

出版者的話

哈里·杜魯門于1945年1月任美国副总统，同年罗斯福逝世后继任美国总统。本书是杜魯門自1945年4月12日就任总统至1953年1月卸任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主要記述当时重大国际和国内事件以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活动。作者以較大的篇幅叙述了他本人在分裂德国，占领日本，干涉中国内政，扶植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提出并实行“杜魯門主义”、“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的叙述是片面的、虛伪的、反动的，但是也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窃取各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果实、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一些情况。为了帮助讀者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动本质及其重要措施，我們將本书翻譯出版，以供参考。

本书分两卷，第一卷《决定性的一年》，叙述的时间从1945年4月到1945年底；第二卷《考驗和希望的年代》，叙述的时间从1946年到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止。

中譯本根据英国霍德与斯托頓公司1956年版本譯出。第二卷基本上照原文譯出。为了节省篇幅，我們只删去了原书第三十章《海底石油》和其他章节有关生活瑣事的叙述部分。

1965年1月

目 录

第 一 章	控制原子能	1
第 二 章	問題和計劃	19
第 三 章	第一个預算	36
第 四 章	国防和情报	53
第 五 章	馬歇爾在中国的使命	70
第 六 章	俄国人在滿洲	86
第 七 章	援助希腊和土耳其	105
第 八 章	馬歇爾計劃	125
第 九 章	柏林的封鎖	137
第 十 章	巴勒斯坦問題	151
第 十 一 章	巴勒斯坦的分裂	164
第 十 二 章	以色列的誕生	179
第 十 三 章	再次参加竞选	197
第 十 四 章	費拉特尔費亞代表大会	218
第 十 五 章	竞选运动和胜利	241
第 十 六 章	第四点計劃	264
第 十 七 章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280
第 十 八 章	美国农业計劃	306
第 十 九 章	共产党的顛覆活动和政治迫害行为	314
第 二 十 章	氢弹	343
第 二 十 一 章	三八綫	369
第 二 十 二 章	朝鮮受到侵略	386

第二十三章	在威克島与麦克阿瑟的会見.....	408
第二十四章	共产党中国的干涉.....	435
第二十五章	艾德礼首相在华盛顿.....	462
第二十六章	朝鮮的危机.....	484
第二十七章	麦克阿瑟將軍的召回.....	505
第二十八章	朝鮮停战談判.....	528
第二十九章	鋼铁危机.....	544
第三十章	1952年的总統选举.....	561
第三十一章	政权移交艾森豪威尔.....	580

第一章

控制原子能

在最初几个月里，我发现一个人当了总统就好像骑上了老虎背。他必须一直骑下去，不然就会被老虎吞掉。1945年繁忙得出奇的九个月教导我：一个总统要经常驾驭局势，如果踌躇不决，局势一定会反过来驾驭他。我自始至终没有感觉到我可以偷闲片刻。

没有担任过总统职务的人，决不能真正了解当总统的滋味，即使是总统的最亲密的助手或家属，也不能真正了解。缠在他身上的职责的链条是没有尽头的，人们决不会让他忘记他是个总统。我相信人性的善远远超过它的恶，而政府的任务就是发扬人性的善；在1945年就是这种信念促使我一直往前走。

我生性不善于突然地或轻易地作出决定，在作决定以前，我需要尽可能掌握一切材料和情况。不过，一旦做了决定，我就不再操心了。我曾经训练自己在历史中寻找先例，因为我常常本能地在历史中寻找我要做的决定的结局。这就是我常常翻来复去地阅读历史的原因。一个总统必须应付的问题大多数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在上两次残酷的战争中，我们看到极权主义侵略者被打得无条件投降。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倡议并致力建立了联合国组织，希望能防止使人类遭受无穷灾难的战争。我曾经在波茨坦会晤丘吉尔、艾德礼和斯大林，努力促使三大国更密切地合作。

但是，尽管我再三努力，同俄国还是越来越难以相处。胜利已经把—一个难以对付的战时同盟者变成了一个更加麻烦的和平时期

的伙伴。俄国为了达到帝国主义的目的，似乎蓄意要利用那些被战争打得支离破碎的邻邦。在远东，国际力量的均势整个起了变化。欧洲大多数国家破产，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忍饥挨饿，只有我们国家能够去帮助他们。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紧急的救济措施，还准备尽一切力量设法防止人类的浩劫。

我们现在负荷的经济和财政重担压得我们步履蹒跚。从战争时期转到和平时期的调整工作即将完成，我们进行得既周密又有秩序。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十分顺利地发展，在几百万军人陆续复员的情况下，还做到了和平时期的充分就业。我们正亲眼看到美国在变成一个空前强大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

但是，194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大得使我们同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件事的后果、结局和问题。这就是原子弹。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控制核子能的秘密。我现在的职责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在利用和控制原子能的问题上，我必须作的决定和要向国会提出的政策很可能影响文明的未来发展。这将是希望和严重考验的时期的开端。

关于控制原子能的议案已经提交国会。那就是在日本投降日过去后不久拟就的梅—约翰逊议案，它提出了军事方式的解决途径。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永久性的“曼哈顿区”，由军事部门控制。

在10月3日送交国会的咨文中，我十分强调和平时期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原子能不应当由军事部门控制。1945年秋天，参议院各委员会在有关原子能的议案由谁处理适宜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致使立法程序被拖延了下来。这场争论的基本分歧点是：这种新的力量究竟首先是一种军事武器，还是一种和平建设的潜在动力资源。

参议院成立原子能特别委员会以后，这场立法争论终于得到

了解决。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馬洪，一个忠诚而有天才的公僕；在拟訂原子能计划的立法工作中，他的领导作用值得大大表扬。

11月30日，我送给掌管原子能计划的几个官员一份备忘录，說我认为梅一约翰逊议案应当修正，应使民用占优势；同时我向参议员麦克馬洪指出由文官控制的必要性。麦克馬洪同意設法修改议案。然而，几天以后，他提出一个任命案，建議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也参加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军事部門强烈地感觉到控制原子能的发展事宜如果不归他們直接管轄，也应当由他們主持，他們正强硬地向国会提議这样做。

12月4日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会议。除了派特逊、福萊斯特尔和参议员麦克馬洪以外，格罗夫斯將軍也在場，还有度量衡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和原子能委员会顧問詹姆斯·紐曼。

我請他們每个人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我表明我的态度，我說整个计划及其执行应当由文官控制，政府应当垄断原料、設備和生产过程。

12月20日参议员麦克馬洪提出参议院第一七一七号议案，实质上，这个议案就包括这个解决办法。12月27日派特逊部长提出一份备忘录，說明他的看法和他的一些反对麦克馬洪议案的顧問們的看法。我十分仔細地加以研究以后，在1月23日答复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我提出这份备忘录，坚持由文官控制；

“陆军部长在12月27日提出的备忘录說明他和临时委员会的一些委員对我的关于梅一约翰逊议案的特別修正案的建議的看法。

“經過仔細考虑以后，我断定11月30日我的备忘录中的建議应当坚持，不加修改。

“我請你們注意下面特別重要的几項；

“(一) 国会为控制原子能成立的委员会应当完全由文官組成。这既符合美国現有的传统,也有法律根据,我国法律明白地禁止武装部队現役人員在政府部門担任其他职位。梅—約翰遜議案的这些条款需要修改。依我的判断,原子能問題也沒有理由违背法律。

“我同意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可能需要武装部队人員在政府部門担任一些特別适合他們的經驗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可以像过去一样,通过特別的授权立法。不过,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的措施,只有在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国会才会采取。

“(二) 在我看来,一切分裂性物质的占有、生产和处理都由政府实行絕对的壟断是必要的。当然,分裂性物质同可以产生分裂性物质的原料是要区别开的。所謂分裂性物质,我指的是鈾 235、钷或者富有鈾 235 和钷的任何物质。

“我承认,对分裂性物质实行严密的控制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同由政府壟断在应付国际問題时的好处比較起来,或者同允許私人拥有或生产这些关系重大的物质的危险比較起来,那是很小的;这些物质的应用是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全的。原子能应当为人民造福,应当尽可能广泛地为人民服务。只有由政府壟断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原子能为社会謀福利。

“(三) 我坚持这些原則,并认为必須給私人充分机会享受原子能方面的各种发明的专利权,必須調整特許权使用費,使之公平合理。这些条款将保证原子能广泛地为公众服务,同时保留特許权的鼓励形式,以維持私营企业的利益。

“虽然我只談談 11 月 30 日我的备忘录中的三个要点,不过,我认为备忘录中的各項建議都有必要坚持。

“应当通知众議院軍事委员会主席和众議院的領袖們說明政

府希望重新提出梅—約翰遜議案以便予以修正，如不能，就不要在眾議院改變該議案的現狀。

“我還希望，政府官員們在國會各委員會里或者在同國會議員們討論有關原子能立法的時候，不要發表同我 11 月 30 日的備忘錄中提出的並在這裡加以重申的各點相矛盾的意見。

“哈·杜”

由文官控制原子能的議案碰到許多困難。提議由軍事部門控制的人在國會中有許多朋友，參議員麥克馬洪要使人們支持他的措施真是煞費了苦心。2 月 1 日，他差不多花了兩個鐘頭同我在白宮討論他的困難。

為了公開支持參議員麥克馬洪的議案，我給他寫了這封信，並拿出去公開發表：

“親愛的參議員麥克馬洪：

“你征求我對參議院一七一七號議案，即有關國內發展和控制原子能的議案的意見。我願意在這時把我的想法告訴你，因為我認為，不論是從我們國家的福利的角度，還是從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極端重要而且迫切的問題。

“我很贊同你們委員會在審議原子能問題的意見時那種仔細的不偏不倚的態度。我相信，這種符合民主傳統的審議已經幫助人民對這樣的立法要碰到的問題獲得比較透徹的了解。

“你會記得我在 1945 年 10 月 3 日向國會提出了一項特別咨文，呼喚通過立法來確定國內控制原子能的政策。從那以後，我用了相當多的時間來進一步研究這個極端困難的問題。另外，我還研究了一些技術情報和人們在審議會上所發表的意見。因此，我覺得我已經考慮成熟，可以比過去較為詳細地提出我認為正確的

原子能立法所必不可少的内容：

（这封信接着提出前面談到的致陆軍部长和海軍部长的备忘录中的三点意見，三点的次序和先前一样，詞句也几乎一样。信中接着写道：）

“（四）我在10月3日的咨文里曾經写道：

“‘我們的科学和工业之所以发达，根源在于我国所特有的自由研究的精神和自由企业的精神。……（这）是我們維持科学和工业的卓越地位的最好保证，而科学和工业正是我們民族幸福的依靠。’

“这方面的立法必須保证独立进行研究的真正自由，必須保证对传播情报的控制不致于阻碍科学的进步。

“原子能立法还应当保证原子能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和現在国会考虑設立的全国科学基金会的研究工作两者互相配合。

“（五）上述有关我国控制原子能的条款，每一条都大可促进国际上达成一种安全有效的協議，使原子能的利用最終只限于和平和人道的目的。原子能委员会应当有办法立即执行关于視察和监督分裂性物质的生产、情报的传播和此类国际活动地区的任何国际协定。

“我觉得以最快的速度制訂我国有关原子能的正确立法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头等重要的問題都决定于这一行动。

“历史上荣誉的地位正在向你們委员会——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造福无穷的立法的首創者招手。

“忠誠的，

“哈里·杜魯門

“1946年2月1日”

关于制訂国际上控制原子能的計劃問題，已在同一時間提交山国务卿貝爾納斯指定的一个特别的政府委员会。

1月14日的国情咨文重复了我們通过联合国組織发展有效的控制的願望。我派出参加1月間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正式會議的代表团受命設法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这是履行上月在莫斯科所达成的協議。

英国人，当时是主人，向大会提出了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計劃，这个計劃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于1月26日获得通过。大会同意这个新委员会的第一次會議于1946年6月14日在紐約举行。

当联合国正在考虑成立一个机构来討論控制原子能問題的时候，国务卿指定的委员会已訂出一个控制原子能的計劃，这个計劃可以在联合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开会时向它提出。

这个委员会有五个委員；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遜任主席，和他一起工作的有前陆軍部长助理約翰·麦克洛伊，还有同发展炸弹关系最直接的三个人；范尼伐尔·布希博士、詹姆斯·康南特博士和萊斯利·格罗夫斯少将。

有一个顧問团同这个委员会合作并为它服务，顧問团的任务是分析和鉴定一切有关国际控制問題的事实，并提出建議。顧問团的主席是田納西工程管理局的主席戴維·李連塞爾。团員有：新泽西电话公司总經理切斯特·巴納德、罗伯特·奧本海默博士、蒙山多化学公司副經理兼技术指导查尔斯·托馬斯博士和通用电气公司副經理哈里·溫。

这个顧問团工作得很出色。它透徹而細致地研究了問題的各个方面。它的报告得到上級委员会的一致通过。这就是人們常提到的艾奇遜—李連塞爾报告，它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献。

3月21日，我从国务卿貝尔納斯那里得到这份报告。那时候已經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控制原子能的問題有一定的影响。

3月8日，参議員麥克馬洪到白宮来报告，說他提出的原子能議案即將遭遇新的困难。参議員范登堡將对这个議案提出一項修正案，修正案提出要成立一个軍事聯絡局；实际上，这个聯絡局和建議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是重复的。它可以先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了解一切事情，它有权在它所选择的任何时候坚持同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商量事情，它有权將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采取的它认为“影响国防”的任何行动提請总统注意。

3月12日，参議院原子能委员会通过了这项修正案，参議員中只有麥克馬洪一人投票反对。第二天，同样多的人投票通过了一篇略經修改的說明书，投反对票的又只有麥克馬洪一人。

这项修正案将会取消文官至上的原則，按照这项修正案，軍事部門有权否決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軍事部門要求这种否決权的理由是：維護国家的安全首先是武装部队的任务。但是，这种說法是錯誤的。維護国家的安全和国防是一种有系統的关系政府各部門的職責；而交給軍事部門的只是它的許多方面中的一面。

3月14日，在記者招待会上我就这一点发表談話說：

“我不认为一般公众甚至国会人士都清楚地了解由文官控制这个委员会的含意。我曾經努力在2月2日的信中把这一点說得十分清楚。我的意見是这样：軍事部門当然要起重要的作用，应当同它商量；但如果认为只有軍事部門能够保卫国家的安全，那就錯了。直接对总统負責的文官組織应当担負平衡地大力发展原子能的全部責任，以利于維護国家的經濟利益、国家的安全、以及保持对其他国家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明确的立場。現在，总统首先是美

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他所直接管辖下的文官委员会，决不会妨碍武装部队的正常职务。”

3月16日我同国务卿贝尔纳斯讨论国会是否会通过一项原子能法，腰斩我们在原子能方面促进国际合作所进行的努力。我们应当设法将我们关于国际控制的计划提交联合国，而不受国内法律的妨碍，以致我们不可能参加这个管制。

贝尔纳斯对我说，委员会准备随时提出报告。他建议我们提出一个在国内外都有威望的发言人。在我看来，伯纳德·巴鲁克这人正合适。理由有好几个。其中之一便是巴鲁克在参议院里很受人尊重，而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同政府控制原子能的计划的关系可能有助于消除国会中反对麦克马洪议案的一些意见。近几年来，巴鲁克在国外建立了许多友谊，包括同丘吉尔的友谊；而且，他老早就享有“政界元老”的声誉。我去拜访他，希望他还会给我们要向全世界提出的建议增加份量。

3月18日，宣布了对巴鲁克的任命，报界的反映很好。当天，我和国会“四大巨头”会晤的每周例会完全用来讨论麦克马洪议案。我说明了当初制订这个议案的理由，并且说我是不会同意任何不受文官控制的法律的。

贝尔纳斯给我带来艾奇逊—李连塞尔报告的最后草案，我立刻坐下来研究。然而，这份报告通过非官方的途径落入报界之手。它使巴鲁克很不安，他要求见我。他来了，交给我一封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

“您这样信任我，任命我为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这在我当然是十分感激的。我既不低估这个荣誉，也不低估这个责任；不过，在我把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以后，有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忧虑，所以，我想同您讨论一下这些事情。据我的理解，我的

責任和權力現在只是直接或者通過國務卿按照您的指示在聯合國組織內執行美國關於原子能的政策。我看不出我有什么參與制訂政策的責任或職責。

“艾奇遜先生領導的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在報紙上發表以後，我不得不注意這種情況。我沒有低估發表這個報告在美國和在全世界的影響；在我還沒有機會仔細研究這份報告以前，我不能表示我個人對它的具體意見，國務卿貝爾納斯轉給我這份報告的信說：副國務卿領導的委員會一致同意這份報告。這就使這份報告十分接近美國政府的政策的範疇。

“我知道一般公眾認為我將同決定我們的原子能政策的工作發生密切的聯繫。這種看法沒有法律基礎，現在副國務卿領導的委員會的報告已經發表，它的內容將大大影響政策的決定。雖然前幾天我只能粗略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但已相信這份報告將成為人們議論紛紛爭辯不休的題目。這份報告的發表（我知道是沒有經過官方批准的）並不會減輕局勢的困難。

“就是這些事情使我感到煩惱，我想在我自己還沒有最後肯定在這種局勢下我能不能對您有用之前，先和您談談這些事。我需要多一點時間來考慮。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您能通知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將確定我的任命的任何行動推遲一些時候，等我有更多一點時間把事情考慮一番再說，這樣就可以避免各方面的困難。

“尊敬您的，

“伯納德·姆·巴魯克

“1946年3月26日”

我首先向巴魯克先生解釋：艾奇遜的報告明顯地表明是一份工作草案，不是經過批准的政策文件。我還告訴他說，要他在聯合

国内执行的政策都将是经过我批准的。我指出，依照法律，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都要受国务卿的监督。我告诉他，当然，国务卿可能会要求他帮助草拟政策的建议，供我批准，不过我不打算给他担任不同于驻联合国的其他代表的任务。

巴鲁克先生接着去见国务卿贝尔纳斯，贝尔纳斯后来告诉我，他给巴鲁克一封信概述他的职责：

“亲爱的伯·姆：

“我在总结了4月18日我们讨论的问题以后（当时汉考克先生和塞耳先生也参加了讨论），已经请你帮忙在我同总统决定美国的政策的时候给我一些建议；你代表美国出席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将以这项政策为指针。

“你说依照法令你不必参与政策的决定。事实是：依照法律，政策由总统决定，而经过我传达给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不过，我知道实际上总统在决定政策时一定会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呢，也会征求你的意见。这就是我要求你充分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已经告诉你，我很满意在艾奇逊先生领导下准备的报告，人们已经叫这份报告为国务院的报告。不过，我告诉你，我并不认为它就是这个问题的结论。相反地，你在考虑这问题以后提出的任何意见，我都将予以仔细的考虑。

“我已经建议，你陈述意见应当不拘形式。我希望你在研究的过程中随时给我提意见。我这样提出建议，是因为我随时都可能被叫去同总统讨论这件事。我愿意向他，或同你一起向他提出我们认为对他考虑这个问题有帮助的任何意见。

“不必作正式报告。决定政策的是总统。你和我可以向他提出建议，正如我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向他提建议一样。决定政策是

总统的责任；我认为决定以后不应当就由他公开，而应当传达给你，你作为美国的代表，应当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不过，这将留待总统去决定。

“一旦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开始工作，你就要和国务卿密切合作。预料不到的事情将会发生，对待这样的一切事情，你必须谨慎地运用你的判断力，只是要避免采取同总统的政策矛盾的立场。

“我相信你在这些事情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你的行动对我负责，就像我的行动对总统负责一样。我知道他的基本政策是什么。掌握了基本政策，对待预料不到的事情应当采取什么立场我就不会犹豫不决。如果遇到十分重大的事情，我就设法向他请示。我们在看法上的分歧没有一次不是很快就消除的。我敢肯定你和他也会这样。

“如果你需要国务院的什么帮助，我敢肯定国务院毫无问题会支持你的。万一发生问题，你可以凭这封信要求国务院的官员帮助你。

“我打算在星期二的早晨离开华盛顿。祝你运气好！”

“你的忠诚的，

“詹姆斯·贝尔纳斯

“1946年4月19日”

巴鲁克，一向被称为“总统们的顾问”，当然充分了解总统对国家政策的职责。在我看来，他所顾虑的实际上是他会不会得到公众的承认。他从来就很重视他的意见和建议（有些并不是总统要求他提的）是否被公布出来。大多数的总统所接受的意见总是比他们可能采用的多。不过，据我了解，现在还只有巴鲁克一个人由他自己建立了非官方的“顾问”的声誉。

我要求他按照我所选定的职责范围协助政府。我并不打算要

他告訴我他的任务应当是什么。我很客气地把这一点向他說明白，貝尔納斯也是这样做的，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來。

巴魯克先生对原子能計劃的主要貢獻是他把艾奇遜—李連塞爾报告从一份工作报告变成了一份正式的系統的建議，他并且增添了一条：建議給违反規定的任何国家以制裁。6月14日，巴魯克把美国的計劃提交联合国原子能委員會。大約数小时以后，事实表明，苏联另有它的一份建議，而这份建議同美国的意見恰恰針鋒相对。

在以后的一个月里，巴魯克和他的同僚們，特别是約翰·汉考克、菲迪南德·艾伯斯塔特和理查德·托耳曼博士，把美国的詳細計劃提交联合国原子能委員會成立的几个委員會。俄国和波兰的反对是很明显的。实际上，俄国人所希望的計劃是：各国达成協議，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停止原子彈的生产，并銷毀儲存的全部原子彈。这等于要求我們銷毀我們的原子彈；如果我們同意这一切，俄国人才願意討論交換科学情报和設立国际監督的問題。

我們的計劃建議对能够产生分裂性物质的原料实行直接的監督。只有在建立了这种監督以后，我們才能考虑处置我們儲存的炸彈。

如果我們接受俄国的立場，我們就会被剝夺一切，而所得到的只是他們答应接受監督的諾言。这样一来，一旦俄国人发动原子軍备竞赛，我們現在因原子能方面的发现和創造而获得的优势和安全就会丧失。正如我在7月10日写信給巴魯克所說的：“在任何情况下，我們都不应当扔掉我們的枪杆，除非我們能够肯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能武装起来反对我們。”

尽管波兰和俄国反对，联合国原子能委員會后来还是通过了实质上就是美国的計劃。委員會的报告送到了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里，俄国仗着否决权，能够阻擋以后的一切行动。

俄国可能不願就国际監督計劃进行合作是我們意料中的事。我們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保卫我們自己的民族利益。

这时候，英国人对麦克馬洪議案表示忧虑。他們說这个議案使他們沒有机会分享我們的知識和技术以及他們在战时同我們在炸彈設計方面进行合作所获得的利益。我国駐伦敦大使阿弗里尔·哈里曼报告我說，艾德礼首相觉得如果麦克馬洪議案通过了，英国将不得不自行发展原子能生产。艾德礼說他担心麦克馬洪議案将会制止原子能秘密的泄露或者同任何外国包括英国分享。英国政府的立場是，在联合国監督生效以前，英国应当設法获得原子武器，或者至少获得自己开始生产所必需的資料。

掌握这些問題的联合政策委员会（英美的机构）在4月15日完全陷入僵局，次日，艾德礼給我一封长信，在信中他企图为英国的立場辯护。

他說，1945年11月16日的共同宣言里說过，我們希望“美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在原子能方面进行充分的有效的合作。”他认为，这話的意思至少是指充分地交換情报和公平地分配原料。艾德礼說，这项宣言沒有提到在我們当中交換情报，而事实清楚地指出这一点已經有所規定。战争时期把大部分的发展工作以及大規模的工厂建設和生产安排在美国进行，这就意味着技术和工程方面的情报已經积累在我們手里。艾德礼說，現在，如果我們之間进行充分的有效的合作，那就必須交換这类情报。这位英国首相建議联合政策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这个問題。

4月20日我回信給艾德礼說：

“国务卿已經把联合政策委员会討論联合王国的代表們的要求的情况通知我，联合王国的代表要求充分地获得有关这个国家原子能工厂的建設和生产情况的情报，以便他們能够在联合王国某个地方着手建設一座原子能工厂。

“国务卿告诉我这个要求是基于 1945 年 11 月 16 日杜鲁门、艾德礼和麦肯齐·金签署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建筑工程。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引文一）我们希望美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在原子能方面进行充分的有效的合作。

“（引文二）我们同意联合政策委员会和联合开发托拉斯采取适当的形式继续保存下去。

“（引文三）我们要求联合政策委员会考虑并向我们推荐适当的安排这项建议的办法。（引文完）

“如果我们对此份备忘录有所误解，我将感到十分遗憾。

“我认为我们大家曾经同意，依据魁北克协定，美国在战争期间没有义务供给战后的联合王国建造一座工厂所需要的图样，并在建筑和生产方面予以帮助。所以，问题在于这种情况是否已经改变，依据上述备忘录的文字美国是否承担了这样的义务。

“‘充分的有效的合作’，只是一般的用语。我们必须考虑这份备忘录的签署人的意图。我必须说，从来没有人通知我说，提出这份备忘录的目的是要美国承担一种义务：为建造另一座原子能工厂在工程和生产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如果有人通知过我，我当时就不会签署这份备忘录了。

“在您和我签署这份备忘录几小时以后，约翰·安德逊爵士和格罗夫斯将军提出的工作计划就表明当时并没有这样改变我们的义务的意图。我承认我当时并没有注意这份计划，但是这份计划千真万确地表明即使在那些为我们准备要签署的协定的先生们的`心目中，‘充分的有效的合作’这句话只应用于基本的科学情报方面，并没有指随时需要就随时提供工厂的建设和生产方面的情报。

“我们心目中的备忘录的第五段内容如下：

“（引文）三国在基本的科学研究方面应当进行充分的有效的

合作。在工厂的发展、設計、建造和生产方面,这种合作(在原则上大家认为是需要的)应当在互利的基础上通过联合政策委员会一再努力而达成的关于这方面的协议确定下来。(引文完)

“至于谈到在这时候我们达成协议帮助联合王国建造一座原子能工厂,我想,无论从联合王国的立场来看,还是从美国的立场来看,都是非常不明智的。

“11月15日,即在签署上面首先提到的备忘录的前一天,联合王国、加拿大和美国联合发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我们的意图是要求联合国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控制原子能的生产,以便防止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由于我们的这一行动,联合国大会后来通过决议设立了一个管制原子能生产的委员会。我不愿意听人说,在我们关于设立国际管制的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它的目的是要美国提供有关工厂的建造和生产方面的情报,以便联合王国能够另外建造一座原子能工厂。这样的目的你既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想到过。

“全世界的人民要求原子能归国际管制。我们发表那篇宣言就是从这种要求出发。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

英国首相直到6月7日才答复我,他来电说,他迟迟答复是为了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讨论这个问题。电报用很大的篇幅概述英国科学家的努力。艾德礼说,英国科学家在1940年和1941年也是首先研究把原子能用于军事方面的人。1941年10月,罗斯福总统曾向丘吉尔建议两国互相配合努力。这位英国首相说,英国人答应帮助美国的企业,因为“他们深信美国所取得的经验和知识可以为大家自由利用”,这样还可以使英国人能够集中力量于雷达和喷气推进动力的研究。

艾德礼又重复他的要求,说在魁北克的时候,大家曾经同意充

分交換意見和情報；因此，交換大規模工廠的設計和建造方面的情報也不例外。他說，現在有待于美國總統來明確有關美國和英國之間戰後工業和商業性質的利益之類條款。艾德禮說，英國科學家繼續貢獻他們的力量，直到投下了原子彈為止；至此，英國人曾經考慮到國內原子能發展的問題，期望能夠“利用聯合企業里到投彈時為止所取得的經驗。”當戰爭結束的時候，英國人接到通知說，在新的協議未達成以前，美國必須停止供給情報。艾德禮說，為了這件事，他曾經到華盛頓交涉繼續戰時的合作關係。

他在電報里說，“當您同意說應當繼續合作，並且答應要求聯合政策委員會在這方面提出些辦法來的時候，我是感到十分放心的。”

艾德禮爭論說，在聯合政策委員會草擬的文件中，他找不出有哪句話支持這種說法：沒有交換有關建造大規模工廠的情報的義務。他提到聯合政策委員會的一個小組委員會所擬定的一份協定草案，草案規定，在交換情報方面繼續進行充分的有效的合作。他補充說，“我們在歷次討論中說得很明白，我們自己的計劃將包括建造大規模的工廠。”艾德禮繼續說，但是使他感到驚奇的是，當小組委員會的報告交到聯合政策委員會的時候，“發現貴國政府既不準備達成任何協議，也不準備在我們先前達成的協議的基礎上繼續前進，而且還不準備在實際上同意應當通過行政措施繼續合作。”

艾德禮宣稱，他不能同意這種說法：繼續這種合作關係是同“11月間由您、麥肯齊·金和我三人發表的”關於管制原子能的公開宣言不相容的。“我們三國政府在這方面有着特殊的相互關係，這是有案可查的，事實上，這也就是我們倡議發表這篇宣言的原因。在戰爭時開始的合作關係，到了和平時期還應當繼續下去，除非或者直到有一種更廣泛的制度可以代替它為止，這一點肯定地

不是同宣言的目的不相容。”

这位首相說，在共同控制原料这一重要方面，合作关系仍然繼續着，“那末，为什么我們今后要放弃共同管理情报呢？”

艾德礼說，“在华盛頓宣言里，或者在联合国大会的決議里，我看不到我們在交换情报方面或者在控制原料方面有什么理由需要散伙，除非有一种更广泛的合伙关系出現。一想到您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不免感到遺憾。”他那冗长的电报是这样結束的：他主张除了在原料方面繼續合作之外，还要繼續交换情报，“依据各种文件和我們过去共同努力的历史，我們相信我們有理由获得有关安全的种种情报，使我們保持适当的警惕。”

就国会里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不能立即答复艾德礼的电报。究竟是麦克馬洪議案最后获得批准呢，还是梅一約翰遜原来的建議稍經修改就能获得通过，現在还不能肯定。在国会未确定以前，我不可能就政策問題对英国有所表示。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不論国会通过什么議案，都将严重地阻碍和限制我們在原子能方面同英国人的合作，这一点是已經很明显的了。麦克馬洪議案經過修改，最后在国会里通过了，1946年8月1日我签署了这个議案。根据这个議案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于1947年1月1日开始工作。我挑选了戴維·李連塞尔担任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在担任田納西工程管理局主席的时候工作非常出色。李連塞尔在艾奇逊委员会的顧問团担任主席的时候，已經获得有关原子能問題的知識。

在国际管制成为事实以前，为了民族的安全，也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利，美国已經准备实行有計劃地发展原子能的方案。

第二章

問題和計劃

我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看到政府要为增进和保护人民健康做点事，就大惊小怪起来。我常常发现，气势汹汹地反对联邦政府医药补助的就是那些不需要补助的人。但是事实上，我們大部分的人却因为无力支付医药費用而得不到必要的治疗。

早在我懂得一点事理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难过，我看到那么多的病人，只是因为他們和社会都出不起錢，便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医疗，而且不仅是那些貧苦的病人必須依靠施舍，就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也付不起昂貴的現代医疗費用。在我第一次担任政府工作的經驗中（那时我是县行政人員之一），我就在这方面看出一些問題来。我看到病人付不起医疗費用，被撵出医院，不治而死。不久以后，我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担任县政府首长时，我曾协助創辦了一所医院，为那些进不起現有医疗机构的病人治疗。我們知道許多城鎮对于病人和受伤者的治疗待遇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即使在那些城鎮，病人也还得证明負担医药費用的能力或证明符合施診的条件。

在我当选为美国参議員后，我支持在公立医院設置基金的各项措施，以期改善这种状况。在我就任总統后，我决定要在这方面多做一点事。

常常有人問我，联邦政府究竟有什么責任要关心人民的医药治疗問題。这难道不該归地方政府負責嗎？答案很簡單。地方政府不會負起这个責任，而且它也不可能沒有联邦政府的帮助，单独

地負起这个責任。

一則因为疾病和传染病并不尊重城界州界。我們从对付小儿麻痺症和其他危害国民健康的疾病的經驗得到证明，沒有一个地方政府能够自保。但是最迫切需要联邦政府給予帮助的最大原因，却是由于被揭露出来的我国千百万的青年男女不合乎服兵役条件这个惊人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經证实我国人民的健康状况远远不够理想，我认为現在該是联邦政府想点补救办法的时候了。

当我看到我国青年身体不合格的統計数字时，我大为震惊。截至1945年4月1日止，从十八岁至三十七岁应征报到的公民約有五百万，經過检查，因为健康问题而被淘汰的占30%。此外，陆軍和海軍方面，因为身体或精神不健全必須复員的約有一百五十万人，伤员还没有計算在內。同时，在現役軍人中，还有同等数目的人，在入伍以前所患的疾病需要給予医疗。事实上，有34%的人是不合格的。对于我們这个在世界史上最大的国家來說，什么都走在別国的前面，可就是在保护人民身心健康这个基本責任上，却如此落后，这真是莫大的耻辱。

申請加入妇女軍团的青年妇女，三分之一以上因为身体或精神方面的原因而被拒絕了。

总计將近八百五十万青年人，照理應該是身强力壮，但却发现不合服兵役条件。

这是一个駭人听聞的揭发。我认为美国應該是最健康的国家，在发现和发展增进公民健康的新方法方面，應該起领导作用。一旦我能够把注意力轉移到国内最迫切的問題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国民保健方案。罗斯福总统早在他的《經濟权利法案》中就提到了公民有“享受适当医疗的权利和获得良好健康的机会”，因而为保健方案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5年5月24日，一个社会保险计划由紐約州的参議員罗伯特·华格納和蒙大拿州的参議員詹姆斯·墨萊在参議院里提出，同时由密歇根州的众議員約翰·丁格尔在众議院里提出。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該计划使每一个男子、妇女、儿童都能享受健康保险的好处。这个提議是作为創設医院的希尔—伯頓条例的修正案提出的。

虽然在原則上我贊成华格納—墨萊—丁格尔議案，但是我不大相信它能順利地在国会里通过。这个議案的头緒过繁，目标过多。因此我在1945年9月6日致国会的二十一点咨文中声称，我不久将提出一个国民保健方案。

1945年11月19日我送交国会一份咨文，提議通过扣薪以及其他扣除办法，实行国民强制健康保险。按照这个计划，全国公民，不問其支付能力如何，都能够享受到医疗住院待遇。咨文建議这种全国范围的医疗制度应分散管理，完全归地方政府掌握。按照各地的不同情况和需要，設立地方机构，以便利疾病医疗。

我說得很明白，有了这样一个方案，人民还是有选择医生和医院的自由，而且医生和病人間的金錢障碍一旦撤銷后，病人将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医生。医生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願意工作的机构，可以自由决定繼續单独开业或是和其他医生联合起来開設診所或参加医院工作。医生仍然有权接受或拒絕病人，医生还是能和往常一样执行自己的业务。

我的建議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要点：

- (一) 医疗費用由强制保險費和国家总收入中支付。
- (二) 因病、因伤的工資損失由政府补助。
- (三) 扩大公共卫生和妇幼保健事业。
- (四) 医药学校和医药研究工作由联邦政府給予补助。

(五) 医院、诊疗所和医药机构由地方政府兴办。

我提醒国会不要因为有些人用“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这样吓人的字眼到处叫嚷，就吓得连碰都不敢碰健康保险问题。我绝不主张实行什么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我知道美国人民也不要那玩意儿。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要求所有的医生都是政府的雇员。我所倡议的不是这种制度。我提醒国会，我们国家虽然很富有，经得起许多风险，却经不起疾病。我们相信保险可以预防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这个信念已经成为美国的传统，而目前所提出的这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是为了预防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健康蒙受到的损失。

我所提的健康保险计划，其中有許多要点，虽然不是全部，但都已包括在华格纳—墨莱—丁格尔议案中，国会当时正集中讨论这个议案。这个议案还提到一些其他问题，因而使问题多余地过于复杂化。在1946年审查这个议案时拖得太久，因而给予反对派充分时间，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反对运动。它不仅反对这个议案，而且根本反对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增进国民健康的原则。

华格纳—墨莱—丁格尔议案建议薪金在三千六百元以下的，征取等于薪金收入3%的所得税，这笔款项由劳资双方平均负担；这个议案也还包括我的健康保险计划所列举的各点，虽然不是全部。同时这个议案还扩大了社会保险总额和失业保险的范围。部分地由于这个原故，当华格纳—墨莱—丁格尔议案提到参议院的教育与劳工委员会讨论时，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反而不必要地模糊了主要问题。在议案讨论期间，反对势力不断地增强。这种反对的意见，主要来自一贯敌视进步政府的集团和美国有组织医药界特权势力。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还这样认为，大多数的开业医生——普通

医生——都能体谅而且赞成公众对于健康保险的要求，所以我觉得由一小撮自命代表全国医药界，凭借医药团体，大量进行收买議員，以期达到自己利益的人们来代表我国医药界的意見，是不公平的。

美国医学协会的領袖們坚持主张他們能够为全国医药卫生問題制訂一套令人滿意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在我执政期間，美国医学协会从来不曾提出任何可行的办法来代替强制健康保险的建議。美国医学协会的反对意見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它曾經强烈地反对公共卫生部門，反对創辦村鎮公立医院的建議，也反对在全国各地建立医院和診療所的希尔—伯頓条例。

华格納—墨萊—丁格尔議案在第七十九屆国会第二次會議中被扼杀了。我在1947年5月19日送交国会的特別咨文中，为爭取实现全国卫生的立法，重新发动了一次斗争，再度提出1945年11月19日的建議，并重申迫切需要的理由：

“我所提出的全面保健方案对于国民福利有极重大的关系。方案的中心在于国民健康保险。在这个方案成为我国社会結構的一部分以前，我們將繼續浪費掉我們最可貴的国民資源，而且将不必要地使国民繼續遭到无穷的痛苦和不幸。”

1948年1月，联邦社会保險局长奉命对增进国民健康的可能性进行广泛的調查，并向我汇报今后十年內可能达到的目标。調查工作在同年9月完成，調查結果，清楚地显示出如果联邦政府不采取措施，医生、牙医、护士、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严重不足現象將繼續增长。掌握了这些材料，我在1949年4月向国会提出四点建議，要求（一）制訂国民健康保险法案；（二）制訂扩充医药学校的法案；（三）增加兴建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補助費用；（四）提高联邦政府的補助金額，以促进地方政府对疾病的預防和控制，对妇幼保健、殘废儿童的福利事业以及对一般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最

后一点建議包括設立医药研究基金的要求，以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資助私人和非盈利机构进行研究工作。

咨文指出，这个方案所費的資金要比它所節約的小得多。卫生工作的支出已占国民总收入的4%。而用在預防疾病的开支只占这笔經費的极为微小的一部分。我強調指出，单就生产時間一項來說，公共卫生方案就能节省千千万万的工作小时，虽然它的真正价值是无法以金錢估計的。

这个方案基本上还是1945年我所提出的方案。反对派也还是那些人——現政权的反对政党、反动派和“医药团体”的領袖們。而用以破坏这个方案、迷惑和欺騙人民的謊言，也还是“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那一套調調。

为了揭穿反对派的宣传，1951年12月29日，我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成立对总統負責的公共卫生事务委员会，目的在于組織一个完全沒有政治关系、不帶偏見的委员会，由一些能够从公共卫生的全面情况出发，根据事实提出建議的医生、劳工領袖、农业界領袖、教育家和实业家組成。

我选派前退伍軍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医师保罗·馬格納森博士为主席。他从全国各地挑选了十四名代表到委员会里工作，于是全面卫生情况的周密調查工作开始了。

我在1952年1月3日所发布的公告中說明了成立公共卫生事务委员会的理由：

“委员会的目的在于調查事实，提出卓越的专家和非专家的建議。他們的調查結果将有助于公众澄清由于对我所主张的、給我国人民創造适当的医疗条件的任何建設性措施一律加以猛烈攻击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上一个財政年度，由于疾病，我們就損失了五万万个工作日。这一事实就足以說明，我們必須和消耗我們人力的疾病作不懈的斗争。”

經過了十二个月煞費苦心的調查和研究，听取了公众的反映，在全国各地邀請专家进行了小組討論以及各种訪問和集会以后，委员会在1952年12月18日交給我一个以《增进美国健康》为題的报告，汇报了調查的結果，并提出了他們的建議。

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了目前通过自願預付的办法来解决个人医疗费用問題，远不足以滿足人民的需要。它证实了医生人数目前远远不够分配的事实，并且估計到1960年美国将需要二万二千至四万五千名医生。它在医药研究的总开支中，发现了数目大得惊人的赤字，并注意到去年在墓碑和紀念碑方面所花的錢比研究方面多得多。它还发现所有医院都是那么拥挤不堪，許多医院的設備又过于陈旧。报告提出最少要增添二十三万张普通病床和三十三万张精神病床。

委员会对于补助个人医疗机构，培养更多的医生和医务人员，充实研究和新設机构的設備，增設卫生机构，以及委员会本身今后的工作等問題，都提出了积极的建議。建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 尽量利用联合診所和乡村保健医院推广預付面。

(二) 联邦政府的补助，再加上州政府的补助，用以支持預付保險計劃。

(三) 在內閣中添設負責卫生保險事宜的职位。

(四) 由国会成立一个由十二人到十八人組成的、永久性的联邦卫生委员会，繼續調查国民健康情况，每年向总統和国会提出一次报告。

(五) 联邦政府对于医药教育、医药研究、地方医疗机构，对于兴建医院和医疗团体和以地区为基础进行的試驗性的研究，給予补助。

委员会所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是 1945 年以及在我整个执政期间所提的国民健康强制保险计划和现行的每次诊疗费由个人自付办法的折衷办法。委员会提議設法普遍推广自願保险办法，使未曾保险的千万人民得到好处；凡无力繳納保险费的，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代付。除了政府在卫生事业方面已花的十亿美元外，估計这个計劃每年还需要十亿美元。

这个保险方案和以前提出的是不相同的，因此认为公共卫生事务委员会已經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增進我国国民健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个方案为解决迫切的国内問題提出了一个完全可行而又民主的办法。

在公布报告的同时，我又发布了一个声明，号召大家繼續为保持和增進我們人民健康而斗争：

“我自然无从預言下一届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繼續推行我們在医疗卫生方面所做的工作。不过我希望他們对于委员会的調查結果和建議能給以慎重的考虑。这个报告值得每个美国公民重視。由于从感情出发，过去几年来，大多数的保健方案都得不到公正的考虑，如果还是同样的感情在作祟，因而貶低了这个报告的价值，那真是太不幸了。……”

我就任总統以来，曾經遭遇到一些风暴的日子，进行过一些激烈的爭論。有爭論，有政治分歧，才能发揚民主。但是跟那些年复一年地反对我們所提出的任何增進人民健康方案的反动、自私的人們和政客們爭論，我实在沒有耐性。我在总統任內，曾經遭受过一些沉痛的挫折，但就个人的感触來說，最使我痛心的是未能击败那个阻碍国民强制健康保险計劃实现的反对集团。不过这个反对集团只能推迟、而无法阻止这个必不可少的联邦健康保险計劃的实施。

在首都，正如强制健康保险建議这件事所显示出来的一样，就

有这么一个組織严密的小集团能够大吵大叫，引起人們的注意。大多数的人民却没有这种有組織的代言人替他們說話。只有总统才是对全民負責的。只有他一人不受宗派、职业和經濟上依附的影响。如果說有人为人民說話，那就只有总统。

1946年我签署了整頓立法机构条例，在其他各項改革中，条例还規定，凡是从事院外活动者都須进行登記，并須公开他們的收入来源和支出情况。虽然這項規定对整頓立法机构很有帮助，但是并不能因此真正根本解决立法机关所受的压力和影响問題。

我在參議院工作的經驗，使我了解到在某些場合，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們对国会不无用处。他們經常給国会的各种委員會提供一些难以从別处得到的事实和数字。有經驗的議員知道怎样利用“好的”和怎样迴避“坏的”議員游說者。

在恢复时期，这些議員游說者对于我們遏止物价飞涨所作的努力起了重大的阻碍作用。他們加諸国会的压力，使我們难以进行工作。尽管我一再要求，尽管我早先曾經否决过一个議案，国会1946年7月通过的物价管制法却并不能保护消費者的利益。不在限价之列的商品，其价格开始扶搖直上。国会所通过的物价管制法案，包括撤銷肉类限价的条款，并規定在8月20日以前不得恢复肉类限价。开放自由市場的第一天，在芝加哥牲口市場上，按照物价管制局的最高限价，每百磅十八元的上等牛肉一跃而为二十二元，猪肉从十四元八角五分的限价涨到十八元五角。在7、8月間，一些比較缺貨的家畜，价格空前暴涨，結果造成1946年秋間所謂的肉類恐慌。事实上，9、10月間的肉荒，大半是由于7、8月間乘物价脫繮猛涨，有利可图的机会，而大量屠宰的結果。大量屠宰所得的肉，一下子就給长期吃不到肉的人們所吞嚥，因而造成更大的肉荒。

在听取了必須規定物价最高限額的反映后，依法成立的撤銷

物价管制委员会于8月20日恢复了对肉类的管制。但是肉类不受任何价格的限制已经快两个月了。在这期间，为了牟取高利，不惜把没有长膘的牲口大量地赶进屠宰场。如果国会考虑我的建议，不放松对物价的管制，这种滥宰没长膘的牲口的事件就不至于发生了。

这事的真正责任该由那一帮不顾一切的自私自利的人们来负——他们有的在国会里，有的在国会外——他们鼓励卖主投机取巧，破坏物价管制。

肉类供应情况搞得这么紧张，因此我在10月14日对全国人民的广播谈话中指出，政府正在考虑暂停物价管制，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国家是不利的，因为继肉荒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大吃大喝。另一个补救的建议是进一步提高牲口价格，但是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因为牲口商还是会观望不卖，等待取消限价或更高的价格。

许多人曾建议政府查封仓库，但是这也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查封了空仓库，没有牲口还是徒然。有些人甚至建议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派人到农场、牧场，搜捕牲口，送去屠宰，但是我反对政府采用这种极端的战时紧急措施。从国外进口肉类也不是办法，因为从国外并找不到足够满足我们需要的肉类。此外，许多别国的人民，就是依靠经过加工、可以出口的肉类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

因此，我宣布目前除了取消肉类限价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并声明我正指示农业部部长和物价管制局局长取消牲畜和畜产品的一切限价。

凡是取消限价而不至于出大乱子的几千件较小的商品，都已经取消了限价。我警告说，如果要避免物价暴涨，保证产品充分供应，不但在肉类工业，而且在其他各方面都要克制和冷静。我还

說，黑市買賣、囤積居奇、非法罷工以及其他類似的自私勾當，都會招致災難，只有勞工界，企業界，政府和人民通過我們經常用以解決各種問題的同樣合作方法才能避免發生上述的不幸。紐約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埃米爾·史拉姆在祝賀我這次演說的來信中表示，儘速取消一切限價是唯一解決增加生產問題的方法。我回信說：

“親愛的埃米爾：

“我的看法是，我們不能草率取消限價——至於肉類，那是一個特殊情況。國會對於管制物價不能及時做出決定，因而導致這樣的後果。

“從種種徵象看來，肉類問題明年還是很難加以解決——商人現在又都在爭先恐後地把不夠肥的牲口趕到市場去，因為現在的市價又在瘋狂上漲。那自然需要一年的時間讓牲口長大起來，供求關係才會轉入正常。東西部沿海地區的人民要付出高得驚人的價格才能買到這種肉類，這樣對誰也不會有好處。

“如果國會照我所要求的，在物價管制法期滿前九個月就把它的有效期予以延長，並且允許我們在某一些商品的供應趕上需求的時候，逐漸取消該項商品的限價，那麼情況就要好得多了。

“像衣着、建築材料等必需品並沒有發生供應恐慌的局面，我絲毫不感到奇怪，因為有限價的緣故。如果我們取消建築材料和房租的限價，那麼，我們必將面臨物價漫天飛漲的局面，而使佛羅里達州當年大發橫財的景象^①似乎成了兒戲。

“貪婪似乎已經成為今日的基調，我認為我們只有不惜一切來正視這個問題。

① 佛羅里達州在大西洋與墨西哥灣之間，風景美麗，物產豐富，在美國史上，一度成為地產等項投資的集中地，因而一時出現物價高漲和畸形繁榮的局面。

“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保持合作，动点脑筋的国会，我就不至于急于放松对这些商品的管制。

“1946年10月18日”

1946年秋間，由于一些主要商品的加速取消限价，不久就清楚地看出，继续控制其他商品的价格已经没有用处了。我从来不主张为管制而管制，我认为对物价和工资做全面的控制，只有在它能够作为控制物价飞涨的有效工具时，才可以采用。

1946年11月9日，我以行政命令取消了对工资和物价的种种管制，声明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商品的囤积居奇。这个问题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足以瘫痪经济的主要环节，而这多半应由国会所通过的、不切实际的物价管制法来负责。

为了整顿那些过去担任、现在还担任着复员工作的机构，在12月12日，随着临时管制局的成立，机构上作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合并到这个行政部门中来的有战时动员和复员局，物价管制局，民用物品管理局和经济稳定局。同时，约翰·斯蒂尔曼出任总统助理，协助我调整联邦各部门的计划和方针。

为配合成立临时管制局的行政命令，我又发表了一项文告，宣布这个局将负责继续行使物价管制局和民用物品管理局的职务，以及进行战时动员和复员局的某些活动。自从物价和工资的管制以及大部分物品的定量配给取消以后，经济稳定局的任務已经大体上结束了。

共和党控制的第八十届国会在11月間选出。早在1947年1月6日我在给新国会的国情咨文里就已经建议撤销一些紧急条例。我提出警告说，我们的经济目前正处在危机四伏的时候，物价随时有飞涨的可能。我并向工业界和劳工界发出呼吁，要求前者维持物价稳定，要求后者慎勿节节进迫，提出不合理的提高工资的要求，以免刺激物价上涨。

第二次大战战时权力法将在3月31日滿期，我在1月31日就要求国会再度延长法的有效期限，并指出人力和工資的管制以及大部分物品的限价都已經在1946年11月撤銷，現在只剩下第二次大战战时权力法所管制的几个項目还需要加以管制。其中之一就是粮食，粮食目前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缺乏。目前需要保留的主要权力就是該法第三項所規定的有关优先权和分配权部分。

2月19日，我在給国会的另一份咨文里提請废止1939年和1941年罗斯福总统由于紧急情况发布的、迄今仍旧有效的一些临时条例，此外还提請废止将近二十四項条款和部分法令。咨文里也列举了其他一些應該暫時延期或繼續有效的法令。这个建議是作为进一步解除战时經濟管制而提出的。

其結果就产生了所謂的“1947年的第一次撤銷管制条例”。这个条例在3月31日由国会送給我签署了。这个条例有效地終止了一切紧急管制和各种战时权力，但是为了避免危及我們的經濟，并有力地支持我們的外交政策，对保持某几种原料管制所必需的某种有限权力則延长了三个月的期限。

在各个行政部門重新研究过它們的需要之后，为了保证繼續控制直接影响国际关系的进出口物資，我又提出第二次展延“撤銷管制条例”期限的要求。这个1947年的第二次撤銷管制条例是在7月15日批准的。連同条例公布的有我的声明，声明中提到我唯願不必再为这个条例所規定的各項管制申請展期，但是世界各国物資缺乏的現象并未消除，而物价飞涨的威胁也未消失。有一点要弄明白，我們的目的是在于消除国际貿易的障碍，所以政府不应濫用这些管制权力，在情况許可的时候即应停止使用。

逐步地、审慎地放寬管制的方針，經国会决定废止許多临时紧急条例和战时法令，并經我在7月25日批准而进一步得到实现。为了配合这一措施，我发表了一項声明，指出这是穩健地、系統地

取消一切紧急权力计划的一部分。然而，总统在 1939 年 9 月 8 日和 1941 年 5 月 27 日所宣布的紧急状况以及战争状态继续存在，因此在当时还不可能终止全部战时和紧急权力。

不幸的是，国会没有采纳制定有关管制权力和防止物价飞涨法案的另一些建议。所以有必要在 1947 年 11 月 17 日召开一次国会特别会议。我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了物价已经涨到什么地步，并呼吁会议注意由于物价的高涨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我极力主张制定特别法案，以防止商品交易中肆无忌惮的投机；分配供应不足的商品，并扩大分配运输工具的权力；延长并加强出口管制；限定供应不足的、基本上影响生活费用的生活必需品的最高价格。我还建议延长并加强房租管理。1946 年 12 月 28 日批准施行的两院联合决议，好像是采纳了这些建议。事实上，它并没有采纳防止物价飞涨有效办法所必需的主要措施。所以在签署时我说，这个决议并不能使高涨的生活费用下降，也不能防止物价的继续上升。

国会和总统间的争端现在完全明朗化了。因此，在 1948 年 7 月 15 日，在接受费拉特尔费亚民主党会议的总统提名时，我猛烈地抨击了第八十届国会，因为它没有能够采纳 1947 年 11 月提交特别会议的方案，特别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制定可靠的管制条例。共和党会议举行得比民主党早，并采取了一些我曾要求第八十届国会通过的措施作为党纲。所以在 7 月 26 日召集的“蕪菁节^①的特别会议”上，我暗示说他们很守信用，一定能履行政纲所作的诺言！我告诉国会说，人民正要求政府采取立法措施，以抑止物价飞涨和生活费用上升，并且帮助解决严重的房荒问题。我说，如果我

^① 密苏里州人认为 7 月 26 日是种蕪菁的好日子，所谓“七月二十六，不問干湿种蕪菁。”

們不能采取行动，制止物价飞涨，那真是犯了不顾后果的錯誤。

此后，我在8月5日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又一次責成第八十届国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因为它迄今尚未能完成其所以召开特别會議的任务。然而唯一的回答还是一个軟弱无力的措施；这比起把国家从高物价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所要求的强有力行动，相去未免太远了。第八十届国会不是集中精力，考虑采取积极措施，以应付局勢，反而不惜违背全国利益，满足于遵循为特权階級服务的路线。

在劳工法案問題上，国会和总统之間也横着一道鴻沟。当剝夺劳工权利的判例議案在1946年送到我桌上来时，我否决了这个鎮压措施。但是反对劳工的情緒經約翰·路易斯在1946年秋天不顾政府的警告煽动起来以后，如今又卷土重来，劳工法案終於成为1947年的主要爭端。

1947年1月6日，在国情咨文里，我极力主张制定法案，以解决劳資糾紛的基本問題。我警告說，最近发生的不協調的爭端，不但涉及劳資双方，連政府和公众也被卷了进去，因此要特別小心，不要在这种感情冲动之下，制訂出懲罰性的法案来。我提出了以下四点方案：

(一) 及早制定法案，以防止諸如工会权限糾紛罢工、胁迫抵制以及劳方或資方为了現有合同的糾紛而采取經濟压力等等的不合理作法。

(二) 扩充劳工部机构，以便协助进行集体談判——合并政府机构，以便采取調停、任意調解制和調查事实三个連續步驟。

(三) 扩大社会法案的計劃，以減輕劳工生活无保障的痛苦——扩大社会保險，改善居住条件，增进国民健康，規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标准。

(四) 任命一个临时联合委员会，实地调查劳资关系。

这个方案给解决国内劳资问题提供了一个正确途径。但是第八十届国会却搞出一套错误的办法。

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小弗雷德·哈特莱所提出的议案4月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个严格限制罢工的议案，虽然不无一些优点，却是一个极端的措施。根据这个议案，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就得撤销，而代之以劳资关系委员会；全国工业总罢工、工会工厂制、工会权限纠纷罢工和同情罢工、聚众纠察和政府公务人员罢工，一律列为非法。这个议案还规定违法工会要受剥夺一年订约权的处分，非法罢工者的复工权要受剥夺，可以对工会提出控诉，工会必须提出财政报告，总统有权禁止州际运输、交通和公用事业的罢工。

以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的劳工委员会在参议院里也搞了一个同样的议案。5月间，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两院协商委员会开始把塔夫脱议案和哈特莱议案结合起来。

1947年劳资关系修正法案，即众所周知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6月18日送到白宫里来让我签署。两天之后，我否决了这个法案。否决咨文中列举了反对的理由：这个议案完全违反我国的经济自由政策，因为执行议案的结果政府必然要或多或少地干预集体谈判的进行。由于它牵涉到复杂的法律问题，这个法案势必成为耗时曠日、聚讼不休的根源，因而助长了劳资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敌对情绪。这个法案既行不通，又不合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正常的经济决定中掺杂了政治上的考虑，势必大大地削弱我国的工会运动。我提醒国会议员考虑我在国情咨文里所提出的逐步解决劳工法案的建议和曾经提出的应该马上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没有就劳资关系进行详细而公允的

全面調查，就貿然地提出我國勞工政策要改弦更張的法案。

我在1月間所提出的建議，還是給制定一個調子溫和而又切中時弊的法案提供了適當的基礎，我極力促使國會就這方面採取適當步驟。

在發表否決咨文的當天晚上，我在廣播談話中說明，這樣的法案對多年來勞工關係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會起什麼影響，指出這個法案跟政府提交國會的勞工法案毫無共同之處，並且警告說，如果這個法案一旦成為法律，它不但不能糾正時弊，也不能改善勞資關係，反而會引起衝突和不協調。

6月28日，參議院駁回了我的否決，1947年的勞資關係法案便正式成為國家的法律。為了維護美國男女勞工的公平合理待遇，我总算在我職權範圍內盡了最大的努力。

第三章

第一个預算

联邦預算是政府各項工作中談論得最多，而且是最不为人所了解的一項工作。預算自然要涉及政府执行种种任务所需的款項。但是联邦政府的职务是越来越繁重、复杂，以致除了整天和它們打交道的人以外，別人很难理解它們。

每一个家庭或多或少都得有个預算，以便按照預期的收入，把开支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以內。但是往往因为疾病等等意外事件，开支超出了預算；或是因为营业欠佳，以及添置房屋、車輛等特別开支，以致收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只得削減开支，或是挪借、預支未来的进款，希望日后能够做到收支平衡。

把这个过于简单化了的例子，放大数百万倍，就可以看出联邦政府是怎样編制国家預算的。但是联邦政府的預算除了要滿足我們人民的需要外，还要考虑到許多特殊的需要。而这些特殊的需要是由我們在世界上的新地位和新任务所带来的。在我执政的几年中，战后美国的預算曾經做到收支平衡。其中三年——1947、1948和1951年財政年度——事实上还有盈余。由于南朝鮮遭受侵犯而大大加剧了的国际危机，防止了国家債務的繼續縮減。預算情况的改善有賴于財政上的精打細算，財政部和預算局是我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的得力助手。

預算局是根据1921年的法律而設置的。預算局局长由总统任命，直接对总统負責。一般說来，預算局局长的职务就是“集中、汇编、修訂、削減或增加各部門編制的預算”，逐項加以研究，从而

决定为了达到节约财力和增进效率目的的变更。一份完整的预算和预算局的建议在每年1月间国会召开年会时，由总统提交国会。

当然，除了要求总统亲自参加编制预算的最后阶段，对其中的主要项目加以审核外，不能对总统有过多的要求。但是我个人对预算编制的每一阶段一直都是予以密切注意的。为了研究它的各项细节，我花费了很多时间。

1923年我第一次在杰克逊县县法院工作时，我对国家财政问题就发生了兴趣。全县事务都受这个机构的监督。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获得了掌管收入，监督开支，以及征收捐税、动产税、不动产税的极为可贵的经验。在执行这样一些职务中，我很快就认识到每个人都在希望由别人出钱来维持政府。

在我就任县法院审判长期间，我就直接负责编制预算，并且督促各部门按照预算办事。在我1934年12月31日离职以前，该县的全部旧日债务，都已根据相当优厚的条件加以清偿；杰克逊县的财政状况好得很。

作为美国参议员，我在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里服务了十年。在那里我熟悉了联邦政府复杂的财政机构，认识到国家预算中数字的意义。我在这个委员会里参加编制过十个预算，凡是由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或者那几年向国会提出的拨款，我都仔细地研究过。

由于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作为总统，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编制预算，草拟预算咨文，一年一度地送交国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为了编制预算，预算局局长（在总统办公厅工作）和财政部长，和我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我经常掌握编入预算的全部项目的第一手材料。按照法律规定，国家元首每年必须向国会提出一个预算案。而美国政府是按照立法机关制订的预算办事的，而不是按照行政机关编制的预算办事。行政机关编制的预算充其量不过是一纸蓝图，由国会根据它制订出最后的真正预算。然后，像其他立法提案

一样，国会将这个預算案提付表决。因为我們有这么一个立法預算，总统提請撥付的各项費用，就可增可减，或者根本不予通过。这是宪法規定了的；宪法規定征稅和撥款必須由国会来决定。

根据总统每年提交国会的建議而制訂的預算总是要比实际执行的預算早半年——那就是說，自本年7月1日到第二年6月30日这一財政年度的預算案在当年1月就要送交国会批准。例如，我在1945年4月間就任总统时，而1946年度的預算，亦即1945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的各项經費，已由国会批准。因此，我上任后應該提出的第一个預算案要在1946年1月20日提交国会，而那是1946年7月1日至1947年6月30日这一財政年度的預算。

罗斯福总统在他执政期間把預算工作从財政部轉移到总统办公厅来，划归預算局局长掌管。但是在我开始編制我的第一个預算之前，我就决定改变一下。为此我把預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請来。

“我希望把这个工作放在三脚架上，”我告訴他說，“由財政部部长协助你我来編制預算。”

我在总统任期内提出的八个預算就是这样編成的。

哈罗德·史密斯因为身体不好，在我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内就辞了职，于是我任命詹姆斯·韦伯接替他的工作。此后我跟韦伯局长、斯奈德部长定期碰头，一起通盘研究預算計劃。后来，我跟韦伯的继任人弗兰克·佩斯和弗雷德里克·劳頓也是这样做的。

預算局局长把內閣閣員和政府各部門的首长一一請了来，討論他們的要求。国防部是最会花錢的部門，因此首先征詢这个部的意見，然后輪到掌握援外計劃的国务院，像这样逐一地进行討論。在和斯奈德部长商量过后，对于需要多么大一笔收入才能滿足各部門提交預算局的开支計劃，我就有个譜了。

在編制預算期間，預算局局長每星期最少到我的辦公室來兩次。我允許他隨時可以進來見我。我在編制預算案上所花的時間兩倍於以前任何一任總統。我經常探討妥善經營管理我們債務的長遠計劃，滿足美國人民對經濟和社會的基本的、迫切的需要，以及我們盟國的需要——這三者之間的適當關係。在這個關係中，各部門之間較少摩擦，因為它們覺得在把它們的要求提供上級考慮這一點上，它們有同等的機會。一次又一次，整天整天地在我辦公室里開會，終於使我了解到它們真正的需要。經過這樣的反復商討，我就給各部門發出明確的指示——我希望他們能夠按照我的指示行事。我是本著我的良心認為正確的观点作出決定的，一旦作出決定，就要堅持到底。

為了要我批准撥付巨額款項，各方面不惜對我施加種種壓力。軍隊方面尤其難以對付。他們經常使用壓力迫使我改變我們煞費苦心編制出來的、希望軍事費用能夠和政府其他需要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相平衡的預算。

比方說，如果分配給三個軍事部門的預算總額是九十億元，那麼陸、海、空三軍就不管自己的實際需要是多少，總是要求平均分攤三十億。這樣任意要求平均分攤的辦法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堅持要陸海空軍證實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並說明為什麼應該平均分攤的理由。它們提不出理由，只好放棄了任何東西都要平分作三份的老習慣。我迫使這三個部門精打細算、明確地對待它們認為必不可少的要求。軍事預算的每一個項目都必須向我和財政部部長提出充分的證據。

它們都是拼命地多要錢，但是最無法無天的要算海軍部。有一個時期，海軍部門竟然囤積了大量的銅板和鋼板。我們對這種情況不得不予以制止，並且最後不得不要求每一個軍事部門詳細開列它們每一財政年度所需要的物資。這樣，我們才開始摸到軍

事預算的底。應該記住，除了目前需要之外，軍事預算還應包括過去緊急開支的追加費和士兵的退伍年金等項開支。

我繼任總統不久，就開始考慮戰後的預算問題。歐洲勝利緊接着就是對日戰爭的勝利。兩方面的勝利使我們面對一個任務：政府既要籌劃資金把戰時經濟轉變為和平經濟，又要設法使生產、消費和國內就業人數維持在高度水平上。

局勢曾經迫使我們建立起一個規模龐大的戰時經濟體系——這種近乎全面的戰時生產在我國還是史無前例的——但是我們又突然面臨着一個極為艱巨的任務：轉變我們龐大的生產機構，以適應和平需要，同時還要保持對勞動力、商品和軍隊的高度需求。

在軍事部門服務的男女人員有一千二百萬，散布在全球各地。從民用企業抽調出來從事戰時生產的還有幾百萬人。未到期的軍事訂貨有數百億美元，這些訂貨是為了促使美國工業按期生產贏得戰爭的軍事物資。

1946年的預算提出了武器、彈藥、租借法案以及戰爭其他方面的巨大支出，可是德國的突然崩潰和日本的迅速投降使我不得不採取斷然的措施，下令修改預算。在5月初，我下令審查概算各个方面。我又吩咐把所有的訂貨合同檢查一遍，看是否能夠在不影響作戰力量的條件下，取消一些訂貨。

因而我能夠通知國會大約有六百億美元的軍事訂貨可以取消。這就節省了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開支，但是我們還得負擔一筆巨大的對日作戰的費用。

1945年間，另一筆用於結束戰爭和復員所需的公債，也就是最後一筆戰爭公債——勝利公債，已經籌措到手。

大多數人覺得聯邦財政計劃非常難以理解，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把批准預算和支付預算混為一談了。國會通過批准預算要比款項的實際支出早十八個月。支付預算代表政府每月開支的和在批

准預算中已經撥付或批准的款項。批准預算之所以能為公眾接受，是因為它只是對未來的開支作出合理的估計；但是支付預算却常常遭到嚴厲的責難，因為它勢必受到政府實際支付款額的影響。

所有對政府開支提出責難或不滿的原因，幾乎毫無例外地是由於看到支付預算所付出的款額而引起的。這種事情的產生，我認為一方面是出於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對情況不了解或是認識不足所致。公眾往往和家庭主婦一般見識，她很滿意丈夫在年頭編訂的全年預算，可是當她看到為了購買雙方同意的用品，每月的薪水都花光了時，就又覺得預算不太理想。這就是估計開支和實際開支有出入的地方。

在我執政期間，預算局局長對政府各部門的開支不斷進行審核。我也派人檢查所有在既定範圍內計劃的執行情況。一旦發現意外的餘額，我就堅持要他們把這筆餘額轉用到別的計劃上，或上繳國庫，用來清償國債。各部門負責人必須對我說明他們手上保留着未動用的經費的理由。預算局不斷地進行檢查，務使預算所確定的并已撥給的經費按照既定的計劃使用。如果發現有了變動，就要他們提出合理的解釋。

有些眾議員和參議員的態度往往很成問題。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地方的和局部的問題和計劃。所以我得時刻提防着他們。他們可能提出各式各樣的修正法案，結果是造成一大疊撥款書，而這些國會議員對國家預算的全面要求往往並不了解。他們只是想在自己的選區里尋找政治資本或是追求頭條新聞。

我覺得不僅是一國的行政首長需要了解預算方面的技術問題，每一個和預算有關係的人都應該有透徹的了解。我尤其希望能夠就預算的作用給新聞記者一個簡單、明晰的解釋，使他們能夠正確透徹地報道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從而使全國人民有一個明晰的輪廓。

为了这个緣故，按照我的慣例一年一度在白宫举行一种叫做“預算研究会”的新聞記者特別招待会。举行这种招待会的唯一目的是把整个預算逐条宣讀，詳細地回答新聞記者所提出的任何問題。每一个新聞記者都发給預算全文一份，等他們到齐了，我一頁頁地念下去，就像老师在教室里上課一样。財政部长和預算局长特別为这样一些招待会繪制了許多图表。預算里任何一点为新聞記者所希望知道的，或者我认为新聞記者應該更清楚地了解的，我們就把那些能够帮助我解答这些問題的政府官員們請到研究会上来。財政部部长和預算局局长在这些招待会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会有时竟用去了两三个钟头，可以說是時間最长的新聞記者招待会。我在白宫期間所举行的三百二十四次新聞和广播記者招待会中，要算这些招待会最使我觉得愉快了。

編制联邦預算可以算是我业余爱好中比較严肃的一項，但是它究竟比一种爱好重要得多。事实上，我认为它是总统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一种永远引人入胜的职责。

在我执政期間，公債的处理工作可以概括地分为三个时期：

(一) 1945年4月12日至1946年6月30日——繼續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經費的筹划工作，同时还要致力于重新改造經濟的艰巨任务。

1945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这一財政年度的預算上所出現的二百零七亿美元的赤字，反映了战时开支轉嫁給这一年的債務。公債总額从1945年4月12日的二千三百四十一亿美元上升到1946年2月的二千七百九十二亿美元的最高峰。随后，公債又降落到1946年6月30日的二千六百九十四亿美元。

(二) 从財政观点来看，第二个时期应自1946年的7月1日

起，一直延長到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時為止。調整是在不影響經濟的情況下進行的。在這四個財政年度內，我們處在一個就業人數和國民收入普遍高漲的時期。我們完成了恢復工作，戰時軍事人員大部分已經復員，大部分的戰時訂貨已經清理。然而，當這個時期快結束時，出現了新的侵略危機，因而再度擴展軍備，又成為我們必須加以考慮的一項支出因素。

這四年內預算的純盈餘達到了四十三億美元。這麼一筆盈餘再加上戰爭開支的一些差額，用來償付公債，公債確實減少了不少。1949 年 6 月公債總額最低曾經降到二千五百一十二億美元，雖然到 1950 年 6 月 30 日又上升到二千五百七十四億美元。

照這個成績看來，已經是相當不錯的了，儘管還應當比這更好一些。在這一時期，我常常提出積累更多盈餘和更多地削減債務的建議，但是第八十屆國會不顧我的否決，仍然通過了不合時宜的和不合合理的 1948 年減稅法案，以致於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三）第三個時期應自 1951 財政年度開始，共產黨侵入朝鮮之後，我們就進入了這個時期。我們的防禦開支急劇地上升，國會也顯著地增加稅收，但還是沒有照我所要求的增加那麼多。在朝鮮受到侵略的開頭兩個財政年度里，我們大体上能夠按照我所倡議的“量入為出”的政策辦事。在 1951、1952 這兩個財政年度內，我們的預算純赤字約達十五億美元，而公債的增加則不到二十億美元。

從 1946 年 6 月 30 日到 1952 年 6 月 30 日，除去開支，政府還得到三十億美元的純收入。這樣的財政狀況我認為很滿意。

1952 年 6 月以後，由於防禦開支的繼續增加，“量入為出”的政策越來越保持不住。如果不修訂稅率法，1953 財政年度的赤字估計將達到五十九億美元，而 1954 財政年度將達到九十九億美

元。我对我們目前，特别是在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增加的时候，那种放弃支付防禦經費政策的傾向提出了警告。

我曾使公債从战后的最高額减少了二百八十亿美元。我的目的是要把总数降到二千亿美元，但是国会不肯为此而冒征收捐稅的政治风险。

1947財政年度，我在預算上做到了收支平衡，而这还是在世界大战浩劫之后，改造战时經濟阶段。1947年我們的財政部还有一笔盈余，1948年我們也有盈余，1951財政年度同样也有盈余。从1945年7月1日至1952年6月30日，这整整六年中，我們的收入多于支出。在我任总统期間，直到1952年6月30日以后財政上才出現了赤字，如果国会当时通过了我的征稅方案，那也就不会有赤字了。

因此，在头两年我所采取的政策，目的在于减少公債，同时还要实现其他种种方案，使生产和消費保持在一个高度的水平上。所以減稅在这个时期里似乎是不合理的。在我执政的中間四年里，我努力做到收支平衡，并且还爭取有盈余結存，用来清償公債，結果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在繁荣时期，增加稅收是合理的。最后两年，按照計劃是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償付战争費用、对外援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遺留下来的数目惊人的国家債務。

在我执政的后期，也就是1952年大选后我在职的最后几个月中，我面前摆着两条可走的道路。一条道路是把国庫內的現金結存花光。我們可以利用这笔剩余来减少債務，那么在我們离职时，就債務的数額来看，我們留下的印象就会好得多了。另一条道路則对国家大有好处。我們在国庫里留下充裕的盈余，并且作些安排，使得新政府接手时，至少有六个月的時間財務上不必重新张罗，而能够站稳脚跟。

当然，我們尽可以在1月間一走了事，让新政府去自作打算。

那可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行徑。但是在我心里占优势的是公众的利益，不是政治上的考虑，所以，我命令各个部門編制一个临时方案，使得整个政府机构的財政和管理工作能够繼續順利进行。

“放手干吧，对的事我們都干，”我告訴斯奈德部长說。

“您所說的对的事，意思是让接任的政府有一个风平浪靜的交接时期嗎？”斯奈德問道。

“正是这个意思，”我答道。

我們把继任的人在正式接任前就請了来，并且为他們在財政部里安排好办公場所，使政府的財務管理工作不至于銜接不上。

尽管我們有机会减少五十亿美元的債務，这样做会使民主党政府显得很有成績，但是我认为这笔錢还是應該留給新政府，好让他們有个良好的开端。

共和党的第八十届国会通过了一項法案，規定那一年的三十亿美元預算盈余要轉用于下一年度的預算。他們估計下一任总统将是共和党人，这么一来，他們就能沾民主党政府所節約下来的三十亿美元的光了。这种賬目上的轉移本不在国会职权范围之内。可是我对此并不在意。

本届国会还企图把政府信用基金留作以后的用度。那就等于說：“財政报告由我公布，但是，我又不提出需要付款的賬单，因为它们要到明年才付款。”

这些信用基金，包括社会保险金、养老金、工人賠償金和铁路員工退休金，都由財政部保管，投資于政府債券里。因此这些基金也就成为政府債務的一部分，必須交代清楚。

我认为政府的全部資產能表达出来，将是一件好事。我常想，如果政府能把它的所有資產开列清單，例如田納西工程管理局、大庫利水壩、胡佛水壩和邦納維耳水壩，以及海港、建筑物和国有土地等等資產，資產总值将远远超过国家全部債務。大家知道，商行的資

产貸借对照表就是这样記的。政府的賬目要是也这样記的話，貸方的数字将相当可观。此外，我也常想，只要国民收入达到国家債務的一倍半到两倍，那就用不着担心我們的債務能不能清償，或是国家财政状况能不能稳定了。

国家債務既可以代表政府对人民福利事业所作的投資，也可以代表强加于我們身上而对整个生命財產是一种浪費的战争費用。前者是政府应負的正当义务。它代表很高的生活水平、医药卫生、軍事安全，国家的进步和繁荣等等具体的东西。与此相反，軍事开支則是破坏、消耗、耗尽构成国家財富的人力和物力。在我就任总统后所編制的八个預算中，我觉得造成唯一真正浪費的就是那些强加于我們身上的战争費用。

我认为“平衡的預算”的好处往往是被过份夸大了。安德魯·杰克逊清償了全部国家債務，而且做到了收支平衡，但是1837年空前的經濟恐慌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而1929年大危机爆发后的不景气局面，就連一个有盈余的政府也受到了襲击。

在紧急时期，例如1930年的不景气，或是1950年共产党侵入朝鮮，政府必須迅速采取紧急行动。而紧急行动往往需要紧急撥款，例如，公共事业振兴署1930年的撥款，就很可能避免国内血腥的叛乱。如果需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了社会福利和安宁，联邦政府就有責任担負起这些費用。

政府是人民的工具，如果一个有效率的、称职的政府所必需的种种措施和管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代議政府就沒有什麼价值了。

怎样建立联邦簿記制度是政府的一桩极为重要的工作。实际上，我相信这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哲学上最最根本的分歧。共和党对政府、对預算都抱着实利主义的——一种頑固的、有多少花多少的态度，即使有时候使一部分人陷于破产也在所不計。

我常常认为民主党所代表的政府实行的是比較合理地分配国

家財富的政策，因此任何一部分人民都能得到一些生活上的改善。我經常關心平衡預算上的數字，正如賬目所顯示的；但是我更關心國內人民預算的平衡。

這就是我制定稅收政策和財政計劃的基本指導思想。我的目的是要盡快減低預算到三百五十億美元之譜，同時把我們的稅收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使國家債務逐漸減少，而又不影響目前的繁榮局面。

羅斯福執政時期，為了支付復興工作的種種開支和供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項需要，只好盡一切可能開辟稅源。因此，在我接手時，稅務部門是個臃腫重疊的破爛攤子。我希望國會能和我合作，制定出一種稅制，國家既有足夠的收入，人民的負擔又公平合理。

由縣法官到議員到總統，我一直信守着一條稅收原則。那就是量入為出的原則，除非碰上關係人民幸福的緊急情況，在那種時候我才認為政府有責任採取緊急措施，籌措經費，以應救濟的急需。照我看來，量入為出並不是什麼神聖的概念，它只是我所知道的最可靠的理財原則。

征收捐稅，依我看來，只能取決於國家歲入的需要。當我力爭要在全民間比較公平合理地分配國家財富的時候，我從來也不主張取富濟貧的徵稅辦法。公平的稅率決定於付稅的能力。我所倡議的各種社會改革，都是以特別法案方式提出，從來不假借徵稅的辦法來移花接木。

關於稅收方面的事，通常是由財政部提供草案。但是眾議院的籌措委員會非常嫉妒財政部在這方面的權力，因此我必須和雙方保持密切聯繫，使得不至於因為政策上的重大衝突而打亂整個稅收體制。

我最感頭痛的是怎樣使國會通過根據“量入為出”的原則來

滿足政府全部計劃需要的徵稅法案。我相信除非對收入甚至支出作好準備，任何向公私業務提供資金的辦法都不會是穩妥的。國會可能投票同意某一項撥款，但是過後也可能拒絕通過適應一些新開支需要的增辟稅源的法案。我真不能容忍國會這種作法，因為一項措施如果值得撥給經費，那麼很明顯，就應該徵收捐稅，撥付使用。

在我執政期間，多少議員都是死抱著一種傳統的犬儒主義的政治哲學：“切勿反對撥付經費，但也切勿贊成增加稅收。”這可能是獲得重新當選的一種方法，但這也是使國家陷入財政困難的一個必然的步驟。

如果不是共和黨的第八十屆國會從中作梗，我的消除稅收制度方面不合理的現象的計劃就可以毫無阻礙地獲得通過。但是第八十屆國會急於取悅多數議員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通過了全面減稅。這在個人收入達到很高水平和幾乎充分就業的時期，減稅是完全不合理的。只要掌握所減稅額的半數，就可以使我的政府消除稅務機構所存在的許多不合理的地方。

當我們把稅收整頓得有些好轉的時候，要不是朝鮮戰爭爆發的話，我們實際上是能夠按照原定的財政計劃實現所有目標的。免稅的項目可以增加，鼓勵的範圍可以擴大，同時還能把生產和消費維持在前所未有的高度水平上。

在執行量入為出的計劃中，為了維持高度經濟水平，我們經常抱著一個想法，計劃必須拿到實踐中去接受檢驗。這一政策和國家經濟以及人民福利都有重大的關係。自然，在某些場合下，經過深思熟慮，我們還得冒一些危險，這些危險比我們所預料的要來得早。例如，我們看到我們的人口每年增加二百五十萬，那就等於每年增加像佛羅里達或衣阿華或路易斯安那那麼大的一個州，這些就意味著我們市場的擴大。人口增加對國民經濟來說是一種挑

战；可是当这二者亦步亦趋地发展时，那就不至于发生不景气了。

我們鼓励經濟繼續向上发展，因为我們知道我們新增加的人口可以加以吸收。但是，仅仅为了显示我們能平衡預算，就嘩众取寵地突然来一个財政緊縮，能够使我們的整个經濟开倒車，結果是弄得銀根奇紧，失业激增。好像有这么一个政治信条，它經常阻止一个总统去向国会請求开辟稅源，除非总统能证明这笔錢已經花掉。我懂得这是好策略。但是我也知道要善于理財——而这才是我的职责。

在国会議事录上記載着的有关稅收和預算問題的謔言和毀謗，比所有其他問題加在一起都多些。大多数的参議員和众議員实际上对稅收和預算知道得很少。在众議院的撥款委员会和筹措委员会中，以及在参議院的財政委员会中，經常会有一些忠直干练的人士，他們对政府財政問題有研究。但是在国会的参众两院中也經常会有不少忠直干练的人士，他們不論是对稅收或是撥款問題，都是以取悅特殊利益集团为已任的。

財政部是政府工作的最后一关。政府所开支的每一分錢都是通过財政部流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沒有一件不和財政部有关，所以必須要有一个稳定的、健全的信用基础，要不然，政府其他部門都要垮台。財政部和預算局是政府賴以运轉的两部机器；它們代表着政府的具体活动。

美国的財政部在政府行政部門中是机构最龐大的一个，对于政府整个活动关系重大，必須严密加以管理，并須經常提高工作效率。我特別荣幸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財政部长，他通曉国内外的財政問題，并且以稀有的技巧和才能管理財政事务达六年以上。

約翰·斯奈德原是我的第三个財政部长，但是在我执政的大部分期間，都是由他負責財政。摩根索部长在我继任总统后三个月就辞了职。后来我又把文森調到最高法院去了，所以文森担任

部长职务只有很短一段時間。我遴选斯奈德执掌政府財政大权是因为我們曾經长期共过事。我在杰克逊县当审判长，他在圣路易城一个銀行里当行員的时候，我就認識他了。后来我們又在一起受过后备軍事訓練。我知道他，作为一个銀行家，懂得銀行經營得好对社会的关系。当我在參議院那些年中，我們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友誼繼續有了增长。

有了斯奈德当財政部长，我就能在財政部里进行一系列早就需要的改革。政府會計制度的彻底改革就是其中的一个大成就。有了由預算局、財政部和政府會計局联合組成的工作組，我們就能够在政府各个部門建立一个統一的會計制度。从前編制財政报告需要三至六个月，現在只要三至六个星期了。

最彻底的机构調整要算在1952年1月計劃并开始的稅务局改組。这次改組是长期調查研究的部分結果，目的在于保证公共事业中的奉公守法的作风和高度的工作效率，保护政府机构不受賄賂营私的腐蝕。有些稅务人員曾辜負了公众的信托；当他們的罪行查明屬实，立即对他們提起公诉。

稅务局的这次改組主要有下列几方面：（一）撤銷稅务局的六十四个征收所。（二）稅务局的局长是唯一由总统委派，經參議院同意的官員。其余的职位今后都須以經過文官考試的人員充任。（三）撤銷由二百多个官員分別执掌联邦各个地区稅务的复杂机构，而代之以不超过二十五个直接对华盛顿的局长負責的地方稅务局局长。（四）建立一个健全的、独立的視察制度，以便随时进行检查。（五）精簡設立在华盛顿的总局的工序。（六）提高稅务人員的薪俸，使这个十分复杂和需要专门技术的政府部門获得质量最高的工作人員。

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流綫型的稅务机构，就使得基层地方稅务机构直接受局长領導，因而責任明确，便于監督。建立从上而下的

严密监督和管理，目的在于保证廉洁、忠实的工作作风。

虽然胡佛委员会曾经建议把复兴金融公司划归财政部管辖，可是斯奈德和我们都觉得财政部不应该经营银行和信贷业务。我们认为复兴金融公司应该保持其作为一个公司的基本骨架，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能加以扩充。拥有我们美国这么巨大有力的经济，如果保留复兴金融公司，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作为扩充紧急贷款之用，在紧急情况消失时，作为紧急收缩之用，那么经济衰退或萧条的威胁就可以大大地减轻了。

在朝鲜战争初期，金融方面发生的一个问题和联邦准备局有关。我认为在我们未能肯定需要多大一笔开支才能有效地充实防御能力以前，对于影响国家债务处理的利率，我们必须保持稳定。

按照法令规定，利率（贴现和利息）的调整是由联邦准备局这个不属于政府任何部门的机构掌握。因此，财政部不能直接掌握和它的债务处理有关的利率。我觉得由于利率提高而使我們进入一个财政拮据的时期，那是不合适的。我还坚决主张在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刻，我们绝不应该迟疑不决，因为这可能引起公众对国家财政的疑虑。

作为政府的首脑，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权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力，保证防御计划的实现。为了这个缘故，我把联邦准备局的委员们请了来。在这次会议上，我要求联邦准备局像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作的那样，全力支持财政部的财政措施。

当然，财政部发行证券，原不必经过联邦准备局的批准，但是按照惯例，双方还是充分地进行会商，以期得到该局的通力合作。

在这次会议上，我得到联邦准备局的保证，一定支持财政部为了应付朝鲜战争所作的财政计划。这个保证完全出自该局的自愿。在会议上，我从不曾示意或告诉联邦准备局应该采取什么特殊步骤。我把我作为总统所面临的问题解释给他们听，他们走后，

我肯定地相信我已經取得了他們的同意，支持我們的財政方案。但是后来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們竟沒有支持这个方案。

協議最后总算是达成了，但是这只是在財政部和联邦准备局的不同意見給总统带来了許多麻煩，給付稅人增加了許多負擔之后的事。貼現率以及公債发行問題显然不足以成为头条新聞（自然，除非在財經刊物上），但是政府財政的穩定以及无数个人的幸福都有賴于这些問題的解决。我对于解决所有这些財經問題的看法总是：我有責任使华盛頓保持其为美国財政中心的地位。財政中心應該在华盛頓——但是要把它保持在那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四章

国防和情报

作为保证我国今后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步骤，美国古老的国防机构必须迅速加以改组——这是我就任总统后的一贯主张之一。在我上任之初，我就力图使所有的军事机构合并，使三军统一归一个部管辖。

合并海陆军，统一归国防部领导这一想法的形成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的，在演变的过程中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就对我国军队组织非常有兴趣，这些年来为改进军队组织而提出的每一个方案我都曾进行过研究。

我在早年对军事史曾作过一些研究，因此我决定加入华盛顿在1792年咨文中所提到的“民兵”组织。民兵已经改名为美国国民警卫队了。

在国民警卫队里以及战后在后备队里当上校时所获得的经验，使我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共和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军事机构，有了非常明确的概念。我在志愿部队里和后来在参议院里服务的经验对我后来作为最高统帅很有帮助。

从珍珠港事件的审讯记录里，我清楚地看出，悲剧的发生，固然是由于陆军或海军司令官的个人失职所致，但是，不健全的军事组织，无论在战场或在华盛顿都没有统一的指挥，这种情况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41年，为了检查国防计划，在参议院里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我才充分认识到由于陆、海军部分立，互不协

調，所造成的浪費和無能到了怎样的地步，在這以前我是不大了解的。我一直認為建立一個協調的國防機構是絕對必要的。在我這個委員會的檢閱台前通過的是由於陸海兩軍各行共事所造成的時間、物力、人力的雙倍浪費。這種情況更加加強了我的上述信念。

作為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和國防計劃審查特別委員會的主席，我確信如果我們不設法協調海陸軍的活動，我們終將使這兩個分立的國防部門垮台，而當空軍也在參眾兩院成立它自己的特別委員會的時候，最後還會使這三個部門都垮台。

陸海軍軍事委員會的主席，特別是在發起撥款的眾議院里，都希望自己能當上陸軍部或海軍部部長。有幾個眾議員，軍事撥款小組委員會和海軍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們，只要一有借口，就要視察陸軍要塞和海軍基地。這些地方要以鳴炮十七響，舉行閱兵儀式等等來迎接他們的。這些大人先生們就是合併機構的主要絆腳石。眾議院的海軍軍事委員會主席是最礙事的。

根據多方面的調查，我發現陸海軍造成了的難以計數的不必要的重復。例如，我發現陸海軍在國內各地，在巴拿馬，都建立有緊相毗鄰的巨大機場，可是海軍的飛機不能在陸軍的機場上著陸，而陸軍的飛機也不能在海軍的機場上降落。這真是我從未見过的可笑做法。在珍珠港，陸海軍的空軍基地不相聞問，就像它們分處在兩個洲，而實際上它們卻是緊挨在一起。而且海軍有它自己的“一支操海軍語言的小小陸軍”，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海軍陸戰隊。海軍還有一支自己的空軍。而陸軍也有它自己的能在內河和海洋作戰的小小海軍。

依我看來，不論在平時或戰時，最高統帥都應該有一個和衷共濟、通力合作的國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過作戰經驗的野戰指揮官，無論是在陸軍中或海軍中，大多數都贊成成立一個統一的國防部。大約在我就任總統前不到一年的時候，我在一個雜

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主张海陆軍合并。我列举了“杜魯門委员会”所揭发的許多触目惊心的浪費事例，竭力主张成立一个新的国防机构，把所有的国防单位都合并到这么一个机构里来，归一个掌握实权的首长指揮。

在那份計劃里，我提出人員配备和物資給养都应集中管理；陆海空軍不应鼎足而三，而應該像一个整体一样，共同策划，一致行动。指揮大权應該由总參謀长直接掌握，以取得战略和作战的协调一致，而不应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在非法定的基础上，由參謀长联席会议权宜掌握。

1945年夏季我第一次有了机会，以总统的身份致力于軍事机构的改組，当时海軍部部长福莱斯特尔提出了增加海軍和海軍陆战队的常备兵額的提案。我认为終止零敲碎打地提法案，拼拼凑凑地搞計劃式的对待軍隊方面問題的时机已經到来了。8月21日，我写信給李海海軍上将，要求參謀长联席会议从陆海空軍总的需要出发，审查海軍方面所提出的法案。我建議审查当中應該考虑到战后我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新式武器的发展情况，以及和这些因素有关的陆海空軍相应的地位。由于这个建議，參謀长联席会议才着手研究陆海軍战后所需要的人力。陆軍方面受命呈报战后他們所需人力的估計，于是陆軍部指定一个以W·貝塞耳准将为首的委员会，研究这个問題。

9月間，貝塞耳委员会报告称，由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缺乏上級指导，而陆海軍調整机构問題又悬而未决，所以不可能准确地估計所需的人力。它建議參謀长联席会议批准它的特別委员会所提出的、曾經以三对一通过的合并陆海軍的建議。然而參謀长联席会议沒有能够达成協議，在10月16日給我提出汇报，并且附来了馬歇尔將軍、阿諾德將軍、金海軍上将和李海海軍上将的意見书。

总而言之，两位陆軍將軍支持合并，而两位海軍上将反对合

并。于是摆在我面前的是，陆军参谋长和海军参谋长在合并军事机构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有着截然分歧的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海军方面一直在为战后的国家安全制订它的计划。这个计划于10月18日送给了我，继续反对和陆军合并，但建议组织更有效的联合委员会来弥补那些公认的不协调的严重缺点。海军方案的主要论点是军事方针必须通过建立高级机构和国家政策紧密配合。我完全赞同海军方面所强调的需要一些更有效的方法，来促使军事计划和我们的外交政策合拍，我也同意我们需要配合国民经济制订工业总动员的长期计划。换句话说，我清楚地认识到，国防计划不光是改组武装力量的问题，而且需要就安全和防御问题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取得密切协调。

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合并机构的议案提到国会里来了——一个是亚拉巴马州议员利斯特·希耳提出的，另一个是科罗拉多州议员埃德温·约翰逊提出的。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在10月17日展开了辩论，这一场辩论一直拖到12月17日，陆军和海军代表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眼看需要总统出面调停，我于是在1945年12月19日向国会提出咨文，建议依照下列纲要把所有武装部队改组成一个部：

(一) 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部，全权负责武装保卫国家的安全。

(二) 国防部部长应由总统指派文职的内阁官员充任。部长之下应设文职的副部长一人和文职的部长助理数人。

(三) 国防部下应设三个密切合作的分支机构：各置部长助理一人，分掌陆、海、空三军。海军仍旧保有它自己的航空母舰上的或水上的空军，而海军陆战队仍应作为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 总统和部长在必要时应有权建立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中

央協調和服务机构。

(五) 設国防部总參謀长一人，三个分支机构——陸軍、海軍和空軍各設司令官一名。

(六) 总參謀长和陸、海、空軍的三个司令官应构成成为部长和总统的顧問团。

除了上述几点以外，我还着重提出，这个新部門的各个主要职位应从三軍中抽調軍官充任。总參謀长一职应由三軍輪流担任，以免国防部对問題的看法为一个或二个軍事部門所把持。

我声称我所提出的合并計劃具备下列一些优点：軍事計劃和軍事預算做到統籌兼顧；統一管理給养和軍事机构較为經濟；協調軍事部門和政府其他部門之間的关系；建立文职人員控制軍隊的最有效方法；創立一个同陸海兩軍平行的空軍部門；有計劃地分配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所需的有限資源；执行始終一貫和一視同仁的人事政策。

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在12月下旬指定成立了一个小組委員會，致力于寻求陸、海軍双方都能接受的合并方案。在八个草案都遭到拒絕以后，托馬斯—希耳—奧斯汀議案终于在1946年4月8日被提到第七十九屆国会里来。小組委員會費尽苦心才制訂出一个可行的而又符合我提交国会的咨文所要求的議案。但是在听取該議案之后，到会作证的全体海軍人員一致拒絕了这个最后的产物。

1946年5月13日，我召集陸軍部部长派特逊和海軍部部长福萊斯特尔到白宫来开会。在这次會議上，我极力說服陸軍和海軍，在合并問題上必須达成協議。我认为如果我不以命令的方式促使陸、海軍达成協議，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我建議他們坐下来談談，找出他們异同之处，然后用书面向我汇报。

5月31日，两个部长送来一份联合报告，概括地提出他們所同

意和不同意的地方。他們的主要分歧包括以下四點：建立一個單一的軍事機構；建立密切配合的海陸空三軍；空軍的管轄問題；海軍陸戰隊的管理問題。

這四點就是陸軍和海軍經常發生衝突的基本原因。我深感失望，對於解決這麼一個傳統的衝突沒有得到真正的進展，于是我確信只有由我親自對陸軍和海軍間的四點分歧一一加以解決，才能為合併問題找出一條出路。6月15日，經過長期審慎的研究，我在給陸、海軍部部長和國會中與海陸軍事有關的各個委員會的主席的信中作出了決定。

在這個決定中，我支持陸軍部長的意見：只有統一的國防部才能真正做到協調一致。我也支持陸軍部部長提出的應單獨成立空軍部的意見，空軍部應該接管所有以陸地為據點的飛機，包括海上偵察機，反潛艇巡邏機和護航機。我認為誰也難以提出有力的理由為海、陸軍雙方繼續保留以陸地為據點的空軍的重复浪費進行辯護。

我同意海軍提出的海軍陸戰隊的任务保持不變的意見。我覺得如果海軍陸戰隊有保留的必要，那麼硬性地規定陸戰隊參加兩栖作戰和陸地戰鬥的範圍的努力將是徒然的。我認為海軍提出的為了保證某一特殊的海上戰役的勝利，應該允許陸戰隊參加一些帶有決定性戰鬥的理由是正確的。

除了上述的決定以外，我同意設立共同防禦委員會，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中央情報局，採購供應局，研究處，軍事教育訓練處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法定機構。我一面促使法案的通過，使海、陸軍能夠早日合併；另一方面繼續努力使海陸軍同意這種法案的各項規定。

儘管在我的合併的決定中，某些基本觀點不合海軍方面的口味，福萊斯泰爾部長還是作了巨大的努力，設法消除現存的分歧。

1947年1月16日，他和派特逊部长在一封联名信中通知我說，他們双方都能同意的合并折衷方案已經協商成功了。

这样的努力使我非常感动，因为这表明他們已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合并固然有賴于立法，也同样有賴于个人的合作。

接到达成協議的通知后，我发布了一項公开文告，其中提到我所草拟的一項行政命令，命令詳細分別規定了按照希望通过的法案建立起来的陆海空軍的任务。第二天，我又通知国会說，提請考虑的合并議案正在草拟中。

这一进展标志着合并軍事机构这一漫长而艰难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現在剩下的只是議案細則的拟訂工作。在我的国情咨文中，我希望第八十届国会对于即将討論的法案給以明智、审慎的考虑，因为这样做既能削減开支，又能确保国家安全。

1947年2月26日，我給众議院議長和參議員范登堡各送去一份議案，这个議案經過修正后通过将成为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这个議案最終在7月25日得到了通过，但是它已經不如送交国会的原議案那么有力了，因为要使陆軍和海軍的意見得到接近，議案包括了双方所作的让步。但是它毕竟結束了对合并原則曠时靡財的爭論。而在我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出現全面的軍事机构。

新的“国家軍事机构”設国防部长一人，由文职的特別助理三人襄理部务。他对其他文职人員的权力仅限于他的本部門，而无权支配陆、海、空軍的文职人員。

法案規定建立陆、海、空軍三个行政部門，分別設置部长一人。參謀长联席會議的存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法律的承认。

法案規定在这个“軍事机构”內建立弹药局，以协调三軍的采购、生产和分配計劃，并就軍事情势拟訂工业动员計劃；法案还規定成立研究与发展局，以协调有关全国安全的科学研究工作。

法案还规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由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陆、海、空军部部长，弹药局长，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局局长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对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作出估计，并处理有关政府各部门共同利益的国家安全问题。

根据法案成立的还有一些重要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置中央情报局，汇集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活动和材料，加以分析和估计；设国家安全资源局，协调军事、民用以及工业机构的需要。

我指派詹姆斯·福莱斯特为第一任国防部长，他在1947年9月15日宣誓就职。

促使合并的理想在立法上通过只是奠定巩固的军事基础的斗争的一部分。为了使这一机构在最初几个月内就发挥效率，我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福莱斯特部长再接再厉地努力克服不是一个国会法案所能清除的、长期存在的竞争的局面。他的主要工作是确定陆、海、空军的具体任务，并决定如何分配预算，以保证完成这些任务。经过国防部举行多次的部务会议，他送给我一份划分三军任务的新规定，并且建议以这项新规定来代替在制定法律时我所颁布的行政命令。他的建议经过研究之后，我撤销了我原先的命令，并就这份对任务的新规定作了一些次要的修改，在1948年3月27日公布实施。

这个国家军事机构成立后的第一年中，我逐渐认识到国防部长需要更多的权力，以适应他所担负的责任。事情很明显，法案必须加以修正：重新规定，从而加强部长的职权；增加国防部副部长一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应设主席一人；海、陆、空军部部长不再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长为唯一参加委员会的军方代表；纠正一年来工作经验中所暴露出来的行政方面软弱无能的许多缺点。

1949年3月5日，我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就这几方面修正国家安全法案。整个说来，我提出的要求顺利地通过了立法手续，但

是在通过后的几个星期里，海軍方面和空軍方面却在报刊上展开了一个大規模的公开論战。

冲突是由于3月間继福萊斯特尔担任国防部长的路易斯·約翰遜的行动引起的。約翰遜部长取消了海軍訂造的新的超級航空母舰。关于匿名攻击空軍非法收买B—36型轰炸机并怀疑它的战斗性能的問題引起了另一場爭論。有些报纸和广播电台經常散布流言蜚語，中伤毀謗差不多每一个拥护合并政策的人，而这个政策对海軍無論如何都是有所限制的。

冲突以整个海軍嘩然的局势出現。海軍部长約翰·沙利文辞职，以示对約翰遜取消訂造超級航空母舰合同的抗議，最后为了整肃軍紀，我只得委任路易斯·丹菲尔德继任海軍作战司令。最后总算同意了必要的修正，在1949年8月10日，我签署了1949年的国家安全修正法案，于是又向真正統一武装力量的路上迈进了一步。对我來說，国家安全法案和加强法案的修正案的通过是我执政期間突出成就之一。

我一直认为軍事法案对于我国安全关系重大，使我遺憾的是国会沒有在这方面采取另一个重要步驟。那就是目的在于制定合理的、适当的普遍訓練計劃的法案。在1945年秋天，我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反应。

然而在1946年12月，我还是指定了一个普訓諮詢委员会，研究同国家安全的全面計劃有关的普訓基本需要和各种計劃。我要求委员会^①在12月20日向我汇报，并利用那次机会告訴他們我对

① 委员会包括下列成員：主席，馬薩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頓博士；委員，普林斯頓大学校长哈罗德·多茲博士，前駐俄国大使約瑟夫·戴維斯，前陸軍部文职副官小杜魯門·吉布逊，《基督教先驅报》編輯丹尼尔·波林博士，社会与工业关系顧問安娜·罗森堡夫人，前总统特別法律顧問塞繆尔·罗森曼，乔治頓大学副校长埃德蒙·华尔希牧师，通用电气公司經理查尔斯·威尔逊。

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說，“我不希望把它当作普遍的軍事訓練計劃来搞，我只希望搞一个普遍的訓練計劃，让我国青年有机会在一起过有紀律的生活，使他們認識自己的健康情况和保护上帝賜給他們的昂昂七尺之軀的意义。如果我們給他們灌輸了这些，然后再給他們灌輸一种責任感——最初从对一城一县的責任感开始，你就可以看到，首先我們將把我們的共和国交托給我們的下一代，就像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从前把共和国交托給我們一样。”

經過将近六个月的深入的調查工作，还举行了一系列的意見听取会，听取了二百多人的意見，委员会在1947年6月向我汇报了收集来的材料。委員們經過調查，得出一个全体一致的結論：普遍訓練是完整的国家安全計劃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这个計劃的制訂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安全，为了使美国能够担負起維護世界和平和發揮联合国作用的职责。

这份长达四百四十五頁的报告列举了三个理由來說明这个結論：

(一) 妨碍联合国發揮其效能的原因之一是別的国家认为美国日益丧失其作为道义上領袖所必需的力量，因而助长了其他强国策划侵略战争的野心。

(二) 普遍訓練提供了保持足够数量的受过軍事訓練的后备力量的唯一方法，而这种力量又分散在民間，国家不致于因維持龐大的陆、海、空軍以及海軍陆战队的常备部队而負担过重。

(三) 原子弹和新武器的发明使战争的范围扩大，破坏性强而直接，因而每个城鎮都要有受过訓練的人員以应急需。

委员会建議实行普遍訓練，每一个合格的男性公民都应受为

期不少于六个月的普遍訓練。計劃就軍事、教育、体育、道德和精神訓練的需要作了审慎和詳細的規定。

委員會在它的報告中所提出的計劃就是大約兩年前我向我的內閣所表示的意見，經過徹底研究加工的結晶。我曾希望這份報告由一些有名望的、有代表性的美國人提出，將會促使國會採取行動，可是我的希望又一次落了空。

委員會提出這個報告三年以後，我仍在努力促使國會通過普遍訓練的法案。我之所以感到非實行訓練計劃不可的理由之一，是我打算為我國因為體格的缺陷而不能應征或自願入伍的34%的青年想點辦法。我深信這34%的青年，如果能得到適當的鍛煉，大多數都將成為身體合格，自食其力的公民。根據這樣一種計劃，我們要給我們的青年以公民教育，並且教育他們在不放棄其個人的宗教信仰的條件下，怎樣和同胞相處。

我確實相信，當1945年我第一次提出這個計劃時，如果國會予以通過的話，那麼，我們就會有一大批受過基本訓練的人員，就會使蘇聯有所顧忌，也許就不敢放手策動柏林危機或發動對朝鮮侵略了。

過去美國只要有一支小小的職業軍隊就可以解決問題。不幸的是，這種時代已經過去。現在軍事實力是政治策略的決定因素；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策是要有效地維護和平，那麼外交上和戰略上的考慮就必須審慎地配合起來。

一國的元首必須了解全世界的動態，才能在需要採取行動的時候，立刻行動起來。總統必須掌握可能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的所有事實。自然，總統必須熟悉國內情況，因為總統所採取的任何行動必須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歸根結蒂，美國人民就是政府。

在1946年以前，總統所需要的這類情報，分別由好幾個不同

的政府部門搜集。陸軍部有一個情報處——G—2^①，海軍部也有它自己的情報組織——O.N.I.^②。國務院從駐外使節取得它的情報，而財政部、商務部、農業部也各有各的途徑從世界各地搜集有關金融、經濟、農業的情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聯邦調查局在國外有過一些活動；此外，羅斯福總統在戰時創立由威廉·多訥文將軍領導的戰略情報局也在國外收集情報。

當我在參議院任職時，政府各部門這種各自為政的收集情報辦法最初給我的印象是無組織到了驚人的程度。我們參議院的各種委員會，在听取各行政部門作證時，往往為政府各部門所提供的情報感到驚訝：同一問題，情報竟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起初我還不明白這是由於獲得情報的方法不同所致。不過，自此以後，我就常想，如果政府能夠有一個互通聲氣的情報機關，那麼日本偷襲珍珠港，即使不說不可能，至少也要困難一些。那時候，國務院所知道的事，軍隊方面卻不完全知道，而外交人員也無從知道陸軍海軍方面所掌握的情報。實際上，陸軍和海軍也只是依靠一個非常不正式的办法互相交換他們的計劃。

換句話說，我們從來未曾多考慮在政府里設立一個中央情報機構。顯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沒有派遣軍隊到歐洲、亞洲、非洲和大西洋、太平洋的島嶼上去時，還看不到需要有一個規模龐大的國外情報系統。

戰爭給我們上了這樣一課——我們的情報收集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做到在需要它的地方和在需要它的時候就能提出準確明了的材料。如果不是準確明了的話，那是毫無用處的。

① 陸軍參謀部第二處(Second Section, General Staff)，即陸軍情報處。

——譯者

② 海軍情報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譯者

在我就任总统后，我发现这种迫切需要的情报没有一处是一致的。各个部门在不同时间把报告送到我办公桌上来，同一件事而报告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因此，我问李海海军上将对改进情报系统可曾想过办法。李海告诉我，在1944年，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曾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个由多纳文将军制定的集中情报工作的计划。李海这样告诉我：这个计划提出一个由总统直接领导，只对总统负责的情报机构方案。但是，海军部却提出一个相反的建议。按照这个建议，就要设立一个负责全面工作的中央情报机关，但是每一个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要在中央情报机关里面分占一席。这个计划大部分是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海军少将悉尼·索尔斯提议的。

过后，我要求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他对合并各部情报机构的建议，并且告诉他我已经请李海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仍旧希望得到国务院的建议，因为国务院将要在这项工作中担任主要的任务。

国务卿贝尔纳斯认为这样的组织应该对国务卿负责，他和我商量由他来掌管所有的情报。可是，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坚决反对。他们坚持主张每一部门需要有自己的情报，但也认为迫切地需要一个中央情报机关，把所有与整个国策有关的情报集中起来。这个机关将成为情报汇总地，由各个情报机关供给情报。这个情报汇总地将使那些负责制定军事和对外政策的人们占有指导他们行动的权威情报。

1946年1月，我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研究各方面提出来的有关组织中央情报机关的各种计划。我很赞成陆军部和海军部在海军少将索尔斯的帮助下所拟订的计划。我已经准备把它付诸实施，可是预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却极力要求延期，以便预算局的人员有时间仔细地研究一下。

“你是要从預算的角度作一番研究嗎？”出席會議的羅森曼法官問道。

“不，”史密斯答道。“從情報的角度。”

“哈羅德，”我對史密斯說，“我知道你那部門里有很多情報專家，但是我認為這個計劃還不錯。如果你的人能把它搞得更完善，那當然更好。但是，這件事我已經盼望了很久。所以，你可以指定專人，在李海海軍上將的辦公室里，跟海軍少將索爾斯共同研究，司法部也派人來，咱們一定得把它搞好。”

當然也還有一些次要的不同意見。比方說，司法部就為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提出某些反對意見，但是並沒有主要的分歧意見，所以不久就基本上達成了協議。

1946年1月20日，我頒布了建立中央情報組的行政命令。我把這個機構置於由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以及我的個人代表李海海軍上將組成的國家情報局監督之下。我還指派海軍少將索爾斯為中央情報組組長。

在建立新情報機關的行政命令公布以前，我下令撤銷戰略情報局。該局的人員和工作，一部分移交國務院，一部分移交陸軍部。

海軍少將索爾斯早就要退休，我向他保證只等陸軍部、海軍部和國務院三方面協商提出一個我所能接受的人選，我就解除他的職務。約莫過了六個月，它們一致推薦空軍情報局局長霍伊特·范登堡將軍，于是我委任他為第一個常任組長。而我感到高興的是，索爾斯少將同意留下來擔任范登堡的顧問。

新的情報機構成立後，我開始收到每日簡訊和國外情報摘要。國務院給我駐外使節以及海軍部和陸軍部給他們駐外部隊的情報，只要和我國外交政策有關的也都給我一份。這樣，我們終於建立了一個協調一致的情報系統，並找到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使

總統經常了解已經掌握的情報和目前發生的事件。

中央情報組在 1947 年改名為中央情報局。每天第一個來見我的人往往是情報局局長。在李海海軍上將繼續擔任最高統帥的參謀長職務期間，我和情報局局長會商時總有他參加；李海退休後，我把海軍少將索爾斯調到白宮來，擔任總統的情報特別助理的新職務。因此，每天早上中央情報局局長給我送來每日簡訊時，他總在座。

在波茨坦會議期間，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三方面的通力合作給我一個良好的印象。通過協商委員會，他們找到一個解決他們之間共同問題的方法，從而避免了經常發生的職權範圍的衝突。每次我交下去一個問題，很快就可以得到他們明確的答復。這種答復集中了他們最好的判斷。這就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所以在離開波茨坦以前，我告訴這三個部門，我喜歡這種做法，並且要求他們以後繼續通過這個委員會在一切共同問題上通力合作。

鑒於這種方法的成功先例，在擬定統一軍事機構計劃的同時，我堅持也要制定統一的政策。我希望在政府中設立一個永久性的上層機構，協助總統制定有關國家安全的重大決策。1947 年的國家安全法案規定成立這樣一個機構，那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同時規定把中央情報組改名為中央情報局，歸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給政府增加了一個非常有用的新機構。現在軍事、外交以及資源問題就可以拿到這個委員會來研究和討論了。這個新機構給我們提供了一本流水賬，一份永久性的清單，使我們對所有有關國家安全的戰略問題，我們的處境如何以及我們往哪個方向發展能夠一目了然。

國家安全委員會原先係由七人組成。除了總統以外，還有國務卿，國防部長，陸軍部長，海軍部長，空軍部長以及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會的成員，除我以外，有國務卿喬治·馬歇

尔，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薛明顿，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耳，海军部长约翰·沙利文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阿瑟·希耳。

1949年，我提請国会对于委员会的成员加以变动。从此以后，委员会就由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加进名单中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组成。总统依法有权在需要的时候，指定其他行政部門的首长参加委员会。

委员們起先喜欢携带許多不必要的顧問和助理。以致于我不得不在1950年7月下令重申出席人数必須按照法律規定，其他列席人員以經我批准或特別討論需要参加者为限。

我很感激国会採納了我的建議，在行政部門中設立了一个研究政策問題的中心机构。我只是把国家安全委员会当作产生建議的机构。跟內閣一样，委员会不作任何决定。政策本身必須由总统頒发，因为一切最后决策都得由他制定。

“表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只是議事的一个程序。委员会从来不制定政策。只有得到总统的批准和批准并表示后才能正式成为美国的国策。即使当时总统以主席的身份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且表示贊同，可是在委员会正式把文件送呈总统批准以前，事情还不能算是最后决定。在这个文件上应当提到會議的召开，并建議采取某种行动，而“这个建議是得到了您的同意的”。等到总统簽署了这项文件之后，建議才能成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数虽少，但他們都是工作能力很强的在职人員，其所以挑选这些人，是因为他們保持客观的立場，没有什么政治关系。按照我們的計劃是，这个組織应当是一个常設机构，不随政府的更迭而变动。为国家安全計劃工作的人員必須繼續連任，这一点对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助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員有着密切

的联系，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是：每当委员会要考虑一项政策时——例如，有关东南亚的政策——它就要求中央情报局对这个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估计。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列席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会议进行期间不断地提供情况。他所提出的估计代表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和中央情报局所属的各个咨询委员会的分析判断。这些咨询委员会包括陆军情报处，空军情报局，海军情报局，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情报处。然后由国务卿提出政策的最后建议，由总统作出最后的决定。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初期，有一两个成员曾经想按照英国的式样把它变为高级执行内阁。福莱斯特尔部长和约翰逊部长就时时对行政秘书施加压力。他们要他僭取监督政府其他部门的大权，并且督促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行政秘书正确地予以拒绝，声明如果国会要给他这种权力，那么就应该在法令中明文规定。事实上，法令草案原拟设置“执政官”一人，国会为了避免误解，才把这个职衔改为“行政秘书”。

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曾经倡议我们的政府机构可以仿照英国的内阁制。这个意见颇值得重视——有些地方，内阁政府的效能是比较高——但是英国实行的是内阁集体负责制。而我们的制度是由一人，那就是由总统负责。如果要作这样的改变，那我们就得修改宪法，而我认为，遵照我们的宪法，我们已經搞得很不错。我们按照原有的制度做，一定能做得很好。

第五章

馬歇爾在中国的使命

美國人對中國人一向是友好的。美國傳教士、美國醫生和美國教授在中國住過很多年，他們所努力宣傳的基督教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長期以來一直得到國內人民的热誠的支持。此外，在許多美國人的記憶里，中國擺脫了君主政體的枷鎖，並開始把它自己從那個古國的根深蒂固的中世紀制度中掙脫出來。然而這個鬥爭在1931年還沒有獲得成功，當時，日本已開始進行長時期的侵略計劃，而隨着歲月的消逝，這個侵略計劃竟把這個曾經一度是大帝國的廣大的土地置于日本的統治之下。

1945年秋，美國被迫面臨着多年來在中國所形成的嚴重的複雜局面。對於中國內部的分裂程度、國民政府對邊遠地區的控制力的脆弱、以及該國政府中缺乏人民的代表，所有這些情況是很少人真正了解的。

我們在美國往往認為中國是一個國家。但是，事實上，在1945年，中國只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自從1911年滿清帝國覆滅以來，中國就沒有出現過一個權力遍及全國的中央政府。當對日戰爭勝利時，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蔣介石的權力只及於西南一隅，華南和華東仍被日本占領着。長江以北則連任何一種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

建立一個新國家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羅斯福總統曾經倡導一種說法，說中國是一個大國，這是因為他指望着將來，並希望以此去鼓勵中國人民。事實上，蔣介石甚至連再占領華南都有極大

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須同共产党人达成協議，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協議，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占領了铁路綫中間的地方，蔣介石要想占領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們面前，假如我們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們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們就必須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驟，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們能将国民党的軍隊空运到华南，并将海軍調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們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們的崗位和維持秩序。等到蔣介石的軍隊一到，日本軍隊便向他們投降，并开进海港，我們便将他們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軍隊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經我批准的。

就在赫尔利大使于 1945 年秋回华盛顿之前，他拍回来一个电报，其中包括有我們战时对华政策的总结。

赫尔利大使写道，“华莱士副总统于 1944 年从中国回来时告訴罗斯福总统說，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接着两位美国参議員（布鲁斯特和錢德勒）預言道，只有奇迹才能阻止中国政府的覆灭。这种看法在美国和中国的文职与武职官員中間是非常普遍的。罗斯福充分了解了这种形势之后才派遣我到中国去作为他的私人代表的。罗斯福总统給我的指示主要有下列几点：

“（一）防止中国国民政府垮台。

“（二）維持战争时期的中国軍隊。

“（三）調和中国和美国軍事机构之間的关系。

“（四）联合中国的抗日力量……

“可以概括地說……在战争期間，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軍事性的。即使是經濟性的指示也帶有軍事上的目的……”

赫尔利和作为蔣介石參謀长的魏德迈將軍在实现头三点中做了許多工作。然而，最关紧要的一点还是第四点。

中国的共产主义問題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問題有很大的区别。蔣介石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有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的政府。

我們在中国的处境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我們不能对这种局势简单地不加过問。在中国还有近三百万的日本人，其中約有一百万以上是军队。除非我們确知这股力量是被消灭掉了，否則，即使日本人是被打敗了，他們仍可以光靠他們在爭夺統治权中举足輕重的力量而控制住中国。

另外一个办法也是同样行不通的。这个办法就是，为了击败共产党人，把日本人从大陆上驅逐出去并用实力迫使俄国人从东北撤退，必須将无限制的物資和大量的美国军队投入中国去。美国人民是永不会贊成这样一种計劃的。

因此，我們断然认为，摆在我們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徑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維持和平，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一定限度內在軍事上支持蔣委員長。但是我們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圍牆之爭。

魏德迈將軍在抗日战争的最后日子里，曾以这样的話来描述这种情况：

“毫無疑問，中国人民对于軍閥和橫暴无比的、不称职的官員对待他們的态度是有許多怨言的。可是，要滿意地解决中国問題或世界秩序問題是决不能靠在这个地区进行內战来完成的。

“根据有限的材料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缺乏民主精神或民主的意向。由于95%的中国人民是文盲，也由于其他許多令人信服的理由，中国是不打算成立一种具有民主形式的政府的。无知的中国人民大众需要和平，他們对于現有的各种思想并不特別感到兴趣，也并不懂得那些。他們最关心的乃是工作机会、为他們的家庭获得食物和衣着以及一个幸福的和平环境。

“这儿的情况最好是能够让一个仁慈的暴君或者是一个军事独裁者来掌握，至于这样的独裁者是共产党人，或者是国民党人，那倒是无关紧要的。根据我的观察，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官员对他们的自我扩张都感到兴趣。我有这样的印象，蒋委员长的领导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着重点是作者所加的。）

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表示了友谊。举例来说，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拨款就超过了十五亿美元。当宋子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我们在外交上给了中国很大的支持。这次会谈的结果订立了中苏友好条约。

赫尔利大使致力于使中国共产党人和蒋介石政府坐在一起，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大使在给我的一系列的长篇电报中告诉我他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他起初到中国去并不是以我们的外交代表身份而是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身份去的。在他给我的许多电报和报告中，他评论了国务院，对一些职业外交家的判断和能力表示怀疑。和我一样，他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必须成为亚洲的反帝国主义拥护者。赫尔利抱怨说，国务院对他的报告与建议没有给予他认为应该给予的优先重视。

最后，在1945年9月10日，他又再度陈述——正如他以前几次所陈述的那样——他所了解的罗斯福总统的在亚洲的长期目标。他陈述了他在促进这些目标方面所作的努力，并引述了几个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作为例证，他认为这些决定的目的就与他所认为的最明智的办法不同。于是，他要求准许他回华盛顿。他打电报给国务卿说，“我愿意有机会和你及总统讨论美国对亚洲政策。”

赫尔利回国之后，他便与国务卿贝尔纳斯到白宫来，一星期之后，赫尔利和魏德迈两人来白宫作了一次更详尽的讨论。我清楚

地告訴他們說，我們的政策就是支持蔣介石，但是我們却不能卷入中國的內戰中為蔣介石作戰。

赫爾利告訴我說，儘管有他與魏德邁所承認的一切缺點，中國的和平發展的前景还是很可樂觀的。在經濟方面，中國的潛力與1937年以前幾年的情況沒有很大的區別。當前的主要問題看來還不是生產而是分配。在財政方面，我們的不斷的援助使中國處於一個多年來沒有過的良好情況，在政治方面，赫爾利將軍剛剛成功地使得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去重慶與國民政府的領袖們舉行直接談判。談判的結果，中國的領袖之間達成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於赫爾利第一次到白宮來的前兩天即10月11日公布了。^①在那個時候，人們有理由希望，中國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赫爾利親自看到了簽訂這項協定的籌備工作，他告訴我說，中國走向真正的和平是有希望的。這項協定要求召開一個制訂新憲法的制憲會議——國民大會，並規定了使得一切黨派均能參加的條款。顯然，蔣介石在這個會議中將占有優勢，因為他在會議中的代表人數要比共產黨多。

一個包括有四十個人的臨時委員會——由蔣介石指定的，但半數以上的人都不是國民黨人——將處理這些事務，直到新憲法付諸實施為止。蔣介石對這個會議的任何決定都可以加以否決，雖然該委員會五分之三的票數就可以拒絕這種否決。

這是一項很好的協定，我對赫爾利所做的使這項協定成為可能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賀。然而，這項協定卻從來沒有產生效果。

那時，蔣介石的軍隊正在開往日本人所控制的地區，他的一大部分軍隊是靠我們的空軍的運輸機來向北方運送的。我們的五萬名海軍陸戰隊也在好幾個重要港口登陸了，所以，通過這些港口，

^① 這裡指的是1945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代表簽訂的會議紀要。——譯者

日本人的遣返工作就能繼續进行。共产党人要国民政府停止运送这些军队，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在利用这种形势来加强反对他们的地位。他们对这一点也没有采取消极的态度。他们尽可能地切断铁路线，重庆政府很快地开始收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人违反了协议，在向东北移动。由于互相攻击有增无已，双方的敌对情绪愈来愈增长。

11月4日，我们驻重庆的大使馆报告说，内战看来将要爆发，原定于11月2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停止召开了。11月25日，中共驻重庆的主要代表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第二天，他的第一副手也接着回去了。这时，武装冲突的消息已时有所闻。我与赫尔利于11月27日在白宫讨论了这个局势的严重性，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是他立即回到重庆去。他向我保证说，他只待办完几件私事后就回中国去。

这次谈话大约是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但是不到二小时，当我正在与内阁成员们举行每周内阁午宴时，有人找我去接电话。这是驻白宫的一个记者从全国新闻俱乐部打来的电话，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告诉我，赫尔利大使刚才在俱乐部发表了一个强烈的演说，对政府、国务院、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我个人进行了攻击。

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到现在还想不透，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我认为赫尔利必须到中国去，内阁一致同意了。第二天，赫尔利果真向报界发表了一封“辞职信”；但是事实上，不管他发表或不发表那封信，他都会不干的。

赫尔利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几个星期之后——1946年1月——他特别来找我的新闻秘书查利·罗斯。他对罗斯解释说，他很想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为我效劳，他希望罗斯告诉我，说他辞职时没有蓄意说过任何对我个人进行批评的话。

“他要求我相信，”罗斯对我說，“他是‘与你站在一起的’。”

赫尔利继续对罗斯說，“貝尔納斯是一个聪明人……但是，他没有从国务院掌管机要的人那里得到充分的情报……貝尔納斯对中苏关系没有理由激动，因为这些关系在去年7月或8月的中国和俄国所签订的协定中全都写下来了……”据赫尔利說，貝尔納斯感到不必担心的理由是，“斯大林遵守他的諾言”。

中国现在看来是被引向更麻烦的境地去了。我们不能派遣军队之类来保证蒋介石的优势。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是发挥我们最大的影响来制止内战。担任此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格和极高超的才干。就在赫尔利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的那一天的内閣午宴上，馬歇尔將軍的名字被提出来了。他刚刚把陆军参谋长的职务移交給艾森豪威尔將軍。恐怕没有人比馬歇尔更应该享受光荣而安静的退休生活了。可是我想不出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人来担任出使中国的艰巨任务。

我到白宫的紅房去打电话到利斯堡馬歇尔將軍的家里去。在未作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我通知他說，“將軍，我希望你代表我到中国去。”馬歇尔只是說，“是的，总统先生，”突然就把电话挂上了。

两天之后，当馬歇尔到白宫来与貝尔納斯和我一起討論他的使命时，我問起他为什么不問任何問題就把电话挂掉。他向我解释的理由是，馬歇尔夫人和他刚刚坐車子到家，他正在取下他们的东西时，电话响了。他不希望让关心他的健康的馬歇尔夫人知道他们的退休是多么短暂，因此，他在她可能听到談話的任何部分之前就把电话挂上了。他希望把这个消息慢慢儿透露给她，但是当他几分钟后打开收音机时，她所听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宣布將軍使命的特快新聞报道。

“我們前面的困难很多，”他承认說。

那天下午，我和馬歇尔及貝尔納斯对中国的局势进行了长談。

应馬歇尔的要求，我叫他只管前去国务院，和他們一道根据我們的討論拟訂一套指令，这些指令就成为我对他这次使命的指示。

这些指令是馬歇尔与国务院共同起草的，12月11日，我与貝尔納斯和馬歇尔在另外一次會議上詳細地加以校閱。12月14日，我当着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面将这份文件的定稿交给了馬歇尔，下面便是文件中所包括的指令本文：

“亲爱的馬歇尔將軍：

“在你行将离此前往中国的前夕，我要再一次重申我对你願意担任这项艰巨的使命的謝意。

“我对你完成你担負的工作的能力有着极大的信心，但是，我願将貝尔納斯和我对你这次的使命有关的一些意見、想法和目的告訴你，如果你认为它們对你有些指导作用的話。

“我在这里附了几个文件，我认为这些文件應該被看成是这封信的一部分。第一个文件是美国对华政策声明，据我了解，这个声明是与你以及国务院的官員們商量之后拟就的。第二个文件是国务卿給国防部的有关中国的一份备忘录。第三个文件是我向新聞界发表的关于对华政策的談話的副本。我知道，这些文件已經給你看過，并得到你的贊同。

“我邀請你去中国这个事实，便是我非常关心中国局势的最明显的证明。国务卿貝尔納斯和我两个人都热切地盼望尽可能快地用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統一。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特別代表，以适当的和实际可行的方式，用美国的影响来达到这个目的。

“特別是，我希望你努力去說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有重要的政党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以获致中国的統一，同时，設法停止敌对行动，特別是华北的敌对行动。

“据我了解，重庆現在正在召开一个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內的由

各个政治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将使你获得方便的机会来与各方面的政治领袖进行讨论。

“当然，正如上面所大致讲过的，你的这番努力能否成功将大部分依赖于我们下述计划的实现，即从中国，特别是从华北撤出日本军队，然后再从中国撤出我们自己的军队。我特别希望，这两个任务都能尽快完成。

“在你与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袖的会谈中，你有权以最坦率的态度和他们谈话。特别是在谈到关于中国人需要贷款，经济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及军事援助时（我的意思是指那个经我在原则上批准了的拟议中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你可以说，一个不统一的、被内战弄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被认为是在上列各方面取得美援的合适的地区。

“我热切地希望，你能将你在会谈中的进展和所遇到的障碍及时地告诉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你将会得到我们充分的支持，我们将在任何时候尽一切努力给予你帮助。

“1945年12月15日，华盛顿”

附入的第一个文件题名“美国对华政策声明”。

文件写道，“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新的、具有无限希望的时代和平与繁荣，有赖于联合国组织的各主权国家联合起来，共谋集体安全。

“美国政府坚信，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对联合国组织的成功与世界和平，最为重要。一个被外国侵略，有如日本所进行的，或被残酷的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中国，乃是对现在和将来的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的一个破坏性影响。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遵循这样的原则：管理内政是主权国家人民自己的责任。然而，本世纪内的各次事件告诉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和平的破坏都会

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和平。因此，为了美国 and 所有联合国国家的最大的利益，中国人民应立即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抓紧每个机会来调整他們的内部糾紛。

“美国政府认为主要的是：

“（一）在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意見不同的中国军队之間，应该协商停止敌对行动，以使整个中国完全回复于中国人有效的控制之下，包括立即撤退日本军队在內。美国政府准备——如果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邀請——帮助安排必要的保证，并将邀請联合王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共同来参加这种努力。

“（二）安排一个由各主要政党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以謀早日解决目前的內战——內战的解决将带来中国的統一。

“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家承认目前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它是达到統一中国目标的最合适的机构。

“美国和联合王国根据 1943 年的开罗宣言，苏联根据去年（1944年）7 月的波茨坦公告以及 1945 年 8 月的中苏条約，都有义务保证中国的解放，包括将滿洲归还給中国人民。这些协定都是和中华民国政府簽訂的。

“美国为了与中华民国政府繼續进行在战争中的經常与密切的合作，并按照波茨坦公告，并为了消除日本军队在中国可能遺留下的影响起見，便在解除日軍武装和撤退日本军队中担任一个确定的义务。因此，美国一直在帮助并将繼續帮助中华民国政府解除收复地区的日軍武装和撤退日本军队。在华北的美国海軍陆战队就是在执行这项任务。为了同样的理由，美国將繼續供应軍需物資，并将进一步繼續帮助中国国民政府运送军队，以便它能重新控制中国的收复地区——包括滿洲。

“为了促使停战和計劃中的国民大会的悬而未决的临时协定的实现，美国將不把国民政府的军队运入像华北等地区，以免妨碍

达成停战和政治协商的目标。

“美国承认、并将继续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并在国际事务上，特别是在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方面，与它进行合作。美国深信，立即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对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将尽可能避免使它对任何意见不同的中国团体所提供的援助产生附带的影响。除了这些附带的影响以外，美国的支持将不会扩展到以军事干涉去影响任何中国内争的进程。

“美国认识到，目前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扩大到包括了这个国家的其他一些政治党派的话，那末中国的和平、统一和民主改革将迈进一步。因此，美国坚决地主张，这个国家的有各主要政党派有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应取得一致的协议，让这些团体在国民政府中都有公平合理和有效的代表席位。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将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博士为国家向民主发展而创立的临时办法的一党‘训政’制。

“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自治性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的政治统一不相容的，而且实际上使这种政治统一成为不可能。随着一个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政府的组成，类似这种自治军队就应该取消，而中国所有的军队都应该有效地合并入中国国军。

“美国遵照它一贯表示的对自决权的主张，认为中国在取得政治统一上所必须的具体步骤应该由中国人自行制定，任何外国政府在这些事情上进行干涉都是不适当的。不过，美国政府感到，中国对其他的联合国家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消除在它境内的构成为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的武装冲突——国民政府和中国所有的政治与军事集团都有这个责任。为了帮助中国人克尽这样的责任，美国政府愿意参加并将邀请联合王国和苏联参加商讨关于确保立即停止这样的武装冲突的必要条件。

“当中国沿着上面所说的道路走向和平与统一时，美国就准备以一切合理的方式来帮助国民政府重建其国家，改进农业和工业经济，并建立一个能够履行中国为维持和平与秩序而担负之国内与国际责任之军事组织。特别是，美国准备答应中国人的一项要求，在中国设立美国军事顾问团，并在中国政府需要和美国政府能够供应的情况下，派遣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这样一类的另外一些顾问，并对中国人在合理的计划条件下所要求的信用借款给予善意的考虑，俾使这种计划有助于发展中国的健全的经济和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的贸易关系。

“必须明确地承认，要达到上述的目的，将要求美国付出一些物资，并暂时维持驻在中国的美国陆海军队。然而，这些支出与我国被迫在恢复为德国和日本侵略所破坏的和平方面所支出的数目相比较，就微不足道了。这些支出与未来的全球性战争的支出相比较将也是不足挂齿的，在这样的战争中，现有的新式的和可怕的武器一定会都使用出来。美国曾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财力与生命而取得的果实必须不再受到损害。”

第二个附带的文件是给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总统和国务卿都迫切盼望，将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法尽快地实现中国的统一。

“在12月7日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一次公众意见听取会上，国务卿说道：

“‘在战争期间，美国在华的直接目标是促成几个党派在军事上的统一，以便运用他们的联合力量来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我们的较长远的目标——当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这一目标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是发展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民主的中国。

“‘为了达到这个较长远的目标，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及各种意

見不同的团体必須以協商的真誠願望來逐步解決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我們認為——正如我們長期以來所認為的和一貫表明的——蔣介石委員長的政府在發展民主政治方面提供了最令人滿意的基礎。但是我們也認為，它還必須擴大，以便包攬那些現在在中國政府中還沒有任何人參加的大的和組織得很好的團體的代表。

“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它需要機智和果斷、忍耐和自制。光靠中國領袖們自己還不能解決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的影響是一個因素，成功與否將有賴於我們在變動的情況下，運用我們的影響，促成中央政府、所謂共產黨以及其他黨派，彼此讓步。”

“總統邀請馬歇爾將軍作為他的特使前往中國，目的在要他以一種適當和實際可行的方式，運用美國的影響來達到上述目的。特別是，馬歇爾將軍將努力影響中國政府來召開一個包括主要政治黨派的代表的國民大會，以求得中國的統一，并同时實行停止敵對行動，特別是在華北。

“為了答复魏德邁將軍最近的信，國務院要求國防部對他作下列指示：

“（一）他可以幫助中國國民政府運輸軍隊到滿洲港口，包括對這些軍隊的後方勤務上的幫助。

“（二）他也可以加緊部署，盡速從中國戰區遣送日軍出境。

“（三）在馬歇爾將軍在重慶和中國領袖的會談，以籌備一個包括有主要政治黨派的代表參加的國民大會和停止敵對行動的結果之前，除去利用華北港口運輸部隊和物資至滿洲以外，將停止再運送中國軍隊至華北。

“（四）運送中國軍隊至華北的部署應即準備妥當，但可不必通知中國政府。當馬歇爾將軍決定在下列情況之下，即：（甲）進行

运送中国军队至华北之工作，不致妨碍商谈；或（乙）中国党派之间的协商业已失败，或显示已无成功的希望以及为履行投降条件和保证美国维持国际和平与长期利益的情况之下，使运送部队有必要之时，则此种部署可即付诸实施。”

这封指示信中的第三个附件是一份新闻电讯，它基本上与第一个附件的政策声明相似。

马歇尔于次日（12月15日）乘飞机离开华盛顿。他于12月20日到达中国，并立即开始研究情况。他那通过国防部电台转给我的电文，虽然文字很朴素，却叙述了一段历史，其中包括了中国历史上戏剧性事件中的一切要素。

马歇尔将军以谨慎的态度在中国开始进行他的工作。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专门倾听人们的意见。他同蒋介石作了详细的长谈，但后者很少谈到共产党，而对俄国人继续留在满洲则表示非常关切。马歇尔还会见了各党派的领袖，包括共产党人，并对许多蒋介石政府的官员、我们自己的大使馆人员、记者以及其他一些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讲了话。

他发现每个人都赞成中国统一，但是就没有一个人以切实可行的话回答得出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马歇尔指出，这正是问题的所在，需要在这上面做些工作。他是能够间接敦促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举行一次会议的。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起初，中央政府对这个建议的反应完全是一步不让的，但是经过马歇尔将军的建议，便提出了一项建议案。这项建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指定代表来同马歇尔商讨关于实行停战的方法，并由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一个委员会来提出关于解决纠纷地区的建议。

马歇尔已经计划好实施停火的机构。他计划组织包括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代表的小组，每组内有一个美国观察员，在必要的时候

給予戰場上的行動以一種公正的處理。

1946年1月8日，國民黨和共產黨代表之間的談判幾乎已快達到達成協議的程度。然而，國民政府堅持認為應讓他們的軍隊繼續開進熱河省與察哈爾省，來占領蘇聯軍隊已撤出的或行將撤出的地區。另一方面，共產黨則宣稱他們已接管了各重要的據點。

停戰命令定於1月10日上午十點鐘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宣讀。在前一個晚上，馬歇爾曾勸蔣介石發布停戰令時不要提到熱河與察哈爾兩省的事，然而，直到10日早晨才達成最後的協議，距預定宣布停戰令前只有很短的一段時間。

一俟發布了停戰令，馬歇爾即着手籌劃預定設在北平的所謂執行部。然而却遇到一些拖延，因為共產黨發現他們從分散的部隊里調來足夠的軍官有困難。當最初幾天開始行動時，證明瞭這個機構是切實可行的。

現在馬歇爾着手繼續安排下一步工作，那就是統一中國的武裝力量。一個三人軍事小組經同意成立了，由馬歇爾擔任顧問。

在這些事情中，馬歇爾尽可能地避免任何類似施加壓力或授意等事。他常常在等待中國人（國共兩方面）邀請他去參加他們的會談；不然，他只是以一個個人對另外一個個人談話的方式來和他們談話。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过程，中間會遇到許多波折。

舉例來說，蔣介石就要求馬歇爾去說服共產黨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接受中央政府的建議。馬歇爾用下列話來回答蔣介石說，他沒有看到兩方面曾提出了什麼明確的綱領或建議性的舉動。他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建議草案，建議把中央政府從一個國民黨的執行機構（當時它是合法的）變成一個聯合政府，以全中國的主權為其基礎，這個草案還包含有簡短的民權條款。

馬歇爾在這一點上作出了不參加政治討論的聰明的決定，雖然他可能正式地被兩方面邀請去作調解人。他對這次使命的正確

观点是，如果可能的話让战争停下来。他尽量避免去参加純属政治性的事。

然而，在軍事方面他却是最积极的。他担任监督停火的三人小組的主席，并担任了着手改組中国军队的委员会的顧問。

在最初的阶段里，共产党代表对于馬歇尔的态度看来似乎比中央政府的領袖們还温順些，他印象中觉得，共产党人感到他們在政治战场上比在战术性的軍事战场上更容易取得胜利，因为他們的組織控制得比較严密，而在国民党方面則还有许多爱发議論的分子。他印象中还觉得，共产党人比国民党人更倾向于在政治斗争方面多利用机会。馬歇尔似乎觉得，国民党人看来好象已决定要采取实力政策，而他认为这将使他們走向毁灭的道路。

2月4日，馬歇尔向我报告說，“事情是进行得比較順利的”。政治协商會議看来已在走向通往民主改革之路，整軍的协定看来也已不远了。

馬歇尔少則每星期一次，有时每星期两次或三次拍給我一份很长的电报。他曾指示他的部下說，这些电报应立即发給我，而我也曾把这个特別任务托付給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让他亲自負責使馬歇尔將軍发給国务院的每一个电报都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回电或答复。

馬歇尔从中国发来的电报使我能紧紧地跟得上事态的发展。馬歇尔將軍冷靜地写下了非常詳尽的实况报告。由于我没有亲身参与其事，我就无法要求比这了解得更多了。

第六章

俄国人在滿洲

早在1946年2月，俄国人就开始在滿洲寻衅。根据我所得到的报告，显而易见，俄国人在打算利用他们答应从滿洲撤退作为手段，从而取得这个战略地区中的举足轻重的特权。

中俄两国在1945年8月所締結的共同防禦条約承认滿洲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俄国人只保留如像铁路运输等某些权利。自从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后，他们就佔領了整个滿洲。俄国人在一个后来与中国政府所签訂的協議中，答应以1946年2月1日作为撤退他们军队的最后的日期。

1946年2月9日，馬歇尔写信告诉我說，滿洲的“局势令人担忧”，他接着写道，他已告知中国的外交部长說，“中国必须以尽可能快的步伐继续完成它的計劃中的統一工作，以便消除它目前所存在的易遭苏联暗中攻击的弱点，只要中国有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府和一支独立的共产党军队存在，这个弱点也就存在。”

馬歇尔又写道，“其次我告訴他說，我认为他不应该对苏联政府許下諾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答应給它以它所要求的包括經濟特权之类的战利品。……”

“我告訴王世杰說，我认为時間对苏联来說是不利的，因为它的军队留在滿洲的时间愈长，在世人的心目中，它就愈加清楚地变成一个故意违犯条約的国家。……”

馬歇尔对我說，他这次的报告写得非常詳細，“因为我感觉到这不仅在我的使命之外的事情方面牵涉到我，而且也許比目前其

他問題对世界的协调一致更有危险性。……

“我认为我国政府必须立即在这方面对中国多做些工作，少给些忠告。……

“我们必须在这里尽可能快地腾出我们的手来，以避免与俄国人发生类似今天英国在希腊驻军方面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争吵。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结束‘中国战场’而且代之以迅速派遣军事顾问团。（魏德迈在我的催促下实际上已在南京暗中组织这个顾问团。）在这方面，除了留下一些侦察部队、运输部队和一些留守部队和地方警卫部队之外，我们必须从中国撤出一切海军陆战队。最后撤退的日期应该立即决定……我并非要求现在立即开始这一行动，但是我希望在下一个就着手做。在这段时间内我同意大量减少海军陆战队的力量。中国应宣布要派遣军队到日本去的意图。……

“由于中国具有统一国家的明确的事实，由于美国战斗部队撤走之后出现的困境，以及由于它的部队参加了驻扎日本的盟国占领军，因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中国到那时就可以将满洲问题提交远东委员会。……”

我于2月12日回信给马歇尔说：

“亲爱的马歇尔将军，

“……我很赞同你所提出的试验性的行动。

“关于派遣美军顾问团去中国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久就可将一项计划修订完成，他们所提出的方案将送给你，征求你的意见。

“我对你所提出的关于从中国战场撤退军队的建议很感兴趣，并且很愿意知道你对于撤退军队的日期的看法。魏德迈将军最近的报告表明，根据他目前的计划，中国军队运入满洲要到1946年

9月1日才能結束，而對這些軍隊的後勤支援工作要到1946年10月31日才能終止。

“由於中國軍隊運入華北是要看你所擔負的使命的進展情況而定，因此我認為關於這一戰場活動階段的可能日期的情報，到目前為止都是不可靠的，我希望你順利完成你的使命，以使這種活動無須進行。

“我將以極大的興趣等候着你的關於從華北撤退海軍陸戰隊的進一步的建議。

“你所提及的關於英國軍隊駐在印度尼西亞和希臘而引起的事態發展，使我更加迫切地希望，一俟美國軍隊在執行我國對中國的政策方面已不再必要時，馬上從中國撤出。

“至於你所談到的遠東委員會與滿洲問題的關係，我認為該委員會所能給予滿洲形勢的唯一實際可行的考慮將在賠款方面，那就是處理日本在滿洲的財產。我想你也具有同樣的看法。我們認為，遠東委員會只應該考慮直接與投降、解除武裝和管制日本有關的問題與政策，它的活動範圍不應該擴大到帶有更普遍的性質的遠東問題。

“請允許我再一次對你表示我的信任和崇高的敬意。”

和馬歇爾一樣，我希望他所建立的三人小組會很快地結束中國的內戰。這些三人小組就是停戰小組，^①每一個小組都是由一個國民黨軍官，一個共產黨軍官和一個來自馬歇爾執行部的美國軍官所組成的。

為了在中國兩方面軍隊間的停戰協定上增加它的影響，馬歇爾曾作了三千英里的飛行，跑遍了整個華北，直到內蒙古的邊境。

^① 指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協議建立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下面的執行小組。——譯者

他和这个地区的的所有的重要司令官談过話，并向我提出报告說，他能够在这个地区內促使他們普遍了解停战以及为了实现停战而設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在延安时，他曾和毛泽东晤談过。

困难是非常多的，并且有不少仍未得到解决。然而馬歇尔认为，他的第一阶段工作已經完成了。中国两党之間已达成了停战协定。彼此之間的猜疑气氛也稍为減輕些了。馬歇尔現在要求回华盛顿来和我作一次个人商談，并作出一个援助中国政府各个部門的計劃。我很想看到他，就批准了他的提議。

他在回来之前曾就他所見到的形势向我提出了一个詳細的报告。他于3月14日抵达华盛顿之后，我曾和他作了好几次长談。

他告訴我說，就在他离开中国之前，蔣介石最后答应让停战小組进入滿洲，而这在以前他是反对的。实际上，馬歇尔认为这一情况使他可以暂时离开中国一下，以便在华盛顿着手进行几件在他认为有助于解决中国問題的事。然而，馬歇尔离开中国之后，蔣介石对到滿洲去的停战小組的权力曾加以极严格的限制，以致他們都无法执行任务。結果，战斗又在滿洲的几个地区爆发了，而且还由此蔓延开来。

例如，在4月6日，馬歇尔的代表吉勒姆將軍报告說，国民党政府当局在沈阳扣留了停战小組中国共产党的成員，在北平还逮捕了另外一些人。而且“中国空軍”的飞机还在共产党的中心延安城市上空“盘旋”。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俄国人走了之后立即占領了滿洲的重要据点。还有的情况是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軍隊已經占据了的地方，共产党軍隊向他們进攻，并把他們赶出去。

馬歇尔將軍把他逗留在华盛顿的短短几十天時間都花在和政府官員們商談关于貸款給中国的問題上，以及关于以船只和剩余物資的形式援助中国的問題。他能够取得協議，促使当时儲存在中国的剩余物資轉交中国，并保证中国可以得到若干小型沿海与

內河的船舶。我責令財政部在各方面都和他合作，并达成了一項協議，立即給予中国五亿美元的貸款。什么都办好了，只差中国方面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不幸的是，蔣介石的代表，中国駐華盛頓大使坚持要在他签字之前作一些修改。使事情更趋于复杂的是，蔣委員長在同一天在中国发表了一項演說，这个演說实际上就是要訴諸武力。財政部认为，如果在中国不能实现政治解决，那末給予貸款就不符合我国的政策，这种看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們的看法是对的。

馬歇爾將軍于4月18日回到了中国，他差不多一落脚就碰上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指控，說美国飞机轰炸了他們駐在四平街的軍隊。但是，馬歇爾執行部能够证明，这些飞机虽然是美国制造的，却属于国民政府所有。

四五月間，我一直收到共产党在滿洲取得胜利的報告。經過劇烈的战斗之后，他們占領了省会长春，又在沒有遇到国民党政府軍隊的抵抗的情况下占据了滿洲的北部工业中心哈爾濱。蔣介石拒絕了共产党提出的在滿洲实行停战的建議，尽管他显然无法压制他們。敌对行动蔓延到了中国內地，到了汉口附近和南京近郊。

馬歇爾的停战小組急忙赶到冲突地区去制止这种趋势，停战命令在某些重要省份生效了。事实上，直到5月下半月馬歇爾认为可以将在中国有可能重新实现和平的迹象打电报告訴我的时候，情势才有好轉。在这段时期內，蔣介石似乎承认让共产党軍隊占領滿洲的大部分。他不再坚持要收复那些已失去了的城市，他似乎在考虑让馬歇爾執行部的三人小組来接管长春，认为这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折衷方案。当然共产党是不願意放弃那个重要城市的，他們甚至还不願意交給中立机构来管理。

这种政策上的显著改变只是一时的，可是，当蔣介石在沈阳和其他重要据点同他的將軍們磋商之后，他又重新拾起了早先的老

方案。他要求共产党恢复被他们切成好几段的华北的交通线，以示他们的诚意。他又提出问题说，他怀疑马歇尔个人是否准备为共产党的诚意打保票。

马歇尔第一次发出了低沉的调子。

他打电报给我说，“我是在逆时而行，不然的话我是很有希望的。事实上，成功不是建立在谈判问题上，而是建立在战场的发展上。”

只是由于马歇尔的坚持，才找到了一些和平解决的基础，最后，达成了一项在满洲暂时停火的协议。6月7日，双方答应休战十五天，由马歇尔的参谋长拜娄德将军率领的小组到长春去监督停火。

马歇尔写信告诉我，他希望在这段暂时休战的时期内，取得一个较长期的解决方案。但是两方面似乎都非常不愿意这样做。国民党政府在满洲的司令官一再扬言说，他准备十五天之后立即重新向共产党的阵地进攻。另外一方面，共产党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计划，认为它们全是些过分的要求。不幸的是，蒋介石的建议中有一个建议是，当中国双方无法取得协议时，停战小组中的美国成员应有最后决定权。自然，共产党只是把这个提議看成是指控的根据，说美国是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他们不理睬这个计划。

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是，共产党除了从满洲之外，还应该从华北的某些地区退出，共产党对此也加以拒绝。当国民党政府宣称已把两个军派往这些地区时，马歇尔断言说，“现在我们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当时有一些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人颇有信心地认为可以在战场上打败共产党，这种估计在马歇尔看来是极端错误的。他认为蒋委员长的军队不但不能很快地取得胜利，而且失去了这种立即取胜的机会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得到苏

联支持的共产党。最后，失败的只会是蒋介石——要不然就是美国进行全面的干涉。

但是由于馬歇尔的耐心坚持，终于使得共产党接受了国民政府所提出的給予停战小組的美国成員以决定权的建議，由于消除了这个障碍，談判才再度显得較有希望。暂时休战延长了十天，以便可以有較长的時間来进行談判。

在这个时候，由于国会里提出了几个提案而且注明要通过，馬歇尔感到非常棘手，提案的内容是，不规定以蒋介石与馬歇尔將軍进行合作作为条件就延长对蒋介石政府的租借法案和給予其他的援助。这是令人伤心的事，并且給馬歇尔將軍带来了很大的麻煩。自然，我不能阻止在国会里談論这类的話。正如以后几年所一再出現的，中国政府企图从其他方面施加压力来从我国政府取得好处。

每逢一些人在华盛顿或我国其他地方发表演說，号召对蒋介石进行“全力援助”时，中国的“死硬派”便增加了新的信心，并且阻撓馬歇尔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接着，共产党自然就把这样的声明說成是美国人两面派的证据。由于我国某些人說話比較随便，馬歇尔的伤脑筋的工作就增加許多困难，这些人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他們只是在帮助“死硬派”而已。

在中国，反美宣传、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都在有增无已。这些行动一方面是被共产党同时也可以說是被国民党中的极端派所激起的。

7月間，我任命司徒雷登博士——北平燕京大学中的一位美国名教授——为美国駐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是在中国出生的，他的成年时期大半在中国度过。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不多，受到中国人尊敬的西方人也很少。我认为他对馬歇尔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他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話当然会使得同各方面的領袖人物的商

談更加容易些。

但是7月間發生了激烈的和大規模的戰爭。正如馬歇爾報告上所說的，“國民黨人責備共產黨人在江蘇和大同地區發動戰爭，而共產黨人則責備國民黨人在江蘇、山東和湖北發動戰爭。”同時，國民黨中央政府開始發動了一個殘酷迫害人民中的自由分子的運動。秘密警察把他們中的許多人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昆明有兩位教授——民主同盟的盟員——就遭到了暗殺。

蔣委員長的态度審慎而鎮靜。實際上他告訴馬歇爾說，一切都會安然無事。然而只要戰爭繼續下去，共產黨人是不願意恢復談判的。他們對自己軍隊的控制顯然是放鬆了，7月29日，一些共產黨武裝人員向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小隊進行攻擊，打死了三個，傷了好幾個。

中國事件的变化使我感到頭痛。南京國民黨的學生團體的反美遊行示威，迫害自由人士的殘酷的新政策，蔣介石要在戰場採取自由行動——所有這些事情說明，國民黨中央政府是與我的維護中國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馳的。

當我閱讀馬歇爾的報告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都有一些人願意根據一個和平解決方案來共同工作。但是雙方也都有一些極端分子不要談判，決定要拿武力來解決他們國家的命運。蔣介石委員長自己則似乎介於這兩類人之間。在今年春季，他周圍的溫和派的影响無疑是占了上風，他同意作些讓步，儘管還表現出了不十分心甘情願的樣子。然而，現在看來好像是極端的軍人集團得勢，他不再願意听取馬歇爾的忠告了。

在馬歇爾的同意之下，我決定親自向蔣介石發出呼喚。8月10日，我讓中國駐美大使將下列信件轉交給蔣介石。

“自从我派遣馬歇爾將軍到你處充任我的特使以來，我一直在密切地注視着中國的局勢。非常遺憾的是，我不得不得出結論，他

的努力显然是徒劳而无益的。

“我确信，馬歇尔將軍在与你的会談中，已把美国政府和消息灵通的美国輿論的全面态度和政策正确地反映了出来。

“近数月来，中国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已引起美国人民严重的关怀。在您的领导之下，美国一直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和民主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不把最近的情势发展迫使我得出的結論說出来的話，那我就是不誠实的，这个結論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极端分子的自私利益妨碍了中国人民的願望。

“1月31日政治协商會議达成協議时，美国曾贊揚这是具有远見的走向达成国家統一和民主的步驟。美国对于你們沒有以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些協議所感到的失望，逐漸变成了我們对中国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国，愈来愈多的人认为，鉴于冲突日益扩大，特别是鉴于压制新聞自由和箝制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的趋势日益加强，我們对待中国的全面政策就必须重新加以考虑。人們并没有忽視最近在昆明杀害著名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的事件。不管这种殘酷杀害的責任应该由誰来負，它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使美国人密切注意中国的局势。人們日益相信，你們是在企图用武力、軍事或特务，而不是用民主方法来解决主要的社会問題。

“最近的事件使我們对中国人民和平与民主願望的信心受到了震动，但是我們的信心并没有破灭。美国政府和人民仍旧坚定地希望帮助中国在真正的民主政府下获得持久和平和經濟稳定。然而，人們日益感到，中国人民的願望遭到了軍国主义者和一些反动分子的阻撓，他們不懂得这个时代的自由趋势，而在阻碍着这个国家走向富强康乐。美国人民强烈地反对这种情况。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問題上，确保在短期內有着真正的进展，否則就不能期望美国輿論会继续以无私的态度来对待你們

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的必要。

“我真誠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閣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們共同宣布的目标。”

当蒋介石收到了这封信时，他便邀請馬歇尔到他避暑地同他一起住。他沒有提到我給他的那封信，只是告訴馬歇尔將軍說，他认为共产党已决定采取暴力政策。他否认他的政府的行为有任何地方表明他实行一种实力政策，即使是在共产党人改变了态度时也沒有这样做。

馬歇尔报告說，“目前，蔣委員長似乎已清楚地倾向于把实力政策看成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他又說，他已再度促使蔣委員長注意实行停战为政治协商扫清道路的重要性。馬歇尔指出，如果让战火普遍燃烧下去，占便宜的只是共产党。

蒋介石在給我的回信中完全把責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我衷心地感謝您8月10日的来信，从这封信里知道您是真正关怀我国的幸福的。

“自从乔治·馬歇尔將軍来到中国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为达成我們的共同目标——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而辛勤地工作着。我也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尽管在与他的努力合作之間还有不少的障碍。

“但是要求和平的願望應該是相互的，而对共产党人來說，这意味着他們必須放弃以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政府和建立一个有如目前蔓延于东欧的极权政府的政策。在我国維持和平的最低要求，即是放弃这种政策。共产党在1月間簽訂协定以后，进攻并占領了东北的长春和山东的德州。在6月停战期間，他們进攻了苏北的徐州、山西的大同和太原。最近几天，他們以徐州和开封为目标，对隴海铁路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攻势。

“当然，政府方面的若干下级人员也有错误，但是与共产党方面肆意违反协定的情况相比较，这些错误还是比较小的。政府方面任何时候发现任何错误，我们对犯错误的人总是严惩不贷的。

“我在8月14日的对日战争胜利日文告中，宣布了加速扩大政府基础的坚定的政策，并为此邀请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来实现1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中所通过的和平建设纲领。我衷心地希望中国共产党会接受我们的观点。政府方面将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我国实现和平与民主。

“我正竭尽全力和馬歇尔将军合作，以期实行作为我们共同宣布过的目标的政策。我们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共产党真诚地响应我们的呼吁上。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期望能继续得到您的支持。”

我在答复蒋介石的信中，欢迎这种进一步努力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表示，并希望立即停止武装冲突，以便我们能够帮助中国完成其恢复和重建的任务。

事实上，蒋介石也的确答应要在政治解决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然而，和馬歇尔的看法相反，他要在他同意停战之前先达成政治协定。与此同时，共产党发出了一个在他们的地区内动员一切可利用的人力的文告。在共产党看来，这是一种防御措施。而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共产党侵略意图的明显的证明。

僵局似乎是不可打破了。每一方都在指控另一方先发动战争，两方面都不愿意在对方没有放弃在停战期间所取得的任何或全部利益之前停手不打。

馬歇尔现在要求两方面坐下来和司徒雷登博士谈谈，以便设法打破僵局。其目的在促使成立一个包括四十个成员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这个国民政府委员会将是走向政治统一的第二步。

蒋委员长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他说，要他同意停止敌对行

动，共产党就必须答应这些条件，在馬歇尔看来，政府军队是可以取得一些暫时的胜利以迫使共产党接受这些要求的。馬歇尔认为，共产党人是了解到这一点的，因此就設法取得他們可以从局部胜利中获得的一切有利之处。

馬歇尔于8月30日向我报告說，“两方面都有一些軍事领导人暗地里持有某种中国式的看法，认为要想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調整方案，少不了就得打几个月仗。千百万受难的人民在这期間的遭遇被忽視了。苏联以公开或隱蔽的方式来进行干涉，也被忽視或沒有被提到。”

蔣介石自己似乎希望战争繼續延长到秋天。他认为共产党必須为定于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提出他們的代表候选人名单，他把这看作是任何停火談判的一个条件，他告訴馬歇尔說，他打算宣布他希望于10月10日召开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會議的代表名单。換句話說，他打算至少要把战争繼續打到那一天为止。

另一方面，共产党却不願意着手筹备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除非他們得到保证同时采取步驟来停止敌对行动。蔣介石曾于5月里問馬歇尔他是否能担保共产党有誠意，8月里周恩来却希望馬歇尔和司徒雷登来保证蔣介石和他的政府是否有誠意。

9月13日，馬歇尔报告說，“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受到两面夹攻。”他們唯一的希望似乎是周恩来和共产党人会认定战争的矛头是在指向他們，因而可能对蔣委員长的要求作最大的让步。

10月2日，馬歇尔写来三封信，大意是說，他认为他的使命已处于絕境。他請周恩来回来，不要再独自留在上海，但沒有成功。他也沒有能从蔣介石那边得到任何让步，他現在公开地宣布他要占領张家口。共产党在一个声明中回答說，向张家口进攻将被看作是政府要发动一个无限期內战的信号。因为张家口是政府于6月間同意交給共产党的一个城市。

馬歇爾向我報告說，他認為必須向蔣介石提出一個直言無諱的備忘錄。在這個報告里他很清楚地說明，他對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都不同意。此外，他還進一步列舉了他對兩方面都不同意之點，然後得出結論說要勸告蔣介石，讓他知道，除非立即在停戰方面取得達成協議的基礎，否則他就要請求結束在中國的使命。早些時候，他曾以同樣的坦率語句告訴過共產黨，除非他們在報紙和宣傳中不再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否則他便將放棄這個調停工作。

在這個時期里，我準備讓馬歇爾回來。

蔣介石經過勸告之後便對共產黨提出了一項建議，雖然這個建議並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令人滿意。實際上，蔣介石之願意採取這個步驟，只不過是想不讓馬歇爾公開宣布調解已歸失敗而已，這一點是比較清楚的。然而，共產黨是不會聽信蔣委員長長的任何主張的，除非他們得到取消對張家口進攻的保證，而且他們還希望能保證恢復1月份達成最初的停戰協定時的相互間的軍事狀態。當然，這就意味着要國民黨方面放棄在這段時期里所取得的一切進展，這個條件蔣介石委員長長是不會接受的。

馬歇爾這時寫信告訴我說，他的結論是，美國政府不能夠卷入這個兩黨以武力來打交道的鬥爭中去，他再度堅持說，除非首先停火，否則談判是不會取得成就的。10月5日他報告說，在他看來他在中国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因此，把他召回是合適的。

當蔣委員長長聽說馬歇爾已經提出了結束在中國的調解使命時，他便建議在張家口戰役中停火十天，同時關於政治和軍事問題的討論仍在進行。馬歇爾一向熱切地不放过任何可以導致停戰的機會，答應把這個提議轉交給共產黨。

共產黨的回答是，他們同意停火，如果沒有時間上的限制的話，他們也同意召開會議，如果議題事先不加以限制的話——這個處境馬歇爾是難以擺脫的，因為共產黨的協商代表批評美國的政

策偏袒于国民党，也即暗指馬歇尔本人有偏心。

10月9日，馬歇尔亲自跑到上海去劝说周恩来，但是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态度非常强硬。他显然是不愿意作任何让步，还怀疑这是蒋介石所授意的，最后，他告诉馬歇尔说，他认为美国帮助中国政府是不适当的，他认为馬歇尔关于最后的建议向公众所作的解释是歪曲了事实真相的，对共产党是不利的。这种指责使得馬歇尔作出了以下的答复，既然他已不再被看成是不偏不倚的，那末他就将从一切谈判中退出来。

这时中国的事态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馬歇尔只是一个关心的旁观者。司徒雷登大使和少数党派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这些少数党派形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力量，其中像民主同盟和共产党站在一边，而其他一些少数党派像中国青年党，则极力争取独树一帜。这些少数党这时已进入舞台作为调解的临时中心。馬歇尔和司徒雷登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然而，这个“第三党”组织却把会议的进展情况告诉他们。

周恩来在这些调解者的劝告之下回到了南京，但他这次的来临不幸恰巧碰上蒋委员长久已计划好的台湾之行，共产党把这种行动解释成为故意回避。中央政府的进攻满洲的安东和山东的烟台更增加了共产党的怀疑，同时也打击了“第三党”组织的情绪。而且，蒋介石从台湾回来时又重新提出了他以前的要求，而共产党也再次重申他们过去的拒绝。

与此同时，蒋委员长接受了“第三党”的劝告，答应把国民大会的开会日期延迟三天。这个会议结果在11月15日开会了，但是参加这个会议的非国民党成员只有几个。

共产党把这看成是最后的决裂。在他们看来，政治协商会议在1月里所签订的协议规定了必须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并把政府的权力移交给这个新委员会。中央政府抢

先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自然就被共产党看成是对一月協議的最彻底的破坏。

周恩来回延安去了，只留下了少数几个代表，但是在他离开之前，他告訴馬歇尔將軍說，他預料蔣介石政府不久将发动一个大規模的战役来占領延安。周恩来对馬歇尔說，这将意味着用談判方式来取得和平的一切希望全都破灭了。

共产党因此就放弃了談判。蔣介石似乎很有信心地认为，他的軍隊可以征服共产党。馬歇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毫不迟疑地向蔣委員長指出，共产党能够打持久战，而当蔣介石的軍隊想繼續占領城市时，共产党能够任意地切断国民党的供应綫和交通。

馬歇尔提醒蔣委員長說，如果俄国援助共产党，他們的供应綫就要比他本人的供应綫短得多，而且很不容易受到攻击。他用尽了一切办法企图使蔣介石相信，在一次純粹的軍事冲突中，不論目前看来对他多么有利，他将无法获得对这个国家的永久的統治。

尽管对他作了这样的警告，蔣委員長仍旧自行其是。他深信共产党絕沒有合作的誠意，只有在軍事上打敗他們才能解决这个問題。他也沒有把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加以考虑。例如，馬歇尔对他提到了中国不安定的經濟状况，对此他說，中国已經习以为常了，事实上是把馬歇尔的話頂了回去。

尽管在对前景的看法上存在着这些公开的分歧，蔣委員長仍請求馬歇尔留在中国做政府的顧問，馬歇尔拒絕了这个建議，因为他认为，被国民党的极端分子所煽动起来的反美情緒，以及这些人在政府中居于显要的地位，将使任何美国顧問的处境感到困难。

12月28日，馬歇尔將軍向我提出建議說，如果关于当时正在筹划的談判的第二次努力归于失敗的話，他就應該被召回華盛頓。从他的报告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在沒有作这种努力之前，这种努力就已注定是要失敗的了。我决定不等到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再作处理。1月3日，我下令让国务卿召回馬歇尔，以商談关于中国和“其他事务”。

“其他事务”的范围包括整个国务院的活动。因为当他还在横渡太平洋的归途中，我便宣布他做国务卿了。

我派馬歇尔將軍到中国去是为了設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协定，組織一个联合政府。他建立了一个执行部，战争是暂时被制止了。中国人就在他們之間开始了这些永无休止的、东方式的談判，只有精通棋艺的能手才能跟得上他們。談判是这样进行的。一方面提出了一个建議，对方接受了，但是附有三个条件。这方面接受了这三个条件，但是却对每个条件又提出另外三个条件。中国人的老办法是要保证万无一失。可是，到1946年战争又爆发了，蔣介石当时就决定要占領华北和滿洲。馬歇尔將軍反对这种主张，魏德迈將軍也反对这种主张，但是他不听。我們供給他以装备、金錢和到滿洲去的船只，他便將他的受过良好訓練的和装备很好的优秀軍隊运到沈阳去。直到最后大势已去了，他們还留在那里，而且投降了。他們向华北地区作了一系列的延伸的活动，并在有城牆的城市里修筑工事。蔣介石的司令官是很不中用的。他們有一种想依靠筑有城牆的城市的变态心理。他們认为空曠的地区是危险的。空曠地区本是他們應該駐扎的地方。但是他們认为一个有城牆的城市妥当；因为他們能够看見人們进来。自然，沒有人来，他們就住在城里。共产党切断了他們的交通綫，破坏了他們唯一的铁路綫；因此对他們說来是不利的。1947年初，馬歇尔將軍是承认失敗了。他說两方面都不願意执行協議。蔣介石沒有傾听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的忠告，他是輸給共产党了。

毫無疑問，馬歇尔的使命沒有能取得他和我所希望得到的成就。战火很快地蔓延到了全中国，直到共产党成了大陆的主人，蔣

介石帶着殘兵敗卒逃亡台灣，這場戰火方告熄滅。

馬歇爾的使命之所以未能獲得成功，是由於蔣介石政府得不到中國人民的信仰和支持。蔣委員長的態度和行動和一個舊軍閥差不多，他和軍閥一樣沒有能得到人民的愛戴。我毫不懷疑地認為，只要蔣介石稍微遷就些，本是可以達成一項諒解的。我是不相信事後聰明的價值的。我派遣馬歇爾將軍到中國去這件事做得是否對，是不應該根據某些人現在的認識那樣去考慮的。這應該根據在1945年我們所能認識到的去判斷。在那個時候，一般人都認為，中國各種不同的勢力是能夠被說服使這個國家統一起來。當然，爭奪政權的鬥爭還會繼續下去，但是沒有理由認為國民黨政府就不能在這個鬥爭中取得勝利，正如歐洲的非共產黨政府那樣，如果它是關心人民和國家的基本需要的話。這在當時看來，還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據我的了解，赫爾利和魏德邁是這樣想的，我們的軍事和外交專家也是這樣想的。而且這些專家中還有人相信，美國能夠強迫中國統一——實際上，那就是說，我們能夠“強迫他們接受”。當然，持有這種態度的人是不適宜於擔任這項工作的。在我心目中馬歇爾是最合適的人，因為他有深厚的民主素養，而且真誠地相信要讓人民去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他深信應相信人民，不應迷信武力的原則，這個原則不僅可以應用於美國，而且對於任何國家的幸福都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了解馬歇爾將軍。在參議院國防計劃審查委員會的那些日子裡，我們每星期舉行例會，從這些頻繁的接觸中，我對他產生了崇高的敬意，認為他是一個人物，一個傑出的軍人。他清楚地懂得我希望在中國所要達到的目的，他完全依照我在他臨行時告訴他的政策綱領行事。

馬歇爾和我都沒有被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土地改革者”這樣一種說法所欺騙。馬歇爾將軍知道他是在和共產黨打交道，他知

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麼。當他3月里回到華盛頓時，他告訴我，他們的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曾經很坦白地宣布說，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他堅定地相信馬克思和列寧的教導和無產階級的最後勝利。馬歇爾從中國的來信中也指明，中國共產黨最後一定會得到俄國人的支持。

我也沒有為斯大林在波茨坦的談話所欺騙，他說中國共產黨不真正是“道地的”共產黨，後來他在給哈里曼的聲明中又說，他認為在中國打內戰是愚蠢的。我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從事爭奪中國的政權已幾乎近二十年。我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是想看到中國變成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共產主義不受人民大眾的歡迎，因為人民的需要，以及人民的呼聲，已經得到了滿足和回答。

我知道，世界和平不是靠多打幾次仗可以獲得的。更重要的是，我一向知道，有兩片廣闊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軍隊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國和中國。要想以武力把我們的生活方式強加於這兩個巨大的地區，在過去是愚蠢的，在現在也是愚蠢的！

在1945年和1946年整個兩年中，這樣的思想甚至還沒有表達出來便會遭到美國人民的拒絕。那個時候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同聲高喊着要“讓青年們回來”，同時，隨著成百萬的美國士兵被復員站送回國之後，我們在全世界以及中國的影響就越來越小了。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有機會給中國以經濟援助，以恢復這個國家的元氣，這樣，我們便能夠削弱共產黨的號召力。但是這樣的援助只有當該國秩序安定下來才能給予，同時也只有當該國政府享有足夠的威信，能夠讓人確信這種援助不會落入軍閥和奸商的口袋時，援助才會起作用。

自然，蔣介石最後由於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美國的援助而被打敗了，因為他的將軍很多都帶著由我們的武器所武裝起來的軍隊投到敵人的陣營里去了。只是當這樣的投降開始大量出現時，我

才决定停止继续把物资运到中国去。

可是，当馬歇尔在中国时，取得重大的军事成就的却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共产党，虽然馬歇尔在分析这些胜利时把它们看成是虛假的胜利，并且正确地預言蔣委員長在军事上最后要失敗。但是在我看来，国民政府的这种失敗主要是由于他們拒絕傾听馬歇尔的忠告。

有必要再次說明，馬歇尔是去做顧問工作的，不是去做指揮工作的。我派他到中国去不是去干涉那个国家的事务，而是去对那个地方的和平事业提供我們所能提供的帮助。他被派到那里去不是去替蔣介石做工作的。如果馬歇尔將軍在他的使命中沒有取得成果回来，那是因为两党都不是真正地希望按照協議組織一个联合政府来統一中国。

我試圖通过馬歇尔来实现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使蔣介石不需要美国全面的军事干涉而可以拯救他自己的唯一的办法。要給馬歇尔的使命以正确和公正的評價，就必须記住，在他出发到中国去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共产党之間就已簽訂了一个爭取国家統一的正式的书面協議。这个協議是以前在赫尔利大使——当时他領導着我們駐在中国的外交使团——的帮助下达成的，如果沒有这个協議，那我就不会派馬歇尔去中国了。我派他去的唯一的目的是帮助实施那个为中国領袖們所乐意接受的方案。我們的本意决不是将我的意志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第七章

援助希腊和土耳其

1946年初，俄国人在伊朗的行动威胁着世界和平。

俄国和英国于1942年曾和伊朗签订了一项协议，该项协议允许俄国和英国军队在战争结束后驻在伊朗领土上六个月。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贝文和莫洛托夫都同意这个协议意味着一切外国军队均应在不迟于1946年3月2日之前撤出伊朗。

可是，在11月里，国务院收到了可靠的报告说，俄国人不但不准备撤退，而且还在增兵。报告又说，俄国人还对德黑兰政府镇压该国北方——特别是阿塞拜疆省——的叛乱分子，正进行干涉。

11月23日，我让国务卿贝尔纳斯把这件事提到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贝尔纳斯那时候就建议赶紧把美国军队撤出伊朗。原来我们是根据与英国、俄国和德黑兰政府的协议而利用伊朗来作为援助俄国的供应线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在该国保持几千名军队。由于这仅是一支比较小的军队，我们便决定树立一个撤军的榜样，然后要求俄国人同意在1月1日从该国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我们对俄国提出的建议就是以这一点作为基础的，但是俄国人在12月3日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几天之后，莫斯科电台就向全世界报道说，一个革命政府已经在阿塞拜疆省成立了。伊朗政府立刻指责说，这个叛乱分子政府是依靠了俄国人才存在的，它受到俄国军队的支持。

当12月下旬贝尔纳斯还在莫斯科参加外长会议时，俄国人甚至拒绝讨论从伊朗撤军的问题。

1月19日，伊朗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控告俄国干涉它的内政。但是安全理事会无能为力，因为俄国争辩说，安全理事会这个机构无权处理这个争端。俄国人简直就宣布说，任何人问起关于伊朗的事，他们都将置之不理。于是安全理事会只好同意让俄国和伊朗直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当苏联军队仍旧占领着伊朗的土地时，它哪能拒绝苏联的要求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谈判桌子上是不会有什麼平等可言的。

3月2日是俄国人与英国和伊朗商妥要撤退军队的日子，这一天是过去了，但俄国人并没有离开伊朗。相反地，莫斯科宣布说“某些军队”将无限期地留在伊朗。

这严重地违背了已签订的协议。这也意味着伊朗必须在炮口之下和俄国人谈判。我决定将我们对国际关系中的这类行动的感觉告知俄国政府。我让国务卿贝尔纳斯将关于伊朗情势的一切现有的文件都带到我俩的每周例会中来。

在3月4日的这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还检查了这个问题的许多危险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果，贝尔纳斯给莫斯科送去一个照会，虽然这个照会带着外交礼节上的措词，但却很清楚的表明，我们对俄国人在伊朗的所作所为不表欢迎，特别是，尽管克里姆林宫一再作出了庄严的诺言，说他们将在不迟于3月2日之前退出伊朗，但是俄国的军队仍旧留在那里。

我们的代办乔治·凯南于3月6日在克里姆林宫递交的照会中有这样一段，“苏联政府决定将苏联军队留在伊朗的时间，超过了三国条约所规定的期限，美国政府，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以及1943年12月1日关于伊朗宣言的一个参加国，对于这种情况不能保持缄默。……美国政府，本着美国和苏联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协同努力中发展起来的友好精神，以及两国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诚恳地希望苏联政府实践自己的诺言，立即从伊朗领土上撤退苏

联的军队，以促进国际信任。……”

这个照会沒有得到官方的答复。然而，俄国的报纸却报道說是国务院的“誤会”，在伊朗并沒有俄国军队在調动。接着克里姆林宫便改变了策略，并且开始接二連三地攻击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耳敦的演說，还攻击我說我支持这个演說。丘吉尔是在富耳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第一次公开談到“铁幕”政策的。当俄国人不希望別人看得太清楚时，他們便采用老一套的放烟幕的障眼法。

但是我們繼續报道关于俄国军队在伊朗出現的情报。伊朗人进入了那些俄国人声称他們已經撤退了的地区，发现道路已被俄国军队封鎖了。据报告說，有三支很大的俄国军队正在前进中，一支开往首都德黑兰，一支向东移动，开往土耳其和伊朗的边境。种种迹象很清楚地說明，俄国已决定一意孤行，而且拿定主意不把美国和联合国放在眼里。

据我看来，这牵涉到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土耳其的安全。俄国人几个月来在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取得一些特权和土地上的让步。土耳其人拒絕了这些要求，如果俄国或俄国的傀儡国家能在东面包围它，那末他們的处境肯定地便将困难得多。

第二个问题是控制伊朗石油資源。沒有問題，俄国是在覬覦着这片广大的石油矿藏，如果俄国人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伊朗的石油，那末世界的原料平衡将会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这对西方世界的經濟說来将是一个严重的損失。

然而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俄国若无其事地漠視小国的权利和它自己庄严的諾言。如果国际义务被置之不顾，而联合国也采取視而不見的态度，那末便談不到国际合作了。

我把这三点都告訴国务卿貝尔納斯和海軍上将李海。接着我让貝尔納斯給斯大林送去一封坦率的信。3月24日莫斯科宣布說，所有的俄国军队将立刻从伊朗撤退。对土耳其的威胁是消除

了，虽然它还没有消失，而且还需要我们继续加以注意。伊朗能够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与俄国人谈判了。的确，伊朗国会后来拒绝了政府所签订的协议，这便是恐惧已从这个国家消除的一个清楚的证明。

全世界现在更能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身上。但是俄国人的野心却不会因友善地提示他们所作的诺言而有所收敛。哪里暴露出了弱点，俄国人便向哪里进逼，而我们也就不得不去对付那里所产生的压力，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俄国人和全世界都了解的。

隔了不久，同样的问题又在世界的同一个地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土耳其和希腊受到来自苏联集团的沉重的压力。他们都在英勇地设法给这些压力以反击，但是目前他们的力量已日趋削弱，他们很需要援助。

自然，土耳其是俄国人早已虎视眈眈的对象。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继承沙皇政府的衣钵，当时它想设法控制这个阻碍着俄国通往地中海的地区。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曾提出了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但是艾德礼和我却坚决要遵守蒙德娄公约所规定的原则，即这个海峡应该对一切国家的商用船只开放。基于这个原因，在波茨坦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就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大家只是同意每个国家都可以直接和土耳其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决定是完全恰当的，因为根据条款，这个协议到1946年就要重新加以审查。

我们把关于修订这些条款的意见写在1945年11月2日送交土耳其政府的一个照会中。我们通知土耳其政府说，我们对公约的任何修正意见都遵守下列三项原则：（一）该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对任何国家的商船开放；（二）该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通过；（三）除非得到黑海沿岸国家的特别许可，或者遵照联合国的授权行事，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在任何

时候都不能通过該海峡，但是在和平时期經大家同意的一定限度的吨位的軍艦不在此列。这份照会的副本送給了苏联——它沒有加以回答——和英国，英国接着也对土耳其政府送出了同样的声明。

然而，与此同时，俄国人除了設法通过伊朗包围土耳其外，还开始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取得領土上的让步。1946年7月，莫斯科給安卡拉送去一份关于調整达达尼尔海峡使用規定的照会，按照苏联的建議，一切非黑海沿岸的国家都将受到排斥。換句話說，我国和英国都将被排除于未来的任何協議之外，而土耳其将被迫承受三个共产党国家——俄国、羅馬尼亚、保加利亚——的联合力量。其次，苏联这个照会的更其不怀好意的部分是，把該海峡置之于土耳其和俄国的共同保卫之下。

这的确是要控制土耳其的一个公开表示。如果俄国軍队在强行联合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表面要求下进入土耳其，那末，过不了多久，这支軍队就会被用来控制整个土耳其。从过去两年的經驗中，我們深深地認識到，苏联的干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占領与控制。让俄国人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軍事基地，或者將軍队开进土耳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保卫海峡，結果就一定是一定是希腊和整个中近东陷入苏联的控制之下。

土耳其政府征求我們的意見，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就这件事向我請示。我責令国务院、陸軍部和海軍部仔細研究这个情勢。国务卿和两位部长及三軍參謀长很快地加以研究，一致建議我們应采取强硬的态度。我和国务卿及參謀长們圍繞着我的办公桌上的地图充分地討論了局势的发展，对中东的形势作了估計。我批准了他們所提出的建議。我們与我們的盟国交換了意見，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并且立即通知了土耳其政府。同时，土耳其政府还得到英国和法国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我还让代理国务卿通知我国駐安卡拉的大使用外交詞令口头上告訴土耳其的領袖說，“这个答复是只有在最高級的領袖們对这件事加以充分考虑之后才能作出的”。我們沒有作出什么特別的許諾，我們指示我們的大使建議說，我們认为土耳其对莫斯科的回答應該“合理而又堅定”。

送交俄国的照会清楚地表明，如果达达尼尔海峡变成了俄国的侵略目标，那末“所造成的形势将构成对国际安全的威胁，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方面显然将会对此事采取行动”。

土耳其政府受到美国态度的鼓励，拒絕了苏联的要求，并且表示，如果俄国訴諸暴力的話，土耳其政府将决心进行抵抗。土耳其的軍隊虽然数目是不少，但装备很差，和久經戰場鍛炼的克里姆林宮的軍隊相比，那就远不是他們的对手了。

更其严重的是連年的龐大軍費开支，对这个国家的經濟所造成的耗費。1946年年底，我国駐土耳其大使从安卡拉来信說，“土耳其将无力維持为了对付苏联而采取的无限期的防御措施。对这个国家的經濟來說，这个負担是太大了，它維持不了多久就要垮台。”

我国駐俄国大使比德耳·史密斯將軍证实了这个估計。史密斯大使在他的1947年1月9日的报告中說道，毫無疑問，克里姆林宮定会再度侵犯土耳其的主权，他认为，除非从美国和英国方面取得长期的援助，否則土耳其就要灭亡了。

土耳其的困境完全是由于俄国战后的趋于极端所造成的，而希腊的情况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領时期开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腊受到了惨重的損失。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墨索里尼的軍隊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最后德国和意大利的联合力量击败了希腊的軍隊。

然而，全国都在繼續进行抵抗，不久，所有的軍隊都集中在两

个主要的集团周围。其中之一即共产党統治下的民族解放陣綫，另外一支軍隊繼續效忠国王，王室政府当时流亡于国外。由于德国占領軍的罪惡行徑以及它和抵抗軍隊經常作战，希腊的正常生活实际上就停止了。田野和工厂都閑置了。人民挨餓，死于疾病者不計其数。

1944年10月，德軍撤退。英軍登陆希腊，流亡政府也跟着回来了。但是这个被战争破坏了的國家既沒有获得和平也沒有获得繁荣。內閣一再更迭，但是沒有一届內閣能够解决这个國家的問題。民族解放陣綫退入北部的山区，拒絕繳出武器，不久便与政府公开对峙起来。政府方面似乎也在助长不負責任的右翼集团的气焰。許多地区都发生了冲突，經濟几乎一点也沒有得到恢复。

自然，共产党人就在这种接踵而至的苦难、飢餓与經濟遭受破坏的情况下活跃起来。莫斯科和巴尔干半島上的卫星国家对民族解放陣綫进行公开的支持。据我所收到的情报說，許多叛乱者都在希腊境外的各种軍营里受訓和武装起来。报告說，在苏联的指使之下，希腊的北邻——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正在进行建立共产党希腊的运动。

在希腊所建立起来的一点安全与秩序，基本上是靠四万名英国軍隊以及英国給予希腊政府的忠告与支持才得到的。但是早在1945年秋季，英国就向我們建議說，他們希望我們援助希腊，特別是給希腊政府以財政上的援助。

我授权国务院与英国商討关于經濟援助希腊的問題，我們也很想肯定地知道希腊的情况到底是否宜于接受我們可能給予的貸款。为了这个緣故，我于1946年1月批准了一个送交希腊政府的照会，敦促該国政府提出一个稳定經濟的計劃。在这个計劃中，我們既提供顧問也提供基金。

然而，由于希腊的右翼与左翼的极端分子之間的距离越来越

大，局勢毫無進展。國王回去之後只是火上加油而已。最後，在1946年12月，希臘政府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說叛亂集團正在受到外界的幫助。聯合國派了一個調查團前往希臘調查情況。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希臘政府接受了我們提出的關於他們的經濟問題的長遠的技術建議，我派前物價管制局局長保羅·波特爾作經濟代表團團長。

然而，波特爾還沒有能夠來得及從他的現場觀察中得出結論，事態的發展就迫使我們作出決定，波特爾的代表團——以及我們早先處理希臘問題的办法——已過時了。

2月3日，駐雅典大使麥克佛給國務院的一個電報中說道，謠傳英國將從希臘撤軍，至少是要撤一部分。2月12日，國務卿馬歇爾給了我一封麥克佛寫來的信，他要求我們立即考慮提供援助給希臘的事。大使說，英國甚至連他們目前所做的一點工作也無力再繼續了。

2月18日，美國調查團的馬克·埃思里季來電說，一切迹象都說明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動向，共產黨人要攫取這個國家。2月20日我國駐倫敦的大使提出報告說，由於英國自己的財政情況惡化，英國財政部反對對希臘作任何進一步的援助。

但是危機比我們想像的還來得快。2月21日（星期五）下午五點鐘左右，英國大使要求會見國務卿馬歇爾。馬歇爾當時出城去了，去參加普林斯頓大學二百年校慶紀念會。會見約定在星期一舉行，國務院收到了一份英國大使行將遞交給國務卿的一份官方照會的副本。照會上通知我們說，英國軍隊必須在不遲於4月1日以前撤出希臘。艾奇遜立即用電話把照會的內容告訴我，我要他就我們所面臨的形勢加以研究，艾奇遜提醒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聯合委員會，在周末他們便準備好一份建議我們應如何做的備忘錄。

2月24日(星期一),国务卿馬歇尔将他在那天早晨正式收到的英国大使的官方照会带来給我。这份照会中陈述了联合王国在履行海外任务时所遭遇到的困难,并且通知我們說,到1947年3月30日,联合王国不得不停止对希腊的一切供应。

馬歇尔將軍和我同国防部长福萊斯特尔和派特遜討論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三軍各部則加紧研究了形勢的各个方面。国务卿馬歇尔在与英国大使的談話中得知,一旦这个工作順利地完成,英国便准备从希腊撤退他們的軍隊。

我們在雅典与莫斯科的代表的来信強調了形勢的紧迫性。史密斯將軍表示,他深信只是英国軍隊的出現才使得希腊迄今为止沒有被苏联的虎口所吞食。麦克佛大使从雅典的来信,描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希腊的若干領袖甚至都想引退了;在他們看来,似乎只有立即得到援助才能挽回这个局勢。麦克佛大声疾呼說,爭取時間乃是当务之急。

2月26日(星期三)下午三点钟,馬歇尔和艾奇逊将我們的专家們研究的結果带交給我。国务院、陸軍部和海軍部联合委员会在那天的早晨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議,一致通过了一項总的政策建議。艾森豪威尔將軍以參謀长联席會議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备忘录,从軍事观点来支持他們的結論。

副国务卿艾奇逊陈述了研究結果,我非常仔細地加以傾听。外交家和軍事家們詳盡地草拟了这个方案,但是他們的結論与几个星期前的信件与报告紛紛飞来时我所作出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希腊需要援助,需要得很急迫,而且数量很大。否則希腊便会陷落,铁幕便会从东地中海伸展过来。如果希腊陷落了,土耳其将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的一个无法防守的前哨。同样地,如果土耳其送給了苏联,希腊的处境将十分危險。

但是形势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波兰、罗马尼亚和东欧其他卫星国家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苏联占领而落入共产主义阵营。我们曾劝告苏联给予这些国家以政治上的自由，但是毫无效果；除非我们准备进行战争，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迫使他们放弃他们的控制。

希腊和土耳其是内外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自由国家。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英勇的斗争，来维护他们的自由与独立。

美国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些国家孤立无援。这样做将在中东、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树立一个鲜明的榜样。我们的理想和传统要求我们去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要求我们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政策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自由受到威胁，我们就要加以援助。

一个大国必须担当起从事这样一种可能遭到风险的事业，如果这个国家真正热爱自由的话。马歇尔和艾奇逊带来给我、并经我们在一起研究过的这个方案很清楚地表明，我们所冒的风险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不这样做，我们的安全以及任何自由国家的安全均会受到重大损害。

在俄国极权主义的威胁面前，自由世界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这是去年我与对外政策顾问们一再商讨的一个问题。为了使我们的思想有长远的打算，我批准在国务院内建立一个政策计划参谋组。由我们的一位最有名的俄国问题专家乔治·凯南领导这个小组。

总统很少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问题，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愿意把我的思虑转到这个摆在我国面前的重大问题上来。

为了打败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墨索里尼的专横和日本军阀的目空一切，我们经受了一次长期的战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可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新威胁似乎与纳粹德国及它的同盟者所造成的威胁同样严重。

我再也忘記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孤立主義者在我國所擁有的勢力。我在參議院任議員期間，每年都聽到有一位參議員念華盛頓的告別辭。它向孤立主義者們指出說，華盛頓為了達到保衛國家的偉大目的，曾擬定了適合於他的時代的一個辦法，現在雖然形勢與我們的國際地位都變了，我們政策的目的一一和平與安全一一却仍然照舊。這種說法一點用處也沒有。在孤立主義者看來，這篇演說辭就像聖經一樣。1939—1941年的“美國第一”組織、三K黨、佩萊和他的銀衫黨徒一一他們全都引證第一任總統的話來支持他們各種各樣的目的。

我很清楚地認識到美國孤立主義的復活對世界所產生的影響。顯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如果沒有美國的參加，就沒有哪個國家能對付得了俄國。如果我們置世界事務於不顧，像希臘這個被戰爭削弱和分裂的地區就會在俄國人不費多大力氣之下墮入蘇聯虎口。俄國人在這些地區的勝利和我們公開表示不關心，就會使得在歐洲國家（如法國和意大利等）內已形成很大威脅的共產黨更其壯大。袖手旁觀、撤退和“閉關自守”的觀念，只會把地球上現在不屬於俄國人的廣大地區拱手奉送給俄國。

現在是把美國明確地與自由世界列在一起的時候，而且美國應站在最前面。我知道這與喬治·華盛頓、亨利·克萊以及所有其他孤立主義者的先哲的精神是相抵觸的。但是我深信，我行將宣布的這個政策的确是我所處的時代的情況所十分需要的，正如華盛頓的政策適應他那個時代的形勢和門羅主義適應門羅所面臨的情況一樣。

在發表一項政策聲明之前，有許多人在為此辛勤地進行工作。自然，總統既不能和他們之中的每個人談話，也不能親自聽到他們每個人的意見。但是當他們的工作一旦結束時，總統的工作就來了，因為那時他必須作出決定。他們只是研究一個問題就得花上

若干天，甚至于几个月，而总统却每天都有一大堆事情要作出决定。为了说明这个情况，我想把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陈述一下。当我正在考虑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时候，欧内斯特·贝文发表了一个关于我们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公开声明，这在我和英国的关系上投下了一个阴影；第八十届国会的企业界集团扬言要从预算中削减大量的政府计划，包括海外新闻事业费用；国务卿马歇尔准备去出席他的第一次外长会议；我们需要对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许多事情作出决定；参议员麦克拉固固地反对批准戴维·李连塞尔做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以此来阻挠原子能计划；海陆空军统一指挥的议案需要最后交给国会批准；报界要求我宣布1948年的计划。在总统必须加以处理的这些要求中，他必须克尽元首所担当的职责，不管是礼仪上的也好，或者是非正式的也好，自然，他决不可以拒绝公众，甚至更不能拒绝报界。

可是，像这样的决定决不能匆忙地作出，凡是重要的决定我都作充分的准备工作，仔细研究和详加考虑。我总是尽可能地多倾听人们的意见。自从第一次碰到了那次结束租借法案的惨痛教训之后，我从没有不加郑重考虑就在一张纸上签字批准。

由于民主党不再能控制国会，我行将作出的这个重要的决定就复杂多了。我一方面盼望得到像范登堡、新泽西州众议员伊顿这样的两党外交的热心支持者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形势要比民主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时要险恶得多。因此，就需要将形势的严重性和我必须作出的这个决定的性质，尽快地征求国会领袖的意见。我请国务卿马歇尔和艾奇逊在次日十点钟回来，同时我邀请了国会领袖们来到这里。2月27日早晨十点钟，参议员布里奇斯、范登堡和康纳利，众议院议长马丁和众议员伊顿、布卢姆和雷朋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也邀请了国会议员泰伯，但是他没有能来。但是他下午来了，我和他讨论了局势。

我向他們解釋了英國提出關於希臘問題的照會後我們所處的環境。英國內閣關於從希臘撤軍的決定還沒有公開宣布，因此，還沒有一個國會議員知道我們即將突然遭遇到的危機是多麼深重。我對他們說，我已決定給予希臘和土耳其以援助，希望國會設法使援助及時而充分。

於是馬歇爾將軍把外交上交換意見的經過和局勢的詳細情況說明了一番。他很清楚地指出，我們的抉擇是，要末行動起來，不然就放着不管而遭到損失，我特別強調我同意這種看法。我回答了國會領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最後並向他們解釋了我們準備採取的方針政策。

國會領袖們似乎感受很深。他們其中某些人不願把錢花在對外援助計劃上。有些不久以前還是直言無諱的孤立主義者。但是在我辦公室中的這次會議上，當我把我認為我國應採取的態度加以闡明時，會上沒有一個人發言反對。

隨後的幾天里，國務院的專家們忙着研究形勢的各个方面。經濟部門則設法估計希臘在經濟上需要多少援助，並如何加以有效地運用。政府官員們則忙着和英國、希臘和土耳其的代表們進行磋商。立法官員們則在準備起草必要的法案。其他部門也都把希臘問題列於第一位。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特別積極，他和艾奇遜長談了好幾次。後來協助完成這項計劃的是副國務卿。馬歇爾將軍打算不久就到莫斯科去，他正集中精力擬訂參加那里的外長會議的計劃。

我得離開華盛頓幾天到鄰國墨西哥去作一次國事訪問——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墨西哥。

我於3月6日下午五點鐘左右回到首都，收到了一份有關各種情況發展的詳細報告，其中也談到了影響希臘的局勢的情況。希臘政府正式向美國要求援助。我國駐希臘大使館和波特爾代表團

都請求趕緊考慮這個要求。

我原打算到基韦斯特去住幾天，避開日常來訪的打擾，以便安安靜靜完成幾項工作，但是後來還是決定留在華盛頓，以便在國會開幕時去請求國會批准給予希臘和土耳其所急需的援助。

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時間卻很少。其中第一件要做的是把這件事提交到內閣會議。會議預定在3月7日召開，我用了大部分時間談希臘的局勢。我把援助希臘的決定告訴給閣員們，並希望他們對用什么最好的方式進行援助提出意見。艾奇遜把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作了概括的論述。他回顧了英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撤退之後可能引起的後果。然而，他告訴閣員們說，英國已同意繼續再給希臘政府三個月的支持。

我向他們解釋了一下準備請求國會撥款二億五千萬美元援助希臘和一億五千萬美元援助土耳其的計劃，我認為這還僅是個開端而已。

閣員們都同意了。但是勞工部長施魏倫巴赫有一些政治上的顧慮，他懷疑國內的反英分子將會攻擊我們“又在”為英國火中取栗。有幾個閣員強調希臘政府改組的必要性。我們對採取什么最好的辦法來向美國人民說明所涉及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最後，我讓財政部長斯奈德領導一個委員會去準備向我提出建議。這個委員會第二天就開會了，成員有艾奇遜、福萊斯泰爾、哈里曼、派特遜、克林頓·安德遜、施魏倫巴赫和約翰·斯蒂爾曼。委員會建議，為了強調時局的嚴重性，我應該親自出席國會聯席會議。

我已經於3月10日邀請若干國會領袖在我的官邸舉行了會議。這次的人數比我在2月27日所邀請的要多些。會議包括參議員巴克萊、康納利、塔夫脫、范登堡和懷特，眾議院議長馬丁和眾

議員布卢姆、坎农、伊頓、哈勒克、麦考馬克、雷朋、肖特和泰伯。迪安·艾奇逊也出席了，他和我同立法者在一起花了两个小时討論了希腊的局势。范登堡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我回答了与第一次會議上議員們所提的类似的問題。对于必須执行的这项工作沒有一个人表示异議。

与此同时，国务院在着手起草我将向国会提出的咨文草案。第一个方案并不完全使我滿意。起草人在演講詞中堆滿了各种各样有关希腊的背景材料与統計数字，把这篇报告弄得听起来好像一份調查意見书。我把这份草稿退还艾奇逊，并附上一个条子，要他再強調总的政策声明。国务院起草人于是又重新撰写了这篇包括一項总的政策声明的演講稿，但是在我看来，还是冷冷淡淡的。例如，主要的句子写道，“我认为，美国的政策應該是……”。我拿起了鉛笔，划去了“應該”二字，改为“必須”。在其他几处也作了类似的修改。在这篇讲稿中我不希望有模稜两可的字眼。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它必須清清楚楚，不允許犹疑或自相矛盾。

1947年3月12日(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我走上众議院大厅的讲台，向国会联席會議发表了演說。我請求參議員和众議員会集在一起，以便我能在他們面前說明我所认为极端严重的局势。

为了对付这个形势，我建議国会立即采取行动。我也希望向全世界說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場。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地便开始被称之为“杜魯門主义”。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轉捩点，它現在宣布，不論什么地方，不論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我向国会和全国的无綫电听众說，“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須支持那些正在抵抗依靠武装暴力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奴役阴谋。

“我认为，我們必須帮助那些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来挽救他們自己命运的自由人民。

“我认为，我們主要應該是經濟和財政的援助，因为这对經濟稳定和有序的政治进展是必要的。”

我的这篇演說发表了之后，世界各地的反映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全世界都发出了贊助声，而共产党和他們的同路人則瘋狂地对我进行攻击。界限是划得清清楚楚的。我在演說中說道，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

我說，“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由代表組成的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論、宗教信仰自由和沒有政治迫害。

“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的。它所依靠的是：恐惧和迫害、对报纸和广播的控制、指名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极权制度的种子，”我在結尾中說道，“是靠灾难和匱乏发育滋长的。它們散布在貧穷和不和的秽土中，并在其中成长。当人們要求改善生活的願望破灭时，它們便大大茁壯起来了。

“我們必須使那种願望永不息灭。

“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們都在期待我們的支持，以維護他們的自由。

“倘若我們的領導表现出举棋不定，我們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受到危害——我們也必定使我国的幸福受到危害。”

当我的演說完毕时，国会議員們象一个人一样站立起来鼓掌。大厅里只有一个人，維托·馬坎托尼奧，这个美国劳工党紐約州代表，沒有站起来。次日国会就开始立法工作，以便把這項計劃付諸实施。与此同时，由于我能不經国会的特別批准而提供援助，內閣閣員們就赶紧对希腊提供这样的援助与鼓励。海軍部长福萊斯特

尔根据我的命令，派遣了航空母舰《利特号》和其他九只军舰访问希腊，以表我们的决心，希望说服英国人继续留在那里，至少等到我们对希腊的援助发生效用时再撤退。

驻希腊大使麦克佛、驻土耳其大使埃德温·威尔逊和保罗·波特尔都奉召返回华盛顿，陈述他们在当地的见闻，并提出他们的意见。

4月5日，在杰斐逊纪念日午宴会上，我把我在国会中所发表的那篇演说的论点又再进一步加以强调。

“我们知道”，我说，“只要我们还是自由的，托马斯·杰斐逊的精神就永远活在美国人心中。他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一百五十年前燃起的这盏明灯，今天仍然在美国发出光芒。它甚至比他那时照耀得更明亮更清晰。当时这个未经受考验的信仰今天已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但是我们知道，杰斐逊的原则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党派或哪一个国家所垄断的。从被压迫的人民的沉默无言和失去自由的人们的失望中，向我们发出了一种愿望的表示。杰斐逊曾经在许多谈话和指示中把男人、女人和儿童对于自由的要求宣布为不可剥夺的权利。

“当我们听到国外要求自由的呼声时，我们就从托马斯·杰斐逊的话里得到了鼓舞。在他给门罗总统的信中，主张采取我们现在所说的门罗主义，他写道：

“‘干涉别国的内政，残暴地侵犯别国的权利，这种情况也是不可容忍的，我这里建议我们对此提出抗议’。

“像杰斐逊一样，我们看到了别国权利受到残暴的侵犯。

“我们也把这些情况看作是不可容忍的。

“我们也提出了抗议。”

“我们必须通过援助那些自由遭到外国压力的威胁的人们，使

得这种抗議发生效力。

“我們必須采取积极的立場。仅仅說，‘我們不需要战争’，那是不够的。我們必須及时采取行动——走在時間前面——及早扑灭可能蔓延到全世界的战火。……”

“今天全世界都期待着我們的領導。

“形势迫使我們担当起这个任务。

“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危急时期。自然，我們接受这个以世界为己任的新概念是一个艰巨和痛苦的过程，它的代价一定是很大的。

“但是推卸責任不是我們的本性。我們有一种构成我国最伟大源泉的传统。我把它称之为美国人的精神与性格。

“我們把乔治·华盛顿、托馬斯·杰斐逊、安德烈·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林·罗斯福貢獻給全人类。

“我們不仅热爱自由，在必要时还以生命来保卫它，而且还认为别人和別国也有权与我們共享自由。

“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为着爭取人权而进行斗争时，自由的美国人民，对于这种結果是不可能忽視或漠不关心的。

“在我們致力于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我們有許多东西要加以保持——許多地方需要改进——許多道路需要开辟。……”

与此同时，国会对援助希腊的議案进行着深入与謹慎的辯論。我希望它在3月31日以前通过，这个希望沒有实现，但是参議院在4月22日批准該項議案，众議院于5月9日才投票，結果以二百八十七票对一百零七票获得通过。1947年5月22日，我签署了这个法案。由于国会制定了这个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美国便向世界說明，共产主义的扩张是不可能輕易取得胜利的。

自然，在希腊国内搞叛乱的共产党和他們北部边境上的同謀

者知道，美国的援助一到，他們就要失敗了。因此，他們想尽一切办法要在我們的援助发生效力之前取得胜利。毫無疑問，叛乱分子是由卫星国家指揮的。1947年5月23日，联合国巴尔干調查团正式下結論說，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支持反希腊政府的叛乱。調查团內投票表决的結果是八比二，自然，俄国和波兰是“投反对票的”，法国弃权。6月初，希腊北部的政府軍隊的处境日趋恶化。6月9日，我国大使館报告說情况“显著地恶化”；16日，希腊政府請求赶紧装运援助物資；它还要求那些答应給予的援助物資大部分为軍事装备。

7月9日，英国外交部告訴我們駐伦敦的大使說，他們的专家們非常担心希腊的局势，认为前景暗淡。7月16日，馬歇尔將軍送給我一份关于希腊局势的备忘录，开始一句便写道，“过去三天来希腊的局势急轉直下。”数量相当可观的游击队从阿尔巴尼亚那边越过边境而来。看来他們的目的是在占領一些較大的地区，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中心。

我召見了海軍部長，問起我們在地中海的舰队有多大一部分能够調到希腊港口去。福萊斯特尔部長告訴我說，以緊急命令來調動大部分的地中海舰队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他相信，这样一种訪問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行动是会产生一些抑止作用的，但是他不願意对美国公众的反应作出估計。

与此同时，我所任命的援助希腊計劃的执行人德怀特·格里斯沃耳德（前內布拉斯加州州长）已經到达了那里。他花了很大的力气着手建立起一个机构，負責接收和分配供应物品事宜。然而，希腊政府还是表示对軍事装备最为关心。他們需要装备、顧問和金錢来扩充他們的軍隊，如果我們听任他們自己去支配的話，他們就会將我們所給予的一切援助用在軍事方面。麦克佛大使和格里斯沃耳德都在不断地劝导希腊政府扩大政府基础，取得最广泛的

人民的支持。

因此，甚至当我们支援希腊经济，帮助他们对付共产党叛乱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这样的问题，即他们要把我们的援助用来加强政党目的，而不用来解决国家前途。美国对欧洲政策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似乎是提醒欧洲人要以最远大的眼光来看待局势，而不要以一种狭隘的国家观点甚至党派成见来看问题。实在的，当我们为希腊问题所困扰时，马歇尔将军已经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说，“马歇尔计划”就是在这篇演说里提出来的。

第八章

馬歇爾計劃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國家，曾經遇到過像美國今天所面臨那樣巨大的任務——恢復和援助戰勝國和戰敗國。軸心國家的無條件投降並沒有給我國人民帶來喘息的機會。他們必須正視並準備作出保證和平所必需的任何新的犧牲。這次戰爭是歷次戰爭中破壞性最大的一次。所謂戰綫是不存在的，老百姓不幸同武裝部隊一樣地成為軍事目標，因為他們是總體戰中的工業和經濟中心的一部分。

對工業區的攻擊，對運輸、公用事業和其他設備的轟炸，使得已經為漫無止境的武裝部隊的需要所吸干的經濟生活到了快要解體的地步。

必須幫助各國（即使不是各洲的話）從這次災難中站立起來。除非這些國家的經濟生活得到恢復，否則就不可能重建世界和平。

在日本投降後的頭兩年中，美國拿出了一百五十億美元以上的貸款和贈與來救濟戰時難民。我們以慈善為懷，盡一切可能來防止飢饉、疾病和痛苦。我們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來幫助恢復交通和運輸，我們一個接一個地幫助各大國重建遭到破壞的經濟組織。

一個戰勝國願意復興戰敗國和幫助它的同盟者，這在世界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就是美國的態度。但是我們卻有一個同盟國對勝利採取了征服者的態度。

俄國人要索取二百億美元的賠款，但是我在波茨坦會議上告訴他們，我們不願意支付這筆賠款，因為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在这一方面已拿出了很多錢。但是現在，这是俄国人能够筹集恢复費用的唯一办法，因为战败国已經屈服了。我們宁可对我們的同盟国甚至过去的敌人进行贈与来帮助他們恢复。恰恰相反，俄国人則不分敌友，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就从他們所占領的国家搶走所有能够运走的东西。波兰、羅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鮮明的例子，它們由于帮助了忘恩負义的俄国人，而却得到了上述的后果。

我們所給予的援助，使世界上許多地区避免了严重的悲剧，并且开始向着恢复的道路前进。这种帮助符合美国的特质，也符合美国的新的历史使命。帮助遭受灾难的人民不仅是我国的传统，而且也是我們的安全所必需。我們重建欧洲和亚洲，也就是帮助建立世界和平所必需的健全的經濟均势。

然而，到了 1947 年，也就是經過了两年巨大的紧急援助（虽然这种援助是零零星星的）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出，为了重建欧洲的經濟，还需要一个更龐大、更广泛的計劃。这个計劃必須赶快进行，因为这时西方正面临日益加强的共产帝国主义的壓力。同时，我觉得，美国的援助不管如何巨大也不能使欧洲得到永久性的恢复，除非欧洲国家自己也能够帮助医治它們自己經濟方面的长期創伤。我怀着这种想法，着手寻求措施，希望以此鼓舞欧洲人民，实行一种最后能够达到有效的自力更生的联合計劃。

1946 年秋，我要求国务院、陆軍部和海軍部的联合委员会参与这个問題的研究，并提出行动方案。当时我认为，我們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計劃，为我們制訂一个对我們困难重重的盟国进行經濟援助的計劃打下了基础。

1947 年 3 月 12 日，我发表了一篇政策演說，在这篇演說中，我力图概括地說明，在任何对自由国家的独立和安定存在着威胁的地方，美国所要采取的立場。

几天以前，我在得克薩斯州华科的貝勒尔大学曾經表明了这种信念：自由的世界貿易是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說：“我們对外的政治关系和經濟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們不能說，我們願意在这一方面合作而不願意在另一方面合作。”我引证了三十年代的經濟战争，当时各国扼杀了正常的貿易，存款人丧失了他們的存款，农民失掉了他們的土地。我說，历史的教訓是很清楚的：国际間的自由貿易将为持久和平提供必要的条件。我的顧問們着手寻求更切合实际的办法来加强經濟事务方面的国际合作。

我們曾經把粮食运到欧洲，但是那里仍然有几百万人民得不到足够的粮食。我們曾經貸款給欧洲国家，但是战争已經把那里的貿易和經濟結構破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我們貸給它們的数額远远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我感到很忧虑，因为我們給英国的貸款沒有达到預期的目的。

我們的政府机构每天把有关国外情况的詳細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許多有代表性的外国領袖所提出的請求如雪片飞来。事实上，他們对經濟情况都表示了重重忧虑，认为如果不改善这种經濟局面，共产主义很可能取得胜利。4月26日，国务卿馬歇尔帶着一种悲观的情緒从莫斯科外长會議回来。他满怀希望到莫斯科去，以为能使俄国人相信美国是在为和平而努力的。然而，俄国人只关心他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冷酷地决定利用欧洲这种一筹莫展的情况来发展共产主义，而不願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合作。

馬歇尔的报告坚定了我的信念：必須刻不容緩地找出复兴欧洲的办法。馬歇尔將軍是我所熟悉的最机敏、最有远見的人之一。每当問題提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似乎都能馬上提出最基本的解决办法，而这个办法往往就是他的幕僚后来所建議的最好的方案。他很少发言，总是仔細地傾听別人說的每一件事情。有时候他会

略有表情地或毫无表情地坐上一个钟头，但是当他充分地听取了别人的意见以后，就会针对讨论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经常是击中要害的。

作为国务卿，马歇尔必须比当参谋总长时更多地听取幕僚的意见。他会倾听很久而自己一言不发，但是，当他的幕僚们之间的争论似乎无休无止而他已不能再忍耐时，他就说：“先生们，不要争论问题；要决定问题。” 迪安·艾奇逊曾经告诉我一个说明马歇尔的特点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马歇尔最初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当时马歇尔要求艾奇逊留下来继续担任副国务卿，他说：“我需要你告诉我最完全、最坦率的事实，特别是关于我自己。” 迪安·艾奇逊回答道：“是这样吗？将军。” 马歇尔说：“是的。我没有什么感情，仅有的那一点点感情也是留给马歇尔夫人的。”

马歇尔在国务院幕僚们提交给他的计划中，只抓住欧洲经济统一的重要性。如果能够引导欧洲国家把欧洲的经济问题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看作不相关联的各个国家的问题，来寻求自力更生的办法，并实行互相合作，那么美国的援助将更为有效，同时恢复后的欧洲的力量也更能持久。

这恰好就是我心里的想法。马歇尔和我完全一致。我感到，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以外，这个实行合作的主张将在欧洲国家中激起新的希望和信心，从而提供生动的论据来对抗共产党那种自暴自弃的态度。

这个主张是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办法，它最初由迪安·艾奇逊在一篇可以称为马歇尔计划的开幕白的演说中公开表示出来，这篇演说是在1947年5月8日在密士失必州克利夫兰发表的。原来计划由我在那次会议上发表这篇演说，因为我有别的事情，所以叫艾奇逊出席这个会议。艾奇逊的演说包括了建议的基本部分，一个月之后，马歇尔对这个建议作了充分的发展，并作了全面

的陈述。

艾奇逊演說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強調欧洲的重建問題必須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他着重說明了粮食和自由的相互关系。他說：“直到世界人民能够重新解决自己的衣食問題，并且对前途抱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战争才算結束。”他接着把我們过去进行救济的努力所收到的效果算了一笔賬，并进一步指出，更广泛的財政援助是必要的。这样使用我們的經濟和財政資源将有助于維護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制度，因为这样做将加强我国的安全，从而扩大經濟領域；人类的尊严和国外的自由制度正在这种經濟領域中进行生存斗争。

艾奇逊的演說虽然是后来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大学提出的建議的一个开端，但在当时它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国务卿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对参加毕业典礼的听众概述了美国对付欧洲危机的行动方針。

这篇演說对馬歇尔說来是典型的。这是一篇实事求是的、朴实的、簡洁扼要的演說。他首先对欧洲的經濟形势作了簡要的回顧。

然后开始談到行动方針，他說：“美国應該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經濟状态，这是合乎邏輯的。否則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和有保障的和平。我們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饉、貧穷、冒险和混乱。我們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賴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現。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們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給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来給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減輕剂。任何願意帮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力图阻撓其他国家复兴的政府就不可能希望得到我們的帮助。此

外，任何企图延长人类的痛苦以便从中获得政治或其他方面利益的政府、政党或集团，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接着他談到了計劃的關鍵部分：“事情很明显，在美国进一步努力来改善形势和帮助欧洲走上复兴的道路之前，为了使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能够收到适当的效果，欧洲各国之間必須就形势的需要，以及它們自己将担任什么任务取得一定程度的協議。如果片面地由美国政府来草拟一个复兴欧洲經濟的計劃，那既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生效的。我认为，欧洲必須首先提出創議。至于美国的任务，應該在拟定欧洲計劃时給予友好的协助，然后在我們实际能做到的範圍內，支持这个計劃。”

我們的建議就是，欧洲各国应首先就一項合作計劃达成協議，以便利用欧洲大陆上的全部生产資源，然后我們尽力給予物质上的支援，来使这个計劃获得成功。

当僚属們还在會議上討論这个方案时，我就称它为“馬歇尔計劃”，因为我願意馬歇尔將軍获得最大的荣誉，他在制定这个計劃方面有着輝煌的貢獻。正是馬歇尔构思出这个建議的全部輪廓。他看出了这个建議的鼓舞作用和經濟价值。历史必然永远会正确地把他名字同这个計劃联系在一起。这个計劃帮助欧洲避免了一次經濟灾难，并把它从俄国共产主义奴役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当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說中发表了他的主张以后，“馬歇尔計劃”这个名詞立刻就在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報紙和广播中变成了通用的名詞，我很高兴看到他的名字同这个計劃連在一起。我相信馬歇尔所享有的世界地位使得根据这个政策而作出的建議很容易被採納。在美国政府中，馬歇尔是那些与美国在全世界的战时活动的逐日发展保持密切联系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作为軍事战略家和外交家，他在国外是同美国历史上很少几个人一样地享有盛誉和受到尊敬的。在国内，不管一般公民的政治信仰如何，他們都

信任他，尊重他，同时也深为国会領袖們所欽佩。馬歇尔的整个品格引起人們对他的信任。我回忆起1944年初諾曼底登陸以前的那一段令人忧虑的时期。当时国会里有許多人对于一般所期待的通过英吉利海峡实行进攻，抱着疑虑，可是馬歇尔来到了国会大厅，对大約四百五十个議員发表了演說，他的冷靜而坚定的态度和对形势的一切实际情况的全面掌握，消除了每一个人可能存在的任何疑惧。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会的每一个人都遵守了这位將軍要求我們保守的秘密。这就是馬歇尔影响那些了解他的人的典型态度。毫不奇怪，所有近来对馬歇尔进行誹謗的人，既不知道怎样去衡量馬歇尔所負的責任，也不了解他克尽这种責任的态度。

在战争时期，他在华盛顿的許多岁月，使他全盘熟悉和了解国会的作用。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龐大軍隊的首脑，他处理了空前繁重的行政問題。在他专心致志地把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說中提出的計劃付諸实施时，这些經驗证明具有无可估計的价值。

馬歇尔的演說像电流一般地立刻获得自由世界的反应。最先响应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貝文，紧接着是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他們告訴馬歇尔說，他們准备采取馬歇尔所建議的那种主动的态度。伦敦和巴黎对西班牙以外的每一个欧洲国家发出了邀請，建議召开一次會議，設法草拟一个广泛的复兴計劃。

俄国的反应也是迅速的。馬歇尔的建議有一度看起来好像不仅可能收到复兴經濟的結果，而且也可能产生揭开铁幕的結果。有点令人奇怪的是，莫洛托夫先生竟同意参加貝文和皮杜尔建議确定全体大会的議程和程序的預备會議。但是，比德耳·史密斯大使从莫斯科正确地报告我們說，莫洛托夫并没有参加任何建設性工作的意图。他打算做的是利用这种局势来达到俄国自己的宣传目的。他企图使貝文和皮杜尔要求美国答应一个欧洲所期望的全部援助的具体數額。当然，这样一来，美国国务院就会被迫作出

我們不能以这种形式承担义务的答复，于是，苏联就可以向全世界宣称我們不打算实现我們的建議。

正如一位法国外交观察家所說的：“苏联想使美国处于这样的境地：美国要末就在真正的計劃成立之前把援助全部拿出，要末干脆拒絕支付任何貸款。”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告訴我們的大使說，“莫洛托夫显然不希望这件事搞成，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飢餓的卫星国却伸长脖子，渴望从你們那里得到一些錢。很明显，莫洛托夫陷入了尷尬的处境。”

事实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接受了参加會議的邀請，并且迫切地希望参加會議。但是，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行动，命令它們放弃参加會議的諾言，同时，莫洛托夫在离开巴黎时把資本主义和美国罵了一通。

1947年7月12日，十六个国家在巴黎参加了會議的开幕式，这些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冰島、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英国。西德虽然沒有正式参加，但是會議考虑了它的需要和它对于任何全面計劃能够作出貢獻的能力。

9月22日，关于这个會議的报告送到了国务卿馬歇尔那里。两天之后，馬歇尔把它連同許多有关文件送来給我研究。报告叙述了欧洲的經濟情况以及与会各国认为依靠它們单独的和联合的努力所能解决的問題的范围。报告在考虑了这些进行复兴的努力之后，便对这十六个国家必需进口而又无法付款的物資的范围作了估計。

于是，我发表了三个独立的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这三个委员会是我指定去調查我們自己的自然資源情况，对外援助对我国經濟的影响，以及能够用于对外援助的物資的性质和数量。9月29日（星期一），我还邀請了国会和政府許多領袖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会

議，就当时我們應該采取行动的計劃进行了討論。被邀出席的有：国务卿和副国务卿（罗伯特·罗維特已于7月1日继迪安·艾奇逊为副国务卿），农业部长和商务部长，以及下列国会議員：参議員布里奇斯、康納利、卢卡斯、范登堡和怀特，众議員艾伦斯、布卢姆、伊頓、哈勒克、雷朋和华尔柯特。

我把上述研究报告的詳細內容通知了議員們，并且告訴他們，看来在明年3月31日之前，为了应付欧洲的迫切需要大約需要五亿八千万美元，因为所提出的計劃最早要到明年3月31日才能生效。我要求参議院和众議院的外交委员会和撥款委员会主席，对于迅速援助西欧的必要性，予以认真的考虑，我們还研究了召开国会来討論这个問題的可能性。

10月1日，我发出了給两院撥款委员会主席的信，要求他們把这个問題当作一件最紧急的事情来考虑，特別是要考虑日益恶化的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11月17日，国会将召开一次特別會議。10月23日，我曾會見国会領袖們，告訴他們我要求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使国会可能采取步驟来制止国内螺旋形上涨的物价，主要是为了对付西欧的危机。

10月24日晚上，我在白宫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說。我說，當我們在考虑一个帮助欧洲复兴的长远計劃的时候，我們必須帮助某些国家渡过目前的危机。“法国和意大利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如果这两个国家的經濟崩潰了，人民屈服于极权主义的压力之下，那末，它們和我們都无法指望它們获得复兴，而它們的复兴对于世界和平又是那么重要。”

在国会特別會議上，我以同样的思想发表了演說。我強調說，用以阻止情况恶化的援助不可能代替广泛的长远計劃，但是，如果我們不願意在我們的計劃实施之前，看到它的基础毀灭的話，就必須立刻給与援助。

1947年12月19日，我送交国会一份咨文，说明美国在一个复兴欧洲的广泛计划中所应担任的角色。

“在拟订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第一，制订这个计划是为了使欧洲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获得真正的复兴，而不仅仅是漫无止境地继续进行救济。

“第二，制订这个计划是为了保证我们提供的基金和物资最有效地用来复兴欧洲。

“第三，制订这个计划是为了使美国的财政负担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也避免把长期无法偿还的毁灭性的财政负担加在欧洲国家身上。

“第四，制订这个计划时，适当地考虑到保存美国的物质资源，并且尽量减轻由于援助欧洲对我国经济所起的影响。

“第五，这个计划必须同我国的国际关系和其他方面的责任协调一致。

“第六，执行这个计划是为了明智而有效地实现我国外交政策上的伟大事业。”

我向国会建议，希望整个计划的执行能够在四年左右之内大体上达到复兴欧洲的目的。估计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全部代价要达一百七十亿美元。我要求国会批准这个数字，并且在1948年4月1日以前在这个数字中拨出六十八亿美元作为最初的也是最危急的阶段（到1949年7月30日为止的十五个月）的应用。

听起来，一百七十亿美元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当然，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单单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财政支出比较一下，这个数字就显得很小了。我们准备用来重建欧洲相当高的生活水平的钱，只等于我们为了打败轴心国家所花费的钱的5%；如果与这个计划实施期间我国的全部国民收入相比，则还不到3%。根据专家们的估计，美国人民完全能够负担得了的。

我没有忽略联合国和我们对它承担的义务。我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说：“我们对复兴欧洲的援助是同我们对联合国的援助完全一致的。联合国的成就有赖于会员国的独立的力量以及它们坚持包括在联合国宪章中的理想和原则的决心与能力。欧洲复兴计划的目的和联合国宪章的目的——通过自由国家的共同努力来保证世界和平——是完全一致的。任何国家如果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企图阻挠或破坏欧洲的复兴，显然与这些目的背道而驰。

“这个复兴计划不可能只通过联合国来实现。因为五个参加欧洲复兴计划的国家现在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此外，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并没有参加这个计划。美国对欧洲复兴计划的支持，将使欧洲的自由国家能够把它们巨大力量用于恢复经济上。而这些国家人民的较高生活水平的恢复，健全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个人自由与正义的理想的继续支持等等，……都有赖于经济的恢复。

“美国同一部分欧洲国家的这个联合计划，是忠于联合国的原则的，它证明，自由的人们能够有效地联合起来抵抗极权主义的压力，保卫他们的自由制度，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国会根据我的请求迅速采取了行动。不过议员们没有同意所建议的全部数额。三个半月以后，即1948年4月2日，我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案”。过了三天，我宣布任命保罗·霍夫曼为经济合作总署署长，职位相当于部长。

功劳应当归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查尔斯·伊顿。他们在一次旨在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国会会议中，以真正的两党合作的态度为这个计划进行辩护。在接着举行的另一次国会会议上，改变了这个计划的管理机构，并把它同军事援助计划合并成立一个共同安全署。

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它所花的代价比我们原来所预

計的要少得多。我曾告訴国会領袖們，在四年多的時間內用一百七十億美元可以勝利地完成經濟恢復工作。結果只花了一百三十億美元就完成了。

馬歇爾計劃將作為美國對於世界和平的最大貢獻而載入史冊。我相信，全世界現在已經認識到，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西歐是很難避免共產主義的專制統治的。

第九章

柏林的封鎖

馬歇爾計劃對俄國是個出其不意的打擊。莫斯科很快就認識到，馬歇爾計劃一開始執行，他們就會失掉利用西歐的經濟困難來使它共產主義化的機會。由於無法阻止各國進行合作來復興歐洲，俄國就企圖採取兩個行動進行報復。第一，是在俄國的主持下，為它的衛星國家建立一個與馬歇爾計劃相抗衡的計劃。這個計劃旨在切斷已經恢復了的東西歐之間的一切貿易往來。這個計劃也要阻止這些歐洲國家恢復正常的戰前貿易往來。這種貿易對這些國家是極其重要的。

第二個更富於挑釁性的行動是在柏林發動一次軍事冒險事件，目的在試探我們的決心和耐心。英國、法國和美國軍隊在柏林同俄國人近在咫尺。柏林的每一個單獨的占領區都完全處在蘇聯所占領的德國領土的包圍之中，同時所有美國、英國和法國的人員和供應物資都得通過一條為俄國人所控制的走廊，才能到達我們在柏林的占領區。按照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之間的協議的規定，管制德國的軍政府是在柏林聯合執行任務的。

關於東西德的劃分的來由問題，曾經有過許多討論。我們的軍事專家過去就充分認識到：一旦我們進攻德國的部隊把德國的力量從東綫吸引過來，俄國的力量就能夠深入德國。因此，遠在戰鬥結束之前達成協議的界綫，正反映了盟國的軍事計劃人員所預料到的在戰爭結束時俄國的軍隊會伸展到什麼地方。

在戰後的第一年中，英國人和美國人曾盡一切努力來實現聯

合管制計劃。可是俄國人在法國人的大力支持下粉碎了我們的努力。法國人害怕德國。當然，由於在七十年中受到德國三次侵略，法國人有充分理由害怕德國人。但是，他們這種分割德國的願望，使他們阻撓了許多聯合管制的措施，而這種合作在當時也許還是可能實現的。

至於俄國人，看來他們決心把他們的德國占領區實際上當作蘇聯所征服的領土來處理。他們切斷了蘇占區和英、美、法占領區的一切聯繫，使得在西德的三國政府的官員們沒有迴旋的余地。因此，必須作出安排以便恢復某些正常的經濟活動，而為了順利地實現這一點，就建立了一個包括英美占領區的“雙占區”聯合機構。後來，法國也參加了這種安排。

在我所接到的許多關於德國情況的報告中，有一個簡要的報告是當時的商務部長阿弗里爾·哈里曼送給我的。哈里曼在訪問德國之後，於1947年夏末說道：“我們給予的援助太少、太晚了。結果，在我們直到目前為止所花費的錢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白白浪費了。德國的經濟一直是靠人力和物資的貯備力量維持着的，它目前仍在繼續衰退中。我們必須增加目前的支出，以便減少今後幾年中總支出。……貯備物資正在迅速地消耗着。農業肥料不足，工業零件和原料即將用罄。運輸部門拆散了舊的機車和貨車來裝配另一部分機車和貨車，使它們能夠行駛。除非我們立刻採取步驟把走下坡路的趨勢扭轉過來，否則，我們將面臨接踵而至的許多危機。……除非我們準備馬上採取行動把德國的生活從目前的可憐而又混亂的狀態中恢復過來，我們就不可能達到我們的基本目標。德國的糧食供應和工業生產遠遠落在西歐各國之後。如果德國不能作為一個健全的生產和消費單位，而發揮應有的作用，我們就不能夠重建自給自足的西歐經濟。”

這就是戰後德國達到最糟糕的地步的情況。但是不久對德

国的撥款就增加了，西德的需要也列入馬歇尔計劃的預算之內，“双占区”联合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某些工业活动的恢复。

可是，与此同时，俄国人却愈来愈不好对付。在1948年3月20日，他們的代表終於退出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就大部分德国來說，这个行动只不过是使过去一段时期內已經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正式化而已，这个事实就是四国管制机构事实上早已无法工作下去了。但对于柏林來說，这个行动倒是一次严重的危机的序幕。

3月30日，苏联方面的副軍事长官德拉特温將軍通知我們駐柏林的軍事长官說：在两天之內，即从4月1日开始，俄国人将检查所有通过他們占領区的美国人員的证件，并检查所有貨运和除了私人行李之外的一切物品。

我們的軍事政府当局拒絕了这些要求。他們指出，當我們的軍隊从薩克森和提林格撤退到自己的占領区时，曾經得到自由通往柏林的保证。可是俄国人說，沒有达成过这种協議。他們宣称，他們完全有权利控制在他們占領区內的一切交通運輸。當我們的火車开到占領区边境，車长按照命令拒絕接受检查时，他們就阻止我們前进并要我們往回开。从4月1日到7月1日，俄国下命令切断了所有来往柏林的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俄国人提出的理由是“技术上的困难”。

这些“困难”的真相不久就很明显了。6月18日，英国、法国和美国宣布，三国的西德占領区即将发行一种新的貨幣。原来，俄国人保有在占領初期即开始通用的貨幣图版，他們在东德印制貨幣，大量流入西方占領区，有目的地使阻撓德国复兴的通貨膨脹更加严重。因此，我們便改变了貨幣的图版，但是俄国人繼續操纵东德馬克。我們的貨幣改革旨在使德国有一种健全的馬克，以便在西德通用。这种可靠的西德貨幣当然受到全体德国人的欢迎。俄国人反对我們的貨幣改革，因为这一改革揭露了他們的貨幣根本

就不穩固。貨幣改革也是因封鎖柏林問題而進行的談判的主要爭論之一。俄國人對於我們這一行動的重要性的估計很快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他們建議，如果西方國家取消貨幣改革，他們就重新開放通往柏林的交通。

俄國人當時想達到的目的是要把我們趕出柏林。最初他們堅持說，我們從來沒有駐在柏林的合法權利。後來他們又說，我們雖有这样的權利，但是我們已喪失了這種權利。

四大國在柏林的整個組織機構，包括我們從規定由俄國占領的地區撤退，都是由四國當地的將領們作為軍事問題協商解決的。劉歇斯·克萊將軍事後責備自己沒有堅持把協議用文字確定下來。可是，我認為，有沒有書面協議對俄國人說來，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柏林的鬥爭是為了德國，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是為了歐洲，而並不是為了合法權利，因為我們的立場在國際法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克里姆林宮看到我們開始實行馬歇爾計劃，就企圖迷惑歐洲人民，使他們相信我們所關心和支持的只限於經濟事務，在碰到任何軍事冒險時我們就會縮回去。

我在6月25日的內閣會議上說明了這一形勢。陸軍部長肯尼思·羅亞爾報告說，一種嚴重的局勢正在發展中。他同駐在德國的克萊將軍經常保持接觸。我叫羅亞爾詢問克萊，局勢是否嚴重到需要考慮撤出在柏林的我方人員的家屬。克萊認為這樣做是不聰明的，因為這會引起心理上的影響。克萊被迫採取了緊急措施，把必需的供應從空中運到柏林，因為當時柏林的水陸兩路實際上已經被俄國人封鎖了。

6月26日，即我們在內閣會議上討論了柏林危機的第二天，我命令這種臨時採取的“空運”措施應在全面組織的基礎上進行，同時我們的歐洲司令部能夠獲得的一切飛機都必須服役。我們希望採取這種辦法能夠供應柏林所需的糧食直到外交僵局打開為

止。

后来談判移到莫斯科去举行，在7月6日，西方三国的代表以我国大使比德耳·史密斯为发言人，向俄国人把問題攤开。苏联在7月14日提出的答复中，放弃了所謂“技术困难”的借口，极其清楚地表明了俄国封鎖柏林事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宣传行动。当时苏联拒絕就柏林問題进行談判，除非把它当作整个德国問題談判的一部分。他們拒絕了我們提出在任何談判举行之前先解除封鎖的条件。

我发出一道命令，叫克萊將軍及他的国务院顧問罗伯特·墨菲回华盛顿来作汇报。

很显然，俄国人决心要强迫我們退出柏林。他們最近在意大利、法国和芬兰遭到了挫折。他們的最强大的卫星国南斯拉夫突然产生了一种主张独立行动的傾向，同时欧洲复兴計劃正在开始获得成就。封鎖柏林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反攻。克里姆林宫所选定的目标——德国的故都柏林——也許是欧洲最敏感的地方，因为它过去是、現在也是德国人的象征。如果我們不能保持在柏林的地位，共产主义就会在德国人中間扩张势力。我們在柏林的地位是风雨飄搖的。如果我們想要留在那里，我們就必須显示一下力量。但是，俄国人对于我們行动的反应又經常存在着引起战争的危險。我們必須正視俄国有可能蓄意选择柏林来制造战争的借口，而更大的危險是以杀人取乐的俄国飞机駕駛員或头脑发热的共产党人坦克指揮官可能制造一个偶然事件而燃起战火。

1948年7月23日，克萊將軍来到白宫，并参加了当天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會議，我要他报告一下德国的局势。

下面就是他說的大概情况：放弃柏林将对我們的西德計劃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它将推迟欧洲的复兴，而欧洲是否能够复兴則决定于更多的生产，特别是西德的生产。一般德国人对于我們撤

离柏林的可能性比盟国更为关心。我們應該尽一切努力爭取局势的和平解决，但是我們必須留在柏林。

克萊又說，德国人民的态度在某些方面簡直令人不敢相信。組成市政管理机构，并将总机关設在苏联占領区的柏林政党領袖們曾坚决拒絕接受苏联的控制。柏林人民决心坚持下去即使这样做会遭受更大的困难。

他报告說，每天空运平均約二千四百——二千五百吨，这个数字足够供应粮食的需要，但还不能包括必需数量的煤。为了維持柏林的需要，使不发生极大的困难，估計最低限度每天需要四千五百吨。在夏季，每天三千五百吨可能够用，但是在冬季就需要更多的吨数。

那时参加空运的包括五十二架 C—54 型飞机和八十架 C—47 型飞机。每天来回两次，降落二百五十次以上。如果再有七十五架 C—47 型飞机，我們每天就能够运入三千五百吨。

我問空軍參謀长范登堡將軍，为了出动这些飞机，将会发生什么问题，他告訴我，假如把更多的飞机用于柏林空运，軍事空运处就要解体。而且我們还会发现至少需要在柏林再有一个巨型的飞机場来容納貨运，同时在另一端至少需要一个巨型的保养航空站。

范登堡將軍在答复国务卿馬歇尔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說，最大限度的空运必然要使用原来备作紧急之用的飞机，而其中很多可能在发生敌对行动时被毀。这样就会對我們进行战略性战争的能力发生不利的影響。如果我們的大部分飞机遭到襲击和毀灭，就会阻碍我們供应部队和防守海外基地的能力。范登堡將軍还指出，通往柏林的航路是我們和俄国人共同使用的，如果我們把空运增加到他們认为他們被挤出航路的程度时，国际糾紛就可能产生。

接着，我問克萊將軍，如果我們試圖用武装护送的办法，把供应物資运入柏林，会发生什么危險。克萊將軍說，他认为俄国人的

头一个反应将是在路上設立障碍。在俄国人不进行干涉的情况下，我們的工兵能够清除这种障碍。但是克莱將軍认为，俄国人可能采取的第二步，即是用武装部队来对付武装护送。

陪同馬歇尔国务卿一起来的罗伯特·罗維特問克莱，他是否认为俄国人可能试图以战斗机巡邏或其他办法来阻止我們的飞机。克莱說，他认为俄国人除非决定发动战争，否則就不会攻击我們的飞机。

我問克莱將軍，他是否知道有什么迹象說明俄国人要发动战争。他說，他认为沒有这种迹象。他們的目的似乎是要把我們赶出柏林，以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他們打算不是在目前，就是在秋后利用冬天的气候迫使我們削減空运，又不致于扩大冲突。

我們討論了如果冲突更加严重时，我們可能从我們的盟国方面得到什么援助。我說明了我的判断：如果我們撤出柏林，我們就会丧失我們正在为之斗争的一切。主要的問題是：我們怎样才能繼續留在柏林而又不致冒全面战争的危險？

范登堡將軍再次发言說，他觉得为了把所需的一切供应空运給柏林而将必要数量的飞机集中起来，将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在飞机和人員方面削弱我們的空軍力量。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会使我們暴露在无法收拾的形势下。

可是，我不同意空軍參謀长的意見。我問他，他是否宁願讓我們试图从陆路护送供应給柏林。再說，如果俄国人阻撓我們这样做，并且发动世界大战，难道空軍就不需要貢獻它的一份力量来保卫美国嗎？接着我自己答复道：空运比陆路武装护送危险性較小。因此，我命令空軍对供应柏林問題尽量給予充分支持。

范登堡將軍回駁道，除非在柏林另外再修建机场設備，这个办法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克莱將軍指出，他早已选好了修建新机场的地方，修建工程可以利用德国的人力馬上开始。于是范登堡將

軍向我保證，空軍將盡全力執行命令。

談到這里，我因事不得不離開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的各个方面，例如能夠馬上投入空運的飛機數目以及留在柏林的家屬的數目等。

我們必須準備把空運擴大到最大限度，同時繼續同俄國人進行談判，看看是否能夠通過協議解除封鎖。7月30日，史密斯大使同他的英法同僚們把盟國對於俄國7月14日的照會的答復交給蘇聯外交部。我們宣稱俄國的答復並沒有提供任何建設性的建議。局勢充滿着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為此，三國大使要求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舉行會談。

8月2日晚上九點，他們會見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往常一樣，斯大林表現得比他的僚屬們較為通情達理，因此，會談的結果使氣氛緩和了一些。斯大林暗示，如果就東西德的貨幣能在全柏林流通這一問題作出安排，他願意撤除運輸方面的限制。他已不再堅持關於在取消封鎖之前必須就全德問題舉行會議的意見，但是他希望把蘇聯政府的“堅決的願望”載入紀錄：盟國延期執行下一個步驟——合併西方占領區計劃。

然而，當史密斯大使和他的同僚們準備同莫洛托夫就這一諒解寫成正式聲明時，俄國的立場又一次變得頑固和強硬了。四次長時間的會談都沒有達成協議。我們的代表們反對俄國提出的草案中所包括的一句話，這句話的實質就是要我們承認，我們只是由於俄國人的寬容才重新被允許留在柏林的。而莫洛托夫則拒絕接受西方國家提出的草案，因為這個草案宣稱我們留在柏林是一種早經確定的權利。俄國的草案說，在宣布貨幣改革之後實行的運輸方面的限制將予撤銷，但是由於貨幣改革直到6月下半月才生效，因此在此以前，實行的許多限制將不包括在撤銷之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簽署了這項聲明，我們就是同意俄國人的論點：封

鎖柏林是为了对付我們的貨幣改革而采取的一种“防禦”措施。此外，根据俄国的建議，在柏林通用的两种貨幣将由一家完全由俄国控制的銀行来管理，同时柏林的全部对外貿易也将由一个为俄国所控制的机构来监督。

同莫洛托夫举行的这些关于起草声明的會議毫无成就，因而我們指示史密斯要求同斯大林本人举行另一次會談。这次會談在8月23日举行，斯大林再一次表现出比莫洛托夫有更大的兴趣来获得互相諒解的基础。在撤銷限制的范围問題上，莫洛托夫再次坚持声明中規定只限于那些在6月18日以后采取的限制。但是斯大林认为，声明中写作“最近实行的限制”比較妥当，同时认为可以获致諒解，如果在6月18日以前曾采取任何限制的話，这种限制也将被撤銷。斯大林还同意，将管理柏林的两种貨幣的苏联銀行置于四大国的控制之下。

根据达成的協議，由四国軍事长官拟訂協議的細节。但是，当外交官們着手起草公报及对駐在柏林的四国軍事长官发出整套的指示时，事实又一次证明莫洛托夫很頑固。事实上，到了最后，甚至連向公众发表一个关于技术問題已經交由柏林方面去解决的临时性公报都不可能，因为莫洛托夫除了他自己提出的条件之外，拒絕接受任何別的条件。

四国軍事长官之間的討論始終不能順利进行。俄国代表索科罗夫斯基元帅很快就采取了同斯大林对三国大使明确保证的完全相反的立場，他宣称不考虑撤銷在6月18日以前实行的任何限制。事实上，他这时还力图对空运实行新的限制。他还断然声明，由四大国来控制发行貨幣的銀行是完全办不到的。在柏林进行一星期之久的技术性問題的談判甚至比在莫斯科一个月的談判还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空运一直在增加着。8月20日，陸軍部长罗亚尔

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說，英美联合空运量平均每天为三千三百吨，一天的最大空运量达四千五百七十五吨。英国人利用了他們能够利用的一切力量，用运输机空运到柏林的物资，在上述吨数中占三分之一。柏林的庫存物资逐渐增加了；那时在柏林已积貯了二十五天用量的煤和三十天需要量的粮食。9月9日，空军部长薛明頓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說，从8月初起，每天平均空运量已达到四千吨，如果指派更多的运输机参加空运的話，可能达到每天五千吨。

就在9月9日举行的这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會議上，我們詳細地討論了这次同俄国人談判所遭到的明显的失敗的意义。馬歇尔和罗維特在回顾了過去一个月来的外交事件后，得出結論說，除了把問題提交联合国之外，別无其他办法。副国务卿罗維特要大家注意一个事实：苏联已經宣布要在包括我們的空运航路在內的广大範圍內举行空军演习。但是我們已通知俄国人，我們將不停止我們的空中活动。

国务卿馬歇尔指出，目前的时机对苏联是有利的。虽然我們能够繼續进行空运，并且增加空运量，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我們获得了比原来所預期的更大的成就，俄国人还是可能用新的办法来試探我們的耐心的。比方說，就在最近，柏林两方占領区出現了共产党領導的暴动，使局勢严重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美国，有人提出了同俄国絕交的要求。这些人不了解我們只能在談判和战争之間选择一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沒有的。只要俄国人願意繼續談判，不管談判是怎样的一无所获，就不会发生战争。

史密斯大使奉到指示，交給莫洛托夫一件备忘录，其中列举了柏林談判失敗的詳細原因，并且以最直率的語言說明了我們的立場。但是，莫洛托夫的答复还是老一套。他把所有的过失都归咎

于我們，除非我們完全接受苏联的立場，就不可能获致任何結果。

那时候，法国、英国的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正在巴黎举行會議，他們在1948年9月26日发表了一項声明，认为苏联的答复“不能令人滿意”，同时宣布这个問題即将提交联合国。我当时正在全国各地进行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竞选旅行，但是，我仍經常与局势的全部发展保持密切联系。电信和文件都送来給我批核。代理国务卿罗伯特·罗維特和馬歇尔將軍一样精細，保证总统經常了解情况的发展，并且在采取重大步驟或发表重要声明之前一定經過总统的批准。

美国对苏联的指控，是在9月29日由华伦·奥斯汀大使交給联合国秘书长賴伊的一个照会中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的。照会要求注意“由于苏联政府对德境西方占領区和柏林之間的交通运输片面地采取限制措施而引起的严重局势”，并且指控这一行动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規定是对和平的威胁。照会还明确指出，美国认为苏联的行动是一种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压力。

但是，苏联政府认为，如果西方国家当初接受了苏联的意見，就不会发生封鎖事件。此外，維辛斯基先生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辯解道，从传统的国际法的意义來說，并不存在什么封鎖問題，因此，也不可能存在对于和平的真正威胁。他說，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关于封鎖柏林問題的任何討論。

在這場爭辯的全部过程中，我們在安理会的发言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菲利普·杰塞普教授。他是国际法的权威之一，由于他在联合国中代表西方国家提出这个指控时，表現了政治家的风度，因而获得国际上的尊敬。

可是，由于戏剧性的空运部队一天接着一天地飞向柏林，使外交斗争黯然失色。到了10月中旬，克莱將軍就可以坚定不移地下結論說：空运已不再是一种試驗。即使最不利的天气，也不能阻止

我們的運輸供應的飛機從西方佔領區飛向被封鎖的前德國首都。

克萊將軍還在1948年10月22日舉行的另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作了這樣的報告，他不僅向我們說明了空運在技術上的成就，同時也指出我們在柏林的行動在德國人民中所起的影响。德國人民加強了團結，以新的活力從事重建德國的工作。我們的行動使他們強烈地反對共產主義。德國過去一直在消極地觀望着，不知道應該把自己的未來命運寄托在哪一方面，可是現在它正調轉船頭，向西方國家駛來。

1948年末，蘇聯的領袖們進一步企圖引誘柏林人民削弱他們靠攏西方的決心。11月30日，由於蘇聯的陰謀，造成了柏林市政委員會的分裂，這樣，柏林市在實際上就分裂成為兩個部分。他們還實行了一種新的檢查證件制度，使得東西柏林的接觸幾乎成為不可能；他們還改變了電力分配制度，這在實際上癱瘓了運輸系統。

與此同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設立了一個技術委員會來擬訂解決貨幣僵局的建議。我們對於這些建議的反應是：我們與俄國人打交道的經驗迫使我們拒絕任何規定由四大國共同實施的計劃。我們已經知道，俄國人常常在原則上同意，但很少在實際上執行。我們需要一個解決辦法，但是我們不能接受實際上使柏林人民完全受蘇聯人和他們的德國共產黨僕從支配的解決辦法。

這就是1948年末和1949年初的情況。我們已經把俄國人想把我們趕出柏林的企圖擊退了。封鎖繼續愈久，空運的技術效能就愈加改進，德國人民就愈加指望西方來加強他們保持自由的決心。柏林已成為美國和西方國家獻身於自由事業的象徵。

克里姆林宮開始看到他們想把我們趕出柏林的努力是註定要失敗的。俄國在柏林問題上所表現的粗暴和野蠻，使得許多歐洲人認識到，西方國家之間必須建立密切的軍事支援，而這一點又導

致最后討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柏林問題对一切的人都是一个教訓。

1949年1月底，克里姆林宮发表了斯大林对一位美国記者所提問題的一系列答复。斯大林曾經在其他問題上利用这种手法以及記者来暗示态度或政策上的改变。这一次，他在回答一个关于封鎖柏林的問題时說，如果西方三国和苏联所实施的限制同时撤銷，就不会有解除封鎖的障礙。

迪安·艾奇逊（我在1948年竞选胜利后已任命他为国务卿）在斯大林答記者問公布后到白宮来作例行晋見。我們非常仔細地研究了俄国部长會議主席的答复。我們发现，从1948年6月以来，在俄国的声明中这是第一次沒有把封鎖柏林同貨幣問題联系在一起。艾奇逊建議，指示杰塞普向苏联駐联合国代表打听一下苏联这样做是不是有意識的，我批准了他的建議。

1949年2月15日，当联合国的代表們正在休息时，杰塞普找到了一个非正式的机会同苏联駐联合国代表馬立克先生說了几句話。杰塞普对馬立克指出，斯大林的答复中沒有提到柏林事件中的貨幣問題。这一忽略有什么意义？馬立克說，他不清楚，但是他願意問一下。整整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得到了答复：这一忽略“不是偶然的”。这个例子說明，用率直的态度同俄国人打交道是如何困难。

俄国人仍旧坚持我們必須停止建立西德政府的行动。但他們已不再坚持必須在他們撤銷封鎖之前实行这一点。現在他們同意撤銷双方在1948年3月1日以后对进出柏林的交通所加的限制，然后召开四外长會議来討論“柏林的局势所引起的問題及影响整个德国的問題”。至此，俄国人已准备退却了。5月4日，发表了一項公报，宣布四个有关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同意：从5月12日起結束柏林封鎖。

自从俄国人最初采取限制措施以来，已经过了十四个月以上。用空运的办法供应柏林也有一年多的时间。

空军的成就值得大大表扬。从技术上来说，对柏林进行空运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甚至连空军的领导人员本身在最初也深深怀疑这是否能办得到。可是，它证明是欧洲各国人民的指路灯。

当我们拒绝被赶出柏林的时候，我们向欧洲人民证明了，当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时，我们就会在他们的合作下行动起来，而且是坚决地行动起来。从政治上来说，对柏林进行空运使欧洲各国人民更加靠拢我们。

封锁柏林事件是试探我们进行抵抗的能力和决心的一种行动。这一行动和他们过去想夺取希腊和土耳其的企图，都是俄国人刺探在他们周围的西方盟国阵地弱点的计划的一部分。

第十章

巴勒斯坦問題

希特勒主义下的犹太牺牲者的命运，是我个人所深切关怀的問題。我常常为人们的悲惨命运深感不安，他们由于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的缘故而成为偏见和狂热的牺牲者。这种事情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是不容许存在的。在近代史上，俄国和波兰，曾经是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迫害者，在莱茵河东部犹太区成为一种制度，其中有些犹太区从中古时代就建立了。但是，纳粹党对于在德国的犹太人的有组织的暴行，却是历史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罪行之一。从希特勒德国疯狂的灭种政策下侥幸生存的受难者的悲惨境遇，是对西方文明的一个挑战，我以总统的身份，着手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在人们所提的建议中，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成立一个犹太人国家。

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的祖国的問題，应追溯到英国人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中对犹太人许下的庄严诺言。这个诺言曾经引起这些被压迫的人民的希望和梦想。我觉得，这个诺言应该实现，正如负责的、文明的政府所作的一切诺言都应该实现一样。

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我担任总统以后几天，当时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任何有关团体可能同我接近之前，给了我一封信，提供了关于巴勒斯坦的简要情况。他说，某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很可能很快作出努力来从我这里获得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诺言。这个计划的目的是犹太人无限制地移入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斯退丁紐斯說：“在近东一直存在着緊張的局勢，這主要是由於巴勒斯坦問題所引起的。在這個對美國極其重要的地區里，有我們的利益，我們認為，這整個問題是一個應以極其慎重的態度從美國的長遠利益出發去處理的問題。”

兩個星期之後，當時因斯退丁紐斯不在，代理國務卿職務的約瑟夫·格魯送給我一份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更詳細的備忘錄，報告我“雖然羅斯福總統曾多次表示同情某些猶太復國主義的理想，但他也對阿拉伯人作了某些保證，阿拉伯人對這些保證看作是我們這方面的明確義務。在過去幾年中，羅斯福總統曾屢次授權國務院以他的名義向近東各國政府首腦保證，‘美國政府認為，不經過與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充分協商，不應作出改變巴勒斯坦基本形勢的任何決定’。他在今年年初同伊本·沙特國王會談時，更進一步向沙特國王保證，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他不會採取敵視阿拉伯人民的行動，也不會幫助猶太人來反對阿拉伯人。

“現附上摘錄羅斯福與伊本·沙特談話內容的備忘錄抄本一份，會談的原始記錄大概保存在羅斯福先生的檔案中。在那次會談之後，這個備忘錄曾經過總統和國王雙方的批准，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認為這是有根據的文件。在4月5日，即在羅斯福先生逝世前一個星期，他簽發了一封致伊本·沙特的信，重復了他在會談時所作的保證。這封信的抄本也一併附上。

“不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且整個近東地區的阿拉伯人都不諱言他們對於猶太復國主義的仇視，他們的政府宣稱，要想阻撓他們武裝保衛他們心目中的阿拉伯世界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羅斯福總統完全理解這一點，因為就在不久之前的3月3日，他在中東之行回來之後，還告訴國務院的一位官員說，在他看來，一個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國家（這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最終目的）只有用軍事力量才能建立和維持。

“如果我能够向你提供任何更多的内幕材料，我一定很高兴这样做。……”

我充分认识到阿拉伯人对于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仇恨情绪，但是，正如许多美国人一样，我为欧洲的犹太人的悲惨境遇而感到不安。答应犹太人有机会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的贝尔福宣言，在我看来似乎是同伍德罗·威尔逊的崇高政策完全一致的，特别是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我任参议员时，就曾对我的同僚纽约的参议员华格纳和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塔夫脱说过，我拥护参议院通过一项赞成迅速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决议。

但是，国务院所考虑的，主要是阿拉伯人的反应，并且认为现在提出巴勒斯坦问题不是时候。在1945年6月16日的另一个备忘录中，代理国务卿说，根据国务院的看法，巴勒斯坦问题是应该在战后通过联合国求得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且，不经过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充分协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作出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备忘录在结尾时就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可能来找我的问题，提出了善意的建议：“因此，您除了对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可能交给您的一些材料表示谢意，并向他们保证您将慎重考虑他们的意见之外，似乎没有必要作更多的答复，除非您愿意这样做。”

阿拉伯各国在致国务院的信中，提出了他们反对建立犹太人国家和增加巴勒斯坦移民的理由。埃及总理诺克拉西直接写信给我说：

“……深为遗憾的是，在过去半世纪多以来，欧洲某些国家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在纳粹主义出现以后更为加深的痛苦，竟被某些政治家利用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一种族理论，并呼吁全世界支持他们的计划。不幸得很，他们的努力的矛头集中在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历史上一向对犹太人表现极大的容忍甚至优待，可是现在阿拉伯人却成为宣传、压力以及

完全无法忍受的掠夺行为的牺牲者。为什么一个只有一百万人口、住在一小块领土上的小国竟被迫在二十五年之内接受了一种外来民族的几乎达到自己人数的 50% 的移民？从完全客观的立场来看，这是很难理解的。容纳这么多外国人所造成的困难是如此严重，以致阿拉伯人坚决反对再增加移民。这一原则已得到一份英国白皮书的赞同。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最严重的方面。现在，这些阿拉伯人座上的客人竟宣布，不论如何，他们都要大批移入自己的亲族，占领阿拉伯人的全部土地，并且依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就是这个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激起阿拉伯人不惜任何牺牲进行反抗的坚强决心，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阿拉伯人不是被降为一个少数的劣等民族的地位，就是要抛弃自己的家园。”

下面是我对埃及总理的答复：

“……我希望向您保证，备忘录中提出的意见已经得到我的密切注意。我充分地理解，阿拉伯国家深切地关怀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我愿意重申您的政府前此曾经获得的保证，即美国政府认为，不经过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充分协商，不应对巴勒斯坦的基本形势作出任何决定。……”

对于以相同情绪写信给我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的首脑们，我也给予了类似的答复。我的立场是：民族自决的原则需要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进行协商。向阿拉伯人保证，同他们进行协商，与我同情犹太人的愿望的态度决不矛盾。

我相信，公正地满足长期受迫害的犹太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解决方案，终究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巴勒斯坦地区的极端主义者的行动，我都加以谴责并感到遗憾，不论他们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但是我也感到，对于要求以人们所公认的民主方法来推进自己事业的犹太人给予一定的鼓励也是必要的。

我已决定，在波茨坦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是我要提出来同丘

吉尔进行討論的問題之一，因此在7月24日，我向丘吉尔提出了下列备忘录，要求他同我討論這個問題。

“在美国，人們对巴勒斯坦問題十分关心。1939年5月英国白皮书所强加在犹太人移民問題上的严厉限制，正繼續引起最关心巴勒斯坦和犹太人問題的美国人的激烈抗議。他們强烈地要求取消这些不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他們受到納粹的殘酷迫害，他們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而巴勒斯坦又是他們許多人要求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知道您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有着深切而同情的关怀，因此，我不揣冒昧向您表示希望，英国政府立刻撤銷白皮书中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所下的限制也許是可能的。

“虽然我認識到就巴勒斯坦問題获得一个肯定而滿意的解决方案是有困难的，同时我們也不能期望在这次會議中詳細討論这些困难，但是我怀疑，长期拖延下去是否能減輕这些困难。因此，我希望在您方便时及早把您对解决巴勒斯坦問題的意見通知我，以便我們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討論解决這個問題的具体条件。”

但是，在丘吉尔能够答复这个备忘录之前，克萊門特·艾德礼已继他出任英国首相。7月31日，我接到艾德礼的一个簡短的照会，他表示已看到我給丘吉尔的备忘录，并答应予以注意。

当我从波茨坦回来后举行第一次記者招待会时，一个記者問我，关于巴勒斯坦問題美国政府在柏林采取了什么立場。当然，在波茨坦會議上並沒有正式討論到巴勒斯坦問題，但是在私人交談中曾經談到过。我当时对記者們說明了我的立場如下：

“美国对巴勒斯坦問題的看法是要尽量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問題将来必須通过外交途徑同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一道求得解决，以便在和平的基础上，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我并不想派五十万美国軍隊到巴勒斯坦去强制維持和平。”

但是，国务院仍然认为我們應該置身于可能得罪阿拉伯人的任何活动之外，因此国务院近东事务司在 1945 年 9 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专门讨论进一步向巴勒斯坦移民问题。在 1939 年，英国曾发表一个白皮书，想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打开大门的愿望和阿拉伯人反对在巴勒斯坦再增加犹太人这两者之间找出一个折衷的办法。白皮书一方面答应发给犹太人一定限额的移民“许可证”，同时则又答应不再多发。

由于欧洲战事的结束，对“许可证”的要求突然增加。当时可以明显地看出，1945 年秋初，上述移民限额就要达到了。除非取得阿拉伯人的同意，否则就不可能作更多的移民。这个备忘录说，既然要获得阿拉伯人的正式同意是难以想像的事，英国将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或者坚持白皮书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停止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或者制定一个新的临时政策，让犹太人移民至少在目前继续进入巴勒斯坦，直到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①经过修订并提交联合国解决时为止。备忘录还说，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尽快允许一百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

备忘录继续说：

“任何政府都不应主张大规模移民的政策，除非它准备协助提供必要的保安部队、船舶、住宅及失业救济……鉴于上述情况，美国在目前时期不应支持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的政策。但是，可以支持这样的移民政策，限制移民的数目和范围，并考虑到人道主义、巴勒斯坦的经济福利和政治情况。英国政府作为委任统治国，应对这种政策负主要责任，并且负责执行。”

但是，在我研究了这些结论之后，觉得这样做法并不能解决基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勒斯坦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战后成了英国委任统治地。——译者

本的人数問題。在欧洲的数以千計的犹太人（当然他們只占被希特勒屠杀的几百万人中的极小一部分）的命运是最令人关心的。在几百万由于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中，他們比任何其他部分的人都遭受到更多更长期的痛苦，可是战争結束以来，他們的情况还几乎没有改善。

1945年6月間，我派遣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厄尔·哈里逊負責到欧洲去調查那些被称为“无处遣送”的流离失所的人的情况。8月下旬，他交来一份报告。这个报告說明，这些人仍旧住在集中营里，依然前途茫茫，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这个报告还指出，这些犹太人中只有极少数願意回到他們原来居住的国家去。

哈里逊写道：“如果对于这些劫后余生的人的遭遇抱有任何真正同情的話，那么，把1939年的英国白皮书的限制合理地放寬一些或者作某些修改，應該是沒有太大困难的。对于某些欧洲的犹太人來說，除了巴勒斯坦之外，就沒有解决他們前途的可以接受的或者甚至合适的办法了。这句话是完全站在人道主义立場說的，就巴勒斯坦來說，它不含有意識形态的或政治上的理由。

“我根据可靠的情报了解到，巴勒斯坦移民证明书到这个月（1945年8月）底就要发完了。以后怎么办呢？任何訪問过集中营或同那些絕望的幸存者談过話的人，想起巴勒斯坦的大門竟很快地要被关上，只有感叹而已。

“巴勒斯坦犹太人管理局已送交英国政府一件請願书，要求再发給十万张移民证明书。与請願书一起送去的一份备忘录，对于巴勒斯坦目前吸收移民的容量和目前实际上缺乏人力的情况，作了令人信服的說明。

“虽然在上述证明书（这种证明书在目前情况下也許被认为是合理的）的具体数目上可能有不同意見，但是，毫無疑問，請願书中提出的請求如果获得批准，将大大有助于合理解决目前尚在德国

和奧地利的猶太人和其他猶太難民的前途問題，因為他們既不願留在那裡，也不願回到原來已取得國籍的國家。

“因此，在德國、奧地利以及在其他地方的飽受集中營的恐怖迫害的猶太人看來，沒有別的事情比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更重要的了。”

哈里遜的報告是一份很動人的文件。不能允許其中所描寫的悲慘情況再繼續下去。我寫了一封信給艾森豪威爾將軍，要求他儘可能改善集中營的情況。我還在1945年8月31日就巴勒斯坦問題寫了一封長信給艾德禮：

“由於美國政府本能地關心那些在德國流離失所的人們（可以證明是無國籍或無處遣返的人）的目前景況和未來的命運，我們最近派遣了厄爾·哈里遜先生到歐洲去進行調查。

“哈里遜先生過去是美國移民歸化局局長，現任國際難民委員會的美國代表。正如您所知道的，聯合王國和美國對於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是積極而關心的。

“我們指示哈里遜先生對於那些流離失所的猶太難民的問題以及他們的需要進行特別調查。

“哈里遜先生不僅訪問了德境美國占領區，也在英國占領區呆了一些時間，在那裡他受到第二十一集團軍的殷勤招待。

“我已經接到了他的報告。鑑於我們在波茨坦的談話，我相信這個報告的某些部分會引起您的關心。因此，附上這個報告的副本一份。

“我希望您注意第八頁以下的結論和建議，特別是關於巴勒斯坦的部分。看來現有的巴勒斯坦移民證明書即將發完。有人建議，額外批准十萬張這種證明書，將大大有助於合理解決目前尚在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的前途問題，以及其他不願留在目前所在地或由於可以理解的理由不願意回到他們原來居住的国家去的猶

太难民的前途問題。

“根据我所得到的这些以及其他情报，我同意这样的信念：对于那些经历了十多年集中营的恐怖生活的人们来说，没有别的事情比解决将来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问题更为重要。不幸的是，希望移民到巴勒斯坦去或合乎移民到那里去的規定的人，已经沒有像納粹分子开始实行灭种政策之前那样多。正如我在波茨坦时对您說过的，总的說来，美国人民坚决相信，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大門不应关闭，根据欧洲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願望，应该允許合理数額的犹太人移民到那里去。

“我知道您同意这样的意見：欧洲的未来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我們設法合理地解决那些流离失所的和过去被迫害的人们所面临的問題。沒有别的事情比那些多年来惨遭迫害和奴役的人們的要求更值得支持的了。

“主要的解决办法似乎是迅速地把尽可能多的无处遣返的、希望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犹太人遣送到那里。如果这样做有效的話，这种措施就不应长期地拖延下去。”

当时貝尔納斯国务卿正要动身到伦敦去参加四外长會議，我就請他把这封信帶給艾德礼。

艾德礼首相在他的复信中爭辯道，实际上，发出的許多证明书，犹太人并没有利用。他还认为犹太人坚持完全撤銷白皮书，立刻允許再发十万张移民許可证，不管这样做对中东局势将发生什么影响。他在第二封信里更进一步否认在英国占領区內的难民集中营里存在任何歧視犹太人的現象，并建議說，如果馬上需要进行救济，在北非的菲利普維耳和費拉达的二个集中营可供利用。

艾德礼首相說，关于巴勒斯坦問題我的前任罗斯福总统、我自己以及丘吉尔先生都做过庄严的保证，即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要同阿拉伯人进行协商，他认为任何其他途徑都将使“整个中东燃起

战火”。不过，他向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在“問題尚未解决阶段”来处理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問題，但他极力主张在联合国負責处理这一局势之前，我們不作进一步的尝试。

哈里逊的报告在9月下旬发表，同时还公布了我写给艾森豪威尔的那封信，信中我要求他尽一切可能改善德境美国占领区内的难民的情况。

与此同时，英国人则执行他們的法律，并且严厉制止未經批准的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还穿着集中营制服的人們，由于沒有许可证，当试图在巴勒斯坦登陆时就被擋了回来。

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令人不能忍耐地促使我的当前目标很难实现。他們不仅要求較容易实现的移民工作，他們更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他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我的态度是，对于希特勒的种族迫害狂的牺牲者被剥夺建立新生活的机会这一点，美国不能袖手旁观。但是，我也不願意看到一个最后会引起冲突的政治结构强加在近东。我的基本方针是，巴勒斯坦的长远的命运問題是由我們联合国組織来解决的問題。不过，在最近，需要对欧洲的犹太人給予一些援助，帮助他們寻找能够合理生活下去的場所。

国务院对于阿拉伯人的反应繼續給予比对犹太人的痛苦更大的关心。10月初，貝尔納斯国务卿开始向我建議，我們應該公布罗斯福总统在临死前給伊本·沙特国王的信，因为他考慮到这样做可以向美国公众表明我們是不会贊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計劃的。事实上，他已为我准备了一个重申罗斯福所說过的声明，他要我把它同罗斯福4月5日的信一起由白宫发表。

我决定让美国人民了解我們希望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保持友誼是适当的，因此我授权貝尔納斯由国务院发表該信。但是，我看不出，我應該通过一个公开的声明，在一件我认为應該由联合国

解决的事件上表明态度的理由。

10月5日，我接到艾德礼的一封信，表明英国人正在进行重大的努力，以便提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首相告诉我，他和他的内閣对于帮助欧洲犹太人的方法和巴勒斯坦问题正予以深刻的关怀。他还指出，这两个问题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但是两者都充满着困难。接着，在10月19日，英国人送交国务院一个正式建议，主张英美两国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联合调查。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人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们希望避免立即作出任何决定的愿望。文件说，英国政府认为“促使犹太人同他们原来居住的那些国家的其他民族一起，在建立这些国家的生活中起积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英国人建议，一个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应该作为一桩紧急事件立即成立起来，在轮流担任的主席的领导之下，调查在欧洲的英、美占领区内的犹太人的境遇；估计该委员会确定不可能回到原来居住的国家去定居的那些犹太人的数目；调查用移民到欧洲以外国家去的办法来缓和欧洲的处境的可能性；并考虑应付当前形势的需要的其他有效方法。

英国的计划是，该委员会首先应该对欧洲的英、美占领区进行调查，以便使本身了解这个由战争造成的问题的性质和规模。这样做了以后，再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可能接受他们的国家方面去。然后，该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向两国政府提出临时性的建议，直到能够向联合国提交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问题只是委员会将要考虑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英国的照会接着说，委任统治的条件要求他们支援犹太人移民，并鼓励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但同时又要保证其余部分的居民的权利和地位不受歧视。照会说，这个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方的双重义务，就是造成过去二十六年来在巴勒斯坦所经历的困难的主要原因。照会补充说，英国人曾经尽一

切努力，設法作出某些布置，以便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并为了国家的幸福进行合作，但是所有这种努力都沒有收效。任何一方认为可以接受的安排一向遭到另一方面的拒絕，而被认为不可能接受。

英国的照会說：“我們必須正視一个事实，即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間是勢不兩立的。他們的宗教和語言不同；他們的文化和社會生活，他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正如他們的民族理想一样，都很难互相協調。最后举出的一些不同点是和平的最大障碍。双方都要求占有巴勒斯坦；一方的根据是曾經占領过巴勒斯坦一千年，另一方的根据是历史上的联系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所給予它的保证。^①……”

英国人建議，委员会在調查过程中，要实地調查政治、經濟和农业情况，因为这些情况是那时限制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理由。英国人希望分三个阶段来处理巴勒斯坦問題。第一，他們要同阿拉伯人进行协商，目的是要作出一个安排，保证暂时不阻碍犹太人移民按照当时每月的比率进行。其次，他們要同主要的有关方面寻求在获得永久性的解决办法以前，設法作出其他处理巴勒斯坦問題的临时性安排的可能性。第三，他們要向联合国提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最近，英国政府已經决定，唯一切合实际的途徑是維持目前的移民部署。他們說，他們耽心“在阿拉伯人的反对之下决定的任何过激的政策，将不仅为对英王政府提出的失去信用的指責提供根据，而且可能会在整个中东造成包括大規模軍事行动在內的严重的动乱，此外，还会在印度引起普遍的忧虑”。

我指示貝尔納斯准备一个答复，其中表明我們願意参加所建議的調查委员会，但是我們要求把力量集中在迅速获致效果上。此

^① 按指英国政府 1917 年的貝尔福宣言。——譯者

外，我建議，巴勒斯坦應作為調查的重點，而不仅仅是許多調查地區中的一個。我想表明，我將不放棄我在8月31日致艾德禮的信中所採取的立場。我不希望美國成為任何拖延策略的伙伴。

英國人對於我們的反應並不感到很高興。貝文寫信給貝爾納斯，堅持調查應該包括除巴勒斯坦之外的可能供歐洲猶太人居住的其他地區。但是，為了避免調查無休止地拖下去，我們堅持了我們的觀點。後來，當建議中的會議召開時，這個觀點占了優勢。

第十一章

巴勒斯坦的分裂

華盛頓和倫敦之間曾經交換函電，計劃由英美共同對歐洲的無家可歸的猶太人問題進行調查，很快就成為眾所周知的事了。10月31日，我接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代表給我的一封電報，其中一部分說：

“……我們從報上获悉英國和美國政府正考慮關於建立一個聯合委員會的建議，這個委員會將重新調查歐洲的猶太人的情況和他們進行移民的需要，並將不顧哈里遜提出的報告，重行決定他們之中有多少人願意到巴勒斯坦去，多少人能夠被安置在其他地方。……

“但是，需要的是政策，而不是進一步的調查。鑒於許多年來的痛苦經驗，我們敢冒昧地斷言，成立擬議中的委員會並不能使問題得到進一步的解決。恰恰相反，它將使局勢更加複雜化，造成無止境的拖延，並且引起嚴重的混亂。

“在過去的七年中，除了我們自己的戰時難民委員會（成立於1944年，已解散）之外，還有過三個主要的國際會議和委員會力圖解決猶太難民問題和猶太人移民問題。這三個組織包括：羅斯福總統於1937年在埃維昂召開的國際難民會議，作為這次會議的結果而產生的國際難民委員會，以及1943年召開的百慕大難民會議。所有這些努力都遭到了悲慘的失敗，這種失敗是由於一個重要的武斷主張造成的：英國政府根據它在1939年白皮書所列的條文非法地禁止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的大門，現在，巴勒斯坦的大

門必須繼續關閉。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移民到其他国家去的可能性上，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願意接受大批犹太难民。如果过去巴勒斯坦的大門一直是敞开的，那么千千万万已經死去的犹太人可能今天还活着。

“我們請求您不要在人們繼續付出生命和遭受痛苦的代价下，进一步贊助成立委员会和进行調查，这样做只能证实早已众所周知的事实罢了。

“現在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另一个跑来跑去的远征队，也不是浪費時間的調查，而是立即采取符合早已确立的、并經有效的国际协定明确了的政策的具体措施……因此，我們謹提出迫切的要求，

“（一）正如总统先生所要求的，立即允許十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这是一个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能够、而且應該得到滿足，而不致影响‘基本局勢’……

“（二）英国政府立即撤回或废除 1939 年的白皮书。这个白皮书的公布是英国政府破坏委任統治制度的片面行动，它是违反国际联盟常設委任統治委员会明文規定的要求，而且也沒有得到美国的贊同。废除这个白皮书是英国政府應該单独承担的责任。

“（三）由英国和美国政府发表一項联合声明，表明它們願意支持和謀求一种符合于貝尔福宣言和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制的本来目的和基本意图的巴勒斯坦政策。

“（四）在上述联合声明发表之后，最有效的办法是組織一个联合委员会，按照各自所关心的問題和责任，謀求实行已宣布的政策的方式和方法。我們还希望，美国能够在不仅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有利于使犹太人可能向該地区移民的經濟計劃方面，而且在有利于整个中东各民族の經濟計劃方面实行合作，因为中东民族的国家飽尝貧穷和不发达的痛苦。

“最后，我們願意进一步強調，繼續拖延和迴避这个重要的、无

法逃避的問題的危險性。這個問題就是履行对犹太人民所作的国际諾言，它根据犹太人民与巴勒斯坦在历史上的联系，帮助他們在那里定居和重建他們的國家。很明显，委員會不可能代替已經明确地表明了了的行动。

“我們再次向我們的政府呼吁，利用它的全部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影响，使正义和人道获得胜利。

“我們謹向您，总统先生，表示我們最崇高的敬意。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紧急委員會主席
斯提文·瓦伊斯、阿巴·西耳弗”

我們的一个主要困难問題是，巴勒斯坦并不是一个可以由我們自由处理的地方。国际联盟采取了行动将巴勒斯坦合法地委托給英国管理。我們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員，而事实上英国人又占有了巴勒斯坦。

我认为，对于寻求解除难民的痛苦的办法，这个更加迫切的問題來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个阶段強調关于建立一个犹太人國家的目的是次要的。

由于外交家在商討拟議中的調查委員會的范围和目的时，碰到許多困难，這個問題直到11月中旬艾德礼到华盛顿来时才再次提出来。同艾德礼会談的結果，使我們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达成了諒解。英国人了解到我不願意改变原来的立場，便同意了国务院为英美联合委員會計劃好的調查范围。我在11月13日宣布了这一協議，同时发表了我在8月31日給艾德礼的信，其中要求他同意十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12月10日，我宣布了这个联合委員會的美国成員，他們是由下列一些人組成的：法官約瑟夫·赫契森，他是来自得克薩斯州的一位深受人們尊敬的联邦法院法官，他被任命为美国方面的主席；前斯瓦斯摩尔学院院长弗兰克·埃德洛特博士（現任普林斯頓高

級科学研究所主任)；《波士頓先驅報》主筆弗兰克·巴克斯頓；我們的外交界前輩威廉·菲利普斯；曾任国际联盟难民高級專員的詹姆斯·麦克唐納；前北卡罗来納州州长馬克斯·加德納。由于加德納未能接受这一任命，我指定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檢察官巴特萊·克魯姆担任他这个职位。这个委員會开始工作，于1946年1月4日在華盛頓举行公开訊問，然后到欧洲和中近东进行实地調查。这个委員會在1946年4月22日由美国方面的主席赫契森法官向我提出了一个报告。委員會一致建議發給十万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证明书，同时尽快地推进实际移民工作。

至于巴勒斯坦本身，委員會极力主张把它变成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不加以統治的地区。他們建議採納下列三个原則：

“（一）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將不統治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也不統治犹太人。

“（二）巴勒斯坦將不是一个犹太国家，也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三）最后建立的政府形式将在国际保证之下，充分保护和保存圣地的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利益。”

然而，委員會的結論說，目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非常紧张，以致任何建立国家的企图都会引起內战。根据这一理由，他們建議委任統治应予繼續，并且最后应与联合国成立一項托管協議，這項協議的条款应以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接近为目的。

委員會还有这样的建議：应使犹太人得以充分移民，那些保护阿拉伯人而沒有同样保护犹太人的土地法应予废除或修改。

委員會的报告是謹慎而全面的。赫契森法官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件极其善良的工作。我觉得委員會的方向是正确的。4月30日我发表了一个声明，表明我同意他們的建議的內容。但是，現在还需要說服英国人按照这个报告采取行动。我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并在同迪安·艾奇逊及其他顾问（貝尔納斯当时在巴黎）商議之后，写給艾德礼一封信：

“总统致艾德礼首相閣下：

“我一直在考虑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应该采取的下一个步驟。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建議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举行协商，因为我們两国政府都对他們負有义务。我认为英美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这种协商的基础，我打算采取下列程序，我欢迎您对这些程序提出意見：

“在最近的将来，由美国政府促使下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組織以及与美国政府保持关系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注意这个报告，并且要求他們在一定期間內，如在二星期之內，提出对报告的意見。美国政府在接到这些意見之后将同英国政府进行商量，然后决定对整个报告的态度，并发表一項公开声明，說明两国政府准备在什么程度上接受这个报告作为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础。

“我想英国政府是願意采取一致行动的，我很高兴知道这一假定是否正确。鉴于圍繞着委员会所建議的允許十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一問題的紧迫情况，我誠悬地希望能够尽快地提出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进行协商的創議，并达成这一協議。

“上面提到的有关組織和团体是：美国犹太人复国主义者紧急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會議，美国犹太教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會，阿拉伯美国事务研究所，美国犹太建国协会，美国新复国主义者組織，犹太人管理局，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高級委员会，伊拉克、叙利亞、黎巴嫩、埃及、外約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門的政府。

“1946年5月8日”

艾德礼立刻回了信，要求允許他有時間与外交大臣貝文商討，因为和貝尔納斯一样，当时貝文正在巴黎；三天以后，我接到艾德

礼的一封比較长的信。英国人希望在宣布任何政策之前，尽可能地把能够預見到的困难全部加以解决。艾德礼在1945年^①5月10日給我的第二封信里說，英国同意尽快創議和犹太人及阿拉伯人进行协商。但是他指出，英国那时正在同埃及进行重要而复杂的談判，因此建議延期到5月20日或以后举行。艾德礼还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只有二星期时间来准备开会是太短了，最好是一个月。他又說，应该作出某些規定以便研究有关涉及財政和軍事义务的最終情况。

与此同时，我們听到了阿拉伯各国的意見。阿拉伯各国驻华盛頓的外交使团拜訪了代理国务卿艾奇遜，对委员会的建議提出了抗議。

我能体会到艾德礼的困难，但是我不願意承认有再拖延下去的必要。因此，我同意了他的意見，把給阿拉伯人的通知延迟到5月20日发出，我希望到那时能看到整个問題的迅速进展。5月16日，我同迪安·艾奇遜举行了一次关于巴勒斯坦問題的长时间的会談，会后，我向艾德礼发出如下信件：

“我已仔細地考虑过了您关于巴勒斯坦問題的兩封来信。当我注意到您和您的同僚們在关于我們两国政府的紧密合作方面和我們的心情相同时，我感到很高兴。我們正在为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协商进行安排，以便給他們的通知能够在5月20日发出。我希望您同意这一点，并希望貴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我仍然非常迫切地希望协商會議能尽早完成，但是，鉴于您认为两个星期的時間太短促，我同意把期限延长到一个月。我們正在起草一件說明性备忘录，准备在要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于委员会的报告提出意見时交給他們代表，同时我們將先把这件备忘录的副本送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1946年。——譯者

給貴國政府。我們相信英國政府也會讓我們得到一份它決定採用的任何說明性備忘錄的副本。

“至於我們兩國政府的專家就報告所引起的某些事項進行研究的問題，我們正在着手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官員組成的適當的小組。但是，正如國務院已經通知英國大使館那樣，我們並不認為，兩國政府的專家在要求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表示意見之前舉行這種討論是適當的。我們相信，同他們的協商能夠澄清有關問題和縮小專家們舉行討論的範圍。但同時，我們相信至少在向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提出請他們表示意見的要求之後，就可以立即召開專家預備會議。在這一方面，如果我們能儘早取得貴國政府認為應該作為這種討論的基礎的某些啟示和任何更詳細的建議，將具有很大裨益。

“我們已注意到您提出的關於最後舉行一個包括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代表的會議的建議。我們相信，這是我們兩國政府在同有關方面進行協商時應該記住的事情，如果同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協商的結果預示舉行一次會議是有幫助的話，至少在適當的時候召開這種會議是可能的。目前，我覺得關於這個問題，無法給您更肯定的答复。”

對那些用個人名義打電報給我，表示支持他們的公使的各阿拉伯國家首腦，我分別發出類似下述致伊拉克國王的私人電報：

“伊拉克王國攝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親王閣下：

“我很榮幸地通知您，我已接到您 1946 年 5 月 9 日給我的電報，並且注意到其中提出的貴國政府對於英美聯合委員會報告的意見。

“您會回憶起，美國政府曾在許多場合下通知阿拉伯各國政府：美國政府認為如果事先不與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領袖進行協商，不應改變巴勒斯坦的基本局勢。

“因此，您完全可以放心，在未与伊拉克政府协商之前，我們决不会就联合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决定。

“我願意趁此机会謹向閣下致意并祝貴国人民幸福。

“哈里·杜魯門

“1946年5月17日”

英国官方对于英美联合委员会报告的反映并不令人高兴。这个报告一經发表，艾德礼就告訴下院說，英国政府在根据报告采取行动之前，将要求美国政府分担他认为将会产生的額外的軍事和財政責任。他又說，在非法的犹太人武装部队被取締之前，大規模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行动不会恢复。

接着有几个星期，英国报纸唱出了一种显然很不友好的調子。許多报纸說出或暗示，外交大臣貝文后来在6月12日的演說中所說的話，即我們所以对帮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感到兴趣，是由于我們不願意让犹太人住在美国。

我認識到要使英国人采取行动是困难的；而美国的輿論却叫嚷得采取一些措施。可是美国既不打算也不准备承担可能需要我們使用軍事力量的风险和义务。不过，我还是想获得对所涉及到的軍事因素的充分估計，因此請艾奇遜去征求參謀长联席會議的意見。

參謀长联席會議力主在执行委员会的計劃时，美国武装部队不要卷进去。他們建議，貫徹这个报告的指导原則應該是：不应采取足以在巴勒斯坦引起英国軍隊无法控制的反抗的行动。參謀长联席會議也注意到，如果产生使用任何美国部队的問題的話，也只能从我們正在进行的任务中抽調出极有限的部队。这种部队的人数也許有助于安定巴勒斯坦的局势，但是他們认为，随美国武装部队在中东重新出現而产生的政治上的震动，会不必要地在整个中东地区引起严重騷乱的危险，而这种騷乱将远远超过任何巴勒斯

坦本地的困难。

參謀长联席會議也认为以武力实现报告中的决定，会損害英国和美国在中东許多地方的利益。他們认为，这种情况如果发生，苏联就有可能取代美国和英国在整个中东的影响和势力。对这一点他們补充說，控制中东的石油是值得多加考虑的問題，因此，他們作出結論：不應該采取促使美国使用武装部队或使中东人民脫离西方大国的行动，因为那里对于我們的安全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这个报告記錄了我們軍事領袖的見解。他們主要关心的是中东的石油，并从长远的利益来考虑，西方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会激起阿拉伯人的反抗，因而有危险会使阿拉伯人同俄国人行动一致。特别是后一种論点，它是我在任何时候都沒有忽略的。对土耳其所施加的压力和伊朗所发生的事件都极其清楚地指明，俄国人欢迎阿拉伯人进入他們的陣营。

5月27日，英国首相提出一份他认为两国政府专家举行联合會議时應該加以討論的問題的項目。英国人根据委员会的十項建議提出了不下四十三个“問題”，这些問題都是他們认为必須交专家們进行討論的。我的反应是，这个程序只会拖延我們所期待的給予十万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救济。因此，我答复道，这些犹太人的問題應該毫不迟延地加以討論，甚至应当在专家們准备討論英国人提出的其他問題以前討論這個問題。我提出美国可以对这些移民的运输和临时住处給予帮助，我重复說明，我最关心的就是允許这十万人进入他們希望在那里建立家园的地方，以便解除他們的痛苦。

但是，首相对我的建議的答复却是否定的。英国人不願意只討論十万名移民問題而不談巴勒斯坦問題的各个方面。我在給艾德礼的回答中告訴他，我能够了解他的观点，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立刻允許十万名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這一問題上作出全面

安排，使得在專家們一旦就更廣泛的問題達成協議後，不致再有更多的拖延。隨後艾德禮在6月14日來電說，他已經任命了一個代表團同我們的代表團對委員會的建議進行討論。

與此同時，我已經指示國務卿、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連同他們的代表組成巴勒斯坦問題內閣委員會，以便同英國人進行協商。亨利·格雷迪被任命為首席代表，他在希臘舉行大選時曾經率領美國觀察團到希臘去，現在已經回到美國。

代表們對英國人提出討論的問題的全部論點作了仔細的研究。6月下旬，艾德禮來信說，他已經準備好開始共同討論。

如果恐怖主義者沒有在巴勒斯坦採取愈來愈多的行動，我力圖說服英國人放鬆巴勒斯坦移民限制的努力也許能為更多的人們所接受。可是，當時在巴勒斯坦存在着極端分子的武裝集團，他們犯下了無數暴行。6月16日，靠近外約旦邊境的八座橋梁被炸毀了，同時在海法發生了兩起爆炸。次日，猶太人和英國軍隊在海法發生激戰。爆炸後所引起的大火使那裡的鐵路停車場遭到很大的破壞。英國官員被綁走了。其餘的英國人受到來自疾馳而過的汽車上的槍擊。爆炸愈來愈多，英國人破獲了一個極端分子集團企圖綁架英國駐巴勒斯坦總司令的陰謀案件。

因此，英國政府決定採取斷然行動，艾德禮在6月28日給我的私人信中把計劃事先通知了我。他說，英國高級專員已經受權採取他認為驅散非法組織所必需的步驟，包括逮捕那些證據確鑿、應對目前暴動負責的人。他寫道，他很遺憾，在我們討論英美聯合委員會的報告時，這種行動竟成為必要，但英國政府被迫得出結論：他們“為履行委任統治政府的職責，不能再容忍這種公開的反抗，在關於巴勒斯坦前途問題的討論正在進行的時候，法律和秩序必須加以維護。”

1946年7月2日，我答复艾德禮說：

“对您6月28日的来信兹致复如下：在我们正讨论英美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时，委任统治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断然行动，我和您一样感到遗憾。我也同样希望，在为了获致一项长远的政策而努力的时候，巴勒斯坦居民能遵守法律和秩序。”

由于巴勒斯坦的暴动，英国人迫切希望尽早地举行联合委员会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我满足了艾德礼的要求，于7月10日，即比原定日期早一星期，用总统专机将格雷迪和他率领的小组送到伦敦。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中，联合内阁委员会在伦敦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由于艾德礼和我都知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有关问题是多么敏感，于是双方同意在协定公布之前严守秘密。可是，消息显然越来越多地透露出去，7月25日，美国报纸竟刊登了委员会的建议的相当详尽的内容。

实质上，委员会所提出的计划，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种类似联邦的制度，其中包括两个自治国，但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大约一千五百平方英里土地（总共为四万五千平方英里）将属于一个犹太国家。中央政府将控制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巴勒斯坦的最南部分纳格夫。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则将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个计划规定，中央政府保有极其广泛的权力，因而有待建立的两个自治国除了纯粹地方性的事务之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控制权。移民问题也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务之一。

各省政府将包括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但议长由英国人任命，不经这些负责的官员的同意，任何提案不能成为法律。执行机关采取行政委员会的形式，人选也由英国人任命。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不欢迎这个计划。没有人对它表示满意。阿拉伯人甚至反对报告中的一项建议，该建议说，为了帮助完

成过渡阶段，美国应直接提供五千万美元来援助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局势并没有好转。就在几天之前，犹太恐怖分子炸毁了耶路撒冷大卫王旅馆，造成许多人死亡。对于犹太人需要建立家园的问题和近东越来越严重的动荡局面，都必须找出解决办法。我仔细研究了在伦敦提出的计划。但是，除了更严重的动荡之外，我看不到这个计划能够产生什么效果。计划规定允许十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的条件是必须得到阿拉伯人的同意，因此在这方面也没有提供缓和局势的办法。这个计划也不是我所希望产生的那种计划。它似乎比今年早些时候英美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完善建议后退了一步。因此，我感到必须通知艾德礼，美国政府无法同意英国的步调。

我在8月12日的信中说：“在进一步研究了英美代表的建议，并同我的内阁成员及其他顾问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能正式支持目前形式的英美联合计划。

“美国国内对这一计划的反对非常剧烈，以致现在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要想动员足够的舆论力量来拥护这一计划，从而使美国政府给予有效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鉴于巴勒斯坦的紧急局势和欧洲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的绝望处境，我认为应该继续寻求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办法。因此，我已指示我国驻伦敦大使同您或英国政府的适当成员讨论已向我們同时也向您提出的某些建议。

“如果把即将举行的会议扩大，使能充分考虑这些建议，我诚恳地希望，这个会议能使贵国政府作出决定，采取这样一个方针，即使我们能获得国内和国会的必要支持，从而能够在经济上和道义上给予有效的支持。”

艾德礼接到了我的信，在8月18日给了我一个比较详细的答

复。他說，我們不支持专家代表团所提出的計劃，使他大为失望。他希望即将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举行的會議“能获致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即使不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所完全接受，但是实行起来不致使巴勒斯坦或整个中东的和平遭到严重威胁”。

但是，到了 1946 年秋天，正如我在給一个朋友的信中所說的，局势看来已“无法解决”。我在这封信里写道：“不但英国人已竭尽能事地把局势弄到无以复加的混乱地步，而且犹太人自己也使得別人无法插手帮助他們。”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官方喉舌——犹太通訊社——刚刚宣布过，他們甚至連和英国人坐下来討論他們的建議都不願意。与此同时，犹太极端分子在巴勒斯坦繼續进行恐怖活动。在美国的高級犹太人領袖則对我施加各种压力，要我代表犹太人的願望在巴勒斯坦使用美国的势力和軍隊。

我了解英国政府的处境。他們在整个帝国内部受到巨大的压力，他們无法获得金錢和軍隊来履行他們的义务，但是又焦急地希望尽可能少損害他們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他們花了許多年的功夫和千百万英鎊在阿拉伯世界培养友誼，为的是維持帝国的生命綫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的石油資源。不难理解，他們是最不願意触怒阿拉伯人的。

阿拉伯人也和犹太人一样絲毫不肯让步。他們表面上是参加了 1947 年 1 月下旬英国人召开的圓桌會議，但是他們决不从他們的立場上退让一步，他們坚持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国家，而且應該永远是阿拉伯人的世界。因此，談判在 1947 年 2 月 4 日宣告破裂，于是英国人决定把整个問題提交联合国。这一决定 2 月 14 日在伦敦发表。当然，这样做引起了各方的抨击，特别是針对外交大臣貝文处理局势方式的抨击。他在一次工党干部會議上說，过失在于美国的复国主义者，后来又在下院宣称，如果不是我坚持要让

十萬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園的意見，破壞了他的計劃的話，一切都會很順利。毫無疑問，他這種說法是無補實際的。

當然，他是指我在1946年10月4日發表的聲明而言，那一天恰巧是猶太人的贖罪節。總統常常在這個節日發表聲明，因而選擇這一天絲毫不足奇怪，我所說的也只不过是重複申述了我的立場，就是說，我希望允許十萬名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過了幾天，杜威州長說，應該允許幾十萬人進入巴勒斯坦，那時貝文就對英國下院說，我發表這一聲明是為了要搶在杜威的前面，換句話說，我只是為了政治上的原因才採取這種態度的。

這是作為英國政府的外交大臣對美國總統所作的非常不合外交禮節的（幾乎是不友好的）聲明。因為他知道我的態度一直是這樣。

當然，美國總統不能把他的時間花在回答人身攻擊和諷刺上。如果他這樣做，他就完全不能做其他事情了。因此，雖然貝文先生的指責使我感到氣憤，但我只是叫查爾斯·羅斯從白宮發表一項十分溫和而非個人的聲明，指出從1945年8月我第一次寫信給艾德禮以來，讓十萬名猶太人遷入巴勒斯坦一直是我們對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础。

1947年4月2日，聯合國接到英國要求聯合國大會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正式請求。英國人同時建議立即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以便組成一個聯合國特別委員會來進行初步研究。貝文先生在2月18日曾向下院說，“衝突既然存在了兩千年，拖延十二個月不能算是長期的拖延”。這一聲明的冷酷無情及其對於人類痛苦的漠不關心，在英國本國就激起了反對，人們提出了迅速採取行動的強烈要求。

5月14日，聯合國大會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定名為聯合國

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这个委员会在沒有所謂各大国参加的情况下，同意結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并且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最后使巴勒斯坦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因此，委员会的大多数建議，巴勒斯坦的独立应采取两个独立国家的形式，一个是犹太人的国家，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国家。但在經濟上結成联盟。耶路撒冷市則应置于联合国的直接托管之下。

犹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欢迎这个建議。他們有些人希望整个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犹太国家，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划分为两个国家的計劃是在他們渴望已久的“祖国”建立犹太国家的梦想得以实现的机会。

阿拉伯人的反应是十分明显的：他們不喜欢这个計劃。他們明白表示，除非胜过他們的强烈反抗，这个划分計劃就不可能实现。阿拉伯領袖們的公开声明是充滿敌意和挑畔情緒的。10月9日，我获知阿拉伯联盟理事会已指示其成員国陈兵巴勒斯坦边境，准备以后使用。

我指示国务院支持这个划分計劃。

第十二章

以色列的誕生

我认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分治方案是可以为这两个民族开辟和平合作的道路的。尽管在目前的环境下很难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搞在一起，但我可以預見根据联合国所提出的方案，使分治地区在經濟上合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終归可能像邻居一样生活下去的。

好多年来，我一直对这个伟大地区的历史感到兴趣。我知道这个地区曾經一度是世界大国的中心，它哺养过千千万万的人民。正像尼罗河流域的拉美西斯二世王国一样，尼布甲尼撒帝国和大流士帝国都曾經充分利用过这个地区肥沃的土地和富饒的資源。但是，在这些伟大的帝国消逝以后，这个地区便四分五裂，內战頻仍，以至普遍走向沒落。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外，阿拉伯人从来没有把这个地区恢复到过去那种威震四方的地位，尽管它仍然拥有某些潜力。我觉得可以制訂一个发展計劃，使犹太人能够建立一个巨大的工业体系，使这个地区的生产潜力得以發揮，那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会得到好处。整个地区都有待开发，如果能像我們开发田納西流域那样来开发这个地区，那么它就能供养两千万到三千多万人。为这样一种前途开辟道路，实在是一件具有建設意义和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业，而且还可以履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作的諾言。

这就是我对这个地区的前途的一些想法，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治的建議使我感到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最为切实可行的道

路。我总是希望能够在不流血的方式下找到解决办法。毫无疑问，要是为了拯救几十万人的生命而去杀害几十万人的生命，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值得一提的。

我当时和后来的目的是为了促使贝尔福宣言所提供的保证能够实现，同时也为了至少拯救一些纳粹主义下的受害者。我并没有承当巴勒斯坦处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就能成为国家，或者按照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来完成它的任务。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和平方式来建立一个为大家所应许的犹太人的祖国，来为欧洲的流离失所的犹太人铺平一条建立自己祖国的平坦通路。

但是，很多犹太人却希望我们的巴勒斯坦政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争取建立一个以色列国的纲领是一样的。当他们看到并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指责我们已经站到亲阿拉伯的立场上去。当然，阿拉伯人看待我们则是更加带有成见和敌意的。

事实很简单：我们的政策是美国的政策，而不是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的政策。其所以是美国的政策，是因为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采取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世界纠纷中心的问题。其所以是美国的政策，是因为这个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愿望：实践诺言，解除人类的痛苦。

但是这个问题纠缠着政治问题，不但牵连到我们，也牵连到国外。犹太人赞成分治，但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赞成分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但是反对到怎样一种程度，却又得不出一致的意見。而英国人呢，看来至少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决心袖手旁观。

这件事的前景实在令人灰心。我给我的一个幕僚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的确希望全能的上帝赐给以色列儿女一个以赛亚^①，赐给基督徒一个圣保罗^②，赐给以实玛利^③的子孙有听到‘登

① 《圣经》上的先知之一，见《旧约全书》以赛亚书。——译者

② 即扫罗，耶稣的得力使徒，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译者

山宝訓^③’的机会。”

但是这个问题已經交给联合国来处理，而我确信联合国是要大家来促使它行动的，我相信在联合国这个问题一定能有办法解决。

这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对一切向我呼吁的人所作的回答。联合国大会正在辯論这个问题，而大会的決議将反映世界各国的意志。11月19日，当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組織的德高望重的領袖查姆·魏茲曼博士来拜訪我的时候，我便是本着这种想法和他談的，几天以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中揭露了当时的一些問題。

“亲爱的总統先生：

“11月19日（星期三）您接見我时的那种誠摯态度，增加了我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向您写信的勇气；在这个紧急的时刻，我是非常不安和痛苦的。根据可靠的消息，目前正流行着两个无稽的謠言，而对我們來說，这种謠言是很不公平的，也可以說是很有害的。

“在华盛顿，人們紛紛謠传说，我們的人民曾經不适当地和过份地向某些代表团施加压力，因此他們是做得‘过火’了一些。我不能够替那些非权威人士說話，但是，亲爱的总統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就我們的代表們來說，这种指責是沒有根据的。我們的代表同各代表团的接触的次數非常有限，他們曾經力求把情况据实向各代表团陈述。他們从来沒有超出法理的范围，他們一向是采取溫和的說服方式。有些代表团，如希腊代表团和利比里亚代表团，我們在这次大会中只同它們会談过一次。

③ 阿拉伯人的祖先。——譯者

④ 指耶穌的教訓：“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節。——譯者

“还有人害怕我們在巴勒斯坦的計劃会在某种方式下被人利用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侵入中东的通道。再沒有比这更加背离事实的話了。我們来自东欧的移民正是那些从共产主义国家出走的人，他們不願意被共产主义所同化。如果不是这样，他們根本就不会出走。要說苏联人极力想通过我們的移民来散播共产主义的影响，那他們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容易地就可以这样做。巴勒斯坦的每次选举和其他一切事物都证明共产主义對我們那个社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受过教育的农民和掌握技术的产业工人階級，生活水平很高，是决不会接受共产主义的。只有在那些尽是文盲和貧穷的社会，才存在着这种危險，而这样的社会同我們的社会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1947年11月27日于紐約”

不幸的是，魏茲曼博士的話只是對他的那些比較接近的同僚來說才是正确的。事实是，不但联合国不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就連白宮也經常受到攻击。我觉得我从来沒有受到像这次这么厉害的針對白宮的压力和宣传。少数极端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領袖的糾纏不休使我感到不安，感到惱火；这些人激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采取了政治威胁的手段。他們有些人甚至建議我們向一些独立自主国家施加压力，使它們在联合国大会中投贊成票。对人也好，对国家也好，我从来不贊成那种以强者的意志强加于弱者身上的办法。我們曾經援助过希腊。我們实际上曾經締造过菲律宾的独立。但是我們这样做并沒把它們变成附庸国，也沒有强迫它們同我們一道投票贊成巴勒斯坦分治的計劃，我們沒有强迫它們做任何其他事情。凡配得上称为美国政策的政策，决不会把任何其他国家看做附庸国。民主人民的生活方式的要点是他們尊重旁人的意見，不管这些人是强是弱，是富是穷。一些向我写信的人

士所采取的那种“直接打交道”^①的办法是决得不到我的认可的。

联合国大会在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的分治计划，尽管它并没有把这种分治计划付诸实施。大会只是赞成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的建议，并要求安全理事会负责执行这些建议。接着便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个以和平方式实现分治的问题。但是联合国大会并没有为执行这些建议规定一个日期或制订一个程序。

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许多报纸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蓝图，而实际上大会仅接受了关于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至于采取怎样的方式把这个原则变为实际行动，那还有待研究。而我一贯希望的则是采取和平方式。

然而，不用流血而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希望是很渺茫的。英国人一直在说他们愿意“接受”联合国的决议，但唯有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同意之后才能执行这个决议；而现在，12月3日，他们却宣布他们认为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要到1948年5月15日才告结束。同一天，阿拉伯人向全世界发表声明，他们要保卫自己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都可以听到在这一圣地发生新的暴乱事件的消息。1948年1月15日，犹太人管理局向联合国提出建议，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来实现分治计划。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警察部队，而要建立这样的部队，就必须在当时各国已达成的协议以外再达成一个协议。但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还是同意应当有这样一支警察部队，联合国秘书长特赖佛·赖伊当时便请各有关方面就着手建立一支警察部队进行了多次的讨论。

^① 意指直接向美国总统提出要求 and 施加压力，这样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译者

犹太人在看到获得国际强制执行的希望不大的时候，便宣布他们打算建立犹太人的民兵组织。而英国人则说只要巴勒斯坦还在英国统治之下，他们便不会允许这样做。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则在制订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全民性的行政机构的计划，而邻近巴勒斯坦的各阿拉伯国家的武装部队则越来越公开地开始进入这个地区。2月13日，我们在该地区的外交使团向我报告说，阿拉伯人可能会在3月下旬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我于是向阿拉伯领袖们发出呼吁，希望他们维护和平，克制自己的行动。而他们竟断然拒绝，还指责美国不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事业，以至助长了近东的骚乱。这是1948年2月17日的事。当时国务院提出一项建议，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充分发挥其排难解纷的力量，我批准了这项建议。在巴勒斯坦，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已越来越严重，而且冲突双方都不肯让步。我们希望和平解决，同时也满怀希望地争取做到这一点。

在联合国就分治问题投票以后，犹太人对白宫所施加的压力并没有减轻。有些是以个人名义，有些是以团体名义，都向我提出要求，而且往往是用一种吵嘴的方式，言词激动，要我制止阿拉伯人的行动，阻止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要我派遣美国军队，要我做这做那。我认为我可以说，我是坚信我的政策的正确性的，不为某些犹太人所动摇。我所说的“某些犹太人”，当然是指那些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知道，大多数信奉犹太教的美国人，尽管他们希望恢复犹太祖国，他们认为、而且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个美国人。

当压力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感到有必要发出指示，说明我不想再接受任何为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说话的人。我当时感到很伤脑筋，甚至连魏兹曼博士也拒绝接见——他在回到美国以后曾经请求见我。我的老友埃迪·雅各布逊来白宫看我，劝我接见

魏茲曼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里，埃迪是同我在一起的，他从来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在华盛顿的整个期间，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向我要求过什么东西。他信仰犹太教，他对外国的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深表同情。在我担任总统以前和以后，他曾经偶尔向我谈起他所知道的有关这方面情况的一些具体事例，但并不是经常谈到。3月13日，他来白宫看我。

我一直是高兴见他的。我们不光是在过去有着很长一段共同的生活，而且我一直对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很难找到比他更忠实的朋友。埃迪说他想要同我谈谈巴勒斯坦问题。我对他说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在联合国里得到解决。

在我和埃迪的整整三十年的友谊中，我相信我们中间谁也没有说过什么重话，遗憾的是他这次竟然提起了这个问题。

埃迪自己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是谈了下去。他提醒我，从前来见我的某些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士，都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并不代表任何负责的领导者说话。

我告诉他，我很尊重魏茲曼博士，但如果我接见了，那只会引起更多的误解。

埃迪挥手指着摆在我办公室里的安德鲁·杰克逊小塑像说：

“他是您一生所崇拜的英雄，是不是？所有关于安德鲁·杰克逊的书也许您都读过了。我记得当我们两个人在开铺子的时候，您老是喜欢阅读书本和小册子，其中就有不少是关于杰克逊的。您在堪萨斯城修建杰克逊县法院的时候，就曾在法院前面立了他的塑像。”

我不知道他要扯到什么地方去，但他还是说下去。

“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我终生崇拜的英雄。但我曾经研究过他的历史，正如您研究过杰克逊的历史一样。他是当前最伟大的一个犹太人，也许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犹太人。你自己也对

我說過他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是一位正人君子。我說的是魏茲曼博士。他年歲已經很大，而且多病。他跑了好幾千哩路來看您，而現在您竟不肯見他，這不像您平日的為人。”

埃迪走后，我便吩咐儘快安排一個時間，讓魏茲曼博士到白宮來。但是他的這次拜訪完全是不公開的。根據我的特別指示，魏茲曼博士可以從東門進入白宮。報刊上用不着報道關於他的這次訪問，也用不着宣布這件事。

魏茲曼在3月18日來到白宮，我們幾乎談了四十五分鐘。他談到巴勒斯坦局勢發展的可能性，談到他和他的助手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工作，而這種科學研究成果總有一天會被應用到他所規劃的猶太國的工業活動中去。他還談到為了安頓今後的移民，就必須有土地，他還使我体会到在南部納格夫地區建立任何未來的猶太國家的重要性。

魏茲曼博士是一個有卓越貢獻和偉大人格的人物。他的一生為兩個理想而奮鬥，一是科學，一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他已經年逾七十，健康情況很不好。他經歷了許多挫折，但他從中學到了耐性和智慧。

我儘可能坦率地告訴他，我先前為什麼拒絕見他。他很了解這一點。我向他解釋說，我對猶太問題的基本看法和最關心的是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做到公平合理。當他離開我的辦公室的時分，我感覺他已經對我的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而我知道這正是他所希望的。

關於這一點，在第二天證實果然就是這樣。在這一天，我們駐聯合國的代辦奧斯汀大使在安全理事會宣布，美國政府希望巴勒斯坦暫時成為托管地區。有些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發言人便斥責我們這是背棄美國的政策。但是魏茲曼博士却同其他少數幾個著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一樣，並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來譴責美國的政策。

我确信他了解美国政策的真正方针是什么。第二天上午，罗森曼法官为另一件事情来看我，临走的时候我要他去看看魏兹曼博士，告诉他我同他所谈到的关于美国的长远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一直察觉到并不是所有我的顾问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都和我一样。这当然不是什么反常的现象。就军事顾问来说，他们的职责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而且总是要从军事的角度出发。而外交人员的看法则是——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决定于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关系。财政部长则是根据预算和税收情况来考虑问题。除了总统身旁的一些职员以外，总统的每一个顾问都有而且应当有他自己业务部门的一套看法。

根据巴勒斯坦的局势，军事人员一直在谈论的有两件事：一旦巴勒斯坦发生纠纷，我们不可能派遣军队到那里去；另一件是关于中东的石油资源。福莱斯特尔部长曾经一再同我谈到关于敌视我们的阿拉伯人可能会不让我们取得他们国家的石油宝藏的危险。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好几次提出备忘录，说明我们除了能派遣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到那个地区以外，再也不能派出什么部队。

国务院的近东问题专家差不多毫无例外地对建立犹太国家的主张抱着不友好的态度。他们的想法是：英国过去是靠了培植阿拉伯人来维持自己在这地区的地位的；现在它似乎已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了，而应当由美国来接替它，但要接替就必须完全按照过去的方式去做；如果阿拉伯人同我们闹对立，他们就会投到苏联的阵营去。

我从来不相信外交人员的这一套论调。但是，我想说一句，尽管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存在着这些分歧意见，但决没有任何关于由谁作出决定和谁应当听从谁的政策的问题。我们的外交人员中有些人、特别是近东部门的先生们，表示了不同的

意見，但這種不同只在於我們向前推進的速度問題，而不是整個方針政策問題。

我在2月間曾經同意應當努力促使聯合國恢復巴勒斯坦的和平局勢。因此我們在成功湖的代表團便建議在2月25日由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舉行會談，探討一下我們在巴勒斯坦所面臨的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已經達到何等嚴重的地步。

英國代表團對於這次會談仍然採取規避的態度，但其他四個代表團還是進行了磋商，並指出在英國當局撤離巴勒斯坦的時候——5月15日，這個地區將沒有一個實際的政府，而聯合國也還沒有作堵塞這一缺口的準備。事實上，要為各方面找到和解的任何基礎，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猶太人迫切地要求分治；阿拉伯人則激烈地反對分治；而英國人則決心要從這一個糾紛中擺脫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同時看到巴勒斯坦內部愈來愈多的暴亂事件，安全理事會就須決定是否要接受聯合國大會1947年11月29日的決議，把它作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基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國務院在1948年3月19日提出建議：除非能夠找到和平過渡到分治局面的辦法，英國原先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權應當置於聯合國托管委員會之下。這並不是否定分治，而是設法推遲實行分治的日期，以等待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能建立自己政府的適當時機。

我的關於巴勒斯坦的政策並沒有說要規定什麼日期或條件；它是服從於履行國際義務和解除人類痛苦這雙重理想的。從這個意義來看，國務院關於托管巴勒斯坦的建議和我的政策並不矛盾。

但另一方面，國務院里的任何人都一定會知道——而且我確信個別官員還真正希望——猶太人在讀到這項建議的時候，將認為我們已經完全放棄了他們寄予莫大希望的分治計劃，而阿拉伯

人也会像犹太人一样，认为我們结果是反对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解决办法。从这个意义来看，托管巴勒斯坦的主张是跟我的态度和我所制訂的政策有分歧的。

然而，把这場辯論由安全理事会轉移到托管委员会，在策略上讲是有好处的，因为前者可以使用否决权，而后者只要获得多数票就可以作出決議。此外，当时距英国人撤离巴勒斯坦的日期不过几星期，而这就会使整个局势有所改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暴乱事件发生以前，联合国往往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在这个期間容許就这一建議进行討論似乎是适宜的。

用联合国托管的办法来接替委任統治，这个建議在当时來說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但是，許多人对这个建議表示了諸多的怀疑，外交界人士认为这就是不让实行分治和建立犹太祖国的一种手段。

国务院里有些人认为，要不触犯阿拉伯人，貝尔福宣言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同英国大多数外交人員一样，我們的一些外交人員也认为阿拉伯人人數众多，同时他們控制着那么巨大的石油资源，因此我們应当对他們采取姑息态度。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这些人中間有些也是有反犹太人情緒的。

国务卿馬歇爾，副国务卿羅維特，还有駐联合国奧斯汀大使都和我的看法一致。奧斯汀在參議院外交委员会有过长期的經驗，他对于联合国的理想坚信不渝。他过去是參議院中最能干的領袖之一。他不是那种嘩眾取寵的角色，但他善于在幕后發揮他的作用，使不同的意見趋于一致。我經常为我自己感到幸运，因为我能够找到像他那样有能力的人来担任联合国的那种棘手的工作。

我在5月14日得到消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管理局正准备在当晚巴勒斯坦時間十二点钟，也就是在英国的委任統治宣告結束的时候，宣布建立犹太国。我曾經时常同我的一些顧問談起过，一

且实行分治，我們將采取怎样一种行动，而大家总是认为我們終归应当承认任何由犹太人建立的能負責任的政府。当然，分治的局面并不是完全按照我所希望的那种和平方式演变的，但实际情况是，犹太人控制了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他們准备自己来治理，并保卫这个地区。而另一方面，我也很清楚国务院的某些“专家”是要阻撓我們承认犹太国的。

現在，犹太人准备成立以色列国了，尽管有人要阻撓，我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宣告美国承认这个新国家。我命令我的一个幕僚把我的这个决定告訴国务院，同时准备把这个消息传达給在紐約的駐联合国的奥斯汀大使。大約三十分钟以后，也就是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以后刚刚十一分钟，我的新聞秘书查利·罗斯便向記者們宣布了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的消息。

有人告訴我，国务院的某些职业外交家对于这个消息感到很驚訝。要是这些人忠誠地拥护我的政策的話，他們原是用不着驚訝的。

对政府的許多职业外交官員來說，他們的問題在于把自己看做是真正制訂政策和主持政府工作的人。他們把选举出来的官員看做只是临时担任某項职务的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任总統都要碰到这样一个問題：如何防止职业外交家对于总統的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职业外交家往往力图貫徹自己的主张，而不想执行政府既定的政策。有时候，他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設法去影响总統所任命来执行他的政策的一些重要人物。在陆軍部和海軍部就常常有这种情况：將軍和海軍上将等等并不是为部长服务，听命于部长，而是要部长为他們服务，听命于他們。国务院也有这种情况。

有些总統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便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个小型的国务院。罗斯福总統就采取了这个办法，他自己直接跟丘吉尔

和斯大林联系。我倒不想遵循这种办法，因为成立国务院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而国务院也应该负起这方面的责任。但是我希望把这一点讲清楚，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是美国的总统，而不是国务院的二三流角色；而且，任何部、任何人都不能容许破坏总统的政策。公务人员、将军、海军上将和外交官都无权制订政策。他们只能以政府勤务员的身份办事，因此他们必须按照由人民选举出来制订政策的那些人所确定的政府政策去做。

至于巴勒斯坦的局面，正如罗维特副国务卿在宣布承认以色列以后对我所说的，“他们几乎把您给坑了。”

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立即开始建立自己的政府机构，1949年1月25日，它举行了第一次民主的选举。美国随即在1949年1月31日正式承认了这个政府。

阿拉伯人对建立以色列国这件事是很气愤的。埃及政府在5月15日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的军队已越过巴勒斯坦边界，为的是要去“恢复秩序”。不用说，这就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所一贯采取的威胁手段，它不顾一切地要阻止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但是联合国立即采取了行动来制止这场冲突的扩大。联合国派遣了一个调解员到巴勒斯坦，他终于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意暂时停战四星期，后来又继续停战了一个时期。这就使总的战斗停止下来了，但并没有使比较带地方性的冲突停止下来，因为事实证明，这个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的某些年轻的领袖，也是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领袖们一样好战的。

我的希望是，通过联合国调解员的努力，也许能够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使犹太人获得可以安安稳稳建设自己未来生活的祖国。至于究竟是怎样一个祖国，照我看来，1947年11月通过的分治决议已有规定。在民主党1948年的竞选纲领中，有一个关于以色列的声明，这个声明清楚地表达了我的想法。

声明說：“我們同意以色列国对联合国 11 月 29 日決議中所划定的疆界的要求，并认为只有在为以色列国完全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变更这个疆界。……我們将在联合国范围内繼續支持耶路撒冷的国际化，保护巴勒斯坦的圣地。”在草拟这一声明的时候，曾經取得国务院的同意。这个声明表达了我的深刻信念：不但貝尔福宣言中的一般性諾言应当遵守，就是联合国決議中所提出的特殊諾言也应当遵守。我曾經向魏茲曼博士保证这些諾言会得到遵守。犹太祖国不应当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应当給予地盘，給予条件，使它名副其实。

联合国調解員、瑞典的伯納多特伯爵随后在 9 月間建議說，应当采取另一种分治的方式：他贊成把北部的加利里划給以色列，而让南部的納格夫归阿拉伯人所有。我不贊成这种变动。在我看来，这有点像把牌很快地洗来洗去，一下又将納格夫地区交給阿拉伯人，而这个地区的问题还完全是有待調处的。但是，如果只从地图上来看两个分治方案，那末伯納多特的方案似乎是更进了一步；因为这个方案似乎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长长的疆界上引起摩擦的地方减少了一些。不管怎样，馬歇尔国务卿还是通知了联合国，說是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公正的好建議。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国务院的各个部門都是亲阿拉伯的，他們立即声称这是美国政策的又一次向后轉。有些人甚至說这个伯納多特方案本来就是国务院草拟出来的。不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伯納多特这个建議，阿拉伯人也反对这个建議，因为它势将承认“一个叫做以色列的犹太国家”。

在馬歇尔对这个新建議发表意見以后，我在 9 月 28 日和幕僚們进行了会談。当时我們是在奧克拉何馬城，在我的竞选运动的专用列車上。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势，大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詳細的討論。我很清楚，伯納多特方案跟原来那个分治計劃有很大的

不同，如果不改变政策，那就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方案。因此我对他们說，我想发表一个声明，重申民主党竞选綱領中关于以色列問題的看法，我并且要他们立即着手草拟这样一个声明。我将在跟馬歇尔或罗維特商議后，在較近的一次演說中用到这个声明。

当馬歇尔国务卿在10月9日从巴黎回来向我报告关于联合国的各項活动的时候，我們除了討論其他問題外，还討論到了这个問題。馬歇尔解釋說，他对伯納多特方案提出意見，其用意主要是为了鼓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进行談判，借此表明实际上分治計劃并不是完全不容变更的。因此，我便决定在这个时候不必就以色列問題发表声明。我对馬歇尔国务卿能够了解我的立場感到滿意，再說，只要在总的政策上大家一致，我并不想把某些具体問題上的任何分歧意見传揚出去。

但是，几天以后，英国代表在中国代表的附和下，在联合国提出了一项措辞非常激烈的反以色列議案。該議案要求在巴勒斯坦停火，但它却把罪过片面地推在犹太人身上，它要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撤出納格夫，而当时这个地区大部分是在犹太人的手里。当时馬歇尔在我的要求下正在希腊和意大利訪問，因而他不能亲自領導我們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好确定不要就这项新的議案随便发表意見。因此我将以下的一份备忘录交給罗維特轉給馬歇尔：

“发文者：总统

“收文者：国务卿

“在沒有得到我的具体指示以前，在任何声明的內容沒有得到批准以前，我們在巴黎的代表团的任何成員都不要就巴勒斯坦問題发表声明或采取行动。

“1948年10月17日”

在 1948 年的竞选运动中，我一直不想把外交政策問題牽涉进去。我希望全世界都能了解，不管美国人民对內政問題的看法是如何分歧，而在对待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則完全是一致的。換句話說，我希望遵守两党外交政策，而在竞选运动中完全不談这方面的問題。可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却选择了这个时机针对我們的巴勒斯坦政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这个声明中力图暗示我已經背弃了民主党的綱領，他这种做法事实上就是对我的正直的品格进行了攻击。

对于这种攻击，我不能置之不理。我通过罗維特通知馬歇尔，使他了解現在我为什么必須发表一个前些时候我們业經同意不发表的声明。当时已沒有其他办法可想，除非我願意让人相信杜威的政治攻击屬实。我深信对待巴勒斯坦的政策过去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不能不重申我的立場。

我在 10 月 28 日于紐約麦迪遜廣場花园所发表的演說中宣布了这个声明。声明中所用的字句，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前在奧克拉何馬城的列車上商談后所草拟的声明中的那些字句。

我說，“以色列問題不应当在一場政治运动中作为一个政治問題来解决。我从来不肯在这个問題上玩弄政治手段。我之所以不肯这样做，是因为：第一，我有責任使我們的以色列政策符合我們对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第二，我想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强大、繁荣、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須强大、自由到足以使他們的人民能够自給自足，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

在我写給現在是以色列国的总统魏茲曼博士的一封信中，我把上面的这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魏茲曼博士在一封充滿了热情的长信中向我祝賀选举胜利。11 月 29 日，我回了他一封信。我在信中从許多方面概括地叙述了我对犹太人的困境和这个新国家的紧张局势所抱的同情和态度。

“私人密件

“亲爱的总统先生，

“今天是通过分治決議的周年紀念日，这是回复您上次11月5日来信的最恰当的时候。

“当我讀到您的信时，我深深为您我最近所經歷的事情所感动。关于我們的那种据说已經无望了的失敗事业，我們两个都遭到所謂的现实主义的专家們的鄙弃。但是我們两个还是繼續追求我們确信其为正确的东西——事实也证明，我們两个都是正确的。我在11月3日早晨所感觉到的那种得意情緒^①，大概就是一年前的今天和5月14日^②以及随后一些場合中您自己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緒。

“但是，頑强和机灵的敌人在被击潰以后，是用不着多久就会重新集結其力量的。您在以色列已經面临这种局势；而我呢，大概也快了。因此我很了解您要制止敌人破坏您那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的焦急心情。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关于納格夫問題的談話，您上次的信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我完全同意您就这个地区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所作的估計，我对于任何企图夺走以色列的納格夫的主张深表遺憾。我想全世界对于我所抱的态度都是很清楚的，特别是看到了民主党竞选綱領中的措詞以后。但是也还是有人沒有把这当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竞选运动中的另一次諾言’，而在选举以后就会忘掉。我相信这些人最近总会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我把我的这次重新当选看做是美国人民給我的一項委托，叫我执行民主党的竞选綱領——其中当然也包括解决以色列問題的主张。我准备照着这样作。

① 指竞选总统获胜。——譯者

② 以色列国成立日。——譯者

“自从您写了那封信以后，我們曾經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我們將坚决反对对 11 月 29 日決議中所規定的疆界作任何的改变，这种改变为以色列国所不能接受。我相信联合国大会在这个基本立場上是会支持我們的。

“我們已經表示願意通过财政上和經濟上的措施来帮助你們建設这个新国家。您知道，进出口銀行正在积极考虑根据一定的計劃給予以色列大量的长期貸款。我也知道，您的政府目前正在草拟这种計劃的具体項目，以便送交銀行审核。就我个人看来，我甚至願意把这种财政上和經濟上的援助的范围更加扩大，使整个中东都能受益，这要看彼此是否能够有效的合作而定。

“十分感謝您对我重新当选总统的热烈祝賀。我很高兴地获悉以色列的首次选举已定于 1 月 25 日举行。这就使我們有了一个确定的日期来正式承认您的政府。

“最后，我想告訴您我在看到新成立的以色列国所取得显著进步时是多么高兴和感动。您从全世界友誼之手中所得到的比您所应得的要少得多。但是您已經极充分地發揮了您所得到的东西的作用，在这点上我很佩服您。我相信目前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和这种局面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将很快被消除。我們將尽力促使希望迅速获得和平解决的双方直接进行談判。

“您忠誠的哈里·杜魯門

“1948 年 11 月 29 日”

第十三章

再次参加竞选

假若我考虑我家庭的願望，在我第一任总统結束的时候，也許就打定主意离开白宮了。無論什么时候，我都没有采取步驟和行动来阻撓任何人来担任下届总统的候选人。就我个人而言，像在1944年一样，我不想仅仅为了滿足个人野心而参加一次全国性政治运动。我当美国总统已經三年半多了。

1948年我决定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动机是同我在1944年的动机一样的。在美国历史上民主党执政已經十六年了，政績卓著，但仍然有很多工作有待于完成。自1932年以来經過艰苦奋斗实行的一些改革使美国各阶层有更多的人改善了生活，这些改革在四十年代正在巩固下来。这些成就很容易遭到反动派政治上的攻击，如果不由一个富于警惕性的民主党政府来加以保障，这些成就就有可能丧失掉。

我从来不想仅仅为了得到一个显要职位而为个人奋斗或者去反对別人。假如我能繼續作一个县法官为社会服务，我会感到很幸福。当一个参議員我会更高興一些，同白宮全无关系也会感到心滿意足。我接受副总统的提名并没有胜利的感觉，而是由于不能在参議院中繼續起积极作用而感到遺憾。

在1944年曾經有人問我，在为罗斯福竞选第四届总统的时候，我采取什么做法，因为我一向认为任何人連任总统都不應該超过两届。

回答是很简单的——我知道在1944年那个极关紧要的时刻

如果罗斯福和他的理想不能继续下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那个国内外事务都在剧烈变动的紧急时期，如果反动势力得势，我明白在战后时期只要几个月的时间，罗斯福和民主党人在过去十六年中曾为之艰苦奋斗的开明的社会纲领，大部分都要付诸流水。虽然总统身体不好，他还是有把握受到自由主义势力的拥护，我愿尽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他竞选总统。

在1948年，我对于我应采取的行动也是毫无疑问的。世界正处于大变动当中，革命正在大多数“无所有”的国家中蔓延开来。共产主义正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它向来是利用这种贫困状态而得到发展的。自由的方针再次受到挑战——这一次是来自一个新的强大的地区，即苏维埃俄国。

根据我同固执的俄国外交人员谈判的经验，我懂得，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实力出发。我们必须重新武装我们自己 and 我们的盟国，同时以这样一种态度同俄国人打交道，决不让他们认为我们软弱。

在我们国内，我看到许多好心肠的集团为“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而竞选，与此同时则为俄国人的侵略行动辩解，说那只是俄国人对我们的强硬政策的反应。许多可尊敬的美人同意这类想法，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想法正在使我们曾经为之艰苦战斗的我国的安全和自由陷于危险。

在1948年，我感到，正如我在参议院的那几年受到了锻炼来担任总统职务一样，我在继罗斯福任总统的这几年也使我受到锻炼来贯彻我们提出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安全的纲领。我还感到（在这方面倒并没有什么非分的自私想法），让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来执政还不是时机，那会使我们的国内纲领不能贯彻，使我们好不容易协商一致的外交政策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在1946年到1948年期间，在第八十届国会任期内，很多事情

表明，一項进步的施政綱領会有怎样的遭遇。第八十届国会的破坏性的反动态度使我深信，在政府中迫切需要更多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少一些。我觉得，我的責任是投入战斗并尽我所能来制止这股反动的浪潮，一直到“新政”和“公平施政”的基本目标被採納、試行和实现。

在共和党人控制第八十届国会期間，表明他們不想要，事实上也不了解什么是开明的綱領。他們不了解工人、农民和老百姓。他們缺乏理智，感情用事地反对进步。任何改善全体公众状况的关于工作条件、健康保險或是长远社会保險的立法建議，都遭到他們反对。他們当中很多人真正认为，繁荣的确已开始趋于頂点，到适当的时候，便会逐步逐步地使全国人民得到好处。

在外交方面，共和党的領導仍然受到孤立主义的影响。自从国际联盟被“十二个一意孤行的人物”拆台以来，共和党的領導显然很少学到什么东西。假若沒有參議員阿瑟·范登堡通情达理的自我轉变和聪明睿智的領導，以及众議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查尔斯·伊頓的領導，我們在外交事务方面决不能实现两党一致的政策。假若沒有这些开明的共和党人的領導，在那两年里，联合国、馬歇尔計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其他一些方案，即使不致于完全停頓，也会受到自私的共和党多数的阻撓。

因此，許多事情加起来使我深信，我必須同这样一些事情进行斗争——俄国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正在造成的威胁，所謂华莱士进步党人鼓吹的为和平而緩和局势的囂张一时的謬論；传统的共和党孤立主义的巨大障碍；南方民主党人和北方共和党人的联盟，他們企图强行取消許多“新政”的立法，从而回到蕭条年月之前的放任理論。必須击败这些势力，否則我們的国家将会倒退到那个反动的艰难时代。

我常常从历史教訓中得到安慰和教益，我認識到我在1948年

的处境从历史上来看并不稀奇。当托马斯·杰斐逊在1800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联邦派人士正在窒息这个新共和国的真正的民主概念。在他当选之后，他把他们赶出政府，并且恢复了自由主义。当安德鲁·杰克逊对再度盘踞了联邦政府的反动势力发动一次革命的时候，他又捡起了那条被打断的自由主义的线，而这种自由主义在约翰·亚当斯执政时期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从1828年开始的杰克逊进步的开明时代由于威廉·哈里逊和约翰·泰勒在1840年当选而被打断。惠格—共和党(Whig-Republican)的保守主义长时期统治了这个国家，虽然亚伯拉罕·林肯真正同情老百姓，对他们忠心耿耿，但直到1884年政府的自由政策才再次有机会为人民服务。这种机会在本杰明·哈里逊和威廉·麦金莱的所谓“早年的好日子”开始以后的四年当中又不见了。我相信威廉·布雷恩具有杰斐逊和杰克逊那样的远见，特别是在1896年他领导南部和西部起来反对保守的东部金融集团的时候，但这时共和党的保守势力已经强大到使他无能为力了。

西奥多·罗斯福这位卓越的共和党总统使进步主义在美国生活中得以继续保持下去。在他执政期间，美国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在保存自然资源方面。西奥多·罗斯福执政七年所实行的英明政策由于塔夫脱的当政而遭到破坏，联邦政府再次落入当时反动保守的共和党人手中，直到伍德罗·威尔逊实行了“新自由”——一个真正自由的民主党的进步时期。

在1916年，威尔逊面临一项抉择：把他所创始的有利于全体人民的事业继续下去，或是放弃自1912年以来他所取得的成果。民主党人接受了这个挑战，从而能够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今天被认为是我国生活方式最宝贵的贡献的一部分，虽然在1920年至1932年期间，当国家事务再度为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的时候，许多

改革都已被他們取消。

1932年及以后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是最近的历史了。在弗兰克林·罗斯福任总统期间，全国政治制度焕然一新；这个政府致力于把国家的财富和权益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期间我本人是有幸参加了的。我看到他制定一项国际外交政策，使美国居于世界领导的地位。在民主党国会的支持下，他在美国政府组织中扎扎实实地贯彻了自由进步主义的精神，使它空前强大。

在美国历届总统的历史上，一系列强有力的开明总统曾为自由主义而奋斗，为普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他们是：杰斐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弗兰克林·罗斯福。这个传统交给了我，我不能轻率地放弃1948年落在我身上的这个机会和责任。我必须努力使这个传统继续下去。如果我能使这条线不被打断，我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当通过参加总统竞选去努力做到这一点。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考虑任何其他行动。

为个人的舒服和利益所要做的事情是不重要的。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才是重要的。我必须参加1948年的总统竞选。

我觉得，在1948年，反对派所唯一可能提出的要选民们把行政部门交给他们的理由是：民主党执政已经十六年了，选民们愿意换一换。但选民们在1946年的行动已经使共和党人的国会控制了立法，而我在竞选总统时要说服选民换一换还不到时机。很明显，第八十届国会是一个最伤脑筋的问题。这是我首先要拿出本领来加以克服的障碍。

由于第八十届国会对农民不实行维持价格的灵活的制度，拒绝我所建议的保证农产品充分消费和使农民有更稳定的前途的纲领，农业遭到了损害。

在1947年11月我召集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由于共和党的第

八十届国会不恢复物价管制，本应于 1946 年就可以克服的通货膨胀的威胁更加严重了。国会专门为少数人着想，而不是为多数人的需要着想；对少数人来说物价越涨就意味着利润越大，而对多数人来说，防止物价飞涨而不损害生产的行之有效的武器是物价管制。

第八十届国会不顾我的否决，于 1948 年春通过了一项赋税法，这项法案把减税的 40% 给予每年纯收入达五千美元以上的为数不到 5% 的纳税人。国会还倡议联邦政府取消遗产税，以鼓励建立免税的乐园；这样，大富豪们就可假借名义建筑住宅，以逃避对他们的财产应征的赋税。

第八十届国会于 1947 年制定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是企图约束美国的劳工，同时给雇主以极大的权力。共和党多数把劳工部弄得支离破碎，使该部的职能残缺不全，简直很难完成其关怀、促进和发展工资劳动者福利的使命。

在美国已经建议把联合国的地址设在美国之后，第八十届国会却未能为此通过必要的立法。这种泼冷水的做法使我国同世界上其他为和平而共同奋斗的国家的关系蒙受损失。这是一种典型的孤立主义表现，其情况正同国会不愿意——几乎是拒绝——支持欧洲复兴计划，以及对我所提出的关于继续执行贸易协定计划的要求置之不理一样。

十四年来第一次控制了全国立法的第八十届共和党国会，力图取消民主党的健全的政策，如集体谈判、社会保险、房租管制、物价管制以及政府为保证大多数人权利平等而执行的措施。非但如此，国会还无视总统一再提出的建议，并且在住房、物价、赋税、农业、劳工、工业关系、对外贸易以及国内外政策的一切重要方面都屈服于特权集团的压力或者为特权分子的院外集团所收买。

简言之，第八十届国会表明共和党过去一向是、并将继续是特

权集团的政党。正因为如此，我在每次竞选演说中都说明一点：选民投票实际上只是决定一个问题，即在特殊利益和公共福利二者之间作出选择。

我深信，如果美国人民了解全部事实，他们就会同意我的意见。然而我知道共和党控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反对我，因此我同人民联系的唯一希望就是亲自把情况告诉他们。

在1948年的竞选中，这个国家的通讯设施是另一个问题。数字表明，几乎90%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反对我，支持其他的候选人。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绝大部分报刊和广播电台是由那些一向从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得到好处的私人集团所拥有和经营的，或者是受他们津贴的。即使是那一部分不为反政府的集团所直接控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那些富有而往往自私的私人集团的广告而得到收入。例如，拥有强大势力的公司花费成百万的美元买下了报纸和杂志的篇幅，用来攻击联邦政府的公用事业计划。其他院外压力集团，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也经常以登广告或以某种发起人的名义给报刊和广播以补助。

我所反对的主要还不是共和党人收买报刊和广播节目，因为这些东西也同样卖给民主党人。我真正感到气愤的是报刊发表歪曲的社论和刊载有倾向性的标题这类老一套的做法，以及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天天发表那些公然颠倒黑白的文章。最使人恼火的是发表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消息。

假如报纸和广播发表的消息符合事实，我就感到满意了，至于某些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在表达意见时的方式如何，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是并不在意的。但是，我看到，危险是在于把事实和纯粹的揣测夹杂在一起，这样一来读者和听众无疑会误入歧途和受骗。那些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写些诽谤性的无聊文章，其意图通常是很明显的，因而也是无关紧要的，但当那些严肃的分析员和“象牙之

塔”的批評家歪曲了事实的时候(他們往往是这样的),公众就有受騙的危險,因为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对他們是信任的。人所共知,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報紙上出現一个声明,就可以使許多人相信。

我深信大部分新聞广播机构已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能如实地反映事实和忠实地表述意見。我觉得許多报刊和广播的老板、发行人和专栏作家在对美国人民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时期簡直是存心不負責任,他們享受宪法規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而不履行因享受这种权利所應該履行的职责。在我看来,它們已經出賣給特殊利益集团,因此在我的竞选演說中我把它們叫做“御用报刊和被收买的广播”。

許多候选人都惧怕报刊和广播的势力,乞求它們发善心,好像选举結果如何就取决于它們。但是我从我的政治生活中懂得这种想法是錯誤的。在我所居住的那个州,我經常遭到絕大多数报刊的反对。每一次我都战胜了它們,我从来不重視报刊的所謂政治影响。多少年来我都沒有改变我的意見。任何一个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綱領的政治家都能够面临激烈的反对而取得胜利。

我熟悉过去总統竞选的历史,这也是我在1948年遭到报刊的反对而并不感到煩惱的另一因素。自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統以来已进行过三十六次总統竞选,在这些竞选运动中报刊都曾經被认为起重要作用。这当中有十八次报刊支持了失败的候选人,另外十八次是支持获胜的候选人。这是我所需要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我对于報紙以及广播这种新的宣传工具的影响可以不必害怕。

这就是1948年夏天我面临的情况。在期中国会选举中得势的反对党早已通过第八十届国会表明了它要彻底破坏民主党在过去十六年中为增进人民的福利和保障所建立起来的机构。与这种威胁同时存在的是敌对报刊的影响,它們鼓吹共和党的政策,并对

我的政府的政策极尽誹謗和破坏的能事。

我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令人鼓舞的，但我生来就不是一个面临一場正义的斗争而临陣脱逃的逃兵。說我不能获胜的那种所謂科学的預言絲毫也沒有使我感到担心。

作为美国的慣例，民意測驗在 1948 年夏天达到了頂峰。有几个民意測驗所如乔治·盖洛普和埃尔莫·罗珀民意測驗所，其准确程度是素負盛誉的，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許多政客、新聞記者、商人和劳工領袖已开始注意这些民意測驗所的结果，把它們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在 1948 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前所举行的民意測驗几乎一致表明我是受到美国人民欢迎的，現在則表明我的威望已空前低落。这是美国报刊对我进行歪曲、对我的綱領、政策和人員极力詆毀的结果。測驗图表表明，我在刚继任总统的时候，全体居民中約有 70% 是拥护我的，在 1948 年春天已經下降到大約占 32%。

我个人对于民意測驗并不在意，因为据我判断，这些民意測驗并不能真正代表美国的民意。我不相信我国社会的主要成分如农业、行政管理和劳工界人士是充分发表了意見的。我也知道民意測驗並沒有表明事实，而只不过是推测。我总是把我的信心寄托在已經了解到的事实上。

虽然我个人並沒有因为民意測驗的结果而感到苦恼，但是我知道有些民主党的領袖却由于預言家們所描繪的暗淡前景而感到沮丧了。我看到，新聞界在广泛散播那些預言，說什么选民們在下次选举中将擯弃我和我的政府；而且根据我的經驗我懂得，虛假的宣传能够使最明智、最善良的人迷失方向。

我明白，对于民意測驗者和共和党控制的报刊联合起来以它們的統計数字和宣传来麻醉老百姓这件事，我是必須采取某些行动来对付的。就連我最亲近的朋友和顧問也劝我改变心意，不參

加7月間的提名。

6月初我有了一個主意——批評家也許只承認這個主意完全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為了遏止民意測驗所和報界的虛假宣傳所散布的那種暗淡悲觀的氣氛，我決定旅行全國各地以總統身份直接對人民講話。這就是說，要坐火車旅行幾千英里，沿途隨時停下來向集聚起來的群眾講話，使他們聽到事實。而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過去有兩位總統曾經作過我設想的這種旅行。一位是安德魯·約翰遜，他曾經在芝加哥到華盛頓這一段路上“轉來轉去”，尋求選民們對他的重建計劃的支持，這個計劃當時是遭到國會激烈反對的。約翰遜在旅途很多地方發表演說，向人民說明他的復興東南部的計劃是以林肯的建議為基礎的，是為了全國的利益，而國會所發起的不成熟的計劃則對北方和南方的繁榮和發展都有害處。他遭到當時的急進分子和抱有黨派成見的報刊的殘酷的打擊，他的旅行以沮喪和失敗而告終。我相信，假如約翰遜在批評面前不放棄他的計劃並且也到其他地方親自進行競選活動的話，他的計劃本來是可以實現的。

伍德羅·威爾遜在1920年旅行全國為國際聯盟的事業辯護也以不幸而宣告結束。當時他的身體垮台了，他不能繼續出現在群眾面前，當列車把他載回華盛頓的時候，那輛列車實際上是一輛喪車了。

像約翰遜和威爾遜一樣，我在1948年6月打算作的旅行是要告訴人民，面對着當時正在傳播的捏造的报道，總統和他的政府正在做些什麼。我想使各偏僻地區的人們有機會親眼看到他們的總統，聽到他的講話，以便他們根據自己的印象而不是根據民意測驗和宣傳得出對我和我的綱領的看法。

我的目的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們說明美國的外交政策的

执行情况 and 国内问题的现状。我还感到有必要向人们说明第八十届国会所起的阻碍作用。我深信，美国的老百姓不完全了解事实真相，因而我有必要离开华盛顿，花足够的时间同人民直接讨论这些情况。

我旅行到西海岸又折回来，在沿途的城市村镇和乡村作了七十六次演说。我从来没有像我周围的某些人那样丧失信心，而且在这第一次旅行中沿途各车站大批群众的反映使我受到了新的鼓舞，增强了信心。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并且急于想亲自听到我要向他们讲的话。

我试用了一种新的讲话方式，这种方式除开在非正式场合以外我从来不曾用过。在这次旅行中我作了七十六次演说，其中就有七十一次是不用讲稿的。为了使我的发言适合当地听众的兴趣，有时候我也使用发言提纲，但这种提纲决不超过几行字，而且通常只是在我开始演说前分把钟左右交给我。

我第一次发表即席演说的正式经验是在6月间我开始每站必停的旅行之前几个星期取得的。4月间我曾根据讲稿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了一次演说，随后我就决定不用讲稿来谈美国与俄国的关系。我用了大约三十分钟讲完之后，出乎我意料之外，听众报以最热烈的鼓掌；而听众主要是共和党人，我从来不曾受到他们如此热烈的欢迎。

5月14日当我向华盛顿青年民主党人的一次集会讲话时，我又一次尝试不用讲稿发表演说。纽约的一家报纸把这次演说称为“杜鲁门以新的姿态发表的战斗性演说”。我决定，如果事先不准备讲稿或者在演说时离开讲稿能够更有效地表达我的思想和感情，那末我在未来的旅行中在列车旁边发表演说时就采用这个办法。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时，以及从劳工节到11月选举这期间的绝大部分竞选演说也都采取这种

方式。

1948年的政治形势还有另一种情况使我的絕大部分拥护者和顧問感到沮丧，这就是民主党在公民权利这个問題上面临分裂的威胁。自从我作为总统在这个受到严重誤解和歪曲的問題上第一次采取立場以来，南方某些州背叛民主党是我早就預料到的，这些州主要是南卡罗来納、路易斯安那和密士失必。从我任总统的最初几天起，就坚持一項切实可行的公平就业实施綱領，坚决实现宪法規定的公民权利。

这个鬧分裂的反对派早在1946年12月5日就开始出現了，当时我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就美国公民权利的状况进行調查并提出报告。我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在战争刚刚結束以后屡次发生反对少数民族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些家庭遭到侵犯，财产受到損失，并有一些无辜的人遭到杀害。报纸上这类消息司空見慣，多得惊人。我想知道这些不尊重个人和团体权利的事件的真相，必要时加强法治以充分保护全体公民，使他們受到公平的待遇。

我发出指示，委员会的調查不应只限于某一少数民族集团的問題，而应調查所有存在种族歧視和宗教歧視的地区。这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个老問題，我对这个問題的做法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然而那些具有“白人至上”思想的領袖們却立即发动了一个蠱惑人心的运动，企图抵銷我为实施联邦政府的保障以反对种族歧視所作的努力。这一运动的結果就造成了1948年南方集团的一部分以“州权民主党人”这一騙人的名义而脫离了民主党。

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是1941年6月25日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命令成立的，其目的在于“鼓励全体公民……不問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如何，充分参加国防計劃”。这个委员会根据全国战时机构撥款法一直到1946年6月30日才結束，該委员会停止工作我是不贊成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表明，战时的大部分案件，屢

主和工会的歧視行为，只要有一項坚定的国家政策，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协商减少或者消除。

然而，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經營的一些沒有解决的案子表明，在有組織的反对面前，单是行政权力还不足以保证他們順从。我認識到，要制止这类非美行为还需要立法权力。公民权利委员会的建立就是要搜集事实并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立法的必要性。

在成立这个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中，我指出，这个国家正在丧失公民权利的基础，維護这些自由权利是州、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每一部門和每一官員的職責。宪法規定保障个人自由，并保证依据法律給予同等的保护，当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剝夺或者不能实施这种保障时，很明显联邦政府就負有責任采取行动。然而，我觉得，联邦政府受到不充分的公民权利法令的阻碍，而司法部也缺乏貫徹这类法令的工具。这种状况正是我想加以糾正的。

1947年1月15日我在白宫对公民权利委员会的十五位委員讲话时說：“我希望我們的权利法案能够切实执行。我們力图做到这一点已經有一百五十年了。我們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进步还不够快。这个国家很容易遇到1922年那种曾經发生过的情况。”当然，我所指的是那一年三K党恐怖主义的再次出現。

六个月以后，1947年6月28日，我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会上发表演說时，再一次說明了我的公民权利綱領的动机。

我断言：“作为美国人，我們相信，每一个人都應該按照他的願望自由地生活。他所应当受的唯一限制是他对自己的同胞所負的責任。假如这种自由不仅是梦想，那末每个人的机会平等就应受到保障。一个美国人的成就大小只应取决于他的能力、勤劳和性格。”

这年10月，公民权利委员会提出了报告，报告表明确有必要制定法律来保障美国少数集团的权利。报告列举了十項重要建

議，這些建議是：

(一) 建立一個經常性的公民權利委員會，一個兩院聯席公民權利委員會，在司法部內設立一個公民權利司。(二) 加強現有的公民權利法令。(三) 聯邦政府採取保護措施以反對私刑。(四) 更充分地保護投票權。(五) 建立一個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以防止就業上的不公平的歧視。(六) 修改聯邦歸化法，凡有申請作為美國公民者，不管種族、膚色和民族如何，均批准其公民籍。(七) 賦予哥倫比亞特區的居民以地方自治權和選舉總統的權利。(八) 把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改為州并使我國的島嶼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九) 給予居住在美國的人以同等歸化為美國公民的機會。(十) 解決日裔美國人的撤退要求。

我在1948年2月2日致國會的咨文中要求制訂有關公民權利的專門法律，把上述建議都納入法律之中。同時我還呼籲全國行政官員和私人公司的職工在使用交通工具方面廢除隔離和歧視。此後，我把這些建議列入1948年的民主黨綱領。

一個政黨的綱領是對公眾的諾言。一個人除非信守他本黨的綱領，并在當選以後竭力去執行它，否則他就不是——個誠實的人。一切競選演說如不以一定綱領中所表述的原則和內容為依據，那就純粹是騙人的花言巧語。當一個政黨沒有堅定的原則和主張的時候，那就不可避免地鬧個人糾紛，玩弄騙人的把戲，而忽視進行一項政治運動所唯一應當依據的基礎。

在1934年、1938年和1942年，我是參與制訂我那一州的民主黨綱領的人之一，也是1936年、1940年和1944年的全國性綱領的制定者之一。我相信這些綱領中提出的原則，而當我被選為總統之後，我力圖實現綱領中所作的諾言。所有這些綱領中的基本原則是為了那些在華盛頓沒有勢力的普通人的利益。對我來說，黨的綱領就是同人民訂立的契約，而且我一向把它們看作是必須執

行的协定。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我甘願在 1948 年冒失敗的危險，而依然坚持我的綱領中关于公民权利的部分。

当然，在我周围有些人迫切希望防止在民主党内部出現分裂，并且进行工作来緩和在公民权利問題上所采取的态度。然而，在这样一个极关重要的原則問題上我不贊成讲些模稜两可的話，而坚持把話讲得清清楚楚。內閣的閣員們和其他一些人提醒我，假如我坚持我给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的命令，不停止我为制訂公民权利的法律所作的斗争，我就要遭到失敗。但是，我所需要的是在坚持我的綱領的前提下取得胜利，或者是由于坚持綱領而失敗。

早在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我就有理由断定，南方将要分裂出去，至少是一部分要分裂出去。南方人对軍队中的黑白一体政策所持的态度是人所共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由于气候条件适宜，几乎所有訓練軍队的兵营都設在南方，所以黑白一体的想法遭到强烈的反抗。在雇佣建筑工人政府修建兵营方面原是没有什麼种族歧視的，而南方人对在建筑工人中实行的黑白一体的政策特別感到恼火；他們还对政府关于公平就业的命令很不高兴。我預料到会出麻煩，而这些麻煩很快就在 1948 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有了发展。

軍事机关——特别是海軍——曾經强烈反对我在武装部队中实行黑白一体的政策，但我强行貫徹了这一政策。后来他們发现执行这一政策并没有造成困难。黑白一体是建立有效的战斗組織的最好的办法，在这种战斗組織中人們可以并肩作战。前綫的經驗证明，哪个部队不歧視黑人，那个部队的战斗力就加强了。

我还觉得，采取其他任何方針都不符合我們的国际使命和义务。我們在國內承认肤色界綫，而还期望領導亞非各民族的广大群众，那是不可能的。我們所宣传的东西必須見諸行动，我力图作到这一点。

自 1932 年以来，民主党的每一項綱領都強調我們党忠于宪法上关于公民权利的理想。但現在引起很多南方人不滿的正是因为我要把这个宪法上的保证付諸实施。当南方人在 1948 年看到我想实行这一保证的时候，他們背叛了党。南卡罗来納的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是这次背叛的首領，他在費拉特尔費亚城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同他的追隨者一起戏剧性地离开了会场。当时有一位記者請他說明他的立場。

“杜魯門總統只不过恪守罗斯福所提出的綱領罢了”，記者这样指出。

瑟蒙德答道：“我同意，但杜魯門真想实行这个綱領。”

公民权利委员会对它所发现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議是曾經作了明确的說明的，我也曾鼓励就这一問題进行广泛地宣传，尽管如此，政客們蠱惑人心的言論和报刊上的宣传仍然对我坚持列入綱領的那个方案进行无耻地歪曲和誹謗。我主张每一个美国公民具有平等的經濟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同每个人的个人关系或者社会关系、或者个人选择朋友的权利是毫不相关的。我提倡宪法規定的基本权利，这种主张竟遭到蓄意歪曲，說这包括或意味着种族杂交和种族通婚。而我的目的只不过是使各个階級的美国人在法律面前都能得到同等的机会和保障。

“州权民主党”声称这不是背叛民主党。他們說他們是真正的南方民主党人。这是背叛。这也是抱有成見的一种表現。1928 年当阿耳·史密斯按照民主党的綱領竞选總統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与此类似的反动現象。当时我在杰克逊县的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我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个县投他的票。但是由于反对天主教徒的偏見，这个一向拥护民主党的县还是以三万票的多数使史密斯落选。由于这种偏見得到胜利，当时人們相信，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天主教徒、犹太人或者黑人能够担任高級政府职位。这是二

十五年前的事情了，現在这种偏見已經不那么明显，虽然还有待于克服。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大大喚醒了美国人，使他們認識到假如让偏見支配政府的行动，就可以造成极为危险的后果。

我决不相信絕大多数南方人会同意南方民主党人少数集团的观点。我个人早年也是一个抱有极强烈的成見的南方人，我相信絕大多数善良的南方人都明白，老几輩人那种盲目的成見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中是不能再繼續存在下去的。在公民权利方面的許多进步措施是南方自願地采取的，我的綱領的目的也正是帮助加速这种进步。正是因为他們明白这一点，过去曾經組成邦联的那十一个州的通情达理的民主党人，沒有退出民主党代表大会，沒有加入分裂派。

我並沒有忽視由于失掉一向投民主党票的南部各州所造成的困难，因为这关系到我在选举中取胜的机会。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在11月間成敗的一个关键問題。我也知道，假如我背弃民主党綱領中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主张，我是能够挽救这种分裂局面的，但我从来不曾拿原則来換取选票，我也不願意在1948年破例这样作，無論这对选举有多大的影响。

我深信，选民們将会看清楚，南方民主党人不根据现实而仅凭虛构是不能形成一个綱領的。由于我抱有这样的信心——在我周圍似乎很少人有这种信心——我依然坚定不移，宁願冒总统落选的危险。

虽然有許多总统候选人曾經不得不設法应付党內的分裂，但我在1948年的处境在美国政治史上却是沒有先例的。我所面临的不是民主党內一个重要派别的背叛，而是两个相当大的派别的背叛。其中一派正在准备撤銷对我的支持、轉而支持另一个根据“州权民主党人”綱領竞选的候选人。除这一派人以外，还有另一个民主党人亨利·华莱士所領導的所謂进步党人。

在罗斯福总统任内，华莱士曾经是美國历史上最好的农业部长之一，而在罗斯福任第三届总统的时候，他作为副总统享有很高的个人威信。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而人们预言，他将得到很多选票。

我任总统之后，当我发现他在干涉我的外交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必要同亨利·华莱士分手。当时我觉得他抱有一种理想，有可能在国内吸引一批人跟着他走，选举他为总统。1948年成立的进步党就是华莱士及其拥护者想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

有些好心的老实人鼓吹不惜任何代价与俄国保持和平，他们认为华莱士是他们这种观点的代言人。华莱士始终认为我对苏维埃人太强硬了，并认为如果我们的态度更缓和一些，和平是可以保持的。他曾经代表罗斯福多次出国访问，到过中国、南美、俄国，包括西伯利亚，这些活动使他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因而也造成有很多人热情地追随他。

然而，在华莱士的活动中也有危险的一面。它为共产党人渗入美国的政治生活和散布混乱提供了机会。进步党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赤色分子迅速而巧妙地进行工作，力图控制代表大会，操纵党的各个委员会和党的纲领，许多党员并不了解这个情况。

华莱士本人似乎已经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狂热到近乎执迷不悟的程度；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人正在利用他的“进步”运动达到什么目的。我一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忠诚的公僕，但他就是不懂得真实的情况。

根据我个人与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知道华莱士的绥靖梦想是没用的，假如这种梦想得以实现，那将是一个悲剧。我学到了一点：俄国人只懂得武力。华莱士不认为这是真的，但他没有我同苏维埃人打交道的那种经验。

我認識到进步党人会搶走我一部分选票，但正如南方民主党人一样，他們所維護的原則是我必須拒絕的。

在 1948 年我能否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还受到党内第三种运动的挑战。这年春天随时有可能开展一个蓬勃有力的运动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

有些重要人物宣传我不繼續貫徹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他們当中有故总统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和埃利奥特，前内阁成员詹姆斯·貝尔納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佛罗里达州的参議員克劳德·佩珀。还有很多人觉得，既然报刊和民意測驗所的反应表明我在这次竞选中得胜的机会已减少到几乎等于零，民主党就应当提別人来担任总统候选人。

艾森豪威尔将军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当时声望极高，因此对于那些想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来代替我的人來說，艾森豪威尔似乎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候选人。然而想提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职业自由主义者却表明了他們不熟悉历史和一套政治常规。当总统还在白宫的时候，他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来不曾违背他的建議来决定候选人或是制訂大会所应执行的綱領。

按照传统，总统是他的党的領袖。他对于全国委员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通常这个党为代表大会指定的一位主席应当对总统抱友好态度，并且得到总统的同意。無論有多少誹謗者，代表大会的組織工作总是由主席来控制的。代表大会应按照主席和总统的意志办事。

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一个威信很高的人，在 1912 年也不能从当时在职的总统塔夫脱手中爭得总统提名的权利，虽然塔夫脱自己的党内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对他。因此，特迪·罗斯福^①只好脱离共和党，以“雄赳”^②候选人的名义竞选，結果遭到失敗。然而

在1908年，当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的时候，他就能挑选党的候选人，正如塔夫脱在1912年能够控制总统候选人提名一样。威尔逊在1916年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1948年，我所处的地位使我能够控制总统提名。当我下定决心参加竞选的时候，党内那些反对我的人没有办法阻止我这样做。正因为如此，瑟蒙德和华莱士不得不脱离民主党而煽动一批人跟着他们走。假如艾森豪威尔也来参加民主党的提名，那末民主党就要分裂为四派；但如果他不这样做，情况就不会发生变化。总统控制代表大会是一个政治原则，在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违反过的。

为艾森豪威尔竞选的热潮在1948年没有发展下去，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拒绝了那些想要改变他的决心的人。假如艾森豪威尔在1948年宣布参加竞选，结果如何的确是难以预料的。为艾森豪威尔竞选的狂热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分裂集团的支持。进步党人毕竟是反对美国由军人领导和军人执政的，而南方民主党人不支持哪一个具体的人或哪一桩事——他们只不过是反对我在公民权利问题上的纲领。

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参加竞选的谣言很可能是来源于白宫。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有一次来访问我，我们两个讨论了政治和军界的英雄人物。我问他想不想参加总统竞选。他告诉我，他不想参加竞选，并且引用了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在这封信里他说明了他决意不参加竞选的理由。那封信于同年1月份公布，其中说：“军人服从文官是必要的、明智的，当终生的职业军人不谋求高官显职的时候，这一原则才能得到最好的保

① 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为西奥多的别名。——译者

② 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脱离共和党后，组织进步党，“雄赳”是该党的标记。

——译者

证。”

艾森豪威尔把这封信拿给我看，我告诉他，我认为他是很有远见的。我说，我不认为他还能对他的光辉业绩再增加一分光彩，他参预政治的结果只会损害他的名誉，像格兰特将军受人欺騙而参加竞选的结果一样。我对艾森豪威尔说，政治地位同军事地位大不相同，一个军事组织的首脑不会受到他的部下的攻击，但一个总统并没有部下，他就必须期待来自各方面的攻击。

我个人认为，尽管艾森豪威尔在 1948 年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众议院议长塞姆·雷朋最有效地概括了当时的形势，他不同那些职业自由主义者一起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总统。雷朋这样说：“不，我不这样做，他是好人，但选他是错误的。”

当然，我认识到为艾森豪威尔竞选的热潮以及进步党人和州权民主党人的背叛在选举那天会占去我一部分选票。但是，我知道我负有责任来继续贯彻民主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曾经使国家摆脱萧条的深渊而达到繁荣和居于世界领导地位；我也相信，只要让美国人民了解事实，他们也会愿意继续实行这个纲领。因此，我决心把事实告诉他们。

第十四章

費拉特尔費亞代表大会

自从西部旅行归来于6月18日回到白宫之日起，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于7月12日开幕之日止，我几乎没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我主要忙于联邦政府的行政事务。至于我个人的事和我在政治上的责任，只能根据情况作适当的安排。

然而，总统有可能在白宫里的电视上看到代表大会开会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我能在不离开工作的情况下亲眼看到在費拉特尔費亞进行的一些重要事情。其他一些通向民主党全国总部的通讯线，也使我能经常地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因此，那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不知道的。

根据安排，在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开过之后，密苏里州州长唐纳利将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提名我为候选人。我计划于7月14日出席代表大会，亲自接受这次提名。

在我看来，一次全国性政治会议的工作往往是一种巧妙的操纵。对执政党来说，会议大体上如何进行，早已由总统、主席和执政党的领袖事先就计划好了的。

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宣布代表大会开会以后，便选出大会职员。三个主要的职位是：常任主席、大会秘书和议事长(Parliamentarian)，后者的职权是使代表大会有秩序地进行。下一步便是任命一些负责资格审查、规程、纲领和决议以及常设机构的委员会。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和众议院中的议事程序相同。

任命了委员会之后，接着便展开工作，允许发表演说，在代表

大会中間對他們各自的候選人進行一般的宣傳鼓動工作。一旦資格審查委員會作了報告，規程委員會也就大會議事程序作了報告之後，下一步的重要工作便是通過綱領。這項工作要到撰寫綱領的決議委員會對大會作的報告準備好了的時候來做。

如果決議委員會對綱領中的某些條款有不同的意見，少數派將把這個問題提交大會討論。當然使得1948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陷入最熱烈的論戰的乃是有關民權的條款。而且在第三天，這還促使南方各州的三十五名離開會場而另行組織州權民主運動。

綱領通過後，便要進行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往往伴之以非常熱鬧的場面，發表演說、列隊炫示和熱情高呼。在各州和各領地都提名之後，便開始唱名投票。當然，如果沒有一個被提名的候選人獲得多數票，那就得再舉行一次投票。投票一直繼續下去，直到有一個候選人獲得多數票時為止。1936年採用了簡單多數票制，那一次便將民主黨代表大會長期來一直沿用的三分之二多數票的規定取消掉了。

總統提名被通過之後，大會接着便進行副總統的候選人提名。副總統候選人選出之後，大會休會，這個黨便出去進行競選了。

在1948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誰可以做副總統候選人，當時是有些問題的。全國委員會主席霍華德·麥格腊從費拉特爾費亞打電話告訴我說，代表大會主要成員無法決定候選人，雖然他說，他們大多數希望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做候選人。麥格腊要我設法勸說道格拉斯接受這個提名。

以前，我曾經有一次設法讓他對政治發生興趣，在1947年2月請他接替伊克斯充任內務部長。道格拉斯當時說，如果我堅持一定要他干，他將接受，但是他已下定決心把最高法庭當作他的事業。他說，“當羅斯福總統指派我到法院工作時，我起初還不太樂意，但是，一年之後，我逐漸喜歡這個工作了，這個工作適合我，對

我的胃口，我下定决心把它当作我的終身事业。”道格拉斯对我說，他想和最高法院院长哈伦·斯通商討一下这件事情。以后，道格拉斯告诉我說，“最高法院院长說，我們在法院的任期未滿，他耽心我可能接受这个职位。”当天，最高法院院长来看我，以他那种溫和的語調对我說：“請您不要打扰我的法院好嗎。”我以同样溫和的語調回答說：“您應該让比尔去作决定。”一星期以后，道格拉斯法官来到白宫告诉我說，在和最高法院院长商談过这件事之后，他已决定留在法院工作。

当道格拉斯法官行将离开时，他說：“您知不知道，在1944年罗斯福的候选人名单中，您是我提出的接替华萊士当副总统的候选人？”我問他道：“你知道我提出的候选人是誰嗎？”道格拉斯回答說：“当然，您提的是杰米·貝尔納斯。我认为我在那件事上的判断要比您的判断正确些。”

麦格腊打电报来要我提出一名副总统候选人，接到这个电报后，我便給道格拉斯法官接上电话，他当时是在离俄勒岡州的洛斯特汀十六英里的野营地休假。我对道格拉斯說，我希望他做我的候选人名单中的副总统。电话声音很差，我能听得清楚的只是，他要和他的家人和朋友商量一下，并于第二天从俄勒岡州的波特兰打电话給我。第二天是星期六，道格拉斯从俄勒岡州波特兰的本逊旅館打电话来。我們大約談了十分钟，道格拉斯問及他是否可以在星期一給我作最后的答复。道格拉斯說：“我願意做副总统候选人，虽然，正如我去年所說的，我已决心留在最高法院里工作。”我告訴他我将一直等到星期一。星期一，他打电话給我說：“很抱歉，但是我已决定不进入政界。我想我不應該拿法院来作为踏脚石。”我回答說：“我很失望。这太不幸了。”道格拉斯法官后来来看我，并說：“外面流传着不公正和恶意的传说，說我使您，总统先生，为了等待答复而悬着不定。那是不真实的，我非常难以作出决定。

我在感情上是完全願意做您的副總統候選人的。我拒絕您的唯一的理由，正如您要我參加您的內閣做內務部長時所決定的，我的願望是想留在法院里工作。”

就在我得知道格拉斯拒絕參加候選人名單的前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參議員巴克萊從費拉特爾費亞打電話來。參議院秘書萊斯利·比弗耳正在與巴克萊通電話，但是還是這位肯塔基州的參議員自己來問我，如果他試圖被提名為副總統，我會不會反對。比弗耳接着補充說，如果我同意，他確信巴克萊能被提名。

我對巴克萊說，“為什麼你不告訴我你希望當副總統呢？我是同意的啊。”這次談話以後，這兩個人便去進行工作，到時候大會便提名巴克萊。

我贊同巴克萊做我的競選伙伴並非是一時的衝動。長久以來，我便把他尊之為參議院中最能干的辯論家。他是一個勤奮、誠實的政治家，是民主黨中最孚眾望的人之一。由於巴克萊是深受南部歡迎的候選人，他便成了1948年同我一道參加競選的一位理想的伙伴。

7月14日，我和家里人以及白宮的工作人員一同登上了總統專用火車。在去費拉特爾費亞的路上，我在無線電里便聽到唐納利州長在提名我做總統候選人時所發表的精采的演說，到達費拉特爾費亞之後，在火車上吃了中飯，便同我黨的一些黨員一道到代表大會大廳去。

當我到達時，大會正在進行最後的劇烈辯論，投票還沒有開始。巴克萊和我被帶進大會下面一層的一套專用房間里。這是一小套房間，供演員們化裝之用，有一個可以眺望費拉特爾費亞全城的陽台。遠處是特拉華河，但是賓夕法尼亞鐵路車站的貨棧就在眼前，而城卻分散在外圍各處。

這是一個悶熱而粘濕的夜晚，儘管陽台上還是舒適的。當我

坐在那儿，等待着代表大会最后的議程結束和来通知让我去接受提名时，与往常一样，我让我的思路追溯到美国的一个半世紀以前的政治生活。我沉思于在我以前的三十一位总統中某几个的經驗，沉思于他們在代表大会上和竞选运动中的情景，那种情景浮現在我眼前，就像我目前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是被迫坐在那个阳台上在等待中度过那漫长的四小时的，因此有时間来进行回想。而且，四周围是异乎寻常地安靜，我似乎远远地离开了这个拥挤的大厅的代表大会的喧嚷和吵杂声。我現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涌現在我脑海里的那些情景。

我沒有感到不耐煩，当我在等待着那个最后終究会叫我到代表大会大厅里去的迟迟不来的通知时，我在思考着我国的早期历史，那时根本沒有政党和提候选人的代表大会。当我坐在阳台上时，我就眺望着費拉特尔費亚的市政大厅和大厅的高高塔頂上的威廉·潘恩^①的塑像。这使我想起了威廉·潘恩所建立的这个“友爱之城”中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想起了东面那个座落在切斯特納特大街上的独立大厅。

乔治·华盛顿由于在革命战争中的軍事貢獻，是远远走在他的同时代人前面的一位領袖。在革命战争之后和他出任总統之前，他在費拉特尔費亚这儿主持了立宪會議，因此在建立我国政府的形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样，他可以說是在两方面是我們的“国父”，这可以說明为什么人們对他几乎沒有有什么党派成見，至少在他总統任內初期是这样的。对于我們这个时代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民来說，这位伟大的美国人是出类拔萃的。他并不是一位职业軍人，而是一位最优秀的公民兼軍人。他是在志願軍部队里从最低层經過艰苦奋斗而升到最高职位上的。

^① 威廉·潘恩(1644—1718)，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奠基人。——譯者

当我的思路轉向华盛顿和早期的共和国时，我回忆起人們是如何开始經受到制訂宪法的困难，那就是使宪法成为人民的工具而不是成为特权者的工具。在第二任总统約翰·亚当斯政府任內，对宪法解释的趋势是愈来愈袒护那些控制土地和銀行的人。但是托馬斯·杰斐逊却主要是通过个人通訊联系，激起了輿論上的高潮，在与阿隆·伯尔經過长期而复杂的联合选举之后，而于1800年当选。

杰斐逊当选总统之后，他繼續运用其組織才能，并很快地就能通过各委员会主席和两院中最有影响的人控制国会。他是一位干练的政治家，这有助于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領袖。一个总统必須是一个政治家，以便使大多数人追随他的綱領。

当杰斐逊卸任之后，詹姆斯·麦迪逊繼續实行他的政策，接着下来便是門罗的沒有党派可言的“和諧时期”，因为，大約有二十四年的一段時間，民主党人——当时被称为共和党人，因为他们主张实行共和政体而不主张实行君主政体——从上至下完全控制了政府。

我心中念念不忘的事情之一是，作为党的首腦，我要留下一个蓬蓬勃勃的局面，把它作为一个最受大多数人民欢迎、坚持原則的坚强的党而移交給我的继承者。

在那个費拉特尔費亚阳台上，我回忆起1824年的三个方面的斗争，当时，国会党团提名会那种旧制度被废弃了，代之以現代的代表大会。这一运动是在田納西州开始的，这个州通过決議，号召結束党团提名会这个办法，理由是这种做法不合乎宪法，不明智。当时党团提名会在开会，并提名威廉·克劳福德当总统，而在州代表大会上很快又提出了另外三个候选人——田納西州是杰克逊、俄亥俄州是克莱，馬薩諸塞州是約翰·昆西·亚当斯。

这在許多方面說来是个不平常的选举年。每一个州都有它自

己的选举日，从开始投票到得知最后结果要花费六个星期的时间。而且，候选人中没有一个获得大多数选票，三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则送交众议院，由它选出总统。

克莱是获得选票最少的一个，因此，他可以自由地运用其影响，以确保其他两个候选人中的一个当选。有人指控他与亚当斯做了一笔交易，他要求在亚当斯内阁里担任国务卿一职，作为取得他的支持的报酬；然而，我是从来就不相信这一点的。不过，安德鲁·杰克逊却是那些认为克莱卖身投靠亚当斯的人之中的一个。的确不错，虽然杰克逊在选举人团投票时获得九十九票——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一个——但他却在众议院里落选而败给亚当斯了。自然，他是个党派观念很强的人，他也怀疑约翰·卡耳豪恩在1824年那次选举运动中被收买了。若干年后，当杰克逊离开白宫时，有人问他，他是否认为有什么事没有办完，据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原要绞杀卡耳豪恩和打死亨利·克莱！”

我国早期的真正的政治斗争发生在1828年，当时，近代化的政党已以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形式组织起来了。杰克逊被称为是“人民的人”，像杰斐逊那样，主张广泛地解释民主。亚当斯再度出来竞选，支持他的是那些控制合众国银行(United States Bank)的人以及那些反对在没有私人企业集团监督下而移民新西部的人。亚当斯还得到反共济党^①的支持。他常常断言，杰克逊是在共济会的支持下赢得1828年选举的。亚当斯在后半生是一个剧烈的反共济党党员。

^① 反共济党(Anti-Masons)，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全国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已渐趋式微，该党利用共济会会员威廉·摩根因心怀不满而被其所属组织杀害一事所引起的民愤，来组织一个名为反共济党的新党，以反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杰克逊(因为他是个共济会会员)。在1828年的大选中，反共济党声势日大，取代了全国共和党。到1836年，该党大多数党员即并入惠格党。

——译者

我始終喜欢杰克逊的一件事情是，他把基本問題提得非常明确。人們知道他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杰克逊將軍的朋友們”——他的支持者們这样称呼他們自己——一直认为他是代表美国普通人民的利益的。在选举中击败了亚当斯之后，他履行了他竞选綱領中的諾言。他使得合众国銀行破产，并彻底击败了联邦党。据說，許多联邦党的領袖，包括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內，是受合众国銀行雇用的。

由于杰克逊在 1828 年当选并且又在 1832 年再度当选，提名代表大会便作为选择总统候选人的永久性的办法而被建立起来。而且，各州总选举日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由于采用了这种群众大会的办法，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小党派，如像反共济党、“无所知党”^①、平等权利派(Equal-Righters)以及其他一些党派。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杰克逊的领导下，民主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党的自由理想得以付諸实施，而有利于人民。

同时，惠格党^②成立了，它反对民主党的主张。在 1836 年，他們的候选人是威廉·哈里逊，但是杰克逊在巴尔的摩召集了一次民主党人全国代表大会，提名馬丁·范·伯伦作总统候选人，这位“小魔术师”的提名为大会通过，而且大部分是依靠杰克逊的影响

① 无所知党(Know-Nothings)，1843年成立，原名美国人党，成員主要是持沙文主义的北方蓄奴拥护者。它反对当时向美国移民，反对外国出生者，反对天主教徒和黑人。該党是一个秘密組織，党徒遇到有人詢問时，只答以“我不知道”，因此有“无所知党”的称呼。該党因 1856 年大选失利开始解体，1860 年正式解散。——譯者

② 惠格党(Whig Party)，1824年由少数人組成小組，1834年正式定名为惠格党。在三十年代与反共济党等联合起来反对杰克逊的民主党。主要代表北方工商企业集团利益，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維護国会权利。1840年該党威廉·哈里逊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总统。到 1852 年，該党在奴隶問題上意見分歧，陷于分裂状态，加之該党主要領袖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大选中先后死去，1854 年終于解体，其黨員大部分参加了于 1856 年新成立的共和党。

——譯者

而当选为总统。

我想起了1840年的选举，这次选举之前的竞选活动是我国历史上最奇怪的竞选之一。惠格党又推举哈里逊当候选人，他们根本就没有纲领。只不过是有一些口号为基础的低级宣传运动而已，其中主要一条是“苹果酒和小木屋”，甚至连哈里逊自己从来也没有住过小木屋。他是弗吉尼亚一个富翁的儿子，他个人几乎没有参加竞选运动。然而范·伯伦的竞选工作也做得很差，由于他自己的表现，也由于惠格党提出“提珀卡努^①和泰勒^②”这个口号和1837年的大萧条，他遭到了惨败。

泰勒由于哈里逊的突然去世而在当选副总统后一个月內便当上了总统，我把他称之为惠格—民主党人。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曾经宁愿从参议院辞职，也不愿意投票赞成从档案中撤销对杰克逊总统的谴责。但是他在惠格党人中是不孚众望的，因为他不愿意让他的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亨利·克莱管理政府。韦伯斯特企图使泰勒做个“代理总统”，但是泰勒说，他是作为总统而就职的，他要做个总统。他组成了一个新内阁，但不让阁员们吩咐他做些什么。

常常有人指责我有点儿固执。我的这种固执或许来自泰勒，因为他是我的祖先的近亲。无论如何，他对总统这一职务的做法我是完全同情的。不管人们对我还要说些什么，我还是要清楚地表明，只要我在白宫一天，那我就要把政府的行政部門管起来，除了担任总统职务的那个人外，任何人不得以美国总统的资格行事。这招致了若干困难，如果我不那样做，这些困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① 1811年，威廉·哈里逊在提珀卡努(Tippecanoe)和印第安人作战，因采取奇袭战术而获胜。这里系以该地名来称呼哈里逊。——译者

② 约翰·泰勒被惠格党认为是对南方各州选民富有吸引力的人，因此提名他作副总统候选人，以资号召。——译者

但是，我像泰勒一样，决不願做一个“代理总统”。

我想起了泰勒的继任者詹姆斯·波耳克。他是巴尔的摩民主党代表大会开了很久的会以后才提出来的候选人，在这段时间内，代表大会无法在候选人上取得一致意见。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黑马”^① 候选人——是众议院的议长，他非常积极支持杰克逊。附带说明一下，他是我国历史上大大被忽视了的一个。当他竞选时，他就声明说，他不想参加下届总统竞选。他在四年的任期中实现了他的纲领，辞职后两个月零十一天便去世了。

波耳克必须对付的主要问题是并吞得克萨斯和解决与墨西哥的纠纷。他建议以四千五百万美元收买所有那片美国土地包括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但是他没有能使墨西哥同意这笔交易。结果，美国为了边境土地问题和墨西哥进行了战争，然而，在战争结束后与墨西哥解决这个问题时，波耳克还是保证付给墨西哥人一千五百万美元，以交换那一片极大的土地，使其成为大陆美国的一部分领土（购买路易斯安那除外）。

波耳克是一个有魄力的人。他提出得克萨斯和俄勒冈问题等作为竞选口号，在代总统任期期满之前，他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墨西哥战争产生了一位军事上的英雄，惠格党根据他在军事上的功绩将他送进了白宫，这就是扎卡里·泰勒。他对政治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一套处理政府事务的手段。结果由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来管理政府。韦伯斯特正如他在哈里逊和泰勒两位总统任内一样，仍然是国务卿，并且在泰勒死后仍然担任这个职务，泰勒是在他当选总统一年半之后逝世的，他死后总统一职由副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充任。据说，泰勒是在7月4日独立纪念日那天因西瓜吃得太多和饮樱桃酒过猛而去世的。

^① “黑马”原为赛马中用语，意谓实力难测的马，这里指出人意料的有效后选人。

富兰克林·皮尔斯是新罕希什尔州的一位美男子，他并不需要为 1852 年的总统职位努力。惠格党人因为奴隶问题而势力衰落了，他们的两个重要领袖克莱和韦伯斯特也在同年死去了。民主党人提名皮尔斯做候选人，他在竞选运动期间呆在家里，而惠格党的候选人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则走遍全国发表竞选演说。当时的形势是，斯科特的支持者分裂了，而皮尔斯尽管没有竞选纲领，却凑巧为北方和南方人所欢迎。斯科特被完全击败了。

外表长得漂亮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往往起着积极作用。像哈定一样，皮尔斯之所以被选上，部分原因是“他看起来像一个总统”。在墨西哥战争中皮尔斯是斯科特手下的一个陆军准将。皮尔斯是个志愿军，斯科特则是个正规军人。两者被提名为候选人都是因为他们在军事上的功绩使他们出了名。我从来不认为名气和长得漂亮是决定政府行政首脑的基本条件。一个总统必须知道他往何处去和为什么往那里去，他必须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信心。

纵观历史，那些竭力想办好事的人往往遭到迫害、曲解甚至暗杀。但是他的主张终究会占上风，并为人们所接受的。

一个人选为选票所左右，或者害怕他作出的决定会损害自己的威望，那他就不能算作是一个代表我国福利的人。如果他是对的，不管报纸和特定的利益集团是否喜欢他的作为，还是对他说什么，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一向认为，大多数人民希望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总统是正确的，并能使人们了解，他总能说服他们。以我个人而论，当时 90% 的报纸是同我作对的，如果把这些报纸作为传达工具，那实在成问题，所以我不得不作许多次长途旅行，以便能让人们了解我。

一个总统不能总是受人欢迎的。他必须要能够说个“是”和“不”字，而且对那些为了这件或那件事常常拉白宫后腿的党派集团和特定利益集团所提出的大多数建议要能够多说几个“不”字。

如果一个总统易为人所左右和热心于同报纸和选民保持一致，那他便是一个十足的庸人。我国历史上每一位伟大的总统都有他自己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终究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我想起了詹姆斯·布坎南，他是一个妥协时期的妥协候选人。1850年的妥协方案早在六年之前就提了出来，作为南方和北方间在奴隶问题上避免发生战争的一种尝试，但是这只是把问题拖延了一下。民主党人由于斯提文·道格拉斯参议员提出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而开始分裂了。在争论的大部分时期内住在英国的布坎南，由于人们认为他同争论的双方没有联系而成了1856年最“有当选希望的”候选人。

这次竞选运动产生了共和党。惠格党人散伙了，他们的残余分子在新党中又因奉行联合反对奴隶制的路綫而重新恢复了力量。这个新党在费拉特尔费亚举行了第一次候选人提名代表大会，并选出了约翰·弗里芒特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在1856年秋进行的、以“自由土地、自由言论和弗里芒特”为基础的竞选运动，与惠格党人在1840年进行的“苹果酒与小木屋”竞选运动的马戏团式的表演有类似之处。这个新党在选举中只差一筹而败给民主党人，但是它不断积聚力量以争取1860年的胜利，当时亚伯拉罕·林肯是候选人。

对于我来说似乎很巧，当我坐在那儿等待代表大会的传呼时，我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或许与1860年民主党的分裂最相近似了。在1948年那个时候是南方民主党员和进步党人的背离。在1860年，在南卡罗来纳的查理斯顿召开的代表大会经过了五十七次投票之后没有能一致选出一个候选人而休会了。南方民主党人退出会场并在他们自己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选出了约翰·布雷肯里季当候选人。北方和西部的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重新召开了代表大会，最后选了斯提文·道格拉斯做他们的候选人。在保守分子中

有一个分裂出去的小党名叫宪法联合党，候选人是約翰·貝耳。但是共和党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这个裂口，林肯以多数选举人票但却以少数选民票而当选总统。

因此，在 1850 年代的后期，两党制垮台了。南方民主党分离出去，共和党人在内战时期和内战之后，从 1860 年到 1884 年一直保持着对政府的控制。战争年代对林肯来说是困难的。如果联邦军队没有在 1864 年取得胜利，他就很有可能要输给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克累伦，后者是以“停止战争”的纲领为基础来进行竞选的。但是林肯再度当选。在 3 月份总统就职典礼后不久林肯被刺身死，他的竞选伙伴安德鲁·约翰逊便成了总统。约翰逊与其说是一个共和党人，还不如说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在林肯的建议下以林肯的“美国联邦”政纲来参加竞选，充当边境几州的代表，以弥补总统在那里的威望不足。林肯曾因缅因州的汉尼巴耳·汉姆林缺少联邦政纲而把他免职。林肯在 1864 年是靠美国联邦政纲而不是靠共和党政纲当选的。

约翰逊是所有诸总统中最受虐待的一个。报纸几乎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以七百二十万美元购买阿拉斯加一事——都加以无情的攻击。报纸把这块新领土称之为“约翰逊的俄国仙境”和“西华德冰箱”^①，约翰逊政府受到报纸舆论和激进共和党人的夹攻，是我国历史上处境最恶劣的政府之一。我对他很表同情，因为我碰到了许多类似的反对意见。

如果一个人没有背景和在政治上没有经验，而又打算竞选美国总统，那就必须有另外一些有利条件。一般来说，军事事业是政治事业的前奏。华盛顿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杰克逊在新奥尔良赢得 1812 年战争^②中仅有的伟大胜利，虽然他是在和约实际

^① 威廉·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 1865—1869 年为约翰逊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购买阿拉斯加的当事人之一。——译者

簽訂之后才获得这次胜利的。泰勒尔由于布納—維斯塔一役而出了名。內战产生了四个后来成了总统的将军——格兰特、海斯、加菲耳德和本杰明·哈里逊。

格兰特是典型的军人总统。他对政治上的一套一无所知，但是他能以一向由军事胜利所带来的威望而走进白宫。当战争以胜利而结束时，人民往往怀着感恩和兴奋的心情，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将最高的政治职位的荣誉赐给那些军事英雄们。

格兰特在他的一生中只在1856年投了一次票，他当时是投了民主党的票。事实上，他是民主党在1868年必然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同约翰逊总统的决裂使他看起来像一个激进共和党人。他犹豫了很长一个时期，对两党都不谈他的意向，最后改变了他的政治主张，以共和党的政纲参加了竞选，赢得了微弱的选民多数票。

威望和长得漂亮只是赢得总统选举胜利的部分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运气。以我而论，我的运气就一向不错，虽然我从来没有意思要让事情为我开路。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企图要使自己当总统，他很少能达到目的。亨利·克莱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对他将当选总统是这样有信心，以致他两次拒绝了副总统的职位，而在这两次，由于总统的去世，他本来是可以继承这个最高职位的。另外一个这样的人是詹姆斯·布莱恩。我深信，当我坐在那里等待着被叫去参加代表大会时，托马斯·杜威是另一个这样的人，他为了做总统作了极大的努力，他的愿望将永不会得到实现。

一个总统管理政府需要有政治智慧，但是他可能没有这种智

② 1811年英国策动印第安人与美国的边疆部队发生冲突，1812年6月，美国两院先后通过对英宣战案。1813年大败英军。1814年1月到7月杰克逊曾在佐治亚州多次打败印第安人，强迫他们签订和约，掠夺了印第安人在亚拉巴马州的大部分土地和东、西佛罗里达州的毗连地带。——译者

慧而当选。人民在挑选他们的总统时，往往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在格兰特第二次被选为总统时，主要因素是金钱。他没有进行任何竞选活动，而他的助手却在每一个能为他获致选票方面都花了大量的钱。尽管自由共和党人背叛了他，提名《纽约论坛报》总编辑霍勒斯·格里利为总统候选人，他还是在辛辛那提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获胜了。

格里利曾得到某些民主党人的支持，而纯粹的民主党人则支持第三个候选人查尔斯·奥康纳。格里利的失败由于托马斯·纳斯特（共和党党徽大象的作者）的漫画而加重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在选举后三个星期便死去，是参加总统竞选的人中受打击最惨重的人。我一向认为，新闻工作人员不是政治类型的人，正如政治家不是新闻界的人物一样。

1876年的选举是最混乱的选举中的一次。塞缪尔·提耳登——民主党提出的候选人——被选出来了。但是，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南方三州的俄勒冈州的选举人票发生了争执。提耳登仅只需要再多一张选举人票就行了，但是，腊瑟福德·海斯是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当国会违反宪法而任命了一个选举委员会来决定选票归属时，他被宣告当选了。

格兰特总统对当时的形势非常忧虑，因此使海斯在3月4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即就职典礼的前一天，宣誓就职。民主党人威胁说，“提耳登或流血”，但是提耳登却说，他不会驱使他的追随者为选举而作战，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前途是会光明的。海斯是一个好总统。他命令联邦军队从南方撤回去。

在1880年的代表大会上，民主党人提名一位体重二百五十磅的将军温菲耳德·斯科特·汉考克当候选人。他曾经在第一天就扭转了盖特斯堡战役的战局，使其对北方有利。在1880年，共和党人严重地分裂了，一部分人支持格兰特，另一部分人支持布莱恩，

还有一部分人則支持約翰·薛尔曼。詹姆斯·加菲耳德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演說，提名薛尔曼当候选人。代表大会陷于僵持不下的局面中。据說，腊瑟福德·海斯与代表大会主席保持了接触，根据为提名薛尔曼作候选人所发表的那篇演說，建議提名加菲耳德作候选人。

加菲耳德当选为总统，切斯特·阿瑟当选为副总统。曾充当过紐約港海关稅务員的阿瑟之所以被提名是出于权宜之計，但是加菲耳德就不是这样的了。后者虽然是內战中的一位將軍，却成了一位好总统。我深信，任何一个真誠地想要履行其总统职责的人在总统任期内都是不会沒有一番作为的，然而，加菲耳德却没有时间来施展其鴻图，因为在他就职典礼后不久的6月里便不幸遇刺，并于同年9月去世。

民主党当时已有許多年不执政了。这个党于1884年在格罗弗·克利夫兰的领导下加强了陣营，他的对手是共和党候选人、素以“緬因州的高傲的騎士”聞名的詹姆斯·布萊恩，但是克利夫兰当选了。然而，这次的竞选运动却是很剧烈的。报纸毫无掩飾地极尽謾罵之能事。这还不算，这种謾罵和批評在其后的四年一直沒有断过。克利夫兰在1888年又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那一年的选举中实际上比他的共和党对手本杰明·哈里逊获得了更多选民的选票。尽管如此，他却在选举人中失敗了。在竞选运动中把关税作为一个問題的哈里逊，尽管获得少数票，还是当选为总统。四年以后——1892年——克利夫兰进行第三次竞选活动，再度被选为总统。克利夫兰是依靠“十亿美元”国会再度当选的，这届国会在两次會議中花費了十亿美元，据說这便导致了1893年的恐慌。克利夫兰为一系列的罢工和騷动所糾纏，但在他的第二次任总统期内民主党与往常一样，是站在自由这一边的。可是总统就不是这样了。他成了一个极端的保守派。他的大儿子在馬里兰的

巴尔的摩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共和党人。

1896年的竞选运动是我个人非常注意的第一次竞选运动，四年以后，当我十六岁时，我在堪萨斯市民主党代表大会中当一名侍应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二次提名威廉·詹宁斯·布雷恩当总统候选人。

在1896年的芝加哥代表大会上，布雷恩发表了那篇“金十字架和带刺的王冠”的著名演说，从而赢得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资格，他那时只不过三十六岁。他是我心目中的一位英雄。我还记得，当布雷恩在堪萨斯市古老的会议大厅中发表演说时，大厅里一共坐了一万七千人。没有扩音器，一个人必须得有一个真正的声贯遐邇的好嗓门，才能使得整个大厅听到他的演说。在1900年的代表大会上，另一个人想要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这就是俄亥俄州的賈德森·哈蒙。他登上了讲台，即将发表演说。这时布雷恩走上讲台，每个人都站起来欢呼。布雷恩说：“你们为什么不给俄亥俄州的州长以发表演说的机会？”哈蒙又试了一次，但是喧嚣之声不停，他就只好下去了。布雷恩接下去演说。代表们对于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以致他立即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用口头表决方式。他那一天的魅力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听说过的。他有一个声贯遐邇的嗓门，而且深知如何运用它。

1896年，尽管布雷恩在人民中很有威望，共和党和“金”民主党人^①还是选举了他们的候选人。四年以后，麦金莱再度当选，1901年宣誓就职，同年9月遇刺身死。

麦金莱有时被描绘成为“马克·汉纳扶植的总统”。汉纳是克利夫兰州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参议员，他实际上是收买了这次选

^① 布雷恩当时的竞选纲领是“自由地铸造银币”(free silver)，遭到民主党党内一部分坚决主张保持金本位的人反对，这些人称为“金”民主党人。

举的，而麦金莱则呆在家里，只是对那些常常到他家里来的一些代表们发表谈话。这是第一次“走廊”竞选运动。我不赞成“走廊”竞选运动。他不是走出大门，亲自和人民见面，争取他们的选票，我从来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人被选入白宫。

威廉·麦金莱的继任者——特迪·罗斯福是我生平所看到的第一个总统。那时是1904年，罗斯福在麦金莱死后继任总统的期限即将结束，他希望凭他自己的权利来竞选总统。那时他在横贯中西部的旅行中到达堪萨斯市，我则正在国民商业银行中工作。我跑到第十大街的拐角处，只是为了去看一下总统是个什么样子。罗斯福发表了一篇精采的演说。我失望地看到，他并不是一个巨人，而是一个因为穿了一件长的阿耳伯特王子式的外套而显得高了一些的矮个子。我当了总统以后，时常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我发现，人们往往是跑去看“总统”而不是看他本人。几十年以前，我同样是跑去看“总统”，当时的总统是特迪·罗斯福。

1912年帮助民主党人重新回到总统宝座上来的是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在1908年挑选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做他的继任者。然而在塔夫脱任期未滿之前，特迪便对其政绩表示不满，他想自己被提名作总统候选人。对一个共和党人来说，特迪是很左的——但是就民主党人来说，他还是中间偏右的——并且把保存自然资源和限制“大富豪罪恶分子”之类的许多自由观点付诸实现。塔夫脱则是一个极端的保守者，并偏袒特殊利益集团。他是不愿意运用总统的全部权力的。

虽然塔夫脱遭到了他的党半数以上人的反对，但是他是在职总统，就凭这一点，他控制了1912年的代表大会。甚至连拥有大批追随者的罗斯福本人也不能够改变那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实。他撤开了共和党代表大会，使自己列入“雄赳”候选人名单。这次塔夫脱被击败了，民主党人由于选出了我们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伍德罗·威尔逊而得以重新执政。

威尔逊在他的第一届总统任内实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如像联邦商业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关税改革，以及其他许多对公众有利的改革。在他的第二任总统开始后不久，美国便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非常反对卷进欧洲冲突的，并且尽了最大的努力置身于其外。他在1916年同查尔斯·休斯的竞选就是以下列口号为基础的：“他使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他依靠这个口号和他的“新自由”成就而获胜。

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一个总统能够使我们既置于战争之外而又仍旧保持美国政府的主权。1918年，通过他的“十四点”演说提出了一项争取公正和平的计划，的确使战争停止下来了。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直到他的任期结束，威尔逊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从事于建立国际联盟，以确保世界和平。由于他在参议院中遭到反对，他竟因操劳过度而最后得了治命的中风症。

在1920年的竞选运动中，人们厌倦战争，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华伦·哈定争取“恢复正常状态”——不管那意味着什么——的诺言感到兴趣。哈定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人物，是由保守主义者和私有财产势力选出来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他是在历届代表大会上所选出的最黑的马之一。他之被提名不但对他来说、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这次的角逐本应该是伦纳德·伍德将军和弗兰克·娄登州长之间的事，但是在选举无法表明究竟对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有利之后，政治头脑们便聚拢来，并选择了哈定，“因为他看来像一个总统”。这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一个名词“烟雾弥漫之室”，讽刺代表大会的后面有人在拉线操纵。“烟雾弥漫之室”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是哈定之被提名，却戏剧性地表现了 this 陈腐用语，使它永远流传下去。卡耳文·柯立芝由于当马萨诸塞州长时在波士顿指挥了一次警察罢工，被选为哈

定的竞选伙伴。

那一年，共和党人获得了一次大胜利。作为民主党竞选人而参加竞选的是俄亥俄州长詹姆斯·柯克斯和海軍部威尔逊的部长助理弗兰克林·罗斯福。柯克斯州长是一个出色的議員，俄亥俄州有才能的州长。他本是可以做一个好总统的。

当柯立芝因哈定逝世而于 1923 年继任总统时，他宣布他将在下一年做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口号是“一切照旧”，虽然维尔·罗杰斯是另外一种表达法：“同柯立芝一道保持冷静，不要轻举妄动。” 1924 年，在一次多年来最混乱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一次又一次地投票表决，设法在威廉·麦卡杜和艾尔弗雷德·史密斯两个人之间决定一个，后者是弗兰克林·罗斯福提名的。根据第一百零三次投票表决，代表大会最后提名约翰·戴维森作为一个妥协性的总统候选人。我记得，当我在杰克逊县当县法院的东区法官时，在收音机中收听了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民主党发生了巨大的分裂，柯立芝取得另一次的共和党大胜利。

我回忆起 1928 年在豪斯顿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那一年有两三个当地人被提名，其中包括密苏里州的吉姆·李德。但是阿耳·史密斯却被提名为候选人，这就抵销了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向是最罪恶的反天主教徒、反犹太人和反黑人运动。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三 K 党恢复活动以来，其影响几乎已达到了顶点，不断进行的诽谤与中伤比我所记得的任何时候都要剧烈。

共和党人那年在堪萨斯市举行了代表大会，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应付他们的开支。作为县法院的审判长，我附带地帮助照管局势，因为大会使人们来到堪萨斯市和杰克逊县。因而我比共产党的某些领袖有更多的代表大会入场券。当胡佛被提名时，我是在场的。安德鲁·梅隆控制了代表大会，正如马克·汉纳在提名麦金莱时一样。

在其后的选举中，南方对阿耳·史密斯的反对使胡佛获得南方许多州的支持，他毫不费力地取得了这次胜利。然而，在两年后的大选中，几乎所有那些参加南方公职选举并支持胡佛的人都被击败了。这就是他们必须为1928年“放弃应有权利”而付出的代价。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标志着共和党统治的结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民主党人在1932年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白宫。

在1936年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所获得的大多数票在全国性选举中是空前的，选举人票除八票之外其余全部为他所得。堪萨斯州的阿耳夫·兰敦是失败的共和党竞争者。这是自华盛顿以来我所看到的第一次总统选举。这一年之前，我开始在美国参议院服务。

由于希特勒侵略西欧诸国，罗斯福便决定打破先例，竞选第三届总统。罗斯福选择了亨利·华莱士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虽然杰西·琼斯、保罗·麦克纳特、吉姆·法尔利、威廉·班克赫德也被提名了。但是被定下来的却是华莱士。

1944年，华莱士再度想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花了很大的工夫才使他不再被提名。罗斯福决定让我做副总统，虽然他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但是他又不愿意公开拒绝华莱士。他是世界上心肠最好的人，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巧妙办法来免除他不需要的人，而不是他自己去撵他们走。

在费拉特尔费亚，现在已经过了午夜。从议事厅里不断传来信息。代表们和朋友们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我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1948年7月15日清晨，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自从1944年的代表大会上我被提名为副总统以来竟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转眼之间，我将要在194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座，接受提名作美国总统。置身于这种形势里，正如我在白宫里所经历到的每次重大事件一样，我感到与美国的政府和政治历史

是呼吸与共的。1948年以前的四十次全国选举的预选会和代表大会对我的真实感，与我将出席的这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和发展了一百六十年的极好的自治制度。我能够积极地参与这种发展，对此我既感到骄傲也感到微小。

当然，代表大会制度是有其缺点的，但是我却想不出一个挑选总统候选人的更好的办法。关于需要召开一次总统预选会的议论很多，但是在美国，没有一个人能够负担得起预选会和竞选运动两者的费用。单说体力消耗也是个需要考虑的不小的问题。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听来似乎很有些道理，但是美国的一些人口密集的中心将在实际上控制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可是，根据我的经验看来，“年轻的乡下人”有时比大城市里出来的专家更能了解美国政治上的需要。

除非联邦政府自己负担起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的费用，如同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参议院所主张的那样，否则个人将没有办法应付这些必不可少的竞选运动的费用。我必须于1934年并再度于1940年在密苏里州为美国参议院进行两次竞选运动，那是一笔极大的费用。我想参议员的预选是对的，但是一个通往总统预选会的实际可行的途径迄今尚未设想出来。

代表大会制度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如果不是成功地进行，那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个制度还没有产生出我们所说的“坏”总统。

对于所有的候选人——地方的、州的和全国性的——来说，理想的情况是，美国所有的人都能在国家的通讯设备面前在公平的基础上听到他们的演说，以致没有一个人由于个人财富，或由于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方面的影响或偏袒等等原因而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当人民消息灵通时，光是靠钱就决不会对政党发生作用。购买官职的观念并不是人民所喜欢的，这一点特别运用于总统。那

就是为什么要对竞选运动的捐款加以限制的原因。

实际上，如要使我們的选举制度实行起来不受到阻碍或危害，那就必須克服两大缺点。在两党中，旧的“老板”制度便是一种邪恶安排。像克利夫兰的馬克·汉納、辛辛那提的吉姆·柯克斯、芝加哥的比耳·湯普森、堪薩斯市的托姆·潘德加斯特、孟菲斯的埃德·克朗普以及其他几十个人，对选择候选人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但是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政治的害处都不比如今的广告——报纸这一工具的害处更大。

广告界的专家們特別擅长于制造“弥天大谎”的技术，很长一段时期，共和党曾得到强有力的广告商、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支持。这种力量的結合能够起到挫败人民意志的作用。

代表大会努力設法在十点钟完成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但是到午夜过后投票才开始。第一次唱票时，我以九百四十七张半选票选为被提名者。一位忠誠的民主党人、佐治亚州的参議員理查德·魯塞尔得到那些拒絕与南方各州的民主党党员一道背离代表大会的南方人所投的二百六十三张票。保罗·麦克納特获得了另外的半张票。接着，艾尔本·巴克萊在欢呼声中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大約在清晨二点钟，通知来了。代表大会正准备听取我接受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演說。

第十五章

竞选运动和胜利

清晨两点，我在好些人的簇拥护卫下走进了楼上的大会堂并登上讲坛。这个巨大的厅堂挤满了疲劳和冒着汗珠的代表，他们已經在这个闹闹哄哄的地方呆了三天三夜了。可是，他们仍然有本领大嚷大叫，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来欢迎我。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反对党为了不让我取得获胜机会所进行的宣传工作——加上我们自己党内的分裂——已經收到了效果。民主党人精神沮丧，气势已餒。我立意要用一些話語使他們振奋起来，使他們知道我們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参加竞选。由总统亲自跑到会场来接受总统提名，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第一个这样做的是弗兰克林·罗斯福，他在1932年被提名后乘飞机来到了会场。我想，这两次的效果是一样的。1948年的这一次使全党得以重新振作起来，正同1932年那次的情况一样。

首先由同我一道走上讲坛的巴克莱简短地作了接受提名的讲演。然后由人介绍我同到会者见面。我曾經研究过其他两三位总统——主要是罗斯福总统的接受候选人提名的演說，我决心在这篇演說中为这次竞选运动先来一个惊人之作。

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說是在代表大会提名以后或閉幕会上的一项正式程序。被提名的人如果有意参加竞选，就必须发表这样的演說，正式表示接受。

我曾經在火車上草拟我的发言提綱，就在大会护卫委员会的成員来到楼下那个房間引領我出席代表大会之前片刻，我又仔細

地看了一遍。我的发言提綱是写在一个黑色的笔记本里，当我等待大厅安静下来听我发言的时候，我把它放到了讲桌上。

我只用了短短的两三句话，就使代表们振奋起来。这几句话是：“参議員巴克萊和我一定会贏得这次选举的胜利，使这些共和党人乖乖地认輸，你們可不要忘了这一点。”这些话全是出乎我的本意，我口里所說的也就是我心里所想的。这里不可能有什么錯誤。我是立意要取得胜利的。

民主党人一直在等待有人肯定地告訴他們說，我們將取得胜利，这种話对他們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他們看到，就在此时此地，有一个身为党的領袖的人，将为捍卫民主党的原則而进行战斗。这就給了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武器。

我从6月間的那次旅行中了解到，在人們为爭取或反对任何事情而进行斗争以前，他們希望知道事情的真相。我感到，在大会代表中間所引起的反应，将同圍繞着火車的群众在听到美国总統直截了当地把事实真相告訴他們以后所引起的反应一样。我并不是在愚弄他們——他們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作了一次措詞强硬和具有战斗性的演說。我数述了历届民主党政府为人民所贏得的好处。我說，“在世界上，从来沒有任何共和国、任何王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农民，过着像美国农民这样欣欣向荣的生活；如果他們不对民主党尽他們的义务，那么他們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負义的人了。”

我指出，工資和薪金已經从1933年的二百九十亿增加到1947年的一千二百八十亿以上。我还說，“这就是劳工的情况，而劳工在政治方面除了有一个朋友外，是从來沒有有什么朋友的，这个朋友就是民主党和弗兰克林·罗斯福。我要对劳工讲一句我对农民讲过的話：如果他們今年不投民主党的票，那他們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負义的人。”

然后我痛斥第八十届国会，强调指出“共和党所照顾的是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个党从一开始就被控制在特权人士的手里，这一点在第八十届国会中得到了具体的证明。……从他们所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得到证明。……”

我详细地列举了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所遭到的种种失败的事实，我一点也没有放松我的敌人。然后，在演说将告结束的时候，我打出了我的王牌。我宣布：

“7月26日那天，也就是我们在密苏里州称之为‘燕青节’的那天，我将把国会议员全召回来开会，请他们通过关于制止日趋高涨的物价和应付房屋危机的立法——而这些事情，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原是表示赞成的。

“同时，我还要请他们同意通过其他一些迫切需要的措施，如拨付补助教育事业的经费——他们说他们是赞成这一点的；制订一个全国性的保健方案；制订公民权利法——他们说他们是赞成这样做的；增加最低工资——这一点我非常怀疑他们会表示赞成；扩大享受社会保险者的范围，增加福利——这一点他们也是说他们表示赞成的；根据我们关于提供公用动力和廉价电力的计划，拨付兴建各项工程所需要的经费。这个第八十届国会企图间接地破坏合众国已经奉行了十四年的动力政策。动力院外集团正同阻挠房屋法案获得通过的不动产院外集团一样坏。

“我将请求为流离失所的人制订足够的和合宜的立法，来代替那项由这个第八十届国会所通过的反犹太人和反天主教立法。

“朋友们，如果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中还包含任何一点真实性的话，我们就应当从第八十届国会的短期会议中看到某些行动。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在十五天之内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办好。然后他们仍旧会有时间离开国会，去参加竞选活动。

“他们企图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们打算尽其所能地在本次竞

选运动中布满迷魂阵；但是我在这里要对大家说，巴克莱参议员和我是不会让他们滑过去的。”

宣布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这件事震撼了所有到会的人，使他们的信心和热情都达到了新的顶点。我告诉这些民主党人说，我们准备接受共和党这个反对党的挑战，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和他们进行搏斗。

当然，我知道，这次特别会议在立法方面是不会取得什么结果的。但是，我认为有理由把议员们召回华盛顿，让他们向全国人民证明一下，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有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我认为每一项同国家的福利事业具有重大关系和包含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立法，都必须毫不拖延地制订起来。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根据他们的纲领办事的。

果不出我所料，国会的“燕菁节”会议从开幕到散会，对我所提出的关于制订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已作出诺言的建设性立法的要求，没有任何反应。共和党的领袖们对我所提出的关于美国人民希望在选举以前看到某些行动的警告充耳不闻，对我在7月27日长达六页的咨文中所提出的建议不予理睬。在丝毫无所作为的两个星期过去以后，特别会议散会了。

现在，准备开展1948年热烈的总统竞选运动的舞台已经布置妥当。我择定在劳工日——9月6日那天发出我开始竞选总统的信号；我的大多数对手也选择了这个日子。在这个战场上，除了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进步党的亨利·华莱士和州权民主党的斯特罗姆·瑟蒙德以外，还包括一些占次要地位的候选人如社会党的诺曼·托马斯等。

我知道，南部的反对分子和华莱士派人士将会搞掉民主党的一部分选票，但是我的敌手还是共和党。这次竞选运动是以这样

一个問題为基础：即維護由民主党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来反对由共和党所代表的和从第八十届国会记录中所表明的那种特权利益。我就是把宝押在这个問題上来参加总统竞选的。

我在劳工日在底特律的凯迪拉克广场所发表的演說，为以后各次的竞选演說定下了基調。我对全国的听众說，“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有时候我的話說得很直率。事实上，有时候我的話說得很粗魯。今天我打算說一些既直率又粗魯的話。目前是劳工和一切参加工作的人的严重关头。我們面临着巨大的危險。此时此刻，劳工的整个前途都决定于一个簡單的問題。

“在这次选举中，如果你們获得一个对劳工友好的国会和政府，你們便大有希望。如果你們获得一个对劳工不友好的政府和国会，那就够你們担心害怕的了，你們最好是小心一点吧。……

“如果让那班制訂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国会人士繼續当权，如果让这些家伙由于选出一个共和党总统而进一步得到鼓励，你們劳工界人士便将遭到一連串切肤之痛的打击。如果你們像在1946年所做的那样，坐在家里不出来投票，而让这班反动家伙繼續当权，那你們就是罪有应得。……

“必須記住，今天的这个反动家伙是一个狡猾的人物。他从許多方面來說都要比二十年代的反动家伙狡猾得多。他是一个心計多端的人物。他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蠱惑家和反动家伙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知道怎样来进行他的宣传鼓动工作。他現在在报刊和广播电台上都拥有許多有力的同盟者。

“如果你們把这个国家的政府置于那些憎恨劳工的人的控制之下，那末，要是政府今后采取措施来摧毀劳工的势力、威信和賺取工資的能力，那你們能怪誰呢？

“我告訴你們，今天，劳工界人士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損失，就必須比以往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

“我从我自己同劳工领袖和工会组织接触的经验中，认识到劳工使自己受到锻炼和与国内其他团体进行合作的能力，都在逐步增长。

“在战争期间，当我作为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就美国工业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了解到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了解并尊重工人和工会领袖们的想法和精神。我接见他们，同他们交谈，曾经在好几十个地方访问过他们的家庭。我曾经在成百个工厂中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工作。……

“劳工界人士一直是不得不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的。你们现在正在为劳工运动的整个前途而斗争。我们大家都是在为了反对那些狡猾的和富有的对手而进行一场艰苦的和顽强的斗争。他们知道他们是得不到你们的选票的。他们的唯一希望是你们根本不去投票。他们把你们估计错了。我知道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争取权利的圣战的胜利！”^①

9月17日，我开始了那次为时较长的竞选旅行。我向准备同我一道进行这次旅行的人员和记者提出了警告，我这次出行，目的是要赢得选举胜利。我对巴克莱参议员说，“我将竭尽全力来进行这场战斗。”“我要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在今后的六个星期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将在旅途中度过，凡是有人希望见到我的地方，我们准备随时停下来和他们见面。

最初，关于我的这次竞选旅行的评论是，这是一场“单人马戏”，认为它不如共和党人所开展的竞选运动那么来得有力量和受到重视。但是，当一群群涌向我的火车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比聚集到杜威的火车周围的人更多的时候，我的对手们开始着急了。

经过俄亥俄州从辛辛那提到克利夫兰的这一段旅程，是在白

^① 在凯迪拉克广场上，到会的人民群众达十万多人，我为他们的响应所鼓舞。这是我竞选运动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天經循辛辛那提、汉密尔頓和戴頓铁路度过的，这要通过一連串小城市，在这些地方聚集起来的群众多得很。前州长劳希，这次俄亥俄州的州长候选人，刚在哥伦布城南面的一个地方登上火車，又想要在哥伦布城下去。在他上車的那个小城鎮，群众有六千到八千人，接下去的一个城鎮群众更多。而到哥伦布城以后，群众是那么拥挤，以至劳希和他的随行人員无法下車进入車站。

“难道一路上群众的情况全是这样嗎？”劳希州长問道。

“是的，”我說，“不过这里的群众比我們在大多数其他地方所見到的群众还少一点。”

“原来这样，”他說，“可是这是我在俄亥俄州所曾見到过的最大的群众場面。”他和我們一同坐車到了克利夫兰。他答应全力支持我們的竞选。

另一段有意思的旅程是从阿尔巴尼到布法罗。当我們一大早从阿尔巴尼車站开始这次旅行的时候，遇到了傾盆大雨，可是聚集在那里的人民群众仍然很多。一路上大雨一直下个不停，而每到一個車站，群众总是拥挤不堪——即使是在那些为共和党国会人士所掌握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情况，就同在紐約的情况一样。

6月間，当我旅行到西部的华盛顿州参加大庫里水壩的落成典礼的时候，我看到大批大批的群众来听我演說。我认为，如果人們对竞选运动所表現的关心，像他們在彪特、蒙大拿、大庫里和薩克里門托等这样一些地方所表現的那样（在薩克里門托車站，清晨七点钟的时候就聚集了一万人，在洛杉磯，有人告訴我說，大街上有一百万人），他們就不可能受报刊的欺騙。

这的确是一次竞选运动。我一直促使我的随行人員紧张地工作，几乎把他們都累坏了。有时候我也曾經把他們全都打发去睡觉，只留下我自己，但尽管我是那样長時間地紧张工作，在这次竞

选运动中，我的体重还是增加了。記者們的报道工作我也督促得很严。

另一方面，一些主要的民意測驗机构，通过报刊和广播电台，直到举行选举的那天，还繼續在那里預言我的失敗。只有农业部的一位經濟学家路易斯·比恩和其他少数几个人在推測民主党有获胜的机会。

我在那些小火車站所采取的办法是简单的和开門見山的，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別的“騙人手法”和修詞学上的技巧。我拒絕接受別人的“指导”。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話老老实实地告訴人們最好認清楚这个事实；这是他們自己的斗争。

我強調指出，如果他們不出来投票帮助我贏得这次斗争的胜利，那么共和党人很快就会再一次来鞭打农民和工人。我直率地和誠懇地向他們讲出这样的話，我警告他們說，如果他們愚蠢得願意再一次挨共和党人的鞭打，那他們实在是活該。

我还把共和党人力图把选民們弄得糊里糊塗的一些問題加以澄清。当我向他們講話的时候，我是把他們看做是具有真正的需要、情感和对某些事感到恐惧的活生生的人。我向他們談到他們的职业，他們的家庭，談到生活費用的問題。我不是把他們看做籠籠統統的一大群人，而是把他們看作生意买卖人、佃农、家庭主妇、已婚的退伍軍人、劳动者、教师以及我作为总统应当對他們表示真正关怀的其他各式各样的人。

在竞选运动中我力图避免談到的一件事情是关于外交政策的問題。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破坏美国所执行的两党外交政策——特别是在进行全国大选的期間，更不应当。我甚至曾經要求在杜威的火車上装設一部打字电报机，以便使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能够随时直接获得有关外交事务发展的消息。我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不想助长那种从党派和政治的利益来考虑外交政策的可能傾

向。我曾經盡量使杜威获得我所知道的关于国际事务这一方面的重要文电。

当时，在我們的外交关系方面存在着許多充滿危險的地方。犹太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已經在真刀真枪地进行热战，我正在极力要使这些人达成一項協議，来停止这场战争。同时，我們还在尽一切努力，使欧洲的一些自由国家得以进行合作，以便对付苏联那种要接收自由世界的威胁。我們正在为爭取裁軍而努力，为爭取正当地控制核子能并使其用于世界和平的目的而努力，任何从党派利益出发来改变这些政策的做法，就会在国内和全世界其他地方造成混乱。我特別耽心的是这种变动将給全世界其他地方带来的影响。

在总统专用的火車上，政府的行政事务还是照常进行。正同我每次离开华盛顿的情况一样，长時間也好，短時間也好，每天总有邮袋从白宫寄到我手里。我经常在我身边保持一批正規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不管总统走到什么地方，白宫的事情都可以随时处理。我还通过装設在火車上的通訊系統用电话同許多人通話，我一直同政府各部門保持着全面的和密切的联系。

做一个总统是不可能摆脱那些紧急的和永无休止的公务的。在一場政治运动中也还是摆脱不了，而且更要加重总统的负担——1948年的情况尤其是如此。我不得不在这年的秋季来进行这场政治运动，这对我來說，可能是最坏不过的一段時間。这是因为我們当时正在同那个冥頑不灵的和可疑的俄国极权政府就外交政策方面的問題进行談判。

我們很快地就把一切傳統的談判方法都用尽了。联合国讲坛——建立这个联合国組織原是为了交換意見和消除分歧——遭到俄国人的破坏，他們想把它变成一个宣传工具；由于俄国人的蛮

不讲理，我們正常的外交途徑受到了阻碍，遭到了挫折。

許多由商业界人士、工业家、教育家和高級軍官組成的专业性使团，都沒有能对改善我們两国的关系作出貢獻，而且連可能改善的迹象也一点都看不到。我追溯每一个可能想得起来的先例，以便求得某种新的和比較有希望的办法。

我想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結束的时候，有迹象表明，在英美关系上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局面。造成这种紧张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而主要是牵涉到我們的远征部队的问题；在美国的好些重要地区，特别是首都华盛顿，都显示出对英国人的某种冷淡态度。

正当这种彼此以冷淡相待的态度发展下去的时候，有一位高贵的客人来到了美国，而且开創了外交史上的新紀元。他就是英国的首席法官里丁子爵，他不动声色地和本着一种令人感到愉快的坦白和直爽的精神，把彼此間存在的大大小小的疙瘩，大部分都給解开了。

里丁子爵来到美国的消息是沒有公开的，沒有人像平常那样事先为他做好宣传工作。他靜悄悄地离开了美国，而他的这次行动，却大大地增进了我們两国的情感。当时很多人都感觉到，他这次使命之所以获得特殊的成功，是由于他訪問得很及时，由于他完全摆脱了那种日常的外交活动和政治活动，以及由于他本人的风度。

我认为，我們所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新方式——而由一个恰当的人来运用这种方式。当前这场竞选总统的政治斗争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为尽管国务院和国防部置身于竞选运动之外，它們却是我的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我們也不可能从其他政治集团中随便找人，因为这个人如果是杜威的同党，那也同样于事无补。

另一方面，华莱士的进步党人在竞选运动中针对两个主要的政党大叫反对“战争贩子”，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声势。他们的这种宣传路线，恰恰就是共产党人所采取的宣传路线。这就使得一个本来已经不妙局面更加不妙了。华莱士所宣扬的这种姑息政策在一些占次要地位的政治集团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些集团不惜任何代价，把那颗诱人的和平丸药天真地吞吃下去。我认为华莱士本人也是他自己那种天真的想法的牺牲者。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我觉得即使是正当竞选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也还是应当立即停止已经安排好的活动，以便制订出某种新的办法来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争取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就许多没有谈妥的问题继续同俄国人进行谈判。我想派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到莫斯科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让他同斯大林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和谈谈彼此的想法。

我在10月3日(星期日)打电话给文森法官，请他来和我商讨一件极为紧急的事情。

文森来到白宫以后，我把我的想法扼要地告诉了他。当我讲完以后，他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他说，他完全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并且希望他能够担负起这一重大的使命，但是，如果光是叫他接受这么一个决定，他将不得不加以拒绝。

文森认为，法官们应当把他们的工作限制在法院职责范围之内，而不过问其任何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在举行大选的时期，更应当如此。他还说，作为最高法院院长，他不能破坏自己的规定，即使碰到这样一个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问题，那也不成。于是我只好静候文森说出我早就料到他所要说的话。

“总统先生，”他说，“作为最高法院院长，我不得不拒绝担当这项前往莫斯科的使命。但是，如果您把它作为是总统提出的一项请求，我就有明确的职责可以履行了。”

“弗雷德，”我說，“我拿這樣的事情來麻煩你，實在抱歉，但是，為了國家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不得不請求你走一趟。”

文森的回答是：“我將在幾天之內就作好準備。”

下面是我向文森法官提供的情况：

俄國人簡直不了解——或者不願意了解——我們的和平意圖和我們想通過聯合國進行合作，使大家得以朝創造和平氣氛的道路上前進的真誠願望；我們不想、也從來沒有打算把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在俄國人或其他任何人的頭上，正同我們要極力抗拒想把另一種制度強加在我們頭上的任何企圖一樣；我想搞搞清楚，究竟我們能不能夠略微增進一下彼此間的了解，是不是應該在我們兩國之間十分不夠的通訊聯系工作方面作些努力。毫無疑問，在我們這方面是作過努力的。如果俄國人不想讓世界的前途和現有的文明歸於湮滅，他們也應該作出努力。

我向文森指出，我們曾經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同俄國人打交道，從羅斯福一直到赫爾、霍浦金斯、戴維斯、納爾遜、赫爾利、哈里曼、貝爾納斯和馬歇爾，都有過這方面的經驗。通過這些人所作的努力，我們也曾獲得某些充滿希望的徵兆，只是後來又在猜疑和不妥協的氣氛中消失了。俄國人時常弄得我們忍無可忍。但我們總是極力克制，一直在爭取同他們和好相處。

在我們同俄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認識到，我們必須以實力為主，任何軟弱的表現都會帶來致命的後果。但是，這決不表示我們所採取的是一種好戰的態度。我們會盡一切努力來同他們講道理，同他們進行合作，而我們是真心誠意要這樣做的。可是由於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得最清楚的一些原因，他們既不可能、也不願意相信我們。

我們當前的重大國際問題之一，是由聯合國成立一個機構來

處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問題，以及現在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會議上正在熱烈展開爭論的那個帶有關鍵性意義的視察問題。蘇聯集團對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規定所採取的不肯妥協的立場，使得我們無從希望和共產黨集團就控制原子能問題達成一項切實可行和必須遵守的國際協議。

我對文森說，根據俄國的發言人所表現的態度，他們似乎想要破壞聯合國提出的關於處理原子能問題的任何明智的建議。這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能夠把我們的立場和我們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俄國的最高領導人講清楚。我提醒文森說，俄國人是既不相信我們，也不相信他們自己可以來進行一次自由和坦率的交談的。我希望這次採取這種新的方式，可以為斯大林提供一個表白自己意見的機會，我很想這樣嘗試一下。

總之，最重要的是我希望通過文森的這次出使，也就是不按照一般的途徑來和斯大林進行接觸，可以使俄國的這位獨裁者更好地了解我們作為一個民族所抱態度和我們國家對整個世界所抱的和平願望。我總感到如果斯大林能同我們本國的最高法院院長交談一下，他可能消除使他在心理上遭到壓抑的某些因素。

我要文森向斯大林指出，另一次戰爭的那種愚蠢的和悲劇性的後果，將形成一次民族性的自殺行為，而除了牽涉到國防問題外，任何一個大國的頭腦清醒的領袖，連想都不可能再想到戰爭。的確，在下次戰爭中，也就是在一次原子戰爭中，不可能有什麼勝利者，而廣大地區的整個歸於毀滅，其情景是令人可憎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這就是對全世界領袖們的一個巨大的挑戰，是我們為什麼建立聯合國的 reason。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繼續進行談判，而為了確保未來的世界得以存在下去，我們準備無論談判多久的原因。

我對文森說，你順着他的調子彈吧。不過要使斯大林從一開

始就弄明白，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外交上的刺探手腕。要交代清楚，这是在最大的坦率程度上所进行的一次交談，大家可以把自已的态度，把有所怀疑、恐惧和猜忌的問題，甚至各人的野心，都自由地和无所抑制地談出来。

只要我們能使斯大林對我們这边的某一个人感到放心，使他感到他可以完全信賴，我想我們也許能够取得某些进展。但是，毫無疑問，如果俄国人坚决要在要么統治、要么毀灭的基础上來使这个世界共产主义化并且控制这个世界的話，那我們就不可能通过談判的途徑來进行什么工作。而即使到了这一地步，正如我对文森所說的，我們也还是應該采取一切可能設想的方式來进行接触，我們應該繼續进行这种嘗試。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文森到莫斯科去走一趟的原因，看他能不能使斯大林表白一下自己的意見。

当然，我要这位最高法院院长放心，他这次担負的使命，并不是对国务院和联合国，尤其肯定不是對我們盟国的一种越权行为。

我向他解釋說，“我打算在你动身去莫斯科以前，就这次出使的目的进行一番討論，以便取得我們盟国的充分同意。我还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訴我們本国的人民。但最重要的是，在把这件事作任何公开宣布以前，一定得及时地关照一下各有关人士。我們必須在各个方面都小心謹慎，不然就可能使这一炮打不响，或者被人誤解为一种单方面的行动。在我們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以前，我将在星期一早晨从地图室拍电报給在巴黎的馬歇尔。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这件事，因为他一直是贊成采取任何建設性的行动來推进和平事业的。”

在同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文森和我就这个問題作了第二次会晤，我們就这次出使任务的范围、时机、出使手續和发表公报的形式等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星期天下午，我命令新聞秘书查理·罗斯通知各广播电台安

排半小时时间来宣布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公报。我同时关照副国务卿罗伯特·罗维特，要他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办好出使手续，使文森在到达莫斯科以后能受到斯大林的接待；我还告诉他，我准备写一封介绍文森的私人信给斯大林。此外，我还向各有关部门发出命令，要它们极其严格地保守秘密，并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防止把消息过早地透露给新闻界。

但是在这架复杂的国际机器得以开动起来以前，在一切有关出使的手续办妥以前，这个消息却不幸被泄露给了一家态度很不友好的报纸，然后其他报纸和通讯社也跟着大喊大叫起来，说这是“姑息”，是“玩弄政治手腕”，是一种“单方面的行动”。这样一来，文森出使的这件事情，甚至在还没有来得及同有关各国充分进行探讨以前，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像往常一样，报刊上的各种叫嚣大部分是由于消息来源的不正确，由于半真半假的传闻和对事实真相的故意歪曲。

在这个拟议中的文森出使莫斯科的计划过早地公开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复杂情况，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次出使是否适宜的问题。我同在巴黎的马歇尔国务卿又通了一次电话，我发现他由于看到其他代表对这次出使的目的有所误解而感到不安。当时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认为我采取这个行动，也就是越过了联合国的权限，而这是有损联合国的威信和权力的。其实这正是我所要加以避免的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坚决认为，在正式宣布文森出使的性质和目的以前，必须极为慎重地同一切有关政府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现在再来继续进行这项计划业已毫无用处。因此我把马歇尔国务卿召回华盛顿来和我进行一次会商，以便弥补一下这方面的损害，并趁此机会把从当前对文森出使问题的纷纷议论中所产生的某些流言蜚语加以澄清。

我同馬歇爾國務卿會商後發表了一個聲明，聲明中列舉的事實有助於消除對這次出使事宜的許多誤解。

聲明說，“馬歇爾將軍在我的邀請下回到了華盛頓，向我匯報關於聯合國在巴黎的各個機構的工作進展情況。我同他在今天上午、接着又在今天下午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他向我詳細地敘述了在巴黎發生的各種事情的情況，我和他就有關本政府將對各種帶有爭論性的事宜所採取的方針政策問題進行了討論。

“關於今晨報刊就最高法院院長文森可能赴莫斯科一行所作的報道這件事，事實經過如下：上星期二，當我同馬歇爾國務卿通話的時候，我曾告訴他說，我始終迫切地希望看到在全世界建立起鞏固的和平，我這個時候特別關心的是蘇聯代表們對原子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我說，我懷疑這些蘇聯代表所抱的態度是不是當真反映了蘇聯領袖們在思想上存在的一種誤解，以致從維護世界普遍和平的觀點來看，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可以想得到的足以消除這種誤解的辦法，那我們就會再一次遭到失敗。我問國務卿，為了爭取使蘇聯領袖們了解美國人民對這些事情所表現的嚴正關心和真心誠意的願望，派最高法院院長文森到莫斯科去一趟是不是會收到有益的效果。馬歇爾國務卿向我敘述了我們在巴黎所面臨的局勢，由於聽到了他的報告和避免任何一種單方面的行動——不管這種行動從另一方面講是如何需要——在當前所可能引起的誤解，我決定不採取這個步驟。

“我同馬歇爾國務卿進行的這次談話使我感到很寬慰。我從他的報告中高興地聽到，在我們自己的代表和在巴黎的法、英代表們之間，對於處理柏林危機的問題，在各个方面都是團結一致的；而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大會則在盡最大的努力，來為其他許多一直使世界各地人民感到不安的問題謀求解決辦法。我感到高興的是，我能向他保證，我國人民決心盡自己的努力來謀求通向和平的

道路。”

按照計劃，我將在 10 月間在邁阿密舉行的美國軍團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我打算在這次大會上談談關於文森出使的實質性問題，我希望利用這次機會來發表一篇關於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說。我並且希望利用這次機會來消除可能由於華萊士的競選活動而給我們造成的任何損害。在他的競選活動的煽動下，某些少數派集團認為本屆政府並不是在盡一切可能來維護和平的利益。它們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便來歪曲我們為和平而努力的種種事實，歪曲我們的外交政策。它們是十分錯誤的——它們所捏造出來的污蔑這個政府是戰爭販子的說法，是有害的。文森出使這件事竟也成為它們玩弄這種政治手腕的一個把柄。

我在美國軍團代表大會上發表的講演中說：

“不幸的是——我是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才這樣說的——不幸的是在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出現了一層互不信任的陰霾，使我們的關係遭到損害，變得很不正常。很明顯，只要存在這種濃厚的互不信任的氣氛，要來解決西方國家和蘇維埃俄國之間的爭執問題是難以取得進展的。

“如果要驅散這種不信任的氣氛，就需要針對長遠的和平目標採取實際的行動——通過這種實際行動，能使世界擺脫戰爭的恐懼，減少軍備的負擔，使大家得以集中力量來開展有益的經濟活動。

“我最近曾考慮要派遣一個專使到莫斯科去，我的目的是想獲得斯大林總理的合作，大家來驅散目前籠罩在西方國家和蘇聯之間進行的談判上面的那種充滿不信任的含毒的氣氛。我派出的專使就是要去表達美國人民渴望和平的嚴肅態度和真誠意願。

“這一建議同目前在聯合國或外長會議範圍內進行的談判沒有什麼關係。派遣專使的目的決不是為了要超越這些談判，而是為了改善談判必須賴以進行的氣氛，從而有助於產生豐碩的和平

成果。

“趁这个时候，我想把事情彻底說清楚，我一点也沒有放松我要利用一切机会来为和平而努力的决心。只要遇到适当的机会，我就一定要在我們同我們盟国的关系的基础上和在联合国的职责范围内，采取行动来推进和平的利益。

“我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将繼續为和平而努力。

“我們的国家和苏联都負有一項根本任务——提高我們两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

“我們必須記住，过去有許多次严重的危机都不是通过战争来获得解决的。我們必須記住，国际間爭取生存的斗争，正同个人之間爭取生存的斗争一样，是无論什么时候都在进行的，它的表現方式很多，并不一定是战争。我們必須記住，国家之間的敌对状态是自古有之的。历史表明，敌对的国家可以在世界上和平共存。

“忍耐应当成为我們的口号。当全人类的命运都处在危险中的时候，我們必須尽全力运用我們所有的忍耐工夫。我們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来加强联合国組織，使它得以担負起摆在它前面的伟大任务。

“全世界人民都在矚望着他們的領袖为他們驅散当前有碍于維持和平的那种互不信任的阴霾。在目前这个时刻，我只想补充这样一句話：我們的国家从来就是能够光荣地和忠于自己理想地克服它历史上的巨大危机的。”

参加美国軍团代表大会的代表們的反应是十分热情的。全国的反应也同样是令人鼓舞的。事情很快变得十分明显，許多为华莱士的和平攻势所吸引并认为这种攻势挺不錯的人，現在已开始認識到，爭取和平的希望，最好还是交付給这个民主党政府的手里。

我一直认为，尽管文森的出使和它的崇高目的，由于一家敌視我們的报纸的播弄而变成了一场灾难，但它实际上仍然是起了

作用的。尽管我认为如果这次使命得以完成，那将更好，但是即使沒有完成，这个出使計劃仍然具有它的意义。它向一切听到和了解这个計劃的人表明，我們將采取任何光荣体面和实际可行的办法来进行和平談判，而且毫无疑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們是不会“单干”或者企图在联合国組織之外来进行活动的。

即使在竞选运动进入高潮的期間，我也不允許我們对外交政策所抱的这些基本态度受到压抑或被抹煞。我們政府的各項活动必須不中斷地进行下去。在華盛頓，我們拥有白宮的全体工作人員来从事这些活动，而內閣閣員們則各司其職并經常同我保持联系。在我的內閣閣員中，除了有人問到与他們所主管的部有关的某些特定問題外，很少有人发表过任何政治讲演。

当竞选运动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我也加紧进行我沿途停下来发表演說的計劃。总括起来，我大約旅行了三万一千七百英里，发表了三百多篇演說——确切地說是三百五十六篇演說。我一向是习惯于艰苦工作的，干这一行对我倒挺合适。我的竞选活动一共进行了三十五天，平均每天要作十次讲演。有一天我讲了十六次。

在橫貫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火車站，聚集起来的大大小小的人群有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有时候我还让我的夫人和馬格丽特^①——这是她們生平第一次和我作这样的旅行——到讲演台的后面来同群众見面。有时候我只是单独一个人趁火車要开往下一站之前，对群众讲几分钟的話。

我这次单枪匹馬的出征收到了效果。当大选的日子愈益临近的时候，人們对我的反应也越来越热烈。我从不怀疑他們将投我的票，尽管我的顧問們始終认为未可乐观，而民意測驗机构則繼續在那里推波助瀾地叫喊什么我沒有当选的机会。我相信，当人民

① 杜魯門的女儿。——譯者

自己了解事实真相以后，他們就会作出正确的决定；尽管有人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竞选要依靠报纸、电台和其他通讯设备，但人民还是宁愿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来自行决定投哪些候选人的票。

1948年10月31日，我从我一生中历时最长、也最艰苦的一次政治运动的吵吵嚷嚷的气氛中回到了独立城我那安安静静之家。多少个星期以来，一直是在闹哄哄的发表演说、握手和日以继夜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情况在10月30日晚間在圣路易举行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大会上达到了顶点。我感到我已经在选民们的面前为他们清楚地指出了何去何从的道路。从美国农民中所引起的反应是如此强烈，看来是会把我还回白宫再当四年总统的。

11月1日，也就是大选前夕，我又作了两次讲演。第一次是在下午对堪萨斯市会堂中的阿腊腊特神龕会会友所作的非政治性讲话。晚上，我从我家里的臥室中通过四大广播公司向大约七千万美国听众发表了演说。副总统候选人巴克莱在肯塔基州帕杜卡城他自己家里通过广播为我作了介绍。

这是我向选民们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请他们在要一个维护人民利益的党还是要一个维护特权利益的党这一原则问题上作出决定。我警告全国人民说，他们所投的票不光是为了某一两个人，而是同每一个人及其家庭在今后多少年中都有关系。

到此，我的事情算是办完了。现在再已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是在等待结果。

大选这天的下午四点半钟，由白宫秘密警察分遣队正副队长吉姆·姿利和亨利·尼科耳森驾车将我家里送到密苏里州的埃克塞耳西奥温泉的埃耳姆斯旅馆，这里是一个休憩胜地，离堪萨斯城东北约三十英里。我们避开了这一天整夜都在极力想找到我的那些新闻记者。他们不断地向独立城我的家里打电话，希望获得

一些消息。我在埃克塞耳西奧溫泉洗了一个土耳其澡^①，然后在六点半钟回到我楼上的房間，吃了一个火腿夹心面包和一杯牛奶，便打开收音机收听关于东部各州投票結果的消息，接着就上床睡觉去了。据当时的报道，我大概以几千票領先。

我在后半夜醒来以后，又一次收听了卡頓波恩先生的广播。我当时領先了約一百二十万票，但是据这位广播員說，我仍将毫无疑问地被击败。

清晨四点左右，娄利走进我的房間，建議我再收听收听卡頓伯恩的广播。我擰开了收音机，获悉这时候我已經以两百多万票領先，但是这位广播評論員还是在那里說，他看不出我有什么当选的希望。

我对娄利和尼科耳森說，我們最好还是回堪薩斯城去，因为看来我們已完全有可能要再干四年了。我們在11月3日(星期三)早上六点钟左右到达堪薩斯城。十点半，我收到了杜威州长祝賀我当选总统的电报。

最后的数字表明，我一共获得了两千四百一十万零四千八百三十六票，在二十八个州中获胜。杜威获得了两千一百九十六万九千五百票，在十六个州中获胜。华莱士和瑟蒙德各得一百万票多一点。我在南部的四个州中败于南方民主党党员之手，这四个州是南卡罗来納、密士失必、亚拉巴馬和路易斯安那。但是在全国最大的十三个城市 and 密苏里、加利福尼亚、衣阿华、伊利諾、得克薩斯、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七个大农业州中，我都获得了胜利。要不是紐約州的美国劳工党的五十万票投給了华莱士，我在杜威自己的这个州里就把他打败了——比他多三十万票。实际情况是，他在紐約仅仅比我多六万票获胜。

^① 即一种蒸气浴。——譯者

我在选举人中所获得的多票数的比重，要比在选民中所获得的多数票的比重大。尽管我在下列各州中被瑟蒙德赢去了三十八票，即南卡罗来纳八票，密士失必九票，亚拉巴马十一票，路易斯安那十票，我获得的选举人票仍然有三百零四票（最后变为三百零三票，因为在田纳西州丧失了一票）。在选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两个州是俄亥俄和加利福尼亚，那天晚上，这两个州的票数始终是起伏不定的，一直到最后计算票数阶段的时候，才使民主党的优势稳定下来。如果不能在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获胜，那么我有把握获得的选举人票数只会有二百五十四票，比必需的二百六十六票尚少十二票。

1948年的大选证明，民意测验家和预测家的话是如此的错误和不可靠，以至直到今天他们的名誉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他们的影响也大大削弱了。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差不多还是一致在预测我将落选。接着他们又预测说，这次选举将交付众议院来决定，因为没有哪一个候选人将获得多数选举人票。

像我一向所作所为的那样，我在1948年所极力要做的是使民主党成为一个为维护和争取人权而斗争的生气蓬勃和奋发有为的政党。我希望使它成为一个代表普通人民的政党，不管有人在怎样诽谤它，也不管有人曾经多少次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它。尽管出现了两个分裂集团，我们的努力还是获得了成功，几乎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投票。

最大的一项成就是：我们是在党内没有最激进的分子和没有南部的顽固分子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一个政治家通常会说，他希望获得他所能够得到的全部选票。但我却是由一个既不依靠极端的左翼分子也不依靠南部集团的民主党推选出来当选为总统的，对此我感到十分愉快和满意。当然，我也不需要投给我的共和党对手的那些反动票。1948年竞选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民主

党能自己站立得住，使它不受任何损伤。这个目的达到了。

这是党的一个历史性胜利。民主党重新获得了原来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大多数席位，还取得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反对第八十届国会的活动，使得选民们相信这次非彻底改变原状不可；我这一次用一个民主党占绝对大多数的国会，来代替了那个两年来一直阻碍政府在内政方面取得进展的国会。

大选两天以后，我乘总统专用火车回到了华盛顿。在圣路易的联合车站，有大规模的群众队伍来欢迎我；当我抵达首都的时候，我看到了在华盛顿出现过的最大的庆祝胜利者归来的群众场面之一。

当副总统当选人和我乘汽车经宾夕法尼亚大街驶向热烈鼓掌的巨大人群的时候，我在《华盛顿邮报》报馆的房屋前面看到一幅标语：“总统先生，您什么时候把老鹅这道菜端出来，我们便准备什么时候吃老鹅。”^①

我寄语这家大报馆，我可不要任何人吃老鹅，我可不是那么洋洋得意，或者想要向任何人夸耀胜利。我说，我感到再执政四年是我的重大责任，我希望依靠全体人民的支持，来实现我认为他们已经委托给我来加以完成的计划。

一到白宫，我就举行了一次内阁会议和一系列其他的会议，来计划如何立即取消塔夫脱—哈特莱法，像在竞选运动中所许下的诺言那样。要做的工作很多，我迫切地希望着手干起来。但是，在医生的劝告下，我于11月7日离开华盛顿前往基韦斯特休息了两个星期，不过在此期间，我仍然每天和新当选的副总统以及党的其他领袖举行会议，以便为第八十一届国会在1949年1月开会以前，制订出一个纲领。

^① 吃老鹅为美国俗话，是蒙羞忍辱的意思。——译者

第十六章

第四点计划

.....

我走上讲坛，开始我的就职演说，这照例是就职典礼的一部分^①；

“副总统先生，最高法院院长先生和同胞们，我以谦卑的心情接受美国人民赐与我的荣誉。我以最大的决心来接受这荣誉，我要竭尽全力为我国的繁荣和世界和平效劳。

“在我任职期内，需要诸位的帮助和祈祷。我请求你们给予鼓励和支持。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能完成。

“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特殊困难。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已往的困难同等重要。今天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政府的开始，而且，对我们和全世界来说，也标志着一个多事的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的开始。

“我们也许注定要经历人类悠久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应该实现这个变革。本世纪上半叶已打下了对人权空前野蛮的侵犯和有史以来两次最可怕的战争的烙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要求是要人们学会和睦相处。”

我提醒大家注意世界所面临的动荡局势和美国人民一向皈依的信仰。我提到已在全世界盛行的虚伪哲学，它已将许多人引入

^① 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第二届总统职位。——译者

歧途，并給他們增添了忧虑和困难。

我說，“那种虛伪的哲学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以这种信仰为基础的，即认为人类是懦弱低能的，是不能管理自己的，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統治者来統治他們。

“民主主义的信仰基础是，人类具有道德的和理智的能力同时也拥有不可剝夺的权利，能够合理而公正地管理自己。

“共产主义逮捕一个人沒有合法的理由，不按法律程序，惩处个人不經审讯，并将个人当作国家的工具，强迫他劳动。个人接受什么知識，进行什么艺术創作，追隨什么样的領導人物和想些什么，共产主义都一一予以規定好了。

“民主主义主张，政府是为个人利益而建立的，并負責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發揮个人才能的自由。”

然后我談到我們对未来所抱的希望是：在联合国、欧洲复兴計划和其他旨在改善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措施的范围内来改进世界。

我說，“为了使我們能够利用現有的先进的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来改进和发展落后地区，我們必須着手拟訂一項新的大胆的計划。”

我提出四点主要的行动原則。第一，繼續支持联合国和有关机构；第二，繼續执行世界經濟复兴計划；第三，加强爱好自由国家的力量以防御侵略的威胁。

接着我概述了第四点：“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瀕临悲慘的境地。他們食不果腹，疾病纏身。他們的經濟生活是落后的，停滯不前的。他們的貧困對他們自己和比較繁榮的地区來說，都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能够解除这些人痛苦的知識和技术。

“美国在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虽然我们所能提供援助其他各国人民的物资是有限的，但我们在技术知识方面的无尽资源是不断增长和用之不竭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使我们丰富的技术知识为爱好和平的人民造福，帮助他们实现改善生活的愿望。并与其他各国合作，我们应该奖励对需要开发的地区投资。

“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帮助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通过他们本身的努力，增产粮食、布匹、房屋建筑材料和机械动力，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我们吁请其他国家把他们的技术资源投入这种事业。他们的贡献将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应该是一项合作事业，在这一事业中一切国家应该通过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任何切实可行的事情上共同工作。为了获致和平、繁荣和自由，必须全世界共同努力。

“在我国企业、私人资本、农业和劳工的合作下，这个计划能够大大增加其他国家的工业活动，能够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这种新的经济发展的设计和控制，必须对被开发的经济地区的人民有利。对投资者利益的维护不得超过投入了自己的资源和劳力的当地人民的利益。

“为在外国寻求利润而进行剥削的老牌帝国主义与民主的公平交易毫无共同之处。

“一切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将因这个更好地利用世界上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建设计划而得到很大的好处。经验证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随着各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提高生产是获致繁荣与和平的关键。而提高生产的关键则是更广泛地和大力地应用现代的科学知识。

“只有帮助最不幸的成员自力更生，人类的大家庭才能获得相

当的富裕生活，而这正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产生动力，鼓舞世界各国人民成功地行动起来，不仅去反对人类的压迫者，同时也去反对他们的老敌人——饥饿、悲惨和绝望。”

我指出，“我们的盟友是千百万如饥如渴地追求正义的人。

“等到我们的国家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民主制度的好处，共同来享受日益富裕的生活时，我相信今天还反对我们的那些国家会抛弃他们的妄想，参加到自由世界国家的行列中来，共同合理地解决内部纷争。

“形势的变化已为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来了新的影响和新的责任。这些事变将考验我们的勇气、忠诚和自由的信念。

“我们始终不渝地信奉全能的上帝，我们将向人类自由得到保障的世界迈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愿意献出我们的力量、资源和坚强的决心。在上帝的庇荫下，未来的人类将确保生活在一个公正、融洽、和平的世界里。”

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典礼结束，我偕同巴克莱副总统登上了漫长的游行队伍的领队汽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前进。

在我的就职演说中，我希望明确这一点：如果自由国家不掌握维护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的机器以抵御强把极权主义加在人们头上的侵略行动，那末自由国家是得不到持久的自由和独立的。集权政体的种子全靠灾难和匮乏来发芽滋长。它们在贫困和不满的土壤里蔓延滋长。当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希望破灭时，它们就成熟了。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已经落在我们肩上的领导责任。1947年3月12日，我要求国会批准援助受到苏联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我也请国会答应希腊和土耳其的要求，批准派往这两个国家的文武官员名单，协助它们的复兴工作和监督使用我们所供给

的資源。

当时要求撥款的数字相当于美国为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約三千四百一十亿美元的千分之一强。不言而喻，我們应爱护这笔投資。

美国人民的传统一向是利他主义的，从最初的时候起，甚至在大家除了艰难困苦之外，还說不上什么共享幸福的时候，这种睦邻精神已成为我們社会的特点了。

当然，在手头寬裕时要做到慷慨解囊并不难。我知道美国人会响应第四点計劃的，就像他們响应一切請求援助的实际呼吁一样。这个計劃完全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它給所有国家带来发展和繁荣的新机会。

我要求对希腊、土耳其进行援助这件事，引起了全世界爭論了三个月之久，爭論完了，美国的方針也就确立了。

根据这个計劃，美国提供人員和經費在工业、农业、財政、对外貿易、公共行政、航运和劳工等方面援助希腊。我們已着手拟定关于希腊的公路、桥梁、铁路和飞机場，房屋建筑基地的填筑，矿业、炼鋼、紡織、漁业、灌溉、重新植林、食品加工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复兴或建設的計劃。

前往希腊的美国代表团已拟定了这样一項計劃：提供农民使用和保养农业机械的知識和除草、树木接枝的技术。其他的計劃包括在希腊訓練护士，卫生部增設肺病防治机构，并派遣希腊医生一名到美国，五名到丹麦学习防治肺病疗法。

在土耳其，也实现同样的計劃。訓練三百八十多名土耳其人为重型筑路机駕駛員。此外，美国援土代表团还协助土耳其公路桥梁局改进組織机构和使工作程序現代化。

援助希、土的計劃，正像馬歇尔計劃一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也像馬歇尔計劃一样，它仅仅是一項紧急援助計劃，它的有效

期限局限于給予援助的款項總額之內。然而，這兩項計劃使全世界認識到美國的目的在於領導自由國家，加強他們維護自由的力量。這兩項計劃還提示了一個新的概念，這就是建立一種長期給予世界落后國家以技術援助的計劃，這種計劃將使他們自力更生地成為日益繁榮而強大的自由盟國。兩年以後，這個新的概念就得到了證明。

這種新的概念在我的就職演說中，首次提到過，它與馬歇爾計劃和援助希、土計劃是迥然不同的。我已說過：“為了使我們能夠利用現有的先進的科學和發達的工業來改進和發展落后地區，我們必須着手擬定一項新的大膽的計劃。”

於是我們便開始擬定僅僅在幾個月內就已成爲眾所周知的“第四點計劃”，因為它是我在就職演說中所講的四個重要的行動原則的第四點。

把它稱爲“新的大膽的計劃”，毫無誇張之處。這是一項有史以來任何國家都不敢提出的大膽的計劃。這項計劃在1949年1月20日宣布後，引起了人們的莫大興趣和興奮。我在六天以後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答復問題時又一次強調了這計劃的新穎和大膽。

有位記者問道：“總統先生，您能跟我們介紹一下產生第四點計劃的背景嗎？”

我回答說：“關於第四點計劃的想法，自從馬歇爾計劃實施後，已在我和同僚們的腦子裡存在了兩三年了。它是和援助希、土的建議同時產生的。此後一直在繼續研究中。我用了大部分時間來詳細研究世界那一邊的情況，力圖尋找獲致世界和平的途徑。”

又有位記者問道：“您能告訴我們，您準備怎樣實行這項計劃嗎？”

我回答說：“這是政府今後四年的政策，也是一個將要普遍加

以推行的計劃。我已請國務卿召集政府各部門領導人會商并草擬初步的執行這個計劃的方案。我不能明確地告訴你們具體內容，以及在哪里推行和怎樣推行。但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研究了美國的历史，認識到我國是依靠英、荷、德、法等國的外國投資才發達起來的。這些國家在修築我國的鐵道，開發我國的礦藏，開采我國的油田和發展我國的畜牧業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投資。這包括經營畜牧場、飼養牲畜和罐頭食品工業。第一家罐頭食品公司設在密士失必河西岸，是一位拿破侖麾下的法國伯爵開辦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國家都把美國當作軍火和原料的倉庫，在兩次世界大戰後，英、荷、德、法在美國的投資就減少了。德國的資本已被沒收。

據我看，如果我們能協助非洲、南美和亞洲的落后國家的政府穩定下來，我們也能使用美國積累的一部分資本去開發那些地區。如果美國的投資能有保障，不被沒收，如果我們能說服資本家，使他們認識到對外國投資不是為了剝削，而是為了發展這些國家，這樣才能對有關各方都有利。

第四點計劃的想法，大約與馬歇爾計劃的概念同時產生的。但是它与馬歇爾計劃毫無關係。馬歇爾計劃完全是為了復興西歐國家，這些國家的生產和經濟都遭到了戰爭的破壞。第四點計劃是一項世界規模的長期計劃，利用美國經過試驗和得到證明技術知識幫助落后國家自立。

我是從身居自由世界領導地位的我國的對外政策出發來考慮問題的。在羅斯福和我執政期間，已經證明建立一個完善的經濟制度，使大多數人民都能獲得高度生活水平的有效辦法是：從特殊的利益集團手里收回國家資源歸人民所有。

這是我們的對內計劃，我要使它成為我們對外政策的一個持久不變的部分。

第四点计划的目的在于使落后国家的千百万人民能从殖民主义下的水平提高到自力更生的水平和最后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我从世界上这些地区所获得的全部报告都说明，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仍落后时代将近一千年。在许多地区，这种情况是由于为了满足外国的利益而进行长期剥削的结果，这些地区的发展只是为了外国利益而不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这是殖民主义的祸害，我是一贯主张消除这种祸害的。

我希望第四点计划能完成的是提供技术援助，从而使这些国家的人民用我们的小额投资就能开发本国的资源。支出的主要项目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教会这些国家的人民如何促进自己的技术。

在我国，我们既有资本，也有技术知识。我认为我们所能遵循的唯一道路就是将这两笔大资本用到落后地区去，以便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向全世界繁荣与和平的前途迈进。否则，在我看来，就只有继续让这些广大的地区走向贫困、绝望、恐惧和人类其他的种种不幸，而这些都是培育无休无止的战争的温床。

第四点计划是我们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第四点计划是和我们保证这些国家在衣食住等条件方面得到适当改善，从而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第四点计划所致力到的不仅是为这些人民带来民主的理想，而且要通过明智的合作为他们带来美好生活的实际利益。

因此这个计划既现实又理想。普通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发展这些国家将使我国工厂的生意永远兴隆。像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印度、北非和南美广大地区的资源几乎都没有碰过，而开发这些资源对美国贸易和这些地区本身都是有利的。这将使许多地区的人民靠贸易生活，而不是靠援助来生活。

这就是我再度执政之初所倡议的理想，一般都公认为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个理想付诸实施。

我立即布置了一系列會議，討論如何最有效地推行第四点計劃，并命令国务卿負責領導推行这个計劃所必需的筹划工作。我又委派經濟事務助理国务卿威拉德·索普調整实行这个計劃的步驟，同时又通过对外經濟政策委员会建立各部之間的協商制度。

在实行第四点計劃中，我明确指出，我們必須利用私人和政府的一切現有机构。美国海外大企业和非盈利性质的私人組織，像洛克菲勒研究所或国际教育研究所，都能提供許多极寶貴的資料和援助，使落后国家得到技术上的帮助。除联合国的專門机构外，可利用的政府服务机构有各部門間的科学文化合作委员会，美洲各国間事務学会，經濟合作总署，以及进出口銀行。

1949年6月24日，我向国会提出一份特別咨文，要求撥款四千五百万美元，开展这个計劃。这笔款項包括已在1950年預算^①中为同样活动而申請批准的一千万美元；所要求的这笔撥款，計劃供給美国参与国际机构和直接进行援助之用。

我要求国会通过一項扩大对世界上落后地区的技术援助計劃和一項鼓励私人資本对这些地区投資，以发展經濟的實驗計劃。这种发展将加强联合国，并有助于世界和平。发展这些地区，已成为我們对外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9月27日，国会提出了实施第四点計劃的立法手續，但是在10月休会以前并未采取行动。在这期間，我利用一切机会說明实现这个計劃的可能性。1949年10月20日，我在商界人士所举行的一次宴会上，非正式地发表了談話，我說单单在美索不达米亚流域这一个地区恢复伊甸园^②就能养活三千万人，只要适当地加

① 1950年預算于1949年1月向国会提出。財政年度从上一年的7月1日开始。

② 根据《旧約全书》創世記第二章的記述，伊甸园是上帝創造給人类的第一对夫妻亚当和夏娃居住的地方。——譯者

以开发就可供給全部近东人民的粮食。我詳細地說明了非洲的三比西河流域和巴西南部一块同样的区域怎样能够变成堪与我国田納西流域媲美的地区，只要那些区域的人民能够得到我們所拥有的专门技术的帮助。

1950年1月4日的国情咨文，催促国会通过已經提交給国会的关于扩大对落后地区的技术援助和資本投资的立法。“如果要使自由和代議制政府的理想在上述地区——特别是远东——实现，那么让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体验科学和經濟进步的好处，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咨文指出，这一計劃要求各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拿出大量資金輸往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以供生产之用。最近发生的世界事件，使得迅速采取这种行动成为刻不容緩的事情。

我說，“这一計劃是符合所有国家人民利益的——它和上一世紀的老的帝国主义或新的共产帝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1950年年初，这个計劃已送交联合国。1950年3月4日，联合国經濟及社会理事会都同意了这个計劃，并草拟了几項建議，这些建議在下半年获得通过。这是就第四点計劃的意見首次通过的正式議案。

不过，直到1950年6月5日，第四点計劃才成为现实。就在这一天我签署了对外提供經濟援助的法案，它已在第八十一届国会的第二次會議上获得通过。第四点計劃就列为这一法案里第IV节“国际开发法案”。同一法案中还包括“1950年經濟合作法案”，“1950年中国地区援助法案”，“1950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援助法案”，以及“1950年国际儿童福利工作法案”。

在为上述各項用途所撥的款項中，供技术援助計劃之用的款項是三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特殊撥款包括在1951年的总預算法案內，這項法案于1950年9月6日通过。

撥归技术援助之用的款項与需要比較起来是很少的，比所要求的最低数額还少一千零五十万美元。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对那些饱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国家來說，第四点計劃正象征着希望。共产主义向他們宣传說，自由国家不能为地球上落后地区的千百万人提供合理的生活标准。这一笔錢与其他国家的捐助合起来，在增进这些人的福利上，将收到积少成多的效果。

按照国际开发法案我在 1950 年 9 月 8 日发布一項行政命令，責成国务卿实施第四点計劃，并設立国际开发諮詢委员会。設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考虑适当的方案，以實現第四点計劃的目标和政策。該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是納尔逊·洛克菲勒。

国务院在承担推行第四点計劃的任务之后，国务卿很快就召集技术人員成立了众所周知的技术合作署。1950 年 11 月 14 日我任命亨利·貝奈特博士出任技术合作署的署长。貝奈特博士原为专科学校的校长，在联邦政府委派他的三項国外使命中，都作出卓越的成績。1945 年他任美国代表前往魁北克参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組織的第一次會議；1949 年代表美国占領軍在德国参加农业調查团；1950 年 4 月任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顧問，按照美国农业学院的形式在埃塞俄比亚組織农业訓練中心。

貝奈特博士是实际貫徹第四点計劃的灵魂，但仅仅一年以后他就在伊朗因飞机失事死去。他死的不是时候，对第四点計劃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損失。由于实际的接触，他了解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形势。他对技术合作署的整个概念胸有成竹。

这样，在我就职演說后的两年內，实行第四点計劃的最小限度的机构成立了，并准备开始工作。

我們沒有浪費時間。1951 年 3 月，也就是第四点計劃的第一次預算經国会通过只六个月，約有三百五十名技术专家在二十七个国家內进行一百多种技术合作的設計。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

的三十五个国家的政府根据第四点计划要求美国政府给予特别援助，解决它们的问题。

1951年3月，又有来自三十四个国家的二百三十六名第四点计划的受训人员在美国深造，根据计划，在以后的六个月中，还要有更多的人来美国学习。

3月末，美国已与世界上落后地区的二十二个国家缔结了第四点计划的一般协定。主要重点放在粮食的供应上，因为粮食是一切生产力的关键。此外在第四点计划中占重要地位的设计是疾病的预防、基本的和职业的教育、运输、纺织原料的发展和消除病虫害药剂等。

到了1951年年底，第四点计划已扩展到三十三个国家。1952年1月9日的国情咨文总结了计划的发展情况，指出美国在1951年利用数百万蒲式耳的小麦救济了印度的饥荒。但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事是美国在印度所作的帮助印度农民自己增加谷物生产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第四点计划的工作情况。这个计划不仅在印度，而且在伊朗、巴拉圭、利比里亚等全世界的三十三个国家发生了作用。我们向这些地区派遣了技术人员。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人员。我们需要更多的经费来加速他们的工作，因为在我们的全部外交政策中，再也没有比这一项工作更重要的了。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明显地说明我们所主张的是什么和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

由于国会日益明显地看出这个计划的價值接着又制定法律，为执行这个计划提供了款项。在1952年的财政年度中，从原来的三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的预算增加到一亿四千七百九十万美元；这一数字在1953年的财政年度里，又增加到一亿五千五百六十万美元。

1952年，有必要在人事上和組織上进行改革；因为计划的范

围与活动继续在扩大。在貝奈特博士逝世后，农业部的一位前任官員斯坦萊·安德魯斯继任技术合作署的署长。1951年底，洛克菲勒辞去国际开发諮詢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专门从事私人組織的技术援助工作；1952年1月，他的职位由前經濟稳定局局长埃里克·琼斯頓继任。

在1952年整頓的現行援助計劃下，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技术和經濟援助由阿弗里尔·哈里曼领导的共同安全署办理，而国务院的技术合作署則继续在中东、亚洲南部、美洲各共和国以及非洲的独立国家内进行經濟和技术的援助。

在我于1953年1月卸任总统职位时，第四点計劃推行还不到三十个月。但在这短短的时期里，这个計劃已在世界許多地区适当地救济了饥饉，已使造成許多地区貧困的根源——疾病的发生，减少了。另外又使許多国家走上用自己的力量和本国人民的工作来提高生活水平的道路。

例如，若干年代以来，秘魯的契姆坡特，就是一个瘧疾传染区，而現在实际上已被清除了。緬甸掸邦境内的瘧疾病患已从50%减少到10%。伊朗布坎地方的伤寒症不能再蔓延，并将这种病菌扑灭了。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里已开始实行強調职业和技术訓練的一整套学校制度。

在沙特阿拉伯推行了货币、賦稅和銀行制度。在好几个国家建立了医药、卫生和护士学校。在海地的阿尔蒂沃尼特流域有一个七万五千英亩的灌溉工程正在进行。在墨西哥的米却肯州建筑了一座多項用途的大水电站。在約旦的灌溉工程已在兴工，它将开垦出十二万英亩的可耕土地，可以供养每户拥有 $6\frac{1}{4}$ 英亩土地的家庭二万一千戶，計十万零五千人口。

在伊朗，特别是在阿塞拜疆的阿尔德比耳—莫汉地区，用改良种籽播种已获得了丰收，那里四年来的第一次由于推行栽培耕种

緊急措施的結果而獲得丰收。我們以拖拉機供給埃及農民，幫助他們把三百萬英畝由於放牧時期過長而變成沙漠的地區改變成可耕地。在印度，提高糧食生產的五十五項農村發展計劃供應飲水、修整溝渠、推廣肥料、教導讀書和寫字、改良工具、改進農村作坊以及改善土地所有制等。

在三十五個國家內的二千四百四十五名美國技術人員實行上述各種計劃。三十四個國家把它們最有希望的青年專家二千八百六十二名送往國外，其中絕大部分送到美國，按自己的專業在研究院進行深造。他們和將來由他們訓練出來的技術人員，可使美國技術代表團卸下責任，到其他地區去進行開拓工作。

我們發現就是在反對美國的国家內，美國技術人員和當地同事之間的關係也是極好的。實施中的第四點計劃具有解除敵對宣傳者的武裝和制止共產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進展的效果。

在計劃的執行中當然也遇到一些巨大的困難。其中最主要的是，國內外自私自利的集團企圖改變計劃的性質，要把重點從技術援助轉移到財政援助上去。我們並沒有把第四點計劃當作一種借貸計劃或施舍方案。它的基本目的是傳播知識，支援別人去改進自己。

美國的納稅人贊成第四點計劃，從一開始就顯示了對計劃的普遍支持。對政府支援其他國家去改進它們自己的努力，新聞界也很少或根本沒有反對。在我看來，第四點計劃繼續獲得成功的唯一的危險威脅可能來自反動派和孤立主義分子。

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計劃。有人曾估計過，亞洲和非洲的生活水平只要提高2%，就可以使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工廠開足馬力運轉一個世紀，而這也不過只能應付對商品和服務的增长了的需求。

在對待世界事務上，只有美國能夠採取這種獨特的方式。我們的人口同其他大國不同，我們是由世界各種族的血液混合起來

的；当我们变成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时候，我们力图实现我们已经写在宪法和独立宣言里的关于一切种族和民族的理想的规定。

美国对待世界事务的方式，已由我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待战败国家的态度作了最好的说明。我们设法为战败国人民提供衣食，并照顾医药的需要。我们对于战败的国家，并没有打算维持它们的战败和屈辱的地位，而是重建它们的国家。我们没有要求赔偿。

在各国历史中这是一件新鲜事。传统的作法一向是战胜国掠夺战败国，并拿走所有的战利品。我们的想法是恢复被打垮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繁荣，希望它们能够觉悟到使用侵略作扩张和发展的手段是徒劳的。我们必须驳斥传统的主张：一个国家必须用侵略和军事手段来获得市场。

根据我们从铁幕后面所能获得的资料来看，俄国的仆从国家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地方。这些国家与古巴、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其他和我们毗邻的国家形成极鲜明的对照。我们的邻国没有一个惧怕我们，它们喜欢和我们做买卖，因为我们接受它们的竞争，并不要求它们屈服。

技术援助计划并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手段。要是俄国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把它包括在这个计划之内。早在波茨坦会议的时候，也就是在1945年的7月和8月，我就准备向俄国人提供援助，以医治他们的战争创伤。当然既然无法进行合作，我们就无法帮助他们，使他们自力更生了。

因此，第四点计划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或反对任何东西的计划。这是一种自助的积极政策，任何国家只要有需要就可利用它。这个计划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殖民主义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路程，少数受惠的国家已再也不能使它发生作用了。

然而，就这个计划的目前和长远的效果来看，在迄今已采用的

方法中，它是对共产主义最强烈的消毒剂。这个计划的创造与设计，是要在永恒的基础上，为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指出改善生活的道路，也就是指出走向持久和平的道路。所以，在谋求和平中，第四点计划是一个极重大的发展；而和平正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

第十七章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1949年4月4日，当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代表美国在一份公約上签署时，我正站在他的身旁；这个公約是美国自从有了宪法以来在和平时期締結的第一个軍事联盟。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中（在还没有制訂宪法以前），北美殖民地曾与法国簽訂过一項軍事同盟。艾奇逊签字的那个文件就是北大西洋公約，是在首都華盛頓的劳工部會議厅举行的。这件大事是在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會議的閉幕仪式中发生的。

北大西洋公約，加上联合国宪章、希—土援助計劃和馬歇尔計劃，是我国对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有了馬歇尔計劃，西欧的經濟在很短的时期內就开始显示出复兴的气象。但是欧洲的許多問題并不只是經濟方面的問題。欧洲还存在着对于侵略的恐惧，从而对未来缺乏信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間，欧洲的大量資金曾經轉移到海外，而現在西欧正需要这笔資金来重建它的城市与工业。然而，資金不可能流入受到共产主义經濟威胁的一些国家中去。

1947和1948年，共产党人在欧洲大事扩张。甚至在馬歇尔計劃已开始实行的时候，他們还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这是欧洲战事停止以后，在俄国的公开支持下共产党人第一次夺取政权。接着在下一个 month 克里姆林宮就命令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放弃参加馬歇尔計劃。

1948年初，还有其他一系列事件冲击着自由世界。捷克斯洛

伐克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欧的民主堡垒，但殘暴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在俄国陈兵边境的支持下，要求取得該国政府的全部政权。爱德华·貝奈斯，这位伟大的馬薩里克的卓越的继承者，坚持了四天，最后才被迫屈服。1948年2月25日，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为期不过九年，终于再度淪入极权主义的铁蹄之下。两个星期以后，楊·馬薩里克，这位捷克共和国締造者的儿子，同时也是西欧国家許多政治家們的好友和伙伴，在微妙中死于布拉格，这种微妙意味着其中有卑鄙的勾当。他的逝世是一种戏剧性的象征，表明在他的国家里，自由已悲剧性地被葬送了。

在波兰，俄国军队在大战結束的时候，就已經建立了一个共产党的政府，現在俄国人已把所謂“波兰主权”这个幌子完全抛弃了。一位俄国紅軍元帅被派去統率波兰军队。大約在同一时期，斯大林“邀請”了小小的芬兰与苏联簽訂了一項“友好条約”。如果芬兰不接受这项“邀請”，就会产生如此这般的后果。对于刚刚开始为馬歇尔計劃所鼓舞的欧洲人民來說，共产党的这些举动，看来活像是俄国“猖狂进攻”的先声。

我本来打算在3月17日紐約的一个圣帕特里克节庆祝仪式上发表一篇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說。然而由于欧洲的这些重大事件发展如此迅速，使我感到有必要首先通过国会向全国提出报告。于是我就要求众議院議長約瑟夫·馬丁为我安排一个国会两院联席會議，以便发表演說，日期我建議在3月17日。

我对国会說：“自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战争結束后，現在差不多又过了三年，可是和平与安定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現。我們都很清楚，战事結束并不会自动地解决大战中所产生的問題。在战后締造和平永远是一桩困难的工作。而且，纵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盟国都能在締造公正的、光荣的和平这一願望下团结起来，但要取得和平究竟应采取哪些途徑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但是，今天世界的形势根本不是大战以后随之而来的那些必然产生的困难的結果。困难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就是有一个国家不但在建立一个公正的、光荣的和平上拒絕合作，而且更糟的是，它还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撓。……

“有一个国家……經常濫用否決权，頑固地阻撓联合国的工作。……

“事情还不止于此，自从敌对行动結束以后，苏联和它的代理人已經破坏了中欧和东欧的一系列国家的独立和民主特征。

“正是这种殘暴的行徑和企图把这种行徑扩大到欧洲其余的自由国家的阴谋，造成了目前欧洲的紧张局势。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悲剧性的灭亡，震撼了整个文明世界。现在又在向芬兰施加压力，使整个斯堪的納維亚半島也遭到威胁。希腊正遭到叛乱者的直接軍事攻击，这些叛乱者受到共产党統治下的邻国的积极支持。在意大利，議會中占少数的共产党正在积极而坚决地爭取控制这个国家。方法尽管不同，但是行徑却是太明显了。

“在面临这种日益严重的威胁之下，也出現了令人鼓舞的現象，欧洲的自由国家为了本国的經濟利益、为了共同捍卫自己的自由，正日益团結起来。……

“就在我向你們演說的时候，有五个欧洲国家正在布魯塞尔簽訂一个为期五十年的經濟合作与共同防御侵略的协定。

“这一行动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这个协定不是按照一个强大的邻国的命令而强迫接受的。它是几个代表本国人民意志的独立政府的自由抉择，而且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条款的。

“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协定本身的具体条款，这是欧洲为了维护本身的文明向团結的方向大大迈了一步。这种发展值得我們全力加以支持。我深信，美国将以适当的方式，根据形势的需要，給予

这些自由国家以支持。我毫不怀疑，我們协助欧洲自由国家进行自卫的决心并不低于他們自卫的决心。”

接着我催促国会完成欧洲复兴計劃的立法手續，并且規定通过普遍軍訓和恢复选募兵役制以加强国防。

那天晚上，在我向紐約圣帕特里克友好儿女协会发表的演說里，也強調了这些見解：

“每一个地方的自由人們都在問：‘这种形势究竟要把我們引到哪里去？究竟什么时候才到头？’

“今天晚上，我无法給你們簡單、輕易的答案。

“但是，我可以向你們表示我的坚强信念：在这个历史时刻里，美国的信念和实力就是防止战争、締造和平的强大力量。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信念和实力原原本本地向全世界表白清楚。”

早在1948年1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內斯特·貝文就曾通知国务卿馬歇尔說，英国正打算向法国以及所謂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国家提出建議，簽訂一系列双边防御协定。他考虑中的条約形式类似敦刻尔克条約。敦刻尔克条約是战后簽訂的一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大不列顛和法国同意，一旦德国重新发动侵略，两国要在防御上互相声援。

馬歇尔將軍把貝文的函件交給我。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如果西欧国家准备为了它們的共同防御而組織起来，那将是对世界和平的一項重大貢獻。

貝文在这封函件里詢問我們对这个新的同盟持什么态度，我曾授权馬歇尔通知英国外交大臣說：我們同意西欧各国所迫切需要采取的一致步驟。正如对欧洲复兴計劃一样，我們欢迎欧洲人的倡議，并且对于他們的事业寄以由衷的同情；美国将尽一切可能协助欧洲各国来实现这个以及类似的計劃。

由于获得美国的支持，貝文便向法国和比、荷、卢国家提出了建議。可是这三个小国却提出一項反建議，主张締結一个区域性的协定来代替一系列双边条約。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先生在这个改变上起主导作用；后来条約就按这个形式簽訂。我认为，使欧洲人参加这个条約的功績，应该归于斯巴克。

但是，纵使布魯塞尔公約已經簽訂了，事情仍很明显，必須采取更具有意义的政治行动来消除西欧各国間所存在的恐惧，从而恢复它們的充分信心。国务院已經作了某些广泛的研究，并拟出了几份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針。我毫不怀疑，为了替欧洲的抵抗和复兴的意志打气，必須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我永远記住1920年威尔逊失敗的教訓。我的意思是說，要爭取国会的合作。我們的欧洲朋友們显然也記得国际联盟这件事的；他們不但极共迫切地盼望总统就政策发表宣言，而且也要求国会表示支持。

副国务卿罗維特和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參議員阿瑟·范登堡起草了一个国会政策宣言，这表明參議院贊成“在經常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相支援的基础上”締結区域性协定，并且正式記錄在案。

这就是參議院第二百三十九号決議案，这个決議案在參議員范登堡巧妙的掌握下，在參議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在1948年6月11日最后付諸表决时，只有四名參議員投票反对。連双方弃权的和缺席但却表明态度的參議員統統計算在內，贊成这个決議案的共有七十九票而反对的仅有六票。

參議員范登堡是深知參議院的工作，而且懂得如何取得效果的。他能够借用別人的意見（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是来自国务院的）然后在实质上不加变动的情况下，再加上一两点意見，作为他自己的立法标志。接着，他就会为这些主张一直战斗到底。范登堡逝

世之后，共和党里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继承他了。

与此同时，国务院正在为我们对“西方联盟”的支持制订细节，“西方联盟”是对布鲁塞尔条约部署的一个名称。这个计划被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作进一步的研究。在1948年4月2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罗维特宣称，为了使这个计划和他与范登堡当时正在起草的参议院决议案中的语气更加接近，这个计划正在重写。

4月23日，罗维特带着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拍来的一封信密电报前来见我；电报中概略地叙述了北大西洋地区国家形成一个正式的条约组织所能引起的危险。他说他曾极端秘密地与艾德礼首相和他的几个最亲密的同僚讨论过这些危险，他们一致认为，由美国政府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北大西洋地区的防御部署，是目前对和平最有效的保证。我指示国务院将这份电报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传阅，随时供他们参考。

贝文说，组成一个防御性组织，可能引起的主要危险是，俄国人可能大为震怒，从而采取轻率手段，把世界推入战争。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专家同意英国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如果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来，那么俄国人很可能会重新估计形势，变得更合作一些。

英国外交大臣同时指出，大西洋安全体系可能是使法国同意重建德国的唯一途径。这样一个体系将会给予欧洲所有自由国家以必要的信心，来建立世界和平与繁荣。

贝文认为，为了取得成效，这个安全协定必须对自由欧洲各国提出真正的保证。贝文提醒我们说，英国政府在1940年就知道美国总统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同情，可是他们又不得不在无法确定美国会给予什么帮助(如果给予帮助的话)的情况下进行作战。接着贝文表示说，除非有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明确制订的集体抵抗侵

略的协定，否則，英国人或其他自由国家就很难挺身而出，抵抗新的侵略。

在1948年5月2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副国务卿罗维特解释说，要是范登堡议案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就更有利于我们同西欧国家讨论加强他们的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措施。他指出，我们的计划里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我们要避免只要求我们为外国效劳，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单方面的协定；第二，根据我们的宪法体制的规定，我们不需要任何自动生效的、无限制的条约。我们不能同意任何相当于保证的协议。但是，我们必须对于那些感到经常处在苏联沉重压力下的欧洲国家给以充分的保障，从而鼓舞他们的信心和信念。

接着国务卿马歇尔又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说，那天早晨，他接到贝文的一份电报，声称有必要拿出事实证明美国愿意承担一定的义务，同时贝文认为应该由华盛顿来倡议这次会谈。

陆军部长罗亚耳代表军事当局提出意见，他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我们没有弄清内容以前，我们不应对任何防御协定承担义务。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只应该派遣观察员参加西方联盟国家计划7月在伦敦召开的军事会谈。罗亚耳建议说，所达成的任何协定都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将来能使西班牙、德国和奥地利参加。

国防部长福莱斯特指出，法国人似乎认为，任何区域性安全计划中的第一项条文必须规定重新装备二十五个法国步兵师。然而，我们的参谋长们却认为，首先应当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认为，如果采取这样的方针，法国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罗维特先生说，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否则实际上不可能使国会同意把大量的军事装备运往其他国家。他还说，如果国会认为我

們是在考慮恢復租借法案，那麼，國防軍事撥款就將大大地削減了。

接着，國家安全委員會向我提出建議，總的說來，國務院所提出的行動方針應予以採納，但應適當重視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和參議院在討論范登堡決議案時可能提出的修改意見。

7月2日，我批准了一項政策聲明，這個聲明說，范登堡決議案應尽可能地徹底執行，國務院應立即着手進行布魯塞爾條約國家所建議的初步會談。

同時還決定，美國的軍事代表應以非會員國的身份前往倫敦，參加在那里召開的五國軍事會議，而且，即使美國要等到以後才能正式承擔義務，我們也應設法說服布魯塞爾條約的國家立即着手進行軍事會談。此外，國務院還要試探一下把挪威、丹麥、冰島、意大利，甚至葡萄牙和瑞典都包括在這個擬議中的條約里的可能性，並且還要建議以後還可以把西班牙、德國和奧地利或者這兩個國家的西方占領區也包括在這個條約內。如果加拿大願意參加，國務院就要作好準備，讓加拿大出席這次倫敦軍事會談。

如果和布魯塞爾條約國家的外交會談結果能使我們深信，在目前為了鼓舞西歐公眾的民氣與信心而需要我們進一步承擔某種政治上的義務的話，那麼我們就應和這些國家着手討論這種組織。這就是防禦計劃的基石，但是這一點如果不能取得兩黨充分諒解，美國就不能承擔任何義務。

同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某些建議，這些建議經我批准以後就成為共同防禦援助計劃。

共同防禦援助計劃和布魯塞爾條約國家這兩個建議結合起來是相互補充而又是各自獨立的。過去國會曾數度批准對某些國家提供軍事供應和技術援助。共同防禦援助計劃就是打算利用一個廣泛的計劃來代替這種零打碎敲的辦法，這個計劃將使我們能夠從廣泛的軍事和政治觀點來觀察形勢，從而確定對那些戰略地位

对美国安全极端重要的国家的防务提供援助的时间和数量。

这个计划是一个从长远利益去考虑的方案，而不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但它也不应妨碍参谋长联席会议所确定的我国武装力量的最低需要。这个计划应与欧洲复兴计划受到同样限制，即两个计划加在一起不致于妨碍我们国内经济的稳定。为了避免生产重叠现象，应鼓励参加这个计划的国家把武器与物资一律标准化。

这时正是1948年的夏天。柏林被封锁了，空运会不会成功，也还不敢肯定。欧亚两洲自由的人们迫切地需要抵抗侵略，他们再也不能等待将来再拿出武器，否则就要误失时机了。的确，这个援助方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支援不会形成另一次助长希特勒称霸欧洲的那种由于“太少了也太晚了”所引起的悲剧。

国务院很快就和布鲁塞尔条约国家进行会谈。会谈的第一次会议是在7月6日举行的，副国务卿罗维特是美国代表团的团长，大不列颠、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加拿大的驻华盛顿的大使代表本国政府出席会议（比利时驻美大使同时也代表卢森堡）。

这些会谈是在极端秘密中举行的。当时采取了一种特殊保密制度，所以散发的文件材料减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各种文件都是由特别信使传送的。会议中讨论的事项绝对禁止在电话中交谈，而无线电通讯也减少到最低程度。一切有关文件只由极少数人员处理。

这个保密制度与布鲁塞尔条约国家进行会谈时所采用的制度相同，目的在防止把情报泄露给苏联的间谍。

由于这些会议极端重要，因此我需要确实地掌握全部情报。副国务卿罗维特，定期带着每次会议的记录前来见我，这些会议的特色是交换意见完全开诚布公，有时甚至达到非常坦率的地步。一群代表六个不同国家的外交家们能围坐在一个桌旁，这样开诚

布公地发言，是罕见的。

除了罗维特以外，荷兰大使范·克累芬斯算是这群人物中最卓越的一位。他似乎具有一种罕见的本领，能抓住事物的要领，并且能够在恰当的时机说出恰当的话。他头一个表示希望范登堡决议案中所重视的那种组织能采取“北大西洋公约”的形式。

最后，经过各个工作委员会开了无数次会议以后，终于制订出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声明，准备提交各国代表的本国政府。以下是这个声明中的最重要的几点：

第一部分论述了影响安全的欧洲形势。从这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的扩张是这次大战的直接结果，在这次大战中德国势力曾一度横行的中欧和东欧产生了真空地带。苏联人的行动被说成是公认的最大限度扩张霸权和势力的公开攻势的一部分。在现阶段，苏联有可能凭借武力把它的统治扩张到欧洲大陆。

与会各国代表注意到，虽然还没有迹象能够证明苏联人定下了武装侵略的时间表，但是由于国际紧张局势而造成的事件的危险性是经常存在着的，而苏联的惯技之一就是哪里有利可图就在那里施用压力。一个细小的事件发展起来，很可能引起一次大战，很容易让苏联征服欧洲大陆。

主要的關鍵是：

馬歇尔计划虽然带来了一些慰藉，然而苏联的难以捉摸的行动所造成的经常性威胁，却在西欧人民中间产生了一种不安全和恐惧的气氛。欧洲人民害怕在有效的援助未能来到之前，他们的国家就要遭到苏联军队的蹂躏；要消除欧洲人民的这种恐惧，还需要采取某些步骤。只有一个包括各国在内的安全体系才能消除这种恐惧。

下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国家应该包括在这样一个体系里。有人指出，如果敌人占领挪威、丹麦、冰岛、爱尔兰和葡萄牙（以及它们

在大西洋区域的属地，如格陵兰和亚速尔群岛)的领土就会形成对西欧安全的威胁。会议注意到所有这些国家可能不愿意或者不准备承担这种组织的义务。因此，有人提出建议，可以有不同类别的组织，从而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义务。

大家一致同意，有些国家虽然在地理上不属于大西洋，但是它们对于大西洋防御计划可能非常重要，因此大西洋国家应与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意大利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经大家同意的那份声明中，就这样写道：美国代表团曾特别坚持要以某种形式将意大利包括到任何拟议中的条约中去。

声明决定，西班牙和西德的问题最后必须加以确定，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企图确定这种问题为时还嫌太早。会议报告中附有一份拟议中的北大西洋安全条约的条款提纲。

布鲁塞尔条约国家要求北大西洋公约宣告，如果一个成员国受到袭击，其他成员国将尽力提供所有的军事及其他方面的援助与支持。这当然意味着参战。我们的代表团奉命采取的立场是：根据我国的宪法，我们不承担这项义务。

加拿大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一个成员国一旦受到袭击，其他成员国应该认为这是对它们自己的袭击。但为了不立即被卷入战争，这个折衷方案规定，希望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的宪法程序向被侵略者提供援助。通俗点说，这就意味着有义务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但要根据各国的宪法程序办事。

在这个条约最后获得通过时，这个折衷方案实际上就成为条约的关键条款——第五条。

10月13日，加拿大通知国务院说，它准备遵循9月9日一致同意的声明中所提出的总的方针加入条约。两星期以后，接到通知说，布鲁塞尔条约国家原则上同意就这个北大西洋公约进行谈判。

在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国家作出这些决定以后，各参与谈

判的国家再度聚集一堂，很快地就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1949年1月6日，在我出席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形势的时候，副国务卿罗维特对于这次会谈中所体现的精神倍加赞扬。

很显然，每个政府都有它本身的问题。法国人急于要把它们的北非属地包括到这个条约里去。英国人不大愿意把意大利人包括进去。正如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讲的，这种不愿意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必须记住，英国人在近年来曾吃了意大利一些苦头。但是我说，如果人们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考虑缺点和顾虑困难上，那将一事无成。制订政策就是要作出决定。我们必须满怀信心地朝前看。

在制定北大西洋公约时，我们作出了真正的巨大决定。正象我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解释的，我们可以称它为“维持北大西洋区域和平而又没有自动参战规定的进攻性的防御同盟”。

北大西洋公约和与其相适应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的西半球协定，证明了我们的决心；支持自由国家抵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武装侵略。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基本意义，因此我在1949年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曾把北大西洋公约连同坚守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等看作是我们在对外政策的基础。

这时，外交官们差不多已经完成公约全文的拟订工作。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为了要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要人员熟悉这个文件和其中的问题，曾经花费了不少时间。

这个公约是在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正式签字的，我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曾说，这个公约是个真正的睦邻措施，而且我还把十二个国家比作十二家户主，他们相信他们之间既有这么多共同之点，那么更正式地联合起来，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认为，这个公约本身既简单又直截了当。我们希望，用它

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地说，如果在1914年和1939年有这样的公约存在，那么会把世界推入两次战争浩劫的侵略行为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公约重申我们对和平事业和对联合国组织所代表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理想的贡献。这个公约是一个反侵略、消除侵略恐惧的盾牌，是一个能够使我们进行真正的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屏障；这些工作就是为我们的全体公民创造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4月12日，我把这个公约连同一份咨文送交参议院，要求予以批准。我向议员们说，这是向和平道路迈进的一大步。为了使和平向前进展，我们必须采取事态所需要的那些实际而又必要的步骤，继续不断地工作。我们为共同防御而采取的与北大西洋区域国家结成同盟的步骤，是世界未来和平再好也没有的基石。

参议院对北大西洋公约进行了唯有这个伟大的审议机构才能做到的彻底审查。批评者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任何能考虑到的反对意见都经过讨论，并得到答复。辩论在7月21日结束，有八十二位参议员投票赞成批准这个公约。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宪法规定的批准条约得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数。有一位参议员没有投票，有十三位在唱名时回答“反对”，其中有十一个是共和党人。

7月25日，我签署了公约批准书，于是美国参加这个公约的手续就完成了。1949年8月24日，已有足够法定数目的国家批准了公约，而使公约生效。这天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为事实的一天。

当然，我们认识到，为了证明这个新的协定有效，还要做许多事。条约一经批准，我立刻要求国会拨款约十四亿美元，对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像希腊、土耳其和菲律宾等国家，进行军事援助。这个计划中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援助。第一，我们需要帮助与我们友好的国家增加它们自己的军事生产。第二，我们将把某些必不

可少的軍事配备移交給这些国家。第三，我們將派出若干专家到国外去帮助訓練并装备它們的武装部队。

在国外战争退伍軍人第五十届野营年会上，我对軍事援助計劃的目的作了这样的解释：

“軍事援助計劃的目的是防止侵略。我們的北大西洋公約伙伴們今天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有效地进行自卫的地步。战争結束以来，他們一直集中力量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經濟。我們把某些軍事装备移交給他們，并和它們組成一个共同防禦計劃，既加强它們，同时也加强了我們自己。軍事援助計劃是以自助和相互支援的原則为基础的，它也是欧洲复兴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的基础。

“我們武装自己和我們的朋友并不是要和任何人作战。我們建立防务就是为了使我們不至于被卷入战争。

“我們的援助仅限于装备机动防禦部队所必需的物資。这些部队对其他国家的独立不至于构成威胁。民主国家沒有侵略的意图；它們只想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这个計劃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它是对安全所作的投資，这笔投資比它本身的价值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和平代价的一部分。为了拯救和平而付出一些开支，或是把我們的全部資源和財產投入另一次战争，作孤注一擲，究竟是哪一条道路好呢？”

根据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規定，它的行政机构很快就建立起来了。1949年9月17日成立了一个北大西洋理事会，各参加国的外交部长成为这个理事会的成員。几个成員国負責防务的閣員組成了一个防务委員會。在这个委員會下面的、由所有十二个国家的陆海軍高級將領組成的軍事委員會立刻就开始了工作。

第一項重大任务就是要在如何制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地区的防务計劃上达成協議。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防务計

划，但是現在有必要把整个地区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这并不牵涉到特定国家的防务地位問題，而是涉及全盤的战略途徑問題。這項計劃很快地制訂出来了，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会于 1950 年 1 月 6 日予以批准。

国务卿艾奇逊把这計劃交給我，我在外交、軍事、和經濟顧問們的協助下，仔細地把它研究了一番。我认为这是一个对美国十分有利的好計劃。1950 年 1 月 27 日，我正式批准了这个战略計劃，这个战略計劃将要控制我們防务的主要部分，并且占据我們防务力量的大部分。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务是建立在“均衡力量”这个观念上的，这就是說，在使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御力量时，每个国家須提供出它的一份力量。但这就是問題之一。比方說，荷兰人有悠久的航海与探險的传统，因此他們不願限制自己的海軍，可是計劃却要求他們集中力量来建立某种类型的地面部隊。差不多全体成員都表示，他們理解其中所涉及到的基本原則，就是說，要是能够避免力量的重叠，就能完成更多的事业。然而，也还有这样的想法存在，即希望有自己的均衡的防务，以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旦失灵。这种想法有时还显露出来。換句話說，这还是一个信心的問題，一个克服不坚定和疑慮的問題。

在国会里，也有人要求拿出证明來說明欧洲人願意承担共同防务中相应的一份义务。而在欧洲，正如人們所理解的，除非美国确凿无疑地加入这个組織，否則人們都不願甘冒危險、担負它的开支。

此外，欧洲的內部还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就使得这个工作錯綜复杂。法国不願放弃任何对德国防御的成見。比、荷、卢三国要求明确一下不但法国，而且連英国在內都要承担它們那个地区的实际防务部署。斯堪的納維亞人感到他們处在側翼，并且是危

險地暴露在这条战略弧綫的末端。英国企图保存它的实力以便維護它的帝国的殘存部分。这只不过是一系列問題的开头而已。

通过一系列會議，国务卿艾奇逊用极大的耐心与技巧使大家明确一点：除非在共同防御和互相支援上真正做到通力协作，否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沒有任何意义。艾奇逊的論证取得了胜利。可以說，沒有艾奇逊，也就不会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事情很快就证明，德国参加欧洲防御的問題是这些討論中的主要問題。德国人民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在希特勒被击败和摧毁以后，他們仍然处在被占領状态下。但是，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却是欧洲的心臟，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多少世紀以来都证明，他們具有保卫这块土地的意志和能力。沒有德国，欧洲的防御不过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場后卫战。有了德国，就能够有一个纵深的防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来自东方的侵略。

这种形势背后的邏輯推理是非常明显的。任何地图都可以說明这一点。只要懂得一点算术就可证明，把德国的人力加进去，对欧洲联合防御的实力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把德国人放进欧洲防务部署中去，和鼓励欧洲人自己进行最大的努力，这是推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起作用的和必需做的两件主要工作。德国人要求他們在防御計劃中获得地位以前，首先恢复他們的全部主权。可是法国人却一直坚持，德国必須受到管制。一个會議接着一个會議，这个僵局看来却无法打破。

艾奇逊参加这些會議时，每天打电报給我，扼要地汇报了当天的全部情况。这种汇报和代表团秘书为了供国务院应用而整理的报告不同。它是由国务卿亲自口授的，专门給我个人的报告。这样，我就能够逐日知道大門紧閉下會議进行的情况。艾奇逊总是让我充分了解他准备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在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議中，有一次是

1950年9月在紐約召开的。

我曾把在欧洲遇到的困难情况重新研究了一遍，因此我認識到，我們必須考虑我們欧洲盟国面对着远东的形势发展而流露出来的焦虑。他們有很多人担心我們会把大部分注意力轉移到朝鮮去，而把欧洲防务降到次要地位。为了证明我們对欧洲防务真正关心，我們决定增派美国军队到欧洲去。这些美国部队是包括德国人在內的均衡欧洲防御力量的一部分。最后一定要成立一个最高司令部来指揮这些力量。

当艾奇逊前往紐約和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英国外交大臣貝文一道参加9月12日的預备会談时，他就带着这项計劃。这两位政治家立刻就看到我們在鼓舞欧洲人的行动这一点，已經跨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法国政府給舒曼的指示却要他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建立一支德国军队的部署，以及可能作为这样一支军队的雛型的任何措施。貝文立刻注意到最高司令这个想法。他认为委派一个最高司令，特別委派一个美国人出任最高司令，将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激励欧洲人的行动。我們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組織登陆部队时的做法一样：先成立一个联合參謀部来进行准备工作，然后在有了具体指揮对象时再委派一名最高司令。

艾奇逊报告当时的情况說：

9月15日，上午12时15分。

“艾奇逊致总统亲收

“會議开了两天，由于在欧洲防务这个中心問題上相互坚持不下，遭到失敗。我要求并已召开了一个只有我、貝文、舒曼以及三国駐德国高級專員参加的秘密會議。这次會談的目的是要摆脱那些咬文嚼字的次要的障碍，而真正探索这个问题的实质。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并且，其結果虽然目前令人很沮丧，但我认为我們还

是会有进展的。

“我指出，您已根据国际形势的实际情况，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准备采取我们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步骤，在欧洲驻扎相当数量的部队，把这些部队加入到欧洲防御的整体力量中去，同意设立一个指挥机构，同意有一个最高司令，参加欧洲统一生产的计划，在经济方面则采取长远的步骤；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指望上，即别人也要尽自己的分内义务，这样整个计划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和平的希望会无比地加强；如果事与愿违，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会有打赢战争的最好机会。接着我又说，这就牵涉到欧洲的防御要尽量向东方伸展，而且，如果不正视德国加入的问题，不作出明智的决定，那么这个防御就不可能实现。我指出，在我们的讨论中，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准备接受我们的援助，但对他们自己应作的贡献却一字不提；而且断然拒绝在任何方式下考虑德国加入防御的问题。因此我想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这个问题，看一看我们目前的处境。

“在接着举行的讨论中，非常清楚地暴露出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是，贝文虽然实际上同意我的见解，但是他的政府却封住了他的嘴，不准许他发表任何意见。这是由于下院最近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辩论的缘故，在这次辩论中，工党政府对丘吉尔抱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害怕会泄露到美国报纸的手中，从而被丘吉尔在辩论中利用。我希望，这种情况不是永久的，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澄清。

“在舒曼这方面，困难就更大。他的态度是，除非同盟国的部队在欧洲大大加强，从而使法国政府能够应付由于德国武装力量的建立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否则作为政府的发言人，他不能或不愿意对德国加入的问题作出任何决定，甚至连原则上的决定也不可能。

“当时的事情很明显，他們誰也沒有自由裁決的权力，因而爭論也不能馬上解決問題，于是我提議研究一下他們每个人所采取的立場，目的只为了澄清我們的思想，而在他們重新有伸縮的余地时，我們就能知道我們各人对于这些不同的論点究竟是怎样看的。

“我认为，可以公正地說，这次討論是有好处的。它彻底地推翻了要等到联盟国軍隊完全配备好以后，才开始組織德国部队这一主张的实际意义。我认为，这次討論粉碎了他們的恐惧的任何邏輯基础，他們害怕，一旦让德国人加入联盟，在西方建立武装力量，就会更加引起俄国人專門为反对建立联盟的实力这一事实而发动一場預防性战争。我认为，我們已表明，在这个問題上同德国政府打交道，并不是作为一个祈求者，只不过是同意阿登納所已提出的要为欧洲部队提供部队的建議，并由于我們接受了他的建議，而促使他接受条件而已。

“这一切都是有益的；然而这次討論結束时有一个情况是很明显的：他們准备接受我們所給的东西，但是他們却不准备接受我們所提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現在正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們并不是把什么特定条件强加在他們身上，但是在他們的态度沒有进一步明确以前，我們就不能再进行这个討論。結果我国代表团无法按他們准备同意的事項发表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文件。我們在这次三边会談第一阶段結束时所发表的公报中，无法宣布任何决定，只是說，我們将在理事会里繼續进行討論，我們將于下星期恢复会談。

“我打算在理事会的會議上把这些問題重述一遍，并且已經获得欧洲較小国家的有力支持。看来在星期六晚間以前，我們还不大可能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但是我可以肯定，英国人和法国人有点越来越坐不住了。我們以后还必須作进一步的会談。在事态沒有新的发展以前，我也許有必要回来向您作进一步請示。就目前

情况來說，您无需担心；但消息很可能已經透露給新聞界，并且把一切并不順利的情況全傳开了，我认为您必須考虑这一情况。我相当有把握地认为，我們會成功的；問題是誰最能沉得住气，并采取正当途徑来解决罢了。

“我現在亲自口授这个电报給您，使您充分了解我的想法，并希望在您认为我可能做錯的地方給予指正，或者給予我任何必須遵循的指示。我将同您密切联系使您全面了解一切情况。”

貝文接到本国政府的指示，要他和艾奇逊一道为有德国参加的联合防御力量工作。由于艾奇逊的努力，除法国以外的所有成員国都接受了联合部队的建議，虽然像挪威和比利时这些处在联盟外围的国家对这一点并不像比、荷、卢国家那样热心。可是总地說来，在建立一个有效的西欧防御的道路上，只有法国人在阻撓了。

在北大西洋理事会休会期間，同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会談仍在繼續进行。三国的国防部长也与外交部长們一道参加了会談。法国派来了儒勒·莫克。从伦敦来了伊曼紐尔·辛威尔，而我則指派了乔治·馬歇尔，他是刚被我說服，离开了理应享受的退休生活，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出任国防部长这一重要职位的。

在这些人的坦率会談中，看来非常明显，法国人如同我們或英国人一样地認識到，如果想使欧洲有效地得到防御，就需要德国的人力。他們深信，在一支欧洲防御部队真正建立起来以前，法国議會是决不会同意任何把德国武装起来的建議的。法国国防部长莫克先生非常坦白地說，在他对德国人加入拟議中的联合部队这一点拿定主意以前，有三个問題需要得到解答：

- (一) 計劃要建立几个德国师？
- (二) 派遣到欧洲去的美国师究竟有多少？
- (三) 美国如何派遣这些师？

当我听到馬歇尔將軍和辛威尔先生能說服法国国防部长，使他同意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具体答案以前，还是可以在原則上取得一致意見时，我感到很高兴。馬歇尔列举十項工作，这十項工作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可以立即着手做的，而且又不会影响莫克要求回答的那些問題以后所作的决定。馬歇尔敦促道，最重要的是要在原則上取得諒解。譬如，美国可以声明，它将迅速地增派軍隊到欧洲去，但是，由于目前朝鮮正在打仗，它还不能确定具体日期。同样，法国人也可以表示同意，为了保卫欧洲應該建立一支联合部队，而且應該把德国的人力包括在內，虽然在目前阶段还不能說明德国人所承担的部分究竟有多大或者多小。我认为馬歇尔的这个典型的明智的办法很有道理。

在以后一次分別举行的会談里，艾奇逊和馬歇尔向舒曼和莫克保证，我們願意和法国人討論在經濟上帮助他們軍事計劃的問題。在这个保证下，法国人才願同意艾奇逊早先向貝文和舒曼所提出的一般原則。因此，9月26日，在紐約发表了一項公报說，北大西洋理事会已同意建立一支保卫欧洲的统一武装部队。这样就留下了許多事項有待取得協議。法国总理普利文先生出面提出了一項計劃，这个計劃允許德国人参加欧洲防御部队，但只是作为現有的作战团队的补充部队。即使这个計劃不能使人人滿意，但它至少是进一步討論的依据。

我們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着手筹划这个统一部队。各有关方面都諒解，行将指派出来的最高司令将是一个美国人。事实上，在我們筹备这个計劃时，我就一直考虑到艾森豪威尔是承担这项特殊任务的当然人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艾森豪威尔將軍担任欧洲盟軍統帅的时候，他統率一个由好几个国家軍隊組成的作战总司令部，表現了卓越的指揮才能。他在欧洲有很高的威望，让他出任欧洲防御司令部的首脑正表明我們使这个共同努力获得成

功的决心与願望。

10月19日那天，我在一封致艾森豪威尔的函件后面亲笔写了这些附語：“我希望你一到华盛顿就来看我。如果我請你来的話，那就会使那些无事空談的先生們胡乱猜測了。”

10月28日，艾森豪威尔將軍到白宫来見我。我把我考虑要他担任的工作告訴了他。他一言不发地听完了我的話，然后說，他願意接受这个任务。艾森豪威尔对我說，他所以願意接受这个任务，是因为他是一个軍人，而这又是要求一个軍人服役的召喚。但是，他又对我說，他乐于接受这个职务，因为这是一桩急待进行的工作。他說，他坚信把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而且迅速地联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两天以后，我接見了北大西洋公約各国的国防部长与国防負責人員，并且暗示他們說，有一位最高級的將軍将出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高司令，而且我已經和他商量过这件事。

這項任命直至12月18日才正式发表。这样做是为了使北大西洋理事会能够通过一項決議，要求我委派一位美国將領担任欧洲盟国最高司令。同时，迪安·艾奇逊从布魯塞尔的理事会會議給我发来一封函电，报告說，理事会會員国一致表示希望我能委派艾森豪威尔將軍。我立刻回答說，我委派的正是艾森豪威尔將軍。

这位新任的最高司令于1951年1月前往欧洲，旨在迅速考察局势。随后他回到华盛顿向我作了全面的报告。我建議他把欧洲的局势向国会报告，同时通过广播向全国报告。我认为，这些报告会起作用，因为它都是极为坦率而誠实的。

艾森豪威尔向我，后来又向一次內閣會議报告說，虽然他发现大家在欧洲統一防御的原則意見普遍一致，对这个防御可能成功地組織起来的意見也是一致的，但是他发现，在要求各国提供力量上要获致諒解却大为棘手。他說，在他最近所作的視察旅行中，他

在每个停留的地方都要問：“你們准备做些什么？你們必須准确地告訴我，你們准备做些什么，以便我向美国政府作报告。”

艾森豪威尔說，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离不开一个冷酷无情的事实。这就是西欧的穷困。艾森豪威尔說，他发现，这种穷困就意味着不可能用同一尺度来衡量各国的贡献。举例說，我們不能指望西欧人在防务上像我們所花费的預算百分数那样来动用它們的預算。他們是这样的貧困，以至有些国家已不能比現在多花一些錢。

艾森豪威尔在內閣會議上发言时說，主要的工作是我們要使这个“联合的实力作螺旋形的上升”。他說，“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信賴这一事业的。現在，他們已开始相信自己了。他們已开始相信能够胜任这一工作了。我們能給予他們这种信心的办法是运送装备和派遣美国军队到欧洲去激励士气。”

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我的欧洲政策。从他被任命为最高司令那天起，一直到1952年他回国投入政界为止，始終是孜孜不倦、忠誠不渝地为这个政策而努力。在他留駐欧洲的整个期間，他常常直接地或通过阿弗里尔·哈里曼写信給我，而且他在欧洲的每件工作始終获得我的充分支持。

艾森豪威尔駐欧洲将近一年的时候，在1952年1月初給我写了一封詳尽的长信，汇报第一年的工作。他回顾在建立一支欧洲军队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且談論到一些有待完成的重大事項。他主张这些欧洲大陆上的联盟国家，必須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巩固而工作。英国很难与这样一幅图画相适应，他同意英国人的意見，就是他們应当和拟議中的欧洲防御集团結合起来，但并不直接加入。据艾森豪威尔的看法，溫斯頓·丘吉尔可能重新在英国組閣，这就意味着将会更加強調政治上的联盟。艾森豪威尔敦促我趁即将到来的丘吉尔訪問華盛頓的机会，說服他发表一个“响亮的声

明，这个声明将尽量不談英国的不参加政策，而強調英国在道义上、政治上以及軍事上支持欧洲軍。”

丘吉尔的訪問是一次值得欢迎的旧友重逢，也是我所期待的一次訪問。虽然他脫离政府已經六年了，但是我們还是經常保持私人联系。当他再一次作为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时，我来欢迎他，感到特別愉快，尽管我知道我們两人以及我們的隨員之間还有許多困难的問題尙待解决。

在和丘吉尔的三天会談中，我們涉及的問題非常广泛，其中之一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問題。丘吉尔解释說，他非常清楚地認識到美国在这个共同事业中承担的重任，他說，联合王国将尽它力所能及承担一切。然而，他指出，他們近年来对于島上的五千万人民的生活与精力已經抽取殆尽，他又說，他們还失去了海外的大量投資。他說，英国有許多許多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联合王国如果現在还要假装它能承担自己力所不及的重負，也是徒然的。

我回答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五十年中，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德国人在我們国家里曾經投資达許多亿美元。其中一部分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英国人和法国人偿还作战物資用掉了。当然德国的投資已經作为敌产被沒收了。我說，“你們在这里的后备金，現在实际上已成了财政上的剩余資金，我們希望能根据第四点計劃或其他方法把它重新投資到国外去。自由世界的复兴也是我們必須做的許多极重要的事項之一。我們要使自由世界形成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

我提醒首相說，自从战争結束以来，我們已經把近六百亿美元送到海外去，但是要記住一点，今年是大选年，国会在选举临近的时候，很不願意增加国外費用的。

丘吉尔說，他当然了解选举对于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立場有

什么影响。去年，他们在英国有过两次选举，当英王陛下政府的政治前途动荡不定的时候，就很难采取坚决的行动。可是他认为，他们目前在英国，“至少在几年内”，已经无需再为选举奔走了。

1952年总统选举日益临近，在各友好国家的首都引起了莫大的焦虑。在公約沒有签定以前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没有被派去組織防务以前所流行的那种疑虑和恐惧又在各地重新出现。我们发现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們裹足不前，因为他们需要肯定，他们不是向投票选举孤立主义政府的美国人承担义务的。

我們的外交官們报告說，当他們获悉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基本上相信需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欧洲防务的人物时才放了心。美国对外政策所存在的一个事实就是华盛顿政府的变动不定，总是使我們的国外朋友忧虑不安，使我們的敌人产生了希望。那些負責任的人物必須牢牢記住这个事实。他們都沒有忘記在哈定接替威尔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世界來說，又是多么严重的灾难。

当輪到我把政府的大权移交給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时候，我也移交給他一些計劃；我完全了解，他能領会我拟定这些計劃的动机并且持有相同的看法，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是这些計劃之一。总而言之，他在这个計劃中起过极重大的作用。

对德条約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約尚待完成。我們曾經希望这些条約能够在1952年年底被批准，可是到了11月，在法国和德国（在德国的程度要輕一点）都突然爆发了反对計劃中的条約的抵抗运动，因此条約的批准很可能进一步拖延下去，虽然这种拖延仅限于事情的时间上和某些重点上，而不是原則上的。

西欧防务的架子已經建立起来了；它之所以能够建成主要是因为我們决心打破传统，加入了一个和平时期的軍事同盟；因为我們决心不仅承担我們应尽的职責，而且还在联合部队的形成过程

中起领导作用；因为我们认识到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欧洲对于世界和平是有极大好处的，因此欧洲的统一和欧洲的实力是防止另一次大战的最有效的保证。

第十八章

美国农业计划

我是在农场里长大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帮助我父亲工作。我的老家密苏里州主要是一个农业州，我的弟弟维文直到今天还在经营农场。我知道农民有些什么问题。当我还在一家银行里工作时，我就知道农民的富裕对于国家的福利是多么重要。

每逢歉收，银行就遇到两种情况：农民提取他们的存款，接着许多农民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当农民遭受灾害的时候，批发商和零售商也要受到损失。这种景象的发生，就是经济上的根本教训。农民富裕，国家也就富裕，农民贫困，国家也必贫困，这是一个实际的例证。

1921年农产品的价格惨跌，在整个二十年代中，农民仅仅能够勉强维持生活。过了不久，1932年，民主党获胜。接连实现了许多正确的政策，恢复了农村的繁荣，因为新政认识到，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趋于稳定，必须使农业收入稳定。水土保持、三A法案^①、农村信贷的实施、乡村电气化等等以及其他措施都有助于农业恢复繁荣。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有力地要把这种繁荣的趋势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美国的谷物运往海外资助我们的同盟国，而且国内就业者大大增加，因而使国内粮食的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即使在战后，救济物资外运和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仍然继续需要美国

^① 三A (Triple A) 是农村经营调整法案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的简称。——译者

的农产品。

在这些年間，政府保证了农产品的价格固定在一定的水平上；粮食方面的繼續不断的大量需要，使政府保证的差价降到最低限度。結果 1948 年美国农民的经济地位胜过历史上的任何年代。

农业上的現金收入，每年达到三百亿美元，而 1932 年却不到五十亿美元；同时以农田作抵押的貸款从 1941 年以来已降低了 25%。农民在銀行中的存款和儲蓄有二百二十亿美元，这是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数額。

这种农业上的繁荣固然部分地是由于战后一些特殊因素所造成，但是从 1932 年以来所采取的有关农业的正确的立法，为农业的持久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更加有利的基础。例如，1932 年我們当时就没有什么水土保持計劃，沒有价格補貼計劃，也沒有学校午餐計劃，有的只是一个有限的农业研究計劃。

虽然如此，农民仍然会发生恐惧。例如像 1921 年的那种突然变化，就可能使农产品价格大跌。我曾打算尽我所能避免农业不景气的发生。当时我感到，农民在战后有权获得真正的保障，以避免粮价的暴跌，而且整个国家也必须得到保障以免农业不景气的发生。当时我需要一个行动計劃，以保证 1932 年以来所获得的利益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保证在美国农业有組織的、持久的和现实的繁荣基础上，把我們的經濟建設事业向前推进。

对于那些沒有适当分享美国生活发展成果的許多农民家庭，我是非常关怀的。正如我的报告所指出的，在絕大多数的乡村社会中，住宅問題、医疗事业和教育設備仍感不足。有些农場由于道路不便仍然陷于孤立状态，另外一些农場則缺乏电力供应。

我确信，联邦政府在建立持久的农业富裕和使农村生活能吸引后代的美国人民方面，是責无旁貸的。过去十六年中的那些正确的、影响深远的立法，为农业不断的进步打下了最良好的基础，

但是在我們的农业計劃上許多地方需要扩大和改进。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們需要有一項永久性的农业商品价格的補貼制度。我相信，全国應該得到保障，以免受到农場价格巨大波动的影响。这在过去曾經引起过經濟上的不稳定，使我們全国都受到影响。再者，我們需要有一項更强大的水土保持計劃，而重要的是，应当采取步驟維持农产品的足够市場，以及改进将这些产品分配到消費者手里的办法。

为了解决上述种种問題，我曾要求农业部长查尔斯·布兰南将农場情况加以全面研究，并草拟具体的建議书，因为布兰南和我曾在三、四次不同的場合下討論过各种計劃和主张。当他的报告最后写成时，他前来白宮同我逐条加以审核。

这个方案的目的在于保证农民有稳定的收入，实现这一方案所要采取的办法我很贊成。让每种有关的商品在市場上寻找它的价格水平。假設这种价格水平低于农民的正当收入，政府在預定时期的結尾就直接付給农民一种差价，这种差价就是他在某一銷售期間商品所得到的平均价格和用一种公式計算出来的合理价格之間的差額。

这种办法並沒有什么新奇的地方，1937年和1938年就曾首次用它来補貼棉花的价格，也曾用来維持甜菜价格，而且直到現在还在实行。美国的每一个甜菜和甘蔗的生产者只要所售出的农作物的价格低于法定公式所定的价格，每年都要从政府收到一张补偿差价的支票。关于羊毛，也有类似的立法，而且实施時間也同样久。

确切地說，布兰南要求我批准的那个計劃，可以使容易腐爛的商品，如肉类、乳制品、鸡鴨和蛋类等，在市場上按消費者可以負擔的价格出售。这个方案首先要用于乳制品，因为許多市場研究資料都表明，牛奶价格和牛奶消費量是紧密相連的。在牛奶价格下

降时，牛奶消費量就相应地上升。这样我們差不多就可以明白指出，牛奶在某一較低市价时能够更多地售出多少夸脫^①；并且，这种办法也为其他商品提供了一项可靠的指数。

这项計劃的基本观念，并不是像以往做的那样从农业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农业經濟，而是从生产和富庶这一点着眼的。我們要使农民生产日益有利可图，同时又要使消費价格水平保持在一般人有能力购买这一点上。如果没有这一类的政策存在，农业产品的价格水平将成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农民种植越多，所得越少，他所能消費的也就减少；农民消費愈少，非农場商品购买量也就愈少；非农場商品銷售量愈少，用来付給农民所要出售的东西的金錢也就愈少。不久以后被称为“布兰南計劃”的这个計劃，就是为了打破这个循环所設計出来的一幅蓝图。

布兰南指出，“农民的价格補貼办法，相当于劳工的最低工資、社会保險以及集体議价制。”如同劳工一样，农民在談判桌上是不平等的。他所付出的产品价格一般都是确定了，这种价格往往都是由壟断者或制造商之間的默契而确定的。但是个体农民的农作物一上市就不得不脫手，結果是他必須接受人們所給予的价格。我記得有許多年頭，小麦低到四角四分一蒲式耳^②，而其他的时候又高到三块美元一蒲式耳。我知道玉蜀黍一蒲式耳的价格曾經在二角二分与二元八角八分美元之間波动，裸麦一蒲式耳的价格曾經在三角与四块美元之間波动，而棉花一磅的价格曾經波动于五分与四角之間。

陈腐的自由貿易理論家們会对我們說，答案就是把生产单位削減到最适宜生存的地步。但是这种理論是不人道的，因为这在人情上說，意味着家破人亡，把一家一戶的田庄交給那不照面的地

① 一夸脫約合 1.14 公升。——譯者

② 一蒲式耳約等于 36 公升。——譯者

主或公司組織的主人。任何名副其實的美國政府決不會讓這種事情每隔二十年左右發生一次。農民的安全意識是美國生活基礎的主要部分。

布蘭南計劃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將價格補貼的重點從商品購買上轉到生產支付上面。根據當時的法律條文規定——我很遺憾地說，現在還是這樣規定——農產品價格不是用政府平價水平貸款就是由政府公開市場上購買予以補貼。結果是，當價格低於國會所規定的保證標準時，大量的剩餘產品就積存在政府的金庫中，而消費者都得不到過份供應的好處。這種辦法產生一種螺旋式的後果：消費者由於價格較高購買較少；同樣理由，農民受到鼓舞而生產更多；這種不平衡狀態就更趨惡化了。

然而，根據布蘭南計劃，如果包括在計劃內的某種產品價格降低到補貼水平以下，那麼農民所接受的价格和補貼價格之間的差額則由政府直接補貼農民。而消費者卻能享受到較低價格的好處。消費者因此會受到鼓舞而多多購買，而這種需求的增加將會使價格再度提高。根據這個辦法，對農民的補貼就將變成自己補償自己了，這句話更確切地說，就是對一般的福利將有所貢獻。

我們建議實施價格補貼辦法所採取的方式也有另外一種重要變化。正如我一向所認為的，農業價格補貼辦法只有一個真正正確的理由，那就是要使普通農家能夠維持一種相當美好的生活標準。但是，根據商品購買計劃，巨額支付卻是交給（現在仍然如此）大量經營土地的公司，它們儼然成為大量生產的工廠了。然而這些公司並不是那類需要政府支持以維持地位的農場主。這種農場經營在我們的經濟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這種經營對於國家的生活和福利來說，還不能像千百萬農業家庭的工作那樣有着重大關係；因為他們常常累得“汗滴禾下土”。

布蘭南計劃中有一項規定，任何一個農場的生產超過某種限

額或在某种限額以上的則不付給生产補貼。这种限額定为一千八百个生产单位，按 1949 年的价格計算，这就是說，有关商品的价值实际上达到两万美元左右的，就不給予生产補貼。

生产单位定为十蒲式耳的玉蜀黍，或現金相等的其他农作物。选择玉蜀黍作为基本谷物的理由当然是很明显的：我們的农业經濟实质上就是玉蜀黍經濟。这不仅是由于我們生产了大量玉蜀黍，实际上我們全部的家畜和乳产品也都是依賴玉蜀黍作为主要飼料的。

世界上沒有其他国家把整个农业經濟放在玉蜀黍上。这一点可以拿事实來說明：美国每年产玉蜀黍約三十三亿蒲式耳，我們所有的家禽、蛋类、牛肉、猪肉、以及我們的一切牲畜生产都是依靠玉蜀黍的。当然也有其他谷物飼料，但是所有我們的农村畜牧生产，从小鸡到健壮的牛馬，主要是依靠玉蜀黍的。

以玉蜀黍来确定生产单位，其他一切需要補貼的农产品的关系都可參照玉蜀黍的价格而予以稳定了。比方說，如果一千八百个生产单位的玉蜀黍可以換得二万美元，那么，生产价值二万美元的小麦或裸麦或馬鈴薯的，也就是一千八百个生产单位。一千八百个生产单位是发給生产補貼金的最大限額。

小农协会的代表們抱怨說，这个限額太高了，那些需要最迫切的小土地經營者却得不到这种拟議中補貼办法的好处。但是，重新分配財富并不是这项計劃的目的。我需要一個能够为农場服务的农业計劃，而且这项計劃的制訂要避免使农业公司利用这一計劃牟利自肥。規定的单位限額，只实际应用于美国的农場經營主中的 2% 左右，但是他們所生产的却占全国农产品的总額的 25% (以金元計算)。

布兰南部长向我提出警告說，这种有利于所謂家园式的农民的建議，将会被指摘为含有政治意图而受到攻击。他說，对于农业

經濟來說，這是一項新的和不尋常的建議，因而難免要被人批評過於激進，或者被當作一種政治姿態。但是，這並沒有引起我的憂慮，因為我曾經仔細而謹慎地研究過這種規定。

“呃，查爾斯，”我說，“這是對的，是嗎？”

布蘭南回答說，他認為這的確是對的。

“那就把它保留在裡面吧，”我對他說。

非常有趣，單位限額這一點幾乎絲毫沒有受到批評；我以為其中的道理是：這項計劃的批評者們看到限額政策所依據的論點是駁不倒的。

這項建議剛剛公開發表，新聞界立刻為之嘩然，許多作家在報紙上大加責難，認為布蘭南計劃含有社會主義的和政治性的意圖。布蘭南部長在 1949 年 4 月 7 日的眾議院農業委員會和參議院農林委員會的聯席聽證會上解釋了這個計劃，此後，參眾兩院會因這個計劃引起許多激烈的爭論。

我曾預料到這樣的批評。對布蘭南計劃所發出的叫囂，同美國醫藥協會對健康保險計劃所作的怒吼完全一樣。美國農村聯合會對價格補貼計劃展開了攻擊；這個聯合會以阿蘭·克林為首，代表享有特殊利益的農民。他們所持的理由，同私營公用事業公司反對政府將公有電力供應人民的一切努力，及美國醫藥協會反對有利於全民健康的計劃所持的理由完全相同。

對於反布蘭南計劃的運動我並不介意，這個運動一年之中就花費了農村聯合會會員們的五十萬以上的美元。我知道農民們自己的願望和需要是什麼，因為我在 1948 年曾親自與成千上萬的農民談過這個問題。我對於那些大批花錢的國會外的巨大實力派在華盛頓大談農業、地產、電氣、醫藥或任何其他問題，向來不感興趣。他們並不能代表那些真正進行工作的人的意見。他們所代表的都是自私自利者的特殊利益，那些人支持這些實力派替他們進

行立法斗争。

我必须战胜的是对于象“社会化”、“社会主义”、和“给予补贴”等这些可怕字眼所持的传统态度。许多年以来，工业和商业一向以邮运许可证，运费率，以“保护”一词作掩护而图谋特殊权益的关税，工厂建筑的租税特权等等形式，要求联邦政府予以津贴。在我们这个时代，农业依靠这一类的援助并不逊于工业、劳工或商业。平价办法努力的唯一目的是把农业提高到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所享有的水平。

布兰南计划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它和每届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民主党政府一直试图通过价格补贴以及旨在加强和稳定这种基本职业所进行的其它种种努力，从而提高美国农村人口的生活标准。

反对党一直想使农民相信，他们正被人置于各种管制之下。为了使这种平价立法得以贯彻，农民必定同意这些管制。罗斯福当政以来的每届选举中，共和党人一直试图诱导农民投票否决这些管制，这样价格就可以找到它们自己的水平。如果农民最后接受了这种劝告，价格必将惨跌，而他们也必将回到1920年的光景。

我希望看到农民能够达到比罗斯福和我执政期间所享受到的更高的繁荣水平。这只有通过像布兰南部长所制定的这种积极计划，才能实现。不幸的是，国会竟拒绝把这项计划变成法律。

第十九章

共产党的顛覆活动和政治迫害行为

我一生都在同偏見和狹隘进行斗争。

当我年輕的时候，看到某些人对其他种族和宗教的态度就感到不安。以后虽然年紀大了，但我始終不能理解，人們怎能忘記他們自己的自由是怎样得来的，而且又是多么幸福。

有些人把人权法案看作理所当然的事，对于这种人，我看不下去。宪法修正案头十条中所包含的人权法案，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自由的保障。

在法律面前，机会均等和法律平等，并不是老生常談，或漂亮的詞句。它們是一个曾經反抗专制政治的民族的活生生的成就。多少世代的人們为了逃避本国政府的压迫，跑到美国来。竟有些自称为美国人的人变成了压迫者，这件事始終使我迷惑不解。

制定宪法的老老少少都知道他們究竟在干什么。他們飽尝乔治三世君主专制的苦头。他們了解压迫和迫害的含义。

有人說，如果宪法里沒有人权法案，他們就不拥护宪法，杰斐逊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

人权法案中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就是有权要求免于“自陷于罪”^①。这是我們自由的基础的基础，而且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中有明确規定。

① “自陷于罪”（self-incrimination）是美国法律中的一个术语。免于“自陷于罪”的权利，意指当事人对一切有可能使自己陷于罪责的問題，有权利拒絕回答。——譯者

随着共产主义的出现，世界就开始有洗脑筋的暴行。根据这种方法，男男女女，无论有罪无罪，一律被迫作自我招供。

在警察国家中，任何人都免不了受迫害。被迫洗脑筋的人失去了希望，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

在美国，人人都得到人权法案的保障而不受迫害。

近年来，有人竟肆无忌惮地企图破坏人权法案中的某些保障，这使我惊讶不置。麦卡锡之流的做法，使人觉得只要要求享有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权利，那就是犯罪。麦卡锡甚至猖狂到这种地步，把那些想援用宪法权利的人也說成是援用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人。他曾指控說，这些见证人濫用第五条修正案。

事实上，濫用宪法修正案的并不是援用第五条修正案的人，而是把那些根据修正案要求权利的人說得好像是当然罪犯而实际上又无法证明这个人是犯罪的人。

当然，我們必須了解，出于政府的需要，在調查罪行或顛覆活动的时候，調查当局必不可少地从他們不能透露的方面获得情报。但是根据我們的訴訟程序，如果任何个人被控犯罪，他就有权利同控告他的人对质。

如果政府不能在法庭上提出证人，那就不能提起公诉。如果法庭对一个人不能提起公诉，那么，他就不应受到参議院或众議院的委员会的迫害。这是我的理論。当然，每个政府都在尽最大努力清除每一个不忠于祖国的工作人员。但是我們不应该用足以損害一个人名誉的方式来对待其余 99.9% 清白而誠实的公务人員，当然事实上，我們也沒有希望这样做。

在联邦政府中供职的二百三十万人中，坏人和品质不好的人当然是有的。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也像其他的人一样，容易受到交际和引誘的影响，这种交际和引誘有时会毀掉其中的一些人。但是我不贊成拿捕风捉影的罪名去控訴任何人，特別不贊成拿这种

罪名去控訴具备充当公務員的資格的人。

常常有人把道听途說的东西当作事实真相，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利用这种东西来攻訐政府工作人員，致使受害者无法自白。这正是共产党干的事，也是麦卡錫干的事，也是众議院的所謂非美活动委员会干的事。这样做同人权法案毫无相同之处。

剝夺个人根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的任何举动，不論它采取什么方式，都是对人民自由的危害。

以国家监护者自居的人和頑固不化的人，居然对我们的学校、大学和教会进行攻击。有些州議會紛紛組織了“小型戴斯委员会”，調查的流行病也传染到了学校的董事会和市鎮的議會。

我不认为学校教員需要进行特別宣誓。

我以为在公立学校中，教师进行像其他公務人員那样的宣誓就职，声明拥护美国宪法和教师所居住的那一州的政府就够了。

叫教师不討論或不讲授自由教育制度中應該讲授的題材，那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有讲授和学习的自由，教师讲授可以学习的任何事物，并不等于說教师是不忠誠的。知識是沒有限制的。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在教育中，我們不應該限制培育思想的机会。人的心智一定要有研究的自由才能得到进步，否則教育制度就沒有用处了。如果人人都千篇一律，学的也完全是一成不变的老一套，結果我們就会变成一个庸庸碌碌的民族。具有見地的人只能在教育自由的天地中表达那些見地。

如果我們像以往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統治之下或是像今天的俄国和西班牙那样，到了互相監視的地步，我們当初建立的那个共和国就变了样了。如果我們不信任我們的邻人和教导我們儿童的教师，那么，我們的国家就出了毛病。

人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当然使心怀叵測的人有可

乘之隙。但是如果你看见了坏人，还不知道他是坏人，那么，你就是咎由自取。

我认为美国并没有被人从内部颠覆的危险。

1930—1953年，我们没有利用暴力就实现了我们历史上空前的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这是根据宪法，由大多数人通过选票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并没有削减个人的权利。当然，有些人是不喜欢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的，特别是那些希望美国有一个高等阶级和低等阶级的社会的人。但是，今天，一般人的生活比以往更好，国家也更富裕，而且不管怎么样，人民也不允许被分成阶级。

但是不管实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真正的民主制度总是要保护少数人以防多数人的侵害的。

在联邦、州、县和市的各级政府中，除非掌政的人以保护人民的宪法权利为己任，否则你准知道你首先就会看见三K党、银衫党和像德意志同盟之类的团体，他们是在采取直接行动或争夺政权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时，人民将被控诉、被判罪而没有自白的机会。

三K党最猖獗的时候，侵犯人民的私宅，把人浑身涂上柏油、裹以羽毛，然后驱逐出境。三K党是反天主教、反犹太人和反黑人的。我记得那时候俄克拉何马的某些市镇中有这样的标语：“黑人，不许在这里让日光照到你们的身上。”

我们的关于自由的思想来自许多民族。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府，是由前来我国海岸寻求自由的各族人民的灵感、活力和思想所产生的；他们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丹麦人、瑞典人、荷兰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等等。

我们要警惕，不让我们的入权法案中所包含的那些自由，被那些煽动恐怖和歇斯底里的人以及侵犯人权的人所破坏。

在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然要采取特别措

施，保护政府不受破坏和不忠诚的行为的危害。政府的工作，以及它的许多国防和外交机密，必须加以保护不使落入外国特务之手。

但是，我始终相信，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共和国，使它同人权法案的精神一致，政府的最大责任就是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不公正和诬控所侵害。

我回忆起美国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时期，这种歇斯底里导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煽惑家和不负责任的人总是利用危急时期，煽动违背理智情感上的恐怖。于是种族的、宗教的和阶级的仇恨就沸腾起来了。在虚假的爱国主义和仇恨外国事物的名义下，给许多无辜的人扣上了罪名和提出控诉。

在这种群众性的激动时期，政府中的某些个人是他们特别选中的攻击对象。近年来，正象在其他时期一样，有些罪名是由于政治斗争而造成的，有些则是由于雇员的损人利己行为所引起的，而受害者往往就是他们的上司。在这样的气氛下，如果发现个别的雇员有不忠诚的行为，于是煽惑家就利用这一毫无牵连的偶然事件来加强歇斯底里，并且大有加罪于政府中所有雇员的趋势。在我们当中有些无可救药的偏激的人，只要他们发现一个罪犯，立刻就加罪整个民族、整个宗教团体、整个工会或整个政党，这种罪名满天飞的行为既损害政府的威信，也损害国家。

我认为，在政府中身负重责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些群众性歇斯底里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引起歇斯底里的事件。

举例来说，当法国革命高潮，雅各宾派在法国掌权的时候，杰斐逊就被人控诉为雅各宾党人，因此也就是不忠于祖国的。1798年，国会通过了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因为他们认为法国的革命人士企图控制我们的政府。

要实施镇压叛乱法，就只好把人权法案扔出窗外。当人们的头脑清醒过来以后，大多数还有效的法案都被废除了。

后来在 1919 年，又有密契尔·帕麦尔以首席检查官的地位，濫用政府的权力侵害許多公民权利的时期。那是一桩駭人听闻的事，也是当时共产党的歇斯底里的阴谋。

在其他歇斯底里时期，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是在完全违反人权法案中的各项保障的其他借口下进行的。但是，我們毕竟从这些时期中清醒过来了。而且我們今后也必然会从每一次的旧病复发中清醒过来，因为我們有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有自由的教育制度，同时也因为我們在自由选举中的投票权給予了我国人民控制和撤換政府的权利。在我們的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就象有人在大庭广众前发了神經病一样，他清醒以后总是感到非常羞愧，作为一个国家，在我們恢复理智以后也是这样。

这正是我絕不相信我国政府会被共产党从内部破坏或推翻的原因。政府的保安机关完全能够不动声色而有效地对付那些潜入政府中的共产党员，而不必求助于盖世太保的手段。

保安的工作是高度专门化的工作，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員、专家和經常的警惕。保安工作往往需要秘密行动，而不要公开的措施，因为公开的宣传事实上对保安工作是有害的。

一直到 1933 年，我們才承认苏联。我认为，罗斯福总统在外交上承认俄国是正确的。他在承认苏联时，曾提出一些苏联应当履行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俄国同意停止在美国进行的革命煽动或共产主义宣传的一切活动。

我們很快就发现俄国并没有遵守这个协定，顛覆性的宣传并没有停止。苏联继续利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作为推行革命政策的工具和战綫，推諉說它对第三国际的活动无法控制。我知道，美国也有一些政客，在企图破坏协定时，也說无法控制他們的党徒。

在这个时期，美国人民正在经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经济和

財政危机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和社会变革。我們有些青年和知識分子，似乎被俄国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建設新經濟的實驗所迷惑。这些青年和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数人不久就发现他們是受了欺騙，誤以为俄国的确在努力建設一种新的社会 and 經濟制度，以为这种制度会消灭压迫、失业、飢餓和战争。他們很快就发现，一群殘酷而手段巧妙的狂热者正在制造一桩大騙局，他們用类似国家宗教的一切裝飾建立了独裁政体。这种新政体給俄国带来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只是另一类型的独裁制。个人在永久的奴役下变成了国家的奴隶，而且，正像俄国人自己不久发现的，压迫、失业、飢餓和战争并没有被消灭。

苏联的权力主要来自千百万被奴役的劳工和丰富的資源；它集中力量建立龐大的軍事机器。这給世界带来了新的威胁，因为这是巨大的軍事力量和革命力量的結合，目的是通过顛覆、革命陰謀和第五纵队來征服世界。

負責領導我国政府的保安工作的人，都充分警惕和了解共产主义危險的新威胁。

在同一时期，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发展起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利用抵制共产党的威胁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开始威胁和平。由于这种国际紧张局勢的結果，共产党和法西斯的活动和陰謀就在我們国内加强了。

为了制止顛覆活动的蔓延，政府有必要制訂特殊的法律。

国会于1939年8月21日通过了哈奇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政府中的任何雇員参加以推翻美国政府宪法形式为目的的政党都是非法的。哈奇法案規定，調查的責任属于联邦調查局。

在这种国际恐怖和陰謀的气氛下，某些煽惑家企图利用这种局勢，作为政治資本是十分自然的事。1939年，在我当第一任參議員任期快要屆滿的时候，得克薩斯州的众議員馬丁·戴斯开始大

声疾呼說政府中有共产党。他提出了許多粗暴的控訴，以后他成了众議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我在参議院的議席上會斥責他进行問訊的方式本身就是最非美的。出席該委员会的证人常常受到威胁和誣告，既沒有机会知道他們被控罪名的来源，也沒有机会证明被控罪名不符。事实上，人民是由国会的委员会审讯，而不是由法院审讯。这是濫用国会的調查权达到危險的地步，这种权力原来仅仅是为了帮助制訂法律的。戴斯委员会采取的方法开了一个先例，从此以后这种做法就传遍了整个国会。

我記得，副总统加納——烏发尔德^①的哲人——当时就对我說，“对美国政治的前途，戴斯委员会的影响比国会任何其他委员会都大。”当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不相信，人民会长期被这类肆意攻击的指控迷惑住，也不会长期受这种处理如此重要問題的不合理的程序的影响。可是，不幸的是杰克·加納的預言应驗了，而我是錯了。众議員戴斯以及他在国会調查中的继承人所用的方法，牺牲了美国公正无私的作风的部分品质。

1939年，欧洲接二連三地发生了危机。9月間欧洲爆发了战争，法西斯党徒和共产党人虽然据說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希特勒和斯大林却违反常情地簽訂了一項互不侵犯条約，作为战争的序幕，同意两国共同瓜分波兰。这使西方国家大为震惊。

当俄国出兵波兰直达寇松綫、随后又侵入芬兰的时候，美国的輿論对共产党极为憤怒，激昂的程度超过共产党統治俄国以来的任何时期。

我們的政府用哈奇法案武装了自己，現在警惕更提高了。

俄国和德国对波兰的海盗式的瓜分产生了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諷刺剧——德国进攻俄国。希特勒为了統治世界，不顾一切，

^① 烏发尔德(Uvalde)为得克薩斯州的一个县。——譯者

事前不动声色，突然掉轉矛头来进攻苏联。于是世界的均势再一次改变了。随着均势的改变，我們也改变了对俄国的态度。

出于本身的需要，这时俄国不得不随同英法两国对納粹作战。丘吉尔立刻把俄国当作为共同事业而奋战的同盟国来欢迎它；其他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战的国家也同丘吉尔一样欢迎俄国为同盟者。

由于希特勒的危险越来越令人震惊，美国人民这时就更加以同情的态度来对待俄国了。

俄国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工业资源很不充裕，难以抵抗高度机械化和迅速挺进的德国军队。斯大林竭力呼吁我們援助他們，要求供应原料、粮食、机器以及軍事和运输装备。我們的政府乐于給予帮助。

正是在美国对俄国的同情逐渐增加的时候，許多极端分子和亲俄的拥护者开始鼓动对苏联进行全面援助。对于俄国既有这样熾烈的情緒，負責我国安全工作的人就有責任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来保护我們政府和国家的重大利益。

俄国人以典型的共产党的两面手法利用了这种同情，攪乱了許多方面的同情者的心緒，又欺騙了許多別人。

当时，我們有些最爱国的公民，包括軍事和政治的領導人物在內都相信，在建立世界的持久和平上俄国的支持是可以信賴得过的。

随后就发生了日本突襲珍珠港的卑鄙事件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向我們宣战，这一切最后把我們拖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俄国人現在成了我們的积极盟国，每个俄国士兵都在为我們打仗，正如同美国人很快就要为俄国人打仗一样。

在这次反对最强大、最殘酷的敌人，爭取生存的共同作战中，我們实行了一项龐大的計劃，把我們能够拿出来的一切物資都供

給俄国。我們开始牺牲我們自己的需要，把大量的食物供給他們。我們展开了广泛的航运計劃，并且在努力突破德国潛艇封鎖的时候，遭受了严重的損失。

俄国人的生存虽然需要倚靠我們的援助，但是他們却表現了一些令人捉摸不定的迹象。他們不願同我們的军队交換情报，不讓我們的飞机在他們的后方降落，即使这些飞机是送交給他們的也是这样。他們要求把飞机和其他物資运往北部的港口，或者送到高加索以南的伊朗基地。

当胜利的浪潮开始上涨时，俄国人的态度也就更加明显了；俄国人正沿他們的战綫追击德国人。

但是，我們还是繼續援助俄国，竭尽全力同他們相处。我們这样做有几个原因。同俄国人交手的敌人每增多一个，同我們对垒的敌人就减少一个。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还很渺茫，我們需要俄国人在那里帮助我們。沒有俄国人参加，世界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正当我們努力同俄国人合作的时候，我們的負責安全的专职人員也都沒有放松警惕。他們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絕不給任何值得怀疑的人以可乘之隙。

从1940年起，罗斯福总统下令由联邦調查局、海軍情报局和陆軍情报处成立一个組織，負責对有关顛覆、間諜和破坏活动等方面的調查工作。

1942年罗斯福总统发布一項战时指令，授权文官委员会停止忠誠受到合理怀疑的任何人在政府工作。

1943年2月5日罗斯福总统頒布了第九三零零号行政命令。

根据这个命令，任命了由各部組成的五人委员会，就被控参加顛覆活动的雇員的問題应采取的行动，进行考虑并向政府各部提出建議，陆軍部和海軍部不在此例。这两个部有自己的調查机构，但也可以征詢五人委员会的意見。

五人委员会有权接受联邦调查局根据向他们提出的控诉所作的一切完备的调查报告，并对各部门和各机构就应当采取的程序和行动提出建议。反过来，委员会得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各部门所采取的行动。

这道行政命令明确规定，五人委员会不得采取行动去限制各部门和各机构根据法律停止任何雇员职务的权限；又规定，如果司法部认为立即逮捕和把案件移交法院审理的措施是正当的，该委员会也不得阻止这种措施。

因此，从1942年以来，政府就一直在考核政府雇员的忠诚。由于这个制度出现缺点，曾经过修改和改进。阿瑟·弗来明领导下的文官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已由联邦调查局加以扩大。

1946年，我下令彻底研究有关政府调查忠诚的程序，为的是要加强安全计划而又不致违反人权法案。

1946年11月25日，我颁布了第九八零六号行政命令，设立总统临时雇员忠诚委员会。我训令这个委员会：第一，研究对于政府雇用人员或向政府申请职业人员进行调查时的标准和程序；第二，研究关于不忠诚或颠覆分子的撤换或撤职的条件；第三，对现行的关于忠诚调查的立法和行政程序的改进办法提出建议；第四，明确忠诚案件中的行政责任，确定忠诚标准，以保障政府不致雇用不忠诚或颠覆分子；第五，拟定诉讼程序标准，保证被控告的人受到公平的审讯。

我任命下列人员作为各机构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德维特·瓦尼希，司法部部长特别助理（主席）；

约翰·普里弗伊，国务院负责行政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

爱德华·弗莱，财政部助理部长；

肯尼思·罗亚耳，陆军部副部长；

约翰·沙利文，海军部副部长；

哈里·密契尔，文官委员会主席。

1947年3月20日，该委员会向我呈递报告。报告指出，从历史上来说，文官委员会是不准调查雇员或未来雇员的政治或宗教的主张或来历的，而且在非政党的公务员中，这一点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直到1939年哈奇法案通过以后，才肯定“有危害性的政治活动”的范围是可以正式加以禁止或侦查出来的。接着委员会的报告追述了1939年以来旨在取缔政府工作中不忠诚分子的立法和行政活动的发展情况。

该委员会根据对政府各机构的广泛调查，作出结论说，事实上，行政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步骤并不一致。判断的标准同办理程序一样，也因机构的不同而不同。至于究竟哪一种计划能更好地达到目的，意见也有很大的分歧。

该委员会完全同意我们需要有某种计划来打击政府内部的破坏活动。他们听取了政府各种情报和安全机构的证言，这些机构向委员会明确说出了国际的形势，以及对我国政府进行渗透活动的可能尝试。关于后一点，委员会报告说，它虽然相信“雇用不忠诚或颠覆分子对于我们的政府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凭空设想出来的威胁，但是它（委员会）根据各方提供的事实，还丝毫不能肯定地宣称，这种威胁的作用究竟是多么深远。”

该委员会宣称它认识到，在有关雇员忠诚的整个问题上，歇斯底里、感情用事和不负责任的想法都易于造成危害，我们需要理智的、现实的和实事求是的处理方式。委员会建议各部和各机构应制定自己审查忠诚的程序，但审查的最低标准应由行政命令加以规定。凡是在任何部或机构任职的人员都要经过忠诚调查，在大多数情况下，调查应由文官委员会执行。目前一切雇员的姓名要与联邦调查局的卷宗核对一下，因为该局的资料对他们忠诚的情况也许有相反的反映。

委員會建議，決定忠誠案件的程序，應包括各機構內的忠誠委員會和文官委員會內的忠誠審查委員會。這個忠誠審查委員會在調查雇員忠誠的範圍內應該作為各機構政策的協調者，作為總統和各機構在這些問題上的顧問，同時又作為各機構忠誠委員會處理案件的上訴委員會，但根據法律有權立即作出撤職處分的機構不在此例。

被控為不忠誠的雇員，應該有權得到書面的控訴通知和受到行政審訊，包括由本人自己選擇的辯護人代表出庭的權利。

委員會建議，“在忠誠案件中，拒絕任用或者撤除任用的基本標準應該是：根據一切證據，具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牽涉在案件中的人對於美國政府是不忠誠的。”接着委員會又列舉了許多可以作出這種決定的因素。

我非常仔細地研究了委員會的報告。一般說來，我認為委員會處理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公正合理的。在少數問題上，我覺得委員會的意見還可以說得更具體些。在頒布已經參考這些建議的行政命令以前，這些部分都按照我的願望做了修正。例如委員會建議，未經許可有意識地洩露機密資料，可以構成不忠誠的根據之一；我想起這容易被人濫用，於是我要求增加一句話，大意是這一條款只有在情節證明不忠於美國的時候才適用。在另外一條中，司法部長得奉命開列顛覆性團體的名單，我補充了一個條件，即任何團體未經事先調查，並正式肯定它的顛覆性質以前，不得列入這種名單。

我在1947年3月21日頒布的行政命令（第九八三五號）中，曾強調了兩個事實，我認為這兩個事實應該貫徹到忠誠調查計劃中去：

（一）雖然絕大多數政府雇員的忠誠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政府工作中出現任何不忠誠或顛覆分子，對於我們的民主程序就

构成了威胁。

(二) 美国政府必须获得最大限度保障，以防不忠于祖国的人渗透到政府雇员的队伍中去，同时，对于政府内忠诚的雇员也应当给予同样的保障，以防他们受到毫无根据的不忠诚的控诉。

我觉得，通过这个新的行政命令，我们已加紧了防范颠覆性渗透的措施。同时我们也设立了机构，保护个人不受根据谣言或捕风捉影的传闻的诬告。

我发现这个忠诚调查计划在实行时有很多缺点。它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办法。但总的说来，这个计划曾给予任何被控的人以当时舆论倾向许可的公正的机会，使他的案情得到裁决。

根据 1947 年的行政命令，如果有人被控隶属颠覆性团体或者从事可以称为颠覆性或不忠诚的行动，初审就由忠诚委员会执行，并且许可他的辩护人出庭。

被告要收到一份被控的罪行摘要，凡认为属于机密的东西在摘要中都被删掉了。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原告愿意出面的话，被告可以要求同原告对质或知道谁是控告者。

被告首先要在由部长任命的部内的忠诚委员会里出庭。

委员会的报告和决定要送交部长。部长可以批准委员会的建议，也可加以拒绝。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被告是正式的文官就有权向忠诚审查委员会上诉，如果他仅仅是临时工作人员则有权向区委员会上诉。

区委员会是文官委员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如果被告不满意区委员会的决定，他有权再向忠诚审查委员会上诉。忠诚审查委员会是最高的机构，委员会的委员都由我任命。

我选拔这个审查委员会的二十三个委员，是根据对他们的才能的了解和各种职业的代表性。他们都是行政人员、律师、商人和各行业中的领导人。

塞思·理查逊被任命领导这个委员会。他是一位知名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进行工作时与司法部密切合作。

忠诚调查计划的缺点之一，是一个人只要经忠诚委员会或最后经忠诚审查委员会证明无罪以后，有关这个人的一切资料都保存在卷宗内。经证明无罪的雇员每调换一次工作，他的卷宗就要审查一次，因此他就不得不一再对同样的罪名进行答辩。而实际上，他要屡次三番地被证明无罪。这是与美国公正无私的传统不相符的。这个缺点，我们在开始时并没有认识到。

1947年年底和1948年，共和党控制了第八十届国会，有些众议院委员会的主席，提出议案，要使国会参加忠诚调查计划的执行工作。有一次，众议院行政部門經費委员会打算通过拨款法案的追加条款，获悉文官委员会中关于政府雇员的秘密报告。

文官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报告，都包括许多毫无根据、未经调查和未经鉴定的控告，决不打算拿来公开利用或传播的。有关任何雇员的秘密报告，必然包含根据怀疑、謠传、偏见和恶意而写下的项目，如果发表，就会损害许多无辜人民的名誉和前途。

1948年3月28日，众议院行政部門經費委员会提出联合决议案，要求政府各部門对国会中需要情报的委员会，提供它们已有的情报，不论这些情报是机密的或者不是机密的。

这个委员会在要求通过这项决议案的时候说，委员会需要这条法律，是因为我曾训令行政部門保持忠诚调查计划卷宗内机密情报的秘密。

我在给各部的命令中宣布：

“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福利，有必要保持情报的机密性质和提供情报的来源，同时有必要保障政府人员不受毫无根据或已证明并不真实的謠言到处传播的害处，这种秘密情报是必需的。”

因此我下令各部把国会对于这种情报的要求，送交总统办公

厅，“以便总统就具体案件作符合公共利益的答复”。

1948年1月和2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行动充分说明了颁布这一命令的根据，那时委员会正在调查国务院的安全程序。该委员会是在考虑国务院要求拨款的过程中进行这种调查的。

国务院对委员会的调查员给予充分合作，甚至到了允许他们检查有关个人的秘密卷宗的资料和作摘要的地步。这些卷宗包括并无事实根据的传闻和怀疑，以及已被证明的事实，并且详尽地说明调查员在每一案件上的进展。

委员会完全不顾他们保障这些卷宗秘密的义务，把这些卷宗的摘录做出公开记录，只是没有公布姓名和代号罢了。这种程序的危险是，帮助了真正进行颠覆活动的人了解哪些人正在受监视，政府了解他们的哪些情况。这也会损害无辜的雇员，使他们由于公布了记录很容易被其他雇员认出来。

通过这种程序，委员会把整个国务院置于怀疑之下，因为这样作就好像对聚在一间房里的一群人说，“你们中间有个骗子”，但又没有把罪犯指出来，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哪些罪行。结果是那间房里的每个人都是嫌疑犯，直到问题澄清为止。这就是煽惑家在公共言论中所用的伎俩，这些言论引起人民对政府中的一个部门进行不公允的谴责。国会的委员会，除了特殊的情况外，不应该看未经鉴定的私人秘密情报，是有充足理由的。

1949年国会开始在各种拨款法案内包括附加条款授权各部门首长根据安全的理由辞退雇员，雇员不得上诉。这种权力首先用于国务院和国防部。

这项立法授权给一个部的部长在安全案件中可以自行裁决，根据任何理由辞退雇员，而不必提出“安全”以外的任何说明。事实上，国会正企图取消我在1947年行政命令中所规定的有关个人权利的保障办法，因为这样一来，所要做的只是把忠诚案件说成是

安全案件，再也无需在部外进行检查了。

关于这种权力的运用，大多数部门的首长都是非常审慎的。但是白宫也收到了某些武断处理个别案件的报告，在这些案件中用毫不足取的借口，而以安全为由把人辞退。

有些报告指出，根据伪证把某些人辞掉了。这些报告使我深感不安，因为我急于看到，任何个人都免于遭到不公平的处理，个人权利不致被无故剥夺。

1950年8月8日，我向国会送交一份咨文，建议弥补有关雇员忠诚和安全法律中的某些缺点的法律。这是咨文的一部分：

“三年多以前，行政部门修订和改善了处理有关雇员忠诚和安全问题的程序。这些新的程序，在保障政府不致雇用不忠诚分子和雇用后对于安全构成危险的人这一点上，证明是有效的。……

“最近几年以来，我们根据现行的国内安全法，在法院中成功地控诉了几百起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应用这些法律方面获得了很多经验。我们在现行的法令中也发现了一些缺点，其中有些是关系很小的，也有些是非常重要的。鉴于当前的局面，弥补这些缺点就成了很重要的事。因此，我现在建议国会在本届会议休会以前，制订某些有关这一方面的法律。”

向国会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就是弥补有关间谍、外国奸细的登记和国防设备的现行法律中的缺点。这一点，应把有关间谍法律中的某些条文加以明确，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应把有关限制和平时期间谍活动的法令的三年期限加以延长；应使接受外国政府或政党命令进行间谍或颠覆性活动的人根据外国间谍登记法案进行登记；授予总统更广泛的权力，制订有关保护军事基地和其他国防设备的安全规定。

第二，我建议国会制订法律，授权司法部长对于应予驱逐出境的外国人进行监督，要求他们定期报告他们的行踪和活动，凡有违

反者即应受刑事处分。

我提醒国会，我一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是：

“我决心使美国安全。我也同样有决心使我们保持我国传统的自由。……”

但是，国会处在感情激动的气氛中，它宁肯跟那些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的人一道走。

1950年9月23日，国会制订了颠覆活动管制法案。这一法案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推翻了我的否决而获得通过。我否决这一议案，是因为司法部、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都通知我，这个法案会严重地损害它们所负责进行的安全和情报工作。

我也相信，这个法案给予政府官员很大的权力，使他们可以为难我们的一切公民，使他们不能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政府对于自由发表意见加以窒息，是朝极权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关于美国的自由，再也没有比这一句家喻户晓的说法更能说明它的基本原理，即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我们惩罚人是为了他们所犯的罪行，而决不是为了他们所持的意见。

这个法案的不良后果很快显示出来了。共产党现在都匆匆转入地下。他们想出了很多对策，例如改名换姓、化装、改行、迁居等，这就增加我们的侦探追踪他们的困难。

但是这一法案既已成了我国的法律，于是我就设立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任命塞思·理查逊为主席。我又任命另外一位共和党人——海勒姆·宾加姆——代替他任忠诚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他过去是康涅狄格州参议员。

美国的安全计划被煽惑家和聒人听闻的报纸恶意地用来恐吓和迷惑美国人民，这真是我们时代中的一个悲剧。

像麦卡锡、麦卡伦、詹纳尔、帕纳耳·托马斯、维耳德之流的人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使人民对政府中大多数雇员的忠诚都发生了

怀疑。

如果同样的方法和标准也应用在私人的机构中，例如应用在銀行中，那么，发现一两个不诚实的出納或會計，就連銀行中所有的雇員和高級職員也都受到譴責。显然这是非常不公道的，如果所有的銀行都受到这样的攻击，結果必然使人民对于我們的銀行制度失去信心，使銀行和国家都受到严重的損失。

因此，在政府驅逐少数不良雇員的时候，不管怎么說，也不應該用这件事来煽动对政府中所有人員的怀疑。更应受到指責的是，煽惑家根据捏造罪名和道听途說而对他們不喜欢的人进行非法的迫害。由于一再散播这些純属于虛假的罪名和控訴，人权法案所保障的这些人的神圣权利就遭到了蹂躪，或不断受到威胁。

我們成为世界的强国，政府雇員的数目也随之增加，就像增加了私人商业的雇員一样，同时这也使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工作推广到全世界去。我們的政府成了全国最大的雇主。

如果政府要对国家和人民克尽职責，它就一定要保持高昂的士气，同时也要維持高水平的能力。

煽惑家对政府雇員的忠誠的攻击，大大地阻碍了政府执行任务的效率。很多优秀的人宁可离开政府，而不願在可能遭到損害的气氛下工作。这种无情的攻击使吸引优秀人士参加政府工作的事碰到加倍的困难。

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政府的重要雇員必然会出现思想瘫痪的趋势。他們的职責是发表诚实的判断，但是他們不敢这样做，因为一旦气氛和环境改变了，那些同他們意見不一致的人也許会控訴他們不忠誠。我們的国家受不了而且也不应当允許这种思想上的控制。

早在 1951 年我就請求尼米茲海軍上将主持一个由一批重要公民組成的委員會，对整个忠誠調查計劃进行全面而徹底的研究。

我要求委員會建議，政府需要做什么，才能對個人的權利提供更大的保障，同時對政府的安全又能保持密切的監視。

我選擇尼米茲海軍上將擔任這個工作，是因為我以前同他討論的時候，他對於充分保護每個人的權利的需要表示得非常熱情。他不僅是我們在太平洋上最伟大的海軍戰略家和人們的坦率領袖，而且也是一位虔誠的愛國者，不管給予什麼任務他都隨時準備響應祖國的號召。他比國內任何人都更了解安全和忠誠這類問題。

我任命下列人士同尼米茲海軍上將一道參加國內安全和个人權利委員會：

俄亥俄州楊茲敦副主教埃梅特·華爾希博士；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的州主教卡爾·布洛克博士；首都華盛頓的安·斯特勞斯女士；紐約的魯塞爾·勒芬韋爾；紐約的查爾斯·西爾弗先生；首都華盛頓的約翰·達納赫議員；俄亥俄州阿克朗的小哈維·費爾斯通先生；以及首都華盛頓的威廉·利海先生。

1951年1月23日，我發表了一項公開聲明，宣布委員會的任命，聲明中有一段這樣的話：

“我們今天特別關懷的是共產帝國主義勢力的活動對我國政府和國民生活所造成的威脅……同時，我們也關懷為保證不受這些危險而採取的措施，會侵犯我們的憲法所保障的自由，並窒息自由的气氛，長期以來我們就在這種自由的气氛中表達我們的思想和處理日常事務。……”

我希望說清楚，我決不容忍受政黨政治的干涉：“為了使這些問題不致被卷入党派鬥爭的漩渦，我是在不分黨派的基础上任命這個由著名的公民組成的委員會的。我相信，我國人民將從他們獲得有關這類問題的權威性的決定，這些決定是根據事實，從國家的利益出發而擬定的，並不考慮政黨的利益問題。”

在我遇見尼米茲海軍上將的時候，曾告訴他說，眼看迫害政府雇員的狂熱一天天在增加，我感到非常不安。我認為迫切需要的是，關於政府工作人員的一套公民權利計劃。如果我对这种大吵大鬧屈服，同意隨便地把受攻擊的人開除掉，我可以使許多批評我的人無話可說，但是這種作法的代價却是毀掉許多無辜的人的名譽。

當尼米茲海軍上將開始為委員會安排職員的時候，他發現有些法令對於雇用人員規定了很嚴厲的限制。例如，法令限制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在離開委員會以後的兩年內，不得從事他的專業活動。這些法令也縮減了我委派的商人的商業活動。國會在最近的好幾件事中都提出了所謂利益衝突的限制，尼米茲海軍上將要求在這一事務中不援用這些限制，使委員會可以招募能夠擔任該會高級職務的工作人員。

眾議員華爾特為了這個目的提出了一項議案，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就這項議案作出了同意的報告，而於1951年3月15日在眾議院通過。這種措施以後就送交參議院，然後又轉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審查。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主席是參議員麥卡倫，他阻撓議案的通過和制訂不良的法案的記錄是只有少數反動分子才能和他媲美的，這個議案就在他領導下的委員會中擱淺了。麥卡倫的這個阻撓行動扼殺了這個議案，使尼米茲委員會不能在不分黨派的基础上公正地研究政府的忠誠—安全計劃。

這是麥卡倫企圖阻礙行政部門的計劃，也是鼓勵國會中煽惑家的另一步驟。這使得尼米茲委員會一籌莫展，只好全體辭職。

1951年10月26日，我寫信給尼米茲海軍上將說：

“既然國會沒有完成國內安全和个人權利委員會為有效行使職權所必需的立法程序就宣告休會，我就只好勉強地決定接受委

員們的辭呈。……

“我原来指望，国会会像我这样迫不及待地要确保我们为维护政府部門安全而采取的措施能順利推行。我原来指望，国会会像我这样迫切地在我們急于扑灭顛覆活动的同时，确保人权法案不受損害。……”

早在1951年6月6日，顛覆活动控制委员会主席塞思·理查逊因健康关系被迫提出辭呈。在他的辞职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医生劝告我，我必須立即住院进行广泛、紧急的外科診治。

“顛覆活动控制委员会，目前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正进行一次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审讯。我认为无限期地继续让我担任不起作用的委員和主席，对国家，对自己都沒有好处。……

“我是一个生来就好爭論的共和黨員，我衷心感謝您对我的信任和推重，給我从事重要的非党派工作的机会。这项工作不含任何政治动机，直接影响全国忠誠調查这一重要領域。”

在答复理查逊时，我写道：“自从你1947年11月11日在政府中复职，担任忠誠审查委员会主席以来，你一直在保卫我們的安全，免遭顛覆活动的毒手，并保护我們立宪政府的传统。

“你給联邦忠誠調查計劃带来了公平而慎重的判断，而且在你的领导下，消灭了政府中的犯罪分子，同时又始終保护那些无辜的人。你在忠誠审查委员会的卓越成就，使我在去年10月任命你出任顛覆活动控制委员会的委員兼主席。

“你把自己說成是‘一个生来就好爭論的共和黨員’，我听了不禁暗自失笑。我要求你担任的职务需要具备正直、謹慎、正确的判断以及超然而客观地观察各种极其复杂的問題的能力。这些品质你完全具备。最难能可貴的是你遇事沉着……”

由于參議院司法委员会的拖延以及沒有采取措施使尼米茲委员会展开工作，使我感到焦虑，因而我决定把这个計劃的研究工作

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办。

1951年7月14日，我把下面的信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小詹姆斯·累伊：

“亲爱的累伊先生：

“最近我听到了一些关于执行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的报告，这些法律授权各部门负责人，根据对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理由，解雇政府的职员，或拒绝申请就业的人参加政府工作。我听了这些报告以后非常关切。

“如果这些法律的规定能达到保护政府安全的目的，而又不致非法地侵犯个人权利，那么，就要运用最大的智慧和果敢来执行这些决定。我们决不能忘记，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在本身的职务范围内去维护这些权利。

“目前的情况对完善的行政管理是不利的。在有关的各个部门和机构中，都没有可供遵循的统一的标准和程序，此外也没有像在政府雇员忠诚调查计划中所规定的那样，制定出中央检查的规则。这是我要求国内安全和个人权利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内的一个问题。但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没有就国内安全和个人权利委员会委员和职员不受利益冲突的法令约束的立法情况提出报告，因而后者的工作也就拖延下来。

“我认为，目前牵涉在政府雇员安全计划的实施中的问题这样严重，以致不应再继续等待国内安全和个人权利委员会，而应对这个问题作初步的考虑。因此，我希望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利用各部门国内安全委员会、协同文官委员会对此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调查，并向我建议需要怎样进行更动。我特别希望考虑应否规定统一的标准和程序，以及应否规定各部和各机构内部作出的

決定統由中央進行檢查。

“在國內安全和个人权利委員會恢復工作時，當然會有助於按照這種要求去完成的工作。

“我正責成各有關部門和機構對此項研究工作給予充分合作。

“你的誠摯的，

“哈里·杜魯門”

國家安全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花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最後這項工作由各部門國內安全委員會所完成，這個委員會由各部門擔任保安工作的官員和技術人員組成，包括聯邦調查局的首長，國務院的保安官員和國防部的一位將軍。

1952年4月29日，我接到該委員會的報告、這是一份廣泛而詳盡的報告。它提出了許多關於改進程序的建議，並指出所有為了安全而對僱員進行的檢查應有統一的标准。另外還建議文官委員會對有關機構所作的關於危及安全案件的決定進行檢查。

1952年8月8日，我在仔細考慮這個報告之後，曾寫信給文官委員會的主席羅伯特·賈姆斯佩克表明我的最後意見，信中有一段我這樣寫道：

“現在最理想的辦法是把忠誠、安全和稱職等計劃合併在一起，這樣就可以消滅目前顯然存在的重疊和混亂的現象。我的理解是，在職僱員忠誠調查計劃已非常完善，因此完成這項工作的障礙一定不大，或根本沒有障礙。……

“……然而，與此同時，已具備僱員安全調查計劃的各部門和各機構，應重新檢查一下它們的程序，並用適當的程序來輔助它，使所有受安全調查計劃審理的人得到保護。”

簡單說來，我要明確說明，要是一個僱員因不稱職而被解雇（而不是由於非法活動），則不應給他打上不忠誠或危險分子的烙印

印。

这是那些信口开河的批評家和煽动家对許多由于正常原因而离职,或被政府辞退的人的一种恶毒歪曲。

政府的忠誠調查計劃是一个巨大的事业,需要很多政府重要官員拿出很多時間和做許多工作。协助这个計劃的委員會的成員有两党的領袖人物。他們参加会议,审查計劃的执行情况和提出变革的建議。

世界共产主义及其侵略是一个全国性的,而不是某一政党的問題。我感到遺憾的是,在国内搜查共产党和在全世界迎击他們的威胁这一工作,竟成了政治問題。

在反共問題上,国会和政府之間,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間根本不应该有竞争。我也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政治問題来看。事实上,我任命有声望的共和党人领导忠誠調查計劃。我已尽到我的責任来防止它变成政治問題。

对于防范共产党的代理人和受共产党利用的人所实施的渗透和背叛的新伎俩,我們一貫保持警惕。但是,我們那些相信我們国家制度的人决不是因为恐惧或害怕这些敌人能够成功才采取这种措施的。

美国是苏联間諜活动的主要目标,而不是它唯一的目标。由于我們一向和其它受共产帝国主义威胁的国家进行合作,所以我們的警惕必須越过我們的国境綫。

我們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保卫和平;我們到处用許多方法去反击共产党的威胁。我們力图建立一个自由世界,从而使人类有希望摆脱飢餓、疾病、剝削和帝国主义扩张等等灾难。

有些人錯誤地称我們的外交政策为遏制政策。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我們的目的是广泛得多。我們正在为一个統一、自由和繁荣的世界而努力。

然而，共产党人却另有一套想法，他们企图统治世界。他们利用叛变、渗透和颠覆的手段已掌握了千百万无依无靠的人民。我们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在历史的最重要关头阻擋并制止了这种倾向，而且，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一道，挽救了西方的文明。

那些政治煽动家、狂人和职业爱国者，有了向美国人民制造恐怖的机会，他们发动了一个恶毒的文字攻势。在他们的謾罵和攻击下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是干净的。

很多善良的人民实际上都相信共产党统治我们的危险已迫在眉睫，而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的政府也到处被共产党人所渗透。

这个攻势的范围如此广泛，似乎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受攻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和耻辱。

我从来没有对美国人的敏锐的辨别力丧失信心。我知道这种歇斯底里的时代终会结束的，正像我们历史上的其他不愉快的时代一样。

以往，我们有过和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相似的局面，过去有过薩拉姆事件、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反共济党、“无所知党”（反天主教的组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三K党、1884年的“羅馬、天主教和叛乱”以及1920年、1924年和1928年的三K党。1928年阿尔·史密斯被反天主教、反犹太人和反黑人的三K党所打垮。

我们的国家有理由为我们的保安机构而自豪，并信赖他们。在战争期间，它几乎使我们完全没有受到破坏和间谍活动的影响。所有被我们逮捕的外国间谍都是由我们的情报机关搜出来的，凡是被怀疑为间谍或颠覆分子的人也都受到上述机构的无时或懈的监视。

我们有些秘密是由善良的公民无意中泄漏出去的，这倒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事。

许多影响国家安全的危险的泄密，是从新闻报道中透露出去

的，而這些報道的人的忠誠和愛國心卻是沒有問題的。

例如，某位專欄作家曾給一個全國性的周刊寫過文章，洩露了我國原子裝備的地点。我們的情報人員一定也希望有同樣容易的方式從蘇聯方面了解原子裝備的地点。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中，原子裝備一定是第一個遭受攻擊的目標。而我們的一個刊物居然將這麼重要的消息供給了蘇聯。

其次，我們的某一系的報紙曾經將我國許多大城市——華盛頓、紐約、底特律、芝加哥和其它一些城市的整套空中照相當作第一版新聞刊登了出去。

我記得，為了杜絕這些有關於國防的泄密，國防部長福萊斯泰爾曾邀請了六位或八位報刊發行人會談，看看是否能說服他們自動地做出新聞檢查的部署。而這些報刊發行人却告訴福萊斯泰爾說，“制止你們的人不向報刊透露消息，那是你們的責任。”某些發行人似乎忘記了這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他們的責任，而且國家的毀滅也就是他們的毀滅。

另一個例子是一家商業雜誌竟把我國最機密的有關空軍發展的資料刊登了出去。我指示中央情報局的領導人要从編輯那里查明他怎麼把這樣的消息刊登出去的。從我得到的報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項資料是我國某一軍事機關中的高級軍官供給這位編輯的。這位編輯說：“你怎麼能指望我比你自己的人更加小心呢？”進一步的調查說明，這位軍官為了使國會通過某一筆預算才這樣做的。

爭取國會的注意和支持，是向新聞界洩露許多機密的一部分原因。“風頭狂”也使人們特別希望看到自己的大名在報刊上出現。

風頭競賽竟達到這樣熱烈的地步，甚至某些官員要當眾吹噓他們的絕密的成績。

我指示各有关部門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制止任何政府官員向報界泄露这些秘密。

我发现有必要发布命令建立一个中央检查所，确定什么消息可以透露，以限制新聞的来源。報界和广播电台說这种措施是一种新聞检查，甚至指責說这样做是为了掩飾錯誤。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国会委員會的訊問程序也是机密新聞来源的富饒园地。某一高級軍事領袖在国会委員會的執行會議上就机密問題作证以后，听到机密泄露的情况大为恼怒，以致他威胁說他拒絕再出席这些委員會作证。泄密的事干得如此迅速和周到，以致在委員會的執行會議上泄露情报的人往往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情报就已經上了新聞收报机了。

我下令我們的情报人員研究一下，国会記錄中的演讲和发言，究竟对外国提供了多少极其重要的情报。这个百分比高到可怕的程度。

这都不是昏头昏腦的受騙者和共产党的同情者泄露出去的情报。这些人都得不到这样的情报，因为他們无法取得机密的資料。这种情报都是些愛說长論短的政客泄露出去的，竞争使他們忘了他們究竟在干什么。在这一方面，华盛顿的政客和报纸、杂志的发行人都是同一类型的。

对于我們的保安机构，政府的一位最能下的高級情报人員曾說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在反对顛覆、間諜和破坏活动方面我們已做到无微不至的地步。这些工作战时做了，战后做了，目前仍然还在做。至于政府人員，目前还存在着某些早該糾正的模糊不清的情况，但是我們必須承认我們在初期曾遇到困难。

“政府中执行安全工作的专职人員虽然了解这些問題，并且非常警惕，但是有些經驗不多的政府官員却不能辨別好心腸的自由

主義者和搗亂的激進分子。從極端的激進分子中，要分辨出誤入歧途的狂熱者和不忠誠的人，往往是很不容易的。事實上，專職的保安人員也很難證明在嫌疑犯中是否有真正的共產黨員。很難指出他們有什麼不是。我相信政府也沒有辦法把他們找出來。

“必須記住，所有這些所謂不可靠的人，從把俄國人當作我們的盟友，轉變到把他們當作我們的敵人是有困難的。比方說，在保安人員的圈子裡就有一種感覺，他們認為甚至在艾森豪威爾將軍負責管制德國的時候，在他的參謀人員中就有些可疑分子，於是我們不得不派特工人員去澄清這個問題。

“一個國家會竭盡全力幫助一個盟友，後來又掉轉頭來說這個盟友是敵人，在改變這種態度時，不可能不發生一些混亂。這就是我們走過的道路。”

第二十章

氢 弹

美国的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我們在核能方面的領先。

我們應該深深感激那一小批科学家，他們使核能成为现实。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这些献身于这一科学的少数人的手里，在1945和1946年，他們沒有爭先恐后地回到平民生活中去，他們擺脫或謝絕了来自工业界或大学的令人向往的聘約，而繼續留在洛斯—阿拉謀斯进行发展原子能的研究工作。他們認識到原子的发展才刚刚开始，而願意留下来做这工作，因为他們了解其他国家一定会竭力和我們爭夺这方面的領先权。

他們确信，除非我們沿着在洛斯—阿拉謀斯和其他美国的實驗室里所获得的許多綫索繼續进行研究，否則我們的地位和安全就必然会受到威胁。

我們正处在重大发现的开始，我急于使我們在核能发展的工作上取得进展，以便生产任何足以保卫我們軍事地位的新武器，从而加强我們保卫和平的力量。我願竭尽一切可能来鼓励这些科学家們繼續为政府工作，并建立我們的龐大的實驗室，热核反应的知識就是在这些實驗室里发展起来的，这种知識使我們很快就能制造超級炸彈——氢弹。

1946年12月31日午夜，一个非軍事机构——原子能委员会——接管了美国的原子能研究与生产工作的上层管理工作。这个委员会是由五个由总统任命并經参議院批准的委員組成的。总

總統指定一位委員擔任委員會的主席，並提名一位管理主任，該管理主任須經參議院批准。

原子能委員會在本身工作的範圍內擁有廣泛的權力和全面的控制。這個委員會負責領導原子能領域內的全部研究、發展以及生產工作。但是，原子彈須經總統批准方許使用。只有總統才能決定應當製造哪種性能的原子彈。只有總統才能決定是否應進行原子彈爆炸試驗。只有總統才能批准原子彈運輸或儲藏的地点和時間。事實上，甚至連生產原子彈和原子彈原料的年產量都由總統決定。

可是，總統也同樣關心為和平目的而發展和應用原子能。通過對預算的掌握，總統能夠指示和鼓勵委員會的工作。

為了協助原子能委員會運用它的權力，根據法律，設立了一個兩院原子能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九名參議員和九名眾議員組成，而原子能委員會得隨時向兩院聯合委員會全面匯報原子能委員會的活動。

根據法律又設立了一個軍事聯絡委員會，該委員會委員由國防部長委任，由海、陸、空三軍各派兩名代表組成，另外還設有一名主席，軍人或文職官員均可出任。這個聯絡委員會經常向原子能委員會“全面匯報國防部所進行的一切有關原子能的活動”，反過來原子能委員會必須經常讓軍事聯絡委員會了解它在軍事方面的全部活動。軍事聯絡委員會“有權就有關軍事應用方面的情況，向原子能委員會提出書面建議”。在軍事聯絡委員會與原子能委員會之間發生分歧時，根據法律規定，軍事聯絡委員會可通過國防部長將爭執問題提交總統。總統有最後決定權。法律最後一項規定是成立了一個由九位委員組成的一般諮詢委員會，委員由總統“在非公職人員”中委任。這個委員會向原子能委員會和軍事聯絡委員會提供科學和技術意見。

我接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委派原子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的建议。下面是我最后选拔出的原子能委员会的第一任委员：戴维·李连塞尔(被任命为主席)、罗伯特·巴彻尔、萨姆纳·派克、路易斯·斯特劳斯和威廉·韦马克。

在选拔原子能委员会的人选时，我没有去注意他们的政治立场。事实上，在最初的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中，根本就沒有一位是民主党员。李连塞尔一向自称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其余四位全是共和党人。我一向遵循政治和原子能不得混为一谈这一原则。

摆在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面前的是一桩极其艰巨的任务。它必须把一个庞大的事业从临时性的战时工作改变成为范围要大得多的永久性的工作。曼哈顿区是为了生产用以缩短战争的原子弹而建立的战时工程。这就是它唯一的用途。而且，在原子能委员会建立以前，政府一直是在军事绝密的幕后管理原子弹生产设备的。但是现在它除了受总统的管辖外，还得受国会的监督。今后原子能委员会必须对国会各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

国会在批准委员会的人选以前，立即展开了广泛的辩论，这表现了国会对该委员会非常关心。参议院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才作出最后决定，通过了我所任命的五位委员。但是，甚至还在等待国会批准人选时，原子能委员会就已经全部承担原子计划的工作。他们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对目前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调查，并在三个月后向我作了报告。在他们的头一份报告里，我获悉，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观点来看，这项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原子弹的数目少得令人失望，而且已有的原子弹还没有装配起来。受过装配训练的有高度技术的平民雇员已经分散到薪金优厚的私人企业去了。而军事人员从事装配工作的训练又没有完成。

虽然在1946年间，为了战略目的曾在比基尼进行了几次试

驗性的爆炸，但手头的更新型的原子彈還要等待試驗。此外，在原鈾的供應上也存在着嚴重的問題。大部分的原鈾是從比屬剛果來的，而且供應不足。

因此，首要的任務是使整個生產計劃趨於平衡。這意味着要停止某些設備的工作，而加速其他一些設備的工作。

當然，採取這些措施的原因並不單純由於高度技術性的問題，而且還有其他原因，這些原因是俄國人願付很大代價去了解的。參眾兩院的議員們對生產表示關心，他們有些人似乎認為，任何一種原子計劃的擴展，特別是原子武器計劃的擴展，都是值得進行的。當然就事實來說，為了給將來制定一個健全的計劃，比較慎重的辦法是正如科學家和軍事當局所勸告的那樣不把全力集中在任何一個單一的方向。

況且，原子計劃必須和我們的國防以及對外政策相配合，而我，作為總統的責任就是要經常在這些和其他因素之間維持均衡。

國會成立了原子能聯合委員會，對原子能委員會的活動進行經常性的監督。這個委員會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高級成員布里恩·麥克馬洪參議員和伯克斯·希肯魯普參議員，很快地就使自己成為專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特別辯護人。

1945年底和1946年，當原子能委員會的立法程序還在進行時，我和布里恩·麥克馬洪一起，度過了不久時間，他對原子能問題的掌握和理解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1947年1月），希肯魯普參議員出任聯合委員會的主席，他和我進行了多次和他的新職務有關的建設性的會談。

要让某些國會議員了解他們所處理的問題多么複雜是不容易的。比方說，有一次希肯魯普參議員打電話到白宮來，說他的委員會急需某一件非常專門的文件。他完全肯定，如果沒有這一文件，

他們就无法进行工作。

我請他到白宮來，當他來了以後，我領他到內閣議事室，把文件交給他，請他閱讀。這個文件很長，一點半鐘以後，他才回到我的辦公室。他顯然是後悔了。

他說：“現在我可希望你當初還是不讓我看這個文件好，我寧願對這件事一無所知。”

我說，“現在你弄明白為什麼這份文件不能拿到你們委員會里去了吧。”

然而，主要的是：不論誰當聯合委員會的主席，麥克馬洪也好，希肯魯普也好，我都以同樣的坦白而直率的态度同他交往。就我个人來說，政黨政治與原子能是兩回事。看到聯合委員會的委員們都小心翼翼地遵守有關原子能的嚴格保密制度，我感到很高興。然而由於重要的秘密洩露出去而造成公開的爭吵的危險總是有的。

聯合委員會主要關心的是原子彈的發展情況，它經常催促增加生產。某些委員有把這一問題過分簡單化的傾向，而認為原子計劃所需要的一切只是讓軍事當局通知原子能委員會“我們要多少多少原子彈”，然後原子能委員會就如數交出就行了。但是，讓軍事當局用這種方式來控制原子彈不但不明智，而且也不可能在軍事需要的基礎上來安排生產。當時就沒有足夠的原料來滿足我們的需要。

我們當時所能得到的一部分鈾來自比屬剛果。不過，在1944年，我們與英國訂了一項協議，決定以共同的努力盡量多地取得鈾（還有其它一些稀有原料）。當戰爭仍在進行的時候，我們在分配這些原料上並沒有什麼困難。整個核能計劃當時都集中在美國，而且，除了微不足道的小量鈾以外，英、美、加聯合起來所能找到的全部鈾都分配給了美國。但是在戰後，這些安排就不得不加以改

变了。战时作为客人而留居美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现在都已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实验设备，需要铀供自己的试验之用。

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需要又大大地增加了。在和英国人进行一个时期的谈判以后，我们在1946年7月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规定我们与联合王国平分全部比属刚果所出产的铀。但是根据这个办法，英国人现在所得到的铀超过了他们实际的应用，而我们却感到不足。为了纠正这种困难，更合乎比例地分配这些铀，我们在1947年末又重新进行谈判，会议是在华盛顿召开的。

1948年1月7日，两国又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这个协议修改了铀的分配，但仍属临时性的。这个“临时办法”，（我们在以后的谈判中总是这样称呼它）规定比属刚果在1948至1949年间所生产的铀全部归美国使用。除此以外，我们从英国的储存中还可以取得一部分铀。

我们同意向英国人公开有关核子的九类特殊资料方面的数据，作为这个重要让步的交换条件。这种同意是与原子能法案的条款规定及其精神是相符合的。有关原子武器的资料明确规定同样不向英国人公开，同时两国同意不将任何资料转告任何其他国家。对新西兰则作了一个很小的破例，因为新西兰的科学家们在建立英国原子能机构上做出了贡献。

1947年末，一群不平凡的专家交给我一份关于我们原子进展的评价。这个报告是由一般咨询委员会写的，这个委员会除其他委员外，包括有罗伯特·奥本海默、詹姆斯·康南特、李·杜布里季、恩里科·费米以及I·腊比等这些卓越的科学家。

下面是奥本海默博士报告他们第一年工作情况的信，

“一般諮詢委員會

致

美国原子能委員會

首都華盛頓

“首都華盛頓

白宮

總統

“亲爱的總統先生：

“自从您委派我們出任一般諮詢委員會委員，以便就‘与原料生产、研究和发展有关的科学和技术問題’向原子能委員會提出建議，已經一年了。当时我們就了解委員會的工作对美国的福利的重要意义。因此，我們非常热誠地担負起我們的顧問的職責，我們在這些職責上花費了很多時間，并进行了研究。在一年內先后举行了为期至少共十五天的會議，我們全体委員都出席了這些會議。我們与原子能委員會、它的人員以及軍事聯絡委員會，經常进行认真的討論；并向該委員會提出七份詳細的报告，在报告中我們尽力提出了建議，这些报告自然都具有高度的專門性。

“我們今年的工作不仅反映出我們深深感到这一科学領域的成功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原子能委員會在承担它的責任时所面临的困难，和它所继承下来的工作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我們很快就发现在与共同防御和安全有重大关系的各个技术領域里，既沒有适当的发展，在那些与未来和平利用原子能有关的技术領域里情况也是如此。有关技术方針的重大問題沒有作出决定，而且在許多方面尚未拟定出来。龐大的設備和實驗室中的工作都在漫无目的而混乱的情况下进行，对摆在他們面前的技术問題的重要性和联系性也缺乏足够的理解。我們的原子武器不論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不能令人滿意，而进展的速度一直都緩慢到危險的程

度。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迟迟没有成立原子能管理机构、以及随着战争结束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方针与目的上的混乱。那些战时设备和实验室为早期军事上的应用，在发展原子武器上，卓越地完成了最初的任务。但在技术问题的性质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以及在战时的工作状态转变到平时工作状态，已经改变了原先可能进行快速生产的条件下，这些设备和实验室大部分都不适于继续进行工作。上述事实更增加了实际工作困难。

“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原子能委员会制定短期的和较长期的技术方案。这些技术方案主要针对三个目标：

“（一）发展、改进和增产原子武器。

“（二）为各种不同目的而发展原子反应堆。

“（三）支援与原子能领域有各种关联的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

“至于我们在原子武器方面的改善，我们高兴地向您报告，今年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且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从一开始，我们就同意原子能委员会的意见，认识到骄傲自满对我们在这一科学领域中的工作有极大的危险。我们对太平洋试验场的建立表示高兴，在那里能够对改进了的原子武器的性能进行现场实验和计算的试验。虽然有很多工作尚待完成，虽然有关原子武器的长期计划刚刚开始，我们仍然相信，为改进我们的情况所已采取的步骤、以及其他在时机成熟时将要采取的步骤，已把这个活动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原子反应堆有许多用途。它可以生产用于原子武器或作为其它反应堆的燃料的裂变物质。它可以成为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工业科学研究工作的有效工具。它可能在十年内发展成为供应特殊用途的动力来源，例如供给少数海军舰只的动力。它可能在一个很难作可靠估计的不太短的时期内，发展成为提供一般工业的动力，从而对我们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生活作出重大的贡献。由于具

有多种多样的目的，这门科学的新颖和只有极少数的人受过从事这一工作的训练，使得原子反应堆的发展很难获得真正的进展。在过去一年中，原子能委员会已采取了許多措施鼓励这门科学的活动，邀请工业界参加工作、对有价值的特殊计划的完成与建设进行奖励，以及聘请有资格的专家参加工作。諮詢委员会认为还有許多工作尚待完成，新的人员和有才智的人必须作出贡献，而且要在很多年后我们在这门科学中的工作才能强大到足以证明它的重要性。作为委员会的辅助机构，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我们对有系统地描述有关原子能的前景，和估计所需要的努力的性质，已经作了尝试。我们相信，更广泛地了解问题的性质、工程师能够而且必须作出的贡献、以及工业界能够起辅助作用的参加方式，对于有关原子能发展方面的努力是有重要意义的。

“为了支持这门基本科学，我们欢迎对原子能委员会所承担的任务作广泛的解释。我们详细地研究了一份最近被采纳的建议，该建议主张提供某些放射性同位素供生物学和医学研究，而且不仅供应国内，也要供应国外。在这个建议中，我们看到一个审慎而起鼓舞作用的范例，它把由解放原子能而产生的利益推广给别人，这种推广必然丰富我们的知识和加强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控制。

“在过去一年间，我们经常遇到一个我们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当我们在研究执行技术政策可能采用的方式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保密以及不可避免地随着保密而带来的误会和错误，对工作的进展发生了影响，因而也就对共同防御和安全发生极其不良的影响。我们相信，在这门基本科学的领域里，原子能委员会从曼哈顿区继承了一个本质上是开明的政策，而且还继续维持这种政策。甚至在技术的领域里，在工业的应用上和军事问题上，保密的结果造成了误解、愚昧和冷酷无情。美国政府应重新考虑下面这个问题：究竟是不明智地泄露秘密所引起的危险大，还是

为了保密而无疑造成錯誤或停滯不前所造成的危險大？只有通过这种重新考虑，才能使原子能对保障和平和对我們的文明財富的持久和发展作出最大的貢獻。

“詹姆斯·康南特
李·杜布里季
恩里科·弗米
I·腊比
哈特萊·茨
格伦·西博格
西里尔·史密斯
胡德·沃辛頓
J·奥本海默(主席)

謹上

“J·奥本海默代表
委员会签名

“1947年12月31日”

这是一封最富有参考价值和具有挑战性的信；除了其他有趣的論点之外，它还提出了保密的問題。我对于把原子能利用于軍事的保密問題的立場是始終不变的。我坚决反对向任何其他国家政府公开軍事上的原子能秘密。

原子能委员会向我提供的材料非常詳尽。有些材料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因而我必须經過仔細的研究才能理解它。当然，我从不擅自对技术意見下判断。我在批准任何重大决定以前，总是征求各方面的意見，甚至在技術問題上也是如此。

按法律規定，我必须每年規定下一年應該生产的分裂物质的数量。为了作出这一决定，我需要看到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

联合建議。这个建議总是最机密的；为了保守机密，我們采取了特殊的保密措施。举例來說，任何人在我的办公室、在原子能委员会、或在政府任何部門的文件里都找不到关于現存的或将要生产的原子弹的准确数字，或計劃生产的分裂物质的准确数字。

要是任何人偶然碰見一份关于原子武器生产的文件，他会发现，原来应当有确实数字的地方不是密碼就是一处空白。其中的数目字都記錄在单独的、分开的紙上，这些紙受到特殊方式的保卫，并且只有极少量的副本。

虽然在那些日子里，在与原子能政策有关的一些机构間有許多尚待調整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並沒有影响到試驗所里研究工作的持續。在實驗室里从一开始就着手的广泛研究領域里，有一項是氫原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原子計劃首次开始进行时，科学家們就把目前的力量集中在“重元素”上，特別是鈾。在1947年至1948年期間，我們把重点集中在鈾和钷上，把这两种元素当作原子动力的来源，但与此同时我們对“輕元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氫）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着，从未停止或中断过。

到了1949年，原子核这一科学部門中的許多发展需要我們对它加以注意，而且还必須作出許多重大决定。1949年年初，原子能委员会已把原子計劃中的大部分复杂問題解决了，于是我們在原子能的整个領域里获得了进展。

为了在解决政策上与事实上的重大問題中得到帮助，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成立了一个特別委员会。这个特別委员会的成員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国防部长路易斯·約翰逊、以及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維·李連塞尔。

我指定这个委员会首先研究的問題是关于我們在原子能問題上和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我在1949年2月10

日指定該委員會研究這個問題時，我們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儘管我們與英國所執行的協議將在 1949 年年底屆滿，我們還得繼續與它合作。

特別委員會於 1949 年 3 月 2 日向我匯報研究的結果，建議我們採取一種新的策略，以便把原子彈的原料與製造盡量集中到北美大陸來。該委員會說，這將意味着這三個國家——美國、英國和加拿大——要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就像在戰時的合作中所形成的合作一樣。

我批准了這個試圖達成這種安排的建議，同時向該委員會表示，我有意在我們同英國人和加拿大人進行任何談判以前，首先把我們的意圖詳細告訴國會兩黨的主要成員。為此，我於 1949 年 7 月 14 日傍晚在布萊爾大廈召集了一個私人會議。除了國會原子能聯合委員會的主要委員和副總統奧耳本·巴克萊以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會的三位委員也出席了這個會議。艾森豪威爾將軍以參謀長聯席會議代理主席的身份出席；在出席的國會議員中有參議員：麥克馬洪、希肯魯普、泰丁斯以及范登堡和眾議員：薩姆·雷朋、卡爾·达拉姆和斯特林·柯爾。

我在會議一開始時就對與會者說，我們與英國就分配鈾而達成的協定即將期滿，而英國人正要求我們恢復在原子能問題上的全面合作，因為這種合作關係已經中斷。我指出我們必須獲得鈾，而英國人則需要我們某些科學資料，我又說，英國與美國的團結是世界和平的基石。在英國，不論兩個主要政黨中哪一個掌握政權，總有一個高度負責的領導權。

英國有許多著名的科學家，他們在製成第一顆原子彈上曾作出很大的貢獻，毫無疑問他們會很快地發展自己的原子彈。我指出，英國科學代表團曾廣泛地參加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彈研究與發展工作，後來又參加了原子彈的製造。此外，他們曾參加比

基尼試驗的準備與計算工作。類似的科學代表團曾參加了在歐克一里季的分裂鈾-235 的研究與發展工作。此外，英國與加拿大的科學家曾在芝加哥的金屬試驗室與我們的科學家商討過在加拿大白堊河建立重水反應堆的設計。

我陳述了，在 1947 年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如何採取統一的制度來處理共同建立起來的資料。1948 年 1 月，三國政府就一個臨時措施取得協議，規定不僅在原料問題上合作，而且也在交換某些指定領域中的科學和技術情報的合作。不過，現在這個協議即將到期，我提議根據原子能法案的規定，締結一個建立在充分合作基礎上的新協議。我認為，如果把現有的鈾都運到美國來處理和儲藏，這一點是可以辦到的。然後英國和加拿大的科學家就能夠加入到美國同行中來，和他們一起工作。為了防止英國人可能抱怨他們被排斥在原子武器的領域之外，我們可以設法把一些未裝配成的原子彈存放在英倫三島。

艾奇遜、約翰遜和李連塞爾作了很詳細的發言支持這個方案。可是，范登堡參議員卻尖銳地反對這一建議。他認為，英國人應該接受我們在原子能領域中的統治地位，並且舉出兩點理由來說明他的觀點。

首先，他敘述了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給予英國的幫助。其次，他表示他相信任何其他的途徑都將導致力量的重複，這種力量的重複正是北大西洋公約在共同防務方面所要防止的。

希肯魯普參議員也反對這一建議。他反對的主要理由是，他不信任英國的保安工作，並且他認為我們不應在這時去冒險。

其他出席的議員們大多贊成這個辦法，但是他們一般都認為，國會中的大多數人將拒絕這樣做。

按照我的習慣，我沒有宣布最後決定就休會了。我已經儘可

能地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見，而現在我必須自己來作出結論。我認為，保持兩黨對原子計劃的支持比堅持一個為國會中有力分子所反對的計劃更為重要。因此，我指示參加即將在9月間舉行的試探性會談的我方代表團做出一個不包括共同掌握原子武器資料的部署。

到了1949年的春天，我們必須在不同的形勢下考慮原子武器。我們現在有了儲備，但我需要知道我們手頭所有的原子武器，以及計劃要生產的原子武器在數量上是否足夠，同時我們是否趕上了技術的發展。

7月間，我再次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會，叫他們估計一下我們在原子計劃上的進展速度。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其中的一個就是如何分配我們的國防經費問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會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在考慮如何更好地武裝我們自己，從而使我們的國防力量均衡，避免因過於重視一方面的防禦而偏廢了其他方面的防禦。

由於我的請求，特別委員會向我提出這樣一個重要的結論：應該加速原子武器的生產。與此同時，他們建議除原子武器以外，應優先生產新設計出來的B—36型轟炸機，因為B—36型轟炸機是為了運輸我們的新型原子彈到世界任何目標而設計出來的遠距離轟炸機。

在這以前，空軍參謀長霍伊特·范登堡將軍於1949年4月20日向我詳細地報告了戰略空軍司令部的計劃。通過地圖和圖表，他準確地向我指出戰爭一旦爆發，戰略空軍司令部將怎樣行動。我是在聽到空軍的這個簡略的報告以後才將下列備忘錄送交國防部長的：

“昨天下午，我十分關切地聽取了空軍當局準備在戰爭一旦爆

发时，对可能的敌人进行的战略轰炸计划。我希望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计划中的轰炸可能成功的机会、以及轰炸的后果作出估价，供我审阅。”

国防部长约翰逊在答复中向我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在进行这种估计。这些负责我们军事计划的人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准备工作和结论。他们的计划始终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他们一直在变动和改进他们的计划，以便赶上世界的进展和力量的巨流。偶尔有些新闻记者风闻有某种军事计划存在，便把它们当作一成不变的政府的见解报道出去。在我担任总统期间，就常有这种事发生，而这种报道不但往往不正确，而且也常常带来危险。

在政府中，研究改进的措施，估价新的方案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再也没有人比总统更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能看到政府的机器是怎样在运转的。

当我要求政府各部门对某些问题作详细的研究时，它们的答复，甚至包括对最困难的问题的答复总是迅速而详尽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总统，我一向坚持在作出决定以前，尽量要有全面的了解，而且我也不希望掩饰分歧意见的含糊不清的报告。

在意见不统一时，我总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更重要的是，我要知道在我的顾问中所存在的分歧意见。如果总统只依靠经他周围少数人同意了的建议，而且这些又被压缩成简单的报告，呈上来请他批准的建议；那么，我认为这是总统的左右没有对他尽到责任。

在军事部门里，这样做也许有效率，但是在政府的最高机构里就不能这样办。从长远来说，对不同的看法作充分的研究、让赞成与反对的意见进行反复的辩论，才能得出最好的结果。我总是在

清晨和深夜花費很多時間去細讀代表各方面意見的文件。有許多時候，在我自己的腦子里已經肯定了哪一條路綫是正确的，但我在做最後決定以前，仍然要对形勢的各方面作全盤的研究。

就原子計劃來說，我与原子能委員會的委員們既有過單獨的討論，也有過集体的會商。我和科学家和軍事顧問們商談過。我也召見過對外政策的專家，听取他們的意見。當然，他們的意見并不經常是一致的，但在我的腦子里我却牢牢地抓住一個前提，那就是只要在国际上原子能管制問題上還沒有達成協議，我國就必須跑在任何可能的競爭者的前面。我深信只要我們在原子能發展上，把握住領先權，這個巨大的力量就会幫助我們維持和平。

在我和原子能委員會打交道的全部過程中，每當結束一次討論，經常告誡大家，我們必須領先。但是我們壟斷的終結比專家們所估計的提前了。1949年8月，俄國進行了一次原子爆炸。

從事情報工作的專家們對此曾有過不同的看法，但總的說來，他們沒有一個人預料到俄國能在1952年以前能設計出任何原子爆炸。幸運的是，空軍的遠距離偵察系統在1949年初已充分地發展了起來；通過這一偵察網，我們才能驚人詳細地获悉發生了一次不是由我們控制的原子爆炸。

1949年9月3日，一架遠距離偵察系統的偵察飛機收集到確定無疑的放射性空氣標本，于是整個遠距離偵察系統立刻以最高速度進行工作。美國空軍跟蹤追趕這種帶有可疑物質的雲朵，從北太平洋一直飛到英倫三島附近，在那里，英國空軍也發現了這種雲朵。從一開始，中央情報局就将發現的情況隨時報告給我。

接着科学家就开始工作，并分析了数据。空軍方面和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們和從大學召集來的顧問們對現有的資料進行了研究。隨後，一個由范尼伐爾·布希、羅伯特·奧本海默、羅伯特·巴徹爾、以及W·帕森斯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重新研究了這些發現。

这时毫无怀疑的余地了。在8月26到29日間，在亚洲大陆某处发生了一次原子爆炸。

9月21日，作为空軍參謀长直接負責远距离偵察系統的霍伊特·范登堡將軍向我汇报了这些事实。俄国人能以出乎我預料的速度获得这样进展，当然使我震惊。

在有关这一时期的报道中，有大量的訛传和有意的歪曲。在这一方面，这种現象对国家并没有好处，而且誰也沒有从这些不可靠的报道中得到帮助。科学家們在工作上所发生的坦率的意見分歧被歪曲了，使人看上去似乎是个人的爭执，这使科学家們感到难堪。政府官員发觉自己不是被描繪成坏蛋，就是被渲染成英雄，这得看你听的或讀的是哪一位广播評論員或专栏主笔的高論。

美国政府对俄国的原子爆炸并不是毫无准备的。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张惶失措，因而也无須采取任何紧急措施。这是我們預料迟早要发生的事件。的确，它发生得比我們专家所預料的要早，但这并不需要修改我們的計劃的方針。

在我发表公开声明之前，我首先要將俄国发生原子爆炸的消息通知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員會的委員們。于是我請該委員會的主席麦克馬洪參議員和該委員會的共和党主要人物希肯魯普參議員在第二天（即9月22日）到我的白宮办公室来。希肯魯普不在華盛頓，因此麦克馬洪一人单独来了。

我把空軍当局送来的报告和科学家的估計給他看。我們討論了这事件的意义，随后我告訴他，第二天我将发表一項公开声明。

9月23日上午十一点，也就是在我刚刚向內閣的例会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我通过白宮新聞秘书罗斯发表了下列公开声明：

“我认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原子能領域中的一切发展情况，这是与我們的国家安全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我作如下公开声明的原

因。

“我們所获得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在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了一次原子爆炸。

“自从人类首次解放原子能以来，其他国家在这种新力量上的发展本是意料中的事。我們过去一直就估計到这个可能性。

“将近四年以前，我曾指出‘科学界几乎一致地认为，这一发现的基础——主要的理論知識——早已广泛地传播开了。实际上，大家还一致认为，外国的研究工作能及时赶上我們目前的理論知識。’而且美国总统、联合王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在1945年11月15日发表的三国宣言中，就已強調指出，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原子武器。

“如果确有強調的必要，那么，最近这一发展再一次強調，对原子能进行真正有效的国际管制是必要的，我国政府和联合国的絕大多数成員国都拥护这种国际管制。”

俄国原子爆炸的一个积极后果，就是刺激了我們的實驗室和我們的伟大科学家，使他們加紧进行对氢弹的研究。

到了1949年初秋，“超极炸弹”——热核子或氢弹——的发展已进行到几乎可以把理論变成实际的阶段了。我相信，任何能保证我們在国防原子能发展的領域中获得領先权的东西都必須进行試驗，但是一个极复杂、极难以解决的問題却产生了，而其他的办法又非常渺茫。

第一个要决定的是，对一个初步的、标志着氢弹能否成功的試驗，原子能委员会究竟應該投入多少人力和物力的問題。为了做这个試驗，势必要挪用現在生产原子弹用的鈾。可是，为了对一个可能会失敗的方法进行試驗，我們究竟能把一个現在工作得很順利的計劃(鈾—钷法)削減多少呢？

在这个时候，与氢弹有关的一切东西都还不能肯定。一切都是理论和假设。甚至连科学家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意见都不一致。除此以外，我们所关心的这些事，不仅与科学知识有关，而且也和我们们的防御战略和对外政策有关。这一切都必须加以权衡。

在原子能委员会里，主席戴维·李连塞尔、萨姆纳·派克、以及罗伯特·巴彻尔是赞成慢慢试验氢弹的政策。而戈登·迪安和路易斯·斯特劳斯却认为没有理由拖延，要求立即着手制订试验计划。

原子能委员会向我全面报告了各种分歧意见，还有个别的委员分别写信表示自己的见解。我再一次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委员迪安·艾奇逊、路易斯·约翰逊、以及戴维·李连塞尔征询意见。11月10日我致函特别委员会写道：

“我最近接到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应否着手进行制造‘超级’原子武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原子能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提出的应予考虑的因素，而且也涉及国务院和国防部所注意的因素。

“为了协助我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我特指派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组成特别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向我提出建议。我建议委员会各委员在自己的机构中指定适当的咨询人员在各自的监督下进行必要的研究。我要求特别委员会分析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特别包括技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并就美国是否应着手进行‘超级’原子武器的发展和生产，和以何种方式进行，提出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我也希望委员会就应否将这一问题公开和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意见……”

1950年1月31日十二时三十分，特别委员会委员们带着报

告来到了白宫。这是一份由三位委员——迪安·艾奇逊、路易斯·约翰逊以及戴维·李连塞尔——共同签署的一致建议书，建议的要点是：我应指令原子能委员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制造和爆炸一个氢武器。与此同时，特别委员会建议从外交和军事两方面，重新审查我们的对外政策和战略计划。

我批准了这些建议，并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

“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我的一部分职责是使我们的国家能够保卫自己，抵抗任何可能的侵略者。

“因此，我已命令原子能委员会继续进行包括所谓氢弹或超级炸弹在内的一切形式原子武器的工作。

“与原子武器领域中的所有其他工作一样，这项工作正在并将继续在同我们的和平与安全计划的全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直到令人满意的国际管制原子能的计划实现为止。我们也将继续审查一切影响我们的和平计划和国家安全因素。”

大约一个月以后，在2月24日，国防部长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一个“立即全力发展氢弹以及氢弹的生产与运输工具”的建议，以便促进我们计划的实现。

军事当局的首脑认为氢弹试验可能成功；因此，他们建议批准有关设备、器材以及适当的运输工具全面生产的计划。

我将这一建议送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对各方面的情况作了彻底的研究，并在3月9日送来一份详细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获悉遵照我1月31日（给原子能委员会）的指示，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已把全部力量投入一个能使我们尽快地试验热核子武器的研究和发展计划；而且他们认为

在 1951 年內能进行氢弹装置的初步試驗。

如果初步試驗成功，整个装置就可能在 1952 年末准备好进行試驗。特別委员会报告說，在仔細审查全部情况后，他們得出这样的結論：“为了进一步加速試驗計劃，还没有其他可以采用的已知步驟。”

在得出这些結論以后，現在就需要决定原子能委员会应否在試驗可能成功的假定上，着手进行生产热核武器所需的原料的計劃。

这就牵涉到对許多問題的考虑，其中之一就是經費。这些試驗估計需要用九千五百万美元，而鈾—235 炸弹計劃部件的变更需款更为可观。供生产用的工厂以及氢弹所需的主要物质，至少，初步要花費两亿美元。与氢弹直接关系不大的发展計劃也需款約一亿美元。

很显然，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必須研究許多許多事实。还有，把所有的观点跟全部能找到的事实綜合起来，加以权衡，正是总统的职責。他不能偏向任何一边。他必須使軍事和对外政策取得平衡，同时又必須使这两者与国家的經濟取得平衡。

在研究特別委员会的报告时，我曾注意到氢弹的一个組成部分的生产設備，也可以供我們目前原子弹計劃和国防生产的其他部門的使用。因此，即使这个装置失败了，也不至于全部損失掉。不过，这一切都还不能肯定。

1950 年底和 1951 年初，在洛斯—阿拉謀斯的烏萊姆博士和特勒博士获得了改变这一情况的新发现。但是，在 1950 年 3 月，能否分裂像氢这样的輕原子尚有待证实。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3 月 10 日，我宣布說氢弹的研究是“最紧急的任务”，这就特別加强了这方面研究工作。同时我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立即作出大量生产的計劃。这样，当我们一旦知道氢弹是

可能的时候,就可以尽快地把它投入生产。

这个决定的后果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庞大的薩凡那河工程开始动工,同时原子能委员会的其他工厂设备也加以扩充。

与此同时,国务院的政策制订者和国防部的计划制定者已集中力量重新审查我们的目标,这是我在1月31日的指示中要求他们作的。4月7日,我接到这两个部门所得到的结论初稿。

这份报告首先对世界形势作了分析。它指出,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了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的两次重大革命,又看到了五个帝国的灭亡和英法两个主要帝国的急剧衰落。这些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的力量对比,到现在只剩下美国和苏联两个主要力量中心了。

报告继续说,美国已明确了自己的基本目标。美国宪法的序言用简练的不容误解的文字列举了美国人民的目标——“……组成一个更完善的联邦,确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宁,设立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并为我們自己和后代子孙谋自由”。

总而言之,我们的基本目标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保证我們所处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持久,这一社会是以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基础的。

而在另一方面,苏联的基本目的却是要建立一个受克里姆林宫的意志所统治的世界。这就使得美国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标,这也就是说,在苏联人能够达到它的目的之前,我們是苏联人必须消灭或击败的敌人。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事实就是这样。

我們讨论了形势中的危险之点,密切注意了俄国的原子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很可能在最近几年内发展起来。

我們对外政策的目标是迅速地建立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軍事的联合力量。

对于谋求世界和平来说,原子的力量是极端重要的。原子在

发展动力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它能为和平的世界带来幸福和繁荣。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个像我们几年以来所处的接近战争边缘的世界里，原子能掌握在不适当的人手里，就能招致人类的毁灭。然而，掌握在适当的人手里，它能被用作抵制侵略和轻率发动战争的强大力量。因此，我一向坚持，我们要以均衡的安全制度和均衡的经济作为本钱，在原子能事业上走在全世界的前头。

氢弹的发展是我们掌握领导权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能使原子弹适用于新的用途，甚至可能达到制造原子炮，把原子弹头装在导弹上，以及把原子发动机装在潜艇上。

但是，在我们把原子能的原理应用到新用途上的时候，我们发觉在像比基尼和恩尼威托克这样遥远的地点进行必要的试验是有困难的。1950年夏，继李连塞尔出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戈登·迪安向我建议，在美国本部建立一个试验场。他介绍了一个距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以北七十哩左右的地方，但他又告诉我，少数曾和他讨论过这件事的政府高级官员对这个建议表示很大的怀疑。有一位率直地告诉他：“美国人民将永远不能容忍在自己国家里爆炸原子弹。”

我问道：“戈登，从时间上看，如果我们建立了这个试验场，它真能有助于我们的武器计划吗？”

迪安向我保证会有帮助的。

“以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进行试验能行吗？”我问道。

迪安说可以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于是我叫他着手进行。不过，我建议最好是不要过于宣扬，并要悄悄地通知试验区范围内的高级官员。

到1952年末，在犹卡滩地的内华达试验场上已经进行了二十次单独的原子爆炸，并且有其他很多器械都作了试验。部队也被调来试验防御装备和战术，而陆军的几个营已配备了能发射原子

炮弹的新型大炮。不仅于此，1952年6月14日，在利用原子能的发展中竖下了新的里程碑，在那天我们安装了《鳐鱼号》的龙骨，这是第一艘利用原子能推动的潜水艇，也是任何种类的远洋船只中第一艘利用原子能推动的船只。

与此同时，和平时期利用原子能的科学部门仍然受到重视。每当李连塞尔或继任的戈登·迪安与我商谈这个问题时，我都要他们报告在研究和工业发展上所作的努力。原子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对人类有巨大益处的动力，当然，除非人类愚蠢到用这种力量去毁灭自己。

这个时期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发展之一，就是在爱达荷州阿尔科地方建立了一个原子反应堆，这个反应堆所生产的分裂物质比装进去的还要多。这一试验的成功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未来发展应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利用原子能的道路已经被扫清了；这意味着“原子能为和平服务”已经可以是一件现实的事情来谈论，而不再是一种希望了。

尽管原料缺乏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拖延，热核能的发展依然在进行。1951年3月，一个决定性的试验在恩尼威托克岛成功地实现了。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因为它证实了科学的计算是正确的，掌握了这种知识就有可能作出更进一步的具体计划。不久以后（1951年6月），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召开了一次拟定计划的会议。这个会获得了巨大的进展，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意见是关于大量生产氢弹的新计划。

6月12日，戈登·迪安给我带来了关于这次会议以及大家同意的计划的详细报告。他说，如果我现在就批准这个计划，估计在1952年初秋，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次热核武器的全面试验，我把迪安的报告带回，作深入的研究。

一星期后，他得到了我的批准，照计划行事。

有一件与这次氢弹試驗糾纏在一起的事情，我們当时沒有料到，这就是天气和美国政治的关系。当 1952 年的秋季来临，准备工作接近完成的时候，原子能委员会要求为恩尼威托克島試驗場作一次气象預报，以便决定試驗的准确日期。但太平洋那部分地区的气候是这样糟，以至在秋季，每月只有一两天的气候条件是合乎理想的，而进行試驗的最合适的日期結果是 11 月 1 日，离大选只有三天。

戈登·迪安跑来見我，对我說他和某些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員认为，在距离选举日这样近的日子里进行第一次大規模的氢弹試驗也許不太好。他們认为，爆炸肯定不能一直保守秘密，人們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手段。我問戈登·迪安是否知道有其他合适的日期，如果延期試驗将有什么損失。他告訴我。接着我指示他撇开政治，不管哪一天，只要气候条件适宜就在哪一天試驗。我想他在来以前就知道我的答复是什么，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听我說过，在国家的原子弹計劃中，决不能掺杂政治成分。

第一枚氢弹的試驗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成就，它是在 11 月 1 日进行的。爆炸的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整个島屿都被炸掉了，还在珊瑚礁上留下一个大弹坑。这是一种新力量的可怕的实地表演，而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件事全面通知新当选的总统。于是在选举后的第一天我就要求原子能委员会設法把我們的整个核武器計劃和試驗的結果扼要地报告給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

到新政府接管的时候，我国已經历了七年半的原子时代。我們在核能的研究和发展上投資七十亿美元。到 1953 年，我国已有了原子弹的儲存，还有把这些原子弹运到目的地去的运输工具。我国也有了一个日益丰富的、使用原子弹头的战术武器的武器庫，一艘正在建造中的、用原子能推动的潛水艇和一种已試驗成功的氢弹以及生产这种氢弹的設備。到了 1953 年，原子能已成功地应

用到医学和生物学的领域，而且正在进一步研究有利于经济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此外，我们首先倡议联合国管制原子能。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们不顾俄国人的阻挠，坚决主张国际管制。

一切功劳必须归于那些科学家们、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以及在实验室和工厂里献身于这一事业的工作人员。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它的工作人员以及顾问团的名单念起来就像是献身于公务的最优秀的人物的名单一样。他们有些人由于说了心里话并拒绝在原子能计划中掺杂政治而受到了非难和辱骂，但是使民主获得胜利的正是这些人。

在原子能发展的进程表里，我把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军事利用原子能并列在一起。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世界里，我们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是一个实际需要；但是我一直在殷切地盼望，原子能为正当的用途——全人类的福利——服务的一天早日到来。

如果我们的原子能国际管制计划能够实现、如果世界上科学家的全部努力都能够集中在寻求使原子为人类的需求服务的方式和方法上，那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我一直在祈祷，希望世界将原子当作一个有用的能的源泉和重要的治疗疾病的力量源泉，而永远不再去挖掘潜藏在这些原素里的可怕的毁灭力量。

第二十一章

三 八 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許很少美国人知道或者注意朝鮮，頂多是把它看做是远在亚洲的一个神秘地方而已。直到1945年夏季末我国的占領軍在那儿登陆以前，除了一小部分传教士以外，美国人是沒有机会見識这个“像清晨般宁靜的地方”的。

朝鮮这个一度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中国的王国，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以后受到了日本的統治。随后在1910年，日本人撕掉一切假面具，吞并了这个国家，把它当成一个被征服的省份。

在1943年11月的开罗會議上，罗斯福总統、蔣介石和丘吉尔首相曾經同意“軫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他們并且“决定在相当期間，使朝鮮自由独立”。

后来在德黑兰，在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會議中也討論了朝鮮的前途問題。斯大林說他看到了开罗宣言，并且說朝鮮应当获得独立，那是正确的。他还同意在朝鮮能获得完全独立以前，需要有那么一段准备期間，也許需要四十年。

在1945年2月举行雅尔塔會議时，罗斯福总統和斯大林在非正式的談話中又討論到朝鮮問題。罗斯福总統提出了一般的托管問題，并且說，以朝鮮而論，应当由苏联、中国和美国三个国家的代表来負責托管。他举菲律宾为例，來說明要使朝鮮能完全自治，将需要一段多么长的時間。菲律宾群島花了四十年，朝鮮也許只需要二十或三十年。斯大林說，托管期間愈短愈好，他还认为应当請英国一同来策划托管事宜。此外，在我继任总統以后，他还肯定了

這項諒解，他在 1945 年 5 月 28 日告訴哈里·霍浦金斯說，俄國應允執行四國托管朝鮮的政策。

在我同俄國總理^①和英國首相在波茨坦舉行的會議上，莫洛托夫曾經提到朝鮮問題，但沒有進行討論。然而，在波茨坦公告中，清楚表示了不容許日本繼續擁有朝鮮的意思。而且，在我們三個國家的軍事首長舉行會議的時候，大家同意在俄國參加太平洋戰爭以後，應當在朝鮮整個地區就美國和俄國的空軍和海軍的作戰範圍劃一條界綫。至於地面上的作戰或占領區域，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因為當時沒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國的或者是蘇聯的地面部隊，會在短期內進入朝鮮。

國際會議上從來沒有討論過以三八綫作為在朝鮮的分界綫這個題目。由於日本戰爭機構的突然崩潰，在朝鮮造成了真空局面，我們提出三八綫，作為一種切实可行的解決辦法。我們在那裡沒有軍隊，沒有可供我們部隊在這個半島的南半部好幾個地方登陸的船隻。國務院極力主張在整個朝鮮的日本部隊應由美國受降，但是我們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軍隊運送到朝鮮北部，那就無法保證我們在日本搶先登陸。鑒於斯大林已經同意共同托管的主張，我們希望把這個國家劃分為兩部分只是為了便於接受日本投降，隨後再使整個半島受到共同的管制。

但是，俄國人却立即開始把三八綫當做一條永久的分界綫。他們不允許在這條綫上有交通往來，除非每次都得到他們的明文批准。由於大部分為數不多的工廠都在三八綫以北，而大部分肥沃土地都在三八綫以南，把這個國家這樣分開以後，就打亂了它的正常的經濟生活，增加了人民的痛苦。

我們駐朝鮮軍隊的司令官約翰·霍季中將力圖和俄國的司令官舉行談判，但他每次的建議總是遭到拒絕。在占領朝鮮三個月

^① 指斯大林。——譯者

以后，霍季將軍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報告朝鮮情況，他認為由俄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一個在三八綫以北，一個在三八綫以南——來占領朝鮮，勢必使我們的占領使命難于完成，這個使命就是建立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為朝鮮將來的獨立準備條件。在南朝鮮，人們把分裂的局面歸罪于美國，這個地區的人越來越憎恨一切美國人。霍季將軍報告說，朝鮮人十分了解，在目前這種由兩個國家占領的情況下，關於真正的自由和獨立的談判，純粹是空談而已；然而朝鮮人希望自己獲得獨立，他們已開始懷疑盟國的諾言是否具有誠意。霍季說，按照西方的標準，朝鮮人還不夠獨立的條件，但是日益明顯的事實是，在兩國占領局面繼續存在的情況下，他們的自治能力是不会有很大增長的。

根據霍季的看法，朝鮮人極其厭惡盟國所採取的托管這個暫時解決辦法，以致“如果現在或將來任何時候要強制實行的話，相信朝鮮人一定會拿起武器來反抗。”

霍季將軍最後總括起來說，“在目前這種條件和政策下，美國占領朝鮮一定會把我們沖到政治和經濟深淵的邊緣，在這個深淵里，美國在遠東的威信就無以挽回了。為了不再朝這個方向流去，就必須在國際方面採取積極的行動，或者在最近的將來由美國在南朝鮮取得完全的主動權。目前特別迫切需要做的是：（一）取消三八綫這個障礙以統一朝鮮。（二）明確發表關於前日本財產的地位以及關於任何這類財產的賠償問題的政策聲明。（三）在採取上述行動的同時，重申盟國關於給予朝鮮獨立的諾言。（四）應在新聞界，在社會人士，在國務院和陸軍部以及在各盟國的心目中，把朝鮮同日本完全劃分開來。

“在目前還不會很快就採取糾正辦法的情況下，我很想提出這樣一個建議：讓我們認真考慮一下，同俄國達成一項協議，由美國和俄國同時從朝鮮撤退各自的軍隊，而讓朝鮮自己去想辦法，使它

为了自行清理内务而去蒙受那场不可避免的內乱。”

这个问题已经决定由两国政府派遣最高级代表进行谈判。当貝尔納斯国务卿在1945年12月前往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朝鮮問題就是他要同莫洛托夫談判的問題之一。

在第一次外长會議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議程的名目經双方同意：“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鮮政府而建立一个統一的朝鮮行政机构”。貝尔納斯国务卿把哈里曼大使在11月8日給莫洛托夫的一封信的副本交给了其他外长，在这封信里面，哈里曼請求授权駐扎在朝鮮的苏軍司令官同美軍司令官进行商談，以便就交通、商务、货币和有关朝鮮的其他悬而未决的事項等这类共同的問題作出安排。

莫洛托夫先生立即显出他是一位多么难以对付的人物。他說，这封信所提的不属于政府行政机构的事項，因此与議程上的題目无关。他希望把討論的內容限于行政机构和托管方面的問題。

第二天，貝尔納斯先生发表了美国对朝鮮的政策声明。这个声明首先回顾了开罗宣言，宣言中曾強調指出我們必須使朝鮮获得独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們建議立即采取行动，取消各自为政的軍事行政区，而建立一个統一的行政机构，作为联合国委托四国托管的暫时的、但是必要的初步办法。我們說，我們希望在五年內可以給予独立。

莫洛托夫要求給予时间来研究我們的声明，而他一直到12月20日才重提这个问题。他当时承认苏联已經同意关于四国托管的办法，但是他說，这是一个长時間的問題，而不是一个即待解決的問題。然后他代表苏联政府建議，应当在朝鮮設立一个临时政府，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发展朝鮮的工业、农业、运输和朝鮮人民的民族文化。由苏軍司令部和美軍司令部的代表組成的联合委员会应当协助成立这样一个临时政府，同朝鮮的各民主党派和社

会团体磋商，并提出自己的建議供各自的政府考虑。委员会还应当提出关于托管的建議，以供英国、中国和美国共同考虑。同时，朝鮮的美軍和苏軍司令部的代表应当在两星期內举行會議，来商討有关南北两个地区的緊急問題，并拟定方案，以期两个司令部在行政和經濟事务上的永久协调一致。

貝尔納斯国务卿在第二天通知莫洛托夫先生說，除了两处小的修改外，我們可以接受这个建議。这个建議还写在莫斯科會議的公报里。

这是貝尔納斯在回到美国的时候向我报告的。

朝鮮的美軍司令官和苏軍司令官按照莫斯科的協議在1946年1月16日举行了會議，但是差不多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双方的談判是不会有什麼結果的。俄国人坚决认为，这种會議除了能就两个地区之間的次要問題作些調整安排外，无权討論其他任何問題。我們的代表則认为，应当討論有关两个地区最后如何統一的問題。到2月5日，最后只就交換邮件、无綫电頻率的安排、人和貨物越过三八綫的規定等一类問題达成了有限的協議。即使是这样一些協議，后来证明也是难于實現的，因此双方司令官會談的真正結果，只限于偶尔交換邮件和互派人数不多的軍事聯絡小組。

莫斯科協議中規定設立的联合委员会于1946年3月20日在朝鮮的古都汉城开始工作。这个委员会无疑是莫斯科會議制訂的計劃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是这个委员会几乎刚开始工作就陷入了僵局。我們认为，所有的朝鮮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見，而联合委员会应当听取朝鮮的任何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的代表所願意提出的意見。但是俄国人却坚决认为，只有那些曾經充分支持莫斯科協議規定的朝鮮人才允許向委员会提出意見。然而事实上，在我們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一切政治党派，都曾对推迟获得独立的期限和先要經過一个托管阶段的做法，表示过失望；而按照俄

国人的标准，这样它們就沒有資格向联合委员会提出意見。朝鮮的共产党人当然不可能去公开反对莫斯科協議的，这么一来，如果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就只許共产党人代表朝鮮人民說話了。

联合委员会于是在5月8日无限期地休会，一点也沒有接触到关系这个国家的重大問題。霍季將軍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还作过好几次努力，希望同苏軍司令官寻求达成協議的基础，但无結果。

这时候，在极少数被允許进入朝鮮俄国占领区进行考察的美国人当中，有一个向我提出了一个报告。这就是作为总统的代表、以大使級头衔派赴朝鮮負責賠償事宜的埃德溫·保萊，他在1946年5月29日到6月3日巡視了北朝鮮的俄国占领区，俄国当局派人陪同他考察了那里的工厂。他还在朝鮮的我軍地区盘桓了相当一个时期。在視察朝鮮的工作完毕以后，他写了一封信給我，把他所看到的情况归納如下：

“下面是根据我自己和我的随員在朝鮮亲身考察后所获得的关于朝鮮情况的一些观感、結論和建議。我在朝鮮接見過我們的占领軍里面的一些人，也接見過北朝鮮的人和苏联占领軍里面的一些人；他們的意見我也曾給予考虑。

“坦白地讲，我非常耽心我們在朝鮮所处的地位，而且我觉得我們并沒給予这个問題应有的注意和思考。尽管朝鮮是一个小国，从我們的整个軍事力量来看，我們在这里担負的責任并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却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們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斗争。就在这个地方将測驗出来，究竟民主竞争制度是不是适宜于用来代替失敗了的封建主义，或者其他某种制度——共产主义，还更强一些。

“从苏联人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他們无意立即撤离朝鮮，理由如下：

“（一）关于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建立托管的問題，关于建立

任何临时政府之类的机构問題，以及关于采取任何可能妨碍他們在北朝鮮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行动，苏联人显然都采取了拖延的办法。

“（二）他們正在扶植共产党和鼓吹苏联式的綱領，通过这种綱領，将使效忠于莫斯科成为效忠于朝鮮的最高形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对一切反对他們或者仅對他們的那种哲学提出疑問的政治党派橫加摧殘。例如，在北朝鮮的街道上，就张贴了苏联的标語和宣传画，其中大多数都是为苏联政府作宣传的，包括斯大林和列宁的巨幅画像。

“許多标語的字句如下：

“‘苏联和朝鮮的友誼万岁。’

“‘苏联政府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我們要更高地举起紅軍的光荣旗帜。’

“‘为了祖国，为了党，为了斯大林貢獻出我們的一切。’

“‘我們的胜利的締造者斯大林万岁。’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战士必須加倍提高警惕。’

“‘紅軍战士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班长。’

“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政府是不想让美国独家使用‘民主’这个字眼的。‘民主’对苏联人來說是一回事，而对美国來說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對我們來說，‘民主’尤共是指言論、集会和新聞的自由。而苏联人对‘民主’的解释則是指人民群众的福利。

“在考虑苏联的宣传对朝鮮人所产生的效果时，必須記住在目前朝鮮的二千七百万人口中，大約有 70% 是小农和漁夫。其中只有很少数人投过选举票，甚至可以說只有很少一些人投票权。他們对本国的或者国际的經濟事务一无所知，这些人是很容易被甜言蜜語和諾言所迷惑的。

“（三）共产主义在朝鮮几乎要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具

备更好的条件来开始它的第一步。这里的铁路，一切公用事业包括水和电在内，以及全部主要工业和自然资源，都是归日本人所有。因此，如果这些东西突然一旦划归‘人民委员会’（共产党）所有，那末他们用不着费任何周折就可以取得这些东西，也用不着为了发展这方面的事业而进行任何工作。除非能保证在这里建立一个民主（资本主义）形式的政府，美国不应当放弃它对日本在朝鲜的国外资财的所有权的要求，这就是理由之一。

“（四）虽然苏联人也許运走一些儲存和目前生产的一些物资，但是他們并没有大量地把机器装备运走。

“（五）他們正在大力恢复北朝鲜的經濟活动，可能他們的目标是要用同苏联的新的經濟联系，来代替已經中断的同日本的經濟联系。

“（六）苏联军队显然是在作长期留在朝鲜的打算。军官的眷属已經带来。事实上北朝鲜的铁路就是由军队在那里经营管理。从高級军官发表的談話中，也看不出有任何撤离朝鲜的計劃，甚至看不出他們希望撤离朝鲜的表示。……

“1946年6月22日”

那年秋季俄国人在他們的占领区举行了当地的“人民委员会”选举。99.3%的选民前往投票处投票，热烈地表示他們对新政权的“忠诚”。按照苏联的办法，选民用不着为挑选哪些候选人为难，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

在我們南朝鲜这边，主要的口号是“需要教育而不需要教訓”。我們的軍政府容許充分的言論自由，即使朝鮮人批評美国占领軍也无妨。当然，大多数朝鮮人既不希望美国士兵、也不希望俄国士兵留在自己的国土上，而共产党人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排外情緒。1946年秋季，在我們占领的地区曾經发生过几起騷乱和示威运动，在少数情况下，我們的军队还不能不向进行威胁的群众开枪射

击。

朝鮮人民是从不知道什么民主政府的，因此我們采取的一些办法常常引起誤解。当我們的軍政府极力想听取一下各方面的意見的时候，人們就責难我們优柔寡断。当軍政府提出警告不要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人們又指責我們不公平。争取朝鮮独立的老战士李承晚就确实曾經指責霍季將軍和我們的軍政府“力图建立和扶植朝鮮共产党”。

1947年1月，霍季將軍报告說，除非美国和俄国合作来寻求解决这个国家的問題的办法，朝鮮事实上可能会发生內战。在經濟方面，这个国家的情况似乎每况愈下。黑市造成了物价的飞涨，也使得市面的物資供应陷于枯竭。水灾、罢工和战争造成各項設備的普遍损坏，交通运输几乎完全陷于停頓。

1947年2月24日，霍季將軍在白宫亲自向我作了报告。他对我充分地描述了朝鮮的經濟困难和政治騷动的情况。他述說了我們軍政府曾經进行的一些工作，为在我們占領区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准备条件，但仍再度建議由俄国和美国共同寻求办法解决朝鮮的問題。早在霍季从汉城司令部书面提出了这个建議，促請立即采取措施通过外交方式来打开美苏在朝鮮的僵局时，麦克阿瑟將軍就批准了这个建議。

我根据霍季將軍和麦克阿瑟將軍的这些报告，批准了国务卿馬歇尔关于再一次努力促使联合委员会进行工作的計劃。1947年4月和5月，国务卿和莫洛托夫就朝鮮問題交換了函电，看来苏联政府已願意改变它原来的立場。因此双方作了一些安排，准备联合委员会在1947年5月21日于汉城恢复工作。

这一进展却遭到一部分朝鮮人士的坚决反对，这些人不想重提托管的問題。李承晚是这帮反对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霍季將軍很耽心李承晚会利用极右集团来破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

我們美国参加这个联合委员会的高级代表是艾伯特·布朗少将。委员会最初进行得似乎很不错。俄国人已愿意听取任何朝鲜社团的意见，不管这个社团过去的立场怎样，只要它现在表示支持莫斯科协议中所制定的政策。但是，7月初，苏联代表团又回到了它在1946年联合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上所采取过的立场。俄国人再一次坚持说，凡是曾经反对莫斯科协议中关于托管规定的党派和个人，都没有资格参加协商。于是关于言论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又提上了议程，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代表是不能让步的。尽管这样，我们的代表团还是继续努力，想跟对方采取某些共同行动，可是没有哪一个建议能获得俄国人的赞同。

1947年8月26日，我们向俄国人提出，由负责托管朝鲜的四个国家——英国、中国、苏联和美国——在9月8日于华盛顿举行会议，来商讨如何执行莫斯科协议的办法。在发出这项邀请书的同时，我们提出了七点建议：

（一）早日举行选举，以便选择俄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各自的临时立法机构。投票应当采取秘密方式，并且应该是在普选的基础上实行多党候选人制，至于选举程序，则可按目前朝鲜南北两个地区各自的立法机构所规定的法律办理。

（二）这两个地区的临时立法机构，应当按两个地区的人口比例，选出相应数目的代表，由这些代表组成全国性的临时立法机构。这个立法机构应于汉城开会，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

（三）这样产生的这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应当同讨论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议有关的四个国家的代表在朝鲜举行会议，来和他们讨论应当给予怎样的支援和帮助，以便使朝鲜的独立能建立在巩固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并讨论按照怎样一些条件来给予这些支援和帮助。

（四）在上述各个阶段中，都应当邀请联合国的观察员列

席。……

(五) 朝鮮临时政府和有关国家应当協議規定一个日期, 撤退朝鮮的一切占領軍。

(六) 应当贊助两个地区的临时立法机构起草临时宪法, 以便将来全国性的临时立法机构在制定全朝鮮所遵行的宪法的时候, 可以拿它作为基础。

(七) 在一个統一和独立的朝鮮建立以前, 应允許南北地区的朝鮮公私机构同联合国所建立的或所屬的国际机构联系。……

俄国人断然拒絕了这个建議。他們坚决认为莫斯科協議已經規定成立联合委员会为朝鮮走向独立的第一步, 任何其他解决这一問題的方式都将是违反協議的。他們說我們的建議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使我們再沒有选择的余地, 而只能认为直接同俄国人进行关于朝鮮問題的談判, 是不会获得成功的。因此我指定国务卿馬歇尔把這個問題提到将要在紐約成功湖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馬歇尔闡述了我們这方面在这场爭执中所持的理由, 他請求联合国去完成那項由于“两个国家无力达成協議”而至今受到阻碍的任务, 也就是恢复朝鮮的統一。

俄国人为了对付这一着, 便在9月26日联合委员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議: 1948年初的某个时候, 所有占領軍隊同时从朝鮮撤退。联合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回答說, 它沒有商討这样一个协定的权力。俄国人随后还一再地通过正式手續把這項建議提到国务院。代理国务卿罗維特回答說, 当联合国还在就主要問題进行討論的时候, 我們不可能商討单独的协定。

但是, 我們还是考虑了关于撤退軍隊的問題。同战时的最高数目比起来, 我們的武装部队已經大大地减少, 而在国会中, 也还是有一股很大的压力, 要求进一步削減軍事开支。我們承担的义

务很多，但我們的部队却有限。我命令国务院和国防部权衡一下我們在各方面所承担的义务，考虑一下我們可以从哪些地方安全地撤退我們的军队。

參謀长联席會議从軍事的角度就部队从朝鮮撤退的問題作了仔細的研究，在1947年9月提出报告說，在这个国家保持着我們那些人員不足的占領部队，並沒有什么战略价值。当时參謀长联席會議中的成員除了李海海軍上将以外，还有艾森豪威尔將軍、尼米茲海軍上将和斯波茨將軍。他們的意見都写在下面的备忘录里面，这份备忘录原是致送給国务卿的，他把它轉給了我。

“參謀长联席會議认为，从軍事安全的观点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鮮的军队和基地，并无战略价值，理由如下：

“在远东一旦发生战事的时候，我們目前在朝鮮的部队将成为在軍事上的一个負担，而且在战事发生以前，如果不大量地增加援軍，那是不可能保持住的。而且，美国所可能希望在亚洲大陆进行的任何进攻，多半会繞过朝鮮半島。

“相反的，如果敌人能够在朝鮮半島建立和保持强大的空軍和海軍基地，那末他們就可能干扰美国在中国的华东、滿洲、黄海、日本海和邻近島屿的交通运输和軍事行动。敌人要进行这种干扰，就必須在一个地区保持大量的空軍和海軍力量，而这样的力量将会为空中的敌对行动所抵消。利用空軍来抵消敌人力量要比大規模的地面作战更容易办到，花費要更少一些。

“在当前这种严重缺乏兵源的情况下，保持在南朝鮮的两个师——共約四万五千人——是可以很好地用到別的地方，把这些部队从朝鮮撤退，不会損害我們远东司令部的軍事地位，除非苏联因此在南朝鮮建立足以向日本发动攻势的軍事力量。

“在目前，占領朝鮮需要耗費巨大的开支，而这笔錢主要是为

了防止疾病和騷乱；这种疾病和騷乱可能会危害到我們的占領軍，而对于美国安全的长远利益，如果有，也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朝鮮方面可靠的报告，在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朝鮮这个問題上，还是不会有进展，除非制訂一个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恢复工作的計劃，那末很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包括暴动在內，使得美国占領軍站不住脚。在这种局势下，慌慌忙忙地来撤退我們的軍隊，就会降低美国在軍事方面的威信，而且很可能会对我們在其他地区同別人进行合作的关系上产生不良的影响，而这些地区对于美国的安全來說則是更为重要的。

“1947年9月25日”

当三軍參謀长草拟这个报告的时候，他們已經获悉关于艾伯特·魏德迈中将的考察旅行的結果。魏德迈將軍是我請他去作这次旅行的，关于他的这次旅行，后来談論的人很多。魏德迈將軍当时負責陸軍方面的計劃和作战工作，他曾經亲自去考察了1947年夏季的局势，关于美国軍隊撤离朝鮮的問題，他的結論如下：

“当苏联軍隊仍然占領着北朝鮮的时候，美国就必須把它的軍隊留在南朝鮮，不然的話，就等于向全世界承认‘精神上的退却’。这样，美国的軍事地位就会随之降低，不但在远东会是这样，在全世界也会是这样。……

“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一点，以及由于美国軍隊的占領南朝鮮，就可以使一个潜在的敌人无从使用不冻港，也不会有机会在这个半島上建立强大的空軍和海軍基地以外，美国在朝鮮保持自己的軍隊或基地是没有什么軍事价值的。一旦在远东发生大規模的战事，我們目前在朝鮮的部队很可能只会是一个軍事上的負擔，因为照我們目前的軍事力量来看，这些部队在那里是維持不下去的。

“在朝鮮的美国占領部队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立即撤退，这样就会在北朝鲜人民（共产党）军可能发动的压力下，放弃南朝鲜，把它让给苏联，因此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种办法是不可能接受的。

“其次是无限期地占领下去。这种做法，在苏联军队撤走以后，不可能为美国的公众所接受，而且会使美国受到国际的谴责。

“最后是和苏联占领部队同时撤退。”

魏德迈将军最后建议最好是在同俄国人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走第三条道路，而在我们的军队撤离以前，由我们来帮助南朝鲜建立和训练它本国的国防军。

为了想同俄国人就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我批准了一个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详细方案。我们建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于1948年3月31日前在南北朝鲜两个地区举行选举，以此作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的第一步。我们主张这个全国性的政府应当建立自己的保安部队，组织政府机构，然后同占领国商谈撤退他们的军队问题。为了监督选举和促进以后各个步骤的进行，我们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

俄国人的回答是指责我们违反了莫斯科协议，因为我们竟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然后他们提出要求立即撤退占领军的议案。这个议案在第一委员会和大会的全体会议上都没有获得通过，于是苏联代表宣布，如果成立联合国朝鲜事务委员会，苏联将不可能参加它的工作。

在大会上代表美国发言的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大会终于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弃权的只有苏联集团。

接着便成立了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委员会在1948年1月12日于汉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尽管北朝鲜的苏军司令官不让这个委员会的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苏军司令官甚至拒绝接受委员会寄给他的信件。

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员会于是命令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它所能到达的朝鲜任何地区展开工作。这个委员会后来负起了监督1948年5月10日举行的自由选举的任务，尽管共产党人有组织地极力制造骚乱，破坏这次选举，南朝鲜五分之四的合格的选民都履行了登记手续，而这些登记了的选民，有90%以上的人投了票。这是朝鲜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正如后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报告所说的，这次选举是“委员会所能到达的地区的选民的自由意志的确切体现，而这些地区的居民将近占全体朝鲜人民的三分之二。”

美国占领区的人民选出的国民议会在1948年5月31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大会选举李承晚先生为主席，然后进行草拟大韩民国的宪法的工作。这项工作于7月12日宣告完成，7月17日便公布了朝鲜的新宪法。7月20日，李承晚被国民议会选举为大韩民国的总统。

遵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建立大韩民国的下一个步骤是把政权从南部地区的占领军司令部和民政机构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大韩民国。我们军政府的官员在过去三年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其职员几乎全是朝鲜人。这就使得移交工作十分顺利。

我指令国务院尽快地进行这项工作。朝鲜人民希望有自己的政府，而他们也权利得到这样一个政府。因此，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便正式宣告成立，美国军政府宣告结束。9月11日，我们就新政府接管几个警察和保安部队的問題作了安排，同时在财产和财政問題方面获得了解决办法。

9月9日，北朝鲜的苏联占领当局针对大韩民国的建立，在平壤宣布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十天以后，苏联外交部告诉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说，所有苏联的部队将在1948年12月底从朝鲜撤退。后来还告诉我们，这一计划已如期完成。

我們当然贊成撤退軍隊。我一向相信，再沒有比不需要的軍隊——外國的也好，本國的也好——駐扎在一個地方更加容易引起敵對情緒。我國南部各州的人民在淒慘的改造時期就具有這種情緒，當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小孩的時候，我就從我的父母和家庭的親友處聽到許多關於南方進行反抗的種種情況。正同我母親一樣，我的父親就是一個沒有改造過來的人。

但是，我們知道俄國人在北朝鮮建立了一支“人民軍”。我們知道共產黨滲透到南朝鮮的情況很嚴重。我們知道李承晚的新政府如果一旦遭到攻擊，一定難于作有效的抵抗。可是，我們的專家們就新成立的大韓民國的生存問題作了仔細的估計，他們的結論是，“只要這個國家能繼續從美國取得大規模的援助，那末它的生存是可以認為有希望的”。

1948年春，國家安全委員會向我報告說，我們可以在下列三個辦法中選擇一個：放棄朝鮮；或者繼續負起對這個國家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責任；或者擴大我們對朝鮮政府的援助來訓練和裝備它本國的保安部隊，同時給予大規模的經濟援助，以免這個剛剛誕生的國家陷於崩潰。但是委員會建議我們採取第三個辦法，我批准了這個辦法。

陸軍部長羅亞耳說，1949年2月初他同麥克阿瑟將軍談話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表示贊成趕快把我們的軍隊從朝鮮撤走。此外，當國家安全委員會在1949年3月22日研究朝鮮局勢的時候，它還獲得了麥克阿瑟的一個報告，說是大韓民國新建立的保安部隊所受的訓練和它的戰鬥意志，都已達到一定的水平，現在已經有理由把美國軍隊全部撤離朝鮮，而對我們在朝鮮的地位不致產生不良後果。

這個時候，南朝鮮人已經集結了一支約有六萬五千人的軍隊，這支軍隊訓練的進度很令人滿意。幫助這支軍隊執行任務的是由

我們軍隊抽調的約五百名官兵所組成的顧問團。除了這個顧問團以外，我們的軍隊全部在1949年6月29日撤離了朝鮮。

在朝鮮的軍事撥款(1949年會計年度)期滿以前不久，我致送國會一個咨文，請求以一億五千萬美元作為給予朝鮮的經濟援助。不幸的是，國會竟拖了四個多月才批准了這筆費用，而當我請求為了同一目的另以六千萬美元列入1950—1951年度預算中的時候，這個請求實際上被眾議院否決了，大多數反對票來自共和黨人。這筆經費後來雖然作為朝中援助聯合法案中的一部分而獲得通過，就總的情況來看，國會對於總統所請求的援外法案，可以說是抓得不緊的。

為了鞏固朝鮮的軍事地位，我批准了在1950年1月26日簽訂的一個防務協定。但是，我們對南朝鮮的國內局勢和經濟情況還是很關心。我之所以批准撤退軍隊的政策，理由之一——儘管只是一個次要的理由，是當時存在着一種危險，那就是我們可能會被卷入這個年輕國家的政治糾紛中而無以自拔。李承晚總統是一個自信心很強的人，而對於具有不同意見的人則不能容忍。自從1945年他回到朝鮮的那天起，他就吸收了一批具有極端右傾觀點的人，而對那些不怎么太走極端的政治領袖的意見則堅決拒絕。軍政府的撤銷，使他可以肆無忌憚地以專斷手段對付他的反對者。我倒不在乎李承晚的警察採用怎樣一種方法來搗亂政治集會和壓制政敵，我深切關心的是李承晚政府竟然不顧席卷全國的嚴重通貨膨脹。然而我們除了支持李承晚，再沒有選擇的余地。從1905年以來，朝鮮就受到日本人的摧殘和蹂躪，它沒有機會培養其他的領袖人物。

我們知道，如果北朝鮮的軍隊發動一次全面進攻，李承晚的政府就會遇到嚴重的威脅。因此，我們要求他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地區鞏固起來；此外，我們還要求他設法使農民過繁榮幸福的生活，使他們不至於受共產黨的蠱惑。

第二十二章

朝鮮受到侵略

1948年春，当我和我的顧問們討論朝鮮政策的时候，我們就知道在苏联控制下的共产主义世界可能会选择这里作为进攻地区之一。但是，从挪威經柏林和的里雅斯特到希腊、土耳其和伊朗，从北太平洋的千島群島到印度支那和馬來亞，凡是东西方有接触的地方，我們都可以作同样的估計。

当然，每一个司令官都认为他那个地区的处境最危險。很明显，关于部队和物資的分配，不能由一个地区的司令官、而必須由高級統帥部来作最后决定。

1950年春从朝鮮获得的情报，說明北朝鮮当时正在不断地建立武装部队，并不断地派遣游击队到南朝鮮。

沿着两軍对峙的三八綫上，也不断发生事件。

在整个春季期間，中央情报局不断报告說，北朝鮮随时都可能把零零星星的襲击变为全面的进攻。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北朝鮮在任何时候都有发动这种全面进攻的能力，但是，究竟是不是一定会发动这种进攻，大致会在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却没有可資推断的情报。但这也不仅是朝鮮是这样。就是这些报告还一再地告訴我，在全世界其他許許多多的地区，俄国人都“具有”进攻的“能力”。

1950年6月24日，我同我的一家人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度周末，并打算料理一些家务。

晚上十点多钟，当我们围坐在北特拉华街我們家的图书室里

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这是国务卿从马里兰州他家里来的电话。

“总统先生，”迪安·艾奇逊说，“我有极其重大的消息要告诉您，北朝鲜人已经进攻南朝鲜。”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必须赶回国去，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艾奇逊。但是，他解释说，详细情况暂时还不清楚，他认为我用不着赶回去，等他再打电话来提供更多的情报以后再说。同时，他向我建议，我们应当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召集会议，宣布大韩民国受到了侵略。我对他说我同意这个意见，并要他立即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他说他将在第二天上午再和我通话，报告情况，如果获得更多的有关朝鲜事件的情报，也可能提前来电话。

艾奇逊的第二次电话是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半左右打来的。他报告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经召开紧急会议。他从朝鲜收到了更多的情报，该地区无疑已经发生了全面进攻。艾奇逊说，安全理事会可能会发出停火的命令，但是鉴于北朝鲜人和他们的大盟友过去完全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的态度，我们不能不设想联合国的命令会遭到忽视。因此必须立即作出其他决定，如我国政府愿意对大韩民国给予多大的援助或鼓励。

我要艾奇逊会同陆海空三军部长和参谋长立即开始进行研究，以便在我回来以后提出建议。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在视察远东之后，正在返国途中。我通知国务卿说，我马上就回华盛顿。

总统的《独立号》专机上的机务人员的工作是很出色的。他们在接到通知后不到一小时就做好了起飞前的准备工作。由于我走得这样匆促，以致有两个随从人员竟没有赶上，因为他们没能及时获得通知赶到机场。

飞机在下午两点从堪萨斯市机场起飞，三小时多一点就到

达了华盛顿。我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进行思索。在我们这个年代，强者向弱者进攻，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想起了早些时的事件：满洲事件、埃塞俄比亚事件和奥地利事件。我记得每当民主政治没有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怎样助长侵略者的气焰。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十年、十五年和二十年前的所作所为一样。我深切地感觉到，如果听任南朝鲜沦丧，那末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如果容忍共产党人以武力侵入大韩民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末，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来抵抗来自较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如果对这种侵略行动不加以制止，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我还清楚地认识到，除非这次对朝鲜的无理攻击得到制止，联合国的基础和原则将受到威胁。

我吩咐飞机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发给迪安·艾奇逊一封电报，叫他和他的亲信顾问们以及国防部门的高级首长到布莱尔大厦来参加晚餐会。

当《独立号》飞机着陆的时候，在机场迎候的有国务卿艾奇逊和刚刚回国的国防部长约翰逊。我们匆匆地赶到布莱尔大厦，会见了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员，他们是：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和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陆军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福莱斯特尔·薛尔曼海军上将。随同迪安·艾奇逊来的还有副国务卿韦伯、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约翰·希克森，以及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

时间已经不早，我们立即入席就餐。我请大家在晚餐准备好和布莱尔大厦的服务人员退出以前，不要进行讨论。我首先请迪安·艾奇逊详细地报告了当时的情况。他宣读了国务院在昨天晚

上九点二十六分收到的我們駐朝鮮漢城的大使發來的第一個報告：

“根據朝鮮軍隊的報告(此項報告已部分地為朝鮮軍事顧問團的戰地顧問的報告所證實)，北朝鮮的部隊今天清晨已向大韓民國領域的好幾個據點進犯。開始行動的時候大約在上午四點。瓮津遭受北朝鮮炮火的轟擊。六點左右，北朝鮮的步兵開始在瓮津、開城和春川等地區越過三八綫；據稱水陸兩用部隊已在東海岸江陵的南部登陸。開城據說已在上午九點陷落，北朝鮮大約有十輛坦克參加這次戰鬥。北朝鮮部隊以坦克為前鋒，據稱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區的战斗詳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鮮部隊已將公路切斷。我今天上午正在同朝鮮軍事顧問團的顧問們和朝鮮的官員們進行會商，研究當前的局勢。

“從進攻的性質和發動這次進攻的方式看來，這似乎是對大韓民國的一場全面攻擊。

“穆喬”

除此以外，穆喬大使還拍來了一些電報，告訴我們更多的情況，但無一不證實一次傾其全力的進攻已經開始，而北朝鮮人還在廣播中發表了一個文告，這個文告實際上是一份宣戰書。

先是艾奇遜在星期天晚間報告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九對零的票數，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北朝鮮的行動破壞了和平，並命令北朝鮮人停止行動，撤退他們的部隊。

我於是要艾奇遜提出已由國務院和國防部準備好的建議。他提出了要求立即採取行動的下列各項建議：

(一) 麥克阿瑟應將美國人——包括美國軍事顧問團人員的眷屬——撤離朝鮮，為此，應當守住金浦和其他航空港，擊退對這些地方的一切進攻。在履行這項任務時，麥克阿瑟的空軍部隊應當留在三八綫以南。

(二) 应当命令麦克阿瑟以空投和其他办法把軍火和給养供給朝鮮軍隊。

(三) 应当命令第七舰队进入福摩薩海峡，以防止战争扩大到該地区。应当命令第七舰队立即从甲米地^①北上。我們应当发表一項声明：第七舰队将阻止对福摩薩的任何进攻，而福摩薩也不得进攻大陆。

說到这一点，我插进一句說，应当立即命令第七舰队北上，但是在該舰队到达指定地区以前，我希望暫不发表声明。

这个报告作完以后，我便依次向每个人征求意见，是否同意，是否还有什么补充意見。在这次討論中，有两点是搞清楚了的。一是到会的每一个人几乎一致地默认，凡是为了应付这次侵略行动所必須做的，就必須做。任何人都沒有提出說是联合国或美国可以置之不理。这是过去五年来关于集体安全的一切談判的一次考驗。其次是在怎样进行援助方面存在着分歧意見。范登堡和薛尔曼认为給予空軍和海軍方面的援助就够了。柯林斯則說，如果朝鮮的軍隊当真被击潰，那就必須使用地面部队。但是誰也不知道星期天晚上朝鮮軍隊的确实情况。不过无論如何，大家都認識到情况是极为严重的。

于是我指示有关部門发出命令，立即执行那三項建議。

在繼續进行討論的时候，我說，北朝鮮人是否会重視联合国的命令，在这点上我不抱什么希望。这也就是說，联合国如果想使自己的命令得到貫徹，那还得使用武力。

布莱德雷將軍說，我們总要在什么地方划一条分界綫。他认为俄国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但在朝鮮，他們显然是在向我們进行試探，而現在就應該把这条綫划好。

^① 位于菲律宾群島，美国的一个海軍基地設此。——譯者

我說，我極其堅決地認為，應該把這條綫劃好。

柯林斯將軍報告說，他曾經和麥克阿瑟將軍通過打字電報機作過一次會談。他告訴我們，這位遠東司令官已經準備好，一旦得到放行的綠訊號，就把軍火和給養運往朝鮮。

我說，我認為俄國人估計我們不敢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會抵抗，企圖違反協議把朝鮮搞到手。我認為我們依然是占上風的，儘管占上風占到什麼程度，還很難說。

我問三軍參謀長，柯林斯，范登堡和薛爾曼，關於俄國在遠東的武裝力量，他們有些什麼情報。然後我問薛爾曼海軍上將，第七艦隊現在什麼地方。他說艦隊開出日本兩天，現在靠近菲律賓群島。我接着問他，把這一支艦隊調到福摩薩海峽需要多少時間，他回答說需要一天半到兩天。

我問柯林斯將軍我們在日本駐扎了多少師，把兩三個師調到朝鮮需要多少時間。他提供了這方面的情報。

然後我問空軍部長芬勒特和范登堡將軍，我們目前的空軍是怎樣部署的，增援我國在遠東的空軍部隊，需要多少時間。

我指示三軍參謀長作好必要的準備，以便聯合國一旦號召向北朝鮮採取行動的時候，立即發出命令，使用美國的部隊。同時，我還指示麥克阿瑟將軍派遣一個調查組到朝鮮去，看哪一種援助最有效，和應當怎樣使用這位遠東司令官所能使用的武裝部隊。麥克阿瑟將軍還應當以他所能提供的軍火和裝備供應大韓民國。我並且授權他使用空軍和海軍的掩護，以便確保這些供應品的運輸，同時保護從朝鮮撤出的美軍眷屬。第七艦隊也交給麥克阿瑟指揮，它的基地設在日本的佐世保。

散會以後，艾奇遜交給我一封電報，這是剛從朝鮮回到東京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拍給他的。杜勒斯曾經為國務院就準備對日和約工作過一段時期，看來他對我們所必須採取的行動，也沒有

什么犹豫。他的电报如下：

“很可能，南朝鮮人自己能够抵擋和打退这次进攻，如果这样，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但是，如果看样子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末我们认为应当使用美国的部队，即使这样做会招致俄国人进行反击的危险。坐視朝鮮在无緣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躪，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我們建議安全理事会代表联合国組織，根据第一〇六条号召五大国或五大国中願意响应的国家采取行动。”

到星期一，从朝鮮来的报告显得情况不妙，令人沮丧，其中有一个是李承晚用国务院电报体发来求援的：

“从6月25日清晨起，北朝鮮的共产党軍隊便开始向南部进行武装侵略。閣下和美国国会当已知道，我国人民預見到会有像今天这样的事件，为了成为东方的民主堡垒，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曾經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我們再一次感謝您在使我們获得解放和建立我們的民国时所給予的必不可少的援助。在我們面临这一民族危机并进行英勇战斗的时候，我們謹向您发出呼吁，請求您更多地給予我們支持，同时給予我們有效和及时的援助，以便制止这种破坏世界和平的行动。”

把李承晚总统的这封請求信交給我的那位朝鮮大使，显得很忧郁，几乎要掉出眼泪来。我力图安慰并鼓舞他，我对他說，这场战斗还只进行了四十八小时，而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在情况恶劣得多的条件下，为了捍卫他們的自由，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我要他坚持下去——援助的东西很快就会到达。

但是，大韓民国的軍隊完全抵擋不了北朝鮮的坦克和重武器。李承晚政府的首都汉城看来就要完蛋，共产党的坦克部队据說已兵临城下。李承晚把他的政府迁到了汉城以南約一百五十英里的大丘。

星期一那天，朝鮮的局勢急轉直下。当晚我在布莱尔大厦召集了另一次會議。参加这次會議的也就是前次會議的原班人馬，只有海軍部長馬修斯沒有到，而助理國務卿馬休斯則代替了腊斯克。麥克阿瑟最近的一个电报是十分令人吃惊的：

“南朝鮮第三和第五師零零星星地投入漢城附近戰鬥的結果，並未能阻止敵人的入侵，這種入侵被認為是過去兩天中敵人行動的主要努力，其目的在於奪取首都漢城。敵人的坦克正進入漢城近郊。政府已南遷大丘，並已開始與朝鮮軍事顧問團的部分機構建立通訊聯繫。大使和朝鮮軍事顧問團的主要負責人還留在漢城。在當前這種迅速惡化的局勢下，遠東司令部派出的前往朝鮮的軍事調查組已下令召回。

“南朝鮮的部隊抵擋不了北朝鮮的猛攻。敵人的有利因素完全在於擁有坦克和戰鬥機。作為戰鬥情況的指標來看，南朝鮮的傷亡人數表明缺乏足夠的抵抗力，也缺乏戰鬥意志，據我們估計，很快就將全部崩潰。”

現在是一點疑問都沒有了！大韓民國立即需要援助，如果要使它不遭受蹂躪。更加嚴重的是，如果共產黨在朝鮮獲得成功，那就會置日本於容易受到紅軍和飛機攻擊的距離之內，而沖繩島和福摩薩就會腹背受敵。

我對我的顧問們說，目前朝鮮局勢的發展，在我看來，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規模的重演。共產黨人總是找我們軍事上的弱點進攻，我們必須對付他們的攻擊，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戰。

我指示國防部長同麥克阿瑟將軍通一次變換頻率無線電話，把我的各項指示親自傳達給他。我命令他使用在他指揮下的空軍和海軍部隊去支援大韓民國，但只限於三八綫以南地區。我還命令他把第七艦隊開到福摩薩海峽去。這一措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共產黨人向福摩薩進攻，同時防止蔣介石向大陸侵擾，後者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共产党人采取报复行动，而扩大冲突地区。

我还批准了关于加强我们在菲律宾的武力和增加对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援助的建议。同时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于6月27日通过了关于号召联合国各成员国援助南朝鲜的决议。

就在这天(星期二)上午，我召集了国会的领袖们开会，以便向他们说明最近几天来的局势和我们所作出的决定。除了“四巨头”(巴克莱、麦克法兰、雷朋和麦考马克)以外，与会的还有康纳利、维利、亚历山大·史密斯、乔治·泰丁斯、布里奇斯和犹他州的托马斯等参议员，基、伊顿、文森和肖特等众议员。艾奇逊、约翰逊、佩斯、马休斯、芬勒特、三军参谋长以及他们的一些助手也在座。

我请国务卿把局势概括地叙述了一下。然后我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行动、而且极其迅速地采取了行动的是联合国。我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原是早就准备好打算在这天会后向报界发表的。我征求诸位国会领袖对这个声明的意见。

参议员维利问，截至目前为止，麦克阿瑟将军派遣了什么样的部队。约翰逊部长确切地告诉他，麦克阿瑟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派出了他的空军和海军部队。

参议员泰丁斯说，他所领导的兵役委员会已经在那天上午决定延长征兵法的期限，并授与总统召集国民军的权力。

参议员史密斯认为，我们在朝鲜应当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来行动。我说这个意见很正确，但指出，我们对福摩萨所采取的行动，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不代表联合国。

约翰·麦考马克想从薛尔曼海军上将那里知道海军是不是不需要扩充。约翰逊部长回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业已开始就扩充所需要的三军部队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原来的平衡计划还是要保持。

众議員基、参議員康納利和国务卿就联合国決議案的措詞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杜威·肖特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在這個問題上支持联合国。

国会領袖們都同意我所采取的行動。就在這一天，共和党的領袖托馬斯·杜威也保證完全支持我的行動。

下面是我同国会領袖們会晤后向报界发表的聲明：

“總統的聲明”

“在朝鮮，為了防止邊境襲擊及維持國內治安而武裝起來的政府部隊，遭到北朝鮮進犯軍的攻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要求進犯軍停止敵對行為，並撤退至三八綫。他們沒有這樣做，相反地反而加緊進攻。安理會要求聯合國的所有會員國給予聯合國一切協助以執行此決議。在這種情況下，我已命令美國的空海部隊給予朝鮮政府部隊以掩護及支持。

“對朝鮮的攻擊已無可懷疑地說明，共產主義已不局限于使用顛覆手段來征服獨立國家，現在要使用武裝的侵犯與戰爭。它違抗了聯合國安理會為了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發出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部隊的占領福摩薩，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與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

“據此，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福摩薩的任何攻擊。作為這一行動的應有結果，我還要求福摩薩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行動。第七艦隊將監督此事的實行。福摩薩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本的和平解決、或聯合國的審議。

“我並已指示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的部隊，及加速對菲政府的軍事援助。

“我同樣也已指示加速以軍事援助供給在印度支那的法國及

其联邦成员国家的部队，并派遣军事使团，以便与这些部队建立密切工作关系。

“我知道联合国的一切会员国将仔细考虑最近在朝鲜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行为的后果。在国际事务中恢复强力统治将有广泛影响。美国将继续支持法律统治。

“我已训令美国驻安理会代表奥斯汀大使向安理会报告这些步骤。

“1950年6月27日”

我们的盟国和海外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外交人员都知道，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末，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决地和胜利地回击对南朝鲜的威胁，那么就会继我们在伊朗、柏林和希腊反对共产党人的侵略行动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以后，第四次获得胜利。我们提醒我们的盟国，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会使苏联人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不能不更加小心一些，而自由世界的和平就愈有保障，和平的前景就更加光明。

关于最高政策的讨论在6月28日星期三那天继续举行，这一天我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了朝鲜方面报来的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况。我对各有关部门说，我希望重新彻底研究一下我们对邻近苏联地区所采取的各种政策。约翰逊部长和艾奇逊国务

卿報告說，由於朝鮮局勢所引起的某些緊急問題，業已開始研究。

這個時候，副總統巴克萊也趕來參加了會議，他原來因國會方面事務不能脫身，可是這也有好處，使他能夠帶給我們一個消息，參議院已經一致通過了關於延長征兵法有效期限的決議。

國務卿艾奇遜指出，對我的政策的一致支持，可能不會持久。我們在朝鮮所已經做的事情，其影響是極其巨大的，但是隨之而來的責任也是同樣巨大的，因為在過去三天中所做的事情，很可能最後把我們卷入一場全面的戰爭中去。

我回答說，這件事所包含的危險很明顯，但是，我們可不能放棄朝鮮，除非其他地方的軍事情況要求我們這樣做。

剛從歐洲回國的阿弗里爾·哈里曼說，歐洲人士都耽心得很，就怕我們對付不了朝鮮的這次挑戰。他說，在我作出的決定宣布以後，人們普遍感覺鬆了一口氣，因為大家認為，如果不是這樣，那就一定會引起一場災難。他還說，歐洲人都充分認識到我的決定的深刻意義。

副總統提到，他曾經聽到一個參議員表示懷疑其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是否願意幫着干。我說，我們剛才還獲得了英國所提供的具體幫助，它將以海軍支援我們。我請約翰遜部長向副總統提供比較詳細的情況，以使他能把這方面的消息告訴參議院諸議員。

空軍部長托馬斯·芬勒特提出了關於在華盛頓和東京的遠東司令部之間取得相互諒解的問題。他認為通過個人的接觸，將有助於避免錯誤，他並且建議派范登堡將軍到麥克阿瑟將軍那里去，以便更加具體地告訴他華盛頓方面的想法。

但是我認為在當前這個時候，非常迫切地需要把三軍參謀長留在華盛頓。而另一方面，我也懂得在華盛頓和東京之間，必須取得相互諒解。我還表示我認為遺憾的是，我屢次召請麥克阿瑟將軍回國，沒有一次不遭到他的拒絕，而且連短時間回國一趟都不

行。他一直沒有机会来晋見我这个总司令。我认为如果朝鮮的冲突延长下去，我希望能見一見麦克阿瑟將軍。

陸軍部長佩斯報告說，他已經向各軍事情報部門發出命令，要它們嚴密注意蘇聯參加朝鮮戰鬥的任何跡象，他並且想知道，除朝鮮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地方應當進行特殊的情報工作。我回答說，除朝鮮以外，我們的戰略情報機構還應注意到其他地區，我認為蘇聯在南斯拉夫一帶，尤其是在保加利亞一帶，以及在北歐一帶所進行的活動，應該特別加以警惕。

陸軍部長還報告說，他已經作出安排，準備向國會作一系列有關軍事情況的報告。在這一點上，我對副總統說，我希望這些報告一定要是兩党性質的報告，我並且希望由他去確定聽報告的人。

國家安全委員會於星期四再度舉行會議，國防部長約翰遜提出了一項發給麥克阿瑟將軍的指示的建議。但是，在他建議的這個指示的最後一段里，卻含有我們正在計劃同蘇聯作戰的意思。因此我十分明確地說，我不希望含有任何這樣計劃的意思。我所希望的是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迫使北朝鮮人退回到三八綫以北去。但是我希望我們能保證不致於過深地陷在朝鮮，以至我們照顧不了其他地方可能發生的類似情況。

佩斯部長認為，對於授權在三八綫以北進行軍事行動的問題上，我們應當特別慎重，而且我們應當對這種行動明確地加以限制。我同意這一點，並指出凡是在三八綫以北所進行的軍事行動，應當僅限於破壞軍需上的供應，因為我希望大家都明確地了解，我們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是為了恢復那里的和平，恢復原來的疆界。國務卿艾奇遜說，空軍在執行任務時不應當受到那樣的限制，不應把三八綫作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綫來嚴格遵守。但是他希望能保證做到一點，那就是採取預防措施，使空軍部隊不要飛越朝鮮的邊界。他建議在發給麥克阿瑟的指示中，包括應付蘇聯萬一進

行干涉的一些办法，内容大致是他应当如何捍卫自己的据点和我们的部队，并立即向总统报告请示等等。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要艾奇逊和约翰逊共同草拟这个文件。

接着国务卿评述了苏联就我们向它发出的关于协助停止朝鲜战事的呼吁所作的回答。艾奇逊认为，拿北平所发表的一项声明^①来同苏联的回答联系起来看，似乎表示苏联人不至于自己出面干涉，而可能会使中国共产党来进行干涉。艾奇逊建议把我们致苏联的照会和它的复照公开披露，我批准了这项建议。

国务卿还报告了关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所提供的援助。我说我希望援助南朝鲜的部队能够真正成为代表联合国的部队。

在散会前，我要国防部长以我的名义草拟一个发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命令他每天就远东的局势作一次详尽的报告。

这一天的稍晚一些时候，国务卿艾奇逊回到白宫，除其他事项以外，我们讨论了关于中国政府要求在朝鲜方面进行援助的问题。蒋介石曾经指示他的大使转告我们说，他愿意派遣为数达三万三千人的地面部队，但是他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因此必须由美国协助，把福摩萨的地面部队输送到朝鲜，并供应它们给养。

我对艾奇逊说，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这番好意，因为，正如我今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我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国参加对朝鲜的行动。艾奇逊指出，国民党中国的情况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福摩萨是最可能遭到攻击的地区之一。这就是我们已经把第七舰队派到那里去的原因；一方面花美国的钱去保卫那个岛屿，而另一方

^① 指1950年8月28日周恩来总理就杜鲁门的声明所发表的声明。——译者

面这个岛屿的理所当然的保卫者却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做多少是有些矛盾的。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委员长的军队在进入现代化战斗以前，是否还必须由我们给它重新大大地装备一番。

我请艾奇逊在第二天同国防部长约翰逊和三军参谋长会议时提出这个问题。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倾向于接受中国关于出兵朝鲜的请求。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在早晨五点钟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刚刚同麦克阿瑟用无线电打字电报机作过长时间会商的柯林斯将军谈过话。麦克阿瑟将军在乘飞机视察朝鲜前线归来以后，立即要求举行这样一次会商。麦克阿瑟说，他相信只有靠美国的地面部队，才能阻止北朝鲜军的前进。他请求准许以一个团的兵力马上投入战斗，同时尽可能迅速地建立两个师。

陆军部长向我请示处理办法。

我要佩斯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将军，我同意他使用一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

上午七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位上校官员来向我汇报昨晚从朝鲜收到的情况报告。他汇报完毕以后，我立即通知佩斯和约翰逊，叫他们准备在上午八点半钟开会，讨论关于麦克阿瑟请求授权使用两个师和蒋介石提出的关于派兵前往朝鲜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我所召集的也就差不多是上次我从独立城赶回后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会议时到会的那些人。我对参加会议的人说，我已经批准使用一个团的兵力，现在我想请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以再增加两个师的兵力。我还请大家商讨一下，关于中国方面提供的援助，是否值得接受，特别是因为蒋介石曾经说，他的三万三千人的部队在五天之内就可以上船出发，而争取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请他们仔细考虑一下其他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比方說，毛泽东会有什么行动？俄国人在巴尔干半島、伊朗和德国会有什么行动？

国务卿艾奇逊說，如果福摩薩的中国軍隊在朝鮮出現，北平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參战，因为他們可以趁此打击蔣介石委員长的軍隊，以削弱蔣介石的力量，以便他們試图进攻福摩薩时蔣介石难以自卫。

三軍參謀长指出，蔣介石委員长所提供的三万三千人，尽管他自己說是他的最精銳的部队，却很少現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同李承晚的軍隊无法对付北朝鮮的坦克一样。

此外，如果把他要求我們提供的运输力量，用之于把我們自己的供应品和增援部队輸送给麦克阿瑟的任务，可能更好一些。

我还是耽心，以我們所能使用的为数很少的部队，是否有抗御敌人的能力。但是在繼續进行討論以后，我接受了別人的看法——事实上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是这种看法，那就是应当婉言謝絕蔣介石所提供的援助。接着我便决定应当授予麦克阿瑟將軍全权来使用在他指揮下的地面部队。

第一批派遣到朝鮮参加战斗的美国地面部队是第二十四步兵师的一部分。我們用海上和空中的运输力量，迅速地把这个老練的战斗部队送往前綫，来延緩共产党軍隊的前进；这个部队的战斗事迹将永远是美国軍事史上光荣的一頁。这些来自第二十四步兵师和大部分沒有战斗經驗的青年士兵，在卓越的战斗指揮官威廉·迪安少将的英明的领导下，完成了軍事史上最漂亮的一次后卫战斗。

我密切注視着前綫的战事情况，办法是由布莱德雷將軍或參謀长联席會議的其他一位官員每天上午向我汇报。我还規定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會議，会上由布莱德雷將軍自己或他的助手报告朝鮮的局势。这个办法是美国軍隊参加地面行动后，于

1950年7月6日举行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會議中开始实行的。当时布萊德雷將軍叙述了第二十四师的困难处境，他报告說，原来也是駐扎在日本的第二十五师已經准备就緒开往朝鮮，但是远东的海运情况很严重，要使这一增援部队到达前綫，恐怕还需要一个星期。

副总统問道：我們是否知道参加战斗的北朝鮮人到底有多少？布萊德雷將軍回答說，根据我們的情报人員的估計，共有九万人。副总统于是再問，我們这方面有多少人投入战斗。布萊德雷告訴他說，当时大約有美軍一万人，大韓民国的正規軍二万五千人。巴克萊还提到正在急速运往朝鮮的一种新式的反坦克火箭炮，其目的是要給予我們軍隊一种能够阻止北朝鮮軍所使用的俄国制重型坦克的武器。

海軍部长馬修斯想知道北朝鮮的部队是否有增加的可能。布萊德雷將軍說，根据远东的情报，除了可能由滿洲增加部队——朝鮮人或中国人——以外，北朝鮮的敌人还有两个师沒有投入战斗。

布萊德雷在回答斯奈德部长提出的一个問題時說，北朝鮮的师編制要比我們的小，大概是一万人。但是佩斯部长补充說，据情报部門的估計，滿洲的共产党軍隊有二十万人。

佩斯繼續說，除此以外，三軍部长都深深感觉到，我們必須重新估計一下我們未来的整个“軍事形勢”。我同意这个意見，并补充說，据我了解，約翰遜部长已經在进行这种重新估計的工作。

說“軍事形勢已經重新作了估計”，这是一种騙人的簡單化的說法。我們許多坐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把战争看做好像只是地图上的玩意。

一个国家能够做些什么或者應該做些什么，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願意和是否能够担起那个重担。在1945—1946年，美国人民决定縮减自己的軍事力量。我当时反对那样急促地和过分地

进行复員工作，我并且曾經公开表示我反对那样做，当时担任陸軍參謀長的艾森豪威尔將軍也反对那样做。但是报刊和国会的呼声却把我們的意見压倒了。

跟着便产生了在国会和人民願意支持的範圍內維持怎样一种軍事力量的問題。当今的軍事領袖几乎全部都是技术专家，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专长的一門在国防中占着最重要的位置，这原是十分自然的。在国防力量的地理分布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每一个地区的司令官都认为使自己地区的利益首先受到重視是自己的責任，而往往不考虑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

我早就了解这样一种想法。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炮兵营“D”中队队长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战争中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炮兵中队，因此我总是向营部的长官力爭，要求給我更多更好的装备，希望更多更好地重視我的給养問題。在我担任參議員的时候，通过我所进行的調查工作，使我看到了各个戰場那种經常爭吵的情况，大家都想更多地获得軍需品。在我担任總統的时候，我总是在批准我认为处理得最恰当的事項以前，力求听取各方面的意見。

当朝鮮問題发生的时候，我也沒有忘記采取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共产党人在朝鮮向我們挑战，但他們也能够有許多地方用类似的方式向我們挑战，而更加严重的是，如果他們决定要那样干的話，他們能够把我們和全世界拖进另一場可怕得多的战争中去。每当我就朝鮮战争問題作出决定的时候，我总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它将給我們的文明世界带来可怕的毁灭。这就是說，我們不应当做出任何可以为苏联人找到借口的事情，以致把自由国家拖进一場全面的大規模战争中去。我不能同意像蔣介石那类人所主张的那种策略和办法，蔣介石在1950年7月3日的一次讲演中，曾經要求联合国譴責俄国人应对朝鮮的冲突負完全責任，并要求莫斯科停止這場冲突。这种粗暴的叫嚷肯

定只会把事情弄僵。如果照他的这种建議做去，苏联人置之不理——他們是极可能不理的——那末联合国不是承认自己的軟弱，就只有让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

我的政策是加强那些自由世界防御力量薄弱的地区。伊朗、希腊、柏林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都是向共产主义作斗争的据点。同样，我們增加对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援助以及把第七舰队調去保卫福摩薩，也是为了增援面临共产党压力的地区。但是每当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时候，都不能不看到其他許多可能发生問題的地方，也不能不看到如果我們在任何一个地方孤注一擲时所遭到的危險。

克莱門特·艾德礼和他的內閣也对全世界的形势持有类似的想法，在艾德礼的建議下，我們同意7月初在华盛顿举行英美会谈。我指派布莱德雷將軍和杰塞普大使为代表，而英国方面則由它的大使奧利佛·弗兰克斯爵士和駐华盛顿的联合軍事代表团团长、英国空軍总司令泰德勋爵为代表。他們在会谈中研究了全世界一切的危险地区，以便决定一旦共产党进一步实行侵略时我們两国所必須共同采取的政策。我們的代表說，我們的政策是要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主要意图。根据与会者的意見，朝鮮事件已經大大增加了全面战争的危險。这也反映了我自己的意見，我曾向布莱德雷和杰塞普以及其他政府領袖表示过这个意見。如果继朝鮮的严重打击之后，又来一次严重打击，那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世界大战。也就是根据这一点，我們才沒有允許采取某些人所建議的进行空中摄影的办法。在7月6日，有一些空軍參謀人員曾經建議派出飞机在大連、旅順、海參崴、樺太島和千島群島进行高空摄影。但是幸而在空軍人員中有人看到了这种做法所牽涉到的政治問題，并向国务院請示。迪安·艾奇逊便来問我。我对他說，我认为任何这类做法都是极其严重的。我要他去

找空軍部長芬勒特，告訴他，我希望他向遠東的空軍司令官們說清楚，進行某些可能給蘇聯以口實來同我們公開衝突的活動，都是違反我們的政策的。進行這種活動的結果，將會是我們的一些進行空中攝影的飛機被俄國人打下來。而這當然會製造出新的、更加嚴重的局勢。

遠東的空軍司令官們想進行這種空中攝影工作原是很自然的，因為這樣所得到的情報對他們所處的環境會有幫助。但是我們要从全面考慮問題，而整體利益高於局部利益，因此我們決定不採納這類的建議。

為我準備研究材料的那些機構也有這種看法，我的決定就是根據這些研究材料作出來的。

麥克阿瑟將軍當然在專心應付朝鮮的局勢。他差不多在一接到援助南朝鮮反抗侵略者的命令，就制訂了一個戰略計劃，並立即開始調派所需要的軍隊來執行自己的計劃。

他的關於增派軍隊的請求應該受到優先的考慮。除了已經在準備開往朝鮮的第一陸戰師以外，我還批准命令第二步兵師立即準備出發，同時指示國防部長約翰遜命令兵役署調配武裝部隊的人力，來充實一些基本單位和艦隊。然後我命令柯林斯將軍和范登堡將軍飛往東京同麥克阿瑟將軍會商。

幾天以前，我還批准了由國務院和國防部聯合草擬的一項建議，建議在聯合國通過一個決議案：在朝鮮成立一個統一的司令部，並由我們推薦一個總司令，同時授權在朝鮮使用聯合國的藍旗幟。7月7日安全理事會通過了這項決議案，第二天，我提請任命麥克阿瑟將軍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職務。

7月12日，華爾頓·沃克中將到達朝鮮，建立了他的第八軍司令部，並接替指揮在朝鮮的聯合國部隊。這個時候，我們的部隊仍舊擔任後衛戰鬥，向釜山灘頭城市節節撤退。

美国报刊就这次退却作了加油加醋的报道。有的消息說某些部队已整个被歼灭，把潰敗和混乱的情况加以夸大。事实的真像是，一帮为数不多的勇敢的年輕小伙子，在几位优秀的將軍的指揮下，終于挽轉狂瀾，使得抵抗力很薄弱的后方，能够集結力量，准备回击。事实上，在国内的人要比在朝鮮的士兵更加惊恐。

但是，这个时候麦克阿瑟將軍已經制訂了进行反攻的基本計劃。7月7日，麦克阿瑟將軍告訴參謀长联席會議，他的基本作战計劃是阻止敵軍前进；尽量利用对海空方面的控制；采用水陆并进的办法，打击敌人密集的地面部队的后方。

这些重大的計劃就是柯林斯將軍和范登堡將軍同麦克阿瑟將軍会晤时所討論的題目。他們还討論了如何在国家政策的全部需要的范围内来滿足远东司令部的需要問題，以及使用在朝鮮的同盟軍問題。

麦克阿瑟將軍同意同盟軍划归他来指揮使用，尽管他認識到把許多不同国籍的軍隊編在一起会給自己的工作帶來更多的困难。但是，他的确曾經建議不要接受蔣介石所提供的三万三千名中国国民党軍隊。他的意見是，这些部队在朝鮮将起不了作用，因为都是步兵，沒有大炮或其他輔助武器，而且还不知道素质怎样。他說，这些部队还必須由我們的兵站給予大量的給养，事实上在好几个月内会象沉鎖一样拴在我們的脖子上。此外，他认为把这些部队从福摩薩調到朝鮮，将使那个島屿空虛，可能引起敌人的进攻。他建議由他亲自去福摩薩一趟，向蔣介石說明这种情况。

至于反攻計劃，柯林斯將軍似乎感到十分耽心。根据麦克阿瑟的計劃，是打算使两师人在汉城附近的仁川登陸，另外空投战斗部队一个团到該地区。同时，在釜山滩头的部队則向北进攻。这是一个大胆的計劃，需要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来执行。

但是，要实现这个計劃，就必须大力进行武装部队的重建工

作，这位远东司令官每次和我們联系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要求增加军队的数量。參謀长联席會議对这些意見都予以仔細的审查，然后向国防部长提出建議。关于军队的調动，当然用不着每一次都要請示我，但是，由法律規定应当由我負責的一些基本决定，往往是必須由我批准的。因此，7月31日，我批准了关于征調国民軍四个师参加联邦军队的战斗任务的建議。

早在7月19日，我就曾經請求国会取消对武装部队数量的限制，并吁請制訂立法，規定对某些物資的优先权和分配权，以便防止囤积，并保证征发必需的供应品。我并且說，还必須增加賦稅，限制消费信貸；国防費用也必須增加一百亿美元。

关于这些事項的咨文，我預先寄了一个副本給麦克阿瑟將軍，告訴他我們在國內所采取的方針。对于这一点他曾經以一封极其客气的电报向我道謝。

第二十三章

在威克島与麦克阿瑟的会見

7月31日，麦克阿瑟將軍飞往福摩薩，当柯林斯將軍和范登堡將軍訪問东京时，他曾和他們討論过关于該地区的問題。

我們对福摩薩的政策曾經是7月2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會議的論題之一。參謀长联席會議的成員們曾向委员会提出建議，給予中国国民党人以全面的援助，使他們能抵抗共产党方面对該島的可能攻击。局势的其他很多方面也曾加以討論。我批准了三項具体的建議：給予国民党中国以广泛的軍事援助；由麦克阿瑟总部对蔣介石軍隊的需要作軍事方面的調查；計劃在中国海岸作偵察飞行，以确定对福摩薩的攻击的紧迫性。

这些决定由參謀长联席會議在8月3日通知了麦克阿瑟將軍，同一天也通知他說，我即派阿弗里尔·哈里曼到东京去和他討論远东的政治局勢。关于哈里曼和麦克阿瑟的会見和談話情况，他向我作了如下的报告：

（为了軍事安全和簡要起見，我刪去了哈里曼的备忘录的某些部分。）

“我們在1950年8月6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到达羽田机場，麦克阿瑟將軍在那里欢迎我們。他和我一同乘車去大使館的迎宾馆。因为在車子里他的副官和司机与我們之間的玻璃是敞开的，我們的談話是一般性的。”

“他叙述了自从我上次訪問日本以后日本政治方面的令人滿意的发展情况。他談到日本人民的优良品质；談到日本人在工作

中表現的令人滿意的情况；他还談到他对工作的热爱和对工作神圣的尊重。相形之下，他对美国国内只图更高的享受和更少的工作的风气表示不滿。

“他认为共产党渗入日本生活决不至于构成一种威胁，因为共产党的观念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共鳴，而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的观念还贴着有俄罗斯的标签。日本人既害怕而又憎恨俄国人。

“我們在朝鮮的行动在日本人中間所引起的反应我們是可以安心的，因为他們把这种行动解释为我們会在俄国侵略的时候强有力地捍卫他們。他們并不为我們暫时的困难而感到恐慌，因为他們知道軍事上的困难是由于突然的襲击所造成的。他們的自豪感是由于‘他’对他們的信任而激发起来的，这种信任表現在美国撤出了大部分的駐軍。他可以撤出所有的美国部队而在日本不至于有任何騷动的危險。……

“他为我和我的隨員安排了参加早晨十点半在总部举行的簡短訓話，并且約定我在十一点半到他的办公室里和他会見。

“那天上午我和麦克阿瑟有过为时两小时半的会談。我們全体人員与麦克阿瑟及其夫人共进了午餐，然后在下午五点半至七点半又进行了两小时的会談。

“在星期二上午，在我自朝鮮回来和我离开日本之前，我們又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談。

“前两个半小时討論軍事方面的問題，参加的有李奇微將軍和諾斯塔德將軍。阿耳蒙德將軍也在座。

“我不打算按会談的日程来詳細敘述，只扼要地照会談的內容来談。

“我們在星期天上午的第一次会談包括了他对軍事局勢的看法。

“我对他說明總統要我轉告他，總統希望知道麦克阿瑟需要什

么，并且准备全力给予支持。我问麦克阿瑟他对朝鲜的决定是否明智有无怀疑。他回答说，‘绝无怀疑。总统的声明是非常伟大的。这是一个可以把世界从共产党统治下拯救出来的历史性的决定，而且也会这样地载入史册的。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是非常必要的，胜利一定会很快地到来。’

“麦克阿瑟申述了他对北朝鲜的武装应尽早予以摧毁，而不应容其慢慢建立的坚强信念。他强调了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危险性，和可能来自联合国——包括美国在内——的阻挠，以及对东方人民和对中国共产党人与俄国人的影响。他害怕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可能大大地加强北朝鲜的部队，时间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前途即使不是灾难，也会是严重的困难。……

“他并不相信俄国目前有意于直接干涉，或卷入一场大战。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俄国人组织并装备了北朝鲜人，并且曾在红军中作过战的苏联籍朝鲜人中抽调出一些受过训练的人员来支援北朝鲜。中国共产党也配合行动，把一些在满洲作过战的士兵调了过去。这些士兵不是按照原来的编制过来的，而是在满洲解役，运到北朝鲜后，重新编进北朝鲜部队里去的。他们的领导是坚强的。一批俄国军官充当观察员，但毫无疑问，是他们在指挥。他们的战术是灵活的；在军事经验方面，他们和任何军队一样是有能力而且顽强的。

“他叙述了东方人和西方人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我们厌恶死；我们仅仅是出于责任心和道义感才去冒险；而对于东方人，死是生的开始。他们静静地死去，‘两臂交抱着，就像鸽子收敛起双翼一样，无牵无挂地死去。’

“麦克阿瑟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上次大战许多服役人员中征调有经验的军士，而他对于有经验的军士是这么迫切的需要。他认为我们可以用快速的舰只和飞机来迅速地运送迫切需

要的部队。一想到我們竟办不到这一点，他說，‘就使我感到恶心。’（这些事情都是他在星期二上午說的。）

“麦克阿瑟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地面部队，数目可多达三、四万人。目前他认为只要能迅速地派出仅仅携带輕武器的几个营（一千人）前来支援，他也就滿意了。重炮当然是受欢迎的，但是需要是这么迫切，因此他认为只要有輕武器也就可以了。他认为英国应该从香港或馬來亞調来一个旅，另外可以从联合王国調派部队来接替这个旅。法国可以从印度支那抽調些部队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是能派一个旅来，那是最好不过了。加拿大也应该派些部队来。他虽然認識到东方国家部队的价值，可是他不能肯定菲律宾目前是否能够派出任何武装部队。

“他认为一旦获得胜利，政治后果是不容置疑的。在东方，胜利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朝鮮人是渴望自由的。当李承晚政府重新在汉城建立起来的时候，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就可以在两个月內举行，而他毫不怀疑非共产党的政党会取得絕对的胜利。在确信沒有俄国或共产党的干涉的时候，北朝鮮人也会投非共产党政府的票。他认为目前沒有必要修改宪法，宪法規定北朝鮮占一百个席位。朝鮮能够成为稳定东方非共产主义运动强有力的影响。

“麦克阿瑟对穆乔大使給以很高的評价。他說他們全面地、有效地在一起工作。

“在我和麦克阿瑟的第一次談話中，我对他說，总统希望我告訴他，他絕不应允許蔣介石成为发动对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战争的导火綫，这样做的結果可能使我們卷入一次世界大战。他回答說，作为一个軍人，他将遵守总统的任何命令。他說在他到福摩薩旅行期間，他和委員长商討的只限于軍事方面的事务。每当委員长企图討論任何政治問題的时候他就加以拒絕。委員长曾經提議把中国国民党軍队交給他指揮。麦克阿瑟回答說这样做是不妥当

的，但他願意提供軍事方面的建議，如果委員長要求他这样作的話。……

“由于一些相当难以解释的原因，对于我們所认为应如何对待福摩薩問題以及我們和委員長之間的关系問題，我不认为我們获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他接受了总统的看法，并将遵照执行，但是信心不足。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他认为任何人只要願意和共产主义作战，我們都应该給予支持，虽然他提不出理由，为什么由委員長来打共产党，就对付得了中国的共产党。我向他指出，在福摩薩的将来，也就是在防止福摩薩落入敌人的手中的問題上，美国和委員長立場之間存在着基本的利益冲突。也許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联合国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而蔣介石相反的，雄心勃勃，只希望把福摩薩当作重新进入大陆的跳板。麦克阿瑟明知道这种野心无法实现，然而他认为不如让他登陆，就这样摆脱他，未始不是一个好主意。他好像沒有想到我們支持蔣介石这一行动的負担势将压在我們在东方的負担上。我非常詳細地解释了为什么說蔣介石是一个負担；在对待中国共产党和福摩薩政策上，联合国的团结很有分裂的危險；英国、尼赫魯和一些像挪威那样的国家的态度，他們对抵抗俄国的侵略虽然具有坚定的决心，但却不願在其他方面寻衅生事。我指出了在友好国家之間維護联合国的团结的巨大重要性，以及在中国和福摩薩問題上任何的錯誤步骤都可能导致情况的复杂化。

“麦克阿瑟主张永远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甚至使用否决权不让共产党加入。他认为让中国共产党加入只会增加毛泽东政府在中国的威信，而破坏了他所认为的我們的目的；促使毛泽东目前的支持者的分化和增强抵抗运动的发展。他不相信中国人願意受俄国的統治。他們有反抗来自北方的侵略的历史传统。至于在中国内部制造更强烈的分裂，我們應該采取比过去更积极的行动。……

“我強調獲得中國共產黨支援北朝鮮的進攻和參加目前作戰行動的證據的重要性。下次聯合國大會上，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席位問題將會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我解釋如果我們能得到中國共產黨直接支持北朝鮮的真憑實據，那我們就有理由根據所牽涉到的道義問題，阻止共產黨取得席位。

“總而言之，我不敢說他完全認識到：在委員長駐節福摩薩的情況下，我們要在中國境內採取任何行動，這不論是在全世界還是在東方，我們的處境是多麼困難。他認為我們的一些政策對委員長不利。他有信心他能够使委員長去作要求他作的任何事情；他隨時準備着應付政治方面的問題，但是，除非總統進一步給他命令，他將忠心耿耿地只應付軍事方面的問題。……

“他對於中國共產黨目前不企圖進犯福摩薩感到滿意。他所掌握的情報和照片表明他們沒有集結過多的部隊，雖然他們在建造飛機跑道。他相信第七艦隊加上駐在菲律賓和沖繩的噴氣式飛機和在他指揮下的 B-29 型飛機和其他類型的飛機能够摧毀任何可能進犯的企圖。他相信中國國民黨軍隊可以經過組織而有效地作戰，並且足以摧毀任何渡海過來的共產黨軍隊。如果中國共產黨試圖這樣蠻幹的話，那在遠東歷史上將會有一次浴血的勝利，並將鼓舞東方的士氣。……

“他談到了靠近大陸的金門島時，委員長聲稱要有七萬士兵駐在那里，萬一要在大陸登陸的話，這是重要的，但是這對於美國並無價值。委員長認為福摩薩是中國的一部分。截至目前為止，甚至在和他談過話的福摩薩人當中，麥克阿瑟也沒有看到要求獨立的跡象，也許在現階段這是很自然的。在那兒街上看不到士兵，晚間也不戒嚴；沒有證據足以證實來自國務院的悲觀的報告。……

“麥克阿瑟認為我們把蔣介石踢來踢去並沒有改善我們的處境，並且希望總統想些辦法來緩和國務院和委員長之間存在的緊

张局势。他建議總統可以重申他以前威胁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如果中国人繼續修建机场或建立他們的据点，他将撤銷攻击大陆飞机场的禁令。我告訴他說如果他希望向總統作这样的建議，那是他的事，但是我向他保证我会坚决地建議總統反对他这样作。我強調保持联合国团结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这样作只会造成更多的困难，給俄国人一个钻空子的机会。

“麦克阿瑟极力贊成在欧洲发展强大的部队，他还认为我們應該更强有力地加强武装部队，以抵抗东方的共产主义。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不会把自己的部队向南移动，但将訓練印度支那人，緬甸人，装备他們，并且用滲入和支持装备良好的当地共产党部队的办法来制造分裂，以便希望最后获得这些地区。他认为尼赫魯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存有戒心的，但是他认为容忍是个有效的办法，因而采取了錯誤的行动。‘我們應該在每个地方打击共产党——狠狠地打击他們！’他认为杜魯門主义是‘伟大’的。應該更强有力地加以推行。就像我們在欧洲推行馬歇尔計劃那样的做法，我們應該在东方也組織經濟援助。这并不需要大量的金錢。这种援助要好好地加以管理。我們應該設法使人民得到援助，防止貪污中飽。

“当他到机场为我送行的时候，他大声地，使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地說，‘你这次訪問的唯一缺点是逗留的时间太短了。’”

哈里曼的私人报告中附来一份李奇微將軍草拟的軍事討論备忘录。这就是麦克阿瑟將軍在二个半小时的談話当中所提出的要求增派美国和联合国地面战斗部队的摘要。

我派遣哈里曼訪問麦克阿瑟，使这位將軍能够了解华盛顿的政治計劃的第一手情报。在这之前已經有好几位高級軍事將領訪問过东京，并曾与麦克阿瑟討論过远东局势的战略問題，但是在我所有的顧問当中，哈里曼对經濟恢复計劃最为了解，他特別有資格把我对于外交政策总的看法传达給麦克阿瑟。

麥克阿瑟將軍在7月31日的訪問福摩薩曾經引起全世界新聞界的各種猜測。蔣介石的侍從武官們放出消息說，遠東司令和他們的領袖對於將要採取的行動的步驟意見完全一致。言外之意是——我們頗有些報紙就是這樣報道的——麥克阿瑟拒絕接受我的使福摩薩中立化的政策，並且傾向於採取更激進的辦法。

在哈里曼向麥克阿瑟解釋了政府的政策以後，他曾經答應他將作為一個良好的軍人來接受它。我再一次放了心。我告訴報界說在福摩薩問題上這位將軍和我的見解一致。

為了更加明確起見，參謀長聯席會議，經我的批准，於8月14日通知麥克阿瑟將軍說，要他保衛福摩薩的指示的意圖是，美國在那裡的行動只限於輔助性的行動，實際上不在該島使用武裝部隊。不能答應國民黨政府的要求，在福摩薩承擔駐紮戰鬥機中隊的義務，也不在福摩薩陸地上駐紮任何種類的美國部隊，除非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批准。

我以為此事到此該可以結束了，而麥克阿瑟將軍也會接受他的總司令所制定的對福摩薩的政策了。但是我錯了。在月終以前——8月26日——白宮的新聞處給我送來一份麥克阿瑟將軍致國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主席的聲明。這項文件在8月28日以前還沒有人看到，但是麥克阿瑟在東京的公共聯絡機構在幾天以前已經把它交給了新聞界，當我在8月26日早晨第一次聽到這件事的時候，一家發表了它的全文的周刊已經在郵寄途中了。

這封長信的內容是：“鑒於福摩薩和我們在太平洋方面戰略潛在意義的關係所流行的錯誤觀點”，這位將軍認為有必要就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他的論點是東方人的心理狀態要求“進取的、果斷的和有力的領導”，“再沒有比那樣一種人所主張的，如果我們保衛福摩薩就會自絕於亞洲大陸，因而主張在太平洋方面採取姑息政策和失敗主義的陳腐論調更為荒謬的事了”。換句話說，他要

求采取一种以福摩薩为据点的軍事侵略政策。电訊的整个調子正是和他最近告訴哈里曼他所拥护的政策針鋒相对的。我觉得毫无疑问全世界会这样来理解的，而且电訊的出发点也就是这样的。

我认为这项声明只会使全世界对于我們的福摩薩政策感到迷惑，因为它同我的6月27日的声明相对抗，也和我在国会发表的政策相抵触。此外，就在前一天，在我的指示下奥斯汀大使致联合国秘书长特賴佛·賴伊的一封信重申了我們的政策。

福摩薩問題曾由俄国的代表提交安全理事会，他們攻击我們援助蔣介石是一种侵略行动，而我批准了国务院的建議，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我們完全贊成联合国調查福摩薩局势，来对付这种攻击。俄国的代表馬立克先生企图使安全理事会相信我們把第七舰队置于福摩薩海峡的行动等于把福摩薩吞并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内。奥斯汀致特賴佛·賴伊的信明确地表明了我們只有一个目的：縮小远东的冲突范围。麦克阿瑟將軍的信——使全世界誤解为美国的政策的表白——与这一点相抵触。

自然，我絕不至于否认麦克阿瑟將軍或其他任何人和我持有不同的見解的权利。然而美国的官方立場应由总统的声明和决定来确定。在对外关系方面，只允許一个人发言，来說明这个国家的立場。这是具有根本性的宪法意义的。麦克阿瑟將軍除了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司令官外，还是联合国在朝鮮的司令官。事实上，他是代表联合国的。联合国那个时候正在辯論福摩薩問題，而联合国的會員国——甚至那些在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在福摩薩問題上也有着尖銳的分歧。作为一位联合国的代理人对于該机构正在討論的問題擅自发表主张很难說是恰当的。

我理解到这事已經造成了損失，而麦克阿瑟的信已經在新聞界的手里；事实上，发表这封信的刊物已經摆在报攤上了。

我严肃地考虑到解除麦克阿瑟將軍的远东战区指揮官的职务

而代之以布萊德雷將軍。占領日本的职务仍然可以交給麥克阿瑟，而把朝鮮和福摩薩自他的手中拿過來。但是仔細地衡量了以後，我決定不採取這個步驟。這樣做法難免有降級處分之嫌，而我不願意損傷麥克阿瑟將軍個人的。我唯一關心的是要讓全世界知道他的聲明不代表官方的政策。

我和迪安·艾奇遜，路易斯·約翰遜，約翰·斯奈德，阿弗里爾·哈里曼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們在預定的8月26日，星期六的上午，舉行了一次會議。我向他們宣讀了麥克阿瑟的聲明，並且詢問他們每一個人是否預先知道這件事。他們對這件事都感到很驚訝和震動。我於是訓令國防部長約翰遜以他個人名義致電麥克阿瑟告訴他我要求他撤回他的聲明。我知道，這樣做法已不能阻止這項聲明的傳播，但是這會使人們清楚地知道它不代表官方意見，而且已由撰寫人收回了。

1950年8月26日，國防部長約翰遜把下面電報拍給麥克阿瑟：

“美國總統指示你收回你致國外戰爭退伍軍人全國野營會的信，因為關於福摩薩的各項論點是和美國的政策以及美國在聯合國中的立場相衝突的。”

麥克阿瑟將軍立刻遵照這個指示做了，但是我覺得對於我們的政策我還須要加以更詳細的說明，來補充國防部長約翰遜的電報。我們對福摩薩的立場在奧斯汀大使致特賴佛·賴伊的一封信里已有扼要而明確的說明，於是決定喚起麥克阿瑟注意這封信。我知道該信的副本已經抄送給他的總部，但是這個副本也很可能和其他自華盛頓送到那里的文件雜放在一起。我想我私人的信件肯定可以使他看到。下面就是寫給麥克阿瑟將軍的信：

“茲附上我於8月27日致奧斯汀大使的信的全文，供你參考。

我确信你細看过这封信和奥斯汀大使于8月25日致特賴佛·賴伊的信（我听說当晚已有一份副本抄送給你的总部），你会了解为什么我在26日采取行动，指示你收回你致国外战争退伍軍人全国野营会的信是必要的。

“柯林斯將軍和薛尔曼海軍上将已經向我呈递了一份关于和你会談以及他們訪問目前在你指揮下的在朝鮮作战的联合国軍的全面报告。他們的报告是十分令人滿意的，它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前面提到的我致奥斯汀大使的信的全文如下：

“‘正如我在今天早晨在電話中告訴你的，我要向你致賀，自从大韓民国一开始被侵略，你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就很好地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观点。在全部討論过程当中，你以极大的效率，完全按照我的指示代表了这个政府。

“‘你于8月25日关于福摩薩問題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巧妙地綜述了我在6月27日所申述的，和我在7月19日致国会的咨文所提到的本政府的基本立場。你在那封信里明白地提出了問題的核心和实质。你忠实地表明了我在那个时候和目前的見解。

“‘为了使对美国政府关于福摩薩的立場不致有所誤解起見，这里有必要重申你在致賴伊先生的信中已經清楚地說明了的七个要点。

“‘（一）美国并没有侵占中国的領土，美国也沒有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

“‘（二）美国对福摩薩的行动是在这个島成为和大陆冲突地区的时候采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公开威胁說，将有更严重的冲突发生。这种冲突会使受安全理事会委托为了抗击对大韓民国的侵略而在朝鮮作战的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受到威胁。中国共产党当局威胁要将冲突扩展到太平洋地区。

“‘（三）美国的行动对福摩薩島上的軍队和对大陆上的軍队

同样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行动。这是为了维护和平，因此，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的。正如杜鲁门总统所明确声明的，我们对福摩萨并无任何企图，而我们的行动也不是企图为美国获取特殊的地位。

“（四）我们已经明白地声明美国的行动对于今后政治解决该岛地位问题没有任何偏见。这个岛的实际地位是一块由于盟国部队在太平洋地区的胜利，取自日本的领土。像其他同类的领土一样，在国际行动未决定它的命运以前，它的法律地位是不能够确定的。中国政府受盟国的委托，接受岛上日军的投降。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现在在那里的原因。

“（五）从历史记载上看，美国对中国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我们仍然对中国人友好，相信千百万的中国人也会以同样友谊回答我们。我们和其他国家在上届联合国大会上倡议通过一项统一中国的决议。只有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家不赞成这项决议。

“（六）美国将欢迎联合国考虑福摩萨问题。我们将赞成联合国的全面调查，不论是在这里或实地调查。我们相信联合国的考虑会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和平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解决办法。

“（七）我们不认为安全理事会需要或将要转移它对大韩民国受到侵略的考虑。朝鲜的和平遭到了破坏。侵略者发动了攻击，受到了谴责，联合国的联合部队正在为反击侵略而战。

“福摩萨目前和平无事，除非有人要诉诸武力，它将保持平静。

“如果安全理事会要调查福摩萨问题，我们将予以支持，并给以协助。同时安全理事会主席应该履行他的职务，按照议程所列项目进行讨论，议程上列的是控诉侵略大韩民国案件，尤其是承认韩国大使参加的权利和投票表决使朝鲜冲突地区化的美国议案等项目。

“‘以上七点正确地說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場。

“‘在安全理事会里即将进行的問題討論中，你将繼續得到我的全力支持。

“‘你的誠实的，

“‘哈里·杜魯門’”

我在致麦克阿瑟信中所談到的柯林斯將軍和薛尔曼海軍上將的訪問日本和朝鮮，表明了我們在朝鮮問題的努力的一个重要阶段。在8月初，我們在那里已經建立了一支六万五千人的地面部队，已經足够守住釜山滩头，也有足够的兵力为进攻計劃打气，在8月10日国防部长告訴我已計劃在9月25日前再送近两个师的兵力到朝鮮去。海軍和空軍部队也同样地增加了，进一步的增援也在准备中。

为了給麦克阿瑟將軍派遣他所要求的部队，我們从美国大陆，从波多黎各，从夏威夷抽調了兵員，甚至从在地中海舰队服役的海軍陆战队里調回一些人来。

柯林斯將軍和薛尔曼海軍上將在8月19日赴东京和麦克阿瑟將軍就进攻計劃进行了詳細的会談；在他回来的时候，他們把計劃交給我，使我有个了解，并且告訴我，參謀长联席會議已經批准了這項計劃。这个計劃具有大胆的战略思想。我对其成功抱有极大的信心。

我在9月1日向全国广播的时候表示了我的信心。我說，“两个月以前，共产帝国主义一变它經常采取的渗入和顛覆的战术，轉而向大韓民国，这样的小国家，发动野蛮的进攻。全世界友好的国家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外交上的抗議而让共产党侵略者吞并下他的牺牲品呢，还是用武装部队来对付軍事侵略。自由世界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样世界上有史以来，很多

国家的人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之下为了维护法律的原则而战。这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

我声明我们的目的和意图可以归纳为八点：“（一）我们信赖联合国，誓将通过这个组织来寻求和平与安全。（二）我们相信朝鲜人有获得自由、独立和统一的权利。（三）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展成为一场大战，这场战争将不至于扩大，除非共产帝国主义将其他军队和国家拖入反对联合国的，侵略性的战争。（四）我们特别希望中国人民不会被错误地引导或强迫来对联合国和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他们朋友的美国作战。（五）我们不希望福摩萨或亚洲的任何部分成为我们的领土。（六）我们相信远东各国都将获得自由。（七）我们不相信侵略或防御性的战争。（八）我们的士兵今天在朝鲜为和平而战；我们在联合国里和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首都，为了和平而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在朝鲜采取攻势的决定，使我们有必要从高一級政策的水平上考虑我们应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这个问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讨论过，最后的结论就包含在我在1950年9月11日批准的政策声明中。

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我们的行动路线可能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联合国中友好会员国磋商的结果；以及大战的危险。

授权麦克阿瑟将军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把北朝鲜人赶回三八线以北，或者击溃他们的部队。如果没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分子的武装部队进入的迹象或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麦克阿瑟将军把军事行动伸展到三八线以北，并作出占领北朝鲜的计划。然而，如果苏联或中国共产党进入朝鲜，就不要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地面军事行动。

一项由我批准的，基于这个建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于

9月15日送交麦克阿瑟將軍。

9月15日是开始进攻仁川的日子。第一陆战师和陸軍的第七步兵师在那里登陆，并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于是这两支兵力，包括阿尔蒙德少将指揮的第十兵团，为了解放在敌人占領下的朝鮮的首都而向汉城推进。抵抗是剧烈的，但是在9月28日完成了这座城市的解放，在9月29日李承晚将他的政府迁了回来。不久以前，——9月26日——突破釜山地带的第八軍第一騎兵师的部队和来自仁川地区的第七步兵师的部队举行了会师。敌人潰不成軍，斗志大为动搖。

我致电麦克阿瑟將軍，表示祝賀。

“我代表全国人民对于在你領導之下在朝鮮获得的胜利致以最热烈的祝賀。無論是在以空間換取時間，积蓄力量，待机出动，或是在解放汉城战役中用兵如神方面，在軍事史上只有少数的战役可以和它相比。我对我們的陆、海、空軍出色的合作感到特別的滿意。我希望你向各軍的指揮官——华尔頓·沃克中将，查尔斯·乔埃海軍中将和乔治·斯特拉特梅耶空軍中将轉达我的謝意和祝賀。由你和他們建立起来的协同作战，树立了一个光輝的榜样。我和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遙向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为自由而战的，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你的英勇的部队——陆、海、空和海軍陆战队的士兵們——致以謝意。我向你們全体致敬，并代表我們在國內的人們祝賀你們全体，‘你們成功地完成了崇高的使命’。”

我已經批准了參謀长联席會議于9月27日传达給麦克阿瑟的新指示。这个指示告訴他，他的軍事目的是“摧毀北朝鮮的武装力量”。为达到这个目的，授权他在朝鮮的三八綫以北进行軍事行动，如果在执行这种行动的时候沒有大量的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北朝鮮，沒有要进入北朝鮮的声明和俄国或中国共产党沒有恫吓要对我們的軍事行动进行抗击的話。訓令还指出無論在

任何情况下，他的部队都不准越过朝鲜和满洲的边界，或朝鲜和苏联的边界；作为一种策略，非朝鲜的部队一概不准在和苏联接壤的各道或在满洲边境使用。同样严禁对满洲或苏联领土使用空军或海军，以支持他在三八线南北的军事活动。

这项指示并进一步训令这个远东司令官，在苏联或中国共产党部队参加作战时，他应采取的行动。原文是这样的：

“万一敌人在三八线以南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只要你的部队的抵抗有成功的机会，你就应该继续你的军事行动。”

遵照这个指示，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他在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计划由第八军沿西海岸走廊向北挺进，而由第十兵团在北朝鲜的东海岸的元山进行两栖登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9日批准了这项计划。

9月30日我上了《威廉斯堡号》游艇在波托马克河上作一周的游弋。据说总统最难有时间让他清理一下思路。我一直认为只要有时间和更多的公民谈话，便应该向他们敞开总统办公室的大门；和人民接近，倾听他们的困难，让他们分享白宫丰富的传统，这是总统工作的一部分。但这就要打乱这天的工作，虽然我总是起得很早，经常比工作人员们早开始工作，还要把公文带回家夜间批阅，而事情总好像做不完似的。

我不知道作一个总统有什么更简便的方法。整天的工作还是不够的，难得有松口气的时候。我把总统的游艇和在基韦斯特的小白宫作为游憩使用要比作为回避使用的时候少得多。在我希望赶点工作，或是在我需要和我的工作人员商量事情而不受打扰的时候，这两个去处是非常有用的。

即使这样，在这种旅行期间每日的公文处理工作还是不放过我。例如，要是我上了《威廉斯堡号》游艇，每天早上就有一架飞机，

通常在九点或九点半的时候，送来邮件和报纸。艇上强大的无线电设备使我能够和白宫的任何人通话，或者通过白宫的中继台和任何人通电话。

这样，当我在9月30日登上《威廉斯堡号》后，我仍然和时局的演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我听说麦克阿瑟在10月1日曾经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要在越过三八线的时刻发表一项戏剧性的声明，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制止了他这样作。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这样的声明是不明智的，并且训令他继续军事行动，不要使他的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这一事实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10月2日麦克阿瑟报告说大韩民国的陆军部队正在三八线以北活动，进展很迅速，并且说似乎没有遇到敌人的什么抵抗。10月3日国务院收到了许多封电报，报告同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威胁着要参加朝鲜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现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召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并且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人。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这种行动。

这个电文立刻转达给麦克阿瑟将军。

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也打来同样的报告。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和这个报告有关的潘尼迦先生在过去却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建议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以稳定全朝鲜局势的议案，在联合国大会的政治安全委员会里悬而未决。这个议案如果得到通过，那么联合国司令官就肯定有权力在北朝鲜作战。这个议案在第二天就要投票表决，看来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

中国对朝鲜的干涉的可能性当然不能不加以考虑，因此我训

令參謀長聯席會議準備一項給麥克阿瑟將軍的指示，以應付這種可能發生的事變。參謀長聯席會議通過9月20日接替路易斯·約翰遜為國防部長的喬治·馬歇爾提出他們的建議，我批准了如下的致麥克阿瑟將軍的電文：

“鑒於中國共產黨軍隊可能在北朝鮮進行干涉，茲特對我們9月25日的指示作如下補充，尚希遵照執行。

“‘今後中國共產黨要是不事先聲明就在朝鮮任何地方公開或隱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隊，你應該根據自己的判斷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隊有可能獲得勝利，你就繼續行動。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要對中國境內的目标進行任何軍事活動，都必須事先得到華盛頓的批准。’”

這項指示在10月9日送給麥克阿瑟將軍。而在這段期間我又作出了另一個決定。我希望和這位將軍面談一次。我想和麥克阿瑟將軍會見的主要原因很簡單，我們始終沒有過任何的個人接觸，而我認為他應該認識他的統帥，而我也應該認識在遠東的高級戰區司令官。我一直對麥克阿瑟在日本任職期間不願意接受，甚至短時期的，回美國的多次邀請而感到遺憾。他應該回來熟悉一下國內的情況。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向主張我們的外交人員每四年應當有一年留居國內的理由。這樣他就會了解國人的想法了。

從6月以來多次的事件可以看出麥克阿瑟在他去國的多年中，他和國家、人民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聯繫。他在東方至今將近十四年，而他的全部思想都貫注在東方。我曾通過哈里曼和其他人士努力使他放寬眼界看看全世界，以期和我們在華盛頓對世界的看法取得一致。但是我感到，我們的努力不大成功。我想如果我能直接和他談談，他也許比較容易改變一些。

從北平傳來的中國共產黨揚言要在朝鮮進行干涉的報告是我要和麥克阿瑟將軍面談的另一原因。我希望從他那里得到第一手

的情报和判断。

經過一段短時間的考虑，我想飞赴朝鮮向我們在那里的部队作一次短時間的訪問。我理解到麦克阿瑟一定会认为在这些危險的日子里他不應远离他的部队，他一定会认为远涉重洋，仅仅是为了几个钟头的談話而感到躊躇。因此我提議我們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会見，結果同意在威克島最为合适。

我宣布我要在10月13日到17日的那一星期的最后几天去会晤麦克阿瑟將軍。我选择这几天是因为我已答应10月17日在旧金山发表演說。在五年多以前，当联合国宪章签字的时候我也曾在那里发表过演說。其次在10月24日，已經安排好要我在紐約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說。自然，我希望能在这些演說里把联合国軍司令官的第一手的材料包括进去。在这个意义上，我計劃中的这次旅行也可以說是为了联合国。

10月11日下午我乘《独立号》总統专机离开了华盛顿。头一段路程只飞到圣路易。在那里逗留了一夜，12日下午二点三十分繼續飞行；六小时又三刻钟以后，我們在加利福尼亚的费尔菲尔德—苏森空軍基地降落。

越过大洋的长途飞行的第一部分在当日的午夜以后开始，但我在一小时以前就上了飞机，在起飞前就入睡了。早晨五点钟左右我醒来——至少从我的表上看是那个时刻。在我走到飛行員的机仓的时候我才发现当地時間才三点。我用过早点，然后又走到前面去，坐在副飛行員的座位上，那时飞机飞近夏威夷島。天色仍然很暗，但是間断地可以看到下面舰只的灯光。那是为了防范飞机发生毛病，海軍派驅逐舰在我的航路上防护。飛行員威廉斯上校說那天早晨的能見度特別地好；無論如何，我是看到了一脉相連的島屿，从西方的天际慢慢地显现出来，使我叹为奇观；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真不会相信这些島屿在一望无际的碧蓝的海洋

中只是一个个小黑点。随后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慢慢地显现了出来，然后清楚地看出岛屿来了。最后飞机越过了金刚石頂^①，在珍珠港上空低飞盘旋了一圈，在希克姆空军基地降落。

我受到由斯坦巴克总督，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海军上将率领的高级文武官员的欢迎。

随后，在雷德福海军上将陪同下，当天早上我乘船巡视了珍珠港。他指给我看 1941 年悲剧的日子里留下的残迹，他也指给我看今天作为我们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基地的良好设备。我在珍珠港的军官俱乐部里用午餐，并向客人们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说。下午我访问了特里普勒陆军医院，并和几位从朝鲜回来的伤病员谈了话。从珍珠港到医院我好像从历史的一个时期到了另一个时期，虽然 1941 年到現在还不到十年。

《独立号》在 10 月 14 日，星期六的午夜过了几分钟离开了希克姆机场。我还是在飞机起飞前就就寝了，在大部分的航程中我是在睡乡里。在我睡着的时候，我们飞过了子午线，我也不知道由于顺风，我们竟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因而飞行员不得不减低速度，使我们不至于在预定到达的时间以前飞到威克岛。

我在降落的前一小时起来了，和几位随行人员共进了早餐，六时三十分，飞机在威克岛的机场上着陆滑行，然后停了下来。正是破晓的时候。按照当地时间，那天是 10 月 15 日，星期日。

在我要下飞机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已经等候在扶梯上了。他敞着衬衣，戴着一顶看来已经戴了很久的军帽。

我们热烈地互相致意。在摄影记者们照例乱哄哄地拍了一通照片之后，我们坐上一辆两门的老式轿车到该岛的民航管理处去。

我们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讨论了日本和朝鲜的局势。

^① 檀香山东南的山名。——譯者

这位將軍向我保证朝鮮的战局是贏定了。他还告訴我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日本也准备接受和約。

然后他提起他向国外战争退伍軍人全国野营会发表的关于福摩薩的声明。他說他感到抱歉，如果他曾使政府为难的話。我告訴他我认为这件事已成过去。他說他希望我能諒解他絕不是在搞政治，他在1948年上了政客們一次“当”，用他自己的話說，这种事不至再发生了。

我告訴他一些关于我們加强欧洲的計劃；他說他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作，并肯定在1951年1月有可能从朝鮮調一师人到欧洲去。他再次肯定朝鮮的冲突是贏定了；而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

这位將軍好像真的感到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和我談話。我发现他是一位使人感到十分高兴、有趣的人物。我們的談話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可以說比我所預期的要友好得多。

七点半过一点，我們来到另外一所小建筑物里，我們的隨行人員都聚集在那里。除我和麦克阿瑟將軍外，参加这次會議的有雷德福海軍上将，穆乔大使，陆軍部长佩斯，布莱德雷將軍，菲利普·杰塞普，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阿弗里尔·哈里曼和布莱德雷的參謀汉布伦上校。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杰塞普大使的秘书維尔尼斯·安德逊小姐躲在隔壁，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命令便把談話速記了下来。这事在麦克阿瑟將軍被撤职以后，在出席作证的时候，才被揭露出来。对于这件事外間謠言紛紜。我可以肯定地說不是我，也不是杰塞普先生，更沒有任何人命令安德逊小姐作記錄；事实上，她的隨行并不是要她作記錄，而只是随带一名秘书，好在會議結束的时候起草一項对外发表的公报。

安德逊小姐作記錄的事后来真相大白了，而这次在威克島召

开的扩大会議上的談話也已經发表在书报上了。因此我在这里只說說这次討論的几个要点——这几点当时給我那么深刻的印象，因此即使沒有記錄，我也能記得起来。

麦克阿瑟將軍說，他坚信在南北朝鮮，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結束。他說，这样他就能够在圣诞节把第八軍撤回日本。他将留两个师和其他联合国国家的部队在朝鮮，直到那里举行了选举以后。他认为选举最迟可以在1月份举行，那时候就有可能从朝鮮撤出所有的非朝鮮部队。

接着大家对冲突一旦結束，复兴朝鮮所需的援助討論了一番，麦克阿瑟將軍和穆乔大使都对我和我的随行人員所提出的問題作了回答。当陸軍部长佩斯問麦克阿瑟將軍需要陸軍和經濟合作总署給他什么帮助的时候，这位將軍毫不迟疑地說，在軍事史上沒有一位司令官有比他自华盛顿各部門得到更全面、更足够的支持了。

我記得我們談到我們的部队所俘获的战俘，这位將軍說他們是全朝鮮人中最幸福的人了。他們吃得很好，穿得很干淨，虽然他們是作为北朝鮮的“共产党人”而被俘的，事实上他們和其他的朝鮮人沒有区别。

接着我让麦克阿瑟有个机会对大伙重复說說他和我私人談話中說过的一些事情。

我問：“中国和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

这位將軍实际上分作两部分来回答這個問題。首先，他談到中国人。他說他认为他們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他們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鮮，但是他們既沒有空軍“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

其次，他談到俄国干涉的可能性。他談到俄国空軍的实力，但是他肯定他們的飞机和飞行人員的素质都比我們的差。他看不出俄国在冬季到来以前可能調出大量的地面部队。他以为因此就有

可能使中国和俄国联合起来进行干涉，用俄国的飞机来支援中国的地面部队。他认为这不足为患。他又說，“俄国空軍和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根本就配合不来。”

后来，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討論日本問題。麦克阿瑟表示坚决贊成对日締結和約，他特別贊同国务院的和約草案。在回答我的問題的时候，他还說他认为搞一个太平洋公約倒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亚洲国家都沒有軍事力量，因此任何像这样的协定，就像一条单行綫，美国給予太平洋国家以保证，而得不到任何回报。他认为由总統发表一項声明就能够达到在这个地区訂立公約的效果。

这次正式會議在九点钟过一点結束。然后麦克阿瑟將軍和佩斯部长及布莱德雷將軍就技术問題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談，同时穆乔大使和随行的国务院的官員們进行了討論。

麦克阿瑟將軍急于要回东京，因此我們决定在午飯以前离开威克島。如果按照我的計劃，我們逗留下来，共进午餐，那么由于威克島和东京两地的时差，这位將軍就要在夜間才能回到东京。

我在麦克阿瑟將軍的优异服务勳章旁加上了第四枚橡叶勳章，同时也授給穆乔大使一枚勳章。然后我和將軍審閱了布莱德雷將軍和杰塞普大使起草的公报。麦克阿瑟將軍在这上面署了名，以表示这份公报表达了他的看法。

在我們回到我們座机旁边的時候，我告訴麦克阿瑟說我认为我們这次的会晤是非常令人滿意的，我希望下一次的会見为期不会太远。我們握过手，在我登上《独立号》专机的時候，他祝我，“平安着陆”。

在我們回夏威夷的路程中，我們又一次飞越过子午綫。我們离开威克島的時候是10月15日，星期天，但是当我再在希克姆空軍基地下飞机的时候，却是10月14日，星期六。因此，虽然我在

威克島剛渡過一個星期天，而第二天又是星期天。

這一天的大部分時間是用來準備我要在舊金山發表的演說。我們是在海灘午宴上進的午餐，下午驅車遊覽了島上的幾處風景區。10月16日，星期一，我便自夏威夷回到了舊金山。

第二天晚上我在舊金山歌劇院發表了演說。我向美國人民報告了威克島會談的情況，並表示朝鮮是聯合國行動的象徵。

我說，“我才從威克島回來，在那裡我和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進行了一次非常令人滿意的會談。

“我知道外間對於我這次旅行一定有很多的猜測。其實這並沒有甚麼神秘。我去了，是因為我要和麥克阿瑟將軍見見面，談一談。和他見見面，談一談，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約定在一個什麼地方會晤。

“戰區司令官由於親臨其境，最了解當地情況，所以再沒有比他晤談更解決問題的了。他掌握大量的情報，這對我們所有的人，在這個危急的關頭，正確地決定政策都會有幫助。

“我之所以到威克島去會晤麥克阿瑟將軍，是因為我不希望使他遠離朝鮮，在那裡他正得心應手地指揮着非常重要的軍事活動。那裡事態的發展是很快的，我認為他不應該離開他的崗位太久。

“同時，我相信我的威克島之行會加強聯合國在朝鮮所採取的歷史性行動的意義。因為朝鮮已經成為人類共同抵抗侵略的象徵。

“我還覺得迫切地需要通過我和麥克阿瑟將軍的會談弄明確，我們外交政策的目的和行動是完全一致的。

“這次會談歸來更增強了我的信心，我們有維護世界和平的持久能力。

“在威克島我們談到了遠東的局勢和它對世界和平的關係。我征詢過麥克阿瑟將軍的意見，依他看美國怎樣才能在太平洋地區最有效地幫助聯合國促進和維護和平與安全。

“我們討論了日本問題和早日締結對日和約的需要問題。我們都對一個和平、繁榮的新日本抱着莫大的希望和信心。

“麥克阿瑟將軍告訴过我朝鮮的戰鬥情況。他描述了在他指揮下的聯合國部隊的光輝的成就。和大韓民國的部隊一起，他們打退了侵略的浪潮。越來越多的戰鬥人員正從全世界的自由的家鄉趕來。我堅信這些部隊不久將恢復全朝鮮的和平。

“我們在美國國內的人們自然對我們自己的陸、海、空和陸戰隊戰士的卓越成就特別感到自豪。他們在軍事史上寫下了光輝的新的一頁。我們所有的人會為他們感到驕傲。

“聯合國要求我國為聯合國軍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們莫大的光榮。我們有這麼一個合適的人選來完成這個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運。這個人就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一個非常偉大的戰士。

“現在，我希望威克島能成為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團結一致的象徵。我希望看到環繞威克島以西的所有地區實現世界和平。我希望看到環繞威克島以東的所有地區實現世界和平。我們正在贏得和平！

“聯合國在朝鮮的行動對全世界人民來說都是極端重要的。

“在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希望和平的國家在一個國際組織的旗幟下拿起武器來制止侵略。在那面聯合國的旗幟之下，他們正獲得成功。在世界範圍內，建立法治的長久鬥爭中，這是一個巨大進步。……

“今天，由於朝鮮鬥爭的結果，聯合國比以往任何時期更為堅強。我們現在知道聯合國可以運用維護和平的權威來創造一種國際秩序。

“在我和麥克阿瑟將軍會見的時候，我們討論到怎樣完成給朝鮮帶來和平的任務的各種計劃。我們談到按照聯合國大會的決

議，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統一、独立、民主’的政府的各項計劃。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們的政策就一直在为朝鮮爭取达到这些目的。

“我們唯一的目的是在朝鮮建立和平和独立。我們的部队留駐在那里将不超过联合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需要他們的時間。我們对朝鮮或其他地方都沒有获得領土或其他特权的野心。我們对朝鮮或任何其他远东地区，或任何地区都沒有侵略企图。我希望全世界完全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任何真正希望和平的国家沒有任何理由对美国存有戒心。

“我們所寻求的唯一的胜利是和平的胜利。

“在朝鮮的联合国部队正获得惊人的进展。然而在那边的战斗尚未結束。北朝鮮的共产党人仍然拒絕承认联合国的权威。他們繼續进行着頑强的，但是徒然的抵抗。

“联合国軍的力量正在日漸增强，目前他們比敌对部队远远处于优势。朝鮮共产党人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必将告終。……

“五年以前，在旧金山这个城市里，我們曾希望苏联会跟我們合作，为建立持久和平而努力。

“但是共产帝国主义不願意这样作。苏联不但不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在互相尊重和合作之下工作，反而企图扩张势力，控制其他国家的人民。走上了苏維埃型的新殖民主义的道路。这种新的殖民主义已經使一些过去曾經是自由的国家完全遭受它的控制和剝削。苏联不但自己拒絕合作，而且不允許它的卫星国家同它所不能控制的国家合作。

“在联合国組織里，苏联坚持反对的立場。它拒絕参加为联合国宪章所认可的，大規模的經濟、社会和文化活动。它竟然好几个月拒絕参加安全理事会。……

“苏联和它的殖民地卫星国拥有数量和力量都很大的武装部队。在欧洲和亚洲，他们的大量的军队形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只要他们还坚持拥有这些部队，并用以威胁其他国家，世界上的自由人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如果他们还想过自由日子的话。他们必须以武力对付武力。

“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任务。这是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担负的任务。而自由的国家正在共同负担起这个任务。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联合国里曾经提出了一项‘为和平而团结起来’的计划，使联合国大会在任何新的侵略发生的时候有可能迅速而有效地行动起来。……

“现在，苏联可以改变这种局势。它只要提出具体确切的保证，表明它有为和平而努力的诚意。如果苏联真正希望和平，它不应该再用闪烁的诺言和虚假的宣传，而是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来证明它。

“如果苏联真正希望和平，它可以——而其实自去年6月25日起没有一天不可以——和其他联合国国家联合起来，呼吁北朝鲜立刻放下武器，来证明它的和平愿望。

“如果苏联真正希望和平，它可以用扯开铁幕，允许自由交换情报和思想的方法来证明它。如果苏联真正希望和平，它可以和联合国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可行的集体安全体系来证明它。这种体系将使销毁原子弹和大大地削减并调整其他武器或武装部队成为可能。

“但是在苏联作这些事情以前，在对自己的和平愿望提出真正保证以前，我们有决心建立起一支自由世界的共同防御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已作的选择。我们坚定地，又有决心地作了这种选择。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喜欢作这种选择。我们不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我们没有征服的野心和炫耀我们武力的愿望。……”

第二十四章

共产党中国的干涉

朝鮮战争在10月里获得了良好的进展。北朝鮮的首都平壤在10月19日拿了下來，麦克阿瑟的部队天天都在前进。

在他指揮下的这些部队，現在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在10月中旬，除了美国和大韓民国的部队外，在朝鮮的还有澳大利亚，英国和菲律宾的地面部队。一支瑞典的战地医疗队也参加了活动。泰国和土耳其派来的步兵正在朝鮮的港口登陆，准备参加战斗。派遣海軍协助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法国、英国、荷兰、新西兰和挪威。此外比利时、哥伦比亚、加拿大、埃塞俄比亚、法国和希腊也正在准备派遣地面部队到朝鮮去。一天又一天，“联合司令部”越来越成为联合国軍司令部。把出錢、出物資的国家都算在內，截至現在一共是四十二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供了它們的援助。

我能理解这样一支由許多国家拼凑成的軍队会給它的司令官增添一些新的問題。麦克阿瑟將軍和接替他担任指揮官的李奇微將軍和克拉克將軍，在证明可以把来自很多国家的战士組成一支能够打胜仗的軍队方面，得到人們給予的最高評价。

在这个多国家的成分里面，朝鮮人本身就是一个問題。到要发动进攻的时候，朝鮮的陸軍还是些沒有战斗經驗的新兵。它的軍官不懂得現代軍事技术，而它的高級將領也缺乏訓練和閱历。在那时，麦克阿瑟將軍对朝鮮的陸軍并沒有很大的信心。參謀长联席会议曾經訓令麦克阿瑟將軍在向北推进的时候，不要把非朝鮮的部队部署在滿洲和苏联的边境。但是这位將軍在他給他的將

領的命令中，指示由美国部队領头向北推进。等打到边境以后，在“可能的”地方，再由南朝鮮人来接替他們。參謀长联席會議对这样做表示担忧，要求麦克阿瑟报告这一种变更的理由。

麦克阿瑟將軍在他的答复中說，大韓民国的部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北朝鮮初期的安全，他认为使用更多的經過鍛炼和有經驗的司令官是必要的。麦克阿瑟說他看不出在他的命令和他所得到的“我們希望你在向三八綫以北前进中，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不会感到有什么束縛”的指示之間有何冲突。麦克阿瑟补充說，“我完全了解你們的指令的基本目的和意图，而且在这种前提下，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不过，要是不照我所指示的，而采取其他行动的話，那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甚至在战术上会陷于危险。整个問題在威克島會議里我都談过了。”

在麦克阿瑟的部队沒有遭到太大的抵抗而向北移动时，就有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看来是会在北朝鮮进行一些活动的猜測。10月20日中央情报局送給我一份备忘录，說他們接到报告說中国共产党将向足以保证供应他們电力的水丰电厂和鴨綠江畔的其他設備安全的地方移动。国务院对这个报告的反应是建議麦克阿瑟將軍发表一項致联合国的声明，表明他并不打算切断水丰和其他电厂的供电。參謀长联席會議认为从軍事观点来看，这样的声明是不妥当的。当这种情况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訓令參謀长联席會議把国务院的建議轉告麦克阿瑟，并征求他的意見，看他是否不同意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是麦克阿瑟认为他不願意这样束縛住自己的手脚，因此也就沒有发表声明。

不过，发表了声明是不是就会产生什么不同的效果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正如我們后来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已經开始进入北朝鮮，虽然直到10月31日我們才获得证据，他們已經进入战区，实际上已經在和联合国的部队作战。

这个消息最先由在北朝鲜元山地区的第十兵团司令部报告上来。10月26日和以后所俘获的战俘被认出来是中国人，经过审问，证明是有组织的中国部队的成员。战俘们供称他们的部队在10月16日就跨过了鸭绿江，这是在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向我提出保证的第二天。将军保证说，如果任何中国人进入朝鲜，他们将肯定地面临灾难，但是他认为他们不至于尝试那样愚蠢的事。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叫麦克阿瑟提出对局势的最新估计。11月4日收到麦克阿瑟以下的答复：

“目前还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真实性作出有力的估计。根据来自前线的战斗情报，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第一，中国共产党政府打算以其全部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在它认为适当的时机公开宣布这一行动。第二，它将隐蔽地给予军事援助，但是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尽可能地掩盖起事实的真相。第三，允许并唆使或多或少也算是志愿的人员源源不绝地越过国境，加强并援助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使他们能够为了在朝鲜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立足点而继续斗争。第四，这样的干涉，也是存在的，是因为他们相信除了南朝鲜部队外，联合国部队是不会在朝鲜的极北地区使用的。他们一旦了解到这样的兵力是不足以达到目的的，就很可能学到一点乖，趁早从破船上捞回点东西。

“第一种或然性代表一种具有最严重国际意义的重大决定。一方面，这种可能性已经很明显，而且很多外国专家都在推测这样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和这种看法相反的逻辑上的基本理由，而且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人能够很快地同意这种看法。

“目前看来，其余三种或然性，或者三种或然性合在一起，似乎是最可能的。

“我建议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轻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

这样，麦克阿瑟將軍警告不要輕率地采取行动，特別是不把中国共产党干涉的可能性看作“新战争”。因此不到二天，他撞起警钟的时候，不免使人大吃一惊。

11月6日我正在堪薩斯城；正好是选举的前一天，像往常一样我打算在独立城投票。那天早晨我接到迪安·艾奇逊的紧急电话。国务卿是在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罗維特在华盛顿的会议上給我挂的电话，他們觉得情况非常严重，需要立刻作出决定。

下面就是艾奇逊在电话里向我报告的局势及其发展情况。艾奇逊說，国防部副部长罗維特在早晨十点钟到他的办公室来，告訴他說他才收到远东空軍司令斯特拉特梅耶中将的电报。麦克阿瑟曾命令他执行一項炸毀横跨鴨綠江上朝鮮新义州和滿洲安东之間的大桥的任务。九十架 B-29 型轰炸机已預定在华盛顿時間一点钟起飞去执行这项任务。罗維特曾告訴艾奇逊說，从战术观点来看，他怀疑所要达到的目的比起可能炸中安东或滿洲其他地区的危險来，是不是值得。

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指出我們和英国人有約在先，未經和他們磋商，不得采取可能涉及攻击鴨綠江那边的滿洲的任何行动。他还告訴罗維特說，国务院已把麦克阿瑟关于中国共产党进行干涉的报告递交联合国，并已請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們將努力获得通过一項呼吁中国共产党停止在朝鮮活动的決議；为了爭取联合国支持我們进一步的行动，这样做是必要的。腊斯克先生还提到了涉及苏联的危險，尤其是鉴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存在着互助条約。

艾奇逊繼續說他和罗維特已同意，在我們获得关于那边局势更多的事实以前，这次轰炸任务應該暫緩执行。罗維特接着和馬歇尔通了話，馬歇尔也认为除非发现敌人集結过江，威胁我們部队的安全，这次轰炸是不明智的。然后罗維特又和空軍部长芬勒特

先生通了電話，訓令他告訴參謀長聯席會議，腊斯克所說的理由，並告訴參謀部聯席會議說他（羅維特）和艾奇遜都認為在他們能夠獲得我的決定以前，這種行動必須暫緩執行。

我告訴艾奇遜說除非對我們部隊的安全有嚴重的和急迫的威脅，我才会批准這種轟炸的任務。艾奇遜說自從上次報告以後，從麥克阿瑟那里還沒收到新的情況；上一次的報告並沒有說再有部隊過江，而只提到中國方面的後備力量。我告訴艾奇遜說我們必須了解麥克阿瑟為什麼全然認為有必要採取這種行動，並且告訴他讓羅維特照這樣發出命令。

參謀長聯席會議在華盛頓時間十一點四十分，距離飛機自日本基地起飛的時間只差一小時二十分，發出一份電報，傳達了我的指示。在這份電報里參謀長聯席會議通知麥克阿瑟，政府正在對朝鮮局勢作緊急的考慮；並告訴他和英国有約在先，未經和他們磋商以前，不得對滿洲採取行動，在收到進一步的命令以前，所有離滿洲邊境五英里以內的目标，都要暫緩轟炸。在這個期間，他應該對局勢的估計提出報告，並說明他命令轟炸鴨綠江所有橋梁的理由。

麥克阿瑟的答复如下，

“大隊的人馬和物資正自滿洲涌過鴨綠江上所有的橋梁。這種移動不僅使在我指揮下的部隊陷於困境，而且有使我軍全部被殲的危險。過江的實際移動可以在黑夜的掩蔽下進行，而鴨綠江和我們防綫之間的距離是那麼近，敵軍可以不必十分顧忌空襲的威脅，展開對我軍的攻擊。唯一阻止敵軍增援的辦法就是發揮我們空軍的最大威力，摧毀所有的橋梁和在北部地區所有支持敵人前進的設施。每小時的遲延都將付出大量的美國人民和其他聯合國人民的鮮血。新義州的主要渡口要在最近幾小時內加以轟炸，

而且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經准备就绪，我是在我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抗議之下暫緩进行这次襲击，并执行您的指示。我所命令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战争原則和我自联合国所得到的決議和指示的，而且并不构成对中国領土任何輕微的敌对行为，虽然肆意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是从那里来的。我不願过分夸大您所加于我的限制将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造成严重損害的后果。我希望这事立即引起总统的注意，因为我相信您的命令很可能要导致严重的灾难，如果不是总统亲自和直接了解这种情况，我是不能担当这个责任的。时间是如此的紧迫，我要求立刻重新考虑您的决定，在等待您的决定时，自然完全遵照您的命令行事。

“1950年11月6日”

布莱德雷將軍在电话里把电文讀給我听。对这么靠近滿洲和苏联国土的目标进行一次大規模的轰炸有着严重的危險。一个立功过于心切的飛行員很容易会引起报复的行动；受伤的飞机也可能被迫降落在我們控制以外的地区。但是既然在場的是麦克阿瑟將軍，而他又痛切地感到局势非常紧迫，我告訴布莱德雷就让他“干去吧”。

參謀长联席會議拍給麦克阿瑟的电报如下：

“从你11月6日的电报所描述的和你的11月4日电文的最后一句所报告的看来，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你的11月4日的电文是我們收到的你最后的一个报告。我們同意摧毁鴨綠江的桥梁对于保证你指揮下的部队的安全会有重大的帮助，除非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行动解释为对滿洲的进攻，而激起更大的努力，甚至苏联也投入他們的力量。其結果不仅危及你的部队，还会扩大冲突地区，而陷美国于极其危險的境地。

“然而鉴于你11月6日电文的第一句所說的情况我們授权你

按照你的計劃，轰炸朝鮮边境，包括在新义州的目标和朝鮮这一头的鴨綠江桥，如果在收到这封电报时你还认为这种行动对你的部队的安全是必要的話。上述命令并没有授权你轰炸鴨綠江上的水壩和发电厂。

“由于必須和联合国的政策、指示保持适当的关系，也由于把战争局限在朝鮮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着重大的关系，所以应极端注意避免侵犯滿洲的領土和領空，并把从滿洲方面来的敌对行动及时呈报，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认为經常把重大的局勢变化在它发生的时候通知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并在最短的时间內將我們 11 月 6 日要求你作的估計告訴我們。”

就在 11 月 6 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將軍在东京发表了一项公报，他声明他的部队現在面对着一支斗志旺盛的新軍队；这支軍队有着大量的后备和充足的供应。敌人可以就近得到增援和补給，而敌人的后方却在我們目前軍事活动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

中央情报局也在那时根据他們的情报来源給我提供了一个对局勢的估計。报告估計說在滿洲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可能有二十万人之多，他們的进入朝鮮可能阻止住联合国的前进，而事实上可能迫使联合国更向南撤退到防御陣地。估計最后指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由于进入朝鮮，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他們的一部分部队而且把他們在亚洲的威信作为賭注押上了。必須估計到他們是知道他們所冒的是什么样的危險；換句話說，他們已經准备应付一次大战。

麦克阿瑟將軍对时局估計的两封电报都在 11 月 7 日收到。在第一封电报里麦克阿瑟重新提到了他最初(11月 4 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干涉的估計，并且断定說他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使用出全部力量来进行干涉。他承认干涉的兵力可能加强到“使

我們的繼續進攻成為不可能的程度，甚至迫使我們往後退却。”他說他正在計劃採取主動，以便“正確地試探……敵人的力量。”他接着又說，“我認為必須執行討論中的目標的轟炸，因為這是防止敵人大量增援軍力到威脅我軍安全程度的唯一辦法。這種把敵人前進的戰綫阻止在朝鮮境內的行動，分明是防禦性的，要是說這種行動會使局部性干涉的數量增加，或者說它本身會挑起一次大戰，那是很難以想像的。

“自從敵對行動開始以來，本司令部就把滿洲和西伯利亞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當作一個主要的負擔，而所有來自那裡的，經過證實的敵對行動都及時地加以報告。從來也沒有要炸毀水電設備的企圖。全日的情況將照常逐日報告給你們。”

麥克阿瑟的第二封電報如下：

“敵人的飛機自鴨綠江以西的基地起飛，襲擊我們在北朝鮮的軍隊。飛機的數量越來越多，鴨綠江和主要戰綫之間的距離是那麼近，以致於幾乎不可能有效地對付敵人目前所使用的打了就跑的戰術。目前對我的戰區所施加的限制使敵人飛機一過北朝鮮和滿洲的邊境，就進入一個十分安全的避難所。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對空軍和地面部队的士氣和戰鬥效率的影響是嚴重的。

“除非很快地採取正確的措施，這種因素將起決定性的作用。怎樣應付這種危急的新局勢，懇請指示。

“1950年11月7日”

自然，每一位軍事指揮官和每一位政府文職官員都有權發表他的意見。的確，如果我們希望所有的公僕都是一個想法，或者只有一種想法，那我們的政府不會是一個好政府。我尊重麥克阿瑟發抒己見的权利。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是如此。毫無問題，我對麥

克阿瑟的軍事判斷力是非常重視的。但是作为總統，我不仅要听取軍事方面的判斷；我所作的決定不仅要根据一部分的活動而必須根据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更全面的狀況。

我們是代表联合国，而且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鮮从事活動的。我所委托給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統一指揮權”是联合国的指揮權；如果我們的行動越出了联合国大会所給予我們的任務範圍，那他和我都無法為自己辯解。

在我的腦子里，毫無疑問，我們不能讓朝鮮的行動擴大成為一次大戰。全面進攻中國的軍事行動必須避免，不要說別的理由，只因為它是一顆巨大的餌雷。

中央情報局對時局的估計是：俄國人不自願自己參加戰爭，但是他們希望尽可能把我們糾纏在亞洲，以便他們放手在歐洲行事。

我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對中國共產黨在朝鮮進行干涉的軍事意義提出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建議如下：

“（一）應該不遺余力地通過政治途徑，包括重新向中國共產黨保證我們的意圖，最好是通过联合国，通過我們的盟國或联合国的臨時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政府直接談判，或其他可以利用的方法，把中國共產黨干涉朝鮮作為緊急事件加以解決。

“（二）在進一步明確中國共產黨的軍事目的和他們企圖干涉的程度以前，對於委托給联合国軍總司令的任務應該經常加以檢查，但是不應予以改變。

“（三）美國應該根据世界大戰的危機加劇的形勢，擴大它的計劃，並加強準備。”

馬歇爾將軍以國防部長的身份同意這些結論。

在11月9日的一次會議上，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參謀長聯席會

議的这些意見和中国干涉所产生的一般性問題进行了全面的討論。我沒有能够出席这次會議，但是会后得到了會議进行情况的报告。

布萊德雷將軍在这次會議上說，中国共产党可能有三种企图，我們应加注意。第一，中国人可能只希望建立一个緩冲地区，以保护他們在鴨綠江沿岸电力設備的利益。如果是这样的话，談判可能有結果。第二，中国共产党可能希望迫使我們和他們进行消耗战，使我們的部队耗損到一定程度，一旦苏联发动一次世界大战，我們就有失敗的危險。第三，我們必須在我們的計劃中考虑到中国人的目的可能要把我們完全赶出朝鮮半島。參謀长联席會議认为最后这个可能性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单靠中国人还发动不了，而苏联一旦进行干涉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战争扩大到东西方每一个接触点。

布萊德雷將軍說，据他看来，我們應該能够保住我們目前在整个地区的障地，但是越来越严重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不进攻滿洲基地，我們究竟能經受得住多大的压力。然而參謀长联席會議认为，这种对滿洲的攻击要由联合国来决定，因为它超出了作为联合国部队行动依据的決議內容。

布萊德雷將軍談到，麦克阿瑟將軍大概是认为轰炸鴨綠江上的桥梁会阻止中国共产党部队涌入朝鮮。然而布萊德雷自己却认为这种想法太乐观了。

国防部长馬歇尔在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會議上指出，我們在朝鮮的东面防綫拉得太寬，兵力单薄，而这就更增加了一层危險。布萊德雷將軍的答复是，麦克阿瑟將軍这样作，自然是为了执行他的指示，指示要他占領全朝鮮，并举行选举。

中央情报局比德耳·史密斯將軍說，在十五天到三十天之內鴨綠江就会封冻，有沒有桥梁都可以通行。

国务卿艾奇逊問布萊德雷將軍說，从軍事观点来看，有沒有比現有的更好的防綫。布萊德雷回答說，从純軍事观点来看，越靠后的防綫越容易防守。然而，他又說，他意識到只要我們部队向后轉移，我們就会失去人心，我們就会使南朝鮮人失去战斗意志。

国务卿艾奇逊表示他有一种感觉，俄国人对纵深防御特別有兴趣。因此他建議在朝鮮东北部建立一个緩冲区，由联合国委派的警察部队而不由联合国武装部队来維持秩序。艾奇逊說中国人所关心的有二：第一是牵制住我們，其次才是边境与电厂。他认为我們應該私下試探有沒有可能搞一个二十英里，鴨綠江两岸各十英里的非軍事区。他接着說，自然任何这类建議行不通的理由是因为共产党会坚持所有外国軍隊統統撤离朝鮮，而就此把朝鮮送給了共产党。

在他总结这一次討論的时候，国务卿艾奇逊指出，會議同意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現在不应加以改变，并且同意在軍事方面他可以相机行事，但是不得轰炸滿洲。在这个同时，国务院应設法試探是不是可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談判，虽然我們和北平政权在外交上沒有直接联系还是一个問題。

必須指出，朝鮮局势并不是共产党中国借端寻衅的唯一事例。事实证明印度支那的共产党叛軍正在更多地接受北平的援助和建議。同样的，在10月底，共产党中国又向古老的奉行神权政治的西藏进军。

我們在印度支那和西藏看到一件在时机上配合在朝鮮进攻的类型，这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是共产党的一次挑战，目的在于加深多数亚洲人排外情緒的郁积。

我們的英国盟友們和許多欧洲的政治家們认为这是中国人迫使美国停止对重建欧洲的援助的詭計。他們知道再沒有比美国的政策——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馬歇尔計劃，坚守柏林的决

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对世界共产主义更有害的了。只要遵循这种政策，而美国随时坚决給予支持，克里姆林宮就永远不能使欧洲共产主义化。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一条誠律一直是分化苏联的敌人，而美国的領導在欧洲所形成的团結便是世界共产主义攻击的最主要对象。

我不打算轉移我們的注意力，而无視于苏联始終不变的目的和阴謀。我知道在我們这个时代，拥有千百万熟练工人、工厂和交通网的欧洲仍然是世界和平的钥匙。

在美国，过去有过，而目前还有这样一些人，有些是善意的，有些是听信了錯誤的宣传，有些是恶意的，他們要我們相信我們應該把我們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亚洲人民，甚至不惜以放弃欧洲为代价。这样我不能同意。但是持这种見解的一帮人嗓門很大，而且他們有宣传自己見解的工具。参議院就是一个大喊大嚷的讲坛。在参議院中或其他場所鼓吹亚洲第一的演說得到很广泛的传播，而我們国外的朋友們不免經常为之惴惴不安。在我当总统任內，我們的政策絕不听命于其他国家，不論这个国家对我們是多么的友好。我們坚持献身于和平的理想，也就是通过联合国赢得的和平，跟和我們有共同的目标和态度的人們合作而赢得的和平。

因此，1950年11月，关于朝鮮，我們要采取三个措施。其中之一是向我們欧洲的盟友，尤其是英国和法国，重新保证我們无意于扩大冲突，也不会因为在亚洲新的牵扯而放弃我們在欧洲所承担的义务。第二，我們在联合国内，为了制止中国干涉朝鮮，寻求最大的支持；不过，又要不至于迫使联合国对北平进行軍事制裁，因为制裁就意味着战争。第三，要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方向和目的。

麦克阿瑟將軍在11月24日以他的第八軍发动了一次主力进攻。他声称这是一次“結束战争的……总攻势……”，他要他的一

位指揮官告訴士兵們他們可以在聖誕節回家了。前此不久，就在11月6日和7日，他來電向華盛頓報警，好像大難即將臨頭。但是現在，很明顯，嚴重的危險並不存在，因為甚至在未動一兵一卒之前，他就宣布了勝利。

但是就在这同一天，中央情報局搞了一份給麥克阿瑟的全國情報簡編，說中國共產黨將“在最低限度以內”擴大朝鮮戰鬥，纏住我們的部隊，使我們陷於長期的消耗戰，以便維持北朝鮮政府的現有局面。簡編還提到中國人有足夠的力量迫使聯合國軍撤退到原來防禦陣地。

這個情報簡編所作的估計證明是正確的。11月28日，事情終於明白了，第八軍撞上了大量的敵軍，而在東海岸的第十兵團，按照公報作者的說法，是處在一種“流動狀態”，這是新聞發布人對於他所不能肯定的情況的說法。

現在說來並沒有一個人因為11月攻勢失敗而責備麥克阿瑟將軍，肯定地我絕沒有責備他的意思。事實上由於眾寡懸殊，不應苛責於他，正如不能因為腹地戰役^①所受的重大損失而過分地非難艾森豪威爾一樣。但是——1944年的艾森豪威爾和1950年的麥克阿瑟之間究竟有些區別——麥克阿瑟企圖為自己的過失辯護的態度我是不能原諒的。第一，他沒有必要宣告這一次是“結束戰爭”的攻勢。如果他知道敵方的兵力不足以抵擋他的前進，那麼他早先拍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幾封電報就肯定是錯了。但是如果他在11月初的估計是對的，那麼他現在就幾乎不可能想輕易贏得勝利。

也許這類前後矛盾的事情是意料得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① 腹地戰役(Battle of Bulge)，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於1944年12月16日在西綫發動的最後一次反攻，當時德軍縱深插入盟軍的腹地——比利時的北部和東部，1945年1月被盟軍擊退。——譯者

中，正当他的部队还在硬拚苦战之中，麦克阿瑟就曾多次宣告过胜利。但是在攻势刚刚失败，他现在又开始对某些人士发表声明，那是不可原谅的。在四天之内，他居然有时间用四种不同的方式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他之所以倒霉仅仅是因为华盛顿的命令把敌对行动限制在朝鲜境内。他谈到什么“军事史上没有前例的”啰，“惊人的限制”啰；他推得很干净，他和他的部下没有一点过失。

然而，记录表明，麦克阿瑟将军自己在11月6日和7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中国人以强大的军力进入朝鲜，进行干涉。他自己曾向我们提供情报说，在鸭绿江彼岸有大量的后备部队。他要求——要求被批准了——允许他摧毁所有的桥梁，因为通过这些桥梁敌人的后备部队源源涌入朝鲜。

自然，他并没有得到轰炸满洲基地和“穷追”自朝鲜逃入满洲的敌机的权力。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同意，这种政策最好是得到联合国的允许，因此，在我的批准之下，向所有往朝鲜派遣部队的联合国会员国征求了意见。所有的国家无例外地，表示强烈的反对。的确，他们还强调，希望不要把非朝鲜部队配置邻近鸭绿江的地区，如果我们的攻势必须我们深入到这样的地区的话。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作出严重决定的地步。如果我们决定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就必须防备敌人的报复。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在条约上，都是同盟者。一旦我们进攻共产党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预防俄国出面干涉。自然，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规模的战争。但是我们和全世界也都不愿意受共产党的奴役。而目前的问题是，我们遭受奴役的威胁是这么严重，但是否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致于我们必须采取毁灭城市和屠杀妇女、儿童的行动。

我只能假定麦克阿瑟将军是作这样想法的，而那些希望他的计划见诸实现的人也是作这样想法的。在我们轰炸满洲基地以后，

共产党中国投入全面战争不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俄国也会行动起来。

然而麦克阿瑟的一再声明使国外很多人士相信我们的政府会改变政策。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混乱的情况继续下去。因此在12月5日我向政府所有机构发布了一项命令说，“在接到我的进一步的书面通知以前，不得未经国务院许可发表有关外交政策的演说，新闻电讯或其他公开的声明。”第二个通知警告，“驻外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在内，对公开声明必须极端审慎，只可以发布和本部门有关的例行声明，避免直接透露有关军事和外交政策的消息给美国国内的报纸，杂志和其他宣传机构。”

几个月以前曾经有过一个高级官员冒失地谈论外交政策。那件事发生在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在8月25日发表演说的时候。马修斯先生在波士顿发表谈话说，我们应该打“预防战”。我一直是反对这种战争的，甚至不愿意想到它。再没有比以战争制止战争的想法更愚蠢了。除了用和平以外，用战争什么也制止不了。

自然马修斯先生是受了海军上将们以及其他高级海军官员们的包围，而他在对付这一类型人物方面又没有很多经验。他告诉我，他听到他们之中那么多的人在谈论“预防战”，而他也就重复了这句话，没想到竟使他离开了我的政策这么远。在我请他来谈，并向他解释，我之所以不让我的政府中的成员在国内到处宣扬和政府的正式政策完全相反的看法的时候，他十分后悔，并且感到非常遗憾。

麦克阿瑟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他在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公报中，有时暗示，有时直说，如果他的建议被采纳，那么朝鲜方面就会万事大吉。

第一，他自然是错了。如果当时或后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如果

我們放手干去，轰炸了滿洲的基地，那我們就已經公开和紅色中国作战了，甚至和俄国公开作战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已經爆发了。

第二，麦克阿瑟將軍自己就曾說过中国干涉的危險不存在。在威克島，他曾經肯定地告訴我說，他沒有发现任何大規模干涉的威胁即将到来的迹象。更重要的是，他曾經告訴我說，如果中国共产党果真进入朝鮮，他能够很容易地对付他們。他曾經說如果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企图夺回平壤，那他們簡直是自投死路。

甚至在他发动那 11 月 24 日的倒霉攻势以前，他仍然以那么一切都不成問題的口气說話。但是一旦事情不是那样的时候，他就向全世界宣告，他本来是可以打胜仗的，只是我們不让他照他的办法干下去。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我們根据什么理由制定的我們的政策，我們全部告訴过麦克阿瑟將軍。他曾經告訴很多到过东京，訪問他的办事处的人們包括哈里曼，并且在威克島他也告訴过我，这些理由他了解，不过他不以为然。自然，每一个少尉最了解他那一排應該作些什么；只要上級和他的看法不同，他总认为上級根本是瞎子。但是麦克阿瑟將軍一定会——也是應該这样的——把向記者发表不同意見的少尉提交軍事法庭問罪。

我当时就應該将麦克阿瑟將軍免职。我沒有这样作的原因是不願意使外界以为他之所以被免职，是因为攻势失敗。我一向认为不應該落井投石，因此現在我也不打算这样作。我也不願意譴責这位將軍，但是應該告訴他，他所发表的那种公开声明是违反紀律的。

以上就是 12 月 5 日命令的背景。

在那个时候，麦克阿瑟將軍和国防部几个部长之間又发生了意見分歧。11 月 28 日，麦克阿瑟將軍报告說，他正在按照給他的

指示改攻势计划为防守计划。在报告改变计划的电报中，他声称，“我们正面对一次完全新的战争。……”他的电报说，“形势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势，这种局势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而不再是本战区司令份内所能决定的了。本司令部，已在它职权范围之内，作了人力所能作的一切。但是目前所面对的局势却超出了它的力量和控制。”

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一项建议，要我们回转过接受六个月前蒋介石提出的，要撤给朝鲜三万三千名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建议。当时他自己就建议不用这些军队。自然，他现在的建议是和他认为朝鲜行动已成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的看法相一致的。经过一次有国务院和国防部参加的冗长的会议之后，我训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促使麦克阿瑟注意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11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如下的电文：

“你的建议我们已在考虑。这个建议的后果牵涉到全世界。我们必须考虑到在联合国内和我们合作的，各国的团结一致的关系遭到分裂的可能性，而使我们的陷于孤立。大英联邦国家可能完全不愿意他们的部队和国民党中国在一起作战。敌对行动也可能因此扩大到福摩萨和其他地区。附带提一提，我们的远东领导地位在联合国内已受到很严重的损害。应当极端审慎，避免使这个组织内的主要联合阵线陷于分裂。”

自然，朝鲜的局势是我的办公室内很多次冗长的、焦急的讨论题目。我们的政策，不仅是在亚洲，在欧洲也是这样，真是危如累卵，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寻求我们面前的巨大问题的答案，而不仅仅是为麦克阿瑟将军的不够谨慎而操心。

在11月28日，当来自朝鲜的坏消息从谣传进行抵抗到证实失败，我召开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关于我们部队遭受中国人打击，以及损失的情况，我最先是在那一天的六点十五

分，布萊德雷將軍從電話里告訴我麥克阿瑟將軍的一份電報才知道的。布萊德雷將軍和三軍的參謀長前天整日開會，研究局勢，他們認為局勢雖然嚴重，但懷疑是不是嚴重到像我們報紙所要我們相信的那樣——災難性的失敗。

然而，布萊德雷將軍強調如果共產黨決定使用他們的空軍可能引起的危險。根據我們的情報，在滿洲邊境的幾個機場上至少有三百架轟炸機。這些轟炸機，無論是截擊我方空運，或者突然襲擊我們擁擠在朝鮮機場上的飛機，都會使我們受到嚴重的損失。即使是這樣，布萊德雷將軍說，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不應授權麥克阿瑟將軍轟炸滿洲機場。

我問是不是有辦法減輕中國共產黨突然空襲可能給我們造成的損失，范登堡將軍說除非把我們的飛機調回日本沒有別的办法。這樣，我們的軍事行動自然就要慢得多了。

我征詢國防部長馬歇爾對時局的看法，而他報告說由於朝鮮局勢的發展，陸海空軍三個部的部長們也曾整日開會討論。他們曾經談到局勢的發展對人員徵集和物資供應所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次追加軍事預算已經擬好了，按照馬歇爾那一天早上向我表示的意見，這個預算應立刻轉送給國會。因此我能夠在會上宣布，這事我已經指示預算局局長照辦了。

馬歇爾將軍接着談到了外交方面的形勢，他說美國必須和聯合國採取一致行動來解決朝鮮問題，儘管和聯合國採取一致行動對我們會有一些困難。他說他覺得我們同聯合國步調一致很重要。他強調這麼一點，他說陸、海、空軍部部長也同意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不論我們是單獨的，或者是和聯合國一起，我們都不應卷入和中國的一場大戰。馬歇爾說，他認為聯合國大概不至於要我們陷入這樣進退維谷的境地。但是他認為我們應該承認，國內倒有一些人主張採取全面行動反對中國。

布莱德雷說这也反映了參謀长联席會議的看法。如果我們让自己卷入对中国的一場大战，那么我們在欧洲的兵力就不可能繼續壮大。佩斯部长补充說，与会的每人都應該了解現在国内能拿出去的只有第八十二空运师，而已征入联邦軍队的国民軍在3月中旬以前还不能投入战斗。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談到这里，副总统巴克莱插进了一句。副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會議上是不常发言的，这表明了和他每日相处的參議員們对此事的忧虑和关心。巴克莱希望知道的是，麦克阿瑟將軍是否真的发表过“士兵們圣诞节可以回家了”的声明，巴克莱并且說，这似乎无法使人相信。他問：麦克阿瑟是不是了解当时的情况？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怎么可能犯这样冒失的錯誤？

罗維特副部长和佩斯部长解釋說：麦克阿瑟“正式地”否认說过这样的話，但是毫無疑問他是說过的。佩斯部长在威克島听他說过类似的話，布莱德雷也听到过，罗維特說，有一份速記的副本可資查考。麦克阿瑟曾經声明，他的話被“曲解”了；布莱德雷为麦克阿瑟辯解說，他认为这个声明原是說給中国共产党听的，向他們表示我們在朝鮮並沒有长远的打算，也不打算繼續战争。

巴克莱仍然很激憤。他感慨地說，“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告訴他說，不管我們对这个声明怎么个看法，我們都應該很慎重，不要拆將軍的台。我們实在不应打击麦克阿瑟的威信。但是巴克莱仍然感到非常不安。

随后我們討論到麦克阿瑟可能需要补充多少兵員，而我們可能补充給他多少。柯林斯將軍說他认为在朝鮮有一道防綫可以守住。在东边的第十兵团处境很危險，但是也許可以撤回到安全地帶。

我要求迪安·艾奇逊，就从他的角度談一談他对时局的看法。这位国务卿在开始时說，过去几小时的事件已經把我們推到大战

的边沿。自然，过去我们就常发现有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的迹象，不过现在我们碰到了公开的，强有力的攻势。他说我们必须记住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的每一行动都有苏联在后面支持，我们不得不把所有发生在朝鲜的事看作世界性的事件。我们不应忽视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面对着苏联这个事实。

艾奇逊继续说，自然，如果我们公开控诉苏联侵略，联合国就会解体。如果我们站出来，指摘苏联，那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提出控诉而又无可奈何，那只会削弱我们在世界的地位。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建议对克里姆林宫采取行动，我们可能找不到同盟者，而陷于孤立。

至于中国共产党，艾奇逊继续说，我们必须划出一条界限，不要这边走走，那边走走。否认他们和我们作战，那是无用的，因此我们最好也给他们捣点麻烦。除了和蒋介石搭演以外，有的是办法。

至于朝鲜冲突，国务卿的意见是，我们应该设法结束它。如果我们进入满洲，并且轰炸那边的飞机场。即使捞到点便宜，那“俄国可有借口加入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整个意图就是指望能把俄国围困住，而在他们企图突围的时候，我们成功地把他们打了回去。如果我们现在让他们把我们引入他们的圈套里面，我们就要冒被陷入无底洞的危险。这种战事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它会把我们的血放干。俄国人曾经一而再地引诱我们进入他们的圈套。这一次不同于以前各次的是，圈套更大些罢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阿弗里尔·哈里曼说，我们应该严密地注意自由世界的反应。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为了证实这一点，应该迅速任命一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总司令。如果自由国家能够肯定我们是不会背弃他们的，他们也就会靠攏我们。

我说道，只要我们有些报纸不是那样热衷于寻找反证的话，要

使自由世界相信是比較容易的。我說，我們的三家大出版商正在使我們的人心离散，并且引导世界人民以为美国人民对自己的政府都沒有信心。我們的很多報紙竞相造謠中伤，歪曲事实，这正是苏联最大的一笔財產。

我告訴国家安全委員會說，我最初曾想我應該到国会里去，对特別會議作一次演說，但是現在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朝鮮是联合国的事情，我国不应单独采取行动。

在这次會議休会以后，接着內閣就开会，朝鮮問題又提出討論。布萊德雷將軍和迪安·艾奇遜对內閣閣員們簡短地介紹了朝鮮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况，我們再次討論到最近政治活动中輕率的攻击和造謠生事給我国的国际地位所造成的損失。

在以后的几天里面，为了重新审查我們的計劃，并准备要采取的下一步驟，我們作了很多艰苦的工作。源源而来的政府高級官員占去了我接待临时來訪的时间。在11月30日，星期三，举行的記者招待会上，我发表了一項旨在表示我們的关切和我們的决心的公开声明。

这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如下：“朝鮮最近形势的发展使世界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已經自滿洲派遣他們的部队到朝鮮，对在北朝鮮的联合国部队进行一次强烈的、組織得很好的进攻。虽然經過长期的、认真的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相信联合国或美国絕沒有侵略中国的企图，他們还是这样作了。由于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間的历史友誼，一想到中国人竟被迫和我們在联合国指揮下的部队作战，不免使我們不寒而慄。

“中国人使用了大量的軍队對我們进攻，而这种进攻仍然在繼續进行。結果联合国部队大部分被迫撤退。目前，戰場上的情况是不稳定的。我們可能要节节敗退，就像我們前次所遭受的失敗一样。但是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們在朝鮮的使命。

“联合国派遣部队到朝鲜去是要扑灭一场侵略战争，它不仅威胁了联合国的整个组织，而且也威胁了人类对和平和正义的希望。如果联合国向侵略力量屈服，没有一个国家会有安全和保证。如果侵略行动在朝鲜得逞，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从亚洲，欧洲一直蔓延到这个半球来。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生存而在朝鲜作战。

“通过联合国，我们已经献身给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的事业。我们坚决地为这种事业而奋斗。

“我们将从三方面来应付新的局势。我们将继续通过联合国，以协调一致的行动来阻止这次对朝鲜的侵略。我们将加倍努力，帮助其他自由国家加强他们的防务，以应付其他地区的侵略威胁。我们将迅速地加强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联合国里面，第一步是由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来阻止这次侵略。华伦·奥斯汀大使正在敦促采取这一行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联合国对朝鲜局势施加全部压力。

“有些人曾经希望通过联合国所提供的正当的、和平的途径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在成功湖的代表，顺利地进行讨论和谈判。然而，看不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愿意进行这种讨论和谈判的表示。他们避而不谈实际问题，却仿效苏联代表为了阻止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所采取的惯技，进行猛烈抨击，假话连篇。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将不再被迫或被诱来为俄国的亚洲殖民政策的目的服务。我确信，如果现在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地为自己讲话，他们将谴责这次反对联合国的侵略行为。

“在朝鲜的新侵略行动只是对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的全世界性威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必要，以非常快的速度增加自由国家的联合军事力量。我们认为比以前任何时期更有必要立刻在欧洲建立起一支由最高司令部指挥的联合部队。

“关于我們自己的防务，为了扩充我們武装部队的規模和提高效率的迫切需要，我将提出追加撥款的請求，這項請求除了包括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大量軍費外，还要撥給原子能委员会的一大筆款項。

“我准备在明天和国会的領袖們会談，要求他們对这几項新的撥款給予紧急的考虑。

“这是所有我們的公民把分歧的意見擱在一边，紧密团結，互相支持，为我們的国家和全世界的自由事业尽最大努力的时候。我們的国家是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希望之楔石。我們必須表示我們是在共同目标和共同信仰的指导下一致行动。”

第二天，12月1日十一点，国会的領袖們在内閣會議室和我会晤。参議院出席的，除了副总统外，还有麦克拉、康納利、卢卡斯、泰丁斯、魯塞尔、犹他州的托馬斯、惠里、布里奇斯、葛尼和維利；众議院出席的有議長，和众議員麦考馬克、文森、理查茲、坎农、馬洪、泰伯、伊頓、肖特、哈勒克和艾伦茲。和我一起出席的政府官員有艾奇逊、馬歇尔、罗維特、布莱德雷、哈里曼、預算局的劳頓、比德耳·史密斯、索尔斯海軍上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詹姆斯·累伊。

布莱德雷將軍对国会議員們就朝鮮的最近軍事局势作了全面的报告，我請他們向这位將軍提出了問題。参議員康納利、参議員葛尼、参議員維利和参議員布里奇斯領先相繼提出以下問題：在朝鮮有多少飞机？从这里到朝鮮有多少路程等等。然后参議員惠里希望知道为什么我們的情报机构沒有估計到这次攻击的发生，布莱德雷怎么解释他也不滿意。他的情緒抵触，态度魯莽。

史密斯將軍于是攤开一幅苏联和它的卫星国以及邻近地区的大地图。他指出朝鮮事件和欧洲事件怎么联結在一起。俄国人刚刚举行了一次有五十万人以上参加的、大規模的演习。他們集中作了渡河和空运的演习。俄国人最近还整頓了他們的西伯利亚部

队，統一了他們的指揮。这对他們來說是不平常的，值得注意的事件。

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接着提出一些数字來說明俄国和它的卫星国的人力以及这几个国家部队的訓練和装备情况。除了惠里以外，所有的国會議員們看得出是很受感动的。这位內布拉斯加州的參議員，滿臉的怀疑和不相信，希望知道史密斯怎么得到这些情报的。他是否使用了所有的情报来源？都是哪些来源？史密斯非常委婉地把这些問題叉开了，但是当他一談到朝鮮和中国，惠里又是件件都要寻根究底。

在这种交換問題和情报中，時間过得很快，我只好請史密斯將軍結束他的报告，以便我好和与会者讲几句话。我指出自6月以来，在国防上我們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着。为了加强武装部队的力量，我們已經作了很多事；过去追加过一次軍事撥款，現在我还要提出另一次追加軍事撥款的要求。这是在中国干涉以前作出的預算，毫無疑問，由于朝鮮发生的事件，我們的時間表必須重新修訂。

于是我向与会的人宣讀了我准备送交国会的咨文摘要，并且把要求追加的撥款数目告訴了他們，附带声明我和我的政府成員准备回答任何人对撥款要求提出的任何問題。但是我希望強調一点，如果这些新款項在目前紧急的国际局势之下對我們还有些用处的話，迅速撥給是重要的。

我說我們的全部努力是旨在阻止朝鮮事件扩大为一次大規模的亚洲战争。我們不打算承担大規模战争的負擔，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不願意参加千百万无辜者的大屠杀；如果战火任其蔓延，大量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朝鮮的局势並沒有任何好轉。12月3日，麦克阿瑟报告如下：

“麦克阿瑟致參謀长联席會議，

“第十兵团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撤到咸兴地区。第八軍的情况愈来愈危急。沃克將軍报告說平壤地区守不住了，敌人一旦施加以压力，沒有疑問，他将被迫撤到汉城地区。我同意他的估計。企图把第八軍和第十兵团的兵力会合在一起，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因而产生任何好处。这两支部队在数量上都处于絕對劣势，他們的会合不但不能加强实力，实际上反而削弱了由于两条分开 的海上补給和調度的后勤路綫所带来的自由活动的便利。

“正如我以前所报告的，因为考虑到設防地区的辽阔：防綫的两部分必須就近从每个地区的海口取得供应，防綫又被从北到南的、崎嶇的山岳地带分割成两个区域，我們的兵力就显得单薄，所以攔腰在朝鮮建立的一道防綫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条防綫从空間計算大約是一百二十英里，从地面計算大約是一百五十英里。如果把我所指揮的七个美国师布置在这条防綫上，那就是說一个师将不得不担負起防守一条长约二十英里的前綫。而其所对付的敌人在数量上占有絕對的优势，在山地里敌人夜間滲入具有很大的威胁可能性。这样的防綫如果沒有纵深的后方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而且从防御的观念来看，这样的防綫必然招致敌人的滲入，結果是被包围歼灭或是被各个击破。对付比較弱的北朝鮮部队这样的战略思想是可行的，但是对付中国陸軍的全部力量就不行了。

“我不相信由于中国陸軍公开地进入战斗所造成的根本变化已为人們所全部理解。估計已經有二十六个师兵力的中国部队投入了第一綫战斗，另外在敌人后方，至少有二十万人，北朝鮮的殘余部队也正在后方休整，自然，在所有这些后面，还有共产党中国全部潜在的軍事力量。

“至于切断敌人的供应系統，山岳地带減低了我們空軍發揮配合的效能，而对敌人的分散战术却很有利。加上目前国际界綫的

限制，这就大大地减低了我們空軍优势可能产生的正常效果。

“由于敌人集中在內陆，因而大大减低了海軍可能發揮的威力；两栖活动不再可能，而有效地使用海軍炮火配合作战也受到了限制。

“因此，我們各个兵种的联合作战的力量大为减低，而双方的力量对比愈来愈决定于地面部队战斗力的对比。

“因此，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最大数量的地面部队的增援，本軍不是被迫节节后退，抵抗力量不断削弱；就是被迫困守在滩头堡陣地里，这样做，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延长抵抗時間，但除了防衛外，沒有任何希望。

“这支小小的軍队，在目前的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消耗，以致最后全軍覆沒，那是可以預期的。

“截至目前为止，本軍还是表现了旺盛的士气和显著的效率，虽然本軍已經进行了五个月几乎不曾間断的战斗，精神疲憊，体力耗損。目前在我們指揮下的大韓民国的部队的战斗效率是微不足道的，作为警察和保安部队使用，他們还有一定的用处。其他国家的陸軍分遣队，不管其战斗效率如何，兵力微少，只能起很小的作用。在我指揮的各个美国师，除了海軍陆战队第一师以外，現在大約都缺額五千人，这几个师从来就沒有补足到規定的名額。中国部队是新投入战斗的，組織完善，訓練和装备都很优良，很明显他們是正处在斗志高昂的状态。此間对局势的全面估計认为必須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这个問題：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軍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我所执行的指示原以北朝鮮部队为对手；由于新事件的发生这个指示已經完全过时了。必須清楚地了解这样的事实：我們比

較小的部隊現在面對的是由蘇聯大量供應物資所加強了的共產黨中國的全面攻勢。以前那麼成功地用來指導和北朝鮮陸軍作戰的戰略思想，現在繼續用來對付這樣的強國可就不行了。這就需要重新制訂可行的，足以應付有關現實問題的政治決定和戰略計劃。在這一方面，時間是重要的，因為每一小時敵人的力量都在增長，而我們的力量却在削弱。

“1950年12月3日”

我批准由參謀長聯席會議立即給麥克阿瑟回一封電報。我所採取的立場是，我們絕不應該犧牲人。在聯合國決定支持大規模的行動之前，似乎最好把我們的兵力集中到我們能夠防守的一些灘頭堡里。

“我們認為目前應該主要考慮保全你的實力。同意將部隊集結在幾個灘頭堡里。”

同時，我指派柯林斯將軍立刻飛赴東京，從那里、從朝鮮收獲最近情況。在11月30日我收到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的一封信，他問他是否可以到華盛頓來，親自和我討論我們應該怎麼對付朝鮮事件，以及我們今後可能採取的行動。

第二十五章

艾德礼首相在华盛顿

联合国成员国中，最先参加我们在朝鲜行动的是联合王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虽然共产党在马来亚的活动对英国的人力是一个严重的消耗，这几个国家还是参加了。但是，英国人对于冲突可能扩大，还可能把苏联拖了进来的危险表示非常担心。

当我们的空军8月初轰炸北朝鲜的港口罗津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种担心的一些征象来。这座城市不折不扣是一个军事目标，因为重要的化学和军火工厂都在那里。但是它离苏联边境只有十七英里，而国外和我们的国务院里都有些人顾虑俄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次轰炸是以他们为目标的。

在最初发现中国干涉的迹象，接着麦克阿瑟要求授权对来自满洲基地的攻击他的部队的空袭给予回击之后，国务院曾经征求英国及其他有部队在朝鲜的国家的意见，以便了解他们的反应。不仅是英国，所有的国家都强烈地反对。

在11月15日收到一份来自北平的，极密的电报之后，我们的盟国更明白地表示了他们的焦虑。电报称，一位驻北平的俄国高级外交人员说过如果满洲的机场受到联合国飞机的轰炸，苏联空军将坚决回击。

中国人阻止麦克阿瑟进攻的大规模反击，对国外的人可能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为震惊。外国报纸引用我们一些参议员剑拔弩张的谈话，并提到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加掩饰的不满为根据而对美国的反应公开地进行猜测。有人竟然这样公开推测，

我們將不顧聯合國的反對，而直接投入對中國的戰爭，甚至對任何國家作戰，只要這個國家站在中国一邊。

自然，大戰的可能性對剛剛從上次大戰的廢墟中恢復過來的巴黎和倫敦的居民來說，是比他們的城市未曾受到破壞的大部分的美國人民可怕得多。歐洲人一般都認為新戰爭將是一場原子武器的戰爭，一提到原子彈他們就要發抖。自然，我們絕不應忘記，保衛歐洲是我們所承擔的嚴肅義務，這一決心還有待美國向歐洲人提出保證。由於報紙似乎經常就只喜歡報道壞消息，大多數的歐洲人只聽到有人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反對派遣軍隊到歐洲去，甚至反對給予他們任何其他東西，而這些東西他們認為在他們受到攻擊時可能對他們有幫助。

全世界變得多么的敏感、緊張，只要看我在11月30日新聞記者招待會上提到“原子彈”這幾個字時的反應就明白了。

在那次招待會上我說，“正如我們往常一樣，我們將採取任何必要的步驟，以應付軍事局勢”。

“那是不是包括原子彈？”一個記者問。

“包括我們所有的各種武器，”我回答。

發問者急忙追問道，“總統先生，您說‘我們所有的各種武器’是不是說正在積極考慮使用原子彈？”我告訴他，“我們一直在積極地考慮使用它。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到它。它是一種可怕的武器，不應該用來對付無辜的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和軍事侵略無關。可是原子彈一經使用，這種情況就無法避免了。”

為了使我的話確切不至於為人誤解，我授權我的新聞秘書查爾斯·羅斯在記者招待會後，另外發表一項旨在澄清視聽的聲明：

“總統希望，”這個聲明說，“他今天在記者招待會上關於使用原子彈所作的回答肯定不至於引起誤解。自然，自從朝鮮的敵對行為爆發以來，我們就在考慮這個問題；這種考慮就跟我們的部隊

在作战的时候考虑使用所有的武器一样。

“考虑使用任何武器也就暗示掌握有那种武器。

“然而，应该着重指出，按照法律，只有总统有权批准使用原子弹，而直至现在还没有发布这种命令。如果到了该发布这种命令的时候，他将授权战区军事司令官负责战术上投送这种武器的任务。

“总之，今天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问题所作的回答，并不表示上述情况有任何的改变。”

虽然作了这样的保证，使用原子弹仍然要由我批准，而我还没有作出这样的批准，新闻报道却坚持说我威胁要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在伦敦，一百名工党议员联名写信给首相艾德礼，抗议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在一次我们的大使称之为“自1945年工党执政以来，在下院进行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当中，这是最严重、最焦急、最负责的一次”，不仅是安奈林·比万的追随者，而且还有丘吉尔，艾登和巴特勒都表示了“忧虑”，他们普遍地表示希望得到朝鲜事件不至于把全世界搅进一场大战的保证。保守党的领袖巴特勒的论调恐怕是最典型的了，他说“全体英国人民都希望得到保证，在他们的命运（由于战争扩展到中国）被决定之前，还是让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下院结束这场辩论的时候，艾德礼宣布说他准备飞到这里来和我进行会谈，因而大大地减轻了紧张状态，他的声明引起了下院两方面的议员的欢呼。任何人读到这次辩论的记录都不可能不看到英国忧虑重重的这样一个事实。

12月4日克莱蒙特·艾德礼来到华盛顿，我们在当天下午四时到五时三十五分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会谈开始时，我致了短短的欢迎词，然后就请布莱德雷将军概括地讲讲朝鲜的军事局势。艾德礼问到朝鲜的空间控制，布莱德

雷向他保证說，这方面到現在为止沒有問題，我們有五艘航空母艦和七個良好的朝鮮機場供我們作戰時使用。

國防部長馬歇爾指出，了解以下的情况是重要的：敵人是在不顧一切損失的情况下使用人力，同时由于他們是在沒有卡車，沒有機械化装备之下作战，他們的行动就比我們的容易隱蔽得多。

我說我們所面临的局勢要求我們作出非常严重的軍事決定，但是作出政治決定也不是沒有困难的。然而，我表示希望我們能够开誠布公地进行自由討論。我說我們在東方和西方都負有义务，但并不打算偏廢哪一方面，虽然兼顧所有的义务可能会有些困难。我表示相信我們應該首先討論中国共产党干涉的問題，并且征求艾德礼的意見。

艾德礼首先說到維護联合国的权力和威信是重要的。他指出美国是維護联合国的主要支柱，联合王国正在尽一切可能給予支援。但是联合王国在最近几个月內将不可能增派軍隊到朝鮮去。根据布萊德雷的报告来看，艾德礼說，他了解到危机可能到来得更快。

这位首相說，联合国的意見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国家的意見都應該加以考虑。在这一时期，他一直和亚洲方面的英联邦的成員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还建議我們也應該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問題。他們正因为胜利而洋洋得意，他們既不是联合国的一分子，絕不会願意按照联合国所宣布的原則来解决問題。他們希望試試他們的力量，試試独立的感觉。因此，即使俄国人想結束战争，也不見得就能說服毛泽东。

艾德礼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共产党可能要在什么价錢之下才肯停火？有这么一种危險，如果我們表示妥協，价錢就可能上涨。而他認為我們應該討論討論，我們准备搞到什么地步，我們打算談判哪些問題，什么地方我們應該坚持。他說不管我們达成什么样

的決議，總不免不合一些人的口味，但是我們應該記住西方是不能棄置不顧的，西方仍然是我們反對共產主義陣綫的主要據點。

關於首相提到的問題我要求國務卿艾奇遜談談我們的立場。國務卿指出，首先必須記住我們的主要敵人不是中國而是蘇聯。朝鮮行動完全出自莫斯科的唆使。毫無疑問，中國人和俄國人之間有過一些安排，因此中國人相信他們有強大的俄國作為後盾。在他們的進攻很順利的时候，他們要作的事情似乎不大有止境，如果他們能夠把我們趕出朝鮮，他們一定會這樣作的。沒有人能夠估計他們的野心要發展到什麼地步。

至於全面進攻中國問題——包括陸、海、空軍的行動——艾奇遜向與會的英國人保證說，“慫恿總統採取這條路綫的顧問並不多”。然而，他又說，他認為和中國共產黨進行談判的前景未可樂觀。在進行談判和卷入戰爭之間我們沒有選擇的余地。事實上，目前我們已經被卷了進去。

艾奇遜分析了談判的問題。從軍事上着眼，他認為儘快地得到停戰對我們似乎是有利的。但是，對我方有利的，自然就意味着對中國人不利，因此他們很可能不願意接受。從政治觀點來看，考慮到世界各方面的意見，建議停戰會有些好處；但是如果舉行了談判，對方要什麼價錢的問題就會產生。似乎可以斷定中國共產黨會要求承認他們的政府，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席位，要求在福摩薩問題上的讓步。他們甚至會堅持有關和平解決日本的任何問題都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

國務卿繼續說，我們必須記住這次對朝鮮的干涉不是一種自發的軍事行動。它是有預謀的。如果我們被糾纏在亞洲，俄國就會在歐洲放手干起來。但是如果我們和共產黨，譬如說以福摩薩為代價解決了爭端，那麼整個亞洲就會以這個事實為例，群起反對我們。他說他不相信中國的行動只是中國軍事狂的爆發，或者我

們把福摩薩給他們，或者作其他的让步，他們就會變得又安靜又和平。相反的，如果我們讓了步，他們只會更加得寸進尺。如果我們對中國共產黨屈服，對日本人和菲律賓人的影響將是嚴重的。如果我們不進行談判，也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再在朝鮮打下去，尽可能的給中國人以更多的懲罰，而我們的情況也不至於更糟。他認為，我們應該把不承認敵人的占有作為我們的政策。

說到這裡，艾德禮首相問，對中國共產黨起騷擾作用，而對我們又不至於有太大損失的灘頭堡，可能守多長的時間。布萊德雷將軍和馬歇爾部長都回答說，東面的灘頭堡可能守不住，但是西面以仁川和釜山為根據地的灘頭堡可能堅守一些時候，尤其是如果可能把從東面撤出的部隊增援這一地區的話。

首相問，如果我們在繼續遭受損失的情況下繼續堅守灘頭堡的話，美國公眾會有什麼反應。會不會要求對中國進行全面戰爭？

我回答說，這種要求現在就可以聽到。我們正在付出巨大的犧牲，並且已經撥付了大量的款項。我希望我們能夠守住朝鮮的戰綫，直到談判的機會因局勢的進展而有所改善。我承認所有我的軍事顧問都告訴我沒有可能守住這條戰綫。但是我仍然希望試一試。

艾德禮談到，對於中國共產黨是克里姆林宮的衛星的情況，有不同的意見。

我說依我看中國共產黨就是俄國的衛星。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整個模型的一部分。在朝鮮之後，接着就是印度支那，然后是香港，然后是馬來亞。我說我不希望和中國或任何國家作戰，但是，照我看來，局勢是很黯淡的。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已經下定決心要爭取到一些東西，包括聯合國的席位和福摩薩，不然就不惜一戰。

艾奇遜說，中國共產黨是不是衛星，實際上沒有多大關係。不管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他們很可能都要採取同樣的行動。但

是，他认为如果指望着他們发善心，那将是錯誤的。他說在国务院的官員中有一种說法：你不能指望共产党政权发善心；他們每天晚上都要結賬的。

馬歇尔將軍回顧他到中国担任特使时，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几次會見。他說周恩来有一次在餐桌上非常郑重地告訴馬歇尔夫人說，毫無疑問他們是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而对于人們仅仅把他們說成土地改革者表示不滿。馬歇尔說他們毫不企图掩飾他們和莫斯科的亲密关系。他們认为俄国人是和他們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而且把这种感情透彻地灌輸到他們的部队里去。

我告訴艾德礼說，我认为馬歇尔將軍的判断是可靠的，尤其是因为他和这些人有过一年的紧密接触。我还要对艾奇逊所談到的我們避免和中国作战的願望再加以強調。因此我詳細敘述了我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島會談的經過，特別指出我曾告訴麦克阿瑟避免在滿洲对中国，在海參威对俄国进行挑衅；我还說我們本不願意参加这次行动，只因为我們是联合国的會員国。

接着我給首相宣讀了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拟定的并經我批准的备忘录：

“（一）在最近的情况下，假定提出的条件不是太难于接受的話，要是能够設法停火，在軍事上将是有利的。这可以保证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停火的安排不得附带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問題上达成協議为条件，諸如福摩薩問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問題等。

“（二）如果停火实现了，局势因而可能稳定，联合国應該繼續使大韓民国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得到稳定，同时繼續努力通过政治途徑寻求朝鮮的独立和統一。

“（三）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絕停火，并驅使主力向三八綫以南

移动，联合国部队势将被迫自朝鲜撤退。自动放弃我们盟友朝鲜的结果将是这样的，即任何联合国的撤退必须完完全全出于军事的必要。”

念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再一次着重地指出我们自动撤出将不成问题。所有被我们撤下、曾经效忠于联合国的朝鲜人将面对死亡。共产党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把这一点讲清楚了，我又继续念下去：

“（四）如果出现前面一段所说的情况，联合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并应运用一切可用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对北平施加压力，并声明联合国绝不承认侵略的决心。此外，还可能采取不断骚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也可能下点工夫，鼓励中国内部的反共活动，包括利用国民党的潜在力量。

“除了上述办法以外，美国和联合王国应立即商量采取其他步骤，用以加强非共产党的亚洲。这些步骤将包括：

“（甲）使日本恢复相当的自治，加速努力达成对日和约，加强日本自卫的能力；更有效地利用它的生产能力，以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并尽速使日本加入国际组织。联合王国对以上三点不愿意采取行动，在新的危急的情况下，只有被淘汰。

“（乙）在能够互相有效支援的东南亚国家之间作些适当的军事安排。

“（丙）加倍努力使非共产党亚洲认识到亚洲所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并促使有关的政府相信对付共产党在那一地区的侵略，亚洲人必须采取协调的行动。

“（丁）加强经济和军事援助，对组织起来抵抗共产党侵略的行动予以鼓励。

“(戊) 加强反对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心理的和隐蔽的活动以及在亚洲的活动。”

談到最后兩項時，我說我曾經考慮到在東南亞也搞一個類似馬歇爾計劃的東西。經濟合作總署已經在這個地區作了不少很好的工作。為了穩定菲律賓的局勢，正在考慮一項特別計劃，我表示希望這個計劃能夠很快地得到國會的批准。我說，這一類計劃應該加以考慮和討論。

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奧利佛·弗蘭克斯爵士接着巧妙地總結了我們討論過的問題。在同意給記者發表的一項簡短的聲明以後，就暫告休會。

第二次會議是在第二天，即1950年12月5日，在總統游艇《威廉斯堡號》上舉行的。在午餐以後（有幾位國會領袖也在座），昨日下午參加會談的幾個人再度集會。新聞秘書查爾斯·羅斯，我的老朋友，也在座。這可以說是他最後一次執行公務。當天傍晚，當查爾斯還坐在辦公桌旁的時候，心臟病突然發作而死。我們從中學時代就是朋友，他的去世，使我如失近親，感到非常悲痛。

12月5日，《威廉斯堡號》上會談的前一段時間，主要是討論提交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全文。當這件事的次要分歧消除以後我談到：朝鮮的軍事局勢是我深為關心，也是我最最焦急的事。

我又說我已經決定我們將不撤出，萬一我們撤了出來，那一定是被迫撤出的。我們肯定不能不認朋友，因為他們曾經效忠於我們。我說我了解我們正在把我們的艦隊、我們的空軍暴露給來自滿洲的突然襲擊。我說，“我們並不是為了挨打而參加戰鬥的。我們將為制止侵略而戰鬥到底。我不打算將朝鮮局勢的軍事指揮權拿過來——我把它交給將軍們——但是我希望搞得十分清楚，我們不能在困難的時候背棄我們的朋友。”

我談着談着，有点激动起来，但是克莱門特·艾德礼回答的时候，态度的热誠也不下于我。他說，“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我們一定支持你們。在这些滩头堡上我們將站在一起。我們能够守多久，只是看法上的問題。”

我又說，無論我們采取什么行动，但不会是自动撤出朝鮮。我坚决地說，“只要有希望不走，我就不願撤出。”

艾德礼重复說，“我可以向你們保证，我們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我們的整个計劃就是和你們站在一起。”

我感謝他所表示的态度和保证。忠于原則和朋友，忠于条約义务，是英国的态度，也是我們的态度。

艾德礼接着回到昨天討論的問題上来，首先他談到在哪些問題上他认为我們已取得了協議。他认为我們已經有过協議不要陷入和中国的大战中，并禁止轰炸中国的工业中心。然后他重新提起艾奇逊的建議，即在被迫退出以前我們應該留在朝鮮，不进行任何談判。首相对这个建議的反应是：第一，要使联合国采取任何看来是針對北平的行动，或者很可能会引起报复的行动，那将是困难的。第二，他认为我們不一定能够創伤中国，而中国倒可能使我們受到很多的損害。他說，依他看来，我們要結束这次事件，不是大战一場，就是坐下来談判。

艾德礼接着提出了英国政府的看法。他的意見是，中国共产党潜在的“铁托主义”已經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不认为中国是完全控制在俄国人手里，因此我們的目标應該是分化俄国人和中国人，他們在远东是天然的敌手。

“我想，”他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設法使中国人不要认为只有俄国才是他們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国人能和俄国人散伙。我希望他們能够在远东和俄国抗衡。如果我們不接受这个見解，如果我們把中国看作苏联的卫星国，我們就上了俄国人的当了。”

国务卿艾奇逊用一个措詞很得体的問題回答了首相的看法。他問道，从长远看，美国人民会怎样想呢？他說他看不出任何一屆政府可能向美国人民提出这样的外交政策：在这一个大洋上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而同时在那一个大洋上奉行和孤立主义正相反的充滿活力的外交政策。我們不可能在太平洋方面奉行孤立主义，中国共产党干些什么都装作看不見；而同时采取强硬的，反孤立主义的立場，对付共产党在欧洲方面的威胁。

艾奇逊接着提出了另一个有力的論点：我国曾經采取相当强硬的行动，对付朝鮮方面較小的侵略。而現在我們面对的是較大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我們甚至在这个侵略者手里遭受到挫敗。如果我們忍受了这次較大的侵略，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我們对侵略的整个看法难免要受影响。要想使美国人民接受远东方面的侵略行为，而不接受欧洲方面的侵略行为，那将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国务卿并且促使我們英国客人注意一个事实：蔣介石是另外一个复杂的因素。因为蔣，不管对也罷，錯也罷，已經是一个象征。

我扼要地給艾德礼介紹了蔣介石給我們造成的一些麻煩。我指出他的朋友們，尤其是參議院里的一些人，一直在为他吵吵嚷嚷。然而，蔣介石的一切行动都显示出，他对于改善他所控制地区的情况并不感兴趣，而是希望把我們糾纏到中国大陆上去。关于這個問題，艾奇逊补充說，完全撇开蔣介石不說，福摩薩也不能淪入共产党的手里。他說當我們在朝鮮大战方酣的时候，如果让福摩薩受到攻击因而陷落的話，我們将会在日本和菲律宾造成严重的危險，而这两个地区是我們軍事活动的基地，我們整个太平洋的地位也就建立在这上面。

艾奇逊坚持我們不能討好中国共产党，我們不應該試圖证明我們比俄国人对他們还要友好。在他們對我們来这么一手之后，

依他看来，倒該由中国人向我們保证他們是“我們”的朋友。艾奇逊繼續說，我們目前的立場是，我們應該聚集軍事力量和实力，制止将来再发生这类事件。我們不得不采取以实力为基础的政策。

我表示完全同意国务卿所闡明的意見，并且补充說，必須了解到，如果沒有国内坚强的支持，美国在国外是什么也作不成的。我們不應該放弃远东。这样作美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这是不可能的。

艾德礼說，他了解我們外交政策要依靠美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但是，他又說，联合国团结一致也是很重要的。此外，我們还要使亚洲的看法一致起来——再沒有比亚洲国家背离我們更危險的事了。艾奇逊插了进来。他說，“肯定的，再沒有比削弱美国更危險的了。”

艾德礼繼續为这样的政策辯护，主要考虑怎样使亚洲国家依附于西方。他轉过来对着我說，他知道我一定会考虑公众对蔣介石和福摩薩的意見，但是他希望我也会記住無論我們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通过联合国，而在联合国里仅仅依靠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努力和表决权，那是行不通的，“尽管我們是那么重要。”

奥利佛·弗兰克斯爵士不愧为优秀的外交官，他插了进来，并把我們看来已經同意的各点概要地說了說。这样使討論又回到几个具体問題上来，第一，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席位問題是否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和他們談判的題目。

艾奇逊坚决地认为我們甚至不應該考虑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这样作，实际上是告訴共产党他們賭贏了，現在他們可以收場了；这无异給侵略者以奖励。就为了这个原因，如果不为別的，甚至共产党打胜了，并且迫使我們撤出朝鮮，艾奇逊也宁願不进行談判。

我要求馬歇尔將軍談談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这位將軍說，从軍事观点来看，他對這個問題感到非常憤慨。他說明了我們不能

把福摩薩交給敵人，而使我們一連串的前哨島嶼斷了一节的理由，这个論点得到布萊德雷的支持。

英国人然后又提出了这样的意見：也許福摩薩还可以留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而同时我們也可能承认中国大陆上的北平政权。馬歇尔將軍說，关于蔣介石最成問題的是沒有人可以代替他，很久以来，事情就“非常明显”，尽管人們强烈地反对蔣，然而还是沒有人可以继承他。

这次會議在下午四时五十分休会。

12月6日开了两次会，上午的会几乎全部是討論經濟問題。英国人到华盛顿来时，为了使他們的国防計劃能够很好地走上軌道，带来了一张他們所需要的原料清单。他們的問題是如果不出口他們簡直就不能进口，但是他們需要进口来重新武装。战后的“緊縮”迫使英国經濟削減到最最必需的物資，尤其是那些复兴国家的物資，正如艾德礼在那天上午所說的，“我們不能再削減了，我們身上已沒有什麼油水可擠了。”

有些物資是英国迫切需要的，如鋅、硫磺和棉花。艾德礼要求我們考虑这些需要，但是我們也要和他們討論是否可以建立联合机构来处理这类問題，就像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那樣机构。

我請首相放心，我的同僚們和我都重視這個問題的性质，這個問題在前一天的內閣會議上討論过。我还告訴他，已經指示內閣的成員、政府人員同英国代表們會談，我希望他們对有关原料缺乏的种种問題最好能够进行全面的討論。我希望在我們的华盛顿會談結束以前，他們会有个結果，提請批准。我宣布我已指派国家安全資源委員會主席斯图尔特·薛明頓担任美方的會談代表的主席，會談在当日下午就开始。

在我們上午的會談开始前不久，国防部副部长罗維特自五角

大樓打電話報告說，在北部边境的一些防空設施的雷达屏幕上出現大群的不明國籍的飛機向我們飛來。已經派遣戰鬥機去偵察，並已向新英格蘭和其他的空軍基地發出警報。但是，一個鐘頭以後，當我和艾德禮在開會的時候，羅維特通知我說報告是錯誤的。北極大氣團不尋常的干擾使雷达發生了誤差。

查爾斯·羅斯的葬禮就在那一天舉行，因此我們下午的會談推遲到三時半才開始。這次會議專門討論了歐洲局勢，特別是怎樣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同意建立統一的軍事機構的問題。英國急于看到這樣的安排成為現實，並且重新提出，他們的論點是：美國派軍隊駐在歐洲——即使是沒有戰鬥經驗而需要在歐洲訓練的軍隊——比任何方法更能激勵歐洲國家的努力。我們共同擬了一封致法國的信，催促他們對建立統一的歐洲防禦的建議從速採取行動。

我們12月7日的會談，重新回到遠東的局勢問題上來。艾德禮指出我們曾經同意設法避免和中國進行大戰，但是我們要在朝鮮儘可能的守下去。他認為這樣作，遲早仍然要迫使我們尋求遠東問題的解決。他希望把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攤開來。

第一，他的政府認為中國（意即共產黨中國）在聯合國內應該有個席位，首相承認這是他們和我們分歧的一點。但是他認為我們終究會發現我們要在某一個地方，某一種方式之下和中國共產黨打交道。他說，英國人認為裝做沒有看見對面有那么一個“討厭的家伙”，那是沒用的。

艾德禮還對朝鮮的有限戰爭表示懷疑。他說他能理解它所根據的理由，他肯定地認為——從道理上讲——這是應該做的事。但是困難是可以預見得到的，因為，他相信，會有許多人熱衷於全面勝利，而這就意味着要進行無限制的戰爭。

首相說，“我認為如果中國參加了聯合國，那就有可能討論了。

我知道这是不合你们口味的。但是我想如果要解决问题的话，最好是通过联合国。我倒认为，如果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在联合国之内，比起同一些人在联合国之外谈判，我们要少丢一些面子。”

艾德礼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旦中国共产党进了联合国，就有可能利用联合国的原则来对付他们。只要他们留在联合国外面，就不可能这样做。

迪安·艾奇逊回答了首相关于有限行动的问题。艾奇逊承认除非我们愿意进行全面战争，我们还可能对共产党中国有太多的损害。但是，这位国务卿说，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在远东有很大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我们扶植日本、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他认为我们在远东的政策不应受形式逻辑的支配，而应由我们行动的结果来决定。

国务卿指出，在世界的很多地区，我们都是处在苏联的压力之下的。在整个地球上，克里姆林宫似乎处处在发动反对美国的斗争。我们要从人们经常伤脑筋的一个问题：“离战争还有多久？”来寻求我们远东问题的解答。如果我们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以最大的速度向战争推进，那么在侵略者刚刚要脱缰狂奔的时候，我们给他一点甜头将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这只会削弱我们自己。这可能使侵略者得寸进尺。国务卿继续说，“照我推测，这行不通。充其量也不过争取一些时间，但是决不会有足够的时间作出什么好事来。只有足够的足够时间是使我们的人心大乱。只有足够的足够时间是削弱我们的道德力量。”

艾德礼似乎稍稍有点吃惊。他说，艾奇逊以为谈判就意味着全线后撤。他认为，福摩萨会给共产党拿走，但是也可能不会。也许我们的谈判能够只谈怎样使共产党不过朝鲜三八线。

艾奇逊回答说，他的看法是在我们确定我们的方向以前，我们不应该进行谈判。如果我们现在就停战，我们在谈判中将处于

劣勢。如果我們堅持下去，或許能夠改進我們的處境，我們就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停戰。自然，如果我們被趕出朝鮮，那也就沒有談判了，但是我們一定要達到目的。

我補充說，如果允許中國共產黨進入聯合國，美國國內將遭到可怕的分裂，而我看不出我們能夠獲得什麼，足以補償我們在公眾士氣方面的損失。如果我們讓中國赤色分子進入聯合國，他們和俄國人究竟有什麼不同呢？我說，我以為他們和其他衛星國家沒有什麼兩樣。

我提到中國赤色分子在成功湖說到我們時所用的語言和他們所散布的謊言時，我使用了我所知道的最利害的話語。我說他們對待我們的傳教士和領事的做法是人類的一個污點。除非他們改變了他們的作法，決不能讓他們進入聯合國。

羅杰·麥金斯爵士指出我們兩國政府奉行的任何政策必須是聯合國的 policy。我對這種說法很同意。麥金斯爵士繼續說，那麼我們的政策必須是在聯合國大會上能夠獲得多數擁護的政策。按照他的看法，聯合國裡面有一種很強烈的，要求談判解決的情緒。他認為，這種情緒是這麼強烈，如果我們在過去不是那麼注意，事事有關朝鮮都通過聯合國來談判解決，那麼我們今天要使其他國家和我們站在一起就會遭到真正的困難。他認為我們也許應該讓聯合國來想辦法，尋求問題的解決。

我們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腊斯克同意麥金斯爵士的看法，我們應該盡最大努力使其他國家和我們站在一起。但是他說他看不出，為了解決爭端，我們為什麼要表示友好，同意中國赤色分子坐到聯合國里來。我們曾在聯合國內多次主動地明確表示我們的和平願望，而總是遭到俄國人的拒絕。如果現在只是為了我們能夠和他們談判，而同意中國共產黨進入聯合國，那我們將是作一次大的讓步。我們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我們對於談

判的願望，因此在我們得到談判機會以前，不應該要求再作讓步。

馬歇爾將軍說，據他了解我們都同意避免和中國發生大戰。他說我們之所以同意這樣，主要是因為我們面臨着全球戰爭的威脅。既然這種威脅目前還存在，既然我們知道我們的對手幾乎是不可能和他們談判的，那么在只會暴露我們的弱點的時候和方式之下進行談判，將是非常危險的。

馬歇爾說，我們再不能丟掉福摩薩了。它在我們手中並沒有特別的战略意義，但是如果它為敵人所控制，那它就是個禍害。他說，除了保有我們的障地利用時間在各戰綫上聚集力量以外，他一時還沒有解決問題的答案。

談到這裡，我扼要地說了說開羅宣言中有关福摩薩的一些史實——這個宣言的擬定是在日本這個敵人稱霸太平洋的時候。那時我們的目的是要在太平洋建立一個對美國，對聯合王國，也有一點想到對聯合國友好的力量。我們還有個目的，宣布我們的計劃以扰乱我們的敵人。

但是，我繼續說，現在的情況改變了。我們希望建立的家——中國——不僅落入不友好者的手中，而且現在對美國抱着刻骨的敵意。

我說我們在朝鮮的態度是由于我決定給聯合國反對侵略的決議以全力的支持所引起的，而我很高興英國和我們在一起。我們行動的目的是保護一個小國免受侵略，而在我們接近成功的時候，這個對我們抱有“強烈敵意”的國家插了進來。

我說，“我們現在不能由于把福摩薩給了這個國家而使我們整個的側翼暴露無遺。我們絕不能同意這一點。我想中國人終久會認識到他們真正的朋友並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亞，他們的朋友是在倫敦和華盛頓。”

首相面無笑容地說，“如果你們一直和他們作戰，那就不会使

他們認識到這一點。”

我說，“不會，但我就不撤出朝鮮……”

“在朝鮮我是和您一起的，”艾德禮說。

接着沉默了一會。我們已經申述了我們的觀點，也了解到我們的分歧點。

然後秦德勛爵和馬歇爾將軍開始討論繼續對共產黨中國執行有限的敵對政策意味着什麼，斯陵元帥和布萊德雷將軍也參加了討論。這方面的討論進行了一會兒以後，阿弗里爾·哈里曼要求發言。他說他認為所有的人必須了解我們最關心的是自由世界的士氣。如果我們對共產主義讓步，士氣就會急劇低落。如果我們在遠東投降，那我們除了貽害歐洲以外，什麼好處也沒有。採取最激烈的方案，加強自由世界，是解脫危機的唯一的辦法。這方面可做的事就很多，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除非美國和英國在遠東方面能夠通力合作，否則北大西洋公約的事情簡直沒有採取強有力行動的希望。

我表示同意哈里曼的意見。像在前幾次會議里所作的一樣，奧利佛·弗蘭克斯爵士把話頭牽到一塊來。他強調這樣一個事實：英國人到華盛頓來不是為了堅持某一些特殊的條件，只是來要求我們考慮他們的看法和了解我們的意見。他說對於基本問題，即避免發生大戰和決定留在朝鮮，很明顯，是沒有疑問的。他認為馬歇爾將軍的等待時機的意見是很恰當的，並且說英國人到這裡來，對於作什麼樣的讓步，或者要不要讓步，都沒有既定的意見。照他看來，交談的結果使一個政府對另一個政府的意見有了更多的真正了解，而這對今後是有用和有幫助的。分歧的意見比過去是加深了，而不是在接近。

迪安·艾奇遜說他同意這種看法。

我問艾德礼是否同意休会到第二天十一点，到那时候我們可以检查我們各个专家小組的工作，并且草拟双方同意发表的公报。首相說他同意。

在当天晚上英国大使館举行的晚餐会上，我找到和艾德礼比較非正式談話的机会，我向他談到了參議院里有些人形成了一个反对集团的問題，这些人像发了瘋似的，下定决心要破坏国家的外交政策。就在那一天，二十四名參議員，全部属于共和党，联名簽署，由密苏里州的參議員克姆——我就是那一州的人——提出的，得到參議員惠里“坚决支持”的決議，要求我說明我向艾德礼承担的“秘密义务”。这些人不觉得一头栽进亚洲战争里有什么不对，但是为欧洲防务拔一根毛却不肯；他們认为英国首相不可相信，而蔣介石却不会錯。

艾德礼也談到他的工党內部也有些反对領袖，尤其是比万和他的集团。他談到他們給他造成的麻煩。只有一生消磨在政治上的人才能像我們談得那么投机——我們对很多問題的起因比我們公报所說的，也許了解得更透彻一些。

星期五的會議，原先只打算是一个形式，使我們有机会批准會談的公报。但是，柯林斯將軍恰好在那时从日本和朝鮮回来了，我請他进来，向美英双方汇报战争情况。柯林斯用大比例尺的地图向我們作了詳細的报告。他一个师，一个师的，几乎是一个团，一个团的，指出联合国部队的駐扎地点。他报告說第八軍軍长沃克將軍相信他可以守住南朝鮮，如果不需要他保卫汉城的話。柯林斯說麦克阿瑟同意这种看法，而他自己視察之后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报告說沃克將軍相信他能够无限期地守住朝鮮的大部分地区，以釜山为供应基地，在朝鮮东部的第十兵团的情况仍然很严重，但是柯林斯认为沒有疑問該兵团几乎全部可以从海路撤出。他补充說，从軍事观点来看，朝鮮的情况是严重的，但不再是危急

的了。

會議接着討論了專家們的報告，并草擬公報。后一項工作交給在場的外交專家去辦，在等他們回來的當中，我們非正式地交換了意見。

在這段間隔當中，艾德禮提到了原子彈的問題。他和我單獨地坐在一起，他問我我在最近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是否暗示，也許，我們正在更積極地考慮使用這種炸彈。我向他保證並沒有這種打算、并且將發表聲明的經過情形詳細地告訴了他。我們同意在聲明中加進一小段，使得關於原子彈的真實情況重新引起重視。

像在我們的前幾次會議一樣，奧利佛·弗蘭克斯爵士對我們是有幫助的。這位英國大使身材又高又瘦，腦筋很快，對於我們當前的問題抱着友好的態度，當我和首相正在為聲明中某一些字句作難的時候，他跪在我們中間，建議使用一些字句，而這些字句往往是被採用的。我問他如果首相的選民和他的政府看到英國大使跪在美國總統面前的照片，他們將作何感想。他跪着就有我和艾德禮坐着一樣高。隔着我書桌的寫字台面，一邊坐着我，另一邊坐着首相，他採取這種姿勢是為了工作方便。

最后的公報談到我們曾經在一起討論了我們兩個國家在國際事務方面沒有解決的問題。它重申我們兩國在外交政策上目標是一致的，即維護世界和平；尊重各國人民的權利和利益；增進世界上愛好自由的國家的力量和信心；消滅恐懼、貧窮和不滿的原因；并實現民主的生活方式。

公報也提到我們兩國目標一致是整个討論中的基調；經過討論，對於我們兩國所面對的威脅的性質，對於克服這種威脅所應採取的基本政策，雙方明確地認識到我們是沒有分歧的。我們聲明我們曾經仔細地討論了朝鮮的形勢，認為形勢非常嚴重，影響深遠，并且說我們完全同意不管是在遠東或是其他地區，絕不縱容和

鼓励侵略。持久的和平，和作为世界和平工具的联合国的未来，决定于我们对抵抗侵略的努力是否坚决予以支持。

我們声明，“在我們这一方面，我們像以往那样，准备遵循談判途徑，設法終止敌对行为。按照我們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凡是通用于威胁世界和平任何行动的国际行为的原则，也应该同样运用于目前的局势。必須作最大的努力，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联合国在朝鮮的目的，并根据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朝鮮的原则，寻求朝鮮問題的解决。我們相信联合国中的大多数国家具有同样的看法。如果中国人在他們那方面表示同样的态度，那我們維護和平事业就有了希望。如果他們不这样，那就要由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联合国，来决定怎样才能最好地維護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至于我們，我們預先声明，我們要坚决地維護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我們在公報中並沒有抹煞两国政府对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問題的有分歧看法。事实上，我們提到我們曾經对这个問題的分歧进行了討論，并且肯定这不妨碍我們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同心合作。

最后，声明談到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問題。我們注意到整个自由世界的力量，在朝鮮事件以后，更其迫切需要建立起来；如果要避免战争，必須有足够的防禦兵力。

我們宣布了如下的結論：

“（一）美国和联合王国的軍事力量要尽快地增强。

“（二）两国应该扩大武器生产，供給所有和我們联合在一起，进行共同防禦的自由国家的部队使用。美国和联合王国应该和其他自由国家一起，繼續作出共同的安排，通过这种安排所有国家将对共同防禦适当地貢獻一份力量。

“我們同意一旦建立一支精銳的、統一指揮的軍队的計劃获得批准，就应该指定一名最高司令。这个計劃目前在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里已接近完成。我們共同希望这种任命尽快确定。

“除了这些加强我們軍事力量的決定之外，我們同意維持民用經濟的健康发展对于防务努力的成敗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我們同意在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生产必須尽最大可能优先保证防务需要，同时也尽可能的滿足自由国家人民主要必需品的需要。为了获得必要的原料和尽速地将它們分配給这些优先的目的使用，我們同意保持密切合作，以增加原料的供应。我們認識到为了保证按照防务和国民的主要需要而公平地分配主要原料，必須采取国际行动。我們討論了某一些原料缺乏的迫切問題，而今后还要繼續考虑这些特殊問題。我們充分意識到越来越有必要阻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原料和物資流入那些可能用来反对自由世界的人們之手。

“鉴于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处境；我們两个国家除了用所有精力来建立我們的防卫部队以外，沒有別的选择。我們这样作，純粹是为了防卫。我們相信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如果他們願意，可以端正自己的行为，以使这些防务准备成为不必要。我們將尽我們一切可能，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徑，使他們对这种看法有个深刻的印象，并努力使目前存在的問題得到和平解决。

“总統声明他希望世界局势永远不至于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总統告訴首相說，他也希望把可能改变这种局势的情况发展随时通知首相。

“在这个危急的时期，使我們感到非常滿意的是，我們两个政府对基本問題的看法是如此接近。我們相信这种目标的一致使我們两国政府有可能貫徹共同合作的决心，以加强自由国家中已經达到的团结，以保卫那些對我們所代表的人民具有根本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

第二十六章

朝鮮的危机

1950年12月的头两星期是一个危险关头。朝鮮传来的军事消息糟糕得很。

說来真是不幸，有些人竟那么健忘。多年来一直阻撓国家执行可靠的军事政策，又要縮減一切以求收支平衡的人，如今就是叫嚷得最厉害的人。他們要求知道为什么我們沒有把現成的几师兵迅速地开去援救麦克阿瑟。有些人要求抽出我們在朝鮮的一切军队，放弃欧洲，建立起一个“美国堡垒”来。又有人要求放弃朝鮮，把力量集中在欧洲，与此同时別人則又认为我們應該在中国发动一場全面的战争，放弃我們在欧洲的陣地。甚至有少数人认为我們應該在当时挑起世界战争，有些人实际上竟說我故意惹起对外政策的危机，为的是要为自己取得更多的权力。

具有言論自由的任何制度都有这样的特点：評論家和政治煽动家的言論比支持既定政策的人的言論往往更受人欢迎。首先是因为对政策表示滿意的人沒有理由大嚷大叫；其次是因为我們传达和整理輿論的机构——报纸和电台——总是強調意見分歧的一面，而不強調一致的一面。总统絕不应受这种歪曲輿論的行为的影响。他一定要能够辨别什么是宣传，什么是人民的真正意見。这可不是一回容易的事，1950年12月这件事似乎显得特別棘手难办。

我刚通过艾德礼获悉英国內閣的看法。我派去日本和朝鮮亲自观察局势的柯林斯將軍带回来一份麦克阿瑟將軍的見解的摘

要。

这位远东司令告诉陆军参谋长说，他认为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有三个。

第一个方案是只在朝鲜继续采取反对中国人的行动。这意味着我们的部队仍将受他们当时所受的一些同样的约束，即不空袭满洲的基地，对中国大陆不进行海军封锁，不利用国民党的中国军队，不大量增援联合国在朝鲜的军队。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采取这一个办法等于是投降。他确信，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迟早会被迫撤出朝鲜。我们所能希望从这个方案中获得的充其量只可能是一种明智的拖延时间的行动而已。

麦克阿瑟将军赞成第二个方案。这一方案准备由联合国封锁中国海岸，并要求轰炸中国大陆。麦克阿瑟还明确说明应该最大限度地朝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同时还要把蒋介石的军队“引导”到中国南方去，可能是通过香港。“以后在朝鲜是采取军事行动还是撤退，要看中国人的反应再作决定。”

按照麦克阿瑟的意见，还有第三个可以采取的方案，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会自愿地同意留在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告诉柯林斯说，联合国应该接受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停战。在他看来，除非联合国愿意接受他所建议的第二个方案，在一个联合国委员会监督下的停战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了。

麦克阿瑟将军是秘密地把他的看法告诉柯林斯的；这位参谋长在报告时也注意到保持适当的秘密性。但是在东京的新闻界代表已经相当透彻地知道了麦克阿瑟的看法，而且他通过许多声明和记者访问也透露了不少，因而使美国公众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认为他提出了在朝鲜取得胜利的惟一有把握的办法。然而事实上却有很大的困难，麦克阿瑟所鼓吹的方案很可能意味着一场全体出动的世界大战——包括原子武器等等。

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像麦克阿瑟那样一位沙场老战士会不理解把“中国国民党军队引导到中国南部去”就是一种战争行动；我也不相信，像他那样三十五年来在世界大事上居于重要地位的人，会不认识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城市被轰炸的反应，会跟美国人民在珍珠港被轰炸时的反应一模一样；我也不相信以他对东方的了解，会看不到这样的事实：他炸了中国的城市以后，苏联的物资仍将源源而来，如果他要贯彻到底的话，他第二着就得轰炸海参崴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道！但是正因为我相信麦克阿瑟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些事情，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险发动一次大战。我可不主张这样干。

我发觉麦克阿瑟将军的看法同我的看法距离那么远。我感到惴惴不安。但是，他把他的意见上达给他的统帅，这当然是正当而又合适的。如果他沒有超越这一点，我就决不会感到必须撤他的职。

我认为，高级军事领袖们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之中有许多的人依靠“摘要”解决问题。他们的实际材料和具体意见大多是从他们的参谋所提供的简短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如今任何一个高级官员只能那样办事；美国总统也得依靠“摘要”来解决问题。但是这里有一点大不相同的地方：总统有许多思想互不相同的人，有经常进出他的办公室的人做他的幕僚；他们各有各的技术和专业；他们的前程并不依靠他们所提供的报告的正确性程度。然而，在军队里、尤其是在职业军人中，强烈的信念和苛求的头脑就会断送事业。我在野战炮兵后备队里当上校时，我看过所有关于论述参谋人员应该如何克尽职责的军事手册——而且我也晓得书上是怎么说的；可是我也知道一个总统必须努力使自己不受唯唯诺诺的人的包围，而一个军事领袖可就沒有这么多的理由这样做了。但是，如果他不这样的话，他对局势的看法就越来越偏激。由于一向采

用輪流任職的慣例，這種情況並不是常常發生的。但是麥克阿瑟卻沒有遵循這種慣例。多年來，他的周圍實際上就是那同一批朋友和衷心愛戴他的人。難怪他不懂得為甚么從前當過軍士的人不成群結隊地回到軍隊里去，難怪他不懂得聯合國在西方國家的生活中到底意味着甚么；而且難怪他相信美國願意參加到亞洲戰爭中去！他脫離了自己的人民。

在美國總統的身邊，一位幕僚所起的作用却是大不相同的。跟軍事參謀一樣，幕僚執行總統的決定（或者說至少是決定的一部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在任何時候幕僚要尽可能地把足以影響總統決策的全部論點提供給他。在白宮幕僚中或政府內閣中，一個唯唯諾諾的人是一無用處的！

在我作出決定以前，我总是設法把每一個問題尽可能充分地加以討論。我要看無數的背景材料，弄清楚我的顧問們是否已把各種不同的看法都包括進去。當然，在作出決定以後，我希望我的幕僚支持我，但是在作出決定以前，我需要他們辯論。我深信這樣做是穩當的、值得的。它只有一個缺點：很多時候，局外人聽到了這些辯論，就以為是發生了爭執，接着，報上的大字標題和雜誌專欄作家便大事渲染。可是，那年12月，我們却不得不着實地辯論一番。

不但有軍事政策的問題，而且還有許多別的問題。在聯合國，十個亞洲國家提出了一個呼喚在朝鮮停戰的議案。我們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毫無價值的舉動，因為除非中國共產黨先獲得了我們所不能付出的代價，他們無疑地是會拒絕談判的。但是，世界輿論似乎是強烈地贊成停戰嘗試的。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這一決議案。它規定由三人小組決定可以在朝鮮達成停戰的基礎，並提出建設性意見以便實現停戰。1月2日小組的三個人——伊朗的安迪讓、加拿大的皮爾遜和印度的勞氏——向聯合國報告說，

他們的努力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除非按照他們自己所提出的条件，否則不願意考虑停战談判。

与此同时，我們已采取步驟来加速我們的軍事計劃，并为此提供可靠的經濟支援。当朝鮮传来第一个坏消息时，我馬上就作出决定，我應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12月8日的內閣會議上，也就是在我們和英国的談判結束以前，我們已就這一問題多少討論了一下。我当时授权馬歇尔將軍通知国会的撥款委員會，說我已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自然，我不願意不提出我們應該怎样办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以，以后的几天我們召开了許多次會議。

12月11日我出席国家安全委員會討論联合国关于停战決議的問題。在与艾德礼的談判中，大家同意我們和英国都不謀求停战。然而，联合国中十三个亚洲国家的決議案，使我們必須决定我們是否同意在这时候取得停战。

我提醒委員會的委員們說，在与艾德礼的談判中曾取得明确的諒解，我們都不願意屈服；还說除非我們被赶出来，否則我們决不离开朝鮮。布莱德雷將軍指出，我們很难同意停战，除非它規定双方可以自由視察，或者是由一个联合国的委員會进行視察。我同意應該規定可以自由到朝鮮各地去，因为我們不能坐等敌人加强实力。

馬歇尔部长說，停战会停止所有的空中偵察，并且可能会迫使我們的海軍撤退。共产党那时候就可以大大地增援，如果我們表示反对，他們會說我們不遵守停战令。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反对停战，我們的朋友又会认为我們在反对和平解决。

迪安·艾奇逊国务卿問到会的軍方成員，在达成停战以前，如果共产党再来一次新的攻勢我們被迫更往后退，这有甚么危險。布莱德雷說，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的給养已开始发生

困难了。

參謀長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海軍少將戴維斯說，從純軍事觀點來看，最好不要在這時候停戰，但是如果一定得停戰的話，我們應該明確說明我們的條件；條件應該包括增兵，即派軍隊到適當的分界綫和別的據點去。自然，我們應該堅持從東北戰區完全撤退第十兵團。

我說我從來沒有想到在條件未談妥之前，就同意停戰。

馬歇爾將軍指出，第一項——增兵——是會有困難的，因為在概念上有根本的分歧。譬如說，麥克阿瑟將軍必須補充已被遣送回國的人，但是對中國人來說這就可以作為進一步增兵的借口。

副總統巴克萊的意見是，我們不應該上圈套而陷入可以被指控為反對停戰的境地。布萊德雷將軍要求知道是否應該發出命令要麥克阿瑟退回三八綫。我立刻回答說，在第十兵團從東北戰區撤退出來的時候，我們要儘可能頑強地守住目前的陣地，而且一直要守到真正停戰為止。馬歇爾說，目前的計劃要求作審慎的退却，並需要知道我是否會反對這些計劃。我說，“我不反對”，但我又說我不想進行匆忙的撤退。我不想作出退兵的政治決定，而認為撤退的速度應從軍事上來斟酌決定。目前給麥克阿瑟的指令仍是合適的、有效的。

接着我談了一下我跟艾德禮討論的情況，並提醒大家說，除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以外，會談表明兩國政府的意見是極為一致的。我着重說明跟英國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因為只有跟他們合作，美國的力量才能充分顯露出來，在太平洋是這樣，在大西洋也是這樣。然而，我說，兩國政府同意跟中國共產黨糾纏在全面性戰爭中的嚴重危害性。

馬歇爾將軍報告說，在現在看來這一點是相當有把握的；我們在朝鮮能夠守住一條陣綫，第十兵團的撤退也可以成功。但是，他

认为总的局面还是一样的糟糕。国防部长說，有一个問題，国会似乎在大談战争以及像全面动员这样的战争措施，而在这时候，我們在軍事上所处的地位却不能支持这种說法。但是，他觉得为了使总统有必要的权力来改善这种处境，就必须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存在。

史密斯将军就苏联对美国的全面动员所能发生的反应发表了意見。关于这一方面的估計，第一点是，我們得設想俄国人預料到我們由于他們的行动而在美国增加軍事准备。但是，既然俄国人可能是根据相当灵活的时间表行动的，就得假定我們的动员只能使他們調整一下时间表而已。他們也許不願意立即进入一場大战，而只是想保证他們不給我們在軍事力量上远远超过他們的机会。

那么，我們所能預期到的便是，苏联將設法进一步削弱西方联盟，办法是：利用西欧各国的战争恐惧，利用和平建議和外交界的和平触鬚，表示要討論裁軍問題，进行破坏活动，并在极为分散的地区进行局部的侵略活动。如果这还不能有效地阻撓美国的动员計劃的話，那末苏联人也许就会抓住先发制人的有利时机立即对西方发动攻势。

馬歇尔将军指出，我們即将动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武装部队，又說我們整个的国际地位是依靠西欧的加强。我們不能突然在朝鮮和太平洋采取措施，这会引起俄国人的反应，而吓跑欧洲盟国。

我問斯奈德部长关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意見，他說为了要說服国会，这样做是必要的。他表示国会中有一方冲劲很大，甚至于是太冲了，他們要求采取軍事行动，而另一方則拒絕通过征稅法案，說我們的时间还充裕得很。

我接着就宣布星期三将与国会領袖們举行會議，以便簡單說明我的行动計劃，并把我关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決定告訴

他們。到那時候我將向全國廣播，說明局勢並要求支持我們的政策。

我與國會領袖們的會議於12月13日星期三上午十點舉行。與會的人全是兩黨人士，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外交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和撥款委員會中的一些前輩委員。除了國會議員以外，出席的還有：艾奇遜、馬歇爾、斯奈德、薛明頓、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哈里曼。

我對國會領袖們說，我們有必要在動員工作方面大大邁進一步。為了要促進這一局面，我正在考慮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我把情報局關於蘇聯在目前情況下可能採取的活動的一個報告的摘要念給他們聽，這樣國會議員們就可以了解我們所面臨的情勢了。

該報告說，根據從俄國可靠方面獲得的證據，俄國想達到的四個主要的願望是：第一，聯合國軍隊從朝鮮撤出，美國第七艦隊撤離福摩薩領海；第二，扶植共產黨中國成為遠東的主导力量，包括北平政府進入聯合國；第三，削弱西方對日本的控制，作為最後消滅西方在該國的一切勢力的一個步驟；第四，阻撓西德重新武裝。

情報局報告說明，據估計俄國人將繼續提議與西方強國會談，目的在保持他們作為“和平解決”的擁護者的姿態，但是沒有跡象足以說明俄國人會讓步，或甚至放鬆他們對這几点願望的任何一點壓力。要求召開會議為的是要在美國和西歐製造混亂。克里姆林宮本身繼續把會議看作是用力來鞏固他們已獲得的或正在獲得的利益的地方。他們的態度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是為了應付未來的情況，他們的辦法可以有所不同。

蘇聯對朝鮮問題預計仍將繼續施加壓力，但是蘇聯的軍事準備和蘇聯宣傳的性質表明，他們有可能在其他地區採取行動。顯得最為緊張的地点是柏林、西德、印度支那、南斯拉夫和伊朗。在這些地區，很容易製造出一個小事件來，好給俄國人進行公開干涉

的借口。就算不发生事件，压力也可以增加到足以严重危害西方国家的地位的程度。

最后，当俄国多半为了吓唬西方并削弱抗拒俄国的压力的意志，而在大谈新的世界战争时，我们应当现实一些，在我们的计划中要估计到这样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也许并不是在虚张声势，并可能已经决定跟美国来一次全面性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艾奇逊说，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情报机构关于局势的估计，事情很明显，自从6月以来，苏联就一直在全力攻击美国的领导。同样明显的是：苏联领袖们认识到他们的政策可能引起一场全面性战争，而且他们准备冒这种风险。他还指出，苏联的主要手法是“要圈套”——要弄清楚究竟能使我们浪费掉多少力量，而他们自己的主力则仍自由自在地保留下来，以供将来之用。

艾奇逊说，他们当前的主要努力是离间我们和我们的盟友的关系，而这一努力正取得了某些成就。

艾奇逊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尽量加强我们自己和我们盟友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并且在增强实力的过程中不要过分消耗它。他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苏联夺取世界霸权的野心。

接着我请国防部长马歇尔发表意见，他叙述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国防部长开始讲话时简单地谈了一下我们现有的地面部队的力量。在美国国内只有一师美国陆军；要到春天才可以有其他一些师训练好，装备好。他接着就转而谈到朝鲜的情况，并且简短地说明我们在那里的处境，他说我们的军队马上就可以占相当巩固的防御地位，又说他们随后就可以很巩固地防守一些时候。

他从这一话题转而谈到日本，说我们在那里根本没有战斗部队，安全是靠七万五千名日本警察来维持的。马歇尔说，对国防部说来，这是一个令人深切忧虑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俄国人下一

步会干些甚么。他們有許多坚固的軍事基地，特别是空軍基地，攻击日本的距离很近。

馬歇尔繼續說，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也到了严重关头。正当我們在最后安排一支統一指揮的欧洲防务軍隊和最高司令的时候，俄国人就搞起他們的宣传鼓动来。他們曾几次警告說，他們不能“容忍”武装西德的任何行为，而且可能准备以武力来支持这一威胁。

接着，馬歇尔提起了撥款問題，他說根据快速計劃，我們試圖在1952年达到原来計劃在1954年达到的数字。这种加快的过程自然会造成紧张状态，尤其是在装备問題上。陸軍方面感到商訂合同已有困难，因为没有合法的权力可以使軍事合同优先于民用需要，工业并不热衷于从民用品的生产，轉向軍事生产。如何为扩充了的服役人員加速取得物資，真正成了整个計劃中很难办的問題。

我指出这会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能做到的問題的一方面，虽然这在其他方面也会有好处。这会給予行政首长某些他所需要的权力，而且总的說来能使我們达到我們的目标：“尽可能迅速地进行适当的、有組織的动員；同时我們稳定經濟局面，就可以使合同承包商履行他們的合同，如期交出軍事装备。”

关于經濟稳定計劃，我宣布第二天和一些国會議員及其他人士开个会来討論物价管制、工資稳定措施、优先訂貨、原料分配以及其他的問題。我指定了請哪些人来开会，解釋說，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会照顾到這些問題中的某一些，而不能全部都照顾到。要进一步取得权力，就必须跟国会商量。

回顾由于中国人在朝鮮的干涉行为，而引起的极端危急的世界局势之后，我向他們保证，我們能应付这一巨大的危險，只是必須采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动。

參議員塔夫脫馬上要求知道，馬歇尔所說明的扩大兵役的計

划是否就意味着全面动员，或者只是走向全面动员的一个中间阶段。我答复说，这并不是全面动员，又说在我们还未发觉自己进入大战以前，不会进行全面动员。

看来参议员塔夫脱对这一答复并不感到满意，而是要求知道这次拟议中的全面动员的幅度有多大。我回答说，随着局势的发展，必须动员到足以应付局势的地步；马歇尔将军补充说，现在我们并不考虑全面动员，而只是准备全面动员的基础，如果准备是必要的話。

参议员惠里说，在他看来，总统是在要求进行全面动员的权力，只不过是在要求的同时又希望他不需要行使所有的权力。我表示同意，说我沒意思要超过必需的限度来运用权力。

参议员塔夫脱提醒与会的人（虽然他的意思显然在提醒我）说，我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受到国会关于提供款项的规定的限制。我表示同意，并补充说，这些行动是整个国会关心的问题，不单纯是拨款委员会得考虑的事。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我才邀请那么多的国会领袖今天上午来白宫商讨这些问题。

众议员文森问起是否已经作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決定。我说已经决定了，除非大家提出充分的理由，主张不应该这样做。麦考马克提出，1939年和1941年罗斯福所发布的紧急令在某些方面今天仍是有效的，只是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語了，又说根据新的形势宣布新的紧急令似乎是恰当的。

众议员文森说，如果宣布紧急令就无需在商訂合同、优先訂貨或原料分配方面进一步采取国会行动了。根据今年9月制定的一项法律，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就有这样的权力。

然而，参议员塔夫脱认为沒有理由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认为9月制定的法律所授权的一切在不宣布紧急令的条件下也可以办得到；但是总统的顾问墨菲解释道，有一些其他法令要有紧

急令才能賦与总统以权力。

众議員馬丁要求知道，除商訂合同而外，宣布紧急令还可以有哪一些方便。为了答复他的問題，我递給他司法部編制的一张立法条款的单子，只要总统一旦宣布全国紧急令，所有这些条款就都生效。

众議員馬丁詢問在国会本届大会上是否有制定其他任何立法的需要。我觉得沒有这种需要，但是希望国会注意我們的动員和防御努力中最重要的一些項目，軍事撥款、援助南斯拉夫、征稅法案和民防立法。

接着馬丁說，他想問一个也許是題外的問題，他怀疑我們是否在想办法取得其他国家的更多的支持。我回答說，这就是艾德礼之所以来华盛顿的理由之一。但是，馬丁說他所想的偏重于馬上援助朝鮮。我們是否正在印度、日本以及“友好的中国人”中努力取得“战斗团体”？

馬歇尔將軍說，这里有一个是否切合实际的問題。我們簡直不可能利用日本人，因为中苏条約是以明确地針对这两个国家的一方可能与日本人打仗而簽訂的，发生这种事件时，另一方就有义务參战。他认为取得印度的帮助沒有多大希望，他說印度正在装腔作势。

接着雷朋問道，我是否要知道与会的全体議員关于宣布全国紧急令这一特殊問題的意見。我回答說，我殷切希望他們每一个人都談一談，而且我也請每一个人依次发表意見。

巴克萊說，如果我們不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来保卫国家，我們就是对人民不負責任。他认为，为我們自己打算，为給我們在全世界的朋友們打气，我應該毫无顾虑地宣布紧急令。

議長雷朋仍犹豫不决，想先听一听某些其他議員先生們的反应。馬丁也拿不定主意，但似乎对宣布紧急令的必要性表示怀疑。

參議員塔夫脫懷疑從法律上來考慮，是否有宣布緊急令的迫切需要，而且一般說來，“在不知道所牽涉到的細節”——如征兵和徵稅——以前，是反對宣布緊急令這一主張的。

眾議員麥考馬克說，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要使美國強大。我們得承認一般老百姓是自滿的，我們得使用強烈的言語，採取強烈的行動才能喚醒他們，使他們採取必要的行動來保衛他們自己。於是塔夫脫插嘴說，他不希望別人誤解他；他是完全贊成加強武裝部队的；他所不同意的並不是這一點。麥考馬克接着說，在他看來，宣布全國緊急令是領導方面一種坦率、明確和果斷的行動。應該這樣做。

參議員惠里說話的語氣可就大不相同了。他說他贊成加強國家實力的計劃，但是關於宣布緊急令，他認為他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實。他也懷疑我們在国外所承擔的義務，雖然他並沒有說出是哪一些；而且他覺得奇怪，總統希望通過宣布緊急令來取得更多的權力，為甚么不能要求國會一項一項地給他。他轉過來對着我，直截了當地問我，如果我需要更多的權力，為甚么我不向國會要求。我回答說，如果我應該隨着緊急情勢的需要而迅速採取行動的話，我所需要的許多權力一定得是無條件的。惠里問道，為甚么我不能只要求某些權力，而要求足以進行全面動員的大權呢。我回答說，這主要是時間問題，零打碎敲地要求授權以擴大我們的部隊，是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的。惠里反駁說，我當然應該知道，我是唯一掌握實際材料的人。我答复說惠里以及到場的任何其他人人都可以得到實際材料。他們所得到的摘要與任何國內的官員所得到的是一樣完備的，而且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再詢問一些問題。

惠里的攻擊使我感到憤慨。我說，我以為人人都知道我對擴大權力並不發生興趣。國會議員們一定能記得，我曾多次自動地放棄權力，甚至曾經要求國會取消作為總統而授予我的某些權力。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重的。我现在之所以要求权力，并不是因为我要权力，而是因为我必须拥有这种权力。

参议员康纳利认为应该发出关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宣告，因为这可以向国外证明我们的决心。但是必须告诉美国人民这样的宣告到底意味着甚么。

我说我准备到四家通讯网联合站去广播，又说我会如实地说明为甚么有必要宣布全国紧急令以及我们将采取什么步骤。康纳利评述说，朝鲜事态的发展已使人人神经过敏，因而总统作一次演说，让美国人民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情况，是有好处的。

众议员文森也赞成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接着马上就应对国防所必需的一切商品实施原料分配制度和物价管制。参议员麦克拉说他担心某些人会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作是宣布战争，但又说他相信紧急状态确实存在，应该宣布。在国会似乎存在着不同意见的迹象时，参议员乔治对宣布紧急状态仍有些怀疑，但是他希望这些意见分歧能够消除，又说到这时候就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他还认为接着就应该采取经济管制措施以及新的征税方案，以便与预算的新要求相适应。参议员密利金认为宣布紧急状态还有个时机问题。如果宣布的时机不对头，人民就会误解。采取这样的断然步骤应该有所准备。他接着重复提出塔夫脱所提出的一点，即宣布紧急状态，报上当天就会出现大字标题，就会不必要地使人民感到震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使公众明白，我们最好的依靠是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并时时保持我们的武力。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代理主席、众议员理查兹说，物价和工资与整个国防计划是密切相关的，我发表任何演说，人民都愿意听我谈起物价、工资以及国防计划。众议员伊顿认为应该宣布紧急

状态,也应该开始迅速加强我们的部队,问题不在于这可以使俄国人感到惊惶(在他看来,这是不会的),而在于这可以使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明白我们有决心制止俄国人。参议员卢卡斯说,如果与会的人散会后纷纷向报界发表他们的不同意见,这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他本人同意那些人的意见,要求在充分说明我们的计划的同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他认为,如果参议员塔夫脱、惠里和众议员马丁会后离开白宫向报界发表谈话说,根本没有必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就将是极端有害的。

接着我请泰伯先生讲话,他说,他认为人民是混乱和不安的。但是,如果向人民说明明确的政策和明确的计划,人民就会照着去做的话,他就满意了;而且说,在他看来,要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就非得有那样的计划不可。杜威·肖特宣称,他相信议会是很不愿意授予权力的。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不得不这样做。他认为国会应该支持总统,而且他还希望总统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

既然,与会的每一位议员这时都得到了讲话的机会,我便对他们的出席会议和坦率的发言表示谢意,随后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我和另外一些议员们又开了一个会,这一次着重讨论了原料分配、工资和物价管制等经济问题。在这一天和第二天,我和我的幕僚与阁员又开了几次会。在这些会上,我们拟定了计划的细节,宣布计划时的演说也拟定了初稿。

12月14日下午,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所拟计划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含义。我急于要确定我们的军事生产的需要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我也认识到一般老百姓不得不支持这样的计划,实行粮食配给和类似的严格管制是不会受人欢迎的。

某些报纸和政治家纷纷提出要求,在武装方面定一个“摧毁性

的計劃”，也就是要求來一個我們在戰時才可能實施的全國性的斷然大動員，當然這使情況更加複雜化了。我反對這種要求全面動員的叫囂。我們在朝鮮作戰，但是我們必須把戰事局限在這一國家的範圍內，不想引起一次世界性的戰爭。此外，還存在着這樣的危險：如果我們現在武裝得那麼迅速，將來到了最危急的時候，就可能在軍事上處於劣勢地位，因為我們的裝備已經過時了。我們所需要的是加緊完成既定的計劃，以便在1952年達到1954年的目標，然後穩住我們的生產水平和準備工作，不但要保持動員的基礎，而且還要使這個基礎現代化，以便一旦大戰爆發可以迅速擴充。

我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談論這一問題時，腦中就自然而然地拿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我們的部隊增加的情況來作比較。譬如，羅維特先生說，動員兩年之後，到1941年12月31日，我們的武裝部隊的人數只有一百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七十一名；副總統巴克萊議論說，此後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部隊加強到十倍於當時的規模。會上我幾次說明，我們必須努力爭取的地位是：要使我們的軍事機器和工業機器能在最短時間內將能力擴充到最大限度。

12月15日星期五晚上十點半鐘的時候，我發表廣播演說，告訴我國同胞，我們所面臨的情況以及我們將採取的對策。

我說，“第一，我們將繼續維護，必要時以武裝保衛聯合國的原則——自由和正義的原則。

“第二，我們將繼續與其他自由國家合作以加強我們的聯合防務。

“第三，我們將加強我們自己的陸軍、海軍和空軍，並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盟國製造更多的武器。

“第四，我們將增長我們的經濟並使它保持平衡。”

我接着談了这几点的詳細情况，最后我預示說，第二天上午我将发表一項公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我說，“这将要求每一个公民为了国家的利益，把他的私人利益摆在一边。我們必須拿出一切力量专心致志地执行我們面臨的任务。

“从来沒有一个国家曾經有过比我們国家現在所負有的这样重大的責任。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我們必須了解：我們专靠自己是不能取得和平的，只有和其他自由国家和每一地方愛好自由的男女进行合作，才能取得和平。

“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的目標不是戰爭，而是和平。在整個世界上，我們是擁護國際正義的，是擁護一個以法律和秩序的原則為基礎的世界的。我們必須這樣堅持下去。我們願意舉行談判以解決分歧的意見，但是我們決不向侵略讓步。對罪惡的姑息不是走向和平的道路。

“美國人民從來就是以勇敢和堅毅來對待危險的。我深信我們現在就會這樣做；在上帝的保佑下，我們一定能保衛我們的自由。”

在這一廣播演說之後，信件、電話和電報雪片般地向白宮飛來，這表明全國絕大多數的人是贊成我的演說的。只有少數人有不同意見。但是，當時有一些參議員鼓噪一時，發出了一陣子怨言，說什麼如果我要證明我想促進國家的利益，首先就該把艾奇遜撤職！這使我感到十分惱怒。

國務卿艾奇遜長期以來就受到了某些報界人士和國會人士的攻擊。最近對他的攻擊使我感到極其惱怒，因而我發表了一個聲明。我相信，如果艾奇遜當時在華盛頓的話，他對聲明的內容和語調都會表示不同意！有一次我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在這些日子裡，我總有一天會“爆炸”，今天就是這樣！

我說，“在最近一星期中，对国务卿艾奇逊又有了新的攻击。有人要我撤他的职。說这样話的人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好处。

“艾奇逊辞职，怎能改善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我真不能理解。艾奇逊先生帮助拟訂并执行了我們抵抗共产帝国主义的政策。几乎从四年以前我們分担希腊和土耳其所需要的武器的时候起，直到目前他劝我抵抗共产党对南朝鮮的侵略为止，我們政府中沒有一个官員比他更敏銳地感到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威胁，或者更强烈地要求抵抗这种威胁。

“此刻，他在布魯塞尔，代表美国在建立反侵略的共同防务。这才使我有可能指派艾森豪威尔將軍为盟国駐欧洲的最高司令。

“如果共产主义今天在世界上得勢的話——当然它是不会得勢的——艾奇逊即使不是为自由与基督教的敌人所打死的第一个人，也将是头一批人中的一个。

“最近对艾奇逊先生的攻击，在下述意义上來說，还是老一套：它們是几个月以来一再提出的一些同样的不真实的指責。它們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这与西华德所碰到的事如出一轍。有一伙共和党人要求林肯总统撤換国务卿西华德。他拒絕了。我也同样拒絕撤換国务卿艾奇逊。

“如果我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这都会削弱国家在反对共产党侵略中所持的坚硬立場。

“如果攻击我們的外交政策和艾奇逊先生的那些团体有別的政策可以提供的話，他們應該提出来。这是他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現在我們是面对冷酷的事实作仔細思考的时候。这可不是作含沙射影的指摘和不分青紅皂白进行打击的时候。

“有一些共和党人看清楚了攻击国务卿艾奇逊的实际情况和真正理由，跟他們的同僚却有不同的意見。

“国家需要所有人民发挥智慧。现在是万分危急的时候。这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需要真正发挥两党制的作用的时候。这是需要利用像艾奇逊那样的人的伟大才能的时候。

“撤换艾奇逊而能得到好处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相信，历史将把艾奇逊列为我国曾经出现过的真正伟大的国务卿之一。在快到八年的时期中，我用了四位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任职时是罗斯福总统逝世，我刚进入白宫的时候；贝尔纳斯任职约十八个月，任期是战争最后几个月和战后初期；马歇尔将军当了两年国务卿，这两年是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实施马歇尔计划和俄国封锁柏林的年头；艾奇逊任职达四年，任职前他曾当过助理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出任国务卿的人能像艾奇逊那样具有任职的充分准备和具有优秀条件的人是不多的。他头脑敏锐，性格冷静，目光远大，这些都使他能很好地处理有关政策的重大问题和国务院的日常事务。

艾奇逊在他作证时会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精细的诘问。但是，现在对他的攻击变得尖酸刻薄了，特别是我们在朝鲜采取行动以来。大多数的批评是参议院中那些有时被称为“中国第一”集团的成员发出的。这些人一再重复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摘，说什么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艾奇逊不知搞什么名堂所造成的，他们现在又指控说，艾奇逊剥夺了麦克阿瑟将军取得胜利的手段。

麦克阿瑟将军对国外战争退伍军人所发表的福摩萨声明和他最近在公开场合的谈话给憎恨艾奇逊的人提供了一个把柄，他们借此就能纠集力量进行攻击。换句话说，他们要打倒艾奇逊，因为他坚持了我的政策。在艾奇逊担任国务卿的四年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一天可以使任何人说他与我在政策上发生过意见分歧。在他广阔的职责范围内，他小心翼翼地使我完全了解每一件事情的发展。

他透彻地了解总统在我国宪法体制中的地位，而且充分认识到：虽然我依靠他经常给我提供意见，但政策必须由我作出政策决定，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做了。

那些攻击艾奇逊的人实际上是在攻击我。不幸得很，在共和党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多年中，党内产生了一个派系，它们似乎除贬损、抨击和否定而外就不知道采取甚么态度来对待政府。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这些人甚至在危机时期也不了解，两党合作制要取得成就，既需要一个执政的多数党，也同样需要一个有责任感的反对党。

我除了召集议会领袖，举行几次会议，说明真实情况以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再进一步着重说明我们到底处在多么严重的危境中，也就是说，我只能使它们看到我与我顾问们所有的那一些极机密的文件摘要。我们的制度的问题之一是：总统不可能把他所得到的一切机密情报告诉国会每一位议员，他们的人数太多，以致秘密一定会泄露出去，可是总统却必须在以这样的情报为根据而拟订出来的种种政策上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简单说，在外交政策上，两党合作制就是：总统可以信赖另一党的议员，而该党的领袖们也信赖总统就外交事务所采取的行动。

美国政党制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政党中的领袖既要依靠资历的偶然性，也要依靠个人的长处和成就。这意味着，相互间的信赖和两党合作制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另一党的领袖是谁来决定。当范登堡代表共和党参议员发言时，我心里从来不怀疑，他的判断和裁决使我觉得可以放心跟他讨论最微妙的外交问题。当马歇尔和罗维特想个别找他讨论他们感到伤脑筋的问题时，他懂得而且理解到他所处的地位是既受到了无比的信任，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有时候范登堡不同意我的政策，但是他从来不企图破坏我的政策。

然而，惠里以及另外一些我可以举得出名字来的人，对两党合

作制似乎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两党合作制是一条单行马路。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两党合作制的方式在他们看来似乎意味着任何事情在他们未搞清楚以前，总统就不得采取任何行动。而反过来，他们却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来支持总统。

另外一些人又显然认为，两党合作制在对外政策方面是设立一个协议机构就可以做到的事，或者认为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某些多少具有重要性的职位上安插几个另一政党的成员就可以做到了。但是那倒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们真是该党的代表。除非具有信赖的精神，上述办法就不会有任何差别。除非议员们以负责的、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对外政策，这种工作关系就没有可能。除非总统在跟反对党的成员谈论那些透露过早就会违害国家安全的问题时，总统可以信得过他们的判断和裁决，事情是不能顺利进行的。

不幸得很，那些叫嚣得那么厉害，要求解除艾奇逊的人，已充分证明，只要能作为他们进行党派活动的材料他们就不惜利用任何情报，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党派活动。

第二十七章

麦克阿瑟將軍的召回

当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朝鮮的时候，我們的軍事与情报专家们却愈来愈担心在日本沒有軍事防禦的情况下，俄国突襲日本的可能性。我們在朝鮮的需要使美国占領当局在日本竟沒有留下任何战斗部队；虽然麦克阿瑟已着手鼓励日本人建立一支至少可以充当临时防禦的国家警察队伍，但是这还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因此，12月19日麦克阿瑟將軍要求參謀长联席會議增援日本。

參謀长联席會議和馬歇尔將軍跟国务院官員开了一連串的會議，想找出某些办法来应付这一問題。我們簡直就沒有現成的增援部队。我們不能把第八十二空运师派遣出去。它是在美国的唯一可以立即出发的部队，而我們却不得不在国内保持最低限度的后备力量。国民警卫队的各师在3月前不能准备就绪运送到国外去。軍事首脑們以为我們可以想办法“光荣地”撤出朝鮮，为的是保卫日本。然而国务院采取的立場是：除非我們被赶出来，否則我們决不能撤离朝鮮。做不到这一点就等于放弃原来使我們进入朝鮮的那一原則。

可以多少緩和远东局势的一个办法是增加大韓民国軍队的規模。李承晚總統曾一再要求給他更多的武器，但是我們无法給他更多的东西，因为我們自己的需要都沒有滿足。但是，1951年1月3日，參謀长联席會議通知麦克阿瑟可以供給他武器和弹药的种类和数量，并征詢他的意見。

以这些数字为基础，參謀长联席會議估計韓國軍隊可以从二

十万增加到三十万，并配备步枪、自动步枪、卡宾枪和輕机枪；他們要求麦克阿瑟就这一問題提出建議。

1月6日，麦克阿瑟將軍作了答复，报告說，武器不但已經給了南朝鮮的軍隊，还給了青年团及其他类似的团体，但是敌人的游击队仍繼續在許多广泛分布在南朝鮮的地区进行有效的活动。而倾向于我們的游击队伍在共产党后方地区却很少有作为，主要是由于缺乏坚定的領導，而且韓國的軍隊始終沒有能完成适当的任务。麦克阿瑟將軍深信，如果我們的武器和弹药不給南朝鮮而給新建立的日本国民警察后备队，将有更好的用处。

这时，朝鮮的局势已經开始好轉了。第十兵团撤出兴南地区的行动已順利完成，該团成员已并入第八軍，并受該軍的指揮。第八軍在沃克將軍死于吉普車車禍以后，已由李奇微中將任新司令官。

麦克阿瑟將軍一再向參謀长联席會議提出建議，說在他看来，战争應該扩大，办法是襲击滿洲机场、封鎖中国海岸和利用福摩薩的中国人。譬如說，在12月29日的电报中，在重申他的看法之后，他說他知道这一行动方案之所以遭到拒絕是因为害怕这会挑起中国和我们进行全面战争的緣故。但是，他认为这种害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以为怎么也不会加剧与中国面对面的局势。至于俄国人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倒是誰也說不上来的。然而，如果俄国人打算襲击日本，只要他得到他替日本要求的四个額外的师，他就可以拖延俄国人的行动。

他还认为，如果我们无意扩大战争，唯一的其他抉择就是逐漸缩小我們在朝鮮的陣地，一直到只剩下釜山滩头堡，然后再从那里撤退，不管这样做对亚洲的士气会有多么坏的影响。

應該指出，这种撤退似乎已經强加在我们头上了，因为1月1日共产党对第八軍发动强大的攻击，迫使我們放弃汉城。

1月9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經我批准，通知麥克阿瑟將軍說，他所建議的報復性措施華盛頓正在考慮中。參謀長聯席會議進一步向他明確說，我完全了解中國共產黨進入朝鮮和目前進入南朝鮮，引起局面改觀的情況。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通知他說，其他方面的考慮需要我們在朝鮮保持我們現行的政策，因此訓令他，逐步堅守陣地，儘可能給敵人以重大的打擊。但是，主要的考慮應該是他的部隊的安全問題和他保衛日本的基本使命。如果根據他判斷，爲避免人員和物資的嚴重損失，而不得不撤退，那末他可以將他的部隊撤到日本去。

麥克阿瑟將軍第二天對這一指令作了答復，要求澄清指令內容。他說要他守住朝鮮陣地而同時又要保衛日本，使它不受外部的襲擊，他所統率的軍隊並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他進一步強調說，如果他必須繼續受限制，以他現有的軍力作戰，那麼，他所統率的部隊在朝鮮的軍事地位最後將支撐不下去的。他指出，由於長期的、艱苦的戰役，聯合國軍已筋疲力竭；他說他們由於受到不正當的批評而感到苦惱，士氣正在急驟下落。他看來，除非有其他更重要的理由，一旦戰術上可能，他所統率的部隊應該儘速撤離朝鮮半島。

另一方面，他說，如果政治的^①原因要求我們在朝鮮守住一個陣地，那末我們就應該負責軍事後果，他預料這個軍事後果將是重大的傷亡和嚴重地危害日本的安全。

當馬歇爾將軍把麥克阿瑟拍來的電報拿給我看的時候，我感到非常不安。實際上，這位遠東總司令官在報告說，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所決定的，同時又經批准的行動方案竟是行不通的。他在說我們會從半島上被趕出來，否則就至少得蒙受極

^① 在這些討論中所用“政治的”一詞的意義，指的是世界事務，而不是指國內的情況。

大的損失。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錯了，但是，在他來說，这是他表示怀疑，并要求重新考虑华盛顿决定的正当手續。我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月12日召开特別會議討論麦克阿瑟的电报和对这一問題应该怎么办。

在这次會議上，我表示意見說，重要的是要让麦克阿瑟充分了解政治和軍事問題。我們一直是这样做的。他曾收到許多份重要的文件，可是显然真正送到他办公桌上的却寥寥无几。所以，我要以个人名义拍个电报給麦克阿瑟將軍，使他了解我們当前的外交政策。我給麦克阿瑟的电报如下：

“我希望你知道此間对朝鮮的局势正予以极大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了解我們的努力正集中在这个对美国的前途和其他各国自由的人民的生存极为重要的問題上，以寻求正确的决定。

“我希望在这封电报中就我們繼續在朝鮮抵抗侵略这一問題上，让你了解我对我国和国际上的基本目的的看法。我們希望你統率下的联合国軍隊能支持我們力图在世界基础上迅速組織起来的抵抗侵略的行动，我們需要你使联合国軍隊能合理地提供的最大力量作出判断。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要把这封电报当作一紙訓令。这封电报的目的是告訴你，我們对政治因素的某些看法。

“(一)在朝鮮能胜利地抵抗侵略就可以达到下列重要的目的：

“(1)具体表明，对侵略行动我們和联合国是不能接受的，并提供一个团結的目标，使自由世界的力量能够圍繞着它动員起来，以应付苏联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所发出的威胁。

“(2)打击共产党中国已被夸大到危險地步的政治和軍事威望，这种威望現在大有破坏非共产党亚洲的抵抗，并且巩固共产主义对中国本身的控制的危險。

“(3)提供更多的時間和直接援助在中国国内外組織的亚洲

非共产党的抵抗。

“(4)履行我们对南朝鲜所承诺的光荣义务,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的友谊在患难中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

“(5)使日本可能取得更为满意的和平处理方案,并对日本与大陆间在和约签定后的安全地位作出巨大贡献。

“(6)促使许多目前生活在共产党势力阴影下的国家坚定意志(这不仅仅指亚洲的国家,而且也包括欧洲和中东的国家),让它们知道它们不必急于在所能取得的实质上等于完全屈服的条件下,与共产主义妥协。

“(7)鼓舞那些可能在遭受苏联或共产党中国突然攻击下,响应号召,以寡敌众的国家。

“(8)使人们看到迅速建立西方世界防务的理由和它的迫切性。

“(9)使联合国贯彻对集体安全所作的第一次巨大努力,并形成自由世界的联合阵线,这个联合阵线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10)提醒铁幕后面的人民,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子向往侵略战争,这种罪行将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击。

“(二)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团结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会员国。这大多数国家不仅仅是联合国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在苏联向我们发动攻击时,它们也是我们迫切需要依赖的盟国。此外,在我国的力量尚未建立以前,只要是涉及扩大战区的问题,我们的行动一定得十分谨慎。某些步骤就其本身而论,也许是具有充分的理由的,这也可能有助于朝鲜战役,但是,如果这些步骤反而把日本和西欧国家卷入到大规模冲突中去,那就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三)当然,我们承认以你目前被迫用来应付大量中国军队的有限兵力,要继续进行抵抗,在军事上也许是不可能的。再者,在

目前的世界局势中，你的兵力应该保存起来，作为保卫日本及其他地方的有效的工具。然而，如果在朝鲜本土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已不可能，同时你又认为某些上述重要的目的是适当而又切实可行的，那么你就可以在朝鲜沿海诸岛，特别是济州岛，继续抵抗以支持上述这些目的。在最坏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必须撤离朝鲜，我们得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出于军事的必要而被迫采取这样行动的，除非侵略的行为得到纠正，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我们将不承认撤离的后果。

“(四)在对朝鲜问题作出最后决定时，我不得不经常考虑来自苏联的主要威胁和迅速扩大我们武装部队以应付这一危险的必要。

“(五)有人敦促我去相信，自由世界对摆在我們面前的危险已有一个现实而又清楚得多的认识；必需的勇气和力量即将涌现出来。联合国最近的会议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脱离实际的想法，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会员国是受下述愿望所驱使的：彻底搞清楚所有谋求和平解决的可能途径都已经完全尝试过了。我相信绝大多数会员国正迅速地团结起来，结果将出现一个鼓舞人心的、不可抗拒的联合力量来保卫自由。

“(六)全国人民都感谢你在朝鲜艰苦斗争中的卓越的指挥和你的军队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下的出色的表现。

“哈里·杜鲁门(签字)

“1951年1月13日”

正如麦克阿瑟在以前的几次战争中一样，他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但是，我需要他像一个军人应该做到的那样，接受政府文官当局所已经决定的政治决策。

1951年1月间，我们的军队已拦阻住了朝鲜的战争浪潮。敌人已经给拦阻住了，而且在某部分战线上还被打回了去。当柯林

斯將軍去視察第八軍的時候，他在1月17日報告說，該軍陣容良好，而且天天在改進中。中國人由於補給綫太長，顯然已落到不能有效地進行作戰的地步。

柯林斯將軍和范登堡將軍視察遠東的另一結果是，他們報告說，麥克阿瑟將軍說，除非俄國插手干涉，看來只要我國整個民族利益需要，我們現在就可以在朝鮮繼續打下去，而又不會使第八軍遭受嚴重的危險。

柯林斯將軍和范登堡將軍回國後向我作了報告，告訴我他們在朝鮮所看到的情況以及他們與麥克阿瑟的談話。我听了他們的報告，心裡就安心了，但是局勢還遠不能令人高枕無憂。1月18日，情報透露，敵人在朝鮮可能重新糾集起來，這意味着可能發動新的攻勢。同一報告還談到共產黨越來越注意日本。在中國南部有軍事活動，這可能是即將進攻香港的跡象。這一切可能意味着北平準備在各个方面進行主要突擊。

從朝鮮的軍事行動開始以來，我總認為這是俄國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宮破壞自由世界的團結的一部分計劃。俄國人知道，只有美國參加歐洲防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才能成功。不讓我們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盡我們的一份力量的最方便辦法是將我們拉進亞洲的軍事沖突中。我們無法拒絕給亞洲共產黨侵略的犧牲者以軍事援助，除非我們願意讓其他小國由於害怕侵略而轉到蘇聯陣營中去，他們是無法單獨抗拒侵略的。與此同時，這就可以在國際範圍內削弱我們的力量，這當然也是俄國的目的。

我們的政策是保持我們在亞洲的地位，促進歐洲的防務和團結，並使美國有所準備。就我當時的看法以及我今天的看法來說，這三個目的是彼此相依賴的，如果我們不努力達到政策的整個三個部分，其中的一個也就不能獲得。

1月底，法國總理普利文先生訪問華盛頓時，我曾借此機會表

明我的立場。我與他會談了三次，第一次專談亞洲問題。

普利文跟我談了印度支那的局勢，法國人從1946年以來一直在那裡與共產黨匪徒作戰。在他談完之後，我告訴他說，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承認北平的共產黨政權，又說我深信共產黨之所以向南朝鮮進軍是因為他們害怕西方國家在遠東的進展。日本有了真正的進展。大韓民國的進展也很大。法國人自己也一直在印度支那取得進展。蘇聯人正企圖以進攻南朝鮮來抵消我們在遠東所已獲得的一切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們正企圖粉碎我們的整個計劃。我確切地告訴普利文先生，美國的政策是建立在這樣的前題下的：我們所努力謀求的世界和平是不能分割的，只有集體安全才能給世界帶來和平。我們願意和中國人進行談判來恢復朝鮮的和平，但是卻不能犧牲集體安全和民族自尊。

當然，在總統所確定的概括性的政策目的與必須以日常事務為基礎而擬訂的政策實施細節之間是有距離的。關於這些實施細節，通常是有意見分歧的。有時，實施細節的比重增加了，以致總統必須作出決定，但是在把問題提交給總統以前，一般都要交換過許多次意見，開過許多次會，研究過許多文件，等等。在1951年最初幾個月的整個期間內，國防部和國務院官員一再開會計劃可以在朝鮮和亞洲普遍採取的行動方案。

3月間，當戰鬥的浪頭開始好轉的時候，國防部和國務院雙方的官員都贊成對已談判過的停戰謀求新的途徑。他們的推論是：既然我們已能使中國人蒙受重大的傷亡，並且正將他們趕回和趕過三八綫去，那末，首先，停止戰鬥現在對他們至少跟對我們同樣有利；其次，侵略者已大部分被趕出了韓國的領土。

國務院草擬了一個聲明，他們建議應該由我發表。3月19日，國務卿艾奇遜、馬歇爾將軍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開了一個會，討論這個聲明草稿。他們還同意通知麥克阿瑟將軍，說總統將發表聲明，

要他提出建議。

我正好結束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小白宮的短期休假，在那里我与艾奇逊和馬歇尔經常保持联系。3月20日，參謀长联席會議执行前一天所同意的事，給麦克阿瑟將軍拍去了这样的电报：

“国务院正草拟一个总统声明，要点如下：联合国已肃清了南朝鮮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現在准备討論解决朝鮮問題的條件。联合国有这样的情緒，认为在大軍向三八綫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作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这就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等待新的談判的发展。鉴于三八綫并没有軍事意义，国务院已問过參謀长联席會議，你應該有什么样的权力才能在以后的几星期內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表示意見。”

第二天，麦克阿瑟將軍在他的回电中建議对他的指揮权不要再加以限制。他指出，以他所統率的軍隊，在对他所加的限制下采取軍事行动，要他肃清北朝鮮的敌人是实际行不通的，为此，他感到他現有的指令很适用于当时的局面。

在接到麦克阿瑟的回电以后，參謀长联席會議又和国防部与国务院开会，进一步确定了拟議中的总统声明的細节。此外，国务院官員还与出兵朝鮮的其他国家駐华盛顿代表举行会談，为的是征得他們对拟議中的总统声明草稿的同意。

声明的草稿如下：

“我作为政府的行政首长，应联合国的請求，在朝鮮行使統一的指揮权，并在与提供战斗部队支持联合国在朝鮮的行动的联合国各政府充分协商之后，发表如下声明。

“联合国在朝鮮的軍隊正从事击退向大韓民国和联合国而发动的侵略行为。

“侵略者蒙受重大的損失之后，已被逐回去年6月最初发动非

法进攻的地区附近去了。

“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按照 1950 年 6 月 27 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提出的条件来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要求尽一切努力来阻止战争的蔓延，并避免苦难的延长与生命的损失。

“这里有一个在该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它应该是一切衷心希望和平的国家所能接受的。

“联合国统一指挥部准备履行能终止战争并保证不再发生战争的部署。这种部署能为解决朝鲜问题开辟更宽阔的道路，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联合国已宣布这个世界组织的政策是：允许朝鲜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

“朝鲜人民有权享有和平。他们有权按自己的选择，适应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政治以及其他制度。

“朝鲜人民有权获得世界组织的援助以医治战争的创伤。联合国已准备给予这种援助，并为此设立了必要的机构。联合国会员国已提出要给予慷慨的援助。目前需要的是和平，在和平的情况下，联合国才能把它的资源用在创造性的重建事业上去。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在朝鲜反对联合国的人对原来可以而且仍然可以为朝鲜带来和平解决的许多机会很少加以理会。

“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就能大大地减轻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并能开辟道路，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

“在未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束战斗的部署以前，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必须继续下去。”

发表这一声明的用意是，不带任何威胁或谴责而愿意取得和平解决的提议也许会得到良好的反应。

不幸得很，我們的周密准备竟枉費心机。3月24日，麦克阿瑟將軍发表了一项声明，它与我所准备发表的声明完全背道而馳，結果是如果我发表那項經過慎密計議的声明，就只能引起世界的混乱。因此，我們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花去的許多时间以及許多外交家和国防領袖們的詳尽討論全都付諸流水了。

麦克阿瑟將軍的声明是这样說的：

“战事仍按照預定的日程与計劃进行中。現在我們已大体上肃清了共产党在南朝鮮的有組織的軍隊。愈来愈明显，我們昼夜不停的大規模海空轰击已使敌人補給綫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就使敌方前綫部队无法获得足以維持战斗的必需品。我們的地面部隊正出色地利用这一弱点。敌人的人海战术已无疑地失敗了，因为我們的部队已慣于作这种形式的战斗。敌人的渗透战术只能加重他們的被零星消灭的損失。敌人的持久力在气候、地形与战斗的困难条件下显得不如我們的部队。

“比我們在战术上的成功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这个新敌人——赤色中国——的軍事力量被过分地渲染所夸大了。它缺乏工业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許多重要物資。它缺乏工业基地，甚至连建立、維持和运用普通海空軍所需要的原料也感缺乏。它无法供应順利进行地面战斗所必需的装备，例如坦克、重炮和在战争中已被使用的其他科学发明。从前，他在人数上的巨大潜力很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随着現有的大規模毁灭性方法的发展，人数上的优势已不能抵偿这些缺陷所固有的弱点。制海权和制空权在当前的重要性及其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并不逊于过去，有了制海和制空权就有了对補給、交通与运输的控制权。由于这种控制权掌握在我們手里，再加上敌人在地面火力方面的劣势結果就形成战斗力的悬殊，而这种悬殊决不是勇气（不管它是多么瘋狂）或完全不顧生命的損失所能克服

的。

“自从赤色中国加入朝鮮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以来，这些军事弱点就已清楚而明确地暴露出来了。联合国部队目前是在联合国当局的监督下进行作战的，因而相应地使赤色中国得到了军事优势，即使是这样，事实还是表明：赤色中国完全不能以武力征服朝鮮。因此，敌人现在必然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鮮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确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以后，如果朝鮮问题能够按它本身的是非加以解决，而不受与朝鮮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如福摩萨问题或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影响，则在朝鮮问题上作出决定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绝不能牺牲已受到极其残酷蹂躏的朝鮮国家和人民。这是一个关系至为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的结局得在战斗中解决，但除此之外，基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方面寻求答案。不用说，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以内，我准备随时和敌军司令官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鮮的政治目标的任何军事途径，联合国在朝鮮的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联合国的一位军事司令官自作主张地发出这样一个声明是极不平常的事。这是完全漠视不许发表有关对外政策的任何声明的所有指令的行为。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这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

由于这一行动，麦克阿瑟已使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这种不服从领导的行为了。

实际上，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用最后通牒来威胁敌人，等于说

盟国的全部优势力量可以用来攻击赤色中国。当然，他說这得有待政治当局去决定，但考虑到他是高級負責人，全世界人民会认为他事先获得消息，知道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在我們的盟友中果然馬上就发生了这样的影响。世界各地的首都所发出詢問的函电紛至沓来：这是甚么意思？美国的政策难道要改变了嗎？

事情所牽連到的不单单是美国总统所要发表的已准备好的声明的命运而已，甚至也不只是这一“檄文”所引起的外交界的怒潮而已；挪威大使向国务院詢問这是甚么意思的时候，就称它为“檄文”。更重要得多的是，麦克阿瑟將軍又一次公然反抗他的統帥——美国总统的政策。

当天（星期六）中午，我和艾奇逊、罗維特与腊斯克开了一个会，重新看了 12 月 6 日发給麦克阿瑟的这道命令，其中要求一切公开发表的声明应經有关部門予以审核。我問其他的人这一命令的意思是否有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他們都同意这是一道极为明确的命令。

我要罗維特先給麦克阿瑟將軍拍封电报去，提醒他在这道命令下所負的責任，因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阻止这位將軍再发表声明。

麦克阿瑟將軍在同一个月份早些时候的一項声明中，也曾对总统的政策进行挑战，我是了解这个事实的。3 月 7 日，他曾向新聞界发表一个声明，大意說除非我接受他的政策，否則就会发生“残酷的屠杀”。不过，他当时至少还承认，这不是由他作决定的事。可是，現在，由于他的声明，他已确实影响了政策的方向，而且再作这样的声明就只会带来巨大的損害。

于是參謀长联席會議便向他发出下列电报：

“參謀长联席會議致麥克阿瑟專電

“總統指示你注意他于1950年12月6日發出的命令。鑒于1951年3月20日給你的情報，你以後的任何聲明都必須符合12月6日的命令的規定。

“總統還指示，一旦共產黨軍事領袖要求停戰，你應立即向參謀长联席會議就這一事件請示報告。

“布萊德雷

“1951年3月24日”

我不得不說，那一天使我大為震驚。我從來沒有低估我跟麥克阿瑟相處的困難，威克島會見以後，我希望他會尊重總統的權力。然而，我力圖設身處地為他着想，力圖搞清楚他為什麼要向政府文職部門的傳統最高權力挑戰。

事實上，他的論點和建議過去始終是得到我和參謀长联席會議的充分重視的，因為他們和我至少都還尊敬這位將軍的軍事威望。但從11月以來，即從中國人進入朝鮮以來，他所發表的一系列聲明都暴露他是一個嘩眾取寵的人。除非我們假定，對這位將軍來說，要緊的是不讓結束戰鬥的功勞有落到別人頭上，否則我們就難以解釋最近這件事的發展。

我回想起亞伯拉罕·林肯盡力和麥克累倫將軍相處時所遇到的同樣情況。卡爾·桑德伯格講了一個關於林肯和麥克累倫的關係的故事；那位將軍對軍事以外的一些問題不時發表政治聲明，有人問林肯，他將如何對付麥克累倫。這個故事說，林肯回答道：“沒什麼，但是這使我想起了一個人，他的馬直踢後腿，還扭傷了他登在蹬里的腳，於是這個人就對馬說：‘要是你還繼續踢下去，我可就要下馬了。’”

林肯常常与麦克累伦大鬧糾紛，不过当时的政策上的分歧和現在的刚好相反：林肯要麦克累伦进行攻击，而麦克累伦却按兵不动。这位將軍对战争应该如何进行，甚至国家应该如何治理，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总统直接下令給麦克累伦，但是这位將軍却置之不理。半个国家都知道麦克累伦有政治野心，这正是反对林肯的人企图加以利用的一点。林肯很能忍耐，因为他的天生性格就是这样，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被迫解除了这位联邦軍隊的主要司令官的职权。虽然我对我和麦克阿瑟在相处上发生的困难，曾极为忧虑，但是我認識到除了解除这位国家高級战地司令官的职权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說我国宪法中有一个基本要素的話，那就是文职控制軍人。政策是由选出来的政治官員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將領們来决定的。然而，麦克阿瑟將軍却一再表示他不願接受政府的政策。由于他一再公开发表的一些声明，他不但使我們的盟国对我們的政策的真正方向分辨不清，实际上他还用他的政策来反对总统的政策。

作为軍人来说，麦克阿瑟將軍一向是我所尊敬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知道，我的任何行为都不足以改变他作为我們这个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軍事人才的地位，而且我也沒有意思要貶低他的地位。我曾希望，而且也曾努力說服他，我要求他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可是，他有不同的意見。他曾公开提出批評。如今他的行动終于破坏了他宣誓要效忠的政府及其盟国所共同决定的政策。如果我容忍他用这样方式来反对文职当局，我自己就会违背我要坚持和保卫宪法的誓言。

我始終相信文职控制軍人是我們自由政府制度最强固的基础之一。我国人民有許多都是那些为了逃避軍国主义的压迫而离开祖國的男男女女的后裔。在美国，我們有时沒有給予軍人和海員

以应有的尊敬，这对我們是有害的。但是，我們始終小心翼翼地保卫着宪法的规定，防止軍人从掌握权力的民选当局那里夺取政权。

常常有人指出，美国人民有选择軍事上的英雄担任国家最高职位的倾向，但是，我认为这种說法是一种誤解。誠然，我們曾选择像华盛顿、杰克逊、甚至格兰特这样的人物当我們的行政元首。但是在这三个人当中，只有格兰特是作为一个职业軍人而培养起来的，而且他曾放弃自己的职业，只是在战争爆发时，才像成千上万的公民一样，回到軍隊里去。我們选择过在战时建立丰功伟績的人，但是直到 1952 年为止，我們始終沒有把任何一位毕生从事軍职的人推选到白宫来。

我們一向是那么謹慎小心地不使軍人超越其本分的一个理由是，軍役系統的固有性质使軍事司令官很少有（即使有的話）机会懂得做好公务所必需具备的謙恭的态度。选出的官員从不会忘記，——除非他是个笨蛋，——其他同样适当的人或条件更好的人也是很可能被选上的，何况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相信最后确定下来的就是最好的选择。任何通过在我国进行的政治选拔程序而上台的人都了解，成功是一貫坚持原則和在适当的时机与地点作出适当調整的混合物。这里所指的調整，是指对环境而言不是指对原則的調整。

这些东西是一个軍官在他的职业道路上很难学到的。支配他的思想的詞汇是命令和服从，而这些詞汇的軍事定义却又不是共和国中通用的定义。

这就是我們的宪法为什么規定文职控制軍人的原則。受到麦克阿瑟將軍威胁的正是这一原則。我不相信，他有意識地决定要抗拒文职控制軍人的原則，但是他的行为的后果是使自由政府的这一基本原則受到了威胁。

我有責任采取措施。

在这个問題上我思想斗争了好几天之久，但是到了4月5日我终于作出决定，因为这一天又发生了另一件意外的事。

这一天，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众议员马丁在众议院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给他的一封信。马丁是一个孤立主义者，长期反对高瞻远瞩的对外政策，3月初他曾写信给麦克阿瑟，除其他事情外，他谈起不在朝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简直是愚蠢透顶的事。接着他问这个看法是否和这位将军一致。

麦克阿瑟将军3月20日写的回信如下：

“8日来函附来了你在2月12日发表的演讲稿，至为感谢。我以莫大的兴趣阅读了它，我看出，多少岁月消逝了，而你当年的英风却丝毫未减。

“关于共产党中国在朝鲜参加对我们作战而造成的局势，我的看法和建议已极其详尽地呈交给华盛顿。总的说来，大家都知道并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只是遵循传统的方式给暴力以最大的还击而已，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你关于利用在福摩萨的中国军队的意见既符合逻辑，也符合这个传统。

“有些人似乎不可思议地难以认识到：共产党阴谋家已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我们已经在战场上参加了由此所造成的争端；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而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了，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胜利，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了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这一封信的第二段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了。麦克阿瑟是完全知道不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道理的。仅仅在八个月以前，他本人也是承认这一决定的好处的。后来，当他改变了他的看法，并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又再度通知他，这是总统既

定政策的一部分。所以，在贊許馬丁先生的邏輯和傳統立場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說我的政策是不合乎邏輯和違背傳統的。

何況他信上所提到的傳統——給暴力以最大的還擊——除軍事教科書之外，本身就是不存在的。當然，就運用軍隊來說，這是一條很高明的規則；但是這與政府之間或人民之間的关系是毫不相干的。美國人民之所以獲得很多的成就和崇高的地位，並不是由於使用武力，而是由於工業，創造和俠義的行為。

當然，麥克阿瑟信中的第三段才是真正的“絕妙高論”。我不了解這位將軍通過甚么情報路線而知道共產黨人決定把力量集中在亞洲，更明確地說是集中在他的管轄區。也許他不知道遏制在伊朗、希臘和柏林的共產主義狂潮得花上多大的力量，付出多大的代價。也許他不知道克里姆林宮怎樣在大力地想阻撓西歐聯合戰綫的出現。當然，實際上，我1月13日的信已說明白，共產主義不但可能襲擊亞洲，也可能襲擊歐洲，並且說明白這就是我們沒有能力擴大朝鮮沖突的一個理由。但是麥克阿瑟却對我們的外交努力加以輕蔑性的評論，最後竟至說出“除了勝利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

但是，勝利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正好像有的戰爭為的是正義，而有的則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錯誤的。

正如布萊德雷後來所說的：“要是真把戰爭擴大到亞洲大陸的話，那麼，這就是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点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

麥克阿瑟心目中的勝利是轟炸中國城市而取得的勝利，是把沖突擴大到整個中國而取得的勝利，這必然是錯誤的勝利。

對某些職業軍人來說，勝利——單是戰場上的勝利——本身就是一種了不起的目的。拿破侖在他倒臺的莫斯科戰役中說，“在每一場戰鬥中，我都打敗了他們，可是我還是毫無所得。”

作出最後決定的時候終於到了。麥克阿瑟給眾議員馬丁的信

表明这位将军不但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而且还以公开不服从他的统帅的方式向这种政策挑战。

我要艾奇逊、馬歇尔、布莱德雷和哈里曼于4月6日星期五上午跟我会商有关麦克阿瑟的行为问题。我公正地把问题提了出来。应该怎样来处理麦克阿瑟将军呢？我们就这一问题讨论了一小时。每一个人都认为政府面临一个严重的处境。

哈里曼认为我早在两年以前就应该革掉麦克阿瑟的职务了。在1949年的春天，正如在1948年的情况一样，麦克阿瑟解释说，由于东京的事务紧迫，不能脱身回国，因而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耳就不得不迫切地从华盛顿插手阻止麦克阿瑟批准日本国会的一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与华盛顿政府当局所规定的占领军的经济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国防部长馬歇尔劝告说，要谨慎从事，他希望多考虑一下。他认为，如果我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通过国会取得军事拨款就会发生困难。

布莱德雷将军完全从军纪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这显然是违抗命令的问题，理应解除这位将军的指挥权。然而，他希望与各参谋长商量一下，然后再提出最后的处理意见。

艾奇逊说，他认为应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但是他认为在我行动之前，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意见是必要的。他劝告说，对这一问题要进行最慎重的考虑，因为这是极重大的事。他又说，“如果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会引起您任总统期间的一场最剧烈的斗争。”

接着，我们就参加内阁定期举行的例会。当然，与会的人都就麦克阿瑟给馬丁的那封信表示了意见，但是大家都没有谈到如何处理麦克阿瑟的问题。内阁会议之后，艾奇逊、馬歇尔、布莱德雷与哈里曼跟我一起回到我的办公室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很小心，沒有流露出我已作出決定。散會以前，我提醒馬歇爾翻閱一下國防部檔案中過去兩年來和麥克阿瑟將軍往返的全部電報。接着我要他們四位第二天上午九點鐘仍到我這裡來。

第二天（4月7日星期六）上午，我們又在我的辦公室裡碰面。這次會議很短。馬歇爾將軍說，他已經看過了那些電報，又說他現在得出結論，麥克阿瑟早在兩年以前就應該革職了。我要求布萊德雷將軍在星期一向我提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最後意見。

4月8日星期日，我將艾奇遜叫到布萊爾大廈來，我跟他進一步討論了這個局面。我告訴他，那天上午我已和斯奈德商量過。接着，我又告訴他，星期一在布萊德雷將軍向我報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時，我將準備採取的行動。

星期一上午九點鐘，我又與馬歇爾、布萊德雷、艾奇遜和哈里曼碰面。布萊德雷報告說，星期日他召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又說他和他們的一致判斷是：應該解除麥克阿瑟將軍的職務。

馬歇爾將軍又一次肯定地說，他的結論也是這樣。哈里曼也重新說了他在星期五那天的意見。艾奇遜說他完全同意撤麥克阿瑟的職。

到這一時候，我才回答說，在麥克阿瑟將軍發表他的3月24日的聲明時，我已決定他必須下台。

接着，我指示布萊德雷將軍起草命令，解除麥克阿瑟將軍的各項統率權，並由駐朝第八軍司令官李奇微中將接替麥克阿瑟的職務。我指示布萊德雷與國務卿艾奇遜商量一下，因為這與聯合國軍總司令的職務有關。

星期一下午三點一刻，同一批人帶着起草好的命令到白宮來向我匯報；我在命令上簽了字。

大家決定命令由當時在朝鮮的陸軍部長佩斯轉交給麥克阿瑟。我們知道他在第八軍總部。我要艾奇遜通過穆喬把命令轉給

佩斯，并且要佩斯去东京，亲自将命令交给麦克阿瑟将军。

但是，我们的电报迟迟未能送达佩斯的手，这首先是由于发报时机械发生了故障，其次是由于佩斯和李奇微将军在前线视察。

我要国务卿艾奇逊通知国会的领袖们，要他将我们对麦克阿瑟所采取的行动通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叫杜勒斯去日本，向吉田政府保证，司令官的撤换决不影响我们加速进行缔结对日和约的政策。杜勒斯同意这样做。

然而，4月10日的晚间，布莱德雷将军匆匆地来到布莱尔大厦。他说，他听到消息已经泄露了出去，又说芝加哥的一家报纸明天上午就要刊登这一消息。这使我不得不改变原定的步骤。当时我决定，我们已无法讲客套，叫陆军部长佩斯亲自送达命令，只好用象解除其他军官职务的同样方式向麦克阿瑟将军下达命令。

在这些新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不得不指示我的新闻秘书肖特在4月11日上午一点钟举行一次新闻记者特别招待会，这正是尽可能迅速地将原令略加改动而重新印出的时间。

新闻记者们都接到一系列文件，第一个文件便是我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的声明。

这项声明是这样说的：

“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有关正式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鉴于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以及联合国特别委托我的责任，我已决定更换远东的统帅。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中将接替他的职务。

“对于国家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辩论是我国自由民主立宪制度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各军事司令官必须遵守按我国法律与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下达给他们的政策和指示，这

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在危急时期,这种考虑尤其必要。

“麦克阿瑟将军在历史上的地位已充分地确立了。国家应当感谢他在担任艰巨任务期间,为国家作出的优异而卓越的贡献。为此,我重申对于他的问题,我为我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深感遗憾。”

第二个文件是解职令的本文。这道命令通知麦克阿瑟将军他的各项指挥权已被解除,并命令他把他的权力移交给李奇微将军。另外还有一个文件命令李奇微将军接替麦克阿瑟将军过去所担任的职务,并通知他范佛里特中将已首途赴朝接替他的第八军指挥官的职位。

这次也发表了一些关于背景材料的文件。其中有我的12月6日关于澄清公开声明的命令、有关拟议中的总统声明致麦克阿瑟的通知、有麦克阿瑟自己的反声明、接着便是关于发表声明的条件的提示、致众议员马丁的信、1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要他就武装额外的韩国军队表示意见的电报以及他的1月6日的回电。

最后两个文件之所以一并发表是由于当时又出现了麦克阿瑟所发表的新声明。一家常常批评政府政策的期刊向麦克阿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是针对武装南朝鲜的问题而提出的。这家杂志说,据悉,南朝鲜迫切地希望保卫自己而“华盛顿”却不给他们武器。

事实上,大韩民国提出关于给予更多的武器的要求之所以遭到拒绝,主要当然是由于麦克阿瑟将军在1月6日的电报中对这个问题表示反对。但是,他竟告诉这家杂志说,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事项是他力所不能及的,意思是说,如果事情由他决定的话,韩国早就得到更多的武器了!

就我自己來說，這些文件已把事情說清楚了。美國人民仍在朝鮮面臨着共產黨的侵略；共產黨的陰謀仍在歐洲和亞洲威脅着西方。4月11日晚上，我發表廣播演說，重新向美國人民說明政府的政策。我解釋我們為什麼要在朝鮮，為什麼不能允許朝鮮的戰事成為一場全面的戰爭。我宣稱我們願意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而解決的方針則是根據3月間所擬定但還沒有發表的聲明。我還解釋為什麼必須解除麥克阿瑟將軍的職務。

我告訴無線電廣播的聽眾說：“自由國家已把它們的力量團結起來，盡力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果共產主義的領袖們想挑起這場戰爭的話，那麼，它是可能爆發的。但是，對於這場戰爭的爆發，我國和我們的盟友是不負責任的。”

第二十八章

朝鮮停战談判

麥克阿瑟將軍回到美國引起了感情沖動的浪潮和一大陣爭吵。我已料到這一點，這並沒有使我感到不痛快。事實上，我公開表示我認為請這位將軍到眾議院演說，以及承認他作為一個偉大的軍人的成就，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我對接着舉行的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聯席會議前的作證，却有完全不同的感覺。在這些所謂麥克阿瑟作證的會議上，結果並沒有產生什麼東西可以給那些政府政策的批評者以多大的鼓勵。恰恰相反，聯合委員會得出結論說，國家的最高統帥完全有權在他認為必要的時候撤換軍事司令官，事實上，只要憲法還得保持它的意義，他們就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

但是，蘇聯領導人必然從這些證詞中得到極大的滿足。委員會中的共和黨人，除少數例外，利用這個機會在會議記錄上記下了我們的戰略計劃的每一個細節。不錯，我們曾採取措施，從發表的記錄上刪去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片斷。但是以委員會組織之大，所有其他的參議員又都被邀請出席的，報紙一般都能找出記錄中被刪掉的是什麼。

這一問題與我關係很大，於是我要求國家安全委員會考慮一下防止國家安全情報通過國會的洩露出去的問題。在5月25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花了一些時間討論這個問題，但是無論在這次會議上或在以後的任何時候，我們都沒有得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

当然，问题是国会議員和报纸都认为，而且是正确地认为，政府的事就是公众的事，因而也就是每个人的事。所谓“每个人”当然包括能看到国会记录、作证发言和委员会报告的每个人，而不是单指只能看到报纸的人。我们非常担心政府中的某些雇員可能泄露秘密，因而我们开除了、侮辱了一些人，只是因为怀疑有些人可能泄密，或是总有一天会一时失慎而泄漏机密。但是只要付出剪辑工作的代价，美国的敌人就能得到关于我们的计划和意图，甚至设施和装备的那部分保密的资料。这些东西之得以公开发表是因为“人民有权知道”。

既然任何两个人对安全的需要与公众的利益两者之间的范围意见很可能大相径庭，美国的敌人只消设法掀起轩然大波，就会导致国会的调查。于是他也許不費什么額外的代价就能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情报。

在麦克阿瑟作证的会议期间，这种情况几乎每一天都发生。

在这段听证会开会期间，所发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总统和他的顾问之间的关系性质。布莱德雷将军忍受着委员会上大多数共和党委员的无礼质问，他婉言拒绝告诉参議員們对他和我在一次商谈中所交换的意见。他对参議員們說，如果他证实和說出他跟他的統帥的談話，他就会破坏他作为一个顾问对总统的作用。

在这一问题上，我完全支持布莱德雷将军，因为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决不只是杜魯門与布莱德雷两人的談話而已。这是关于政府分权制的意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制定我国宪法的那些人在规定政府明确地分为三个独立的部門的时候，是了解他們这样做的道理的。他們多半是有法学素养的人，而且他們对从巴比伦到英国的政府演变的历史都有丰富的知識。他們深信这个新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能够保护个人自由并让个人自由得以充分发展的政府。他們知道独断甚至暴虐无道

的政府是由于政府权力統一在一个人手里才出現的。他們所制定的制度的目的是防止野心家或“兵权在握的人”攫取政府的各种权力。

当我还年輕的时候，我就念过孟德斯鳩的《法意》和《联邦主义文选》，后者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賈埃的論文选集，它詳尽地闡述了宪法的用意何在。后来，我在夜晚研究法学的期間，讀了一些布莱克斯通和柯克的著作，以及斯托里法官的《評論集》。有关这方面书籍的閱讀以及有关历史和我国政府的研究，是我考虑我国宪法問題的基础。我国宪法是一个内容极为精辟的文献，每一个美国人对自己的祖国都負有义务，不仅要去吸取宪法的字义，而且还要了解宪法所代表的伟大思想。

在我看来，其中最伟大的是关于公平审判的思想。我們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这个思想，誰都不能被认为有罪，除非通过公平的法律程序证实他有罪。

其次，体現在我国宪法中的最重要的思想是，通过分权的办法，使政府的权力始終受到限制。这就是說，政府的三个部門——立法、司法和行政——必須小心翼翼地保卫着自己的地位。这种小心翼翼的防范是件好事情。在我当参議員时，我总是殷切地注意到国会的权利和特权得到維護。如果我曾担任过司法职位，我也一定会认为我有責任随时警惕，不使司法独立遭受任何可能的侵犯。作为总统，我有責任保护我所担任的职位——美国总统职务——的宪法地位。

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还没有和美国总统职务完全相像的职位。总统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必須加以保护使不受侵犯，正如国会必須关心国会的权利和特权一样。

当然，领导政府如今是一个极其现实的問題。你并不是在一个理論的空中楼阁里领导政府，而是要对付在各种困难局势下的

許多棘手的問題，而且還不容你有猶豫的余地。只有重視實際的人才能領導政府。但是他們必須既重視實際而又對政府應該體現的崇高價值有深刻的認識。

作為一個實際的前提，政府的行政部門和國會一樣不能單獨領導政府。總有少數議員在辦事情時好像要控制行政部門的每一件事情一樣，可是當行政責任落到他們肩上時，他們就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了。但是，卻沒有一位總統曾企圖單獨進行統治。每一位總統都知道而且必須知道，國會對財政的控制權一定要加以尊重。因而，總統，作為一個實際的前提，通常都倚重國會，把有關行政部門的各項工作的情報提供給國會。

然而，有一點很明顯，每當行政方面斷然拒絕向國會提供情報的時候，也正是行政方面感到國會侵犯了它的特權的時候。當然，國會希望尽可能多地掌握事實。這多半是為了制訂立法時的正當理由，但有時這只是為了要和總統為難，要他的好看，換句話說，這只是為了黨派的政治原因。在發生這樣的事情時，總統的莊嚴責任是拒絕追查他的私人文件的要求。那怕是所謂的軟弱的總統對於這種事也是不會容忍的。

我總是努力關心和維護我所擔任的崇高職責的地位。沒有顧問或是沒有別人的建議（不管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總統就不能發揮作用。但是只要總統一旦必須說明他听取了什麼樣的意見，誰告訴他些什麼，或者是他保存什麼樣的記錄材料，他所得到的意見就會毫無價值了。要顧問發揮作用，就必須使他們覺得，他們所說的或所寫的都將保守秘密；他們提供忠告的那個人或機關認識到，他們只是表示意見而已；而且他們也許並不是被邀表示意見或提出忠告的唯一的人。在作出決定之後，只要有人企圖詭難這一決定，並要判定促成這一決定的意見或忠告是否“正確”，同時對提出不“正確”意見或忠告的人進行報復和批評，那麼，唯一能產生明

智决定的独立思考就会受到阻碍或遭扼杀。

当某些参議員正忙于想证明我使麦克阿瑟將軍不能在戰場上取得巨大的成就时，麦克阿瑟的继任者却在朝鮮出色地执行政府的政策。李奇微將軍并不是一向都同意政府的政策或參謀长联席會議的意見的，可是他却小心翼翼地执行命令。李奇微將軍在日本抓得很紧而且有良好的效果。曾經有人預言日本会发生风波，因为日本人民已对麦克阿瑟將軍有了信仰。但是，李奇微將軍的沉着而有效率的作风保证了占領的順利进展。这次人事上的更动向日本人民证明：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文职当局在軍事当局之上，將領們不同于日本人的战时領袖，他們本身并不是法律，他們必須执行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員的命令。

对李奇微將軍的另一个初步考驗是对韩国及其总统李承晚的关系問題。韩国政府曾再三要求供給它的各种青年团体以武器。我曾向參謀长联席會議表示，我不同意我們武装实际上等于政治单位的团体，可是我曾要求他們研究为韩国建立一支更为有效的軍隊的长期計劃的可能性。

李承晚总统曾要求供应武器，用以装备韩国軍隊的十个新編师，但是李奇微將軍提出反对意見。他作为第八軍司令官的經驗告訴他，在增加装备和供应以前，大韓民国首先必須改进領導。在他向參謀长联席會議提出这一意見的报告中，他引用了4月28日范佛里特將軍給他的一个电报：

这份电报說：“韩国軍隊的基本問題在于領導和訓練，而不在于人力或装备。除极少数的情况外，普遍都缺乏領導。如果有充分受过訓練的軍官或軍士，目前的部队中是需要他們的。除非上述缺陷得到弥补，允許組織和供应更多的部队只会浪費极端缺乏的装备和軍需品。据估計，自朝鮮战争开始以来，韩国軍隊在装备上的損失已超过装备十个师所必需的东西；而且这还没有給敌方

以相等的損失，有时簡直不像打仗，就把装备丢掉了。……”

李奇微將軍表示同意范佛里特的这一估計。两位將軍都負責說服李承晚總統，这种缺乏領導的現象只有朝鮮自己的政府才能加以糾正。他們对他說，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需要建立一个原則性强、业务能力高的忠誠的軍官团体，而这种团体并不存在，他們正在計劃能产生这样效果的办法。他們还說，除非能形成令人滿意的領導，一切关于扩大大韓民国軍事力量和为这些部队提供更多的装备的进一步談判不得不推迟。李承晚不大高兴，但是由于这种非常坦率的交換意見，結果很快就产生了一个訓練計劃，这个計劃帮助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韓國的軍隊。

不过，停战談判的开始正是朝鮮局面的最重要的发展。

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的“春季攻势”給打退了；总的說来，联合国軍隊都能坚守接近三八綫的一道防綫。6月里还进一步越过了三八綫，并短時間攻占北朝鮮首都平壤，但一般的战斗是輕微的。

6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賴伊发表声明說，“沿着接近”三八綫的地带停火就能达到击退对大韓民国侵略的联合国的目的。6月7日，国务卿艾奇逊也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这一声明是符合經我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議的。在5月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會議上，开始有系統地討論我們在亚洲的目的；这一討論一直繼續到6月16日才結束。关于朝鮮問題，我們將政治目的（建立一个統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朝鮮）和軍事目的（击退侵略并按停战协定結束敌对行为）区分开来。在战斗停止后，我們的目的是：在北部边境以南适于防御和管理而又接近三八綫的整个朝鮮地区，建立韓國的权力；为非朝鮮的武装部队撤出全朝鮮創造条件；以及建立韓國軍隊，以便制止或击退北朝鮮卷土重来的侵略。

这一政策並沒有变更。在整个朝鮮問題的过程中，我始終相

信，联合国可以而且應該证明，它不允許侵略者保持由于罪恶行为而取得的果实。但是，我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記：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宮里；或者忘記：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戰場而只在幕后拉綫，我們就决不能將我們再度动員起来的力量浪費掉。

因此，一旦大韓民国的領土基本上肃清了侵略軍，我們又重新強調我們願意举行談判，以期实现停战。6月23日，苏联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馬立克终于在联合国的广播演說中表示，苏联政府认为朝鮮交战的双方應該开始談判。两天以后，北平《人民日报》說，中国人民拥护馬立克的和平建議。

这时，我正在田納西州土拉霍馬参加一个航空工程研究中心的落成典礼，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我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我国外交政策的某些想法。下面便是我当天下午所說的一些話：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們曾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組織，以維持世界和平。我們这样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保持我国安宁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維持世界和平。……

“从来没有一个侵略者遇到过这样一系列的保障和平的积极措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現过这样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屏障。

“当然，我們不能担保将来不会有世界大战。只要克里姆林宮願意，它就完全能够掀起一場世界大战。它有一个强有力的軍事机器，它的統治者是一批专制的暴君。

“苏联統治者未来究竟怎样做，我們无法肯定。

“但是，我們能够使自己有資格对他們說：如果你們进攻，你們就会遭到自由国家的联合力量反击。如果你們进攻，你們就会面临一場你們不可能得勝的战争。……

“克里姆林宮仍然在設法离間自由国家。克里姆林宮最怕的是自由世界的团结。

“苏联的統治者一直在設法分裂北大西洋公約国家。他們一直企图在我們和其他自由国家之間散布猜忌的种子。他們的主要目标是拆散我們的盟友,并迫使我們‘单枪匹馬地去干’。

“如果他們能做到这一点,他們就能够进而实行他們的計劃,各个击破,以征服全世界。

“不幸的是,一直在設法离間我們和我們盟国的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宮而已。在我們国家里也有些人正在企图使我們‘单枪匹馬地去干’。……

“抱有党派成見的人力图把我們的外交政策說成是‘姑息主义’,还給它加上‘恐惧’或‘胆怯’的按語。他們只指向一个目标,要使我們‘单枪匹馬地去干’,走上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团結在維持和平的伟大、統一的运动中,这难道是恐惧政策嗎?在朝鮮打击武装侵略,并把它击退,这难道是姑息政策嗎?

“当然不是,每一个有点常識的人都知道不是。

“請看看这些批評家提出的另外的办法吧。他們是这样說的,冒一下风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們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說不定苏联不願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許我們不致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們希望我們拿着頂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俄国玩輪盘賭。……

“在朝鮮和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們必須准备采取一切能够真正实现世界和平的步驟。我們必須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足以导致世界大战的不必要的冒险行动,或其他足以使侵略行为得逞的軟弱行动。”

在同一篇演說中,我重复了我們願意参加朝鮮和平解决的談判,但是这必須是一个能使朝鮮人民重新得到和平与安全的真正

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国务院訓令駐莫斯科大使柯克就馬立克的演說詢問苏联政府的意見，苏联的答复证明馬立克所表达的是苏联官方的意見。

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員之間举行了許多次會議。这些會議的結果是我接到了一份建議书，它說我們的下一个步驟應該由李奇微將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願意同共产党司令員进行談判。我批准了这个声明；于是6月29日（星期五）便把這項声明发給远东美軍总司令，并訓令他在当日华盛顿時間下午六点钟将声明广播出去：

“总統訓令你在东京夏季時間星期六上午八点钟将下列电报用无綫电指明发給朝鮮共产党軍队司令員，并同时向报界发表：

“我以联合国軍总司令的資格，奉命通知你們如下：

“我得知你們可能希望举行一次會議，以討論一个停止在朝鮮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并附有維持此項停战的充分保证。

“在接到你們願意举行这样一个會議的通知之后，我将指派我的代表。那时我并将提出我方代表和你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議这样的會議可在元山港內一只丹麦医院船上举行。

“‘联合国軍总司令、美国陸軍中将 李奇微（签字）’”

在这份电报之后，我們就可能举行的任何談判的方式又給李奇微將軍发去一些訓令。这些公文同样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拟定的。6月29日深夜，布萊德雷將軍帶了一紙訓令的草稿到《威廉斯堡号》游艇上来，我在那里研究了這個草稿，并批准了它。

这道訓令撤銷了从前关于停战条件的指令，并包括关于在李奇微和朝鮮共产党軍队司令員进行談判时作为指导的某些談話的訓令。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說的：

“(一)在这次停战中，我們的主要軍事利益在于停止在朝鮮的冲突，保证制止战斗的再起和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

“(二) 不論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对决定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停战部署的态度是否认真，或者他們是否准备同意訂立解决朝鮮問題的可以接受的永久性办法，我們都缺乏确切的保证。所以，在考虑停战时，縱使就政治問題和領土問題达成協議毫无进展，获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內仍为我們所能接受的停战部署，也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三)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員之間的談判应严格限于軍事問題；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鮮問題的談判，或考虑与朝鮮問題无关的問題，如福摩薩問題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問題；这些問題必須由政府处理。……”

我訓令李奇微在談判立場上要极其謹慎小心，除非对方不接受我們最低限度的条件，否則不得让談判破裂。

我又进一步向他发出訓令：停战協議应限于朝鮮問題，而且严格地只限于其中的軍事問題，不應該涉及任何政治或領土問題。

共产党司令員給李奇微电报的复文是7月1日由北平广播出来的。他同意为“举行停止軍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談判”而进行会晤，并建議在三八綫附近的开城地区作为談判地点。双方聯絡官于7月7日首次会談，7月10日代表团举行首次會議。

从第一次會議起，共产党人证明他們在阻撓和拖延談判的进行，直到符合他們的意图为止。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我們先后以海軍中将乔埃和哈里逊將軍为首的談判人員對他們的任務表現极大的耐心和毅力。正如过去从戰場送来的报告一样，我每天接到有关和談營帳中进行談判的全部情况的报告。重大的步驟都是經總統明确批准以后才决定的，甚至远东軍总司令或首席談判代表在重要关头所作的声明的措詞也是这样。

我一再表明，如果停战談判失敗，必須使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地了解談判的失敗是由敵人造成的，而不是由我們這一方造成的。

李承晚時常發表聲明說，他決不接受一個不統一的朝鮮，這使談判複雜化了，但是在11月到1月間談判還是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在這段時期還未過去以前，達成協議看來似乎是可能的。接着新的複雜的情況發生了。有些問題所牽連的只是這樣一些細小的問題，如應該用甚麼字樣來稱呼“朝鮮”。然而，最難於對付的問題是牽涉到遣返戰俘的問題。

我們當然極其迫切地希望我們的被俘人員能遣送回來。有許多傳說和證據說明共產黨人對俘虜採取不人道的待遇。共產黨人拒絕紅十字會視察俘虜營，雖然他們最後提供我方一張俘虜的名單。不過，這只有他們自己公開宣稱他們所俘擄的戰俘人數的六分之一，而他們却反而說聯合國司令部所提供的名單不完全。

1952年1月1日，我方建議交換一切願意遣返的戰俘。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最激烈的爭論；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堅持我們不能讓步。

共產主義是一個不尊重人類尊嚴或人類自由的制度，沒有一個思路正確政府會同意把願意維護自由的男女強迫送回這樣的制度中去。過去我一貫堅持，我們決不能拋棄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南朝鮮人和自由，現在也是這樣，我拒絕同意規定違背戰俘的意志而把他們送回共產黨統治地區去的任何解決辦法。1952年5月7日，我以官方的口吻發表一項公開聲明表達了我的思想，其中有一句話絲毫不差地在文字上道破了我心中的想法：

“我們決不用遣送這些人供屠殺或奴役的辦法來購買一個停戰。”

就我來說，這決不是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問題！

下面是我聲明的全文：

“(一) 美国完全同意并且毫无保留地支持李奇微將軍向朝鮮的共产党侵略者提出的关于达成停战協議的建議。

“(二) 去年7月，联合国軍击退了共产党在朝鮮的侵略，向共产党证明了侵略是不可能得逞的，并为全世界自由的人民带来了和平的新希望。接着苏联表示可以通过軍事停战協議来停止朝鮮的敌对行动。联合国軍司令部抱着为和平解决寻求基础的真诚願望，开始在朝鮮同共产党进行停战談判。

“(三) 經過許多月困难重重的談判以后，除三个問題外，全部問題都获致初步協議；在談判中，每個問題都是分別討論解决的。現在很明显，剩下的三个問題是不能分別解决的。联合国軍司令部的建議为同时一道解决这三个問題提供了公平而确实的机会。这个包括三点意見的建議是：

“(1) 不能按共产党所坚持的强迫遣返战俘。同意强迫遣返战俘是不可想像的。这样做将违反基本的道义和人道原則，而这些原則是在朝鮮的行動的基础。用武力强迫遣返我們所拘留的战俘，会造成痛苦和流血，而使美国和联合国的名誉永受玷辱。

“我們决不用遣送这些人供屠杀或奴役的办法来购买一个停战。联合国軍司令部在把那些表明坚决反对遣返共方的战俘分开时，极为慎重。我們已建議在停战后让公正人士對我們拘留的那些人重新进行詢問。再也沒有比这种办法更公平的了。共产党坚持强迫把不願受他們統治的人遣送回去，这向全世界駭人听闻地暴露了他們所实施的制度。

“(2) 联合国軍将不坚持禁止重建或修复飞机場。

“(3) 中立国監察委员会应由共方遴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联合国軍司令部遴选的瑞典、瑞士四国代表組成。

“(四) 李奇微將軍建議中的三个部分是构成一个整体的組成部分，它們是一个整体，不是零散的东西。我們是否同意达成協議

要看他們是否接受整個建議而定。這就是我們的立場。共方迄今只表示願意撤回要蘇聯參加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的建議。這個假造的問題是他們在談判的後期提出來的，撤回這個問題並不是他們的真正讓步。

“（五）李奇微將軍和聯合國軍司令部的談判代表表現了耐心和機智，值得給以最大的贊揚。他們不顧幾乎不能忍受的挑釁，在達成停戰的許多實質條款的協議方面獲得了真正的進展。李奇微將軍的建議是同時解決剩下的問題的明智辦法。這個建議將使那些熱望和平的人不能不表示同情。”

1951年秋天會議地點已從開城移到板門店。這一聲明所談到的建議是為調解會上顯然存在的分歧意見的三點計劃。

然而，共產黨人對交換戰俘問題依然拒絕作任何讓步。他們想以他們所拘留的全部戰俘交換我方所拘留的全部戰俘。我明確地表示，我不同意進行任何戰俘買賣，這可能造成把非共產黨人強迫送回到共產黨控制區去的後果。同意這樣做不但是不人道的和悲慘的，而且也是可恥的，因為我們在戰俘營中的調查證明，為我方所俘的極大部分的中國人和北朝鮮人都不願意在這樣的情況下遣返回去。因而，我們建議交換所有願意遣返的人。

共產黨的代理人為了達到控制戰俘營的唯一目的，有意讓自己被俘擄過來，他們在某些情況下，的確成功地建立了恐怖統治。然而，這並沒有改變許多戰俘的意志。只是因此而引起的騷亂却給我方司令官製造了很多的困難。

1952年5月遠東軍司令換了人，當時我派李奇微將軍去歐洲接替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職位出任盟軍駐歐洲的最高司令。為了接替李奇微，國防部推薦我們戰時駐意大利的司令官馬克·克拉克將軍，我批准了這一推薦。

克拉克將軍的工作很不容易。几乎在他一接掌統率权时，就碰到巨济島上战俘营里的棘手的局势，那里的共产党战俘竟企图綁架主管战俘的美国將軍。停战談判似乎完全停頓了，但是共产党发言人南日將軍坚持繼續举行會議，在会上他长篇大論地发表宣传演說。李承晚總統和他的国民議會发生了爭执，他宣布了戒严令，逮捕了他的一些政敌。

与此同时，北朝鮮的共产党力量已經加强了，克拉克將軍不得不提出增加軍隊的問題。显然，自从 1951 年春天以来，我們已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韓國的軍隊，因为克拉克坚决主张扩充韓國的軍隊，他还再次提出中国国民党的支援問題，主张要蔣介石提供两个师。

我們在福摩薩的軍事顧問蔡斯少将不贊成当时派蔣介石的任何部队去朝鮮。然而，參謀长联席會議仔細地研究了这一建議的軍事利益，向国防部长建議說，在他們看来，派中国国民党部队去朝鮮是可取的。罗維特部长就這一問題和他所有的顧問进行了充分的討論，不时向我报告討論的进展。

国防部长对各种办法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这些办法可以多少減輕两年多来对朝鮮提供那么多战斗力量的美国軍隊的負担。最后，发觉增派中国国民党部队的利益都是增加韓國部队所能取得的。沒有事实足以說明从福摩薩派去的两师中国軍隊（尽管他們是部分受过訓練的）会使 1952 年的朝鮮局面起重大的变化。

关于我們的朝鮮政策問題，与其說是我們可以做什么，倒不如說是我們不得不做什么。

我已相当詳細地敘述了我們在朝鮮所采取的行动的一些事实，因為我們和我們的盟国在朝鮮所做的对全世界未来的和平将有深刻的影响。这是我作为總統不得不作出的最棘手的决定。我們在朝鮮的攻击中所碰到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兆头不祥的威

胁。

但願除迅速的軍事行动之外还有其他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这种侵略，因为我知道抵御侵略就会引起生命的可怕的牺牲和深重的苦难。但是摆在我們和自由世界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抵抗，不抵抗就只有向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軍事侵略投降。我相信：如果在朝鮮的侵略行为不加以制止，正如1930年在滿洲^①和1935年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行为沒有加以制止一样，全世界就必然会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这是和希特勒在越过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境时在世界其他各国面前所夸耀的同样性质的挑战。自由世界当时沒有迎击那一挑战，結果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自由国家——联合国——迅速地意識到对世界和平的新威胁。联合国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产生的，建立的目的就在于阻止或对付侵略，不管侵略在甚么地方有爆发的危险，或实际上已經爆发。

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能那样自发地、迅速地起而对付侵略。利用国际机构来对付那些凭借战争手段强把他們自己的意志或制度加在別国人民头上的人，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們一开始就知道，美国得承担主要的重担。由于我們的地理位置和我們的力量，这是責无旁貸的。我們的盟国还在重建它們百孔千疮的国家，还在医治恢复緩慢的民众創伤。何况我們的大部分盟国在自己的边境上也可能遭遇到共产党的侵略。

过去，有好几次，共产党人曾企图刺探，如果他們采取征服和扩张的行动，我們会怎么办。在伊朗、希腊、土耳其和柏林，他們都知道我們是不受威吓或欺騙的。但是在朝鮮問題以前，他們一直把他們的行动局限在顛覆活动、間接侵略、威吓和革命上。

① 原文疑有誤，此处恐系指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譯者

在朝鮮，全世界面臨了共產黨人新的大膽的挑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共產黨人在這裡第一次公開地、狂妄地訴諸武力和侵略。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讓共產黨帝國主義者認為他們可以隨意進入朝鮮或其他地方。我們必須迎擊這一挑戰；事實上我們這樣做了。我們必須迎擊這一挑戰，使全世界不致卷入一場全面性的戰爭。這一點也做到了。

第二十九章

鋼 铁 危 机

1951年11月1日，美国联合鋼铁工人工会宣布，当他們和鋼铁制造商所簽訂的合同到1952年初期滿时，他們就将要求改善某些工作条件和大幅度地增加工資。这是一系列事件的开端，最后，它迫使政府不得不出來接管我国的一些鋼铁厂。

鋼铁工人們的要求，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越軌的地方。朝鮮战争和国防計劃的需要大大增加了鋼铁工厂的营业数量，鋼铁公司的利潤上升了。朝鮮事件前三年，鋼铁工业的平均利潤是每吨六元五角九分美元。可是，1951年这个供应朝鮮战争需要物資的第一个整个年头，納稅后的利潤是每吨七元零七分美元。而且，根据总統的要求和国会的授权，国防部給予它們以大量的定貨，从这些大量訂貨来看，对鋼铁制造商來說，1952年的情况如果不是更好的話，至少可望与以前一样好。

我們面临这样一种經濟情况：工业的錢賺得多了，而工厂里的工人却發現，生活費用的提高削弱了他們工資的购买力。食品和衣着以及类似的基本項目的价格上涨了。

可是，工資还只是工会希望进行談判的問題之一。工会和某些公司——特别是美国鋼铁公司——之間的关系是普遍恶化了。糾紛是由于公司設法采用增产鼓励工資制而引起的。工人們指控說，不管对不对，这个制度把他們当成机器一般來对待，他們对此感到憤慨。

我相信，許多好心腸的公民却沒有認識到下列事实，即对工人

們說來，工會遠不止是一個爭取提高工資的工具。在這個機器時代，單個工人沒有多少機會使他感到他所做的工作是重要的。參加了工會的工人，像其他任何人一樣，希望感到自己是在取得某些成就，通過工會，他獲得了人類的尊嚴感，感到他與別人一道做了一些有意義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他要抗拒任何干預工會的行徑。

僱主壓迫工會，僱主反對工會，原是有一段很長的历史的，這就無怪工人們一向認為，大多數僱主是想盡辦法要扼殺工會，僱主通過一項變革所希望做到的任何事情都是旨在使它成為工會的催命符。工會反對增產鼓勵工資制的原因之一是，它們把它看成是剝奪它們作為爭取工資的談判代理人的權利的一個工具。剝奪了它們這種權利，將會削弱甚至闕割工會最重要的職能之一。

我們的某些比較開明的工業懂得這種道理，發展了勞工方面和管理方面兩者之間的关系，結果取得了較大的效率。建立在這個基础上的管理和勞工之間的关系導致了和諧和彼此諒解，這對工人和公司兩方面都有利。但是，在某些工業中，工會主義却從來就沒有被全部接受。

1951年，鋼鐵工業聲稱，它不希望討論工會所提出的增加工資和改變工作条件的要求，工會方面則宣布，工人將在12月31日舉行罷工。我完全不理解，為什麼公司方面拒絕和工會舉行談判。也許他們認為，這是強行其是的大好機會。也許他們相信，國防計劃的急迫需要將會把政府帶進這場爭執之中，而在不改訂合同条件的情况下強迫繼續進行生產。不管是什麼样的理由，國防部和國防生產机构的官員却怀着極為惶恐的心情看待這場迫在眉睫的罷工。國防部長羅伯特·羅維特幾個月來一直向我指出，如果讓罷工阻礙了生產，那末國家防務計劃將會受到危害。內閣中所有的成員都一致同意羅維特的看法，認為，如果允許我們的鋼鐵工廠關門，對於美國和朝鮮戰爭將都是有害的。當時我們不但要設法

使朝鮮和其他地方的武装部队得到充分的装备，而且我們还答应要給盟国以武器和弹药，而它們抵抗共产主义的决心，可能就要看我們能不能供应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武器。显然，如果鋼铁工业发生罢工，我国的最高利益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2月22日，我把美国联合鋼铁工人工会和鋼铁公司之間所发生的这种糾紛交給工資稳定局去解决。工会方面立即响应了这个行动，同意推迟罢工，以使生产不遭到中斷。

在推迟罢工以期通过談判求得解决办法的方面，我可以在国会提供的两个办法中选择一个。第一个办法引用塔夫脫—哈特萊法，該法案有一条关于八十天禁令的規定。与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所断言的相反，这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規定。相反地，它規定了在罢工危害到国家的健康与安全的情况下，总统可以指定一个調查委员会来判明事实真相，并向他提出报告。在收到了那个报告之后，总统可以指令司法部要求法院下令禁止罢工八十天。在这段期間內，調查委员会就設法求得一个解决办法。在第八十天終了时，除非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否則罢工就可以合法地进行下去，这时总统必須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議。

另外一个办法是引用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該法案宣称，“国会的意图是，为了提供有效的物价和稳定的工資……以及維持不間断的生产，必須有有效的处理办法来解决影响国家防务的劳工糾紛”。这一条規定授权总统提供类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战时劳工局所采取的处理办法。

我秉承国会的指示办事，曾經設立了一个工資稳定局，并責成該局負有解决影响国家防务的劳工糾紛的职責。1951年，国会收到一份記錄在案的詳細报告，其中談到該局如何起到了塔夫脫—哈特萊法中所規定的处理办法的代替作用。众議院曾打算提出一項动議，以便剝夺工資稳定局所具有的处理劳工糾紛的权利。可

是，這項動議被擊敗了，國會還竭盡全力來擴大國防生產法，使它包括一個用來處理勞工糾紛的代替辦法。

在這兩種辦法中決定要選擇其中之一時，我首先考慮了塔夫脫—哈特萊法。但是塔夫脫—哈特萊法基本上是為了解決和平时期的勞工問題而擬訂的。而工資穩定局却是特別為了解決與防務有關的勞工糾紛而建立起來的。在這一年中，它的這種職能還再一次被國會所肯定。我們所面臨的這種形勢使得我轉向了工資穩定局。

從1952年1月10日到2月26日，工資穩定局舉行了範圍很大的意見聽證會，並與各黨進行了討論，3月20日，該局交給了我一個報告。關於工資問題，它建議，應該給工會增加工資，增加的總數是每小時二角六分四厘美元，在十八個月內分成三個階段來執行。這比工會所要求的要少些。在其他方面，工資穩定局也削減了工會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它建議完全拒絕工會的要求。把這個決定與工業界當前和未來可能賺得的收入相權衡，這項建議在我看來似乎是公平的和可行的。

國防動員署署長查爾斯·威爾遜在3月24日向我提出報告說，公司方面將斷然拒絕建議中的解決方案。他說，在長期罷工之後，工業界將會進行抵制，防止工廠關門的唯一辦法是批准公司方面所要求提高的價格。

為了防止發生一次全國性的危機，我並不反對合理地提高價格，這將補償較高的工資成本，當我們在1946年遇到一次鋼鐵罷工時，專家們為我作了一次計算，它告訴我們，當時擬議中的工資到底要增加到多少才會使產品成本上漲，提高價格就是根據那種計算來批准的。然而，根據目前這次情況中的數字來看，我感到鋼鐵公司所提出的提高價格的要求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對於國家來說，這次要求提得也不是時候。

工业界要求对所有的精制鋼，不管其售价如何，一律全面提高价格。事实却是，鋼铁的价格，从便宜的精制鋼到特种鋼和高級鋼，其价格等級是相差很大的。对現行价格按美元来一次全面提高，其結果将会是，較低級的鋼的价格按比例來說就提高得較多了些，但是对那些生产出来以最高价格出售的鋼的价格來說，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认为，采取这种全面提高价格的方式来补偿提高了的成本，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鋼铁公司的利潤在不断增长。国家則在征募它的人員前往戰場作战，我认为，軍火制造商和他們的原料生产商不应该利用这个紧急时刻坚持要获得超額利潤。在我看来，公司方面的态度似乎是錯誤的，因为，在加速进行国防計劃的情况下，政府就是鋼铁和鋼铁制品的最大的主顧。在这个时刻提高价格，那就意味着在国防工具上向政府索取更多的錢。

当然，我理解到，工資的任何提高都意味着增加产品的成本，但是，在未能证明由于工資的增长而必須按照一个划一的数字来使价格表上的价格全面上升的情况下，我可不愿意让我自己承担核准这一数字的責任。

在我国的高度机械化的經濟中，鋼铁是如此之重要，以致其价格有任何些微的上涨就立即会引起一大串貨物——从冰箱和汽車直到罐头和发夹——的价格上涨。鋼铁价格不成比例的上涨将会起一种引起通貨膨脹的作用。由于这个緣故，我认为，只有鋼铁工业所担負的生产成本超过了其正常的數額，我才有理由同意提高鋼铁价格。然而，这一次，鋼铁工业却极力想要取得比其应得的利潤还要高得多的好处，并且使政府吃亏。

使我感到遺憾的是，威尔逊竟把我考虑作一次价格調整，以补偿实际增加了的成本这个意願，解释为答应滿足公司方面的全部要求。当我糾正他的解释，指出他的錯誤时，他便辞职了。

現在已很明显，要找出一項解决办法是很困难的。

人們开始举行一連串的會議和商討，我的助手，解决劳工問題的能手約翰·斯蒂尔曼，在他的办公室里和劳、資和政府方面的团体和个人举行各种會議。會議的參加者將他們的談話內容报告給我，并征詢关于某些問題的意見或决定，但沒有取得什么进展。4月9日，工会宣布它們將举行反对鋼铁公司的罢工。

我又把我的一些主要顧問召請来商談，以决定采取什么步驟对付这次紧急事件。国防部长罗維特強調說，鋼铁生产的任何停工，甚至是极短时期的停工，都会增加我們在軍备計劃的“加紧生产制”中所承担的风险。他还指出，我們三軍中整个的作战技能，就是依靠充分利用我們的工业設備。在着重談到朝鮮的形勢时，他說，“我們現在是以弹药而不是以我們軍隊的生命来守住战綫的。”他警告說，鋼铁生产有任何縮減，都会危及我們作战人員的生命。

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对于因缺乏鋼铁而会耽誤大力扩充原子武器生产設施一事，感到严重的关切。国家生产局局长亨利·福勒对我說，除了軍事装备、原子能建設、动力工厂、铁路建設、造船、工作母机制造等部門外，一切都將停頓下来，如果鋼铁工厂关門的話。他指出，这就要看存貨的情况和制造业工厂的鋼铁能維持多久；而某些弹药制造部門实际上手边已无存貨。

商务部长索耶簡要对我談到鋼铁工厂关門对若干運輸計劃所产生的影响。他提出的数字表明，鋼铁生产中断十天將意味着損失九万六千呎的桥梁和一千五百哩的公路。他报告說，万一鋼铁工厂关門，那末正在美国造船厂里建造的九十八艘船，只有二十一艘能够建成，另外三十九艘就不得不全部放弃。他对我談到对飞机生产将会有这样的影响，以致譬如說康維尔和道格拉斯两家工厂將不得不在六十天以內停止它們的装配綫。危險的是，有些制造

厂商将等不到缺货开始，而是一旦鋼铁生产停頓，就要关門。

內政部长奥斯克尔·查普曼說，石油、煤气和用电部門的設備維修和扩建都要依靠鋼材。对于煤矿和炼焦炉，不但任何一个附件，而且主要用途也都需要鋼。

我和迪安·艾奇逊的討論，談到这种威胁着要瘫痪我們国防經濟的冲击，可能会影响到我們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根据共同防务援助計劃，我們答应給我們的盟国以装备，我方如果有任何一点做不到，将会严重地損害他們對我們在危急时期援助他們的能力的信心。俄国将会由于看到我們在重整軍备方面減緩速度而感到高兴。我們甚至也不能忽視这样的可能性，即俄国认为我們因一次持續罢工而被削弱，以至招致他們作进一步的侵略，而且可能出現其他的“朝鮮”。

所有这一切呈現出一幅非常严重的景象。国会在进行辯論，并大談其鋼铁危机；我本来是欢迎国会有任何实际解决办法的。但光凭討論却不够。我必須采取行动来制止这个危及国家安全的鋼铁生产停工。除非最后几分钟的努力导致和解，我看不出有其他办法，只好由政府来下令接管鋼铁工厂。

“政府接管”的說法听起来好像很可怕。有些人认为，接管意味着把私人财产充公或加以剝夺。但是所发生的真正情况是，政府只是对这些财产采取暂时保管的办法。原来在接管前負責管理工作的那些人則讓他們代表政府繼續做这些工厂和工場的管理工作。这样一来，政府就能有把握地做到使生产不致中断。

資方也好，劳方也好，誰都不願意政府接管。他們是不会願意的——当然不会願意；政府方面也同样不願意。最好是每个人、劳工和資方解决他們自己的問題而不用政府加以干涉。但是当他們走进了死胡同，危害到国家，像这次的情况一样，接管便是幫助他們获得解决办法的一个有效途徑。

当我在白宫任职期间，政府部門的首脑常常劝我接管那些一定要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的工业或工厂。但是除非在少数危急情况下，我是拒绝这样做的。我总是把接管当作一种最后的手段——只有在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或者是在必须保护整个国家的时候，总统才采取这种办法。

为了这个原因，我一直等到罢工开始前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才发布这个接管令。在那个最后的一天，我大部分时间是同斯蒂尔曼博士和商务部长索耶一起度过的，他们两位的工作将是监督被接管的工业。于是就在工厂预定要受到罢工打击的前几小时，我发布了第一零三四零号行政命令，接管钢铁工厂。同一天的傍晚稍后时分，我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发表演说，说明采取这次行动的理由。

“如果钢铁生产陷于停顿”，我解释道，“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制造直接运送到我们朝鲜前线的士兵手中去的子弹和炸弹。如果钢铁生产陷于停顿，我们将不得不削减和推迟原子能计划。如果钢铁生产陷于停顿，不久我们就不得不停止制造空军飞机用的发动机。

“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争取和平的机会将依赖于我们的国防生产。我们的国防生产则依赖于钢铁……”

“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我们的国防计划没有能实现，那末战争的危險和遭受敌人攻击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增加。

“如果我不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便是不忠于我作为总统的责任。

“由于美国军队正在战场上与敌对垒，如果我沒有能做到所需要做的一切，供应他们以保卫生存所需要的武器和弹药，那我便是沒有履行我作总统时的誓言。”

我宣布说，我已命令商务部长索耶接管钢铁工厂，要它们继续

开工，并已指示斯蒂尔曼博士把鋼鐵公司和鋼鐵工人工会的代表都召到华盛顿来，重新再作一番努力，让他们解决他们之间的糾紛。

我向美国人民回顾了导致这种局势的发展情况，并強調指出下列事实，即在平常时期，集体談判是解决工資和工作条件的适当办法，但是在这个国防建設时期，阻止物价飞速上涨乃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国会曾規定一个基本政策，每个人都必須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稍微牺牲个人的一点利益，而根据国会政策所制訂出来的規章是公平的和公正的，而且也公平地和公正地应用于这次的事件。工会方面接受了这些規章，但是公司方面却没有接受。遺憾的是，公司方面采取了下列立場：除非他们能够在他们所要求的鋼鐵价格上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否則該工业就将停止生产。

我指出了这对整个物价稳定計劃的灾难性影响，如果答应鋼鐵价格作一次大幅度的提高的話；并且說明这如何会引起所有用鋼鐵制造的貨物——从坦克到打蛋机——的价格上涨，这又如何为許多其他希望提高它們物价的工业树立了一个先例。“如果我們在这个問題上对鋼鐵公司让步，”我說，“那你可就与稳定的物价告別了。如果我們向鋼鐵工业投降，那末可怕的现象将会出現。物价将会在我們四周围立即飞涨起来——不单单是用鋼鐵制造的东西的价格，而且我們购买的其他許多东西，包括牛奶、雜貨和肉的价格也会上涨。”

我說明，国会让我在利用工資稳定局或塔夫脫—哈特萊法禁令两者之間选择一个办法；我決定从头到尾通过工資稳定局。結果，我們得到的是九十九天的生产而不是一項禁令所給予的八十天的生产。然而，国会既未选择向我提出建議，也未赋予我权力来运用这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因此，我們现在就处于这样的境地，只有政府实行接管，才能阻止这种威胁性的关厂。我非常清楚地

表明，我无意让政府接管鋼铁工厂的时间，絲毫超过为阻止关厂所絕對必需的时间。但是根据我做总统时宣誓要完成的职责，我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来阻止鋼铁生产停工，现在就无可避免地要接管工厂。

第二天，我向国会提出一个咨文，說明我所采取的行动，我請求国会为政府經營工厂的期限和条件規定特別立法。我在这个咨文中說，我乐意执行国会针对这种情况而打算拟訂的任何政策，甚至他們想取消我刚才采取的行动也行。我补充說，除非国会采取行动，否則我自然必須負起我自己的責任。

在我看来，接管完全是在宪法賦与我的权力范围之內的，我是据此而行事的。宪法規定，“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被賦与行政权力”。这句话把一項非常艰巨的責任加在那个有幸做了总统的人的身上。他担任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职位。肯定地說，这是美国人民所能賦与任何人的最大的信任。正因为賦与了这种权力，才使得一个有思想活动的人受寵若惊。历史上有些人喜好权力，喜好伴随权力而来的那种魔力。簡單举几个人为例，如亚力山大、凱撒、拿破侖就是如此。我却从来不是这样。我所关心的，只是对于那賦与我以权力的人民所应負的責任。我认为，总统的权力應該为了人民的利益来使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总统就必须运用宪法所沒有明文規定不让他使用的一切权力。

当一个重要的經濟部門在国家安全处于危急的时刻行将发生瘫痪这种危險时，那末，在我看来，总统明显的責任便是采取步驟来保护国家。林肯有一次曾經問道，“一个政府是不是必然由于太強硬而违反了其人民的自由权，还是由于太軟弱而无法維持其生存？”历史用林肯的行动記載了他的回答。

我自己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我相信政府既能是自由的也能是坚强的。而且，我肯定地认为，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府来維持人

民的自由权，只有一个自由政府才能具有这个确保其生存的力量。民主政府的精髓在于它是負責任的，对我說来，这意味着应接受并实行政府的这些責任——直到选民将它們交給另一个人为止——那时他的責任便是按照他所理解的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而采取行动。

政府的这个責任——积极地增进国家的利益——沉重地落在总统的肩上，但是也落在国会的肩上，而国会仅仅采取一种否定的方針就不能履行其責任。国会对政府在紧急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仅仅使用瘫痪的办法，是不能执行其宪法职能的。

我本来希望，国会将会以某种积极行动来回答我提出的报告，我是非常願意忠实地执行国会所决定的一切政策的。但是，表现出来的唯一的行动似乎完全是否定性的：在参議院里，对第三补充撥款法提出了一个附录，用以限制根据我的接管令对鋼铁厂采取行动而撥出的那笔款子的用途。这是彻头彻尾地运用政治权力来进行一項撥款立法，这样的行动是我一向所反对的。参議院的这个行动促使我向作为参議院主席的副总统巴克萊写了下列一封信。

“我并不希望，”我写道，“妨碍国会所采取的行动，我很想請求国会——如果它采取行动的話——以一种符合其責任的态度，根据我国和整个自由世界所面临的危急形势而采取行动。……”

“不管鋼铁生产实质上停工多久，都会立即削弱我們在朝鮮的軍隊保卫自己以抵抗敌人进攻的能力。如果敌人今年春天在朝鮮发动另一次进攻，那末这次进攻的成敗与否就全看我們是不是使我們的鋼铁工厂一直在进行生产……”

“我希望，国会在这个問題上所通过的任何立法，都会提供一种办法，从而使鋼铁工厂能够保持持續不断的开工生产……”

我感到遺憾的是，参議院並沒有答复我这封信。許多南方的

參議員同所有的共和黨人——只有莫爾斯和朗格這兩個共和黨人除外——一道把這個附錄寫進了這個法案，但是國會卻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行動，也沒有拿出任何建設性的建議來對付這次危機。這是為什麼，我就永遠也弄不清楚了。

與此同時，斯蒂爾曼博士繼續同代表勞資雙方的談判者舉行會談。國防部長羅維特在談判者面前向他們着重地談到了國防形勢的嚴重性，並且指出了由於停止生產——不管其時間是多麼短——所帶來的危險性。

鋼鐵公司對接管採取了猛烈的反擊行動，緊接着在我向全國發表了演說的第二天，內地鋼鐵公司的總經理克拉倫斯·朗戴爾便開始作了一次廣播和電視演說。公司方面現在向法院提出了控訴。

訴訟程序——最後到了最高法院——的第一階段發生在4月29日，當時美國哥倫比亞特區的區法院法官戴維·潘恩下命令要商務部長索耶把這些工廠交還給公司。可是，在第二天，上訴法院將這個命令拖延了一下，這樣最高法院便可以就政府接管工廠的權利作出決定。

在潘恩宣布了他的命令之後，鋼鐵工人工會便停止了工作。但是當上訴法院接着發出了延期令時，工會便立即恢復了工作。公司和政府於是便要求最高法院審查法官潘恩作出的裁決，當高等法院在仔細考慮要不要和何時審理這個案件時，談判在繼續進行——多半是在約翰·斯蒂爾曼的辦公室里——他們在尋求直接的解決糾紛的辦法。

到了5月3日，美國鋼鐵公司的總經理和公司方面的主要發言人本·費爾勒斯同美國鋼鐵工人工會的主席菲耳·墨萊（也是產業工會聯合會的主席）最後排除了某些主要的意見分歧的地方。約翰·斯蒂爾曼告訴我說，能夠有一次真正的機會來達成協議，這

还是第一次。但是，当白宫和劳资方面的谈判代表还在进行工作时，新闻发报机发出报道说，最高法院已经同意立即审理这个案件。这就突然中断了一切谈判。钢铁公司在那天的早晨已经表示愿意作重大的让步，而他们现在却退出一切谈判。如果最高法院大约迟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发出这个通知，那就很有可能达成了协议。

政府的起诉书是由助理检察长菲利普·珀耳曼在最高法院提出的，他是一个出色的律师和有献身精神的公僕。他巧妙地和强有力地提出了政府的控诉。

钢铁公司方面的代表是约翰·戴维斯，他是192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率领了一个由纽约、费拉特尔费亚、克利夫兰、匹兹堡和华盛顿的能力高强的公司法律顾问所组成的代表团。

这位助理检察长为美国政府提出了两方面的论据。第一，法院不应该受理他们的控诉，因为公司方面不管由于接管而可能遭受到什么损失，他们是有能力加以恢复的。第二，接管公司的财产是美国总统权力的一种合法运用。

据我看来，报纸在对待这次接管钢铁工厂的事件中所作的聳人听闻的报道和所表现的党派之见，在历史上是无出其右的。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要算在美国最高法院还没有裁决一个案件之前，美国报纸社论所进行的干涉。新闻报道和社论诋毁接管并煽动舆论，在法院本身正在听取双方论据的时候来左右和判定这次案件。钢铁公司买下了整版整版的广告栏，利用它们在全国报纸上对美国总统进行攻击。它们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影响舆论，反对政府。

对政府来说，我的见解是，一旦案件到了法院，我再表示意见就不相宜了。我一向认为，我们的报纸有时对法院未加判决的事情就进行评论的这种做法，是影响一个法官判决案件的一种不道

德的企图。的确这样，在这次钢铁事件中，它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散布不正确的看法，渲染气氛。公司方面的公众关系专家巧妙地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工业界对价格的要求转移到莫须有的总统的不正常的和无前例的行为。

稍稍读过一点历史书的人就会知道，这种行动并不是罕见的事——过去，甚至在这个国家没有进行什么真枪实弹的战争之前，政府就曾接管过受到罢工威胁的工厂。但是这些事实没有被提起，或者即使提起了，也很快地一笔带过，好像它们在目前是没有什么意义似的。

当然，我决不会隐瞒下列这个事实：即6月2日最高法院所宣布的裁决令我非常失望。我想最高法院院长文森的反对意见是完全对的，我肯定地认为，总有一天他的这个看法会被人们公认为正确。

最高法院院长根据他自己的看法，对法院的多数派意见作了下列的评论：“多数派中六种主张所表示出来的意见分歧，没有参照权威性的先例，一再倚赖于先前的反对意见，完全忽视了表明紧急事件的严重性和接管的暂时性质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人们在肯定区法院的命令上是走了多么远。”

我不是律师，这种法律上的辩论还是由别人去管吧。但是作为一个门外汉、作为政府的一个官员和作为一个公民，我往往感到难以理解，法院怎么能这样对待像罗维特、查普曼和其他一些人的证词并完全不把它们放在眼里，而所有这些都详细地说明了一次钢铁厂停工将会对国家带来严重的危险，他们的证词既没有遭到公司方面的反驳，也没有引起它们的争论。

我不禁想到，要是在法庭上有一个霍姆斯^①，一个休斯^②，一个

^① 奥利佛·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 1902—1932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推事。

布伦代斯^③ 或者一个斯通^④，不知道将会作出怎样的裁决！

法院的裁决令于6月2日下午早些时分送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在三点钟以前，我便给商务部长索耶发出一个命令，要他遵照裁决令办事，把工厂交还给钢铁工业。下午四点半钟，在我的办公室里匆忙地召集了一次会议。国防部长罗维特和商务部长索耶一道出席了会议。新上任的司法部长詹姆斯·麦克格拉纳里也在座，同来的还有司法部副部长珀耳曼、劳工部长托宾和白宫的几位工作人员。我希望知道一下，这些顾问们根据法院的裁决将会提出什么样的行动方针。我们现在应该采取塔夫脱—哈特莱法的禁令吗？如果不采取的话，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呢？我顺着坐席请每一个到会的人都谈谈他们的意见。只有一两个认为，我应该根据塔夫脱—哈特莱法开始采取行动。多数人认为，既已利用了工资稳定局，这条路对我就不再行得通了。也有人感到，最高法院的意见大大地加强了工业方面的谈判地位，以致要想从中调解，找到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比以前还要困难得多。

6月10日，我作了进一步的努力，请求制定法律，允许我接管那些一定要罢工的工厂。但是国会拒绝给予这个权力。整个国家的钢铁工厂都停下来了。

罢工持续了五十三天之久，只是到了劳资双方最后达成一项协议时才告结束。这是在答应提高钢铁价格之后才达成这项协议的。为了解决罢工问题，允许给公司方面每吨钢铁增加五元六角五分美元。

② 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1862—1948), 1930—1941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院长。

③ 路易斯·布伦代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 1856—1941), 1916—1939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推事。

④ 哈伦·斯通(Harlan Fiske Stone, 1872—1946), 1942—1946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院长。

我以一种不得已的心情批准了这次价格的提高，因为我确信这是錯誤的——正如同我在3月和4月拒絕批准时一样，那时提高物价就是錯誤的。但是現在最高法院已否定了政府管理工厂的权力，国会駁回了我請求接管的权限。因此公司方面現在拥有一切有利条件。如果我們需要鋼铁——我們非常迫切地需要——那就得依从工业所索取的价錢。

罢工在7月24日結束。六十万名鋼铁工人賦閑了七星期以上。二万五千铁矿工人在那个時間内举行了一段時間的同情罢工。由于缺乏鋼铁，汽車工业里有三十万工人遭到解雇。在这个時間内，每天的工資和生产損失估計为四千万美元。全部損失估計在二十亿美元以上！这还没有把在解决了糾紛之后国家为防务努力而需要的鋼铁和鋼铁制品所付出的較高的价格計算在內。

当范佛里特將軍于1953年3月从朝鮮回来时，他抱怨地談到他的軍隊在1952年夏天和初秋缺少某种类型的弹药。美国公众对于这一事实是不会感到惊异的。国防部长罗維特和国家生产局局长福勒在鋼铁案件的证詞中，曾經賭咒发願地談到，鋼铁生产停工将会影响我們运送足够的軍火到朝鮮前綫去的能力！

我想，我們并没有因为鋼铁厂关門而在朝鮮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这算是幸运的。从12月31日罢工首次說要开始，直到6月2日的整整五个月，政府采取的行动成功地保持了生产。所赢得的这个時間是宝貴的。但是不管律師們如何为之申辯，所損失的七星期是再也无法补偿的了。

不管最高法院的六位法官关于总統宪法权力的不同看法是什么意思，他总必須在国家危急的時刻采取行动。法官們說，只有当宣布战争或当国家遭到侵略时，总統才能拥有广泛的权力，这种說法是非常不现实的。我們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敌对行动不通过有礼貌地互换外交照会的方式就开始了。在战斗人員和非战斗人員

之間以及軍事目標和平民禁區之間，已不再有什麼顯著的區別。我們也不能把經濟事務和國防與安全問題截然分開。

在這個時期和時代，國家的防務不只指的是建立一支陸海空軍。這是要動用整個國家資源的事。作為總司令和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總統，必須能夠在任何時候採取行動，以應付任何對國家安全的突然威脅。一個賢明的總統永遠是會同國會合作的，但是當國會在發生危機時沒有採取行動或無力採取行動的時候，根據憲法，總統就必須運用他的權力來保衛國家。

第三十章

1952年的总统选举

我之决心不再做 1952 年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应回溯到 1949 年宣誓就职的那一天。当时我面对要再担任总统职务四年，我脑子里一直在考虑我国和全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我想到自己的未来，想到一个人应当就任总统多久和一个国家必须经常更换领导的问题。现在我已确定决不再参加竞选。但是我不能将这个决定告诉其他任何人。一位总统，由于他的职务的性质，必须尽可能地对这一决定保守秘密，直到最后的时刻。

在我就任总统一年多以后，于 1950 年 4 月 16 日在一个备忘录里写下了我的想法和我的打算，并把它收了起来：

“我不是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的候选人。

“我第一次竞选公职是在 1922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军队里服务了二年，在参议院十年，担任参议院副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二个月又二十天。我担任公职有三十多年，就任美国总统差不多整整两届。

“华盛顿、杰斐逊、门罗、麦迪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伍德罗·威尔逊以及卡耳文·柯立芝是就任两届总统的先例。只有葛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和弗兰克林·罗斯福试图打破这个先例。弗兰克林·罗斯福成功了。

“我认为，当八年的总统就够了，而且有时候，对任何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来说，都是吃不消的。

“权势有一种引诱力。它可以渗入人的血液，正如大家知道的

賭博和貪財有引誘力一樣。

“我國是一個共和國，是全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我願意這個國家繼續是一個共和國。辛辛納塔斯和華盛頓指出了這條道路。當羅馬忘記了辛辛納塔斯它就開始衰退。當我們忘記華盛頓、杰斐遜和安德魯·杰克遜這些人的榜樣（所有這些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原是能夠繼續擔任總統職務的），我們將開始走上獨裁和毀滅的道路。我知道，我能夠再度當選，並能繼續打破為弗蘭克林·羅斯福所打破的舊的先例。但我決不這樣做。今後這種先例的繼續，不應當靠憲法修改案^①，而應靠以在職的人的榮譽為基礎的慣例。

“雖然我可以辯解說，我只做了一屆總統，但為了重新建立這種慣例，我不是一個候選人，我將不接受另一屆的候選人提名。”

同年即 1950 年 7 月，我從基韋斯特的小白宮取出這一備忘錄，並且念給我的白宮部屬們聽。反應是可以預期到的。他們的情緒十分激動，並且表示了異議和失望。他們要求我不要把任何這樣的聲明公布出去。但是我不打算這樣做，到了適當的時刻我就會公布出去。

我已決心不參加 1952 年的競選，而我所關心的問題則是向人民推薦一位合適的人做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我認為最合理的、最適當的候選人是美國的最高法院院長弗雷德·文森。

文森在我國政府的所有三個部門里都有豐富的經驗。在這方面，兩黨之中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他的經歷。他在好幾屆國會中任職，在國會里他被認為是稅務和另外一些問題的專家。他曾在聯邦高等法院任職。在大戰期間，羅斯福總統任命他負責穩定經濟的工作。後來他作為總統的助理進入白宮，負責管理戰時經濟

^① 第八十屆國會提出這樣的憲法修改案（現在是第二十二次），但在寫這一備忘錄時，憲法修改案未獲得足夠票數的批准。

以及轉入和平生产的重大工作。文森在我任內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的职位又增添了他对內閣的經驗。当最高法院的內部爭执增长时,我又要求弗雷德·文森以他的卓越的行政管理的才干协助我,在最高法院院长斯通逝世后,我任命他为最高法院院长。

文森具有一种天賦的个人忠厚和政治忠誠,这在华盛顿上层人士中是罕見的。在华盛顿,有些人爭夺政治权益时常常背信弃义。而文森就不这样。他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和感情不外露的爱国者,他还能够始終不渝地对个人和对党表示忠誠。

当我在参議院他在众議院时,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尽管当时我們常常在政府工作事务上打交道。只是当我进入白宫以后,我才完全了解他,并且发展到对他很尊敬。我們紧密地一起合作。我們发现我們都对历史有兴趣,我們对历史上的許多日期和地点有爭执,这些爭执是通过事后的研究才解决的。文森精通現代的和古代的历史。他經常閱讀重要历史书籍,并一直与当前的出版物保持接触。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既广且深。我回想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足以說明文森忠心耿耿地和专心一致地对待本职工作。当我准备好去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談时,我要求文森和我一同前往,在那里做我的助手。但他拒絕了,他說:“总统先生,您就要出国,而且您要离开国内数星期。我想我最好还是留在白宫本职崗位上,以使日常工作不致中断。”

1950年夏,在我写完关于我决心不再竞选总统的备忘录以后,我第一个向文森提出建議,希望他继我为总统候选人。但他拒絕了。

1951年秋,我邀請文森到基韦斯特的小白宫来見我,在那个完全秘密的地方,我重新和他談起关于他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問題。我向文森扼要地指出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合理人选的理由。我們交談了这个問題的各个方面,最后他說,他将同文森夫人商談一

下。每当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时，他总是同她商量。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亲密的夫妇。

文森回到华盛顿对我說，在他同文森夫人商談并慎重考虑以后，他仍然真正地感到，并且在他的心目中认为，他不应当利用法院作为爬上总统职务的阶梯。针对这一論点，我回答道，我知道有些人曾經利用过法院，查尔斯·休斯就曾利用过它，照我看来，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没有什么錯。在那次会談后不久，并且在另外一次談話以后——这一次是同文森夫人談話——最高法院院长以身体健康为由，坚决地予以拒絕。我认为，如果文森真的作了总统，他将成为历届总统中评价較高的一位，但是很可能縮短他的寿命。

由于文森不願意出来，就我来说，活动场所现在就很开闊了。我的部属和民主党重新向我施加压力，让我重新考虑参加 1952 年的竞选。但是我的回答仍然同以前一样，我的决心已定，我們只能从其他地方去找总统候选人。

我开始从全国各个角落着手检查竞选的情况。寻找一位在气魄上、外表上和能力上都适宜的人来担任我国政府的最高职务，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們从經驗中知道，政府中正直的人通常是能够担負起他們的职务和責任的，尽管他們可能被认为是不适宜的。但是說到总统这一职务，則包含很多方面的考虑，虽然許多有資格的人可供选择，但这一次却没有一个是“必然的”选择对象。为了挑选一位最好的全面发展的候选人，使我想到伊利諾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我在 5 月 8 日写的备忘录如下：

“我已經說过，不要叫我担任第三届总统。我在 1950 年 4 月 16 日表达了这个意見。

“現在如果我們能够找到一位能接管并繼續执行公平施政、第四点計劃、合理就业、对农民实行平价政策并对消費者实行保护政策的人，民主党就能够从現在起一直得胜。

“目前，在我看来，伊利諾州州长有这样的背景并具备了所要求的条件，我想我应当和他談談。”

我喜欢史蒂文森的政治素养和从政經歷。我个人很欽佩他。我喜欢他的坦率和他精力充沛地参加州长的竞选运动。他在那次竞选中表明他具有一套政治本領和政治“感”，他知道最完美的政治既要懂得管理业务也要有管理艺术，他懂得政治这套本領是执行我国自由政府形式的职能所不可缺少的。

我特別重視史蒂文森作为許多机构首脑和內閣閣員的特別助手对联邦政府所作的許多貢獻。他在联合国和国务院的工作表明，他清楚地理解我国作为世界各国的領導和我們保卫和平的計劃所担負的任务。

下面是我同史蒂文森州长談話后所作的筆記的一部分：

“早在1952年1月，我曾邀請伊利諾州州长艾德萊·史蒂文森到布莱尔大厦來談話。有一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他來了。我們談了一个多钟头。

“我对他說，我不准备再参加总統竞选，我认为他最适合担任总統职位。他出身于一个有政治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曾作为副总統同格罗弗·克利夫兰一起参加1892年的竞选运动和选举。他的祖父还曾在1880年同温菲尔德·汉考克一起作过总統候选人。他曾經在国会里任职。

“艾德萊的父亲参加过伊利諾州政府的工作。艾德萊曾經在国务院和联合国为国家效劳。他曾是伊利諾州的一位出色的州长。

“当我同他談話时，我对他談到了我对总統职务的認識，它是怎样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权力和最伟大的职务。我要求他担任这一职务，并对他說，如果他同意，他将被提名为候选人。我告訴他，一位白宮的总統一向控制着全国代表大会。我提請他注意杰克逊、范布伦和波耳克。我談到1912年的塔夫脫，1920年的威尔

逊，1928年的柯立芝和梅隆，1936年、1940年和1944年的罗斯福。但是他说：不！他显然被我弄得不知所措。……

“3月4日那一天，史蒂文森州长又来见我，这一次是他要求见我的，他对我说他已经答应再度参加伊利诺州州长的竞选，他认为收回他的这个诺言是不正当的。我赞成他的看法，我尊重他这样做。他说他不希望人们认为他宣布重新参加他的大州的竞选，是为了取得进入白宫的阶梯。”

但是，我感到我在史蒂文森身上发现了他是我愿意将党的领袖的职务安全地交给他的一个人。他是民主党所需要的一种人，尽管我不能强迫他接受，但我确信他将理解到要把争取提名做候选人当作他的责任。

3月29日，在华盛顿首都国民警卫队军械库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午宴会上，我宣布我将不再参加竞选。

出席的民主党员将近五千三百人，我在讲话将结束时，离开了准备好的讲稿说：“我将不再参加竞选。我为国家服务的时间已久，而我认为我曾忠诚而有效地为国效劳。我将不再接受候选人提名。我不认为在白宫再度过四年是我的责任。”

大厅里顷刻之间鸦雀无声。随后不同意的喊叫声沸腾起来了，当我讲完话离开大厅时，不同意的叫声仍不断地传来。

当我宣布这一决定返抵白宫时，我发现白宫侍者和看门人几乎要掉下泪来，而侍候我岳母的两个女仆正在哭泣。我劝他们安静下来，照常工作。

我预料到，当我的一些朋友突然听到宣布这一消息时，会感到失望甚至震惊。但我确信，他们想必会知道，我是经过长期的和仔细的考虑才作出这一决定的，而且一直等到我认为适当的时刻才向公众宣布。

担任总统这一崇高职位的人往往理解到，他之当上总统仅仅

是因为更多的人民瞩目于他而不是瞩目于别人。但是如果他根据围绕他周围的人来判断他的处境的话，他听到的一百个声音都将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尽管其他所有的人都说他不是。一个总统，如果他想有清醒的看法和永不脱离实际，就必须从他四周的声音当中解脱出来，必须有自知之明，弄清楚他所得到的消息的可靠性。

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再改变主意的，而且在这一点上，我甚至更加明确，在现时条件下，变换一下国家领导对于我、对于民主党和对于国家都有好处。

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早在1950年或1951年我就宣布决定参加竞选，艾森豪威尔将军可能不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或者不会当选为总统。我持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我确认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相信他在竞选中没有对手，或许认为民主党也会提名他为候选人。

老实说，有许多贤明之士可以做民主党候选人。我很清楚地知道，历史上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得到执政党的提名，除非他得到白宫总统的支持。因此，我仔细地研究并考虑了每一个候选人。我同我的部属和顾问们讨论了他们的各项条件。我愈是权衡当时的局势，我就愈清楚地认为，从经历、经验和才干来看，史蒂文森州长都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

竞争提名候选人当中一位最能干最恰当的人物是阿弗里尔·哈里曼。他在政府服务的时间久而且工作出色。哈里曼在危急的大战期间和战后年代里在许多重要部门任职。他在伦敦经管租借法案的工作成绩显著。他担任驻俄大使和驻英大使的工作也很出色。在我的内阁中他是一位很能干的商务部长，在执行欧洲马歇尔计划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哈里曼非常重视，过去这样，现在仍然这样，但是我感到，由于他在竞选政治上的有限经验，以

及由于他对竞选公职的活动毫无經驗，他在这种特殊的場合就有些受到限制。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个星期，哈里曼来見我，問我是否同意紐約代表提名他为候选人。我答复哈里曼說，他可以采取这一步驟，但是我对他說，当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希望他能与大会提名采取一致行动，不管那个人是誰。有一些党的領袖也来見我，問我他們是否能帮助哈里曼，我对他們說，当然他們可以这样做。我国其他某些地区的集团也願意将哈里曼推选出来。我确切地对哈里曼說，如果他和史蒂文森之間到了摊牌阶段时，我将支持史蒂文森，因为我认为史蒂文森是民主党目前能够提出的最强的候选人。哈里曼和我之間达成的这种諒解已落后于7月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某些情势发展之后。

埃斯提斯·克弗維尔在竞选提名上展开了有力的和广泛的活动。他在众議院担任議員的經歷和他在參議院的工作在許多方面都是得到贊揚的。我知道他的名声。我贊同他給他的調查委員會所提出的任务，但是我不贊同他所使用的方法和他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的方式。

俄克拉何馬州的罗伯特·克尔是另一位討人喜欢的候选人。他是一个有能力、勇敢頑强和精明强干的參議員。不幸的是，克尔提出一項議案被我否决了，因为我认为該項議案对于公众不利。鮑勃·克尔^①已显示出，作为一位州长和一名參議員，他具有高度的行政管理和立法的才干。但是，根据我的看法，他在參議院內代表石油和煤气利益集团的經歷，就使得他沒有被选举的資格。我一向认为，任何一个人进入參議院或众議院去代表他本州的特殊利益，为了援助該特殊利益集团而首先提出立法案，这样的人就丧失了任何要求作为民主党全国領袖的資格。从历史上看，民主党不

^① 罗伯特·克尔的暱称。——譯者

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党。

佐治亚州的迪克·罗塞耳是一个可以考虑提名的候选人。他有才干，为人正直誠懇。他是参議院消息灵通的人士之一，可能对全国农业形势最为了解。作为一名参議員，罗塞耳往往能够以清楚和直截了当的方式提出問題，使得每个人都能理解。在麦克阿瑟委员会听证会举行討論时，他巧妙地掌握了会场。这件事表明他有作主席的才干、智慧和果断的气魄。但是由于他来自佐治亚州，那里的种族問題鬧得很厉害，他没有得到提名的真正机会。我相信，如果罗塞耳是来自印第安納州或密苏里州或肯塔基州，他很可能成为美国的总统。

当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临近时，艾德莱·史蒂文森仍然繼續不願意全力以赴。他不叫我公开支持他提名作为候选人。在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数次談話以后，史蒂文森州长仍然保持原来的态度。由于大会即将閉幕，因此民主党有必要另外决定一位强有力的候选人，并团結在他的周围。在这个場合副总统艾尔本·巴克莱起了关键性和戏剧性的作用。

巴克莱在人民中間、在党和国会內享有很高的声望。如果不是由于他的年岁的緣故，他应当是一个最合理的候选人。由于总统的工作异常繁重，年岁这个問題是不容輕易忽視的。也許，由于巴克莱的体力和精力抵銷了時間的作用，这种說法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他的情况，但是这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大約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二周——巴克莱宣称他願意成为总统候选人。我邀他参加白宫的一次會議，麦金尼主席和我的一些工作人員参加了这次會議。在这次会上，我們对巴克莱說，直到那时候为止史蒂文森一直拒絕参加竞选，如果他(巴克莱)真的要求提名，我們將支持他。

在7月21日芝加哥代表大会召开的那一天，巴克萊如約前往。但是，在一个主要方面，巴克萊沒有按着我們向他提出的建議去做。在征得工会領袖的支持时，我們建議他每一次只和一位工会領袖會談。可是，他沒有接受这个劝告，他安排了一次与十六位工会領袖見面的午餐会。我們知道这些工会領袖从来不愿聚在一起，这次會談的結果是：工会領袖們一致拒絕。我的看法是，如果巴克萊接受一位善于同工会打交道的党的領導人的建議，工会的这种拒絕原本是不会发生的，而巴克萊就会成为民主党的總統提名候选人。

同一天下午，在同工会會談失敗后，巴克萊到華盛頓來見我。他對我說，他準備退出，不做候選人了。我勸他繼續競選下去。但他說，他的夫人和他的支持者們建議他在目前情況下最好還是退出，他這次來見我的原因是想告訴我，他已將這一決定向報界公布了。我對巴克萊說，我了解他受到了工会領袖行動的挫傷，但我認為他目前仍是凭一时的任性而這樣做的，如果他堅持要退出，把代表大會突然撤下不管，他將來會感到後悔。

在同巴克萊談話后不久，我接見了商務部長查爾斯·索耶，他對我說，他認為在巴克萊還沒有和代表大會見面以前就允許他離開芝加哥是不對的。我同意索耶的意見，並打電話給芝加哥的麥金尼，建議他讓巴克萊出席代表大會作一次告別演說。這樣安排好以後，7月23日，艾爾本·巴克萊便由人陪同，到講演台上接受全國政治性代表大會從未有過的最熱烈的一次歡迎。

巴克萊的即席演說，是1952年代表大會的一次難忘的高潮。演說受到了熱烈的歡呼，這是在這樣集會上最生動最受人歡迎的演說之一。這是“副總統”最好的一次演說。我認為，這個演說是一位重要的候選人聲明退出時所能做的最偉大和再好不過的表示。

但是这幅非常出色的图画被污染了，因为巴克莱突然允许除他的州以外其他州的三个代表提名他为候选人。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尽管他告诉我他已经退出——人们已开始瞩目于他，代表大会好像会要造成僵局，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代表大会最后可能优先考虑提名他为候选人。但是，我对于他答应提名一事感到遗憾，因为他这样做破坏了他的精彩的告别演说。

第二天，7月24日，我在白宫收到史蒂文森州长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打电话来是为了问我，如果他答应被提名为候选人，是否会使我感到为难。我以激愤的口吻和强烈的词句回答了他，最后我对史蒂文森说，“自从1月份以来我就想办法使你这样说这样的话。这又怎么会使我感到为难呢？”

从那时候起，事情开始很快地向前发展，逐步形成的趋势是，代表大会将提名史蒂文森为候选人。

我发出命令给我在密苏里州代表团中的代理人托马斯·加文，命令他支持伊利诺州的候选人。

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虽然重病垂危，但仍然设法作了某些安排，以便随时了解代表大会的发展情况。他通知麦金尼和我说，当时机成熟时，他就会让康涅狄格州的代表团出面支持，并且指示部下届时通知他，不管他自己的健康情况如何。就这样，第一个打破僵局的州是康涅狄格州，变成了史蒂文森的支持者。这一行动使优势开始转向史蒂文森，而我公开宣布加以支持，则确定了他被提名为候选人。

实际上，如果巴克莱没有退出的话，如果当他见我时没有把事情弄得不可挽回的话，我就不可能在后期对史蒂文森说我将支持他的话，而巴克莱就将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

代表大会召开的第四天，帮助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集中于请

他出来参加竞选，而他却勉强地、好不容易地才宣布他自己为总统提名候选人。

第五天，7月25日下午，我的夫人和我乘上《独立号》专机飞往芝加哥。该机的司机长威廉斯上校放置一架电视机在我的座舱内。一路上我们注视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我们看到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和第三轮投票的开始。飞机抵达芝加哥机场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分。芝加哥市长马丁·肯纳利和代表大会主席麦金尼到机场迎接，然后我们驱车来到黑石旅馆。

我在旅馆里看了我的一些朋友，然后着手准备我的演说。大约在早上一点四十分，我抵达国际剧场，并走进代表大会的大厅。代表大会曾在下午四点钟休息过，一直到代表大会重新开始并且在史蒂文森得到提名以后我才露面。

我同史蒂文森走到讲台口，将他介绍给代表大会，并保证说：“我将竭尽全力并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取得胜利。”

代表大会在史蒂文森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以后再次休会。这时候，萨姆·雷朋、史蒂文森、麦金尼和我退到大厅讲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商讨谁做史蒂文森的竞选伙伴。在作出决定前我离开了他们，但在离开前我提示了一下，认为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约翰·斯巴克曼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斯巴克曼在一致赞成的欢呼声中，没有经过投票就当选了，于是第三十一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此闭幕。

在竞选总统运动中，史蒂文森的演说才能果然名不虚传。他的确擅长讲演，因为他的语句能明确地指出我们时代主要问题的意义。他特别善于阐述我国对外政策。他从不发表煽惑性的演说。他不作超过限度的诺言。他从不含糊不清地讲述一件事情，而是一针见血。有些人认为他讲的话不可理解，其实他是个毫不妥协的人。他的竞选活动是一次伟大的竞选活动，为党和国家增

加了光彩。他没有迎合人民的弱点，而是正视了人民的长处。他从不以原则作交易以换得选票。他在南部说了什么，在北部地区也说什么，在东部说了什么，在西部也说什么。他的光荣之处在于，尽管反对党提出挑衅，但是他不卷入个人之间的争吵，也不进行攻击。

但是，史蒂文森对于他想继任总统的态度，使我有些时候感到困惑莫解。我认为史蒂文森犯了某些错误。产生的原因究竟是由于他的顾问们的恣意或者是听到坏的报道，还是由于他染上了某些公民因为阅读反对民主党的报刊所患的传染病，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进行攻击，并且把他的竞选司令部移到伊利诺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寻求同华盛顿的政府机关脱离联系或者是同我分离。我不知道，史蒂文森是怎样想的，他怎么能希望促使美国的选民同意保持民主党执政，而又似乎想与民主党的有权力的分子脱离关系。

不幸的是，史蒂文森在俄勒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引用了一个记者的话，他说，他将清除“华盛顿的污垢”。我怀疑他是接受了共和党的欺骗宣传，把我们华盛顿窗户上苍蝇留下的粪污夸大为一个大污点或“污垢”。近几年来，共和党反对派曾企图制造一个案件来反对政府，但是它只发现政府对根除任何地方的贪污或恶习永远保持警惕。只要有人行贿，就必然有人受贿。这在私人企业是真实情况，在公用或政府企业也是这样。这在工业、银行和联邦政府亦同样是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在政府要少得多。由于史蒂文森在俄勒冈的疏忽大意，使得共和党反对派在艾森豪威尔竞选运动中敢于进一步提出两个骗人的论点——贪污和朝鲜事件。

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中另一个錯誤是，他拒絕同几个大的人口中心的民主党組織合作，沒有适当地同这些組織打招呼。这使我感到吃惊。我曾經认为他之出任伊利諾州长是因为他具有现实的政治判断力。我曾想，他那位机敏的祖父一定給他注入了某些坚实的政治本能。

由于史蒂文森在一开始就同許多有影响的政治領袖保持疏远，他可能认为他获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可是实际上，他却是沒有必要地牺牲了基本的政治后盾，而且可能失掉几百万选票。我这样說并不排除下列事实，即他获得了直到現在为止比任何其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得到更多的选民选票——弗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所取得的压倒一切的伟大胜利的情况除外。

党的領導工作和党的政治斗争，并不仅仅是发表演讲，尽管演讲可能是精采的。一位政治家很快地懂得，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演出，依靠政治界的帮助同依靠自己的才能同样重要。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史蒂文森現在知道，对許多人來說，政治是一种高度的組織工作，不是专干这一行的人要么必須很快地学会它，要么便是失敗。我常常把政治的含意解释为管理的科学，可能是一門最主要的科学，因为它包括使人民生活在一起的艺术和能力。竞选官职或参加总统竞选只不过是政治的一部分。为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尽职或处理公务是政治的实施。就我看来，我国两个主要大党的分歧之处在于，当共和党人在每次竞选中到下面去向人民討好时，我們民主党人却永远和人民在一起，通过已建立起来的政治組織同他們保持經常的联系。因此一个竞选任何官职的民主党候选人，如果他不是由于某种正当原因而抛弃組織的支持的話，他的竞选活动通常总是进展得很順利的。

1952年竞选中的另一个錯誤是，在华盛顿和斯普林菲尔德之間很少合作或根本沒有合作。实际上民主党开展了两个竞选运动，

因此重复和混乱时常发生。这种不幸的局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认为，史蒂文森要求我参加他的竞选时，时间似乎是太迟了，然而我还是尽快地投入，并且尽我的力量去做。我认为，史蒂文森先生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在克利夫兰和其他城市，对于所谓政府中的共产党问题采取了守势。共和党人中的轻率的煽动家编造了一套当代最无耻的谎言，他们说民主党人对共产党太软弱了。共和党人利用恐惧和大欺骗的伎俩来恐吓我们的人民，在他们中间制造混乱。历史的事实是，民主党政府采取了经济和军事的措施，保卫了西方的文明免遭共产党的控制。

正是民主党政府揭发并判决了我国人人皆知的共产党阴谋家，民主党政府在做这样的时候，并未抛弃我们的人权法案而诉诸极权主义措施。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用保持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来巩固我们的经济，从而有助于打垮共产主义，在那里饥饿和恐慌威胁着自由的人民。

这样的成绩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所有美国人，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都会理所当然地为我国在这一继续为世界民主而斗争的伟大时期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

我认为史蒂文森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因为他，如同艾森豪威尔一样，参加了本届政府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对于任何把他列入对反共持守势的行列的阴谋，他原本应当予以强烈的反抗的。他决不当向卑鄙的煽动家让步，因为当政府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时，他们当中许多人是畏缩不前的。

如果史蒂文森在1952年1月30日诚恳地接受我的建议，使我们能够适当地做好准备，我确信在芝加哥就谈不上有什么竞争，我认为他至少还可以多获得三百万选票。可能这不会使他获得足够的选票当选总统，但至少是可以谴责艾森豪威尔所进行的蛊惑

性宣传，并使他承认詹納尔—麦卡錫的“大欺騙”。

这样說了以后，我想說清楚我贊賞史蒂文森作为民主党的領袖和总统候选人的理由是，他能够出色地說明主要的問題。他善于将民主党的原則用感人心弦的語言表达出来的能力，使他赢得了好的名声，成为世界聞名的人物。我极端重視他的机智勇敢。面对共和党人发动的蠱惑性竞选运动，能够公正地和坦率地談話是需要有勇气的。史蒂文森尽管是失敗了，但是在美国人民中間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感人的和高水平的竞选活动，为国家和党增添了光彩。

当然，史蒂文森遇到了享有盛名的而为共和党所利用的艾森豪威尔將軍非常强烈的抗爭，任何一个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不得不面临巨大的心理上的障碍——竞选的对手是一位聞名的軍事上的英雄。某些共和党領袖認識到，他們不能靠塔夫脫参議員或其他老資格的共和党人来取得胜利。共和党，由于它是一个少数党，他們知道必須从民主党或其他无党派人士那里取得选票，以增强实力。他們获得实力的唯一希望是寻找一位候选人，这位候选人对选民的吸引力足以跨过党的界限。一位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战争英雄，他的名气似乎为一个很少有成功希望的共和党集团提供了难得的政治資本。

在1948年和1952年，甚至有些民主党人，由于害怕在竞选中失敗，也要求抓住这个人。重要的战争常常将某些軍事人物提到显赫的地位，他的名声和他的軍事技巧有助于建立民众的士气。这些人物的光彩很容易地跨过了党的界限。在艾森豪威尔宣布他是共和党方面的候选人以前，我們中間的許多人一直弄不清楚，他究竟是一位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他被人劝告說，他的名声在共和党内不会遭遇到任何反对，甚至有人这样鼓动他使他相信民主党也会一致提名他为候选人。这些顧問們显然不是代表共和党領

袖說話，当然更不代表民主党。随后在共和党领导中发生了一场艰苦的斗争，艾森豪威尔发现自己已深深陷入政治泥淖中。他不得不利用杜威和布兰纳尔的策谋和他个人的名声来赢得共和党的提名。

我們之中凡是知道艾森豪威尔在两届民主党政府下在军队里长期服务的人，都有理由相信，他将不同于一般的条件参加竞选。他在反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中和战后时期在重建西方国家的军事方面，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他的任务，无愧地赢得了盟国的感激之情。他有机会知道和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和我国正在做些什么。他协助两届政府贯彻重要的政策，并且在许多重要的决议上有充分的机会表现他自己。

当我们发现他后来展开了这样的竞选，我们大吃一惊并感到失望。他纵容了一次诽谤和歪曲事实的竞选运动，而这种诽谤和曲解连他自己也可能不相信是真的。这个运动大量地指控民主党政府贪污腐败。但是共和党执政二年却一直未能提出任何证据足以证明竞选时所进行的恶意诽谤是正当的，尽管他的司法部长进行了疯狂的调查。过去令人难以理解艾森豪威尔的地方现在清楚了，使我们感到很大震动的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竟被当作政治游戏来玩耍。当我们在朝鲜的斗争被盗用于党派政治目的时（而我们当时正同一个最顽固、最狡猾的敌人进行停战谈判），我感到我们无论在政治上或道义上都不能对此加以容忍。我能够理解某些孤立主义者利用朝鲜问题作为政治武器，但我永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位负责的军事人员，一位非常了解我们进行停止敌对行动谈判的极端微妙之处的人，会利用这一悲剧讨政治上的便宜。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政治史册将载入这样的一章。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底特律市的演说中宣称，如果他当选，他将亲自访问朝鲜使战争停

下来。当他說这話时，他一定会知道他是在削弱我們的談判。他一定会知道，这样一种旅行即使能够取得什么成就的話，也是很小的。他也一定会知道，他的这种說法，使美国人相信在他当选以后，他将給他們带来和平。在新政府执政后，战争仍进行了数月，而朝鮮的和平尙有待爭取。在我国国民中沒有一个能比他更有理由了解和有更好的机会去发现敌人的性质。任何人都无权利用这样一个危机为政治目的服务。

还有一些事情我也永远无法弄明白。当艾森豪威尔在威斯康星州进行竞选期間，他在密尔窩基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說，他被說服在演說中刪去了对他的从前的首长馬歇尔將軍表示贊揚的部分。艾森豪威尔同意刪去这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使参議員麦卡錫能够和他一起在讲台上出現。

我认为，由于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沒有經驗，他这次是上当了。艾森豪威尔之屈从于瘋狂的个人目的，是由于他发现，如果不竞争或不进行激烈的个人竞选活动，他可能得不到提名或总统职务。为了贏得提名，他必須紧紧追随向塔夫脫展开剧烈攻击的代表們。随后，为了贏得当选，他还必須展开一个全面竞选活动。

艾森豪威尔將軍获得了胜利。他获得全国有史以来比任何总统候选人所得到的票数都多的选票。但是，按比例來說，并没有接近弗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和1936年所得的多数票，或哈定在1920年、赫伯特·胡佛在1928年所得的票数。但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現六千余人参加投票的局面，甚至史蒂文森所得的票数也比罗斯福在1936年所得全部票数多十六万三千票。史蒂文森被击败了，对方多六百万票。

但是，富有戏剧性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二千七百万民主党員不为这位軍事英雄的魅力所惑，坚守他們党的基本信念，投史蒂文森的票。

这次竞选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名声很大以及所采取的竞选方式这两种因素加起来的緣故，这促使千百万从来没有行使过投票权利和义务的选民出来投票。

如果没有这些首次参加投票的千百万选民的支持，我怀疑共和党人能否在参议院或众议院中取得胜利，甚至连这个勉强取得的微弱的多数也是不可能的。

史蒂文森和民主党是在没有进行狭隘的党派之争，和没有在国家处于危机状态以虚妄的希望为诱餌的情况下，取得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的。

第三十一章

政权移交艾森豪威尔

1952年11月4日，我在吃早饭前，很早就到独立城的纪念堂去投了票。我在这个地方投票已经三十多年了。这里离我的家只有很短的一段路。但是这次投票在我来说却是一种新的体验。三十多年来，当我投票的时候，很少说在候选人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不是担任这项公职，便是担任那项公职。而这一次却是这种情况。我的夫人和玛格丽特同我一道走到投票站，我们想到了将来可以回到独立城我们的老家安安静静地和过和平生活的愉快情景。

在投票以后，我们便立即搭上了开回华盛顿的总统专车。我把我的注意力转向公务。就像以前历次选举一样，选举运动一旦结束，我便不再去惦念它，也不作什么猜测。我按照往常的时间就寝，当时还只有一些关于各个地区选举结果的零星报道。

但是，甚至在我还没有就寝以前，我就料想到我们在这次选举中是失败了。

半夜时分，有人把我叫醒，他递给了我一大叠关于各地选举结果的电报，我从上面看到，艾森豪威尔一定会获得这次选举的胜利。

我于是又转身睡觉去了。我没有听说史蒂文森准备在选举中让步。第二天早晨的报道表明，艾森豪威尔以获得空前未有的大多数选民票赢得了胜利。

我感到失望，但我并不感到奇怪。当我研究那些关于选举结

果的报道时，我看到在国会选举中，就整个选民的投票来说，还是以民主党这一边占多数；但是按选票的分配来说，就使得共和党占到微弱的多数并控制了国会。

在我国的全部历史中，要和一位身为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的军人开展政治斗争，总是存在着困难的。

在返回华盛顿的旅途中，我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马廷斯贝格站，从火车上拍给了艾森豪威尔如下一封电报：

“祝贺您获得大胜。1954年预算必须在1月15日前送交国会。初步数字已全部编制好，您应指派一名代表立即和预算局长会商。如您仍然想要前往朝鲜，《独立号》当归您使用。

“哈里·杜鲁门”

11月5日下午二时十七分，我在白宫收到下列电报：

“我非常感谢您拍给我的慷慨和多礼的电报。我将争取在两天内作出安排，派遣我的私人代表来和预算局长会商。最令我感激的是，您提出来要我使用《独立号》，但是请放心，三军中有谁能提供任何一架合适的运输机，便足以满足我计划中的朝鲜之行了。在取得您许可的情况下，我将把我拟议中的启程日期尽早地通知国防部长。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在收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报以后，我当天就拍给了他另一封电报，请他来自宫商讨关于如何有条不紊地办理新旧政府交接的问题。电文如下：

“感谢您迅速和多礼的回电。我想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即

我們必須有条不紊地来办理政府各行政部門的新旧交接事宜，特别是在我們这个国家和整个自由世界面临国际上的危險局势和問題的时候，更应当如此。因此，我邀請您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尽早来白宫和我商討关于这一过渡时期中的問題，以便使全世界都知道，在維護自由与和平的斗争中，我們这个国家是团结一致的。

“哈里·杜魯門”

在拍发这个电报以后，我便就选举事宜发表了一项公开的声明，同时宣布我已經邀請当选的总统前来白宫。声明如下：

“美国人民已經选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將軍为他們的总统。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这就是我們决定由誰来統治我們的方式。我代表人民的意志接受这一决定，我将支持由人民所选出的政府。我也請求全体公民都这样做。

“新政府和新国会将面临极端困难的問題，特别是外交方面的問題。对于这些問題的正当处理，将可能关系到我們是否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問題——而且，事实上，将关系到我們是否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生存下去的問題。同时，当前还没有什么能迅速和容易地解决这些問題的办**法**。要解决这些問題，就要求我們在未来的岁月中作出牺牲和进行艰苦的努力。我們必須支持我国政府为了維護我們的自由和获致世界和平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即使这将是一段漫长和艰苦的道路。

“我已随时准备尽我职权范围内的一切力量，协助政府各行政部門有条不紊地办理交接事宜。我已經拍电給艾森豪威尔將軍，建議他派出一个代表来和預算局局长会商，以便使他能充分了解預算中的各个項目的情况。我必須把預算送交国会，因为根据法律，这项預算应在1月18日移交新政府。凡是艾森豪威尔將軍希望移交給新政府的其他有关事宜，我們都将采取步驟，同他合作。

我已邀請艾森豪威爾將軍尽早來白宮和我會晤，商討這些問題，以便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在維護自由與和平的鬥爭中，我國人民是團結一致的。

“在結束這項聲明之前，我還不得不向史蒂文森州長所進行的這次競選運動表示我的欽佩和感激。他奉行了我國民主制度最優良的傳統。很明顯，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我們擁有一個將在未來歲月中對我們的國家生活作出巨大貢獻的新的偉大領袖。

“我們將來還會有其他的選舉。屆時我們將能再一次提出我們的看法和分歧意見，供美國人民抉擇。在目前，對我們大家最有利的是，加強團結，為了作為這個偉大共和國的公民的共同利益而一致努力。”

在發布這項聲明以後，我向白宮的工作人員和全體閣員以及各部門的負責人發出了一個口頭指示，要他們立即開始準備同艾森豪威爾會晤時所需要的材料。我要求他們就白宮當前所面臨的最緊急和最迫切的事務作出全面的報告和繪制相應的圖表。

我迫切希望做到有条不紊地辦理這次政府交接工作，並希望盡一切可能來保證我們外交政策的執行不致中斷。

在這一點上，我沒有理由對即將上任的總統感到耽心害怕，儘管這位總統為了競選的目的曾經令人遺憾地和錯誤地利用了朝鮮這幕悲劇。即將上任的總統原是了解或者說應當了解世界的局勢的。不管怎樣，他畢竟曾經擔任過歐洲的盟軍統帥，擔任過總參謀長，訪問過中國、朝鮮和福摩薩，後來他還回到歐洲去組織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武裝力量。沒有誰曾經比他獲得更好的機會去了解整個局勢的情況，特別是他當時曾擔任過那麼重要的職務。

第二天，11月6日，我收到艾森豪威爾將軍下面這封電報：

“白宮

總統

“謝謝您的电报。为了有条不紊地办理这次交接事宜，您建議我們俩亲自会晤，我对此謹表示感謝。由于我显然需要一定的時間来就指派重要助手的问题进行談話和会商，我敬謹建議，我們不妨把拟議中的这次会晤姑且安排在从11月17日开始的那个星期的头两三天。同时，在您的許可下，我想趁您提出关于派遣代表接交預算事务这一建議的机会，附带提出其他一些人員，以便接洽联邦政府其他几个部門的事务。这样，我們两人之間的会商便会取得最大的成果。我和您同样希望，我們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在根本問題上，美国是团结一致的。

“尊敬您的，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11月6日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

就在这一天，我原已派专人送交艾森豪威尔將軍一封信，提請他注意我必須作出政策性决定的一些有关国际局势的特殊事件。原信如下：

“亲爱的將軍：

“昨天下午拍給您电报以后，我便同国务院、財政部、国防部和預算局的負責人进行了会商。

“在联合国，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真正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这是必須采取积极态度去对付的。我希望您除了提出一个同預算局长接洽的人員外，还提出另一个人員，以便他能負責地同国务卿、財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商討这些問題。

“在联合国，有一項关于朝鮮的決議案尙待解决。

“伊朗問題是一个极为微妙的問題，它牽涉到我們同英国的关系。

“突尼斯問題也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問題，它牽涉到我們同法國和南非的關係。

“還存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問題，關於資源的分配公式還懸而未決。初步報告可望在11月15日提出。

“所有這些事情都牽涉到重大的政策性問題，而且只有美國總統才能作出決定，但是，儘管必須就這些問題作出決定，在沒有得到您贊同的情況下，我不願斷然作出決定。這些事情影響到美國對待自由世界的整個政策。

“如果您能指派一個全權的代表，或者由您自己到這裡來參加這些會議，那就會使這方面的問題獲得正確的解決。

“您的真誠的，

“哈里·杜魯門

“1952年11月6日

“致佐治亞州奧古斯塔

奧古斯塔國民高爾夫球場

美國當選總統

可尊敬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和自華盛頓以來各個總統的歷史經驗，我希望能幫助新總統在上任以前熟悉事實情況。

總統職責的繁重和複雜性已經發展到了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重大的決定是不可能等待的。總統不但必須根據他所掌握的事實情況作出決定，而且必須根據他對這些事實情況所具有的經驗和所作的準備工作來作出決定。一個新總統在上任以前沒有充分聽取情況匯報，便要來作出一系列關係重大的決定，那將是極大的困難。我認為，一個離任的總統不去幫助他的後繼者承受政權，不把這一點作為自己的職責，這是我們的政治傳統中有所疏忽之處。

这种疏忽可以追溯到我国的早期历史。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在半夜里离开白宫的，因为他不想在杰斐逊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和他见面。这给杰斐逊造成了困难。但是，同今天的局面相比，他的困难只是一种较小的困难。在杰斐逊时代，我国的人口只有五百三十万零八千人，而在我必须将政权移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人口却达一亿六千万人。我们现在的某些县，几乎拥有杰斐逊时代整个国家那么多的人口。

在较近的历史中，塔夫脱总统没有向伍德罗·威尔逊办好政府的移交工作，尽管塔夫脱曾经陪同威尔逊乘车去参加就职典礼。塔夫脱没有把政府部门的任何事情给威尔逊作好安排。

威尔逊也没有向哈定办好政府的移交工作，不过当时威尔逊是一个病人，他在争取挽救国际联盟命运的斗争中受到了打击。

赫伯特·胡佛在1932年的选举后不久，曾经邀请当选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到白宫来商讨全国性危机问题。罗斯福去过白宫两次——一次是在11月下旬，一次是在12月。但是他拒绝在实际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时承担责任。罗斯福自己提出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当选总统，在宪法上还没有赋予他承担唯有总统才能行使的决定权。除了就职典礼的前两周内由离任的和接任的财政部长非正式地在一起进行工作外，政权并未移交。

1945年4月12日，当我成为总统的时候，交接方面的情况有些不一样。罗斯福是突然逝世的，这就使我不得不尽自己所能地去熟悉情况。当时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自然要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因为人人都希望赢得这场战争。由于每个人都惦念着要赢得这场战争，这就给政府的事业造成了一种生气蓬勃的局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移交方面的问题也就成了如何把这一事业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当时全国坚强地团结在一起，不分党派的精神始终得以保持。

但是我們現在却面臨着不同的局勢，我們的國家剛剛進行了一場令人無比遺憾的激烈鬥爭。

我堅決認為，我們應當使政府的每一個部門都能有条不紊地移交給新政權，協助它繼續保持這個國家的生氣蓬勃的局面。

11月7日，我收到了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如下回電：

“佐治亞州奧古斯塔，

1952年11月7日

“親愛的總統先生：

“由於我堅決相信應當採取兩黨會商的方式來處理我國的外交問題，因此對於您在11月6日的信中所提出的建議，即由我派出一個代表來參加外交方面某些急待作出決定的問題的討論會，我特別感到欣慰。不過，由於我一直沒有找到羅致我的顧問和助手們的機會，要指派一位對參加這種會議能起有利作用的人員，還略需時日。我一定優先注意這個問題，我將最遲在下星期一（11月10日）以前再同您聯繫。

“在您的信中，您使用了‘全權的’這個字眼，我猜想，您使用這個字的意思是希望我派來的代表能夠準確地反映我的觀點。這一點我的代表是能夠做到的，但是，很自然的是，他的全權也就只能到此為止，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我自己還沒有什麼全權可言。

“尊敬您的，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當天我拍給當選總統一個電報：

“佐治亞州奧古斯塔

奧古斯塔國民高爾夫球場

美國當選總統

可尊敬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您昨天的电报刚好在我派出的信使离此前往奥古斯塔以后收到。关于政府各行政部門的移交問題，我們的想法显然是一致的。我滿心高兴地希望能在 17 日見到您，如果这个日期对您完全合适的話。您如能尽可能早地派出同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联系人，我将十分感謝。要完成預算的編制工作，并在 1 月 18 日前作好准备，将預算送交国会，这是需要很大一部分时间的。我希望您派出的人員尽可能迅速地向預算局提出报告。

“哈里·杜魯門”

两天以后，11 月 9 日，当选总统拍来了如下电报：

“佐治亚州奥古斯塔，11 月 9 日

下午五点十分

“白宫
总统

“根据您几次函电中所提到的事情，我謹委派馬薩諸塞州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参議員作为我个人的联系人，来同政府各部和其他机构(預算局除外)进行联系，这种联系工作可能对促进新旧政府各項公务的交接工作有所裨益。

“洛奇参議員将在本星期內来华盛顿，到达时定当通知办公厅。

“我还委派底特律的約瑟夫·道奇作为我个人的联系人，由他本着同一目的来和預算局长进行联系。道奇先生打算在 11 月 12 日来华盛顿，他将很快同預算局长接头。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我立即在一个呂宋紙的信封上……草拟了如下回电：

“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可尊敬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您提出的两位先生我非常满意。谢谢您这样迅速地将他们提出来。

“总统

“1952年11月9日”

另一方面，国务卿艾奇逊曾经向我表示，他对艾森豪威尔拟议中的朝鲜之行将给停战谈判和联合国对这一谈判的支持所带来的影响，感到耽心。11月6日，艾奇逊给我留下如下一份备忘录：

“我们昨天讨论了关于朝鲜和联合国大会的局势这一紧急问题。

“您知道，在纽约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大会现在正面临一项具有空前重要性的议程——讨论朝鲜问题。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和进行细致的外交准备活动以后，美国和其他二十个发起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开幕以前，提出了一项关于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所采取的举行停战谈判的决议案，特别是表示赞同联合国军司令部所采取的关于战俘的不强迫遣返的立场，赞同向共产党人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接受这个显然是最后阻碍停战谈判达不成协议的原则。

“美国提出的决议案中所包含的一些原则，是获得人们的高度支持的，我们希望并期待这一决议案很快就能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从而在联合国大会和世界舆论的无比强大的压力下，迫使共产党人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各项建议的基础上接受停战。但是，由于看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有朝鲜之行，许多代表都摸不准他究竟是否会支持迄今美国在停战谈判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因此都似乎不大愿意就这项决议案进行表决。苏联人和一些‘中立的’代表

困很快就会利用这种局面来在联合国大会进一步制造不利于美国的那种混乱和怀疑的气氛。

“在代表們中間，关于艾森豪威尔將軍朝鮮之行的可能后果，也存在种种推测。有些代表似乎认为，朝鮮之行可能会影响到联合国軍司令部在板門店所采取的立場，也可能会改变联合国軍司令部的談判人員迄今所持的观点。另外一些人則推测可能会由此而作出与自己有重大关系的重要軍事决定。

“如果艾森豪威尔將軍认为他可以发表一个声明，申述他的朝鮮之行的目的，并表示支持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目前所进行的各种努力——要是他能这样做的话，那就会无可估量地有助于应付这一严重的局势。……”

我告訴艾奇逊，当艾森豪威尔將軍这次來白宮訪問的时候，我盼望同他談談这个問題。

我希望能确有把握地做到不致于丧失我們在国际上的領導地位。这种国际上的領導地位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和千百万人民的生命。

自从我宣布不做 1952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那天起，我就时常想到如何做到有条不紊地将政权移交给后继者的問題。甚至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芝加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各自的总统候选人以前，我就下定决心，要使双方的候选人都能經常了解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发展情况。我有着双重目的。首先，我希望使外交政策不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其次，由于我們具有領導世界的責任，我希望能确实做到，不管是誰当选总统，都能充分获得有关方面的情报，能为将来处理外交事务作好准备。

因此，8 月 13 日，即使竞选运动还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就拍給艾森豪威尔將軍如下一封电报：

“白宮，1952年8月13日

“科羅拉多州丹佛

棕宮旅社

可尊敬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您如能在下星期二(19日)光臨參加內閣的午餐會，我將至感愉快。如您希望把您的新聞秘書和其他工作人員一道帶來，我也將樂於接待他們。如能在十二點十五分到達這裡，我將請史密斯將軍和中央情報局向您匯報一下外交方面的情況。然後我們再同內閣閣員共進午餐。之後，如您願意，我可以叫我的全部工作人員向您匯報白宮的情況，以便使您了解所發生事情的全貌。我已經和中央情報局作出安排，由該局每周向您提供一次關於世界局勢的情報，正如我們向史蒂文森所作的那樣。

“哈里·杜魯門”

第二天，艾森豪威爾拒絕了我的邀請，並作了如下回答：

“親愛的總統先生：

“謝謝您關於由政府某些機構向我匯報外交情況的建議。就我私人來說，我還應對您希望我出席午餐會的邀請表示感謝。

“我當前所處的地位是作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以及作為其他希望全國政府有所改變的美國人士的旗手，因此我的職責是繼續自由自在地在我認為得當和符合國家利益的時候，公開對現政府所採取的政策和行動進行分析。

“在當前這個時期，人民正在就我國今後四年的領導人作出決定。這也就是要在由共和黨提名的人和由您和您的內閣所支持的候選人之間作出決定，而在您拍給我電報以前，您是同這位候選人進行過會商的。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和在這樣一個時期，我覺得我們

彼此所交换的情况，应当只限于美国全体民众所周知的情况。因此我认为，如果我应您的邀请来参加在白宫举行的会议，那将是不明智的，并将在公众人士的思想造成混乱。

“正如您所知道的，您提出要加以讨论的问题，都是我多年来所经历过的问题。但撇开这一点不管，一旦出现严重危急关头，我是可以立即改变我的这一决定的。而在您的来电中，却丝毫没有表明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承您盛情建议由中央情报局每周寄给我一份报告，我谨表示欢迎看到这些报告。但是，根据我的看法，除了牵涉到美国安全的事情外，美国人民都有权了解关于国际局势的全部事实。我希望明确这样一点，那就是拥有这些报告，决不能限制我凭自己的判断来对外交纲领进行讨论和分析的自由。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谨复”

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令我很生气。很明显，政客们已经开始向他乱出主张。8月16日，我亲笔给艾森豪威尔写了如下一封私人信：

“亲爱的艾克^①：

“如果我使您感到有任何为难的地方，我谨向您致歉。

“我经常想到的一件事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如何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得以继续执行下去。您知道这是事实，因为您曾经参与制订这一政策的工作。

“在美国的范围内，必须停止党派政治。我感到无比遗憾的是，您竟然容许一小撮阴阳怪气的人物来离间我们的关系。

^① 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

“您犯了一个严重的錯誤，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严重的錯誤而使这个伟大的共和国受到損害。

“像这样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希望看到这个共和国繼續保持下去，不管在世界历史上占据最重要地位的人物是如何想法。

“恳求上帝指引您，賜給您智慧。

“这是这样一个人写給您的信，他一直是您的朋友，也一直想成为您的朋友！

“真誠的，

“哈里·杜魯門”

三天以后，8月19日，艾森豪威尔將軍寄来了一封私人的回信，也是亲笔写的。他在信中对我16日寄給他的殷懃致意的信表示真誠的謝意。他說他希望我放心，我对他发出的邀請並沒有使他个人感到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他說，他的感觉是，既然已經卷入这场政治斗争，那末，一旦他同我以及同我的內閣会晤，就牵涉到必須向公众进行舌敝唇焦的解释。他繼續說，由于在我的邀請电中沒有表示国家有什么紧急事，加以他已不再担任任何公职，因此他认为比較聪明的办法是謝絕这次邀請。

艾森豪威尔將軍說，他希望再一次表示，他感謝我的邀請和关于由中央情报局每周寄給他一份报告的建議。他說他将通过这些报告經常了解外交方面的情况。他在信中最后向我保证，在外交問題上，他支持真正的两党政治。

11月18日上午，国务卿艾奇逊、财政部长斯奈德、国防部长罗維特和总統助理阿弗里尔·哈里曼同我一道举行會議，就当天下午将和艾森豪威尔进行商討的事項交換了意見。同艾森豪威尔的會議預定在下午二时举行。

艾森豪威尔將軍在一点五十五分来到白宮办公厅，他立即由

人陪同引进我的办公室。随同他一道来的还有参議員洛奇和道奇先生，但是我請这位当选总统在我們和諸位助手共同举行會議以前，单独和我商議一下。

艾森豪威尔脸上沒有笑容。我觉得他显得有点紧张。我想使他感到随便一些。在接触到这次會議的目的以前，我就办公室悬挂的一些图画和他閒聊起来；我指給他看那个壮丽和巨大的地球仪。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曾經使用过的地球仪，波茨坦會議期間我在法兰克福見到他的时候，他将这个地球仪送給了我。我对他說，我打算把这个地球仪給他留在白宮使用。他表示接受，但他脸上仍然沒有笑容。于是我便开始进入正題。

我对他說，我认为，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有必要举行这次會議，我想到有两个重大的理由。

我們必須再一次向其他国家保证，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在这一过渡期間，必須消除那种惶然不安的情緒。

我說，我希望把話說清楚，我提出的关于和他进行合作，以便将政权有条不紊地移交給他执掌的建議，是一个真正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建議。我的目的不是要設置政治圈套，我沒有这样的打算，也不是力图推卸我作为总统所承担的任何責任。

我告訴他，按照宪法規定，一个卸任总统在他的后继者举行就职典礼以前，他都是能行使总统任內所具有的权力和責任的。在1月20日前，仍将是我的責任，我希望履行这一責任。

我說，我知道，任何当选总统在取得法定权力以前，都是不願意承担作为总统的任何政治責任的。他們这样作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名正言順的。

我說我的政府并不希望新政府过早地承担責任。但是，也可能有某些外交政策方面的問題，使我們不可能貫徹下去，除非其他国家确实知道我国的外交政策将由新政府繼續执行。

这就不是現政府的权力所能决定得了的事。

我說，“我們將告訴您這是一些怎樣的問題，我們將歡迎您對這些問題表示贊同和支持，如果您希望給予這種支持的話。

“但是我們將不強迫您這樣做。這個問題必須由您自己根據美國的最高利益來作出決定。”

我建議當我們到內閣議事室同其他的人一起開會的時候，擇要談談國際上的這些問題。

但在到內閣議事室去參加會議以前，我想告訴當選總統艾森豪威爾幾件我認為對他了解原子能方面至關重要的事。

我概括地敘述了一下必須由總統來作出決定的原子能問題，以及總統怎樣會同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委員會進行工作的情況。我提醒他注意原子能方面存在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牽涉到我國同聯合王國和加拿大之間的关系。

我提出應當作出安排，讓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戈登·迪安為他提供有關原子能計劃的最新材料。

我們的會晤一共二十分鐘，然後我陪同艾森豪威爾將軍走進內閣議事室。

同我們在內閣議事室一起參加會議的有艾奇遜國務卿、羅維特部長、斯奈德部長、哈里曼、參議員亨利·洛奇和約瑟夫·道奇。

我在宣布開會時作了如下講話：

“我邀請你們幾位先生到這裡來和我會談，是為了在1月20日以前這一暫時的過渡期間，建立一個旨在充分了解我們的問題和目的的組織形式。

“就我們國家同其他國家的关系而論，我認為在這一期間，主要的是要避免現政府及其後繼者之間產生的不必要的分歧。這有好幾層理由：

“第一，這將向全世界表明，在外交政策方面，我們的國家能做

到政治上最大可能的团结一致。

“第二，这将有助于保持国外人士对美国的威力和声望的尊重，保持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们对我国外交政策的信心。

“第三，这将有助于制止克里姆林宫为了离间美国同它的盟国和朋友们的关系所作的努力，有助于不让克里姆林宫利用这样一种误解来制造危机；即认为在我们维护自由世界的团结这一目的方面，我们是分裂的或动摇的。

“这也就是我希望现政府尽其所能地进行协助，以便把我们的职责有条不紊地移交给我们的后继者的目的。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的。

“我希望使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同事们获得有助于他们接管政府工作的情报。

“我的目的不是企图推卸现政府从今天到1月20日这段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责任。直到1月20日为止，我将一直奉行我认为正确的政策，我也将对这些政策负完全责任。

“有些问题，可能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而有待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他的看法。但是这也还是要由他自己来决定是不是愿意这样做。

“我欢迎艾森豪威尔挑选洛奇参议员和道奇先生来同本政府建立联系。我们将同他们充分进行合作。

“如果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随时指派更多的代表，我们也将乐于和他们共事。

“我们希望竭尽全力来协助即将执政的政府，一方面我们为当前的问题充分提供背景材料；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你们将来必须处理的问题预先提供有关的情报。

“我们的目的不是企图使新政府承担责任或义务，我们没有这种打算。

“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是力求对局势提供常識性的探討。”

然后我告訴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士，我剛才已經同艾森豪威尔將軍私下作了一次談話。在說到這里的时候，当选總統問我是不是可以給他一份关于我們这次談話的备忘录。我向這位將軍保證，我很乐意这样做。

接着我遞給他兩頁由財政部長約翰·斯奈德所準備的一份备忘录。這份备忘录扼要地提出了新政府必須加以處理的某些問題，是為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顧問們提供有關情報以供他們參考的。它涉及到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和美國的国际地位問題。

我們邀請当选總統的財政顧問們隨時蒞臨財政部，以便听取該部專門人員的詳細匯報。

然后我請艾奇遜國務卿提出某些或者是立即需要加以注意，或者是应当由艾森豪威尔將軍認真考慮的問題。

在艾奇遜發言以前，艾森豪威尔將軍問我他是否应当把國務卿提到的問題記錄下來，或者是交給他一份备忘录。艾奇遜同意交給他一份包括這些問題的备忘录。

然后，艾奇遜說，他將談到一些迫切的問題，這些問題目前就需要採取行動去加以對付，而对1953年1月20日接管政权的新政府來說，在今後的岁月中都可能具有重大的影响。

為了節省時間，艾奇遜只談到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他對艾森豪威尔將軍說，他認為最好是艾森豪威尔將軍能擴大他同國務院進行联系的範圍，以便能有尽可能多的和為他所信賴的人員得以熟悉在1月20日以後必須加以處理的事務。

艾奇遜接着談到聯合國討論朝鮮問題的情況，特別是在討論到有關戰俘問題時的情況。

由於前幾天印度提出了一個折衷的建議，聯合國大多數國家的團結有瀕于破裂的危險。艾奇遜就這方面的情況作了解釋。

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代表已经表示准备对印度的建议作出某些修改，使它让大家看起来显得顺眼一些，但是这样做事实上就是要我们放弃我们所坚持的原则：由战俘自由选择。

艾奇逊说，在纽约，正在形成一种极其严重的局势。同维辛斯基进行辩论的结果，不应当采取强迫手段来遣返战俘的意见已极为普遍地为人所接受。就连维辛斯基也不愿意赞成与此相反的原则。而中立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所采取的方针则是要设法挫败这一原则。在这一点上，它们得到了加拿大人和英国人的强烈支持，而现在又得到了法国和其他国家人士的支持。挫败这一原则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把战俘交给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不对战俘采取强迫手段的，但是要由它来遣返战俘，而这些人在被遣返以前，便始终是战俘。如果这些战俘在三个月之内没有得到遣返，那就要把他们交给一个政治会议去讨论，这种政治会议无疑会继续重复同样的程序。

“他们的企图是，”国务卿继续说，“接受关于这一原则的说法，而仍然使共产党人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的——遣返战俘。在那个委员会之下，战俘们除了被遣返外，无法逃避做俘虏的命运。”

“如果这样一个建议获得通过，那就会产生某些明显的后果。首先，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我们显然已经放弃了我們自己的原则。挫败这一原则的做法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其次，我们无疑将依靠使用武力的办法来反对将战俘交给一个委员会；尽管这个委员会不采取强迫手段，但是在战俘们得以返回家园以前，他们将始终只能是俘虏。”

“第三，我们将签订一个最不可靠的停战协定，在战俘营里，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麻烦问题。”

“陆军将不让在敌军防线上进行任何视察，它将不可能正当地部署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

“共产党人将在北朝鲜无所约束地修复飞机场。我们随时都可能被加上破坏停战协定的罪名，因为关于战俘的建议是含糊的，行不通的，也几乎肯定会引起种种误解。

“因此，纽约方面的局势要求美国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来击败或者改变这种想要使自由遣返原则归于无效的企图。这就牵涉到要使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同我们连成一气的问题。很明显，已经到摊牌的时候了。杜鲁门总统和他内閣的顾问们的态度是明确的。因此，如果有人屈服的话，那只能是那些企图使这个新建议获得通过的人。

“辩论将于明天(星期三)开始。就建议进行表决最早是在星期六，很可能要到下星期。

“艾森豪威尔将军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关于支持现政府观点的任何声明，都将发挥有助于问题获得解决的最大作用。我已经准备好可能发挥这种作用的一个声明，现在把它交给洛奇参议员。

“我已经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代表，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任何分裂，将在美国招致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对集体安全理想的幻灭。这种后果还不限于影响到朝鲜问题，而且会影响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协定。”

下面就是我们建议艾森豪威尔发表的声明，

“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建议)

“美国人民迫切希望在朝鲜获得和平。但是，他们坚决要求签订一个体面的停战协定。这个停战协定必须是一个清楚明白的停战协定，它应当解决一切军事上的问题，不容留下任何可钻空子和招致误解的地方。

“在共产党人手中的我国战俘必须立即归还。在我们手中的共

产党战俘应当让他们回家。但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凡是坚决抗拒回到共产党国家去的人，不能把他们赶回去。不能把他们永远当俘虏看待。必须把他们释放，使他们成为自由人。

“我希望联合国大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坚定的立场。”

没有人请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就我们建议的这个声明作出回答。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将在星期二见到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届时当同他商量一下有关朝鲜的问题。

然后艾奇逊谈到伊朗的局势，这里的局势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这是伊朗和联合王国之间关于石油的争执。艾奇逊国务卿建议新政府应当密切注意这里的局势，因为很可能会因此而引起巨大的麻烦。他认为，如果美国能主动地和单方面地采取某些行动，将有可能促使双方求得共同的解决。

艾奇逊谈到新近法国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方面的一些纠缠问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然是艾森豪威尔所熟悉的。

在谈到东南亚的情况时，艾奇逊说：

“我们长时间以来就很关心对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方针。在法国，很大一部分人的意见都认为这里的事业是失败了，它既耗费法国的财力，也减弱了法德两国在欧洲防务方面保持同等地位的可能性。

“从军事观点来看，法国在印度支那是显然缺乏进取心的。印度支那的中心问题是老百姓采取一种骑墙的态度。除非他们获得合理的保证，知道谁是胜利者，而这个胜利者将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是决不会倒向这一边或那一边的。

“在援助法国方面，我们所已经做到的是为它负担印度支那战争费用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我们已经在美国、联合王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之间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的目的旨在从

軍事上求得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来对付中国人公然干涉印度支那的这种意外事件，但无效果。现在法国想从政治会议入手来促进这一问题获得解决。

“这是新政府必须作好准备和采取行动去加以解决的迫切问题。”

艾奇逊指出，所有这些外交上的问题，都是在我的命令下就如何把我国的资源用于外援方面所进行的一次调查研究中提出来的。

洛奇先生（他曾经为我在这个调查研究工作中效力）说，他了解这项调查研究工作。艾奇逊先生还补充说，这项工作涉及到对这样几方面的研究：如何恰当地把国家资源分配于外援而不分配于国内的重振军备，如何在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之间进行分配，以及如何在地区方面进行分配。

艾奇逊结束他的发言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希望能看到国务卿这次发言的一份备忘录。他将对这一备忘录和所建议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进行仔细的研究。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认识到所讨论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他接着说他准备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立即同罗维特部长去会见三军参谋长听取军事汇报。

我曾经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在五角大楼等候，以便就朝鲜问题向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一次专门的汇报。

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我于是就我在白宫已经准备好的一项联合声明的草稿进行了商讨。他请我在两处地方作了修改以后同意了 这个声明。这次会议在下午三点十五分结束，接着由白宫发布了下列联合声明：

“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今天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在他们自己单独进行会谈以后，又同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共同

安全局长以及艾森豪威尔將軍的助手洛奇參議員和道奇先生举行了會談。

“會談以後，總統和艾森豪威尔將軍发表了如下聲明，

“‘我們討論了在国际关系方面影响到我們國家的一些极关重要的問題。同這些問題有关的情報曾經提供艾森豪威尔將軍參考。

“‘根据我国宪法，總統在离任以前必須履行其職責，在其后继承者就任以前，不能要求他分担或承担總統的責任。

“‘我們已就現政府和未来政府之間的联系和交換情報的工作建立一个組織形式，但是我們並沒有作出违背我国宪法整个精神的安排。沒有人要求艾森豪威尔將軍在他宣誓就職以前承担總統的任何責任。

“‘但是，我們認為，我們为了进行合作所作出的安排，将对巩固我們的國家和对国际事务的有利进展具有重大意义。

“‘我們相信，这次會談和我們今天为了进行联系和新老政府之間的合作所作的安排，为本國人民本着继往开来和勇于負責的精神来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提供了新的证明。’”

在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离开以后，我很大感不解。我觉得，直到在白宫举行的这次會議为止，艾森豪威尔將軍還沒有領悟到摆在他面前的工作的无比严重性。他在會議期間所表現的那种态度，我总觉得有些地方无法理解。也許是因为这次會議使他第一次認識到總統的职位和責任意味着什么。他也許由于看到總統所必須应付的一系列問題和必須作出的各式各样的决定而感到耽心害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倒还将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整个會議期間他都是那么一副冷冰冰的严肃相。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他也許不了解政府过去所作所为的真相，因为在党派政治的斗争中，他所知道的都是一些遭到严重歪曲的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直还在惦念着。